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 中将风云录 (一)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 前 言

1997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70周年华诞。为隆重庆祝这个盛大节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首批推出《将帅风云录》系列丛书六集，即：《十元帅风云录》、《大将风云录》、《上将风云录》（一、二集）和《中将风云录》（一、二集）。

这部丛书所收录的人物，除极个别走向反面之外，都是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披荆斩棘、不屈不挠、浴血奋战过的我军高级将领。当中，有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有功勋卓著、驰名中外的战将，也有卓越的政治工作者、杰出的后勤工作者。他们在战火纷飞和白色恐怖的年代，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前赴后继、英勇奋斗，为推翻反动统治，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们又肩负起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的重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又为人民军队的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呕心沥血，殚精竭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是人民的功臣、后辈的楷模，是党和军队的宝贵财富。然而，本丛书并不是着重反映他们戎马一生的历史传记，而是针对人物的特点，从一个侧面撷取他们在漫长的革命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年代最为闪光的、富有传奇特色的轶事和风采。俗话说，“一叶知秋”、“滴水映海”。轶事和风采同样能让人们感悟到，革命前辈们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用鲜血与生命谱写的一曲曲感人肺腑的绚丽乐章。

革命的事业是英雄的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人民解放军走过了70个春秋，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里程，创造了千古不朽的辉煌。70年如一日昭昭于世。在这场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中，值得我们崇敬的革命老前辈们，为世人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概括起来，即坚定的政治信念，顽强的革命意志，高尚的人生情操，强烈的使命感，高度的责任感，严谨求实的作风，认真科学的态度，无私奉献的精神……。这些，不正是人民军队战无不胜，坚不可摧的基础所在，不正是中华民族威武不屈，富贵不淫，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所在，不正是今天一代一代革命继承者永志不忘，躬亲实践的精神准则吗！

基于上述思考，在建军70周年的喜庆日子里，我们把这部丛书奉献给广大读者，希望能得到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喜爱，若诚能如此，我们将感到无比欣慰。

编者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

## 中将风云录

## 虎将王必成

胡兆才

王必成（1912～1989）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湖北省麻城人。1912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里。1928年参加了当地赤卫队，1929年4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4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当过勤务员、班长、连长、指导员、营长、副团长、团长、团政治委员。他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的反围剿战斗和举世闻名的长征。抗日战争开始，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调到新四军抗日前线，任新四军第1支队第2团参谋长、团长，率部随陈毅在江南敌后开辟茅山抗日根据地。他率部伏击竹子岗，夜袭新丰车站，奔袭车湾据点。第2团被江南人民誉为“老虎团。”1940年7月，随陈毅、粟裕北渡长江，参与创建苏北抗日根据地。1941年后，担任新四军第1师第2旅旅长。1942年底，奉命率第2旅南下苏南，担任第16旅旅长。1945年初，担任苏浙军区第1纵队司令，进行对日反攻作战，解放了金坛、溧阳、高淳等地。1946年担任新四军第6师副师长，率部参加苏中战役。1947年担任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司令员，参加了莱芜、孟良崮、沙土集、豫东、淮海等战役。1949年2月担任第24军军长，参加渡江战役，担负警卫南京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浙江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副司令，南京军区副司令，昆明军区第一副司令、司令员，云南省委第二书记。1980年担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自由独立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89年3月13日在南京病故。

### 苏南抗战连战皆捷

大凡名人都有成名之作，画家有成名之画，小说家有成名之小说。王必成被称之为虎将，当然有他的成名之战，那就是茅山抗战。

1938年3月，当时苏南已沦陷数月，日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国民党10余万军队不战自溃，军政机关纷纷溃逃，苏南社会秩序极其混乱，散兵骚扰，盗匪蜂起；维持会、绥靖队等汉奸组织应劫而生；“游击队”四起，群雄角逐，鱼龙混杂，有的打着抗日旗号敲榨勒索，与盗匪无异。广大人民在日寇、汉奸、盗匪的践踏和蹂躏下，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危难之时，新四军第1支队第2团奉命进入茅山地区，他们以自己的模范纪律、政治宣传鼓动和战斗胜利，建立了威信，取得了人民的信赖和支持。不久，团长张正坤调走，王必成升任团长，他指挥第2团打了许多漂亮仗。

同年6月28日，在镇江西南竹子岗附近伏击敌汽车队，毁敌汽车6辆，俘敌华中特务机关部经理官明弦正南。

7月1日，夜袭新丰车站，全歼日军第15师团松野联队广江中队一个小队40余人，缴三八式步枪13支，烧毁了敌营房，破坏了铁路路轨。因新丰车站地处沪宁线上，新四军打胜仗的消息如长上了翅膀，很快传遍了江南。

7月10日，在句容新塘附近伏击日军由南京开向句容的车队，击毁汽车2辆，毙敌40余人。

7月30日，第2团一部袭击镇江以西高资车站，歼灭伪绥靖队，缴获驳壳枪4支、手枪1支、步枪15支，毙敌15人。

8月13日，王必成带第2团夜袭句容县城，这是新四军首次袭击县城，对敌人造成极大威胁。此战毙敌40余人，伤2人，缴获步枪数十支，缴获子

弹及其他军用品甚多，并摧毁县维持会，释放被关押群众百余人。

8月15日，第2团一部袭击沪宁线上下蜀、龙潭间的桥头日军据点，毙敌8人，伤10余人，余敌逃窜，缴获步枪10余支。8月23日，第2团一部在珥陵附近伏击从金坛方向沿金漕河驶来的敌汽艇，毙敌40余人，俘敌1人。

王必成率第2团在苏南一带捷报频传，陈毅赞扬第2团为“老虎团”，誉王必成为“王老虎”。陈毅要王必成重视总结战术，并规定“老虎团”在一般情况下，要建立每天研究战术的制度，并要把研究的东西，运用到军事训练特别是野外演练中去，要练出水平，经得起实战考验。

“老虎团”在敌后同日军作战时，战术的运用是多方面的，诸如：围城打援、伏击战、奇袭、奔袭、外线和内线作战、破袭战、钻心战、声东击西、捕捉战等等。除一般的战术运用外，实践中还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战术，即一打、两战、两拼、三猛、两速。这个战术当时被誉为“老虎团”的基本战术。

- 一打：就是敢于同日本强盗打；
- 两战：就是敢于打夜战、近战；
- 两拼：就是敢于同日军拼手榴弹，拼刺刀；
- 三猛：就是敢于猛打、猛冲、猛追；
- 两速：就是速决战、速转移。

王必成的这一套战术，引起了日军的重视。1939年5月，我军某部在小丹阳地区战斗中，缴获了日军一本《对共军2团的作战研究》小册子，其中写道：“不让共军老2团近战。只要能避近战，共军老2团其他战术也就失去了作用。”由此可见，日军在战术上是如何惧怕第2团。

日军在战术上采取了两条措施对付第2团：一是扩大扫荡规模，同时加强以适应与老2团近距离战斗的模拟演练；二是增加轻武器装备，加强火力配系，加强情报网络，提前掌握对方行踪，尽可能避免和第2团近战。

日军为做到避免与第2团近战，提出了一个消极的对策：“在共军基本战术能发挥作用时，皇军切忌恋战，要迅速收缩，退至村落、丘陵、河沟堤埂、房屋等一切可利用的地形地物，以绝对火力优势固守阵地，以待援军。”1939年以后，日军的确常采用这种“对策”。

但是，不论日军如何耗费精力和时间，研究王必成第2团的战术，仍然败仗频频。1939年11月19日，日军一个加强中队在武村大队长指挥下，从敌占据点宝堰出发，在延陵扑空后，大肆抢掠。日军途经九里返宝堰时，为我第6团拦截。战斗打响后，我军抢占牲口山制高点，连续打退敌几次冲锋，歼敌20余名，敌向贺甲村溃逃。这时驻守在附近的第2团听到枪声，火速南下，在王必成指挥下，于上午11时左右赶到贺甲，与第6团一起完成对敌包围。下午2时发起总攻。第2团第1营首先突入贺甲，经激战又歼敌40余人。余敌退守到一个祠堂内，以7挺轻重机枪猛扫，且施放催泪性毒气，妄图固守待援。是时，正下着瓢泼大雨，我军乘机冒雨强攻。残敌50余人惊恐万状，从村北突出。我紧缩包围，在一个打谷场上同敌人展开白刃格斗至黄昏，终于全歼武村以下官兵186名，生俘3名，缴获无数。

打扫战场时，王必成点着火把细查了敌我双方的伤亡情况，日军168具尸体有90%是被第2团用刺刀捅死的。但是，由于敌人的顽抗，第2团也付出较大的代价，牺牲了28位同志。

这次战斗，“老虎团”的基本战术再一次显示了神威。“老虎团”的声誉在茅山地区人民群众中更加深入人心，而敌人也更加惧怕“老虎团”。敌人在苏南各个县城张贴悬赏捉拿王必成的告示称，发现王必成行踪而报告者赏大洋五千，活捉王必成者赏大洋一万。日军要别人报告、捉拿王必成，可是，他们自己碰到王必成却退避三舍，绕着走。

1940年7月，王必成奉命率第2团开赴苏北黄桥地区作战。1942年11月，王必成部队与苏南第16旅会合，王必成任旅长，又回到了苏南茅山作战。王必成一到苏南，就调查敌情，主动出击，连续作战三个月，打得鬼子暗中派人求和，要王必成手下留情。几十年过去了，苏南人民至今还传颂着王必成缴获九二式步兵炮的故事。

那是1943年3月29日上午，王必成得到情报说，门口塘据点的日军南浦旅团小林中队和一个伪军大队，共二三百人，上午9时左右带着大炮，正在广（德）北杭村附近“扫荡”。王必成立即直接与第48团第3营徐超营长、郑大方教导员联系，命令该营直插杭村西南慈姑山（原称祠谷山），准备与杭村东南牛头山的第1营夹击敌人。同时，令饶惠谭副团长带领机炮连的小炮排去第3营阵地，听候指挥；吴嘉民政委与第2营黄祖煌营长、杨焕章教导员带领部队去杭村东北广宜大道两侧埋伏，防止敌人北逃，并堵截溧阳、宜兴两个方向可能支援之敌；自己则带着第1营去了牛头山。

从温塘到牛头山有10多公里路程，部队一个多小时就登上了牛头山。王必成举着望远镜向下一望，在牛头山与慈姑山之间的广宜大道上，有大批日伪军正从杭村向南运动。这些做尽恶事的鬼子、伪军，带着大量掳掠的鸡鸭、财物，有挑的，有背的，有缠在腰上的，有挂在枪上的，还有驮在马上的。正在稀稀拉拉地沿着大道向南走。其中还有几匹大洋马，有的拉大炮，有的驮炮弹，还有两匹马背上，驮着耀武扬威的鬼子军官。敌人越来越近了，王必成当机立断，立即下达攻击令，一阵激昂的号声响彻天空。于是第1营向西北、第3营向东南，几乎同时步枪机枪齐开火，相对夹攻，鬼子、伪军遭此突然袭击，被打得晕头转向，哇哇乱叫，纷纷丢下掳掠的财物，乱作一团。鬼子小林中队长从马上滚了下来，妄图组织顽抗。敌人拼命抵抗了一阵，却无法抵挡我军的暴风骤雨似的枪弹。向南的大道已被第1营迎头痛击的火力截断，向北的大路又被第3营的战火烧到了屁股上。小林中队长见势不妙，只好脱下皮靴，落荒而逃。鬼子、伪军纷纷向着门口塘方向拼命奔跑。

王必成亲临前线，站在慈姑山上，拿着望远镜，指挥部队急速向南运动，追堵敌人。战斗打得非常激烈。饶惠谭副团长带着小炮排的两门迫击炮和6发炮弹赶到了。王必成将手中的望远镜递给小炮排排长戴文辉，戴文辉一看，激动得大叫：“大炮！大炮！”

王必成自信地说：“我叫你来，就是要用小炮打他的大炮，我只准打3发炮弹，你有没有把握？”

戴文辉没有瞄准器，他打炮完全凭自己的经验，目测定位，但是戴文辉听到王必成的问话，充满信心地点点头。他很快用眼睛目测好距离，然后对王必成说：“首长，准备好了！请下命令吧。”

王必成有力地挥动右臂，高声喊道：“打！”第一发炮弹在距鬼子炮位三四米的地方爆炸了，鬼子倒下好几个。敌人慌了，王必成却向戴文辉竖起大拇指，然后又喊了一声说：“再打一发！”

戴文辉的另一发炮弹又飞了出去，这一炮打中了炮旁的战马，敌人人仰

马翻。受了惊的战马狂蹦乱跳，冲倒了几个敌人，在被马踩倒的敌人的哭喊声中，敌人像无头苍蝇似地四处乱跑。

王必成密切地观察着敌人的情况，是进攻的时候了，他果断地下令：“同志们，冲啊！”

霎时间，各营、连的冲锋号响了起来，嘹亮的号声和着惊天动地的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像一曲战地交响曲。敌人成批成批地倒下去了，我第1、3两个营的干部，个个身先士卒，率领战士们从两面山冈的松树林中杀出来，如猛虎下山，直扑敌阵。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残余的敌人冲得七零八落，几乎全都将敌人压到了广宜大道之西。那门大炮早已陷在田埂小路的沟旁，第3营教导员郑大方一马当先，他挥起驳壳枪高呼：“冲啊，为人民立功的时候到了！”一个排的战士争先恐后地紧跟在他的身后，同敌人展开白刃格斗。第1营也冲下来，敌人狼狈不堪，在两个营的围歼下，纷纷放下武器，磕头求饶。

打了一个多小时，杭村战斗以我方的大胜而结束，歼灭敌伪军100余人，其中鬼子70多个，俘虏3人。那门九二式步兵炮，连同三发炮弹，都成了新四军的战利品。

九二式步兵炮是平射炮，是攻打碉堡炮楼的最好武器。我军得到这种武器，真是如虎添翼，指战员们兴奋地围着大炮左看右看。可是，南京日寇侵华派遣军总司令部得到九二式步兵炮被我缴获的消息，十分震怒，当天就下达命令，加紧“扫荡”，要不惜一切代价，将大炮夺回去，并且还要一级一级追究责任。广德鬼子受到上司批评，岂敢怠慢，首先责成小林中队长夺炮。从杭村战斗第二天开始，敌出动1000多鬼子，加上大批伪军、特务、汉奸，足有4000多人马，把小林中队长绳捆索绑，押在队伍前面带路，漫山遍野寻找新四军，扬言要夺回大炮。

敌人的行踪早在王必成意料之内，缴获大炮的当天，王必成就预料到鬼子会有这一着，命令第48团派一个连保护九二式步兵炮，当晚就把大炮转移到煤山地区去。山路崎岖不平，大炮又很沉重，翻山越岭，两匹骡子拉得十分吃力，部队行动十分缓慢。于是，他们就把大炮拆卸成几个部件，由机炮连分开带着走，在煤山一带山区和敌人捉了几天“迷藏”。

王必成命令，只把大炮炮身和三发炮弹随军带着走，其余部件全部打埋伏。机炮连连长吴福庭、小炮排副排长王国富等几人，与第48团被服厂厂长吕道明，找到了当地保长和党组织，钉了三只像棺材一样的大木箱，将炮轮、炮架、炮栓、炮后座，分别装进木箱，秘密地运到一座山上，分散挖洞埋藏。被服厂的物资也同样分散埋藏。部队走后，留下吕道明等少数几人，化装成老百姓，暗中监视敌人的活动。

鬼子探听到新四军没将炮带走，便猜到大炮打了埋伏，于是搞来许多洋镐和洋锹，天天押着小林中队长，在新四军所过之处，漫山遍野地挖。山区有千重山、万重山，尽管鬼子挖得筋疲力尽，大炮的影子也没见着。

鬼子又想了个主意，他们到处贴《布告》悬赏：谁说出大炮的位置，就赏法币20万，并且派人挑着钞票“扫荡”，每到一处，就把钞票摊在桌子上，强行集合群众，妄图以钱收买人心。可是，知情者并不爱他们的臭钱，爱钱者却不知情，结果，鬼子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鬼子绞尽脑汁，跑断了腿，黔驴技穷，实在无法向上峰交代，驻广德城的鬼子头目只好硬着头皮，派人送信给王必成说：“我们丢了大炮很难过，

请贵军把大炮还给我们，贵军需要我做什么，只要我能办到的，一切都好商量。”

王必成看了信，对刘别生说：“我就回他一封信，大炮在这里，他要，叫他自己来拿，只要他有本事拿！”

鬼子又碰了个硬钉子，大炮没有拿到，反而给新四军留下了笑柄。

1944年后，新四军在大江南向日伪军局部反攻，王必成派人把埋藏在地下的九二式步兵炮挖了出来，经一番擦洗，大炮旧貌换新颜。8月23日，王必成指挥第16旅打长兴，激战一昼夜，扫除了绝大部分据点，只有白阜据点之敌死守顽抗，无法攻克。王必成灵机一动，向敌人喊话说：如果再不投降，就用大炮轰据点了。

伪军营长从碉堡里伸出头来，满不在乎地说：“新四军吹什么牛，你们如果真有大炮，我们就打白旗投降，可惜你们的大炮还没造呢！”

王必成见他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一挥手说：“把大炮推出来给他们见识见识。”

话音一落，九二式步兵炮被炮兵排从一座草房中推到了据点外，脱去炮衣，装上炮弹，大炮昂首挺胸，炮筒正对着敌人。把那个伪营长吓得大喊一声：“啊呀，我的妈啊！”然后，颤颤兢兢地说，“新四军，别打炮，我们马上投降！”不一会儿，他带着士兵，举着手，从碉堡里灰溜溜地出来了。

第二天拂晓，第16旅攻打镇南、镇北各据点，王必成为了减少伤亡，命令炮排将九二式步兵炮从白阜调到镇北。3小时后，炮运来了。王必成右手一挥，大炮开口了。镇北大据点被轰了一个箩筐大的窟窿，正要开第二炮时，伪军已从窟窿里扯出了一面白旗。长兴战役历时3天，摧毁60余座敌堡，歼灭伪军两个团，击毙日军大佐指挥官1名，中佐顾问两名。在庆功大会上，长兴人民送给王必成一面大锦旗，上面有金闪闪的四个大字：民族救星。

如今，这门九二式步兵炮被陈列在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里。

苏中扬威

抗战胜利后，王必成部改编为新四军华中野战军第6师，谭震林兼任师长和政委。其实，日常工作是由副师长王必成和副政委江渭清主持的。

1946年7月初的一天，值班参谋报告说：“副师长，华野司令部来电话说，要你和江副政委到海安去开会。”

王必成兴奋地说：“马上要打仗了！”

王必成和江渭清策马赶到海安，会议刚刚开始，粟裕司令员正指着挂在墙上的地图说：“同志们，当前，苏中形势如山雨欲来风满楼，国民党背信弃义，撕毁停战协定，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策划下，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华东解放区是敌人进攻的主要方向之一，正规军即达50万人，其中用于进攻苏皖解放区的兵力为11个整编师、30个旅，约25万人。至7月上旬，由南向北进攻苏皖解放区的敌人，有5个整编师、15个旅，约12万人，位于南通、泰兴、扬州地区，并定于15日分4路同时发起进攻，企图首先攻占我海安、如皋，尔后进攻华中解放区重镇盐城、淮阴。”

接着，粟裕代表华野司令部向各部下达作战任务，规定王必成的第6师担负首战攻克泰兴的任务。

会议结束后，王必成和江渭清在返回的路上，就作了简要的分工，王必成负责指挥作战，江渭清负责政治动员和后勤保障。王必成知道，苏中首战，关系到战役的全局。这付担子有多重，他心里十分清楚。为取得首战胜利，



王必成回到部队，顾不上休息，就把第16旅、第18旅干部召集起来，传达作战任务，然后将他们带到实地侦察，了解泰兴的敌情和地形。

泰兴——是长江沿岸的一个县城，位于华中解放区的南端，有7米高的城墙，外有30米宽的护城河，工事比较坚固。这里有公路可通靖江、扬州、泰州等敌占据点，是国民党军向解放区进攻的出发地域之一。日寇投降后，曾被我苏中独立旅（即第18旅的前身）解放。1946年初，国民党军整编第83师根据蒋介石“星夜前进，抢占战略要点”的秘密命令，侵占该城。战役发起前，部署在该城的敌人是整编第83师第19旅第57团和配属的一个山炮连。

侦察完地形回到驻地，王必成向各旅布置了作战任务，具体部署为：第16旅第48团主攻南门，另两个团在泰兴东南的张家桥、大生桥地区，阻击可能由靖江、天星桥来援之敌；第18旅第52团突击小西门，一部在大西门助攻；第53团突击北门，一部由东门佯攻；第54团位于七星庙阻击可能由口岸东援之敌。

任务布置完毕，王必成严肃地说：“同志们，这是苏中初战，我们只能打好，不能失败。赢得初战，对夺取第二仗、第三仗及全部战役的胜利影响很大。我们师是一支久经战斗锻炼的部队，在抗战中立了功，但我们不能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那只能代表过去，不能说明现在。我们要在解放战争中再立新功。”

会后，各部进行着紧张的准备和动员，王必成深入各团，检查准备工作情况。

7月13日拂晓，王必成率全师向泰兴开进。经过100多里急行军，黄昏时抵达泰兴城下。当日21时，王必成打响信号枪，随着三发红色的信号弹腾空而起，顿时枪声大作，进攻泰兴的战斗开始了。第6师的突然攻击，使敌人措手不及，十分惊慌。战至14日晨，我军扫清了外围，逼近城垣。城内的敌人依托城墙进行顽抗，大炮、机枪从城头上向第6师猛烈地轰击、扫射。

担任攻城任务的部队开始进行攻城准备。王必成命令第48团派人化装进城侦察，摸清了南门外敌人的工事构筑和兵力部署，把主攻点选在敌辎重连防御地段上。经一天的紧张工作，各团都完成了攻城准备。王必成立即下达了14日18时开始攻城的命令。

傍晚时分，泰兴城显得异常平静。17时30分，王必成指挥炮兵突然发起攻击，一排排怒吼着的炮弹倾泄到敌人阵地上。此时，敌人用机枪火力疯狂射击，以阻止我炮兵前进。我两名炮手中弹牺牲，大家高喊着“坚决消灭敌人，为牺牲的战友复仇”的口号，以更猛烈的火力射向敌人阵地，摧毁了敌人的桥头堡后，便集中火力炮击城墙，轰开一个缺口，扫清了步兵前进的障碍。18时，第48团在炮火掩护下发起攻击。第1连以勇猛迅速的动作强渡护城河，仅20分钟就打开并占领了突破口。第1机枪连班长、华东一级战斗英雄胡宗林带病参战，用重机枪掩护步兵冲击，并随突击班登上城垣，击退反击之敌，掩护连营向敌纵深发展进攻。该团第1、2营几乎同时突破城墙，迅速向敌纵深穿插。王必成命二梯队营由突破口进城，向东门攻击前进，以割裂敌人的战斗部署。

夜幕降临时，枪炮声震撼着泰兴，硝烟笼罩着全城，战斗正激烈地进行。第16旅第48团进展顺利，但第18旅进攻受挫，被阻于护城河外。王必成见状，立即令第48团向纵深猛烈发展，策应第18旅攻城；令第18旅继续组织

攻城。此时，在第52团代理参谋长的师作战科长于大毛和政委郝光，立即召开营连干部会，总结两次攻城失利的教训，确定了“火力掩护、爆炸城墙、架梯登城”等攻城方案，并组织了突击队。经紧张准备，再次发动攻击，首先用迫击炮送炸药包轰击城墙城楼，只见城墙上火光闪闪，碎石飞扬，炸得敌人嗷嗷哀叫。高大坚固的城垣，被炸开5米宽的缺口，于大毛指挥主攻营的突击队开始登城。突击队在“豹子头”徐长元队长带领下，个个临危不惧，人人顽强奋战，争先恐后奋力攀登。忽然，城垛子上响起了一阵清脆的机枪声，只见“豹子头”徐长元端起机枪一阵横扫，打退了敌人的反扑。接着，全团如猛虎下山般冲入城内。与此同时，王必成命令第53团也乘机突破北门，并立即向纵深发展。战至午夜，第18旅全部占领东西大街及以北地区。15日凌晨4时，第16旅第47团入城参战。经激烈战斗，至15日下午，泰兴之敌一个团基本被歼，只剩下团部一二百残敌退守庆云寺负隅顽抗。

“报告副师长，”一个参谋跑到王必成面前，举手敬礼说，“华野司令部来电话，说敌人判明我主力在宣家堡、泰兴作战，企图派主力乘隙进攻如皋、海安，与我军决战，并组织兵力增援宣、泰。粟司令命令我师留一部进攻泰兴，吸引敌人，主力向如皋开进，选择战机歼敌。”

王必成立即命令部队向如皋方向转移。走出一个小时，华野司令部送来命令，要第6师以主力向如皋以南之杨花桥、宋家桥迎击国民党整编第49师之第79旅，以足够的兵力阻击沿如黄公路东援之敌整编第65师及第99旅。据此，王必成命第18旅并第16旅第46团沿黄桥、伴今方向前进，由贺家坝向东北方向攻击，分割歼灭敌第79旅；命第16旅（欠第46团）沿黄桥及其以东一线阻击敌第65师及第99旅，以保障主力围歼第49师。时间紧迫，王必成立即召集各旅、团首长下达了战斗命令，部队马上出发。在行军路上，各旅团边走边布置作战任务，边进行宣传鼓动，宣扬“泰兴攻坚连”和徐长元、胡宗林等人不怕牺牲、勇敢作战的英雄事迹，用泰兴、宣家堡战斗的胜利鼓舞大家。沿途的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积极支前，并送来许多食品慰问部队，鼓励大家多打胜仗，保卫解放区。指战员们在胜利的鼓舞和人民群众拥军热情的激励下，发扬吃大苦耐大劳和连续行军作战的顽强精神，经两夜急行军，于18日拂晓前抵达预定作战地区。

敌整编第49师沿林梓、丁堰方向进犯如皋。17日第26旅进至鬼头街、田肚里地区；第79旅进至宋家桥、杨花桥地区。敌整编第65师及第99旅分别自泰兴、靖江向黄桥进犯；驻泰州的第148旅东犯姜堰。由于王必成留一部在泰兴伪装主力继续攻击守敌，以及第6师主力转移的秘密神速，敌对我军东进的行动毫无察觉。

18日，在友邻第1师将敌整编第49师师部及第26旅包围在鬼头街、田肚里地区的同时，王必成的第6师第18旅第54团和第16旅第46团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将敌第79旅包围在杨花桥、宋家桥地区。当晚第54团攻击杨花桥之敌未成。19日晚，王必成增调第52团、第53团参战，攻击仍未奏效。此时，第1师在第7纵队主力配合下，已全歼鬼头街、田肚里之敌，敌师长王铁汉仅率少数残敌逃进宋家桥。20日晚，野战军首长令第1师一个团配合第6师第18旅再次强攻杨花桥、宋家桥，给敌以歼灭性打击。这时，东援之敌整编第65师及第79旅已逼近作战地区，第6师乃奉命停止攻击、撤出战斗。

如南战斗，是苏中战役的第二仗，王必成的第6师在兄弟部队配合下，

全歼敌整编第 49 师师部、第 26 旅全部和第 79 旅大部，达到了预期的作战目的。

强将手下无弱兵。第 6 师在王必成指挥下，连战两仗皆捷，士气大振。战斗结束后，粟裕打电话给王必成说，为了赢得胜利，第 1 师、第 6 师暂时休整，已着第 7 纵队在海安以南进行运动防御。第 6 师和第 1 师在海安以东休整了几天。

8 月 8 日，王必成接到华野命令说，从 7 月 30 日至 8 月 3 日，第 7 纵队奋战 4 昼夜，杀伤敌军 3000 余人，创造了敌我伤亡 15：1 的优秀战例，任务完成后主动撤离海安。敌整编第 65 师、第 105 旅、新第 7 旅先后占领海安，并纷纷报“捷”，吹嘘所谓“胜利”，把我军的主动转移看成是“不堪再战”，于是调整部署，进行“清剿”。新第 7 旅位于海安，整编第 65 师及第 105 旅由海安东犯西场、丁家所，7、8 日进至李堡、角斜地区“清剿”。9 日敌第 65 师奉命西开泰州、黄桥。10 日新第 7 旅准备东进李堡接替第 105 旅的防务。敌人的错误判断和频繁调动，给我军以奇袭歼敌的大好时机。野战军首长当机立断，决心以第 1 师攻歼李堡、角斜之敌第 105 旅主力；以第 6 师第 16 旅攻歼丁家所敌第 105 旅一部，第 18 旅位于西场南北地区，配合在賁家巷东南地区的第 7 纵队全力歼击海安东进之敌，并阻击如皋可能出援之敌。

王必成受领任务后，指挥部队迅速向作战地区开进，以第 18 旅第 54 团一个营扼守陆家尖、担任正面阻击；以第 54 团两个营和 52 团埋伏在陆家尖以西、公路以北，与公路以南的串场河构成袋形阵地；以第 53 团为预备队，配置于西场东北、顾家庄以东地区。部队全部掩蔽在民房和青纱帐内，对外封锁消息。王必成到实地察看了兵力部署情况，并告诉大家要藏好，要冷静，待敌人钻进口袋里再打。至此，一切准备就绪，只等敌人进袋了。

8 月 10 日 20 时，第 1 师趁敌换防混乱之机发起攻击，至 11 日中午全歼敌新第 7 旅、第 105 旅两个旅部和各率的一个团。由于我军攻势迅猛，敌顿时乱作一团，通信联络瘫痪，海安的敌人对这一情况却一无所知。11 日上午 9 时，敌新第 7 旅旅长率第 21 团按预定计划，大摇大摆地向李堡开进，中午进入第 6 师伏击阵地，第 54 团当即迎头痛击。第 7 纵队第 57 团和第 54 团两个营猛烈出一击，一举将敌包围并分割成数段，使其完全陷入被动挨打境地。17 时，第 6 师对敌发起最后攻击，仅半小时就解决了战斗，全歼敌第 21 团。李堡战斗的胜利，打破了敌人在海安与我军决战和完成东西封锁线，巩固占领区的企图。

李堡战斗后，王必成正聚精会神地写战斗总结，粟裕打来电话说，中央军委指示华野：“苏中分散之敌被我各个击破，望再组织几次作战，即如交警总队，凡能歼灭者一概歼灭之。你们能彻底粉碎苏中蒋军之进攻，对全局将有极大影响。”

华野司令部决定以黄桥为佯攻方向，从丁堰、林梓打开缺口，钻到敌人腹部作战，陶勇率第 1 师攻打丁堰守敌 4 个交警大队，王必成率第 6 师攻打林梓守敌两个交警大队。

王必成接令后，立即派两批侦察员到林梓去侦察，得知林梓北距丁堰 8 公里，是（南）通如（皋）公路上的一个市镇。通扬运河（南通到扬州）流经镇中，河宽 20 米左右。镇内地主大院、寺庙较多，大都集中在运河东岸。两岸散建部分民房。镇周围水网、稻田密布，西、南、北三面环水。镇东地

形开阔。战前得知，该镇守敌为交警第 11 总队第 1 大队和一个保安团。交警总队由“忠义救国军”编成，是国民党专门用来镇压人民的一支特务武装，全部美械装备，轻机枪、卡宾枪、火箭筒等火器较多，但无火炮。该敌政治上极为反动，但作战经验少，战斗力一般。敌在林梓利用河流和日寇遗留下来的 5 个 8 至 10 米高的大碉堡，又加修了土木质发射点和堑壕，壕外还设置了铁丝网和鹿砦，形成比较坚固的防御。

8 月 16 日，王必成召开作战会议，讨论了上级意图，研究作战方案，决心在第 1 师攻歼丁堰守敌的同时，以第 18 旅一部攻歼林梓守敌以及附近敌“清剿”机构和地方武装；以第 16 旅主力进入林梓西场地区，准备阻击南通出援之敌，并相机夺取白蒲；另以一个团配合第 1 分区武装围攻黄桥；预定 21 日 20 时发起攻击。

21 日下午，全师部队进行了战斗动员。指战员十分高兴，都希望多缴几支美国枪，更换自己的装备。17 时，部队按计划向林梓开进。

当晚 9 点半，第 54 团由东、南、北三个方向同时向林梓发起攻击。当攻击部队接近敌约 40 米时，突遭敌轻武器的猛烈射击，前进受阻。22 日 1 时和 3 时，王必成又连续组织两次攻击，仅夺占领北边一个大碉堡。东、南面仍无进展，与敌形成对峙状态。拂晓，经审问俘虏和从林梓逃出来的群众查明，守敌原为 1 个交警大队。21 日下午，交警第 7 总队第 3 大队由如皋到达林梓，准备与第 11 总队第 1 大队换防，增加了一个大队。同时还了解到，敌防御工事是外面强、中间弱，最强点是东南三个大碉堡群。保安团与交警矛盾多，指挥不统一。

王必成根据新情况，当即停止进攻，决定增加兵力，调整部署，集中全旅的兵力兵器，采取四面包围、重点突破、穿插分割的战术，攻取林梓。为达到速决全歼目的，他又调第 16 旅第 47 团（欠一个营）和两个炮兵连加强第 18 旅，并与该旅及主攻部队的指挥员到实地进行勘察，改变了原来的主攻点，集中兵力在粮行和东南方向上实施突破。攻击前，在通扬河上架了一座浮桥，并准备了各种攻击器材。22 日 14 时，王必成命令再次发起攻击。首先集中炮兵实施火力急袭，并用抵近平射的方法，摧毁了敌人依托的几个大碉堡和对我威胁最大的土木质发射点。接着，各突破地段上集中轻重机枪一齐开火，直接掩护第 1 梯队向敌人发起进攻。第 53 团、第 54 团、第 52 团、第 47 团先后突破了敌人防御，攻歼了粮行、沈景芝大院、沈树勋大院、沈旦初大院、关帝庙、师殿和观音堂之敌。最后，王必成命令集中兵力围攻三元宫和石板桥之敌。这时，敌人防守不成，逃跑无路，求救无门，成了瓮中之鳖。王必成命令攻击部队立即开展战场喊话，进行政治攻势。敌人纷纷缴械投降，少数残敌跳河企图逃跑，均被我军击毙在河中。战至 16 时，敌交警两个大队和一个保安团共 2200 余人，被第 6 师全歼。与此同时，丁堰之敌被第 1 师歼灭。战斗胜利结束。这是苏中战役的第五仗。这一仗打得干净利索，不仅缴获了大批美式自动火器，武装了自己，而且打开了西进的大门，为下一步插入敌人心脏作战创造了条件。

林梓战斗结束当天，王必成经林梓镇向第 18 旅走去，迎面碰到送命令的作战参谋。王必成接过命令，一目三行，命令中说，丁堰、林梓战斗即将结束时，宿县东进之敌已占睢宁，正准备向淮阴进攻。8 月 25 日，扬州之敌第 25 师进攻邵伯，以配合进攻淮阴之敌的行动。华中野战军为保障邵伯、高邮和淮阴的安全，决定采用“攻黄（桥）救邵（伯）”的战法，来调动敌人，并

在运动中予以歼灭。为实现这一决心，即令第 1 师、第 5 旅、特务团和第 6 师迅速西进。

虽然连续作战，指战员们十分疲乏，但他们立即又踏上了征程。走出林梓约十里路时，华野司令部通信员送来命令，要第 6 师停止西进。敌人正从黄桥调第 99 旅沿如黄路北上，增强如皋防务。而如皋还派出一个团接应第 99 旅。华野司令部令第 6 师迅速歼灭第 99 旅。

王必成对江渭清说：“送上门的礼，哪能不收呢！”他派人将第 16 旅、第 18 旅的干部找来，立即作了分工：第 16 旅在左，第 18 旅在右，沿如黄公路及其以南地区，秘密迅速地向黄桥开进；第 16 旅以第 46 团为前卫团，一旦与敌遭遇，即拖住敌人，掩护全师展开；第 47 团、第 48 团断敌退路，阻敌增援，并由侧后攻击敌人；第 18 旅则负责将敌人迎头截住，主力迅速向敌两翼展开，拦腰攻击，边割边歼。

王必成根据遭遇战斗情况变化快，不易掌握的特点，为争取主动，先机制敌，在战前采取了边行军、边动员、边布置的方法，完成了战斗准备。要求部队战前要隐藏我军企图，战斗触发后要先敌展开，先敌占领有利地形，先敌开火，先敌冲击，以“堵头”、“断腰”和“击尾阻援”战法，全歼敌人。

25 日上午，第 16 旅前卫第 46 团利用青纱帐掩护秘密进到卢家庄时，发现敌人在飞机的掩护下，沿公路向东开进，先头部队已越过分界。王必成命令第 46 团立即由卢家庄向分界攻击前进，拖住敌人，掩护主力展开；第 47 团、第 48 团立即跑步前进，至分界以西断敌退路、阻敌增援，从侧后打击敌人。此时，沿如黄公路西进的第 18 旅第 52 团，也在芹湖发现敌搜索部队，他们全然不顾敌机的疯狂轰炸扫射，立即依托芹湖先敌发起冲击，敌慌忙回头。他们跟踪追击至大界沟以南地区，与敌形成对峙局面。第 53 团、第 54 团沿分界北侧急速前进。

王必成根据当时战场形势，命令第 52 团、第 46 团坚决堵头截尾，以分界为主攻方向，实施多路攻击，歼敌于运动中；第 16 旅主力迅速抢占小二房庄，阻敌增援并随时准备攻占黄桥。各旅受命后立即发起攻击，当夜即占领大小界沟、沈家巷、杨家岱和大小杨庄以北地区。拂晓前，将敌压缩在荡里与东分界狭窄地区内，使敌陷入进退维谷、首尾不能相顾的困境。

为迅速歼灭被围之敌，野战军首长调第 1 师第 1 旅和特务团加强第 6 师。26 日上午，王必成又调整部署，决心集中第 16 旅、第 18 旅共四个团兵力，并肩由北向南实施主要突击；以两个团的兵力从东、西、南三面实施围攻；第 1 师第 1 旅为预备队，随时准备加入主攻方向作战和歼灭越河逃窜之敌；特务团接替第 16 旅的小二房庄阻援任务；13 时发起总攻。

敌经第 6 师一夜攻击，伤亡惨重，士气低落，建制混乱。此时，正盼着飞机掩护和援兵到来。中午下起了大雨，敌人更为紧张。而此时我参战部队却把大雨当成歼敌良机，冒雨按时发起总攻。各部以突然迅猛的动作，一举突破了敌人的防御阵地，直插敌人的心脏。敌乱作一团，我军大胆插入敌群，猛打猛冲。经一番激战，敌大部被歼，一部跳河南逃，被 6 师击毙于河中。少数南窜之敌，也被第 1 师第 1 旅歼灭于卢家庄以北地区。至此，敌第 99 旅和一个炮兵营被全歼，战斗胜利结束。

王必成的第 6 师在著名的苏中战役中，除海安、邵伯两战未能参加外，共参加了 5 次战斗，为苏中战役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王必成的指挥艺术

在苏中战役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王必成的第6师在这次战役中打出了威风，得到了更大的锻炼。

#### 莱芜战役血战口镇

1946年10月，涟水战役后，王必成率第6纵队北上鲁南。鲁南战役后转移到临沂以西休整。此时，粟裕领导的华中野战军与陈毅领导的山东野战军会合，统一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王必成的第6师改编为第6纵队，王必成任司令员，江渭清任政委，皮定均任副司令员，陈时夫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杜屏任参谋长。

第6纵队指战员大部分是苏中子弟，北上山东后，不习惯于北方生活。王必成走到哪里，随时都可听到战士们的议论。

这个说：“怎么搞的？天天打胜仗，天天向北跑，北方的玉米饼、小米饭实在吃不下。”

那个接着说：“唉！倒霉透了，反攻反攻，反到山东，一手煎饼，一手大葱，问我有啥意见，做梦都想回苏中。”

对于这些议论，王必成虽然觉得可以理解，但他认为，当兵打仗，不能只在家乡周围转，而要树立全局观念，否则对打胜仗是极为不利的。于是，他一方面召开纵队党委会议，号召大家克服乡土观念，树立在全国范围内打运动仗的思想。另一方面，他经常深入部队，和干部战士们拉家常，帮助他们消除思想疙瘩。一天，他到第18师第53团，问一个苏中籍战士王东明：“小王，怎么样？到山东吃得惯小米吗？”

王东明皱了皱眉头说：“这里太苦了，实在难习惯这里的生活。”

王必成拍拍他的肩说：“人是有适应性的，我们从娘胎里出来时，只会吃奶，后来不是学会了吃饭？如果你一直生长在这里，吃惯了小米，也就吃不惯大米了。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总要服从命令，要以四海为家，要不断开辟新战场。”

王东明听了王必成的话，觉得非常有理，不觉频频点头。这时周围也有不少战士在听他俩的对话，王必成抬起头，转向大家说：“同志们，山东和苏中各有千秋，山东虽没有大米，可这里有大枣、花生、苹果、梨子，你们在这里时间久了，一旦叫你们离开，可能还会有意见呢！”

战士们被王必成的笑话说得笑逐颜开，一个高个子小战士说：“王司令，你放心，我们一定打好入鲁第一仗，打不光山东敌人决不回苏中。”

“说得好！”王必成竖起大拇指称赞道，“北上山东打胜仗，我们要让华野威名天下扬！”

1947年2月10日，王必成、江渭清接到华东野战军首长的紧急命令，内容是，敌人以其进攻山东解放区的20个整编师、53个旅中的11个整编师、29个旅的兵力，分南北两线来犯。南线之敌以8个整编师、20个旅，分三路沿沂河、沭河北犯临沂；北线李仙洲集团3个军（同整编师）、9个师（同整编旅）由明水、辐川、博山南下莱芜、新泰、蒙阴，实施南北对进，企图于临沂地区与我华东野战军主力决战。野战军首长决心以一部兵力即第2、第3纵队及鲁南军区第10师佯装主力，在临沂以南摆开决战阵势，节节阻击，以迷惑、迟滞南线敌人，诱北线之敌放胆南进；与此同时，秘密移动野战军主力第1、第4、第6、第7、第8纵队，会同北线我第9、第10纵队，围歼李仙洲集团于新泰、莱芜地区；令第6纵队由现驻地出发，经费县以东、以北，穿过蒙山山区，务于16日前进至羊流店以北地区集结，暂留一个师在苍

山、神山、傅庄以南地区阻击敌人，待第2纵队接防后随主力之后跟进。

看罢命令，王必成立即和江渭清、皮定均、杜屏一起分析情况，认为华野首长避强击弱、南堵北战的作战方针是十分明智而正确的。部队不暴露企图，按时到达指定位置，又是实现华野首长决心，歼灭北线敌人的先决条件。因此，王必成决定首先采取一切措施，坚决完成北上行军任务。从驻地到羊流店以北集结地域，行程200多公里，山路崎岖，加上第6纵队初到山东，对地形不熟，需要六个夜晚才能赶到，时间相当紧迫。王必成当即决定将华野首长的命令迅速传达到部队，然后除留第18师暂担任指定地区的防御外，其余部队全部轻装，当晚开拔，边走边进行战斗动员和战斗准备，要求大家克服一切困难，务于2月16日前赶到指定位置。

2月15日、18日，华野首长两次颁布作战命令，指出北线敌酋李仙洲率第73军、第46军及第12军之新第36师，已先进占了莱芜、新泰、口镇一带，决定集中8个纵队将该敌全歼于莱芜地区；命令王必成率第6纵队及鲁中军区警第4团，全力攻歼口镇和青石桥之敌新36师师部及其所属两个团，切断莱芜之敌的退路，并准备配合第10纵队打击由明水来援之敌。战役定于2月20日晚发起。

王必成接令后，立即组织实地侦察，然后召开各师师长、政委作战会议，分析地形和敌情，向各师下达作战任务。

口镇长1.5公里，宽1公里多，面积比莱芜城还大。它处于明水、博山通往莱芜的“丫”字形公路交叉点的中央，为胶济线之敌出入鲁中之咽喉。李仙洲集团的军用仓库就在这里，仓库里有上百吨弹药及数十万斤粮食。攻克口镇，不仅能分割敌人的南北联系，堵歼莱芜向北突围之敌，而且还能阻击明水来援之敌。口镇驻军为敌之第12军新编第36师，不仅装备精良，粮弹充足，而且成员中有一批极端反动的还乡团。其兵力部署是：师部率第108团、辎重营及炮兵部队驻守口镇，第106团驻口镇以北约7公里的青石桥，第107团驻口镇以北约20公里的上游庄，其中口镇是守备重点。口镇之役，关系到全局胜利。王必成意识到此处乃敌我必争之地，他们将面临着一场艰巨的攻坚战。通过认真研究，王必成命令第16师和第18师两个团，采取偷袭和强攻相结合的手段攻占口镇；以第17师及警第4团，插入口镇以北，主力对青石桥之敌警戒，一部配合第16师、第18师攻歼口镇之敌。

经紧张的战前准备，战斗于20日20时发起。夜幕降临，担任主攻的第16师，隐蔽地进入口镇西南的攻击出发阵地。20时，北风凛冽，寒气袭人，四周黑得像锅底。第48团的突击连由田家庄出发，沿一条深约两米的水沟向口镇秘密运动，在逼近外壕时，被敌哨兵发觉。可是，就在他盘问“口令”的一刹那间，就被猛冲上前的战士击毙。战士们一拥而上，不到10分钟，突击连就顺利控制了数十米长的突破口，守敌纷纷后退。40分钟后，王必成即令第48团全部突入。这时，敌以一个连兵力在炮火配合下向我反击。第48团则以猛烈的炮火还击，压住了敌炮火后，步兵出击，将守敌一个连歼灭，俘虏10余人，巩固了阵地。

此时，第47团采用迂回战术，以一部兵力监视当面之敌，而主力由西南方突入围墙，打通了与第48团的联系。两团并肩战斗，几小时后，第16师便控制了口镇的街区大半，取得初战胜利。

第18师于23时开始攻击，因敌疯狂反扑而受阻。拂晓，敌炮兵和飞机对我军阵地进行疯狂的火力袭击和轰炸扫射，妄图将我部消灭在阵地上。王

必成见阵地上我部人数太多，易被敌火力杀伤，便令第 16 师暂停攻击，留一部兵力控制已占阵地，主力撤出。为查清敌情和组织当晚的总攻，他带着几个参谋到口镇，与部队指挥员一起研究地形和敌情。他们侦察发现，敌主阵地为环绕口镇的石砌围墙，高约 3 米，长达 5 公里，并筑有工事。围墙之外是深达 2 米、宽约 3 米、筑有暗堡的外壕。外壕外侧还设有一道鹿砦。镇内多是石墙瓦顶房屋，大街小巷均构筑了街垒和暗堡。敌师指挥所设在镇东北角核心阵地内的关帝庙内。这里是密集的地堡群，以地道相连接。他们分析，敌人准备借此固守顽抗。王必成和纵队领导研究决定，必须轮番使用兵力，在巷战中大胆实施穿插分割，采用灵活的战术，组织连续突击，不给敌人以片刻喘息之机，一鼓作气将敌人歼灭。

2 月 21 日夜间，王必成发出第二次攻击命令。令第 16 师、第 18 师共 6 个团兵力，于当夜歼灭口镇之敌。

部队接令后，迅速发起攻击。第 18 师的第 53 团由南门第 16 师打开的突破口进入，沿南围墙向东门攻击前进，将第 52 团迎入，经 5 个小时的激战，到晚 9 时攻占了小东门。与此同时，第 16 师的 3 个团则由西向东并肩突击。敌人顽强抵抗，第 6 纵队的指战员们与敌人展开了逐屋、逐街争夺战。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和熊熊大火，英勇拼杀，先后占领了小东门至北门以西的全部街区，控制了口镇全部街区的 2/3，将敌压缩到东北一隅。但第 6 纵队伤亡也大，激战至 22 日黎明，被阻在大柳巷以西，与敌呈现相峙局面。王必成决定白天停止攻击，准备当晚再战。

王必成指挥第 17 师智歼援敌一个团，乘虚占领青石桥的战斗，是莱芜战役大合唱中一支精彩的插曲。

20 日晚，当敌我双方在口镇、莱芜地区的鏖战进入高潮之时，李仙洲集团已被我各路大军四面包围，陷于面临全军覆灭的绝境之时，在口镇被第 6 纵队打得焦头烂额的敌第 36 师师长曹振铎，接连发了两次电报，向李仙洲呼救。可是，李仙洲此时自顾不暇，处在四面楚歌之中，哪能去解曹振铎的燃眉之急呢？曹振铎万般无奈之时，只好令驻守青石桥的第 106 团向自己靠拢，企图合兵一处，以作垂死挣扎。可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求援电报和向第 106 团下发的命令，一字不差地被解放军截获。

为保障攻击口镇部队侧翼的安全，首先要截住向口镇增援之敌。王必成命令第 17 师在青石桥以南设下袋形阵地，待该敌脱离青石桥后，在运动中将其一举歼灭，并乘势占领青石桥。按照这样的作战决心和作战手段，第 17 师划分了各团任务：以第 49 团秘密占领青石桥西南之三山庄、文风山，预计在青石桥之敌向口镇行进时，从其右翼攻击；以第 51 团及纵队特务团第 1 营，埋伏于青石桥与口镇之间的下水河两侧和青石桥东南的月庄湾、他头山一带，待青石桥之敌南窜时，从正面和左翼发起猛攻；另以警第 4 团占领青石桥以北 1 公里之狼山和以东约两公里之谷堆山，如敌北逃，则坚决予以迎头痛击，如敌南窜，则伺机抄后路袭占青石桥，防敌回窜。当晚，在王必成指挥下，各团趁夜暗行动，分别进至预定位置，构筑工事，隐蔽待机。至 21 日拂晓，第 51 团通过青石桥与口镇的敌电话线，窃听到口镇之敌向青石桥守敌哀叫战情吃紧，要求向其靠拢的呼号。第 51 团立即准备收紧口袋，严阵以待。

敌人并不是那么愚蠢的，为解除我军对其侧背威胁，并给我以向北突围的假象，妄图以假乱真，混淆我视线，于 21 日 7 时许，青石桥守敌出动一个



营，摆开阵势，向青石桥以北的梁山发动了5次猛攻。但是，敌人的这一套伎俩，早被我识破。敌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于13时以一个营向青石桥以南之三山庄以北无名高地进攻，企图掩护主力抢占枣园，夺路南窰口镇。此次，因我第17团求战心切，在敌还未全部离开青石桥时，就对其主力发起出击，吓得敌人慌忙缩回了青石桥。

为尽快消灭青石桥之敌，以便转用兵力，加强攻击口镇之力量。王必成遂令第17师于20时开始强攻青石桥。黄昏后，攻击口镇的枪炮声响成一片，此时，青石桥之敌自感孤木难支，准备趁夜色南窰口镇。19时，敌在我第17师攻击青石桥之前一小时，开始分两路南窰。王必成及时查明敌动向，重新调整部署，确定歼敌于运动中。当敌第106团先头部队进至枣园，后尾脱离青石桥后，王必成遂令各部迅速出击。第49团第1营首先从北面冲上公路，切断了敌退路，向敌侧后攻击，该团第2、3营从敌之右翼，特务团第1营从左翼，第51团从正面同时冲向敌人，打乱了敌部署，敌被我四面包围。我各部趁势向敌实施向心攻击，大胆楔入敌阵，发挥了我军近战夜战的特长，将敌分割成数小块，激战30分钟，将敌第106团一网打尽，占领了青石桥。至此，援军被歼，退路切断，口镇之敌遂陷逃之无门、战之无力的绝境。

22日中午，华野发来紧急通令，说敌酋李仙洲率第73军、第46军共5个师，企图放弃莱芜向北突围逃窜，令第6纵队在攻击口镇同时，派一部兵力在口镇以南攻击这股敌人，协同兄弟部队将这股敌人全歼于运动之中，不使一人漏网。王必成和几位纵队领导立即分析当前战场具体情况，认为任务虽十分艰巨，但必须服从全局，坚决完成任务。他们决定调第18师于当日下午进至口镇以南，选择有利地形布置钳形阵地，隐蔽埋伏，堵击莱芜北窰之敌，并随时准备参加围歼莱芜北窰之敌的战斗。

口镇与莱芜相距13公里，其间有两条平行公路，两条公路之间相隔2至3公里。这2至3公里是地形低洼、泥土松软之地；而公路以东多为断绝地，部队行动困难；公路以西地形平坦，村庄较多，有一条曲折的小河从东北向西南横穿两条公路而过，河堤可构筑阻击阵地。第18师接到命令，决心以一部兵力在港里一线正面，主力在公路两侧，构成钳形阵地，坚决堵歼莱芜北窰之敌：以第54团在张家庄、崔家庄、毛子庄一线占领阵地，并派出小分队到张家洼担任警戒；以第53团在山头店、郭家镇、李家镇一线占领阵地；以第52团集结于港里、周家高庄地区，为师预备队，担任正面出击。

王必成批准了第18师的部署后，他们立即按时到达指定位置，构筑工事，补充粮弹，进行伪装和战斗动员，至16时，完成了各项战斗准备。与此同时，第16师、第17师也完成了攻击口镇的战斗准备。17时左右，对口镇发起总攻前，敌集中曲射炮对我攻击部队进行了猛烈的火力轰击，致使我部遭受伤亡。王必成调整了战斗部署，将总攻时间推迟到21时，第17师由西、西北向南攻击，第16师以两个团由西南向东北攻击，特务团第1营在东北角佯攻。当夜，战斗空前激烈。第16师两个团分别由东大街南段及小东街阵地全力向东北攻击，连续夺占几栋房屋。当进至刘沟胡同时，丧心病狂的敌人向我占领的房屋发射大量燃烧弹和照明弹。顿时，浓烟滚滚，烈焰冲天，火舌漫卷，好几条街成了一片火海。部队冒着熊熊烈火，奋勇攻击，与敌激战于刘沟胡同以南地区。第17师投入战斗后，采用爆破、火力、突击相结合的战术，连续发动了凌厉的攻势，接连攻占了四条街巷和一个弹药库，缴获了大量迫击炮弹和手榴弹。残敌退至师指挥所盘踞的核心阵地关帝庙

内，凭借坚固的院墙负隅顽抗。这时，该师师、团领导干部亲临第一线，组织指挥对关帝庙守敌的突击。爆破组在轻重机枪的掩护下，将敌院墙炸开了一个约7米长的口子。我突击队在爆炸的烟雾中冲进了突破口，与敌展开逐屋的争夺战。

第18师在阻击阵地上，时刻警惕地注视着莱芜方向敌人的动向。23日天刚放亮，飞机的嗡嗡声由远而近，转眼间，20多架敌机出现在口镇与莱芜之间的上空，一阵疯狂的扫射，附近的十几个村庄顿时淹没在火海中。同时，莱芜方向也传来密集的枪炮声。这些迹象说明，敌人已开始向北逃窜。果然，野战军通报，莱芜的李仙洲集团已开始突围。敌兵分两路，第73军在左，第46军在右，李总部和辎重车居中，在飞机和炮火掩护下，并列向北突进。我第1、第7纵队在左，第4、第8纵队在右，以及刚赶到加入战斗的第2纵队，正勇猛侧击敌人。10时许，敌先头部队进至第18师阻击阵地前沿。王必成果断下令，一声喊打，各种枪炮齐开火，炮弹、子弹、手榴弹同时在敌阵开花。敌惊慌失措，纷纷后退。李仙洲急调后续部队，以汽车开路，步兵紧随，潮水般向我涌来。我则以密集火力猛烈射击，连续打退敌多次集团冲锋。敌屡攻不下，损失惨重，只得仓皇回缩。12时，我第1、第7、第4、第8纵队以排山倒海之势，从东西南三面冲杀而来，王必成指挥第18师迎头痛击，把敌人5个师压缩在东西近3公里、南北2公里多的狭窄地带。这时，敌如阱中之兽，上窜下跳，以大批飞机对我军阵地疯狂扫射轰炸，用炮火猛烈轰击。在我阵地一片炮弹呼啸、火光闪烁、硝烟弥漫之时，敌后续部队再次向我发起更大更凶猛的集团冲击。王必成临阵不乱，命令火线战斗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坚决顶住敌人。第53团和第54团，依托公路两侧高地，把各种火力发扬到最高度，暴风骤雨般地倾入敌群，消灭了一批又一批敌人。阵前敌尸越积越多，有的成了尸山。敌第73军军长韩浚率1000多人，从第53团和第54团小洼结合部冲开一个口子，正向东北夺路而逃。王必成令第18师副师长罗桂华立即率第54团一个营猛扑过去，以猛烈的火力消灭了一批敌人，同时封闭了缺口。这时，敌失去指挥，建制大乱，人马互相践踏，车辆拥挤不堪。王必成见最后歼灭敌人的时机已经成熟，急令第18师转守为攻，全线出击。各团以营、连为单位，猛烈冲击，楔入敌群。同时，各兄弟纵队也以雷霆万钧之力冲入敌群。附近十几个县的民兵也投入战斗。敌人陷入了我军的汪洋大海之中。当时，战场上炮弹爆炸声、机枪扫射声、敌机轰鸣声、冲杀声汇成一片，敌我犬牙交错，分不清两军界限，天上敌机的炸弹无处投，机枪无处打，眼看着其地面部队被消灭，在上空乱转，发出阵阵哀鸣。敌人在我强大攻势与政治瓦解下，有的被歼灭，有的举手投降。第54团骑兵通信员吴成良，见一股企图逃窜之敌，不失时机地拍马冲入敌群，大吼一声：“缴枪不杀！”竟吓得300多敌人乖乖地举手投降。第53团第9连第1班战士邓玉海见一敌军官乘马落荒而逃，端起枪“叭”的一声，将他射下马来。他抬头见只有一个战士，便掏出一支金光闪闪的钢笔，递给小邓，哀求放他条路，却被严词拒绝，他被带到了俘虏营。经审讯，此人是第159师少将师长甘成城。激战持续到17时许，枪声渐渐平息。除敌第73军军长带少数残敌窜至口镇，汇合该地守敌逃到青石关被我第9纵队歼灭外，余敌悉数被歼。历时3昼夜的莱芜战役胜利结束，取得歼敌7个师5.6万余人的大捷。

飞兵激战孟良崮

莱芜大捷后，蒋介石不得不把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为对山东、陕北的

重点进攻。1947年4月初，敌人纠集华东第一线兵力，共13个整编师、34个旅，约25.5万人，分别由汤恩伯、王敬之、欧震组成3个机动兵团，沿临沂至泰安线，并肩向北进犯，企图歼灭我华东主力于沂蒙山区。我华东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主动由鲁南向鲁中后撤，大胆诱敌深入，寻找机会歼灭敌有生力量。4月22日至24日在泰安一带首战告捷，歼灭敌整编第72师全部两万余人，打击了敌人重点进攻的嚣张气焰。敌人被迫采取了齐头并进，稳扎稳打的战术，3个兵团一字排开，像乌龟一样慢慢爬行，逐步向我沂蒙山地区推进。

华野首长为调动敌人，创造战机，令王必成第6纵队与第1、3纵队并肩沿津浦路西侧南下，出击宁阳，以威胁敌重要的补给基地兖州，打乱敌人重点进攻部署。当时，第6纵队南下，敌则北上，双方部队经常擦肩而过，就这样，第6纵队和敌人周旋到5月初，又奉命北上鲁中，协同第1、3、4纵队围歼北犯新泰之敌整编第11师。但是，刚刚形成战役合围，敌整编第25师、整编第83师等部分头来援，向第11师急速靠拢。这种情况不利于选择打击目标，歼灭敌人。如第6纵队向鲁南行动，鲁南为敌之后方，兵力空虚，部队插到那里，可以迷惑敌人，分散敌人注意力，又可随时北上参战，容易收到出敌不意、突然袭击之效果。

可是，插到鲁南敌后，干部战士们思想上却扭不过弯来。当时，进攻山东的敌军有三大主力：一是第1兵团张灵甫的整编第74师；一是第2兵团胡璉的整编第11师；一是第2兵团邱清泉的新5军。这三大主力中的整编第74师，是第6纵队的老冤家、死对头。王必成指挥第6纵队和他们的第一次交锋是1946年的10月，在涟水城外，第6纵队阻击了第74师的猖狂进攻，歼敌3000多人。第二次涟水战役，再一次给他们以沉重打击，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但因众寡悬殊，第6纵队也付出了较沉重代价。此役，干部战士们亲眼目睹战友们在整编第74师的枪炮下壮烈牺牲，活着的还留下了敌人带给的伤痕。因此对整编第74师格外仇恨。北撤山东时，大家听说整编第74师跟在屁股后头，一个个就急得摩拳擦掌，发誓要为死去的战友报仇雪恨。可是，此时却要大家放掉这个冤家对头，插到鲁南敌后去，这是有悖大家的感情的。这是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如何动员大家？王必成和第6纵队的领导们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

王必成平常寡言少语，但他的战友们太了解他了，他是个“静”即是“动”、“沉默”常常是“沉思”的人。他一向勤于审时度势，随时观察敌我情况变化，随时考虑自己率领的部队如何迎接新的作战任务，如何处置可能遇到的种种复杂情况。

王必成经一番深思熟虑后，向纵队党委提出了一个独特的方案：不是越过新泰临沂公路向东，而是向南挺进鲁南，插入敌后，隐蔽待机。

王必成的方案，得到江渭清，皮定均和杜屏的赞同。决议形成后，王必成一面组织部队行动，一面向华野总部报告。当时，敌情紧急，天黑时分，华野的复电仍未到。王必成当机立断，毅然率部南下。凌晨，部队稍事休息，刚架好电台，就收到华野首长同意王必成行动方案的加急电报。这时，王必成号召各部，加强思想工作，引导指战员正确理解华野首长诱敌深入、持重待机的方针。他强调说，作战指挥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力争主动，力避被动，避敌之长，击敌之短，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决不可操之过急，分散兵力与敌决战，而主动地避开，则是为了更好地打击敌人。王必成晓之以理的说服，

使大家树立了全局观念，部队便顺利地插到了平邑以南地区。

第6纵队在王必成的领导下，忽聚忽散，忽东忽西，以飘忽不定的行动迷惑敌人，有时为照顾全局，宁可放弃到嘴的肥肉，来麻痹敌人，使敌人弄不清真假虚实，为突袭歼敌设下了伏兵。

鲁南地区深受整编第74师第11师和第25师残害，当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给第6纵队以巨大的支持，同时也要求第6纵队帮助他们拔除几个敌人据点，为民除害。华野曾电示第6纵队，要“配合地方武装，打击、牵制敌人，迫敌回师鲁南”。所以，王必成决定于5月8日晚，配合鲁南地方武装，攻击白彦、城前两个敌军据点。战斗打响后，白彦之敌向城前逃窜，企图在城前集中兵力，进行顽抗。这时，王必成从华野发来的电报中获悉，敌汤恩伯第1兵团整编第74师等部，向蒙阴的坦埠以南大箭、马山、佛山等地进犯，我军的第4纵队、第9纵队正与之交战。这一迹象表明，敌人已被我军所左右，进入鲁中山区，一场大规模的围歼战就要开始了。王必成想起粟裕曾对他说过，打整编第74师少不了第6纵队的话，分析这次很可能用上第6纵队，必须早作准备。于是，他重新研究了战况，认为城前这个敌军据点若久攻不下，第6纵队难以迅速脱身北上，若迅速拿下又将引起敌人疑虑，而暴露第6纵队位置。于是，决定立即停止对城前据点的攻击，将部队撤离城前附近地区，隐蔽下来，耐心等待歼敌时机的到来。由于王必成的精心布置，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他们的腹背，还埋伏着第6纵队这支两万余人的伏兵。

5月12日中午，王必成果然收到陈、粟、谭首长签发的十万火急电报，命令第6纵队立即星夜兼程，飞兵北上，抢占垛庄，断敌退路，参加围歼整编第74师的战斗。当时，位于战线中央的整编第74师态势突出，已侵占重山、艾山一带，先头部队已渡过汶河。其两翼有强大的掩护兵团，但进展迟缓。华野首长果敢地定下了虎口拔牙的决心。我军的战役部署是：以4个纵队兵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以两面开弓之势，牵制敌人的掩护兵团，集中5个纵队的兵力，向整编第74师两翼穿插，截头堵尾，四面包围，将其一举全歼于孟良崮一带山区。

当第6纵队的指战员们知道这个消息时，激动得摩拳擦掌。围歼整编第74师的时机终于等到了。但是，第6纵队要在两昼夜行军100余公里，封闭合围口，掐断敌咽喉，任务是相当艰巨的。王必成决定以第18师为左翼，第16师为右翼，纵队部率第17师居中路，以神速动作坚决断敌退路。这时，部队还分散在几个地方，为争取时间，立即双管齐下，一面通知附近各师师长、政委到纵队接受战斗任务，一面派人去距离纵队部较远的部队传达战斗命令。因任务紧迫，各师边走边动员，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全体军事干部、政治干部，以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全体战士，发扬不怕牺牲，不怕疲劳，不怕艰难困苦，发扬打得、跑得、饿得的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完成彻底歼灭整编第74师的光荣任务。

5月12日黄昏，第6纵队回师向东北方向进军。沿途山峦重迭，道路崎岖，天上有敌机扫射，地上有小股敌人、土匪袭扰，而且粮草不足，困难是很多的。各单位充分进行宣传鼓动，召开“飞行会议”，传递“飞行快报”，使部队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战士们斗志昂扬，他们在枪杆诗里写道：“迈开我们的飞毛腿，英雄铁脚走天涯。”各级干部身先士卒，主动让马、让干粮，帮战士扛枪、背背包。有的战士鞋子烂了，用破布、烂草包着脚行军。

体弱有病的同志拄着拐棍翻山越岭，紧跟队伍。途中，来不及埋锅做饭，便以地瓜干、花生米充饥；遇到河流，徒涉而过。所有部队的行军速度，都超过了预定的时间，部队提前赶到了预定地点。

第6纵队的第一步战斗任务是攻占临蒙公路上的垛庄。垛庄是整编第74师的设防要点，是进攻沂蒙山区的交通孔道和后方补给点。这里有坚固的守备工事，两侧有强大的兵团保障，所以，敌人只留了一个辎重连守备。

王必成思考着，垛庄能不能攻占得手，是完成对整编第74师包围，然后将它彻底歼灭的极其重要的一着，把垛庄拿到手，就掐住了整编第74师的咽喉，将其置于死地；垛庄拿不到手，敌就可能从这里溜走。为此他派有攻坚战斗经验的第18师第53团担负攻占垛庄的任务。第18师派第53团第4连立即出动，作开路先锋。第4连于12日下午1时许，由鲁南白彦附近出发，昼夜兼程前进，14日凌晨到达垛庄以南的彭家岚子。这时，与整编第25师一个连迎头遭遇，遂即展开战斗，激战10多分钟便将敌击垮。他们乘胜猛进，占领垛庄西南岱山寺西侧无名高地，为第53团进攻垛庄抢占了有利地形。14日下午5时，第18师主力部队全部赶到垛庄以南和东西长命一线集结，查明了垛庄和垛庄附近的敌情，并与左右兄弟部队取得了联系。此时，我第1纵队与第8纵队分别向整编第74师两翼勇猛突击，插入敌人纵深，割裂了整编第74师与左右两翼的联系，我第4纵队、第9纵队向整编第74师当面迎头痛击，阻止了敌人前进，并从北、东、西三面将敌围住。王必成则指挥第18师对垛庄迅速发起攻击。深夜，天空布满乌云，天地间一片墨黑，我第18师以第53团两个营的兵力，从垛庄西面的寺后凹地发起攻击；以第54团一个营兵力，由沙屋后迂回到垛庄北侧，与攻击部队互相配合。敌人以为垛庄是他们可靠的后方，而万万没有想到会从他们的背后杀出一支奇兵，敌束手无策，不到半小时，就被全歼，垛庄被我占领。

敌第1兵团司令汤恩伯发觉我军有围歼整编第74师意图后，立即亲自打电话询问垛庄情况，指令整编第74师务必派重兵死守垛庄。整编第74师师长张灵甫在我向垛庄运动的同时，指派他的运输团长带领1000余人撤下山来，赶赴垛庄以东，正好与我第18师前哨相遇。我前哨部队乘敌运动之际，突然猛烈开火，歼敌一部，活捉了敌运输团长。余敌狼狈逃窜。我军乘势攻击，夺占了垛庄附近的要点，与第1、8纵队打通了联系，封闭了合围圈。整编第74师唯一的后路终被截断，被我第1、4、8、9、6等5个纵队团团围困在以孟良崮为中心的狭长地带，成了瓮中之鳖。

整编第74师陷于四面包围之中，使蒋介石非常震惊，他一面抚慰张灵甫，令其苦撑待援，一面调动10个整编师兵力，妄图对我实行反包围，以解张灵甫之危，并借此机会与我主力决战。华野首长审时度势，料敌如神，对蒋介石的这一阴谋早有防范，在敌可能增援的方向，部署了强大的阻援部队。我第2、3、7、10纵队和鲁南地方武装，分别将敌第5军阻击在莱芜以南；将敌整编第11师阻止于蒙阴以北；将敌第7军拦阻在孙祖、桃花山一线；将敌整编第20师、整编第64师牵制在青驼寺以南地区。我各主攻部队也以强大攻势割裂整编第74师与援敌之联系，使敌不但不能解张灵甫之急，反而自身难保，遭我严重杀伤。

第6纵队奉命和友邻部队一起在敌侧后的两翼阻敌援军，一个是孟良崮的西南方黄崖山、狼虎山一线，协同第1纵队阻击敌黄百韬的整编第25师；另一个是在孟良崮的东南方牛头山、大朝山一线，协同第8纵队阻击李天霞

的整编第 83 师。

东南方的敌整编第 83 师，曾遭我军多次歼击，垛庄被我攻占后，他们十分恐慌，连忙由驻地双侯集向垛庄东南的青驼寺一带退缩，王必成判断这支敌人战斗力较弱，且与整编第 74 师有重重矛盾，增援整编第 74 师的积极性不高。于是，令第 17 师第 51 团向南伸展，占领东、西果庄，控制大朝山、大望山等高地，以阻该整编师的可能增援；令第 17 师第 49 团和第 51 团向北攻击，以防止整编第 74 师夺路逃窜。

西南方的整编第 25 师则不同于李天霞的部队，他们在蒋介石的督令下，拼命增援。距孟良崮只有 5 公里的黄崖山，是整编第 25 师通往孟良崮的最后—道天然屏障。该敌一旦越过黄崖山，经一片开阔地，就能与整编第 74 师联成一片。所以，第 6 纵队能不能抢占、固守黄崖山，也是关系到取得战役胜利的重要环节。这是一场硬仗、恶仗。王必成把它交给了善于打山地阻击战的第 16 师。

14 日晚，在攻击垛庄的同时，开始了抢占黄崖山的战斗。王必成命令第 48 团火速向黄崖山—线搜索前进，务必先敌占领阵地，不惜一切代价拖住整编第 25 师。此时，整编第 25 师—部，也正向黄崖山—线急进，企图抢先通过黄崖山，从这里撕开一个口子，打通与整编第 74 师的联系。次日拂晓，黄崖山上浓雾弥漫，两军同时赶到了山脚下，我由西坡向山上冲去，敌则从东坡向山上攀登。这是一场抢时间、比速度的激烈争夺战。我第 48 团第 3 营第 9 连连长翟祖先率先头部队，不顾连续行军的劳累，攀悬崖，跨沟坎，越绝壁，冲破—切障碍，终于先敌—步，抢占了制高点。他们往山下一看，只见—股敌人离山顶只有 40 多米了，在督战队的逼迫下，正在拼死向上爬。于是，他们迅速占领有利地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用六—炮、轻重机枪、冲锋枪、汤姆枪—起朝敌群猛烈扫射，打得敌人鬼哭狼嚎，退下山去。接着，我后续部队陆续赶到，黄崖山及附近的狼虎山、万泉山等要点也均被我控制。部队立即抓紧时间抢修工事，巩固阵地，以迎接更加艰巨的战斗。

15 日中午，整编第 25 师乘我立足未稳，以两个营兵力，向黄崖山阵地发起猛烈攻击。他们在“—准进—不准退”的命令下，用密集的队形，冒死向山上进行集团冲锋。担任阻击的第 16 师令第 47 团接替第 48 团防务，控制、扼守黄崖山；第 48 团则隐蔽、集结在大涧口—线，待机反击。当整编第 25 师的两个营向我攻击时，我预伏于阵地两侧的部队，突然向敌侧翼出击。经—番白刃格斗，敌人纷纷被歼，滚跌到悬崖下。

这天下午，敌再次进行集团冲锋。他们先对我第 47 团扼守的阵地进行疯狂炮击，山上我防御工事遭破坏。接着拥上来—个团兵力，分成三路，齐头猛攻。我阻击部队虽进行英勇抗击，但前沿阵地终被敌突破，情势十分危急。在前沿阵地指挥的第 47 团团长江祖煌，迅速指挥 1 营和特务连跃出堑壕，迎敌而上，经过—场浴血奋战，敌人伤亡惨重，败退下去。我重新收复了阵地。狡猾的敌人在黄崖山上失败后，改换战术，从望海楼北侧迂回，向我左翼狼虎山、石屋山、老峪—线阵地进攻，企图夺路通过，同样被我击退。

我阻击部队的作战，是十分艰难的。因为据守高地，敌人终日连续地进行攻击，使炊事员多次送饭送不到阵地，战士们从早饿到晚，还要坚持战斗。山上没水，要到山脚下的井里去取水，没有水桶，只能用钢盔吊水喝，指战员们渴得口干唇裂。在两个昼夜的黄崖山阻击战中，敌人先后对我扼守阵地进行了 10 多次反复冲锋。但是，不管他们来—个连、—个营，还是—个团，

不管他们从正面来，还是迂回进攻，每次都是来的多，回的少，阵地一直在我手里。整编第 25 师离孟良崮近不过咫尺，却不能救援整编第 74 师。与此同时，南线与北线增援的各路敌军，在我兄弟打援纵队和地方武装的坚决阻击和打击下，进展迟缓，自顾不暇。蒋介石里应外合，两面夹击，对我实行反包围的计划遭到彻底破产。

敌人的援兵被阻遏，为我军围歼整编第 74 师创造了条件。但是，要敲掉整编第 74 师这个“硬核桃”并非易事。张灵甫是蒋介石的心腹干将，他有反革命战争的作战经验；整编第 74 师人员弹药充足，全部美械装备，还配备有榴弹炮、山炮部队，有大量空军部队协同，又处重兵集团的中央。这是必须认真对付的。为此，华野命令担任攻击的各纵队加速猛攻，要不惜任何代价，在各路援敌靠拢之前，彻底歼灭整编第 74 师，决不让敌跑掉一个。王必成在各种会议上，号召全体指战员，发扬英勇顽强、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坚决实现华野提出的“攻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的这一战斗口号。

15 日上午 8 时，第 6 纵队担任主攻的部队继续投入了战斗。王必成令第 17 师投入主攻方向的两个团，密切配合友邻第 8 纵队，向孟良崮的侧翼发起进攻。我第 18 师第 53、54 两个团于 15 日上午 8 时，不顾敌机扫射、轰炸，在我军强大炮火的掩护下，向整编第 74 师的外围阵地横山、官山、大山场一线猛打猛攻，与敌展开激烈争夺战。这时，第 6 纵队指挥所随战斗的胜利发展，向前移动到第 18 师指挥所附近。王必成在望远镜里看到两军激烈搏斗，如犬牙交错，一进一退，又一退一进，在山坡上彼此短兵相接。敌依赖飞机轰炸作掩护，拼命顽抗，但因两军扭打一团，敌机投弹常常落在他们自己的阵地或两军阵地之间，误伤他们的士兵，所以空军的助战效果不大，甚至帮了倒忙。经两小时艰苦奋战，我第 53 团终于突破敌人的前沿阵地，将敌一个连消灭在阵地之前，夺占了横山、官山两个高地。我第 18 师第 54 团也打得非常勇敢，他们在占领了子朗以后，即向东北方向连续攻击前进。当进至业家沟时，敌出动了两个营兵力猖狂反扑。敌反扑被我击退后，双方形成对峙鏖兵局面。傍晚时分，我决定集中兵力和火力，利用夜暗，采取突袭办法对敌强攻，遂调整攻击力量，重新配备火力，给第 18 师加强了炮兵和机枪。晚 7 时许，我第 53 团派出两个加强营由官山向西北攻击，配合第 54 团攻歼业家沟、杨家庄敌人。我先以 10 分钟猛烈的排炮轰击，炸得敌阵地上碎石乱飞，浓烟滚滚，使敌遭受严重杀伤，抬不起头。我攻击部队便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勇猛冲击，一举突入敌阵，将守敌大部歼灭。残敌遂往东 540 高地狼狈逃窜。接着，业家沟、杨家庄、大山场等阵地全部为我夺占，从而使敌人核心孟良崮的侧背，完全暴露在我军面前。

15 日晚，整编第 74 师被迫全部汇集到芦山、孟良崮、600 高地及东西 540 高地，人马拥挤，指挥失灵，水断粮缺，弹药困难，陷入岌岌可危的困境。但是，张灵甫不甘失败，他一面继续向蒋介石呼援，一面要他的旅长收拾残兵败将，死力紧守，伺机突围。深夜，华野司令部将敌情用电话通告各纵队干部，令第 6 纵队配合友邻部队，务必在 16 日拂晓发起全线总攻击，最后解决战斗，全歼第 74 师，不许其一兵一卒漏网。接到华野指示，王必成立即电令各师师长、政委赶到纵队指挥所，在地堡里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了华野指示，布置了各部队的作战任务。各师领导表示，一定要尽最大努力完成任务，坚决把华野提出的口号变为现实。拂晓前，纵队参加主攻的 6 个团预备队全部进入预定位置，随时准备出击总攻孟良崮。纵队指挥所向前移动

到孟良崮以西的大山场，距孟良崮主峰仅4公里。

16日凌晨4时，浓雾沉沉，芦山、540高地的敌人向东移动，有企图突围的迹象。王必成立即下令接敌部队提前实施全线出击。我第18师第52团以迅捷动作，由马家庄向西540高地攻击，直扑正在逃窜之敌。在我强大火力打击下，敌人立即陷入混乱，大量就歼、被俘。我54团在朦胧的夜色中，由杨家庄一线向东540高地开展攻击。敌不敢恋战，慌忙溃逃。我第53团与第17师的第49团，沿着横山东侧协助第8纵队向芦山攻击。芦山之敌一个整团陷于我两面猛烈炮击的火海中。敌对我各路攻击部队虽进行连续反冲击，但均被我一一击退，经反复争夺，孟良崮南面的屏障芦山，终于被我完全占领。

上午7时，敌已精疲力竭，王必成考虑到第6纵队主攻部队也十分疲惫，不宜再战，他便果断决定纵队的预备队——特务团向敌出击，协同52团和54团拿下东、西540高地，冲上孟良崮，直捣敌巢。

连日来，特务团的指战员们眼见着兄弟部队参战，急得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一听到命令，一个个像上足了发条的时钟，直楔敌阵，不出两小时，就顺利拿下了西540高地西侧的285高地。敌趁特务团立足未稳，派500多人兵力，在敌机掩护下，向285高地狂轰滥炸，妄图收复阵地。特务团机智灵活，避开敌空中火力，迅速向前运动，与敌展开近战，和反扑之敌扭打一团，毙敌100余人，生俘200多人，打退了敌人的反扑。接着，他们又乘胜前进，与第52、第54团密切配合，拿下了东、西540高地。

将近中午，在各路大军的合力围攻下，孟良崮周围的主要制高点均已被我控制，残敌和大批的辎重、骡马都退缩、堆集到磨盘似的孟良崮山顶和600高地等光秃秃的山头上。此时此刻，敌人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在望远镜中，可以看到我方的一发炮弹就可打死打伤大片敌人。不远处，时时传来敌人的哀号声和粗鲁绝望的叫骂声。更可笑的是，敌机空投下的各种弹药、熟食、饼干、罐头、水等物资，绝大部分落在我军的阵地上。敌人气得嗷嗷叫骂，我们的战士们却笑得前仰后合，风趣他说：“蒋介石不愧是称职的运输大队长，派‘黑寡妇’（指敌机）送饭真及时啊！”

下午2时，总攻开始了。我榴弹炮、山炮、野炮，从四面八方泻向敌阵地，把山顶、山崖和敌人马全都笼罩在一片茫茫硝烟烈火中。嘹亮的冲锋号声在山谷里回荡。我各路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孟良崮压去。王必成指挥的特务团首先突破孟良崮西侧，直取整编第74师指挥所所在的山洞。在绝望中，张灵甫令他的参谋长魏振钺率1000多士兵猛冲到山腰，企图作垂死挣扎。特务团指战员奋勇迎战，与敌展开激战，敌人一次次冲锋，被我一次次压下去。经几个回合，敌参谋长被生俘，敌死伤被俘大部，特务团乘胜向山洞逼进。第1营第3连指导员邵至汉冲在最前边。他多次负伤，仍坚持战斗，率部分战士攻至洞口。此时，张灵甫正指挥卫队作困兽之斗，邵至汉身中数弹，倒在洞口。第3连的指战员们见指导员牺牲了，一个个睁着血红的双眼，奋不顾身地和敌人进行白刃战，消灭了这股亡命徒。这时，后续部队赶到了，他们集中火力向洞内猛扫，顿时，洞内传来一片鬼哭狼嚎声。战士们冲进洞内，洞内一片狼藉，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血污满地。张灵甫已被击毙。

16日下午5时，战斗胜利结束了。一阵暴风陡然而起，倾盆大雨从天而降，驱散了战斗的硝烟，群山泛出一片葱绿。雨后天晴，王必成站在山顶上，举目眺望，胜利后的喜悦洋溢在他的脸上，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



顿感心旷神怡，他看到胜利的战旗在孟良崮顶峰迎风飘扬。

# 解放战争中的王近山

陈德荣

王近山（1915～1978）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10师第30团班长、排长、副连长、连长、副营长、营长，第10师第29团团长、第28团团长，第10师副师长，红31军第93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第772团副团长，第385旅第769团团长、旅副政治委员，新编第8旅代旅长、旅政治委员，第386旅旅长，太岳军区第2军分区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4旅旅长，太岳纵队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军区第6纵队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司令员，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副司令员兼第12军军长和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川东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兵团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山东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副部长，南京军区副参谋长、顾问。抗美援朝战争中，两次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的一级独立自由勋章。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王近山曾被誉为“一代战将”。

\* \* \* \* \*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里，王近山在党中央、毛泽东和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等的正确指挥下，认真学习和实践毛泽东军事思想，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以超人的胆略、非凡的军事才能，活跃在战争舞台上，奏出一曲曲胜利的凯歌。尤其是解放战争时期，更是王近山成熟、辉煌的时期。

解放战争中，王近山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改称中原野战军，亦称“刘邓大军”）第6纵队司令员。那时，在第6纵队，从上到下，从官到兵，谁都知道王近山有个绰号叫“王疯子”。其实，王近山一点也不疯。这是广大指战员对他英勇无畏、敢打敢拼、奋不顾身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赞美，是对他舍生忘死、机断果敢、靠前指挥的高超指挥艺术的颂扬。下面，从记述王近山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些作战片断中，不难看出他不畏强敌，迎难而上，勇挑重担，足智多谋，骁勇善战，敢打必胜的战将风采。

## 胸怀全局勇挑重担血战大杨湖

全局在胸，以大局为重，用局部的积极行动配合整体作战，在关键的时候勇挑千斤担，这是王近山的一个显著特点。定陶战役中的大杨湖之战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在这次战役中，王近山立下了卓越的战功。

1946年8月，我晋冀鲁豫野战军出击陇海路，连克5城，歼敌2.8万余人，解放了豫东大片土地，打乱了敌人南线进攻计划。陇海战役胜利结束时，毛泽东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集中于陇海路以北休整，诱敌深入，寻机歼敌。并指出，对进攻之敌，不打无把握之仗，打则必胜，必须以4倍至少3倍的优势兵力对付敌人，先歼敌一部，再歼敌一部，再打第三部，各个击破之。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向陇海路北根据地转移、休整。

但是，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趁我刘邓大军亟待休整之际，急忙从豫西、陕南抽调3个整编师，从淮北、徐州调来1个军、2个整编师，加上原在郑州、新乡、开封、商丘等地的7个整编师，以14个整编师32个旅

的兵力，分东西两个方向，对我冀鲁豫解放区发动钳形进攻，妄图攻占解放区，消灭刘邓大军主力。8月28日，东路之敌徐州绥署的第5军、整编第11师和第88师，由徐州、砀山地区向单县、成武地区进攻；西路之敌郑州绥署5绥区的整编第3师、第41师、第47师全部和整编第55师、第68师一部及暂编第4纵队3个团，由封丘、开封、考城、商丘一线向东明、定陶、曹县地区进攻，企图聚歼我刘邓大军主力于定陶、曹县地区，进而控制鲁西南，打通平汉路。敌整编第3师中将师长赵锡田自恃是黄埔第1期生、蒋介石的嫡系，加上该师曾赴缅甸作过战，装备精良，骄横得不可一世。赵竟狂妄吹嘘：不用两个星期就可占领鲁西南，把刘伯承赶上太行山！

面对强敌和如此严重的态势，刘、邓首长全面细致地分析了敌我基本情况：冀鲁豫战场，敌32个旅30万人，我只有4个纵队5万人，兵力对比敌强我弱，如求全歼，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只有巧妙地调动敌人，寻其弱点，集中兵力，形成局部优势，各个击破。东西两路之敌相比，徐州之敌是蒋介石的嫡系，其第5军和11个整编师，全部美式装备，有所谓蒋介石的五大主力的两大主力之称，战斗力较强，先打徐州来犯之敌，势必形成相持局面，难收速决全歼之效；郑州来犯之敌虽多于徐州方向，尽管表面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但外强中干，必然一击奏效，故打之易于得手。从敌部署看，西路之敌担负主攻任务，我打之，则必然造成敌西线紧张，迫其调整部署，便我发现其弱点，利我选准突破口，集中兵力打歼灭战。西线之敌除整编第3师外，均系非嫡系杂牌军，内部矛盾突出，我首歼整编第3师，各路敌军增援的可能性不大，便我利用矛盾，各个击破。整编第3师刚从中原调入，情况生疏，仓促上阵，连战疲惫，加之骄横狂妄，易孤军冒进，利我歼灭。

基于上述分析，刘、邓首长决心先主动退让一步，诱敌深入，使敌人在运动中拉长战线，形成孤立或薄弱部分，再集中力量首先歼灭西路之敌主力整编第3师，粉碎西路之敌攻势，打破敌人东西钳击我军的计划。

为实现这个决心，刘、邓首长召开了各纵队司令员、政委参加的作战会议，征询大家意见，研究打法。会上，李达参谋长介绍了敌情。刘、邓首长对敌我情况作了进一步阐述，确定在东西两路敌人中，选西路为主攻方向，而西路中又以整编第3师为主要攻击目标，以该师师部和其主力第20旅为突击重点。最后，刘伯承指出：如不能粉碎敌人的进攻，我们就要被赶到黄河以北，回太行山打游击，就不能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战略任务。要粉碎敌之进攻必须从整编第3师开刀，干净彻底地把它吃掉！

为了激励大家，邓小平提问：“我们是坚决消灭敌人？还是背起背包回太行山？”

稍倾，刘伯承突然发问：“看谁来打？”

王近山对敌人的嚣张气焰十分气愤，听到刘、邓首长的问话，他拍案而起，主动请战，说道：“一号（刘伯承司令员）、二号（邓小平政委），赵锡田率骑兵冒进，看上去气势汹汹，实属孤立突击之敌，我王近山今天立下军令状，不消灭赵锡田，我没脸回来见你们！我们第6纵队要求承担起最艰巨的任务！坚决打！打剩下一个旅，我当旅长；打剩下一个团，我当团长；打剩下一个连，我当连长。全纵队打光了，我们对得起党，对得起哺育我们的太行山父老乡亲！”

刘、邓首长听了王近山的请缨很高兴，当即批准第6纵队担负攻歼敌整编第3师主力第20旅第59团的任务，并作了各纵队合力聚歼整编第3师的

作战部署。

受领任务后，王近山同第6纵队其他领导同志分头到各旅传达部署，并同旅的领导同志一起研究作战计划和具体打法。9月3日下午，敌整编第3师被诱至预定战场大黄集、大杨湖地区。其右邻第47师、左邻第41师分别被阻于桃园集、常路集和东明地区。东路进攻之敌也被阻于单县以东地区。于是，形成了整编第3师孤军突出，便于我歼灭的有利态势。鉴于上述情况，刘、邓首长决定于当日夜对整编第3师发起攻击，首先集中力量，重点歼灭该师主力第20旅。第6纵队奉命攻歼敌第20旅主力第59团；第2纵队攻歼大黄集、周集之敌；第3、7纵队攻歼申倪砦、方车王、天爷庙和小杨湖、周庙等地之敌。敌第59团是敌整编第3师的“王牌部队”，装备较好，战斗力较强，配置在要害部位大杨湖地区。王近山派人对大杨湖进行了侦察，得知：大杨湖村约300余户人家，村内多砖瓦房，村围有断续土墙环绕，村四周地形开阔。根据敌情和地形，王近山决心以钳形攻击，歼灭大杨湖守敌，以第16、18旅分别经张集、苑砦和张大庄、马庄，合击大杨湖；第17旅位于杨磨头待机。

3日夜，战斗发起。战至5日拂晓，部队扫清了大杨湖外围各据点后，即以2个团的兵力进攻大杨湖，因敌火力太猛，依托层层工事顽抗，未能成功。此时，敌整编第41师已进至东明集（大杨湖西北约20公里处），敌第11师也正向定陶急进，企图增援整编第3师，情况极为紧迫，我必须从速歼灭大杨湖守敌，否则敌援兵赶到，相互靠拢，战局将发生对我极为不利的变化。刘、邓首长明察秋毫，及时指出：大杨湖战斗，是歼灭整编第3师、粉碎西路敌人进攻的关键，事关全局，必须打好这一仗；并迅速调整了部署，决定于当日夜全线发起猛攻。

根据刘、邓首长意图，王近山于5日上午召开了由旅以上干部和主力团主要领导参加的作战会议。会上，他传达了刘、邓首长的指示，强调指出：“大杨湖是敌整编第3师的要害，必须从这里开刀才能迅速打乱整编第3师的阵势，从速将其歼灭。这一仗事关全局，我们必须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破釜沉舟，不惜任何代价，坚决歼灭大杨湖的敌人！这是关键的一仗！打赢了，叫敌人滚出解放区。要是打败了，我们就得打起背包再上太行山。现在，党中央、毛主席在看着我们，刘、邓首长在看着我们，冀鲁豫解放区人民在看着我们！我们要用“烧床铺草”（意思是义无反顾、准备为革命牺牲）的精神和敌人拼！我就不信敌人有三头六臂，我们的子弹、手榴弹、刺刀也不是吃素的。把整编第3师主力第59团消灭，这个任务是我向刘、邓首长立下军令状要下来的，必须实现！”

接着，王近山分析了敌人的特点：大杨湖守敌火力较强，防御较严，与四周敌人协同密切，我必须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重点突击。同时，要阻止四周敌人对其支援，陷大杨湖守敌于孤立无援之境，以利于我迅速歼灭。据此，王近山确定以肖永银的第18旅和第17旅第49团担任主攻，由东南面从大杨湖、大张集之间的马庄向大杨湖实施主要突击；尤太忠的第16旅主力由北相继进攻并准备机动；李德生的第17旅（欠第49团）配置在大张集为预备队；第48团向大黄集、第53团向周庙实施警戒并准备阻击来援之敌。为了集中火力打开突破口，将全纵队八二迫击炮以上口径的火炮编成火力队，指定由第17旅参谋长赖光勋同志任队长，配置在大杨湖东南，占领发射阵地，支援突击部队攻击。

为实现上述决心，王近山将纵队前指设在离大杨湖仅 500 米处的大张集。

5 日 23 时 30 分，漆黑的夜空升起 3 颗红色信号弹，总攻大杨湖的作战开始了。在此关键时刻，刘伯承司令员亲临第 6 纵队指挥所，并风趣他说：“我给你们看大行李来啦，你们放心地去打嘛！”刘司令员和大家一起战斗，更加鼓舞了第 6 纵队指战员的斗志，增强了胜利的信心和勇气。纵队的领导立即到了旅指，旅的干部到了团指，团长、政委有的到了营，有的跟随突击队冲锋。王近山深入部队鼓励大家说：“国民党军队，都属老鼠的，洞门光棍，欺软怕硬，只要我们硬，他们就软！对这帮混蛋要狠点，把所有的子弹都打到敌人身上去！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要把敌人打垮！坚持，只要坚持住，坚持到底，胜利就是我们的。”

部队在一片喊杀声中奋不顾身地向敌人冲击。接着，下面不断地向王近山报告：我第 54 团在村西南角攻占了一块阵地；第 52 团由村北攻入村内，占领部分房院；第 49 团由村东南角突破了敌人的防御，正在与敌激战。此时，守敌立即向我发起猛烈反扑，企图乘我立足未稳，迫我撤出。第 49 团 3 次突入敌人阵地，均遭敌连续反扑，被迫撤至村沿。第 52 团、第 54 团亦遭敌火力拦阻，进展困难。我占领村沿的部队，由于伤亡较大，敌人继续反扑，眼看阵地难以巩固。

值此千钧一发之际，为了巩固和发展突破的成果，王近山司令员令第 16 旅一部由村东迅速投入战斗，向敌猛扑，反复争夺，将敌压缩至村西部，敌见我来势勇猛，乃集中兵力，固守待援。正在激战中，申倪砦（大杨湖西南 3 公里）之敌，在 5 辆坦克配合下，向我第 54 团侧后猛烈冲击，企图接援大杨湖守敌西撤。大杨湖敌人闻坦克声响，知援兵到来，又拼命向我反扑，战斗更为激烈。

我第 54 团在敌人内外夹击下，浴血奋战，英勇抗击，连续打退了敌人多次冲击。很多同志几次负伤，坚持不下火线，继续和敌人拼杀，直至最后牺牲。有的排只剩下几个人，仍然坚守阵地，不让敌人突围西逃。激战至后半夜，该团仅剩百余人，团长卢彦山、政委李少清及参谋长、政治处主任亲率警卫员、通信员、电话员、司号员、卫生员、炊事员、饲养员投入战斗，顽强坚守阵地，寸土不让。但敌人仍拼命向该团连续猛烈冲击，情况十分危急。假如该团坚持不住，让大杨湖敌人突围西逃，则整编第 3 师难以迅速歼灭，战斗时间势必延长，从而让敌人援军赶到，将大大增加我粉碎西路敌人攻势的困难，影响整个战役的进展。

值此严重关头，王近山亲自给团长卢彦山打电话，鼓励他们说：“你们打得好！打掉了敌人的锐气，对全局起到了重要作用，没有辜负刘、邓首长的期望。我代表纵队党委慰问全团同志！你们眼下处境困难，一定要坚持住！”随即，王近山令第 18 旅以第 53 团主力，在第 54 团方向投入战斗，迅速向敌猛扑，巩固了一块阵地，截阻了援敌。大杨湖企图突围西逃的敌人，见援兵被阻，又退守村内。

此时，我攻击部队同敌人反复冲杀，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很多连队仅剩几十人或十几人，有的班只有一二人，但敌人继续顽抗，战斗仍在激烈进行。这是考验一个部队能否“过硬”，在最困难的情况下能否坚持夺取最后胜利的严重时刻。为了彻底歼灭大杨湖的敌人，保障定陶战役的全胜，王近山决定倾全力再次组织攻击。当晚又部署第 46、47 团由东向西突击，第 53 团由

南向北突击，同时以第50团仅有的百余人组成一支突击队，从第54团右侧加入战斗。

6日拂晓，第6纵队再次向大杨湖负隅顽抗之敌发起猛攻。王近山亲自来到离敌前沿约300米的地方指挥。在这里，便于用肉眼察看战场情况，便于及时调兵遣将，便于及时正确地处置各种情况。子弹在低空飞舞，手榴弹、炮弹的爆炸声不断响起。突然，一发炮弹落在离他几米处，身旁的一名参谋被炮弹炸伤。王近山毫无惧色，安之若素，一面叫人抢救受伤的参谋，一面从容不迫地指挥作战。

由于王近山靠前指挥，极大地鼓舞了战士们的斗志。“打进大杨湖！”、“消灭整编第3师！”、“活捉赵锡田！”的口号响彻在大杨湖战场上。

部队奋不顾身冒着敌人的火力，前仆后继，英勇突击。很多同志多次负伤，仍然坚持战斗；很多班剩下一、两名战士，立即主动参加另一个班的冲击。弹药打光了，就用刺刀、铁锹和敌人搏斗，有的同志直至牺牲还用嘴死死咬住敌人。大杨湖守敌在我顽强攻击的震撼下，经我以绝对优势兵力连续突击后，伤亡越来越大，战斗力逐渐削弱。随后，王近山指挥部队尽力投入战斗，迅速打开了纵深战斗的局面，各团相继突入村内，将敌分割围歼。战至8时，终于全歼大杨湖的敌人，敌第59团团长吴耀东被从桌子下面拉出来当了俘虏。

大杨湖战斗的胜利，使敌整编第3师阵势大乱，骄横跋扈的赵锡田，也露出了惊慌失措、外强中干的真面目，率残部于当日向南逃窜。

智勇过人、性格刚烈的王近山岂容赵锡田逃跑。当即，令第6纵队部队乘胜追击，协同第2、3、7纵队于7日在大李砦将整编第3师残部歼灭，赵锡田被活捉。蒋介石精锐部队整编第3师全军覆灭，使敌人大为震惊。敌第41、47师和第55、68师等部于当日分别向考城和兰封逃窜，中途敌第47师被歼2个旅，其余各遭我兄弟部队追歼一部。至此，定陶战役胜利结束。蒋介石妄想消灭我刘邓大军的美梦也随之破灭。

是役，王近山指挥第6纵队和第2、3、7纵队密切协同，在刘、邓首长正确指挥下，经5天英勇奋战，歼敌4个多旅共1.7万余人，创造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范例，彻底粉碎了西路敌人的攻势，打破了敌人东西两路钳击我军的计划，沉重打击了敌人全面进攻的疯狂气焰。这一胜利正如1946年9月12日《解放日报》社论指出的：“是继中原我军突围胜利与苏中大捷之后又一次大胜利。这三个胜利，对于整个解放区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这一胜利，是刘、邓首长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这一胜利，也是王近山不畏强敌、舍生忘死、敢于啃“硬骨头”的英雄气概和顽强战斗作风的生动体现。9月7日毛泽东主席亲自拟稿，致电刘伯承、邓小平：“6日23时电悉，甚慰。庆祝你们歼灭第3师的大胜利，望传令全军嘉奖。”9月8日7时又致电刘伯承、邓小平：“7日13时电悉，甚好甚慰。”9月16日毛主席发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其中把定陶战役作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范例。

大杨湖战斗是第6纵队成立后第一次面临的恶仗、硬仗。这次战斗，王近山坚决贯彻了刘、邓首长诱敌深入，掩护主力进行战役准备的指示，深刻认识大杨湖之战是定陶战役的关键，定下了不惜一切，坚决完成任务的决心，采取了积极的机动防御与麻雀战相结合的战法，正确掌握了“阻”与“放”和“歼”的时机，发扬了“勇敢战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在持续激战，

部队伤亡较大的情况下，仍坚定沉着、刚毅果断、从容不迫、量敌用兵，指挥部队与敌浴血奋战，从而，使刘、邓首长的战役决心得以实现，为战役全胜创造了条件。

#### 胆略超人 敢破惯例智取襄阳

超人的胆略，丰富的智慧，不因循守旧，敢于创新立异，依据主客观条件活用战法，以智取胜，是战将王近山指挥作战的又一特色。襄樊战役第二阶段的襄阳作战，就是王近山有胆有略，有勇有谋，决心果断，指挥正确，活用战法，以智取胜的典型战例。

1948年6月下旬，中原地区敌我主力交战于豫东。我华野粟裕兵团主力在睢县、杞县地区围歼敌区寿年兵团。为配合华野作战，中原野战军（原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称）正以第1、2、3、4纵队在漯河、周口地区，阻击北援之敌。此时，南面汉水中游襄樊地区守敌第15绥靖区部队完全陷于孤立状态。在唐河地区隐蔽休整待命的第6纵队司令员王近山，坐不住了。他打电报向刘、邓首长请战打襄阳。

为了开辟汉水中段，建立战略前进基地，并配合兄弟部队作战，刘、邓首长决定以第6纵队和桐柏军区第28旅及陕南军区第12旅组成西兵团，乘敌之隙，发起襄樊战役，夺取川陕鄂三省要冲襄阳、樊城。战役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先歼老河口、谷城之敌，由桐柏军区司令员王宏坤统一指挥；第二阶段由第6纵队司令员王近山统一指挥第6纵队（3个旅）、陕南第12旅（3个团）和桐柏军区第3分区（5个营）围攻襄阳之敌，桐柏军区第28旅攻打樊城。

7月2日，王近山率第6纵队自唐河出发，一昼夜急行军150余里，迅速隐蔽接敌，突然发起攻击，于当晚12时，解放老河口。守敌仓皇逃往谷城。陕南第12旅自均县以南之草店隐蔽东进，3日晚在谷城以南之山地截住敌人，歼敌第163旅1个团及1个营，俘敌旅长以下1800余人。桐柏军区第3分区于襄阳至谷城之间截歼敌第163旅辎重营。战役第一阶段顺利结束。

7月6日，桐柏军区第28旅部队包围了汉水北岸的樊城，我军其余各部队从三面进逼襄阳，战役第二阶段开始。

襄阳，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有“铁打的襄阳”之说，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争夺中原，必取襄阳。古代就有许多战事发生在襄阳：三国时，孙权的父亲孙坚，在攻打襄阳时，被射死在岷山脚下；关羽在夺取襄阳后，水淹七军，活捉庞德，成为千古佳话；宋朝，岳飞于襄阳击败金兵，现今襄阳城西诸葛武侯祠内还留有岳飞手书——《出师表》；明末，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克襄阳，建立政权，称新顺王。在《史记》中有这样记载：“襄阳，上流门户，北通汝洛，西带秦蜀，南遮湖广，东瞰吴越。欲退守江左，则襄阳不如建邺（今南京）；欲图中原，则建邺不如襄阳。”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襄阳的战略位置是多么重要。

襄阳城东、北、西北环水，北与樊城隔水相望，城南和西南群峰耸立，有凤凰山、羊祜山等高地，地形险要，可以控制城南和城西的道路。城四周筑有高三丈、宽两丈的石头城墙，靠城墙有深丈余、宽3至4丈的外壕2至3道，壕外密布铁丝网和鹿砦，城垣及南面大山，均构筑坚固的地堡、碉楼。城垣四周许多道路上、死角处、开阔地遍布地雷，可谓是“固若金汤”。

由于襄阳在军事上地位重要，蒋介石特指令康泽率部防守。

康泽何许人也？康泽是国民党中央常委，著名特务头子，黄埔军校第3

期毕业生，蒋介石的亲信，曾被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因反苏、反共出名倍受蒋介石宠爱，回国后担任蒋的侍从副官、黄埔系的核心组织“复兴社”的秘书长、三青团组织处处长等职。1948年初，蒋介石日子难过的时刻，任命康泽为第15绥靖区司令官，坐镇襄阳这个川陕鄂豫4省交界的要地。康泽自己从未带兵打过仗，就任命有作战经验的川军将领郭勋祺做他的副司令，并将其主力第104旅部署在城南门和城南大山重点防守，将第163、164旅各1个团防守西门和城西南高地，由少数正规军和反动地方武装在东门和北门防守。在康泽的眼里，襄阳城防如铁桶一般。

面对险要的地形和复杂的敌情，王近山进行了细致周密的分析：襄阳地形利敌防守，敌有重兵把持，我进攻确有较大困难。我第6纵队部队刚从大别山出来，且只有6个团的兵力（每旅留下1个团在大别山坚持根据地斗争），连同桐柏和陕南军区的部队，攻城总兵力约14个团、2万余人，重装备较少，桐柏和陕南军区部队又是从远道奔袭而来，按照集中优势兵力，四面包围，力求全歼的原则，在兵力数量上并不具备优势。这是不利的一面。但也有许多有利的条件，部队通过整风，士气高昂，求战心切；康泽是个特务，不懂军事，是个狂妄自大的无能之辈，其副司令郭勋祺虽是一名老军人，但并不受信任，手无实权，与康泽矛盾很大；守敌为川军，战斗力不强，加上敌第104旅曾在滑县上官村被我歼灭过，正副旅长被俘，该旅重建时间不长，对我存有畏惧心态；襄阳守敌是孤军，平汉线之敌来援不及。通过分析比较，王近山认为，只要我围攻襄阳部队充分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政治、军事民主，讲求战术，团结一心，协同作战，一定能打败敌人。于是，王近山定下了初步决心：合力围攻襄阳，断其水陆逃路，攻占城南诸山，而后依山攻城。同时确定，以桐柏第3分区部队主力向石匠山、铁帽山、文壁峰逼进，一部伸至汉水西岸，构筑工事，防敌南逃；以陕南第12旅向尖山、虎头山、凤凰山稳步推进；以第17旅向西关逼进；第16旅为第2梯队随第17旅跟进；以第18旅出南漳、宜城，准备打援战场，阻敌来援。

6日，各部按王近山的部署完成了对襄阳的合围。第18旅袭占南漳，进至宜城地区后，敌尚无来援迹象。此时，王近山决心对襄阳守敌发起攻击。

7日夜，攻击部队传来报告，敌人工事坚固，火力较强，我伤亡百余人，攻击未成。

面对这一情况，引起王近山更加冷静地思考。为了确实弄清当面敌情，制定符合战场实际的正确的歼敌计划，他吩咐参谋处贺光华处长带一名参谋到凤凰山去现地详细观察敌情和地形，并嘱咐贺光华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设想问题。然后，王近山关上房门，站在地图前苦思良策。几个小时以后，王近山紧锁的眉头舒展了一些。突然，一声“报告”，贺光华回来了。

王近山迫不及待地询问贺光华：“前面情况究竟如何？”

贺光华边擦汗水边掏出一份现地绘制的地形、工事、兵力配备要图交给王近山，很有条理地汇报说：“敌人山上的工事坚固，碉堡很多，山头与山头构成了环形防御，火力可以相互支援，也可独立作战。如果我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攻击，啃是可以啃下来，但既费时间，也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城四周除外围据点外，四关都有工事，以南关和西关更强一些。东关外水壕很宽，且距汉水很近，不利屯兵。南关外紧挨羊祜山、岷山、铁帽山，东面就是汉水，由南关攻城，背后是通宜城、钟祥的公路，如汉口敌增援，我将受敌南北夹击，而且仍然要攻山才能接近南关。西关外至万山有一条走廊，南北约



一公里多，北面是汉水，南面有琵琶山、真武山，如果挖一条交通沟进去，可以直抵西关，部队运动也可以减少伤亡。”

王近山细心听完贺光华的汇报，慢慢地在指挥所里来回踱步。他又问贺光华：“十字架山、真武山、琵琶山各距这条走廊多远，重机枪火力和八二迫击炮够不够得着？”

贺光华答道：“真武山、琵琶山紧挨着，重机枪火力可以控制这条走廊，虎头山离得远一些，目测大概在2000米以上，八二迫击炮勉强可以打到，而且敌人炮火并不强，不可能构成密集火力进行拦阻。敌人西面城墙上有一门野炮，打过来的炮弹稀稀落落还常常是瞎火。”

王近山听后，自言自语他说：“再攻山就中敌人的计了！我们要逐个夺取这些大山，不但付出代价太大，而且会拖延时间，贻误战机。”说罢，端起茶杯呷了一口水，又接着说：“根据敌情和地形，我们完全可以派一支部队迂回至东关，与将要突至西关的部队相配合，东西夹击城中守敌。”说着他两手一兜，做了一个“掐”的手势，“自古打襄阳，都是先夺山后攻城，现在我们要打破这个常规，只夺取几个小山就开始攻城。我们用刘伯承司令员教给的战法，来它个猛虎掏心——直接攻城。撇开虎头山、十字架山、羊祜山等敌人的主要阵地，不管它。估计山上的敌人在我攻城时，不敢脱离工事下来打我们，而敌人在山上的火力又打不到我们，那就让他看着我们攻城，叫康泽把那些大山当成包袱背着吧！我们这是趋利避害，出敌不意，攻敌不备，康泽就是我囊中之物了。”他非常自信地接着说：“我看一定能成功！”

贺光华听了王近山的分析，心服口服，对王司令员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因为，贺光华同志是从总部刚下来的，以前只是听说王近山能指挥打仗，这次是耳闻目睹。

根据王近山的指示，贺光华把新的作战方案报给刘、邓首长。很快，刘、邓首长复电：“完全同意作战方案，睢杞已告大捷，白崇禧主力被钳制在周家口一线；对南阳王凌云，已派第2纵队前往监视和阻击。10天内敌援兵保证到不了襄阳，后顾之忧可完全解除，望按照计划加紧攻击。”刘伯承司令员高兴他说：“这个王近山，真是好样的！看来，襄阳已在我掌中了。”

7月8日，王近山亲率旅以上干部到万山看地形。随后，在现地召开了作战会议。会上，传达了刘、邓首长的指示，并由贺光华处长介绍了有关情况，尔后进行攻打襄阳的大讨论。最后，王近山断然决定改变历史上攻襄阳必先夺山的战法，采取“猛虎掏心”、“刀劈三关”的战术，避开城南诸山外围阵地，首先攻占琵琶山、真武山，进而攻占铁佛寺、同济医院等城关要点，打开城西走廊，再集中主力从西门实施主要突击，坚决歼灭襄阳之敌。

面对在场的干部，王近山用眼睛扫描了一遍之后，眼神聚焦在第17旅旅长李德生身上。他说：“既然大家都同意，那么谁担任主攻西门的任务？这刀劈三关的任务可是很重的。”

李德生完全看懂了王近山的眼神，站起来抢先发言：“我们第17旅担任主攻！”

“你觉得有把握吗？”王近山又用起了激将法。

“不成问题，一定坚决完成任务！”李德生的话音刚落，其他各旅也纷纷争取担任主攻。

这时，王近山表态了：“都别争了。李德生同志先说了，就让他们旅担任主攻。”

接着，王近山命令：第 17 旅以一部攻占琵琶山、真武山、铁佛寺，集中主要力量于西门实施主要突击，陕南第 12 旅和桐柏第 3 分区部队继续佯攻城南高地，迷惑和牵制敌人；第 18 旅一部兵力插入东关，钳制敌人；第 16 旅为预备队。为了便于作战指挥，王近山还明确指出：突破阶段，由第 17 旅旅长李德生统一指挥；纵深战斗阶段，由第 16 旅旅长尤太忠统一指挥。

王近山指挥攻坚作战，一贯极为重视突破和巩固突破口。这次攻打襄阳，尽管善于攻坚的第 17 旅担任主攻，他比较放心。但是，王近山的主要注意力仍在突破上。于是，王近山特地向李德生交待：“开辟城西走廊通道，是实现整个攻城计划、击破襄阳防御锁链的首要环节，一定要充分准备好，有半点马虎都是不行的！这是关键性的硬仗，你要精心组织，打好这一仗。”

接受任务后，李德生认真贯彻王近山的意图，到各团进行动员、检查，还于夜间带领几名团的领导摸到琵琶山下高粱地里观察地形。

琵琶山，从襄阳西南高地前伸下来，高约 200 米，山上火力可封锁走廊宽阔路段。两个高大的石头碉堡，像一对牛角，耸立在山头上。岩壁前面，是铁丝网、鹿砦，山沟的死角和上山的通道，还埋有许多地雷。该山守敌为第 104 旅第 15 团 1 个加强连，是敌城西的一个重要防御支撑点。琵琶山虽不大，但其地形陡险，加上大山和东面真武山的火力均可支援，开辟城西走廊有难度。

看罢地形，第 17 旅又研究了打法。

7 月 9 日黄昏，第 17 旅第 49 团第 3 营在炮火掩护下，攻击琵琶山。经 15 分钟激战，即全歼守敌，拿下了琵琶山。不幸的是，亲率突击营的团长苟在合，在敌人的阵地上踏响了地雷，光荣牺牲。

攻下琵琶山，拔掉了通往西门的第一颗钉子。康泽甚为惊慌，调集了部分敌人，与我争夺琵琶山。

10 日，敌以飞机、重炮掩护步兵向我 6 次疯狂反扑，第 49 团第 3 营指战员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的战斗作风，在敌 3 面围攻下，凭借山上工事，与敌激战数小时，终于将敌击退，牢牢地守住了阵地。

10 日晚，第 17 旅以第 49 团第 2 营攻击真武山。该山守敌为第 104 旅第 15 团第 3 连及 1 个重机枪排，筑有近 30 个永久、半永久性的地堡，工事完备。第 2 营受领任务后，组织班长和排长以上干部看了地形，在现地明确了任务，并按照敌设防情况摆了沙盘进行反复研究，还选择了相似地形反复演习，从班到营都制定了作战预案，从干部到战士对任务和战法都做到心中有数，从而大大增强了全体指战员的必胜信心。19 时 20 分，该营在炮火掩护下对真武山守敌发起了攻击，采取小兵群机动灵活的战术，在 20 分钟内接连摧毁了敌人 18 个地堡。20 时许，全部占领了阵地，全歼守敌，并打退了敌人的反扑。王近山用望远镜看到了部队攻山情况，在电话里对随 2 营突击的第 49 团副团长王西军说：“我看到部队攻上山了！你们打得好！”当晚，第 17 旅又以第 50 团第 1 营乘机攻克城西之张堂村，歼敌 1 个排。战斗中，副团长杨毅同志英勇牺牲。第 49 团连劈二关，皆胜，为打通城西走廊立了首功。此后，李德生同志和第 49 团干部集中全力刀劈第三关——攻占铁佛寺。该寺位于路左，离西关大桥仅 50 米左右，和敌人西门城楼成犄角之势，紧紧控制着入城的唯一通道。因此，扫除铁佛寺这个大障碍，至关重要。于是，第 17 旅又进行了紧张的准备。

在此期间，陕南第 12 旅和桐柏第 3 分区部队经过英勇奋战，分别攻占了

凤凰山和铁帽山，歼敌一部。汉水北岸兄弟部队亦歼敌一部。这些，都有力地配合了打开攻城走廊的战斗和攻城的准备。这一连串的胜科，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康泽急令第164旅放弃樊城，撤入襄阳加强守备，企图全力固守襄阳。

根据新的情况，王近山令汉水北岸的桐柏军区第28旅南下东津湾，令第18旅于10日夜在桐柏第3分区部队攻打文壁峰的掩护下，以秘密隐蔽的行动，绕过文壁峰，沿汉水西岸河堤北进，占领了东关护城堤，接应桐柏第28旅自东津湾西渡汉水，建立了东关攻城出发阵地。这一突然、大胆的声东击西的行动，大大震惊了敌人，康泽慌了，搞不清我军从何方攻城，深感“处境危殆”，日以数电向白崇禧呼救，却不敢出城反扑。11日夜，王近山又令陕南第12旅接替第18旅东关阵地，第18旅移至城西南尹家集地区为总预备队。同时，第17旅经过两天土工作业，完成了两条交通沟，直抵西关。13日夜第50团第1、2营和第47团第5连攻占了西关铁佛寺、红土包子和同济医院，歼敌第409团第4营，俘敌百余人，建立了总攻的主要阵地，为攻城的胜利创造了条件。第47团乘胜进克秋树下，开辟了西北角攻城的出发阵地。第50团攻占西关后的主要任务是保护西门外横跨3道外壕的大石桥，作为总攻时接近西门的跳板。

我从东西两关抵近城垣后，襄阳已直接暴露在我军攻击锋芒之下，耸峙于城南的大山，已完全丧失其屏障襄阳的作用，守山之敌的补给也陷于困境，康泽已黔驴技穷，遂急电蒋介石求援。蒋看出了康泽的心境，给康发了一份鼓气电：“康司令官：11日电悉，南北两方援军最迟必于20日前赶到襄阳，中正负责督促，勿念。……吾弟经过此番风浪，渡过此一难关，以后不惟胆识可以因之大为长进，而且立名成业亦起于此也……共军必无远程炮与重武器，弃山守城，固守待援。”14日17时，城南高地守敌在其空军掩护下，全部缩回城内。这样，第6纵队又不战而取得了羊祜山和虎头山。至此，襄樊外围作战遂告结束。

襄樊地区守敌龟缩襄阳城后，即分段据守，以西门和南门为重点。敌以第104旅和第163旅1个团防守城西门及西北部；以战斗损失较少的第164旅防守南门及城西南部；以勤务营和地方团队防守东门和城东部，康泽司令部设在杨家祠堂。

王近山即将情况电报刘、邓首长，并提出主攻西门方案。刘、邓首长同意这一方案，并指示：“攻城的指导思想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的钳形突击。重点在西门。于7月15日20时30分对襄阳发起总攻！破城歼敌，一定要获全胜！”

王近山接此命令，部署如下：第6纵队部队于西门实施主要突击；陕南第12旅和桐柏第28旅分别从东北角和东南角攻城。各部队汇合地点指向杨家祠堂康泽司令部。王近山决心由西关经大石桥向西门实施主要突击，以第17旅为攻城第1梯队；以第16旅第47团配属山炮、步兵炮各1门、工兵1个排于城西北角自选突击点，配合第17旅作战；第46团为第2梯队，准备随第17旅进入战斗；以第18旅为第3梯队，准备入城巷战。在火力组织上，集中全纵队的3门山炮、2门战防炮、17门迫击炮和27挺重机枪，分编成4个火力队，集中使用于西门一个方向，掩护突击营登城。

王近山的这种部署，充分体现了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的思想。第6纵队3个旅全部集中在西门外，以1个营为主突，1个营为助攻，其余16个营成阶

梯配置，突击营打开突破口后，即迅速投入，连续跟进，使敌人无还手余地，无喘息之机。这种部署，这样战法，这种勇、猛、狠、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是王近山指挥特色的典型表现。

15日20时30分，王近山发出总攻襄阳的命令。我军开始炮火准备。炮兵在近距离上行直瞄射击，将西门附近300米地段内敌之碉堡和地堡大部摧毁，并掩护工兵连续4次爆破，终将城墙炸开1个缺口。担任突击营的第49团第1营乘势勇猛发起冲击，通过横跨3道外壕的大石桥，冲至城下，立即以投弹组掩护突击组架梯登城。当第1架木梯被打断，突击队面临敌人火力杀伤的紧急关头，第49团第1营英雄排长李发科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毅然以肩搭人梯，将2名战士送上城墙，其余人员也随即扶梯登城，用手榴弹和刺刀打退了数十倍敌人的连续反扑，巩固和扩大了突破口。第50团先头部队紧跟第49团第1营进入战斗，粉碎了敌人再次反扑、夺回西门的企图。接着，我第2梯队各团投入战斗。随后，陕南12旅、桐柏第28旅和第47团第3营亦相继登城。各路大军像无数支离弦之箭，纷纷插向襄阳的大街小巷，向纵深进展。

王近山在战前动员时，给各旅下达过3项具体任务：一是活捉康泽；二是缴获敌人的化学炮；三是抓1万名俘虏。此时，王近山抱着电话机讲个不停：“一定要活捉康泽！要活的！要活的！千万不要让他跑了！一定要完整地把化学炮弄到手！要开展攻心战，进行战场喊话，多捉俘虏！”

入城后，第49团向十字街，第46团向十字街以东，尔后两个团再分别向东、南、北方向发展进攻；第54团向南门里及其以东，第52团从米花街向南门里，第50团向北街及其以东，第47团向西北角发展进攻。各部队分路并进，不为少数敌人所牵制，不为战利品而停留，抓住俘虏及时了解情况，实施勇猛穿插，很快将敌割裂包围，迅速打乱了敌人的指挥系统，使敌互不相顾，处于瘫痪和混乱状态。我穿插部队同时开展火线喊话，瓦解敌军士气，大批敌人向我缴械投降。第52团俘敌3000余人，其余每团各俘敌千余人，第46团机动灵活插入敌炮阵地，还缴获敌化学迫击炮4门。战至16日6时，守敌大部被歼，唯有康泽司令部特务营、宪兵队数百人依托工事和坚固建筑物负隅顽抗，敌副司令郭勋祺亲自督战，叫嚷“凡是拿起枪来保卫司令部的，一律重赏”，并当场开箱分发“关金券”，妄图收买士兵，作垂死挣扎。

康泽司令部是一座四进深建筑，围有高墙，院内四个角上，各筑有十分坚固的两层碉楼。司令部中心筑有一座更为坚固的三层主碉楼。从康泽、郭勋祺的住室到中心碉楼有地道相通。敌仗恃其坚固的防御设施，顽固抵抗。

当突入襄阳的消息报告刘、邓首长后，野司传来具体指示：“康泽只能捉来，不能抬来，要活的！”

王近山召集几位旅长，以极短的时间现地明确了捣毁康泽司令部的打法，并决定以第18旅第54团执行，一定要抓到康泽！负责统一指挥纵深战斗的第16旅旅长尤太忠给第54团下达了作战命令。

康泽的命运危在旦夕。

就在我军攻进康泽司令部前十几分钟，康泽收到蒋介石的电慰：“吾弟未经过大战，这次在襄阳同优势敌人作战，可磨炼胆识。”又告，“援兵快到了。”康泽看完电报，只是苦笑了一下，将电报烧

16时，攻打康泽司令部的战斗开始。我第54团在陕南第12旅和桐柏军区第28旅的配合下，采取迫击炮平射、工兵爆破与步兵攻击相结合的战法，

一举攻入康泽司令部。

在“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的喊声和枪声、手榴弹爆炸声中，康泽钻进坑道藏了起来。

战斗仍在继续。敌第15绥靖区中将副司令郭勋祺被活捉，但就是不见康泽的人影。从多方面提供的情况证实，康泽在坑道里，并未逃掉。

大家都不认识康泽，若是他混在俘虏群里跑了怎么办？还是攻击部队第54团的指战员有办法。他们把被俘的康泽卫士傅起戎找来，作了教育交待，让他带路寻找康泽。最后在底层坑道的死尸堆里，活捉了康泽。至此，襄樊战役胜利结束。

中央军委对活捉康泽非常重视，电示：“将康泽送华北，并派可靠武装，加镣铐运送。”

此役，共歼敌2.1万余人，生俘敌第15绥靖区司令康泽和副司令郭勋祺以下1.1万余人，缴获各种枪5000余支、炮103门、子弹76万余发。由于襄阳是敌人鄂北战勤供应基地，我军还缴获许多军用物资。

王近山在接见郭勋祺的时候，郭很感叹他说：“当年红军过四川，我这个师长没能挡住你这个师长，可是那回我逃脱了。这回，我这个副司令却没逃脱你这个司令的手啊！”

王近山笑着说：“没有想到这回又相见了。不打不相识啊！”

襄樊战役的胜利，解放了老河口、谷城、南漳、宜城、襄阳、樊城等城镇，控制了汉水中段，体现了王近山在刘伯承、邓小平的正确领导指挥下，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卓越指挥艺术。刘伯承指出：“这次作战与豫东战役是一盘棋，由于我军在豫东平汉线作战，将敌主力吸走，使襄樊孤立，蒋介石、白崇禧无力西顾，而造成了襄樊作战有利形势，极似打篮球，双方互相牵制，然后由一人乘机钻隙投篮而得胜。襄阳攻城，王近山指挥的第6纵队起了主导作用。”同时，还对王近山在此次作战中积极求战、敢挑重担、机智英勇，特别是敢于打破常规，撇山攻城，声东击西，从西门突破等创造性的指挥艺术，给予了高度评价。

襄樊战役的巨大胜利，报告党中央、毛主席后，党中央、毛主席在贺电中指出：“庆祝你们在襄樊战役中歼敌两万余人，解放襄阳、樊城、老河口等七座城市，并活捉蒋介石法西斯特务头子康泽的伟大胜利。这一汉水中游的胜利，紧接着开封、睢杞两大胜利之后，对于中原战局的开展帮助甚大。尤其是活捉康泽，更给全国青年受三青团特务迫害者以极大的兴奋。尚望继续努力，为彻底解放中原而战。”

朱德总司令曾将襄阳的攻坚作战誉为“小型模范战役”。

襄樊战役结束后，刀劈三关的第17旅第49团被授予“襄阳特功团”；首先突破西门的第49团第1营被授予“襄阳登城第1营”的光荣称号；活捉康泽、缴获化学炮的第16旅第46团、俘敌较多的第18旅第52团荣立特等功；第17旅，第46、47、50、54团和第6纵队炮兵营均记一等功。

王近山和他指挥的部队，为华东和中原两大野战军并肩协同、驰骋中原，创造了辉煌！

高明指挥活用战法鏖战淮海

毛泽东指出：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王近

山同志在作战指挥上能很好地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结合战场实际，正确地理解和坚决贯彻上级意图，科学地分析和判断情况，根据战场形势的发展变化，敌变我变，先变于敌，牢牢把握战场主动权，实施坚定正确的指挥。这是王近山指挥作战、夺得胜利的又一关键所在。在参加淮海战役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中，王近山指挥部队豫西“牵牛”，超越拦击，关门扎口，层层剥皮，稳扎稳打，围歼追击，演奏了一部有声有色的胜利进行曲。

1948年9月25日，党中央、毛泽东根据全国的形势，精心运筹，当机立断，决定扩大原定战争规模，以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并肩协同作战，发起伟大的淮海战役，以收复华中广大地区，解放全中原，直逼长江，威胁南京。毛泽东亲自制定了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战役的第一阶段，华野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为配合华野作战，中原野战军在主力部署攻击陇海路郑州段之敌的同时，以一部兵力拖住武汉白崇禧集团的黄维、张淦两兵团，诱其西进，使敌人不能东援。

为了隐蔽作战意图，掩护中原野战军主力东移参加淮海战役，为了拖住敌人黄、张两兵团向西，刘、邓首长决定：第6纵队在兄弟部队配合下，紧紧拖住敌黄维兵团西进，决不能让其东援；并指出：敌人打我们时，不能向东带，只能向西牵，牵得越远越好。

黄维兵团，是蒋介石的心腹陈诚赖以起家的嫡系部队，蒋军中一流的精锐，有12万人马，全部美式装备，战斗力较强。特别是所辖第18军是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不仅装备精良，而且法西斯教育很深，反动统治极严，实行连坐法，在作战中有一定的顽强性。我一个纵队要拖住敌人这样强大的一个兵团，而且还要牵着走，任务是相当艰巨的。

时任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司令员的王近山，受领任务后，深感责任重大，对部队进行了反复动员。他说：“刘、邓首长把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交给我们，是对我们的信任。我们要发扬不怕任何艰难困苦，不怕付出代价的精神，一定要完成好这个任务。有人吃肉，就有人啃骨头，我们要有自觉啃骨头的精神，为全局作贡献。”在上下发动，群情振奋的基础上，根据刘、邓首长的意图，他决心以积极的行动诱敌西进，采取敌急我急、敌缓我缓、敌驻我扰、敌进我牵的作战方针，使敌我处于若接若离的胶着状态，让敌人打又打不着、丢又丢不下。于是，王近山指挥所属部队拉开架势，伪装成中原野战军主力，同敌人摆开了迷魂阵。

王近山命令各旅参谋长带领侦察连和电台，分别从多方向接敌，及时掌握敌情和迷惑敌人。同时，派得力干部，在唐河和白河沿岸搜集船只，准备架设浮桥器材，以便向西机动。

10月13日黄维兵团进至泌阳东北之春水、牛蹄一线，张淦兵团已集结确山，拟沿确（山）泌（阳）公路向西逼进，南阳之敌（王凌云）不断以兵力出唐河袭扰，企图在唐泌地区寻歼我军。为诱敌西进，王近山令部队转移至上屯地区，一面作战斗部署，构筑工事，虚张声势，列阵以待；一面派出侦察人员，掌握敌人的动向，探索我西移道路。19日，西进之敌逼进唐河，我避免与敌接战，当晚转移到唐河西岸。20日，敌跟踪而来，王近山又指挥部队于深夜徒涉白河，转移至店铺。此时，敌发觉我孤军作战，遂调整部署，以张淦兵团位于唐河地区策应，以第15军渡白河向西，王凌云率第9师从邓县向东南，第20军由吕堰驿向北，三面向第6纵队合围。为避开敌人合围，王近山即令部队于10月22日连夜急行军转移至鲁家砦，伺机行动。23日，

他除令部队紧缩宿营地区、加构工事、加强侦察警戒、防敌袭击外，派第 16 旅参谋长赖光勋和第 18 旅参谋长安仲昆率侦察分队分别掌握南北两面敌情，以第 51 团到孟岗砦阻击邓县南下之敌，防敌断我西移道路。

这期间，王近山与干部、战士同甘共苦，一边了解掌握敌情，一边做大家的思想工作，还不断指挥后卫部队袭击、牵住敌人，唯恐敌人“掉队”。个别干部发牢骚：“这是干什么？不分白天黑夜，不分晴天雨天，一个劲地走，让敌人跟在后面追，真难受。”还有的索性跑到王近山面前说：“司令员，我们跟您打过许多胜仗，从没怕过敌人，这回怎么啦？”王近山笑着说：“你怕走路！这叫牵牛计！跟着我放心地走，把敌人拖住、拖瘦，到时候会有好戏。”

10月24日，王近山准确获悉：敌第134旅旅部率3个团进至光化县下薛集地区。王近山决心乘敌孤军突出、仓促驻止、不明我第6纵队主力之际，突然袭击该敌，借此使敌误认为我野战军主力仍在豫西，以利我继续拖住黄维兵团。

经野司批准后，王近山于24日晚令部队对下薛集之敌发起攻击。这次袭击，本应成功。我军行动之前一小时，敌人才发现被包围，紧急呼救求援。但是，由于气候对我极为不利，天下着雨，我炮兵在雨中射击，不能准确看清目标，影响步炮协同，致使攻击未成。经过三次进攻，都未成功。王近山司令员见已达到骗敌、诱敌的目的，当机立断，命令部队迅速撤出战斗，及时向内乡转移。敌见我围攻下薛集，又产生错觉，误以为我野战军主力尚在豫西，急以黄维、张涂、王凌云等部，分向下薛集、新野、枸林等方向急进，以重兵对第6纵队进行围攻。

当第6纵队向内乡转移之时，白崇禧急令王凌云第2、14、15军沿镇（平）内（乡）、邓（县）内（乡）公路，对我夹击，并以黄维兵团进至泌阳地区策应。此时，敌我相距更近，回旋机动地区大受限制，稍有不慎，即有被敌夹击的危险。26日，北面之敌与我掩护部队接触，王近山即令第53团摆开架势，伪装主力，向文渠集地区转移，诱敌跟进，主力即绕厚坡继续向内乡方向转移。至此，王近山率部已牵敌半月余，部队缺粮缺鞋，昼夜行军，又逢雨天，道路泥泞，人员十分疲惫。但广大指战员经过方城整军和“牵牛”的深入动员，深刻认识到此次牵敌的重大意义，一再抑制了急欲与敌交战的情绪，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忍受着艰难困苦，继续牵敌西进。

我向内乡，敌亦追至内乡。战士们讽刺地称黄维的第12兵团是“听话的兵团”、“听调遣的敌人”。

王近山指挥的第6纵队胜利地完成了关系战略全局的牵敌任务，为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歼灭黄百韬兵团，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野司表扬第6纵队：“由于下薛集战斗，更吸引了黄张两兵团向西，对主战场方向起作用甚大。”

1948年10月30日，徐州之敌告急，蒋介石速令黄维兵团火速东援，向徐州西南地区开进。

11月1日，王近山接到刘、邓电令：“第6纵队并指挥第12旅尾击确山向阜阳、太和出犯之黄维兵团，配合我主力在徐州外围之歼敌作战。”接电后，应立即经南阳赊旗镇，先向沙河店行进，以便早日抓住该敌侧背迟滞其东进。”并明确指出：“应日夜兼程，东进侧击敌第12兵团，并参加淮海决战。”

11月3日，野司再次致电王近山：“此次配合徐州方面之主作战，不仅

关系中原战局之转变，即对推动全国战略形势之开展，争取早日打倒国民党，亦属重要之关键。因此，需动员全体指战员，应服从整体利益，不顾任何疲劳，不怕任何困难、消耗与牺牲，采取一切有效办法来截击、阻击东进之黄维兵团，迟滞其运动时间，以协助主作战达到胜利。……要计算日程，在 6 日夜赶到沙河店，并争取先敌于 8 日赶到上蔡、汝南间，对敌后侧适时阻击、腰击。利用诸河流方向阻敌也需如此。”

军情火急，军令如山！

据此，王近山指挥部队立即行动，率领部队昼夜兼程，顶风冒雨，以每天百余里的行军速度，东追黄维兵团。

途中，王近山遇到前来视察的刘伯承司令员。刘伯承关怀地询问了部队的情况，并且指示：“你们要赶过黄维。”

“没问题，现在是白天短，黑夜长的季节。”王近山回答说。

“黄维有轱辘，走的又是弓弦，我们走的是弓背。”刘伯承提醒说。

“弓背比弓弦长不了多少，我量过，他也不是 12 万人全都在轱辘上。”王近山说。

“我们王近山心里有数了。”刘伯承满意他说。

刘伯承明确指示王近山：“你的任务是把部队带到阵地上去。”

王近山当即表态说：“没问题。”他向刘伯承敬礼后即纵身跳上战马，飞驰而去。

11 月 18 日，王近山率部抄捷径到达涡阳地区，终于赶到了黄维兵团前面，两条腿跑过了敌人的汽车轮。随即，王近山于涡河两岸布防，堵住了黄维兵团北上的去路。

19 日，王近山在纵队部驻地枸杞园召开营以上干部战斗动员会，传达野司明确的任务：“刘、邓首长在淝河与浍河之间布下了一个巨大的“口袋阵”，围歼黄维兵团。第 6 纵队的任务是等到黄维兵团钻进这个大口袋后，扎紧南面的袋口，不让敌人突围逃跑，协同友邻，关门打狗，将敌全歼。”

为了统一指挥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并肩作战，会战淮海，统筹淮海前线的一切事宜，党中央、毛泽东于 11 月 16 日决定：由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邓小平、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谭震林 5 人组成党的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

11 月 22 日，华东野战军歼灭黄百韬兵团。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结束。

11 月 23 日，王近山司令员和杜义德政委召集旅以上干部开会，传达了总前委歼灭黄维兵团的决心与部署，要求各旅指挥员在战斗中要好好注意战术，突出重点主义，加强兵力与火力协同，坚决完成好扎口袋口的任务，决不让黄维兵团逃掉。

24 日上午，黄维兵团之第 18 军进入我预设阵地后，王近山指挥第 6 纵队和陕南第 12 旅，自擅城集（蒙城北）南北地区向板桥集、赵集之间出击，与左翼第 11 纵队合拢。敌发现情况不妙，下午便匆忙地向浍河南岸退缩。乘敌退缩混乱之际，王近山指挥全纵队出击，与各路兄弟纵队猛力合围，把黄维的 12 万人马压缩在以位于浍河、涡河之间的双堆集为中心纵横约 15 华里的地区内，对黄维兵团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包围圈。

敌第 12 兵团被包围后，黄维感到情况十分严重，一面命令部队就地构筑工事，一面电请蒋介石增援。蒋介石不惜血本，令其次子蒋纬国的装甲兵团



和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从蚌埠向北增援，同时令黄维集中兵力突围，向南接应援军，相互靠拢，聚合力量。

黄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和陆军大学特一期，到德国留过学，在国民党军队中也非等闲之辈。被包围于双堆集时，他认为，双方都在进行运动野战，并无永久性的坚固工事，要突围，只有趁我军包围圈尚未形成工事体系时最为有利。因此，他决定采取相当厉害的一招：集中4个师，以坦克、火炮开路，在飞机配合下向南突围。

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下面我们来看王近山是怎样指挥部队战胜黄维向南突围的。

25日夜，敌趁我刚达成合围，部署尚未就绪之际，以一个营到两个团的兵力，凶猛地向我第17旅第50团和第12旅第35团阵地连续攻击，企图突围。我坚守部队顽强抗击，马小庄阵地一度部分丢失。王近山指示李德生旅长，要不惜一切代价将马小庄坚决夺回。李德生速派第49团增援，经过反复冲杀，歼敌大部，夺回了马小庄阵地。对在我合围时南逃的敌第49师，王近山命令肖永银旅长率第18旅跟踪尾击，26日夜在大营集地区全歼逃敌。

这时，邓小平政委通过报话机询问前线情况，王近山报告说：“我现在在双堆集正南。我们和第11纵队会师了，口袋口已经扎住了。”他指着地图继续报告说：“纵队在杨庄，已经控制了大小王庄、小马庄、小周庄、李庄一线，向南逃跑的第49师被全歼，黄维的王牌第18军只剩下两个师了。”

邓小平听了汇报后指示：“王近山，你那里是首当其冲，乘我立足未稳，黄维会拼命向你那里冲击的。”

王近山坚定地回答说：“政委放心，绝不会放走黄维。”

27日，黄维果真甩出了“杀手锏”：集中4个主力师在飞机、坦克、火炮掩护下，疯狂地向东南突围。在这关键时刻，王近山沉着冷静，坚定果敢地指挥部队与敌作战，并审慎地接纳了廖运周率第110师起义。

黄维的杀手锏是甩出了。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第110师师长廖运周会在这个时候率部起义。

廖运周，1927年就加入过共产党，一直是“白皮红心”。解放战争开始后，又和我中原局取得联系，在第110师建立了地下党委，廖运周就是中共地下党第110师的党委书记。他曾两次提出率师起义，回到人民军队的行列，均未得到邓小平的同意，并要他等待时机，在政治上能起到最大作用的时候再起义。

这个时刻终于来到了。

黄维组织4个主力师突围前，把廖运周找去，征求他对这次行动的意见。廖运周一听这个计划，心中暗吃一惊。但他已有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不露声色地附和与称赞黄维的决策，得到了黄维赞赏，并同意第110师担任突围前锋。

廖运周从黄维处回到师部，召开了紧急党委会。地下党委迅速决定：明日举行战场起义，破坏黄维的突围计划，回到人民的怀抱！并派其副官、中共地下党员杨振海同志与解放军取得了联系。

26日下午，在我陕南第12旅阵地前沿，一位身着国民党军服的军官，被我抓获，他提出要见我最高司令官，报告重要情况。

几经周折，这位军官被送到了第6纵队指挥部。原来，他就是廖运周的副官、我党的地下工作者杨振海同志。

在第6纵队指挥所，王近山接见了杨振海。杨振海从随身带的皮包内抽出一份地图，详细地向王近山司令员汇报了黄维将采取的行动。

事情来得很突然，王近山派人安置杨振海先休息一下后，就回到作战室，反复思考起来：第110师起义，是真是假？是否有诈？如是真起义倒好办，若是假起义，让黄维兵团跑了，那就会对中国历史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过，将成为历史的罪人。但这个机会也不能丢失。

随后，王近山找来了纵队其他领导一起分析研究。大家认为第110师举行战场起义是有诚意的，但为了防止万一，要有对付假起义的准备。根据大家的意见，王近山决定，接受第110师起义。指令第16、17旅各抽一个团兵力，在起义部队通过通道的两侧构筑射击工事，防止起义部队发生哗变。如无哗变情况，这2个团即作为伏兵，掩护第110师通过后，负责歼灭跟随第110师后的突围之敌；陕南第12旅2个团、第16旅1个团和第17旅2个团为二梯队，第18旅3个团和第16旅1个团为总预备队，坚决顶住黄维兵团突围。

随后，王近山亲自打电话请示了邓小平政委，证实了杨振海确是中共地下党员身份，第110师有我党组织，并同意王近山的决心。同时，邓小平还嘱咐王近山：要加强戒备，防止起义中发生意外，并要组织好部队，坚决地阻击黄维后续部队的突围。

王近山放下电话机后，叫人请来了杨振海，作了具体交待，要杨振海立即回第110师，转告廖运周师长：起义的时间提前1小时，即在27日6时前，起义部队必须通过指定地段；由第6纵队作战参谋武英在指定地点联络接应；起义部队过来后，到指定地域集结。

27日晨，大雾弥漫，第110师（欠328团，该团被黄维调去警卫兵团部）在师长廖运周的率领下，在我作战参谋武英的引导下，按指定路线带入我规定的集结地。起义部队刚一过完，王近山即指挥部队封锁缺口，准备对跟进之敌实施打击。

黄维认为第110师突围成功，即以飞机掩护后续部队3个师跟随第110师拥进。黄维要求南京派了4架飞机掩护突围，廖运周令部队摆出对空联络信号，拉开布板后，飞机不再轰击了。王近山及时果敢地指挥火力突击和拦击突围之敌，连刚刚起义过来的第110师炮兵营也掉转炮口加入了火力突击。敌人顿时大乱，损失惨重。敌第85军军长吴绍周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用报话机问廖运周，廖运周假称：“突围部队遭共军包围”，即关闭了电台，与黄维、吴绍周断了联系。第110师举行战场起义，这是黄维怎么也想不到的。

敌遭我火力突击之后，展开全部炮兵，以坦克为先导，引导步兵向我陕南第12旅第35团阵地猛攻。我第35团杨庄阵地失守，李庄阵地亦遭敌8辆坦克和优势兵力的攻击，情况十分危急。王近山急调第18旅和第16旅驰援。此时，第12旅第34团和第17旅第50团各一部及第16旅第46团，迅速主动投入战斗，奋勇反击，战至黄昏，收复了阵地。

28日，黄维已清醒过来，估计廖运周有变。但并没有停止行动，反而更加疯狂拼命突围，以其主力王牌第18军的第11师为主，在坦克、飞机配合下，向我第49团第3营马小庄阵地猛攻（这里是黄维选中的突破口）。敌以猛烈火力将我工事大部摧毁后，以9倍于我的兵力进行连续攻击。在团长张镰斧、政委苗兴华的带领下，部队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顽强抗击，连

续打退敌人多次突围攻击。在王近山司令员的正确指挥下，部队以坚韧不拔、不屈下挠的钢铁意志顽强抗敌，打退了敌人的数次进攻，牢牢地守住了南线阵地，将南面大门关得死死的，将“袋口”扎得紧紧的。经过4天空前激烈的浴血奋战，仅第6纵队就歼敌3000余人。

黄维攻不动南线后，气急败坏，又转向东、北、西三面，如丧家之犬，到处乱撞。可到处都是铜墙铁壁，黄维兵团撞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不得不调整部署，一面负隅顽抗，一面向蒋介石呼救。

蒋介石见黄维处境危难，就在11月30日令杜聿明放弃徐州，率部西撤南下，拊我中原野战军侧背，与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南北对进，协力救出黄维，汇集南逃，退守长江。

党中央和毛泽东针对敌情变化，采取了加速歼灭黄维兵团、围住杜聿明集团、阻住李延年兵团的方针。刘伯承司令员风趣形象地称之为：“吃一个，夹一个，看一个。”此时，刘、陈、邓首长对围歼黄维兵团作了具体部署，决定以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华东野战军第7纵队和陕南军区第12旅，编成南集团，由第6纵队司令员王近山、政委杜义德统一指挥，采取“继续压缩并完成严密封锁包围防地之方针，战术上采取攻占一村巩固一村”的稳进原则”，加快对黄维兵团围歼。

王近山根据刘、陈、邓首长的意图，结合战场地形开阔、敌守备甚严、难以接近和部分指战员产生轻敌速胜思想的实际，及时指示部队防止和克服轻敌情绪，广泛开展军事民主，研究破敌、歼敌良策。最后，王近山决定采用“以地堡对地堡、以战壕对战壕”的方法，逐步向敌延伸工事，紧缩包围圈，以“层层剥皮、稳扎稳打”的战法，围歼黄维兵团。据此，各部队进行了工程浩大的野战筑城和近迫作业，构筑攻防两用阵地，多路多方向逼进敌人，无数条交堑壕像长龙似地伸向敌前方据点之间和侧后。这一着，引起了黄维的极大恐慌。他不断以飞机炸、大炮轰、坦克压、毒气袭、兵力扰等手段，阻我作业，破坏我阵地。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我前沿各部队在阵前采取多路并进、多点实施的作业方法，使敌不能兼顾；同时加强了警戒和火力掩护，用炸药包、手榴弹、自制汽油燃烧弹等，积极同敌作斗争。经过一个星期的突击，构筑交堑壕5万余米、地堡3000多个，为围歼黄维兵团创造了有利条件。

12月6日，对黄维兵团总攻开始。王近山指挥中野第6纵队和华野第7纵队、陕南军区第12旅协力攻歼双堆集以南被围之敌。首先围攻小周庄、李土楼之敌，尔后围歼大、小王庄及双堆集东南野战阵地之敌，最后协同友邻攻歼双堆集之敌及小马庄黄维兵团部。

17时许，在王近山的直接指挥下，第6纵队第18旅第52团和陕南第12旅第34团，在炮火支援下，突然发起攻击，以猛打猛冲的动作迅速将敌分割，仅用一小时就歼灭李土楼之敌第23师第69团主力，并攻占了小周庄。总攻第一天，就剥下了敌人的第一层皮。

9日，王近山指挥部队剥敌人第二层外壳时，他对尤太忠旅长说：“剥这层外壳是黄维的要害，是要黄维的命，这是一场恶仗、硬仗，这一仗一定要打好。攻占大、小王庄和李店子，黄维必定要拼命反扑，进行垂死挣扎，你们一定要以对战役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压倒一切敌人的英勇气概同敌人血战到底，协同兄弟部队彻底歼灭黄维的王牌第18军。”

9日晚，华野第7纵队一举攻占了距双堆集只有千余米的大王庄，直接

威胁到敌防御核心。

10日拂晓，黄维以其主力第118师，在飞机、坦克、炮火掩护下，疯狂进行反扑，拼命夺回了大王庄。在此紧要关头，王近山以拳击桌，果断定下决心说：“这是最后一击，看他强还是我们强！敌人这是最后的垂死挣扎。我们一定要夺下大王庄！”他及时以第46团增援第7纵队，粉碎敌人对大王庄的疯狂反扑。此战，双方争夺之激烈、伤亡之大，实属罕见。战至10日黄昏，杀得敌人尸横遍野，全歼敌第33团（所谓的“老虎团”）和从主力第11师抽来的反扑部队，为最后围歼黄维兵团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场恶仗，使小王庄之敌第23师大为震惊，当晚主动缴械投降。这第二层皮剥得干净、利索！

为迅速歼灭黄维兵团，根据总前委决定，华野第3、13纵队加入南集团，突击敌核心阵地双堆集。

14日，王近山指挥部队攻歼双堆集东侧敌之野战核心据点。这个核心据点，距黄维兵团部只有千余米，位置极为重要，黄维以其号称“威武团”的精锐部队第54团防守。该团在这里构筑了数尺厚的土墙和以大量地堡为骨干的环形防守阵地，火力密布，防御严密。王近山指挥“襄阳特功营”即第17旅第49团第1营，协同华野第3纵队第23团之“洛阳营”，在上百门炮火支援下，并肩突击，在兄弟部队配合下，攻占了敌核心据点，全歼了敌人的“威武团”，创造了兄弟部队并肩作战、密切配合、协同作战的范例。15日，黄维见势不妙，遂组织残兵败将和身边的警卫团，施放毒气，向西南突围，只可惜他碰到了“王疯子”！王近山指挥部队，对敌连续、勇猛地突击和追击。当夜幕降临的时候，蒋介石的王牌部队第12兵团，像陈旧破烂的危房经暴风骤雨的突然袭击一样，倒塌在王近山指挥下的中野和华野战士的脚下，司令官黄维、副司令吴绍周等高级将领被生擒。

黄维兵团被歼后，王近山顾不上休息，便不失时机地指挥部队发扬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密切配合兄弟部队协力围歼杜幸明军团。战至1949年1月10日，全歼杜幸明军团，伟大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消灭国民党军55.5万余人。蒋介石所谓的长江防线犹如一排割破了嘴唇的牙齿，暴露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面前。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一声令下，百万雄师一举突破敌人的长江防线，以排山倒海、疾风扫落叶之势，横扫江南残敌如卷席。此时，王近山以第3兵团副司令兼第12军军长和政委之职，指挥第12军从安庆以东的棕阳、石机头地段突破渡江，乘势穷追猛打，长途跋涉，千里追击。接着，王近山又率部挥师南下，进军大西南，连续行军作战50余日，挺进2000多公里，与兄弟部队一起，粉碎了美国支持的蒋介石企图在西南持久顽抗，保持一个反革命基地的美梦。

王近山，从枪林弹雨中走过20多个春秋，曾7次负伤，作过3次大手术，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英勇奋战，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旗帜上，有他不朽的功勋，有他血染的风采！

1991年3月，邓小平深情地挥毫为回忆王近山的专集题写了书名——《一代战将》，江泽民、杨尚昆、李先念、薄一波、宋任穷、刘华清等领导同志为王近山题了词。江泽民在该书的题词中称王近山是“杰出的战将，人民的功臣”。这是对他驰骋疆场20余载、为党为人民立下赫赫战功的极高评价和褒奖。

## 保卫黄河战斗中的文年生

### 节延华

文年生（1907～1968）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湖南省岳阳县人。出身雇农，自幼替人放牛、种田、做工，衣不蔽体，食不果腹。1926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在第36军教导团当过士兵、班长，并随军北伐。后来不满于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混战和军队的腐败，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于1930年6月毅然脱离旧军队，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红3军团排长、连长、副团长、团长。长征途中，历任红3军团司令部侦察科长、第3师第10团团长、第81师师长。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抗日军政大学队长，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第718团团长兼政治委员，中央留守兵团警备第8团团长，绥德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警备第1旅旅长兼关中军分区司令员，八路军南下第3支队司令员。期间，于黄河两岸多次率部与日军激战，在关中平原多次率部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为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纵队副司令员，冀晋军区代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第3纵队副司令员，华北军区第6纵队司令员，第20兵团第68军军长、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湖南军区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副参谋长、广州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他还是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 \* \* \* \*

《120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史》记载：1938年5月初，离石日军第109师团以约一个旅团的兵力，附炮30门，向黄河东岸军渡进犯，企图突破黄河西岸阵地，占领宋家川渡口，切断陕甘宁边区与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交通线。10日晚，日军先头部队一个联队进抵军渡以东的王老婆山及其附近地区，我河防部队准确地掌握了敌人的行动，没等敌人到达河边，警备第8团团长江文年生便亲自率团主力东渡黄河，乘敌人立足未稳，夜袭刚进到王老婆山的敌人一个大队。经过几小时激战，歼敌200余人，缴获步枪40余支、轻机枪2挺及其他军用品一部。敌人遭此打击，被迫掉头向东退去。

文年生率部胜利地进行了保卫黄河的战斗，这是他辉煌一生中的一个闪光片断。

#### 日寇进犯军渡

黄河，古老民族的象征，五千年文明的摇篮。

黄河，炎黄子孙的骄傲，中国当代历史的见证。

一声船夫的号子，喊出了万里高原博大的胸怀和宏伟的气魄；一曲《黄河大合唱》，曾唱得几代中国人热血沸腾，梦绕魂牵。

所以，作为一位稍有文化素养的现代中国人，或许有可能没见过黄河，但绝对没有可能也没有理由不知道黄河。

年年月月，世世代代，黄河之水养育了中原人民，但也给中原人民带来过数不清的灾难。人民记忆最深的莫过于那次造成方圆上千公里黄泛区的黄河大决口了。这一次不完全是黄河的过错，甚至说完全不是黄河的过错，因为这是一场人为的祸殃。1938年6月8日，国民党中原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的部队，为阻止日军的西进，受蒋介石之命，炸开了黄河南岸、郑州附近的花园口，几天内，滚滚黄河之水吞噬了1500平方公里的中原大地，受灾人口达480多万，其中死亡40余万人（也有资料称是89万）。非常可悲的是，

尽管中原人民付出了如此巨大的牺牲，最终也没有阻挡住日军的进攻。

然而同样是要借助黄河天险，阻止日军的进攻，在先于国民党部队扒开花园口之前一个月，即1938年5月10日，八路军警备第8团团长文年生带领仅4个连队的兵力，渡过黄河与日军彻夜激战，取得了歼敌200多名的战绩。全面抗战之初，一次战斗歼敌如此众多，在整个华北战场是不多见的，因而它所造成的极大影响，也不是这次战斗歼敌数字所可比拟的。

鲜明的对比，强烈的反差。仅以此便会让人们们对文年生将军的名字永志不忘。

文年生于八路军改编之初，便在第120师第359旅第718团任团长兼政委。当时八路军只有3个师，每师两个旅，每一个旅有两个战斗团。也就是说，文年生是八路军12个战斗团团长之一。其实，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他就先后出任过第3师第11团和军委教导第1团团长，长征途中两次出任第3军团第5师第10团团长，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前曾任第81师师长。

正当红军改编之际，日军已经侵占了北平、天津、张家口等地，30多万大军沿平汉、津浦、平绥铁路向南、向西大举进攻，华北战局危急。而华北的国民党部队，虽有70万之众，但在日军进攻面前，难以组织有效的抵抗，纷纷溃逃。与此相反的是，刚刚改编的八路军各主力部队，相继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鉴于当时陕甘宁边区东边面临日军的威胁与进攻，南、西、北三个方向，有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包围、封锁、侵扰，磨擦事件频频发生，中共中央决定，在八路军主力开赴前线的同时，从各师抽出少量部队留守陕甘宁边区，并成立八路军后方留守处。留守处的部队大部分为各师的直属营队，留守的主力团只有两个。一个是第129师的第770团，另一个便是第120师的第718团。

1937年9月13日，侵华日军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占领大同，随后以主力沿同蒲铁路南下，直取太原。10月23日，毛泽东向陕甘宁边区部队发出指示，指出边区即将成为直接抗战的区域，要求全边区的部队必须立即进行直接抗战的准备与动员，并急令718团和兄弟部队速接清涧、绥德、米脂、佳县及吴堡五县河防，11月8日，日军攻占太原，其矛头直逼黄河。

为了适应新的战争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军委于11月初决定八路军留守处改为留守兵团，将留守部队中的以营为建制的单位扩编为7个警备团，第718团更改番号为警备第8团。

11月17日，中央军委指示，将整个河防划为3段，各段设河防司令部，萧劲光兼任河防总指挥。文年生率警备第8团在五县河防司令部（即绥德警备司令部）的编成内，守卫螭螭峪至枣林坪沿河渡口，重点守卫宋家川。

宋家川是吴堡县县城所在地，位于黄河岸上，与山西离石县的军渡隔河相望。军渡——宋家川，整个河防的最大也最重要的渡口，是太原通陕北的必经之道。

1938年2月17日，日军第109师团攻陷山西汾阳，而后以主力沿汾阳至离石公路向西逼近。2月22日，八路军留守兵团将河防兵力部署作了适当调整，其中文年生率警备第8团主力并加强一个重机枪连，扼守宋家川一带的渡口，坚决阻止日军渡河。2月27日，日军第109师团进占宋家川对面的军渡和军渡上游40公里处的碛口，并以猛烈炮火轰击对岸警备第8团的河防阵地。3月2日，毛泽东根据中央政治局关于保卫边区、巩固河防的部署，致电前线朱德、彭德怀及林彪、聂荣臻、贺龙、萧克、关向应、刘伯承、徐

向前、邓小平等八路军各高级将领，指出现军渡、破口之日军两路猛攻河防，黄河有被突破之危险，绥德、延安紧急，并威胁着整个河东部队的归路，要求有关部队从敌后星夜起程至离石以北，攻击军渡、破口之敌，阻其渡河。3月3日，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陕甘宁边区政府发表《告民众书》，指出凶恶的日寇，已要进攻我们边区来了，号召边区军民誓死抵抗，无论男女老少，都要努力参加抗战工作。3月5日，《新中华报》发表《保卫边区，保卫西北》的社论，号召边区军民紧急动员起来，随时准备战斗。

在党中央的直接指挥下，边区军民紧密团结，共同努力，河防部队与敌后我军主力密切配合，粉碎了日军对陕北的第一次侵犯。3月底，进犯河防和围攻晋西北的日军，相继撤出了晋西北根据地。

可是，日军染指陕北的野心不死。1938年5月初（这里有必要再重复一次：整整一个月之后，国民党中原战区部队在1000多公里的黄河下游扒开了花园口），其第109师团气势汹汹，再次向军渡扑来，决心由此重点突破黄河防线，夺取宋家川渡口，以便打开通往陕北的大门。于是便有了开头所说的在敌人未占据军渡之前，趁其立足未稳之际，文年生带领4个连队主动渡河出击，一举歼灭敌先头部队200余人的战斗……

#### 黄河岸边的思考

1938年的春天，蹒跚，迟迟不愿露面。黄河岸边看不到如茵的绿草，村口树林里不闻悦耳的鸟鸣，在远处山坡上斑剥的麦田里，麦苗仍像被抽了筋似地瘫伏在地上，没精打采。这天一大早，西北风又呼啸起来，并卷起漫天黄沙，直往人的眼缝里、鼻孔里、脖颈里灌，让人躲不胜躲，防不胜防。

“这鬼天气！都到五月了！”缩紧脖子的警卫员陈刚，眯着眼望一望头顶的太阳，几分失望又几分恼怒他说。难怪他发牢骚，看那太阳，临正午了，还如同画在黄色天幕上的一块深色的烧饼，失去了作为太阳它本应有的耀眼的光芒。陈刚似乎还没解恨，回头看一眼身边正全神贯注地望着大河对岸的首长——文年生团长，又说道：“这鬼地方！要是在我们家乡，两个月前就——”

“就什么？”一旁的文团长似乎是不在意地问了陈刚一句，头也没回，依然在注视着对岸那浑沌、朦胧的一片。

陈刚朝首长高大魁梧的背影伸了伸舌头，到嘴边的话又即刻咽了回去。在首长身边工作半年多了，对首长的性格、脾气、爱好，他早就模得透熟。首长平时爱动脑子不爱动嘴巴，什么时候看他，总是一副严肃的面孔，再加上他那一米八几的个头，生人在他面前常感到几分敬畏。但在他身边工作一久就知道了，对战友，对部下，他不仅和气可亲，而且心肠比谁都软。这方面的例子可多了。有一次，陈刚趁团长不在的时候，把团长放在桌子上的钢笔拿来练习写字，不小心把钢笔帽上的挂勾给弄断了。他知道这支钢笔是团长最心爱的东西，平时看得和枪一样重，所以当即吓得像塌了天似地哭起来了。文团长回来后，先是发现钢笔帽坏了，正想问是怎么回事，便又看到了陈刚在一旁抹眼泪，不用问心里啥都明白了。于是，心平气和地对他说：“瞧你一个没出息的样子，革命战士怎么动不动就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哭鼻子呢？不就是钢笔帽坏了吗？可钢笔尖还好好的呀，只要不耽误写字就没事。”团长嘴里尽管一再说没事，但陈刚看得出他为此心疼了好几天。后来团长找来旧布头亲手缝了一个钢笔套，从此把钢笔牢牢地系在自己上衣钮扣上。团长政治上帮助你不断进步，生活上关照你要吃饱穿暖，按陈刚的体会是，在家

里爹娘都想不到这么细。特别是学习文化方面，文团长不仅自己肯下功夫，还要常常拉上陈刚一块学。行军、打仗、下部队检查工作，一个是首长一个是警卫员，可是在工作之外的时间里，就剩下他们俩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就成了同学和兄弟之间的关系。所以，陈刚有时才敢在他面前偶尔地开开玩笑甚至说句牢骚怪话。但不能过了头，一过了头也会挨克。文团长克起人来，不大吵大喊，更不会骂得你狗血喷头，听起来似乎是慢声细语，但慢中带急，柔中有刚，几句话便能让你出一身大汗。

作为团首长的通信员，要说陈刚了解首长，恐怕不假，但是最了解的还应是首长对部下。这里有个前提，即：全团上下，不论是指挥员还是战斗员，不论是上级还是下级，都是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同志。有了那一段共同的经历，即使是第一次走到一起的陌生人，相互间也会有一种不言而喻的理解、共鸣和沟通。作为一团之长，文年生深深知道，他身边这些爬过雪山、走过草地、九死一生才到了今天的同志们，个个都是党的宝贵财富。今后，中国革命的伟业要靠他们去奋斗，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要靠他们去完成，爱护他们就是爱护党的事业。这种爱饱含着朴素而深厚的阶级感情，更饱含了崇高而神圣的政治理想和坚定而热烈的共产主义信念。文年生带兵的原则正是建立在这种爱的基础上的。他带兵、爱兵、知兵、理解兵，战友们也爱他，了解他，信任他。这样的一个战斗集体，让各级首长放心，也令党中央毛主席宽慰。在这样一个战斗集体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完不成的战斗任务，也没有打不垮的敌人。当然，工作中不是没有矛盾，也不是没有问题。不过，有一条，不论是有了矛盾还是出了问题，他首先把握一点，那就是绝对相信同志们的觉悟。有两件事他是感触很深的。一次是部队改编为八路军后换发服装，原来军帽上的红五星要换成国民党的党徽，这是令很多同志从感情上所不能接受的。想起十多年来有多少好战友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口和屠刀之下，不少战士产生了抵触情绪。但是，当上级首长讲清楚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以后，部队的抵触情绪马上没有了，并且化作了高昂的战斗热情。还有一次是部队改编后不久，兄弟团队陆续东渡黄河开赴敌后，却把第718团留了下来，又有很多同志为此想不通，认为我们也是主力之一，为什么不能和兄弟部队一样上前线打日本鬼子？后来毛主席在延安亲自接见了留守部队官兵，并作了重要讲话。从此，全团上下斗志昂扬，战士们把“保卫黄河，保卫陕甘宁，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口号变成自觉的战斗行动。部队开赴黄河岸边时，正值隆冬季节，河岸上的泥土冻得比石头还硬，战士们不辞辛劳，日夜构筑工事，决心不让日本鬼子过来一兵一卒。这就是我们的战士，这就是我们战士们的觉悟啊！二月底三月初，日军占据了对面的军渡，接连不断地隔河向宋家川我方阵地实施猛烈的炮火袭击。但是，一个坚定的信念在文年生心中从来没有动摇过：只要有我们警卫第8团在，敌人要从宋家川渡过黄河的梦想就永远是泡影……

陈刚的“牢骚话”被团长给噎了回去，可他没有想到正是他那咽回去的半截话，却让文团长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其实，陈刚的话并没有大错。不是吗？在家乡，在湘江两岸，在洞庭湖边，两个月前就该是驾飞草长、桃红柳绿了，但在这塞上高原黄河岸边，却是另一番景象。一想起家乡，文年生心里便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30年前他出生在洞庭湖边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十岁那年上了几个月的私塾，能



吭吭吧吧地把一本《百家姓》念囫圇了。因为家里穷，交不起学费，11岁不到便去别人家学做裁缝，稍有不慎老板便用尺子狠打，做完工还要给人家看孩子，孩子哭了自己也要挨一顿打。就这样，气没少受，饭却没有吃饱过一顿。以后他又跟着别人学木工，当时人小力薄，连斧头锯子都拿不动。吃的是主人家的冷饭剩菜，同样也要常常挨骂受气。木工也没法学成，只好又跟着大人到洞庭湖周围的华容、南县等地给人家打短工，种过田，也担过堤。大革命时期，湘北有了国民革命军。一是因为看到国民革命军走到哪里都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二是听说到了军队里就再不愁吃不愁穿了，所以他便当了兵。然后他随部队北伐一直打到了郑州、开封。以后，国民革命军中几派为争夺地盘兵戎相见，互相残杀，而且当官的打骂当兵的、当兵的欺负老百姓的现象非常普遍，使他认识到这样的军队并不像它所标榜的那么革命，加上他长期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在1930年5月，红军第一次攻打长沙时，他毅然离开旧军队参加了彭德怀领导的红3军团，从此翻开了人生征途上崭新的一页。在革命队伍里，文年生刻苦学习政治理论，思想上追求进步，作战中英勇顽强，迅速成长了起来。参加革命三个月后，他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当年年底，井冈山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他被提升为连长，第二次反围剿胜利以后，他又被提升为副团长、团长。在长征途中，他坚决与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阴谋作斗争，立场坚定，处置果断，曾受到毛泽东的点名表扬。自参加红军以后，他还曾三次系统地学习过革命理论。第一次是进红3军团的教导队，第二次是在中央苏区办的红军学校，第三次是在延安的红军大学。三次学习使他在政治思想认识、文化知识水平、作战指挥艺术以及部队管理教育等方面发生了三次质的飞跃。

整整八年了。八年，在人生的长河里不算太长，但是对文年生和他的战友们来说，走完这八年的路程是多么的不易。八年来，他翻过多少座险山，跨过多少条恶水，多少次在黑夜中拼杀，多少次和死亡擦肩而过？！八年后的今天，当他站在黄河岸边，面对滚滚激流和漫漫黄沙，他那埋藏在心底深处的悠悠乡情，即刻化作了浑身上下金戈铁马、壮怀激烈的英雄豪气。

像文年生这样丰富的战斗经历和对革命理想成熟而深刻的认识，陈刚哪知道那么多。他毕竟太年轻了。三年前，他刚刚13岁半，就在家乡——湖南澧县，参加了贺龙的部队，不久就又随主力踏上了千难万险的漫漫征途。那么小的年纪，个子还没有枪高，又是爬雪山又是过草地，事后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是怎样走完那漫长的路程的。唯一使他难以忘怀的是在征途上，首长们的马他骑过不少回，老战士的背他趴过的更多。在陕北一年后，他个子长高了不少，身板也结实了不少，他似乎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不久，第718团刚到黄河边的时候，组织上分配陈刚给文年生团长当警卫员。第一次向文团长报到时，他一看到自己的头顶还没有首长的肩膀高，感觉是老大的不舒服，心里不禁嘀咕起来：怎么把我分给了这么位高大的首长？如果是首长个子矮点，不也能显得着我一些吗？不过，当他很快了解到文团长和自己是湖南同乡，文团长的老家在洞庭湖东边，自己的老家在洞庭湖西边，两家能隔湖相望时，心里着实高兴起来。一天，他随文团长到黄河边检查连队的防御工事，瞅准时机，他和团长套起了近乎，可是，“同乡”两个字刚出口，文团长便严肃地对他说：“以后记住，在革命队伍里，只讲同志，不讲同乡。”别看陈刚年纪不大，但大首长他是见过不少的，大道理他也不陌生。他接过团长的话又说：“我们俩是同志加同乡，都是喝洞庭湖水长大的呀！”平时

不苟言笑的文团长，这时也不禁被跟前这小战士的胆量和机灵逗乐了。文团长微笑着抚摸起陈刚的脑袋，说：“问题是你到现在也还没有长大呀。”文团长的话并不错，陈刚当时还差两个月才满16岁呢。可是，陈刚平时什么都不怕，最怕别人说他长不大，所以委屈得泪珠子又在眼眶里打起转来。一看这样，文团长也心疼起来了，安慰他说：“现在没长大没关系，往后有陕北的小米、黄河里的水，很快就会把你养大的。”

后来陈刚在实践中切实体会到，文团长当时说的那番话，实在是太好了，别看陕北的小米没有洞庭湖边的大米那么白那么香，黄河里的水没有洞庭湖的水那么清那么甜，但是却一样地养人。他自己都能感到跟着文团长半年多来，不仅个子高了，力气大了，心里也更加透亮了……

文团长依然一动不动站在黄河岸边，任肆虐的风沙撕扯着他单薄的军衣，扑打他年轻的面庞。此时，与其说他是在观察什么，不如说他是在思考什么。陈刚顺着团长的目光也往前方望去，前方，滚滚黄河水汹涌澎湃一泻千里。不知又过了多长时间，文团长突然像对陈刚说，又像是在自言自语：“你别看黄河没有咱们家乡的湘江那么秀丽，那么温柔，黄河水也不像洞庭湖水那么碧绿，那么清澈，但正是她养育了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啊！五千年的文化，还有五千年的文明！在她的怀抱里，你就不用发愁了，我们的战士会一天天长大的，我们的革命队伍也会一天天壮大。”

深入前沿，从严治军

文年生团长和陈刚来到第2营营部时，部队已经开过午饭。这还是营部书记朱林尧同志喊他们来的。要不然，这顿饭还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才想起来呢。常常忘记吃饭，这是文团长的“老毛病”了，不少人都早有所闻，朱林尧更是多次亲身领教。

对朱林尧，文年生也算是比较熟悉的了。小朱是部队长征经过贵州时入伍的，入伍前曾读过三年小学，就因为在这三年小学的学历，在当时部队基层，他也可称得上是半个知识分子了，而且脑子非常灵活，领会能力很强。第718团成立时，他是团司令部的技术书记，工作泼辣，积极主动，不管交给啥任务，不会就学，一学就会，很受团领导的器重。在该团刚接守河防任务时，宋家川一带社会秩序非常混乱，从山西溃退过来的国民党部队，失去了建制的约束和指挥，四处乱钻乱窜，偷老百姓鸡的有，抢老百姓粮的也有，闹得黄河岸边乌烟瘴气。后来经上级批准团里成立一个纠察队，由朱林尧任队长，专门对付国民党的散兵游勇。有一天，一个国民党少校买群众的东西不给钱还出手打人，正好被纠察队碰上，该少校不服纠察，朱林尧下令把他给捆了起来，并关了他一天禁闭，他这才老实。由于朱林尧和纠察队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宋家川一带的社会治安明显有了好转。为此，朱林尧多次受到上级首长的表扬。特别是文团长，更是喜欢他这种敢做敢为的劲头和作风。不过，一个20出头小伙子，朱林尧不可能没有做错事的时候。有一次因粗心大意写错了一个口令，被文团长狠狠地骂过一回。其实文团长当时也只说了他一句：“你以为这是闹着玩的呀？！什么时候你脑袋找不着了还不知道是在哪丢的呢？！”就这一句，吓得他三天不敢和文团长打照面。倒是文团长本人，说过就说过，只要能改正，就不会再把下属的缺点或毛病放在心里。不久前，组织上把朱林尧调到在一线执行任务的第2营当营部书记，临走前文团长专门买了一包花生米请他，和他聊了半夜，希望他下去后多熟悉基层，准备着将来去挑更重的革命担子。在朱林尧的记忆里，从来没有见文团长说

过这么多的话。

今天，文团长下来检查工作说好在营部吃午饭，可是到开饭时间了，不见团长回来，部队吃过饭了，还不见人影，派人到几个连队去找也没有见到，只听有人说可能在渡口附近。潘锋营长和肖道生教导员心里有几分明白了：最近日军在山西离石一带又有了新的动静，其企图仍是攻占宋家川渡口。为此，文团长不可能放得下心，这几天他天天到前沿阵地和宋家川渡口上下反复察看，心里一定是在酝酿新的歼敌计划，连吃饭的事也想不起来了。于是，潘营长立即打发朱林尧跑步到河边去找。

果不其然，朱林尧便在离渡口不远的河边找到了文团长。对老首长，朱林尧当然不会说什么，但对陈刚他就没那么客气了：“你这个兵，傻傻乎乎的，什么时候了还在这看风景哩！饿坏了首长，你负得了这个责吗？”陈刚莫名其妙被他熊了一顿，一时不知说啥好，只好眼巴巴地望着文团长，显然是在向团长求援。文团长说：“你这个朱林尧同志，吃柿子专拣软的捏，这关小陈什么事？”“怎么不关他的事？”朱林尧似乎是有理不饶人。“我也给首长当过警卫员。一般来说警卫员要听首长的，但在有的事情上，例如吃饭啊，睡觉啊，首长得听警卫员的。若是警卫员没有想到，那就是失职。就算是你们的肚子都是铁打的，不知道啥是饥饿，可河道里这么大风，作为警卫员总该找个避风的地方让首长呆吧？”听朱林尧说到风，文团长把话叉开了：“大风不过午。这风刮了五六个小时，已是强弩之末，正好我们也该解决吃饭问题了。我问你朱林尧同志，看你火烧火燎的样子，你们营长准备了啥好东西招待我们？”朱林尧自信地说：“请首长放心，我们肖教导员今天可是把存货都拿出来了，首长这回又准能一饱口福。”

朱林尧说的肖教导员的“存货”，不仅文年生同志心里明白是什么，连陈刚也非常清楚，不会是鸡鸭鱼肉，更不可能是山珍海味，只不过一盘炒辣椒而已。凡是和文年生一块儿工作过甚至稍有接触过的同志，都不会不知道他嗜辣椒如命的习惯。作为湖南人，喜欢吃辣椒，没有人感到奇怪。其实爱吃辣椒的又何止是湖南人。部队大部份是两湖、江西、福建和贵州、四川人，哪个不喜爱吃辣椒？文年生不仅喜欢吃而且很能吃。一营教导员傅忠海是湖北洪湖人，吃辣椒在全团也是出了名的，但他有句话说得好：“咱们爱辣椒，是把辣椒当菜吃，可他文团长是把辣椒当饭吃，和他比，整个差了好几级。”关于吃辣椒，文年生也有自己的认识和说法。一是部队生活条件相当艰苦，战士们本来就没有什么好东西吃，偶而碰到一回加菜改善生活，他宁可少吃一口也要省给别人，自己拿辣椒顶替；二是从小家里就穷得叮当响，不管好歹，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加上自己饭量又大，很少有别的什么菜吃，全靠辣椒送饭。他常对同志们说，要是没有辣椒，我就长不成这么大的个子了。全团没有几个人不知道他这个习惯的，所以无论走到哪里，在团里也好，在营里、连里也好，大家都乐于用辣椒招待他，他也乐于接受。但他心里也明白，就是这辣椒也不是什么时候想弄就弄得到的，为此他常常感到内心不安。

吃饭的功夫，刮了大半天的黄风果然停了。午后的阳光，显得灿烂了许多，也可爱了许多。宽阔的河面，阳光下一改上午的面孔，一派生机勃勃。金色的波光中，时而有一只渡船顺激流而下，如同透明的背景下一个快速划动的剪影，身上裹着羊皮大袄、头上扎着白羊肚手中的船夫，奋力摇着橹，口中不停地发出具有一定旋律的呐喊，像沾血带泪的歌唱，更像揪心撕胆的哭嚎，谁听了浑身的每根神经不为之颤抖，灵魂深处不受到震撼？！特别是

那些在南方翠山秀水里出生长大，如今正与黄河同生死、共存亡的热血勇士们。文年生，这位堂堂的七尺须眉，这位置生死于度外的共产党人，同样会被眼前的情景激动得热泪横流。他实在也是个热血男儿啊。

吃过饭后，文年生和第2营潘营长、肖教导员一起，再次到前沿阵地上检查。第2营是全团的一线分队，守在宋家川渡口上下最重要的部位。全营共4个连队，其中第6连和第8连的阵地就在渡口附近的窑洞里，站在每一个掩体内，都能把对岸军渡和河面上的情况看个一目了然。第5连和第7连的位置稍后，处在第6连和第8连阵地的侧翼，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有效的火力给第6连和第8连以策应和支援。对于两个最靠前的连队的阵地，包括工事的构筑、交叉火力的配置、出击路线的选择和两翼分队策应的时机把握等，都是文年生和大家反复研究而确定的，他对每一位前沿指挥员的职责、每一个火力点的位置了如指掌。而且，为了让战士们牢记河防防御战斗的战术原则，他把其中的要点结合战斗实际编成顺口溜，叫大家唱：“敌人打炮，我们隐蔽；敌人炮停，抢修工事；敌人活动，密切注意；敌人过河，半渡而击。”正是由于这样准备充分、组织周密，在前一段的战斗中，日军除了隔岸打了几千发炮弹外，对我毫无奈何，没有造成我方任何伤亡。

长期的战斗经历，使文年生特别看重对基层指挥员政治思想和军事素质的培养。上级的作战意图能不能贯彻执行，部队高昂的士气能不能保持，士兵们的战斗热情能不能充分发挥，战斗中的每个细节的处置得不得当，战斗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会不会把握，这些都是保证战斗胜利的基本因素。而这些因素，就构成了一位基层指挥员的整体素质和水平。他对基层指挥员在指挥战斗时的要求是：头脑清醒，适应变化，指挥靠前，身先士卒，因为，一投入战斗，便是你死我活的场面，如果枪一响指挥员的脑子就糊涂了，事前战斗计划再周密，也会乱套。只有保持清醒的头脑，才能适应战场上随时出现的新的情况并实施新的指挥，才能保证战局顺利地向前发展。另外，基层指挥员在战斗中，指挥位置一定要靠前，只有靠前才能了解到真实的情况。至于身先士卒，就是指牺牲在前，撤退在后，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在战斗中都应该做到的，也是我们革命军队与反革命军队的一个显著的区别。我们已经积累了多少这方面的经验了，不论是多么难夺的山头，不论是多么难攻的阵地，只要有干部冲上去了，就没有冲不上去的战士。而在平时的工作中，文年生对基层指挥员的要求同样十分严格，并且非常注重一点一滴的培养。例如，开始有的基层干部在研究作战计划或实施战斗指挥时，把敌我双方所处的位置，习惯称河东、河西或东岸、西岸，对此，他多次严肃指出，这是违反基本军事常识的。他说，从大的作战地域上看，在陕北这块地方，黄河总体上是从北向南流，于是这便有了河东、河西或东岸、西岸之说，在制定战略计划时这么说或许是可以的。但是，因为所谓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是固定不变的，而河水的流向却又是变化不定的，黄河自古有九十九道弯之说，事实上，就五千多公里长的黄河来说，何止是九十九道弯？所以，具体到某一战斗地段时，黄河就不一定是从北往南流了。例如眼前，在宋家川渡口，黄河是从东北向西南流的，渡口下游不到500米，黄河又向正西流了，显然没有了东岸、西岸之说，所以在战斗中的准确叫法应是左岸和右岸，即：以河水向前流动为准，左边即左岸，右边是右岸。

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举不胜举。因此，不少基层指挥员说，不要怕文团长批评你，他批评你是教会你打仗的本领、带兵的学问，批评得越多你进

步就越快。

“用脑子打仗”

第2营营部的灯光又亮了一个通宵。

文团长有个习惯，一次行动计划，自己考虑得再成熟，他最后也要反复征求有关同志的意见，否则心里就不塌实。

5月9日接到上级的敌情通报，称两个月前曾占据过军渡并企图强渡黄河，后因遭我敌后主力攻击，不得不匆忙向太原方向退缩的日军第109师团，沿太离公路再次出动了。其目的仍是抢占军渡，继而从宋家川突破我黄河防线。

敌人的行动和企图本在我预料之中，而且我早已做好了在宋家川抗击敌人强行渡河的充分准备。但是，一个全新而大胆的想法开始在文年生脑海里产生。即：与其被动地等着敌人来进攻，我为何不可以趁敌立足未稳之时，主动渡河出击，以攻为守？如果我能见其不意地歼灭或击溃敌先头部队之一部，必将去敌之锐气，长我守土抗敌军民之威风 and 决心。同时，他也考虑到了，这一作战思想的关键是能否有取胜的绝对把握。上级赋予该团的任务是扼守宋家川渡口一带河防，如果万一渡河出击失利，将有负于上级的信任。另外，前一段的战斗虽然阻止了敌人渡河，但尚未与敌人发生更直接的战斗，对敌人的作战特点掌握不足，没有直接的歼敌经验，况且敌人在武器装备方面明显优于我军。当然，文年生也考虑到了我方的优势。我军优于敌人首先是在心理上。日军虽然尚处进攻状态，穷凶极恶，气焰嚣张，但毕竟是远离本土在异国作战，属不义之军，对当地气候和水土条件不适应，加上两个月前在晋西北的进攻受挫，其锐气已经遭到了打击。而我军虽然装备不如敌人，但人本身的素质，不论是在思想方面还是军事技术方面，都远高于对方。部队成分全是经过长征的老战士，艰苦的战斗岁月早已把意志磨炼得坚强如钢，为了民族的解放和革命的成功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可以说人人是身经百战、以一当十。

既然敌我双方各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那么在拟定作战计划时，扬长避短，摸清敌情，选择分散之敌为攻击目标，运用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的战术原则，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定能打敌人个措手不及。于是，文年生当即派出两个小组过河侦察，自己则再次来到处于一线防御的第2营。经过一天的检查和思考，更坚定了他渡河歼敌的决心。当晚，他便把自己的想法，拿出来和第2营两位主要领导反复讨论和斟酌。这就是为什么营部的灯光亮了一个通宵的原因。

其实，接到敌情通报以后，潘营长和肖教导员也曾一起认真分析和研究过，他们认为，尽管敌人气势汹汹，装备优于我军，但是要想突破我黄河防线，基本没有可能。一是因为敌人战线拉得很长，投入到晋西北的兵力有限；二是黄河水流湍急，日军目前尚无有更先进的渡河装备；三是我河防部队严阵以待，军民团结，众志成城；四是在敌后有我八路军主力在活动，敌人渡河作战有后顾之忧。这样，即使敌人在某一个点上突破成功，但终因在短时间内难以把大量的兵力运到右岸，所以形不成拳头，也站不稳脚根，结果仍然逃不脱被我围歼的命运。当然，他们也明白，这种乐观的分析并不能成为一线阵地指挥员丝毫松懈的理由。特别是看到文团长一天来无论在阵地检查，还是在黄河边徘徊，那少言寡语的严肃和苦苦思索的神情，对他们本是乐观的情绪不可能不有所抑制，也不可能不增添几分沉重。他们知道，文团

长在“反围剿”和长征途中，因作战勇猛，善打硬仗、敢打苦仗，素有“文老虎”、“猛老虎”的美誉。同时，他又喜欢动脑用脑，可谓是勇中有谋，硬中有巧，向来又以“用脑子打仗”而著称。所以，当文团长称要把自己下一步作战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拿出来征求他们的意见时，他们不仅没有感到丝毫的意外，反而觉得这是十分平常的事情。

肖道生和潘锋分别是1930年和1931年入伍的老同志，和文年生一样是参加过井冈山五次“反围剿”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战士，相互间已经达到高度的信任与默契。潘锋同志本是第1营营长，年初因第2营原营长工作调动，加上第2营担负着宋家川渡口正面防御的重任，文年生团长从多方面因素考虑，把他从第1营调到了第2营，事前连招呼都没有打。事实上，对潘锋这样的老同志，往更艰苦、更重要的岗位上挪动，也不用打什么招呼，上级一个命令下来，必定是坚决执行和愉快服从，别无考虑，也别无选择。

文年生团长将自己“不成熟的想法”摆到了肖道生和潘锋面前，两人会意地笑了。团长对敌情的分析和敌我双方优劣势的比较，正说到他俩的心坎上。而且，团长显然比他们站得更高，想得更远。“渡河出击，以攻为守。”这是他们二人所没有想到的，现在经团长提出来，两个人顿时兴奋起来。自从到了黄河边上，全营上下枕戈待旦，士气高昂，战士们每天摩拳擦掌，发誓要与日寇拚个你死我活。可是，半年过去了，除了反复构筑工事等着敌人从对岸打炮放枪外，连日本鬼子什么模样都还没有看清楚过，谁心里不上火着急呢？特别是听到兄弟部队在前方打了胜仗的消息后，更是撩拨得大家心里焦急手心发痒，纷纷要求上前线杀敌立功，口头向领导请战的有，递交请战书的有，还有的同志放出话说再这样没有仗打就申请调出河防部队到敌后去，更有不少战士咬破手指，血淋淋地往自己写的决心书上按，情景相当感人。作为营长、教导员，他们理解战士们这种求战的迫切心情。其实，他们心里盼打仗想杀敌的心情和大家何尝不是一样。他们既为此而感动也为此而头疼。因为，作为他们这一级指挥员，无法满足战士们各种请战的要求，只能反复向战士们做说服工作，带领部队继续做好战斗准备。而且，他们也担心，再这样继续下去，天天喊打仗却又老是没仗打，很难保证不挫伤战士们宝贵的战斗热情。我们自然有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我们也相信战士们局部服从全局，个人服从组织的觉悟，但是，真正切实起到保护部队积极性的最好办法，莫过于马上给大家提供一个直接杀敌立功的机会。这个机会终于来了，他们二人怎么能不精神为之一振呢。

“团长，您这个想法太好了，绝对是一步好棋！”文团长的话音刚落，肖道生便马上举双手赞成。“团长，这个任务就交给我们第2营吧。虽然我们还没有过河和敌人交过手，但近两个月来，我们时常以战斗小组为单位悄悄过河到军渡至离石一带摸情况，地形、道路都已经比较熟悉了。”潘营长已不再是单纯的表态，而是有理有据地向团长请战了。在首长面前争重担、抢任务，这是部队的传统，也是各级指挥员练就的一套“基本功”。

听了他二人的发言，文团长却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热情，他不停地在窑洞里默默地踱来踱去，仿佛脚下是一条永远走不到尽头的路。他那不停移动的高大的背影，把墙上挂着的小马灯有限的光亮遮去了大半，窑洞里显得更加昏暗了。没有人去计算过了多长时间，也许是10分20分钟，也许是一个两个小时，三个人各自想着一个共同的心事，屋里静得掉根针都能听到响声。直到小马灯本就比黄豆粒大不了多少的火苗眼看就要熄灭了，肖道生这才对

着墙上一扇只能伸进一个人头的窗户喊隔壁的朱林尧，让他赶快过来给灯加油。一般情况下营里领导开会研究工作，朱林尧都要到会做记录的，会后要整理会议材料和有关情况，有必要时还要向上请示向下传达。但今晚不是正式开会，肖教导员也就没让朱林尧过来。不过，朱林尧虽然人没有过来，耳朵却是一直都没有离开，这边说什么话他听得一句不漏。所以，一听到教导员喊他给灯添油，他立即把备用的一盏马灯点亮，然后提到了这边，窑洞里顿时亮了许多。

当朱林尧把灯挂好以后，走到肖道生跟前，凑到教导员耳边悄声说道：“教导员，这事可不能把我给落下了哇？”肖道生知道他是个机灵鬼，啥事都瞒不了他，便暗中指了指文团长的背影，算是给朱林尧一个回答了。朱林尧还想说什么，正好被转过身来的文年生看个一清二楚，他难为情地对团长干笑了两声，然后退到门边准备出去，却被文团长给叫住了：“朱林尧同志，好像你也有什么话要说？”听团长这么一问，朱林尧给问愣住了。如果正面回答团长，这等于不打自招，承认自己一直在偷听首长们谈话；如果不正面回答，文团长面前能蒙混得过去吗？一向机敏过人的朱林尧一下子想不出应变的招了，像根木桩似地立在那里。潘营长在一旁急了，催他道：“怎么回事，团长问你呢？有话就尽管说嘛！”看来不说是不可行了，朱林尧只好硬着头皮说：“首长们比我水平高，本轮不到我说的，但团长现在一定要我说，我就说一点吧。”肖道生听到这里也急了：“有话就快说，啰嗦那么多干什么！”朱林尧不好意思地望了望教导员和营长，接下去说道：“如果渡河出击，我认为越早越好，要在敌人从离石往军渡运动的半路上下手，不能等敌人到军渡向我们打炮了我们才动作。报告，我的话完了。”

“是啰嗦了一点。不过，这意见嘛，倒是蛮好的哇。”文团长首先肯定了朱林尧的意见，接着对屋里三个人说：“看来我们四个人的意见一致。不过，这次行动关系甚大，不单是你们营或我们全团的荣誉问题，边区的人民，还有我们党中央毛主席，都在看着我们，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现在初步考虑，为了不打乱我们全团目前的防御部署，特别是不能影响宋家川渡口正面防御和右岸的整个安全，但又考虑到你们营对军渡至离石一带情况比较熟悉，所以我想，这次渡河到左岸出击，以你们营为主可以，不过只能动第5连和第7连，另外加上第1营的第4连和团机枪连。你们的第6连和第8连，不仅一个兵也不能动，而且你们两位营的主要领导也有必要留下一位。”说到这里，他的目光迅速扫视了一下潘营长和肖教导员，最后把目光停在了肖道生身上，说：“老肖，你们两个就不用争了，我看你就留下吧，让潘营长和王副营长带第5连和第7连去。”肖道生望着团长点了点头，立即说：“团长指示，我们坚决执行就是了。”“那好。”文年生继续说。“具体战斗计划，还要等团派出的侦察小组回来以后，由团里最后研究确定。你们要尽快做好第5连和第7连战前动员和各项准备工作，保证随时能拉得出去。另外，把准备渡船和选择渡口的任务也先交给你们。我的意见是不能从宋家川和军渡这里直接渡河，这里目标太大，社情复杂，容易泄密，弄不好会引起敌人的警觉。最好是选在上游的磳口，那里渡口虽小，但相对比较隐蔽，渡过河后我们多走一段路就是了，你们要先派人去摸一摸那一带左岸的情况，包括敌情、社情和水情，然后连同渡船准备情况，一起及时报告团里。

朱林尧请战

朱林尧自己绝没有想到这么大的一次任务，这么难得的一次杀敌的机

会，竟然会没有他的份。为此，他非常想不通。越是想不通越还是要想，越是要想越还是想不通。他去找营长蘑菇，营长说：“这事不是我一个人定的，营党委集体讨论。”营长一句话便推掉了。营长算是客气的。他去找教导员争取，教导员没好气地说：“你去不了，我不也去不了吗？前天夜里你都亲耳听到了，不也就是文团长一槌子定音，我不就黄了？革命军人嘛，要一切行动听指挥，首长说过了，组织上也决定了，还有什么想不通的？！”

可是，想不通还是想不通。不过，倒是教导员的话提醒了他。对头，找团长说去。凭自己和团长多少次一个被窝里滚过的情分，求团长给营里说一声，再来个一槌子定音，我这事就成了。于是他把手头急办的事在上午处理停当，吃了午饭便悄悄地对营部值班通信员小张说：“我到团部去一趟。有谁问到我去哪了，没急事就说不知道，有急事就说我到团部去了，找到团长就能找到我。”

朱林尧一路小跑，到了团部直奔团长住的窑洞。正是部队午休时间，附近静悄悄的，没看到一个人影走动，只有陈刚一个人守在窑洞门口，太阳底下脱了个大光膀子，专心致志地在逮虱子。朱林尧老远就要喊他，陈刚急得直朝他摆手，然后提着衣服把朱林尧拉到远处的一棵枣树下，说：“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你这个知识分子来得可真及时啊。”“怎么，团长让你找我了？”朱林尧抑制不住兴奋地问。陈刚说：“不是团长要找你，是我陈刚要找你。”朱林尧顿时有点泄气了：“你找我？你找我干什么？”陈刚一脸正经地说：“别急嘛。我找你不行了？要找你就是有事。谁没事找你干什么？”“好好好，快说吧，你找我有什么事？”朱林尧不相信他陈刚一个小小的首长通信员也会找自己有事。陈刚说：“以前就听说文团长是肚子里有学问的人，我就不明白，他参加革命前也没读几天书，怎么就有学问哩？现在我知道了。他不管工作多忙多累，一空下来时就读书写字。团长读书是真读书，不像有的首长只看不出声，文团长经常是大声地读，离多远就能听见。这几天他不知道从谁那里借来一本老古书，他读起来像唱歌一样好听。其中有两句他还专门读给我听，边读边说，‘好好，写得好。’可是我听了也不知道好在哪里。所以就想到你了，想到什么时候再看到你，一定向你请教。听不少人说过，在咱们团，除了团长，真正肚子里装了几瓶墨水的，你也能算上一个了。”“承蒙你的夸奖。”朱林尧心里有自己的事，显得不耐烦起来，“决说吧，是哪两句？”陈刚这时从身上摸出一张字条，朱林尧接过来一看，上面歪歪扭扭地写了两行字：“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朱林尧不加思索地问道：“这是两句唐诗，你都不知道？”陈刚说：“这我知道。团长给我说了。”朱林尧又问：“唐诗就是唐朝人写的诗。这你知道吗？”陈刚说：“当然知道。也是团长对我说的。”朱林尧更不耐烦了：“既然你什么都知道，还问我干什么？”陈刚说：“我还不完全明白这两句唐诗说的是啥意思。当时团长只说‘写得好’，还没来得及给我讲别的就有事被人叫走了。等他回来，诗的事也就没有机会再提起了。”朱林尧耐着性子说：“那好吧。我问你，知不知道无定河在哪里？”陈刚想了想，说道：“好像这名字还熟悉，有那么点印象。”朱林尧说：“不是有那么点印象。上次我们从绥德经过时，过了一条河。你当时还大惊小怪地喊起来：‘哇，这么小的黄河呀！’被团长当即骂了一句：‘什么黄河！这是无定河！’你不记得了？”陈刚仿佛恍然大悟：“记得记得。”朱林尧说：“记得就好，在古代这一带就是经常打仗的地方。这两句诗就是说从中原过来的士兵在这里打仗阵亡很



久了，人都变成无定河边的骨头了，可是因为交通不便，也不能写信，家里人还不知道，做梦还想着他活着哩。”

“原来是这样。”难得见到陈刚这一脸的沉重。他一边穿好衣服一边想起了什么事，问朱林尧：“哎，刚才只顾讲我找你的事，还没问你呢，看你跑得一头汗，找我有什么事？”“谁找你了？”朱林尧这才又想起自己的大事还没办，着起急来：“我是来找团长的。他在不在家？”一听说他找团长，陈刚把一脸的沉重立马换成了一脸的警惕性和责任感，说：“对不起。团长在休息，无关的人不得打扰。”朱林尧更急起来：“你说什么？我怎么成了无关的人了？”陈刚不吃这一套，仍板着脸说：“这我管不着。反正只要有我在，你就休想这时候进去。”听陈刚说得这么强硬，让朱林尧简直有点不可思议了：“真没想到，我朱林尧在你陈刚面前连这点面子都没有。”陈刚说：“这不是我给不给你面子的事情。你又不是不知道，前天晚上在你们2营，团长可是一夜没合眼。昨天一天，他先到了1营的4连，后又去了3营部，真是马不停蹄，没有一分钟的空闲。昨天晚上团里开会，又是一个通宵。今天一早就去了机枪连，午饭前才回来。就算是只真老虎，总也得有个打瞌睡的时候吧。”

陈刚一席话说得朱林尧哑口无言，可是他想想自己的事情已是迫在眉睫，只有再拣好听的话说了：“你刚才说的是有道理。不过我这事怪急人哩，你只让我进去一分钟，啥问题就解决了。你放心，我只跟团长说一句话就出来。小陈同志，今天你成全了我这一回，往后我老朱十年八载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陈刚听朱林尧把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心里倒觉得很好笑起来，但从他说出的话里却听不出任何松动的迹象：“你也少给我来这一套。什么老朱？我只知道我们八路军里面是有一位老朱，但不是你。”朱林尧一听陈刚这么说，几乎要发起火了：“你胡扯什么？那是朱总司令，怎么能叫老朱？”陈刚说：“是呀，朱总司令都不能叫老朱，你又算老几？”朱林尧这时哭笑不得，想想这真好像是“秀才碰到兵，有理讲不清”了。“好了好了。我不给你再磨牙了。你不让我进去，我就坐在这枣树底下等，你陈刚总管不着了吧。”说罢，背靠枣树一屁股坐在了地上。陈刚今天似乎下决心要和朱林尧作对到底，说：“怎么管不着？我不想管了就管不着，我要是想管了，照样管得着。”“能的你不轻！”朱林尧朝陈刚翻了翻白眼，然后合上眼皮，索性不再理睬他。

陈刚和朱林尧都是1935年参加革命，论月份朱林尧早陈刚一个半月，再加上大他好几岁，所以平时有意无意地朱林尧在陈刚面前总爱摆出个老兵的架子，让陈刚受不了。但是从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等方面，陈刚心里还是真有几分佩服朱林尧的。想想刚才人家还帮助了自己，不该把他气得直翻白眼，心顿时软了下来，主动用缓和了的口气对朱林尧说：“这样好不好，你的工作也很忙，这样等下去也不是事。你不就是要跟团长说一句话吗，现在把这句话说给我，我再瞅机会学给团长听，行不？”朱林尧翻了翻白眼，用极不信任的口气说：“给你学学？看你是多大个人不是？你想帮我这个忙，可我还信不过你呢！”说罢，又把眼皮耷拉了下来。这回陈刚没有生气，把嘴巴凑到朱林尧耳边说：“其实你不讲出来，我也能给你猜个八九不离十。信不信？”朱林尧当然不信，连眼皮都懒得抬一抬。陈刚接着说道：“你是因为这次上不了前线，想找团长套套近乎。说白了，走的还不就是老蒋的‘曲线救国’路子。我说的对不对？”朱林尧几乎是跳将起来，一把拉着陈刚的手，

说：“哎哟，看不出，陈刚你在首长身边工作，进步就是快！告诉你吧，我就是为这事来找团长的。你想，我心里现在该有多急？！”陈刚说：“你急有什么用？心里再急，你能把日本鬼子一口吞了？同志，想上前线杀敌还不容易？以后有的是机会。”朱林尧听陈刚说话的音调有点不对头，问道：“这话是你说的？”陈刚说：“嗨，我哪有这水平？！这是团长说给很多人听的，现在我学给你听，说不定你一听，心里就不急了。”朱林尧说：“你学起来倒是轻松啊，我这心里就不急了？没那事。”陈刚说：“我问你，一营教导员傅忠海，傅教导员，你不会不了解吧，他可是参加过秋收起义的老资格，和团长的关系比你怎样，不差吧？就是傅教导员今天中午还专程从营里跑来找团长，争取上前线的机会，团长就是用的那几句话把傅教导员给打发走了。还有，夜里团首长开会时，我也在外边听到了，其他几位团首长也都争着要上前线，团长也说了那几句话。别看话不多，顶用着哩。”

听陈刚这么一说，朱林尧才感到自己这次是彻底没什么戏了。但是不亲自见到团长他总还是有点不甘心，说：“不管怎样，我得在这里等到团长。”陈刚又劝他说：“我看你还是不要等了。就是等到团长，能起什么作用？首长们定好的事，如同板上钉钉，你黄花菜早凉了。”不管陈刚再说什么，朱林尧又一屁股坐在地上，脸上一副不到黄河心不死的神态。陈刚又说：“那就对不起了，我就此不再奉陪。团长这个人你是知道的，说不准什么时候要走马上就走，也许是今天夜里出发，也许几分钟后动身，我得随时做好准备。”朱林尧又是一跃而起，再次拉住陈刚的手，激动地说：“小陈同志，这么说团长已经批准你去了？”陈刚说：“你这不是等于白问吗？团长走到哪里我就得跟到哪里，这是我的职责，根本不是批准不批准的事情。”朱林尧又使劲握了握陈刚的手，激动得说话都带颤音：“你真是，真是，太荣幸，太荣幸了！”搞得陈刚一时竟不好意思起来，只好安慰他说：“朱林尧同志，你也不要太想不开，团长不是说了吗，上前线打仗，以后有的是机会。这次，我一定亲手缴一支日本鬼子的三八式送给你。”“谢谢！谢谢！”朱林尧使劲握住陈刚的手，久久不愿松开。

这时，突然团作战值班室通信员来叫陈刚，说团长叫他马上去值班室，有任务。陈刚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赶紧跑到团长的窑洞去看，屋里一个人影都没有了。出来后他便埋怨起朱林尧来：“都是你，团长什么时候离开的我都不知道。”朱林尧说：“你可不能把责任推给我。我来找团长，你说团长在里面休息，好说歹说你硬是不让我进。现在团长不在了，你倒怪起我了。我告诉你，团长绝不会是在我来之后走的。你要好好查查原因才是。”陈刚说：“这么说，团长他是长了翅膀从我眼皮底下飞走的了？”朱林尧说：“那可真是说不准的事。要不……”没等听他把话说完，陈刚早一溜烟地跑了。

### 夜渡黄河，主动出击

早听人说过，文团长这个人有分身法，经常在人意想不到的时间和意想不到的地点见到他。作为在文团长身边工作的陈刚，并没有从首长身上感觉到有太多的神秘和不可理解的地方。文团长工作起来常有一种拼命精神，他精力非常旺盛，可以连着三天三夜不睡觉，困了随便找个地方，迷糊个10分钟20分钟，就能解决问题。同时，他又很注意工作效率。别人一天是24小时，用在他身上可能是36小时；别人是两条腿走路，他可能是四条腿走路；别人是一个脑袋想问题，他可能是两个脑袋想问题。把这几条综合起来，他

一个人就如同几个人，这就难怪会给人一种有分身法的印象了。但是，令陈刚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的是，他明明看到团长进屋休息了，怎么就会突然不见了。难道团长他除了有分身法，还有隐身术不成？

— 99 —

5月10日下午，各渡河分队开始向螳螂峪下游一带集结。17时渡河开始。渡河的序列是：第4连、第5连、指挥所、机枪连、第7连。要求20时渡河完毕。部队到达左岸的碛口以后，为了缩小行军半径，按预定路线，分两路纵队向离石与军渡之间的柳林镇方向运动，40公里路程，要求在第2天5时之前全部到达柳林北侧各指定地点，就地隐蔽宿营，恢复体力，准备迎敌。

指挥所由文年生团长、潘锋营长及团司令部作战、侦察、通信参谋组成，另有两名医务人员和团侦察排与通信排各派出的一个班。其中侦察排长带一个侦察组和第4连的一个步兵班提前渡河到达碛口，然后为部队渡河后的行动设置前进路标；另由侦察科李参谋带一个侦察组和第7连一个步兵班，于当晚8时后由宋家川隐蔽渡河直接到达军渡，负责正面的敌情侦察和搜索。

部队渡河时，文团长并没有在指挥所的序列里，这令陈刚的心里一直悬着一块大石头。当时，他和朱林尧匆忙分手后跑到值班室，团长不在，他又找了几个地方也没见人影。他只好问值班的刘参谋，刘参谋瞪大眼睛反问他：“你是干什么的？团长在哪里应该问你自己才是啊。”陈刚只好承认：“是我不对，我把团长给搞丢了。”刘参谋说：“好你个小陈刚，别看你人小，这回功劳可不小，能有本事把团长都给弄丢。说说看，该给你个什么处分？”陈刚心一横，想都没想便回答说：“只要能把团长再找回来，你枪毙我，我部不说冤枉两字。”刘参谋这时笑了，说：“认识错误态度倒还不赖。不过，我可没有权力枪毙你。告诉你吧，团长丢不了。他给你留话了，让你暂时跟着通信班走，他们马上就要出发了，你快去吧。”陈刚听罢转身就跑，只听刘参谋在背后朝他喊道：“小家伙，跟着团长往后要多长两心眼。一个心眼照顾自己都不够用！”

陈刚随团指挥听到达渡河地点时，第4连第一批渡河的同志才刚刚上船。他心里着急，便一条船一条船地看，而后又挨个到岸边集结的队伍里去找，哪有团长的影子？他想找人打听打听，可又怕碰到刘参谋那样的人，不仅不告诉他团长在哪里，还要把他先给奚落一遍。他只好心事重重地夹在指挥所的队列里，等待着奇迹的出现。

此时，一片云霞从西山顶上轻轻掠过，露出了夕阳那张可爱的少女般羞红的脸，她把甜蜜的微笑洒向这条奔流不息的大河，洒向大河两岸绵延起伏的群山，洒向山间与大河里波涛一样颜色的黄土地，洒向黄土地上一片连着一片的正在泛绿的麦田。啊，还有，还有出征战士们一张张年轻的面庞和他们肩扛步枪上的闪闪发亮的刺刀；还有，还有激流中一条条奋力划向彼岸的渡船，还有渡船上满载的一个伟大民族不屈的灵魂和这个不屈的灵魂所发出的无声的呐喊……

陈刚期待的奇迹果然出现了。当他搭乘的这条木船行至河心时，他看到夕阳的余晖把左岸的景物映照得格外明亮，那陡峭的石壁，那参差的窑洞，那婆婆的树林，都在闪闪发光。突然，在前边渡船靠岸的地方，他发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团长！我在这呢！”他情不自禁地朝对岸扯着嗓子喊起来，一是距离还有那么远，二是渡船搏击河水的声音太大，又是逆风，他的喊声

不可能传到岸上。尽管如此，他喊过以后，浑身觉得舒畅了许多。于是，他长长地吁了口气，仿佛心里悬着的那块石头这才落了地。但同船的人被他这一惊一乍的神态弄得轰然大笑起来。大多都是团部的人，一个锅里打饭打菜，一个操场上列队出操，没有不熟悉他的，所以大家合伙开起他的玩笑来。有的说：“陈刚，你这个团长的警卫员，背两条警卫员的职责给我们大家听听，看像不像。”有的说：“陈刚啊，只要看到你不在团长身边，我们都放心了好多，因为没有你在身边添乱。团长不就更少操了一份心吗？”还有的说：“陈刚，听说延安新建立了一个幼儿园，但缺一个小孩头，据说中央点名要调你去呢，真的假的？”陈刚知道论口才，他不是这帮人的对手，加上“孤军奋战”，干脆来一个不予理睬的政策，你说你的，说的再多，我只当没听见就是了，还不是如同大风刮到河里去了。

当渡船刚刚靠岸还没有停稳，陈刚便第一个挤到船头，正准备大步一跃时，文团长向他伸出长长的手臂，并说：“别忘了，这脚底下就是山西的土地，第一步可要迈稳当了。”随着团长的话音落下，陈刚已稳稳地站在了岸上，真正的脚踏实地。还没等团长把紧紧攥着他的胳膊的手松开，陈刚便垂头丧气地说：“团长，我犯了错误，您批评我吧。”文团长感到几分意外又几分吃惊，立即问道：“你犯了错误？什么错误？”陈刚一副老实交待的沮丧神情，说：“我，我不该把您给弄丢了。”话一出口，他觉出了毛病，于是又急忙改了口，“哦，对不对，是不该自己把自己给弄丢了。”团里有人说过这样的话，谁能把文团长逗得笑出声，哪怕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只要确认是标准的笑声，谁就能赢得全团第一笑星的荣誉。此话虽然有点夸张，但足以证明文团长的笑声的确来之不易。然而，眼前陈刚的一句话，竟然能意外地把团长逗得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还一边笑一边说：“什么你丢了我丢了的，现在不是你也没丢我也没丢吗？要说犯错误嘛，那是我，不是你，我不该在你全力以赴地向虱子发起全面攻击的关键时刻，不向你报告一声就悄悄从你眼皮底下溜走。好了，别蔫得像霜打了似的。你是第一次过黄河，这在你今后的一生中，都会很有意义，要拿出全身所有的精神劲才对头哇。”

如果说，当陈刚在船上第一眼看到岸边文团长的身影时，就像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的话，那么，听了文团长这夹着笑声的一席话，他半日来心中的所有内疚与沉重顿时一扫而光，算是彻底地雨过天晴、烟消云散了。而且从团长的话中他还弄明白了一个事实，当时团长确实是在朱林尧来之前走的。这样的话，还真有点对不住朱林尧同志了。看来，这一回真得缴一支日本鬼子的三八枪送给朱林尧才是，要不然就更对不住别人了。而且是自己答应过人家的，革命战友之间不能说话不算话呀。不过，还有一件事他没有澄清，那就是团长是什么时候渡的河。他是亲眼看着作为渡河第一梯队的第4连的第一条船开动的，团长并不在上面，后来的每条船也都如此。这说明在部队开始渡河之前，团长已经提前到左岸了。具体是和侦察排的同志一起或者还要更早，对陈刚来说已经没有再澄清的必要了。

陈刚的分析没有错。文团长正是和侦察排长带的侦察小组以及第4连的尖刀班同条船渡的河，而且他是第一个下的船。这就是说，他的确是全团第一个到达左岸的。单独或孤立地来看这件事，也许并不说明太多的什么，在部队渡河这段时间内，尚不属严重的敌情背景下的行动。或许，对他来说这是一次检阅部队的最好的机会；或许，他是要借这次难得的机会，熟悉熟悉

那一张张有些已经熟悉有些还很陌生的面孔。从第718团组建，到现在的警卫第8团，已经一年多的时间了，同志们全是从各路红军部队抽调来的。一年多来，大家伴着黄河每日枕戈待旦，但是真正的战斗尚未开始。除了正常的工作调动和其他非战斗减员外，全团没有损失过一兵一卒。而这次行动就完全不同了，不仅是全团的真正的第一次战斗，而且面对的又是世界上最凶残的日本侵略者。有战斗就不可能没有牺牲。在这些经过万里长征而幸存下来的同志们中，一定会有人就要在这次战斗中永远倒下去，并且很可能不是一个而是一些，包括他自己在内。但是，除非他自己也倒下了，否则，不管倒下的同志是谁，从感情上讲都是他文年生所不能接受的。这就是战争，这就是摆在他面前的现实。或许这就是他一定要第一个到达左岸的初衷。当他看到一条条船安全靠岸，一张张面孔从他眼前不停地闪过，他内心深处便有一种极大的满足感。特别是从每一只船上第一位跳下来的同志，他都要不由自主地伸手去拉上一把，这是无声的爱的交流，胜过于言万语；这是无形的心的沟通，令他满腔的热血一阵一阵地沸腾。同时，当战士们从船上往河岸望去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团长魁梧的身影和胸有成竹的表情，心中更是充满了必胜的信念。特别是当自己的手被团长攥紧的一刹那，身上像生出了翅膀，似乎随时都能够凌空翱翔。

按序列先后，前边渡过黄河的分队，到了左岸后便按照指定的路线和尖刀班设置的路标，快速前进了。当机枪连第一批过河的同志上岸后，这时临时指挥所的队伍就要出发了，潘营长走过来提醒文团长跟大家一起走，他说：“你们先走一步，我随后就到。”说罢，仍然一动不动站在河边，望着后续分队渡河的船只在河心里划动。于是潘营长吩咐一名作战参谋带上通信班的两名战士和团长一起留下，并向他们简单交代了几句注意事项，便匆匆跟上队伍走了。

夜幕降临了。繁星点点，布满了深邃的夜空，一个个或一片片，都显得是那么遥远，那么神秘。河谷里的风似乎又强劲了许多，同时也更增加了几分寒意。当第7连连长杜本田同志最后一个从船上跳下来后，刚要以一个标准的敬礼向面前的文团长报告渡河完毕时，右手却被团长紧紧握住了。“不用报告了，快集合你们的队伍吧。”文团长嘱咐说，然后他又招呼陈刚和另外几位留下的同志，说：“我们也要出发了。”

### 柳林激战

有人说文年生指挥打仗神出鬼没，常令敌人摸不清虚实。之所以能够神出鬼没，是因为他的仗打得没有固定的格式，没有不变的规律，就像一首不押韵的自由诗，有感即发，不拘于形式；又像一首没有曲谱的歌，随口能唱，不受场合的左右。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规律。在八路军队伍里，像文年生这样指挥打仗的又何止他一人。从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二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及伟大的实践，已经哺育出了千千万万个文年生这样的指挥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再强大的敌人总有他不强大的一面或者几面，瞅准他的薄弱部位，集中优势兵力出其不意地狠狠地咬上一口。像这次他率领扼守右岸的部队主动出击到左岸，是日军绝对预想不到的。他们只想到了对方会凭藉黄河天险，拼死抵抗，所以在占将军渡之前，日军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作战准备，他们的目标就是突破黄河防线。文年生要的就是敌人这个想不到。

40公里的夜行军，对于一支善于走夜路、善于打夜仗的部队来说，本就

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而且时间比较充足。要求是第2天5时赶到宿营地点，对于最后一个渡河的第7连来说，也有足足9个小时的行军时间。事实上他们提前了两个小时便到达了。至于第一个渡河的第4连，到达宿营地点的时间是刚过零时。根据侦察来的准确情报，日军先头部队计划第2天傍晚到达柳林镇附近宿营，而我方则计划头一天22时开始行动，这中间有20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可供部队恢复体力，以便养精蓄锐。

一切都是按计划准确无误地推进。突击部队自带干粮，宿营后不埋锅造饭，尽量不惊动附近群众。各侦察小组尽可能前出，随时掌握敌人出动的方向和位置。各分队加强警戒，严密封锁我部作战企图和任何消息。

上午8时至下午5时，文年生团长带领有关人员，到柳林镇附近秘密察看地形，对照渡河前的图上作业，熟悉现场的地貌特点，记下可能成为作战地域的山梁、道路、河流、田陇及居民建筑等地形地物的准确位置。

下午7时，日军第109师团先头一个大队200多人，占据柳林镇北侧王老婆山，就地宿营。

令文年生团长和同志们感到无比欣慰的是，敌人的行动完全没有超出我们的预想，到此尚无出现令我们感到意外的情况。而且王老婆山一带正是文团长带领大家于上午重点勘察的地段，离我突击部队隐蔽地仅3公里，我们的部队随时可以就地展开。

晚8时，文年生主持召开各分队指挥员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具体的战斗方案，而后给各分队下达战斗任务。其具体的战斗布署为：文年生亲自带领第7连和机枪连两个排，于晚10时开始行动，迂回到王老婆山侧后，隐蔽接近山顶，攻占并控制制高点后，从上往下向敌人发起攻击；潘锋带领第4连、5连及机枪连两个排，负责正面进攻，于晚10时进入预定的冲击出发阵地，在文团长他们于山上打响的同时，从下往上向敌人发起攻击。

王老婆山，海拔不到200公尺。日军盘踞山的南侧，文团长率队从北侧上山，在完全没有敌情的情况下，一直到达山顶，然后从上注下接近敌人，并抢占有利地形。大约11时左右，与敌警戒接触，于是他们集中火力向敌人营地发起了猛烈攻击，日军匆忙组织抵抗。潘锋率第4连和第5连在机枪排的掩护下，勇猛地冲向敌阵。两面夹击，敌人陷入一片混乱。

对手毕竟是日军的正规师团，而且并非完全无备而来。敌人在遭到突然打击之后，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基本控制住了混乱局面，而且凭着优于我方的武器，顽强抵抗，使战斗比预想的要残酷、激烈。

整整激战了5个小时！

凌晨4时，阵地上的枪声逐渐稀疏下来后，日军从离石调出的增援部队已经接近柳林，炮声不绝于耳，炮弹落点也越来越近。文团长当机立断，立即命令正在搜索残敌和打扫战场的分队，马上按原定路线和集结地点有组织地实施撤退。正在这时，一发炮弹突然落在了附近，随着爆炸声，文团长重重地倒下了。当同志们惊呼着扑上去的时候，没想到他拍拍身上的土又站起来了。第7连杜连长赶紧上前问道：“团长，你没事吧？”文团长这时用双手把自己的头、以及耳朵、鼻子、双腿等摸了一遍，说：“好像这全身各单位都还在，大家放心，没事。”

说到这里，他突然发现陈刚不见了。他分明记得炮弹爆炸之前，陈刚就站在自己身旁嘛。他预感大事不好，急忙高喊起来：“陈刚！陈刚呢？快找陈刚在哪里！”不一会，有人喊：“报告团长，陈刚同志负伤了！”文团长

三步并作两步跨过去，抱起陈刚连声喊道：“陈刚你怎么了！陈刚你醒醒，快醒醒！”听到团长的呼唤，陈刚慢慢睁开了眼睛，吃力地问道：“团长，你还好吗？”文团长这时急忙喊来卫生员。卫生员为陈刚包扎完后告诉团长，看来陈刚伤势不轻，不过眼前没存生命危险。听了这话，文团长才松了口气。这时，潘锋派人来向团长报告，说潘营长在山下正组织第5连阻击敌人的增援，要团长和指挥所的同志赶快向黄河边转移。于是文团长叫负责背伤员的同志在前，然后带领大家向山下走去。

文团长他们赶到军渡渡口时，东方地平线上已经翻起了鱼肚白，透过河面上升起的迷朦的晨雾，已隐隐约约可以望得见右岸渡口两侧高耸的石壁和岸上宋家川的轮廓，依照那轮廓便能模模糊糊地分辨出我第6连和第8连的阵地。

负责接应的同志已经在渡口准备好了船只，先一步到达的第4连连长正组织伤员上船，整个渡口鸦雀无声，秩序井然。

目送载着伤员和部分缴获物资的船只开动以后，文团长命令各分队指挥员整理好自己的队伍，以排为单位清点每个同志手中的武器和子弹，然后在渡口附近原地休息，并随时准备继续战斗。

这时第4连连长向文团长请示：该连目前虽然减员40人，但尚有112人，而且，一部分同志手中武器已换成了新缴获敌人的三八式步枪，子弹充足，战斗力没有太大的削弱，申请留在左岸接应第5连。同时建议团长和指挥所以及其他分队的同志，尽早渡河撤到右岸。对于第4连连长的申请与建议，文团长没有及时答复。其实他心里也在考虑：敌人先头部队200余人，现已基本被我们吃掉，离石日军至此并不知道我们是右岸的河防部队，还会以为是活跃在山西境内的我八路军某一主力所为，所以他们并不一定会全力以赴向军渡方向紧逼；退一步考虑，即使敌人援军真的向军渡大举扑来，我们并非一定要被动地撤回右岸，我们完全可以凭着现有实力与敌人在左岸较大作战范围内周旋，因为左岸并不全是日军的天下，我们给它来一个一两天的游击战，仍是大有作为。既然可进可退，可打可走，文团长没有理由不显得胸有成竹。当然，让文团长如此沉着、冷静、乐观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他早就注意到了，在他们撤出王老婆山不久，敌人的炮火就停了，而且后来连柳林方向的枪声也不很激烈了，说明潘锋和第5连的同志们并没有遇到太强大的敌人。

事实再次证明了文年生判断的准确。

6时整，第5连连长廖平玉同志派一位战士回来报告，说增援的日军已被他们打退，目前离石方向没有发现新的情况，他们决定再观察一刻钟后，如果仍没有新的情况发生的话，即可组织部队按原计划往军渡方向撤退。

听完报告，文团长点了点头，表示同意第5连连长的决定。但他好像又突然发觉出了什么问题，急切地问这位战士道：“既然你是廖连长派回来的，那么你们潘营长呢？”一听问到潘营长，这位战士难过地把头低了下来。原来，潘锋带第5连从王老婆山阵地转移下来，即刻向着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方向前进，准备组织有效的阻击，就在这中间，潘营长不见了。当廖连长发现以后，一边组织部队向着敌人攻击的方向展开，一边派人去找营长。因当时天黑，加上战斗正紧张，派去的同志没有把营长找回来。听到这里，文团长没有再问什么，立即命令各分队组织渡河，然后一个人慢慢走到岸上的一个高坡，望着柳林的方向，久久地沉思着。激战后的清晨，大地显得异常的宁

静。远处的村庄里看不到炊烟升起，听不到鸡鸣牛叫，近处的田野上看不到忙碌的人群，更听不到劳动的欢笑，惟有一轮红红的太阳，默默地从地平线上在慢慢爬高，仿佛更给人心中增加一份沉重与压抑。

第5连连长廖平玉带领全连平安归来了，给文团长以几分安慰，特别是他们还带回来两名日本俘虏，更是增添了几分意外的惊喜，惹得那些等待过河的战士，纷纷围上来看希罕。据廖连长讲，本来抓了四个活的，但个个非常顽固，无论采用什么方法就是不肯跟着走，后来只好像捆猪一样把手脚全捆住，然后找来木棍，两位战士抬一个。其中有两个俘虏死也不愿就范，一路上拼命挣扎，在半道上给摔死了，所以只抬了这两个回来。文团长听罢大喜，他知道，做好俘虏工作，能起到非常重要的瓦解敌人的作用，上级首长也多次强调，各部队在战斗中一定要争取抓到日军俘虏。然而，由于日本一向重视军国主义的教育和忠于天皇的思想灌输，战场上很难让他们束手就擒。这下可好了，一下子抓了两个。他吩咐廖连长多派几个人，好好地照看，千万不要再出现意外。

潘营长没有和第5连一起回来。廖连长对团长说，撤离前他又派人去找过，仍是没有找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文年生心里如同压上了一座沉重的大山，喘不过气来。这时，指挥所的同志请他上船，他没有同意，他的目光一直注视着柳林方向。他心中还存有一线希望。渡口只剩最后一条船了，廖连长再次请他上船，他仍说：“别着急，再等一等。”话音刚落，他果然看到在远远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一个摇摇晃晃的身影。他急忙指给廖连长看，并说：“快，喊几个人跑过去看看！”

很快，跑过去接应的战士们，异口同声地欢呼起来：“营长回来了！营长回来了！”文团长兴奋得大步迎了过去。

潘锋被敌人的炮弹击伤后昏了过去，当他醒来的时候，耳边已经听不到了枪声。他自己把伤口处理了一下，然后扛上在攻打王老婆山时缴获的一挺歪把子机枪，慢慢朝军渡方向走回来了。

文团长让人把潘锋扶上船后，自己才跳到了船上，然后，随着他的一个坚定有力的手势，渡船迅速向右岸划去……

#### 誓死保卫黄河

以4个连的兵力，以较小的代价，一次歼灭200余名日军，这一胜利不仅在保卫河防的战斗中是空前的，甚至可以说在整个华北战场都是十分难得的。这一胜利，极大地鼓舞了誓与黄河共存亡的河防部队的将士们以及广大的边区抗日军民，得到了留守兵团首长以至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高度评价。

日军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企图又一次被粉碎了，但敌人的进攻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对文年生和他的战友们来说，保卫黄河的战斗还仅仅刚刚开始。

1938年8月，文年生同志升任绥德警备区副司令员，并仍兼警备第8团团长。从12月中旬开始，日军第20师团在占领山西大宁、吉县、永和等县后，扬言要进攻陕北。随即准备了大批渡河器材，分兵三路，每路1000余人，附火炮30门，向黄河岸边推进。1939年1月1日凌晨，日军占领左岸阵地以后，即用火炮、机枪向我右岸三处阵地实施猛烈射击，并以飞机10架投掷毒瓦斯弹，掩护其步兵集结登船，实行强渡。但是，我河防部队仍然采用“半渡而击”的战术，并在敌后我主力部队的支援下，使敌人三处渡河都没有成功。这次战斗共歼敌80余人。4月至5月，日军第109师团和第36师团，以1.5万人的兵力，重点进攻军渡和碛口，并于6月4日至6日，相继占据



了左岸的柳林、军渡和孟门、碛口，随后即以飞机、火炮向右岸我宋家川、枣林坪一线阵地狂轰滥炸。与此同时，日军第20师团、第37师团，也以2000人的兵力，附炮20门、飞机10余架，分两路从左岸马关头、凉水岸渡口强行渡河，但再次遭到失败。这次战斗中，我军共歼敌80余人。

1939年8月，留守兵团决定在五县河防成立警备第1旅，文年生同志任旅长，9月4日，日军第36师团3000余人，附炮30门，占领军渡，强迫群众为其修筑工事和公路，企图在此据守，待机偷袭渡河。文年生再次率警备第8团一部，渡河到左岸，迂回到敌后的柳林、离石、汾阳、平遥等地，开展游击作战，纵深达200多公里，时间两月有余，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同时，也有效地牵制了企图渡河的日军。战斗中他们还不断地壮大自己的队伍，出发时是4个建制连队，回来时是7个建制连队，战斗人员由600多人发展到1400多人。11月20日，日军独立混成第16旅以近万人的兵力，附炮30门，由离石、柳林等地，分四路合击碛口。23日占据碛口、孟门及佳县对岸的克虎寨后，一面猛烈炮击我右岸阵地，一面以2000余人集结于碛口渡口，放船漕渡。文年生指挥警备第1旅官兵在第359旅一部的支援下，对集结渡河的日军进行猛烈射击，敌人强渡失败。这次战斗，共歼敌100余人。12月12日，离石、柳林日军4000余人，附炮20门，再次进占军渡，炮击我右岸阵地。文年生再次派出侦察分队渡河，在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两侧不断袭击日军，歼敌20余人。敌人因侧背不断遭受威胁，又渡河不成，于16日从军渡撤回到柳林。

从1938年春到1939年底，日军向我陕甘宁边区的河防进攻23次，其中规模较大的有7次。敌人每次使用的兵力，少则2000余人，多则1万余人，有时还出动飞机助战。但是我河防部队全体指战员，在边区广大群众的支援下，在敌后我主力部队的配合下，英勇奋战，同敌人进行了70余次大小战斗，以伤亡160余人、中毒20人的代价，毙敌800余人，胜利地完成了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保卫黄河的光荣任务。作为在河防主力部队中，先为团长后为旅长的文年生，他血管里，早已流淌的是母亲河的血液；他的灵魂中，永远刻下了母亲河的名字……

1940年春以后，日军对我河防的进犯虽然未完全停止，还多次用飞机轰炸延安，但对陕甘宁边区的安全已形不成大的威胁。同年底，文年生同志执行党中央的命令，率领警卫第1旅转战到了关中平原，并兼任关中军分区司令员。

1943年底，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选出了王震同志等22位高级干部为生产模范，而且，毛泽东还亲笔为这22位同志分别题词，予以隆重奖励。其中，给文年生的题词是：“书赠文年生同志：生产教育二者兼顾——毛泽东”。

为了迎接抗战的最后胜利，1945年5月18日中央军委命令，继成立以王震同志为司令员的南下支队后，再成立两个南下支队，其中以警备第1旅一部编成第3支队，文年生任司令员，准备从晋西北、太岳区，渡河南征。6月18日，从延安出发。向湘粤挺进途中，到达河南新安地区时，日本投降，形势发生变化，支队转赴东北。从此，在文年生的革命履历上，又开始书写新的一页。

## 战将皮定均

青木

皮定均（1914～1976）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14年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代家岭。1928年参加农会，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担任应山县儿童团长。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南征北战，在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斗争中，英勇作战，多次立功。长征中，曾任直属中央军委领导的红军大学教导第2团团长，号召大家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作斗争，坚决主张北上与党中央会合。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29师特务团团长，太行军区第5、第7军分区司令员，豫西抗日独立支队司令员，领导抗日军民不断打击日伪军，进行反摩擦斗争，帮助当地党组织建立县政权，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第1旅旅长，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第24军副军长、军长，在中原突围中，率部克服种种困难，进入苏皖解放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8兵团军长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军长兼政治委员、福建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兰州军区司令员、福州军区司令员，曾率部入朝作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76年7月7日，在前方指挥军事演习中，不幸殉职。\* \* \*

解放战争之初，皮定均率领中原军区第1纵队第1旅在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中，英勇突围，转战千里。突围成功，“皮旅”闻名于世。“皮旅”的威名是对我军特有的牺牲精神、勇猛精神的颂扬，也是皮定均将军为中国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历史见证。

皮定均为人耿直、诚恳，性格直爽，襟怀坦白，处处从大局着想，以治军严格著称。叶飞将军称赞皮定均：“他对部队教育抓得紧，要求严；注意抓部队的作风养成，着力干部队军事素质的提高”；“特别注意抓部队的群众纪律，不论条件多么艰苦，环境多么紧张，他始终自觉地维护人民利益，绝不允许丝毫侵犯人民利益的现象存在。”这也是皮定均从一个未上过一天学的放牛娃成长为我军著名将领的一个主观原因。

### 白雀园自勉

1946年6月24日下午，皮定均旅长接到纵队司令部拍来的一份特急电报，要他同政治委员徐子荣一起迅速赶到纵队部，接受紧急任务。皮定均刚看完电报，忽然听到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抬头一看，通信员又送来了一份紧急通知。皮定均看完紧急通知，预感到一场大战的序幕就要拉开。

皮定均和徐子荣一起迅速离开旅部驻地白雀园，前往中原军区首脑机关驻地宣化店。宣化店又称“仙花店”，相传此地的“八仙花”长得色如琼玉，香飘数里，人们称之为“仙花店”，后又演变为宣化店。这座古镇地处鄂豫两省三县的边缘，与河南省的罗山、新县交界。镇的东面和西面有东大山和西大山连锁，北面与大胜关、墨斗关、九里关相邻，真是山河锁钥，中原要塞，为历代兵家所必争。史载从春秋战国到南北朝，宣化店多有拉锯战。著名军事统帅忽必烈和朱元璋在问鼎中原时，都曾经在宣化店驻兵。在中国革命史上，宣化店也占有重要地位。1929年，宣化地区成功地举行了宣化店起义，在大悟境内第一个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而今，这里成为中原我军6万雄师的指挥中心了。

皮定均赶到纵队部，向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第1纵队司令员王树声报

告。王树声司令员把几份电报递给皮定均，说：“这是中央和中原局的指示。你们先看看。”

原来，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的愿望，分别对程潜和刘峙下达密令，决定出动鄂豫皖边区外围部队，由刘峙统一指挥第5、第6绥区的部队，“严密封锁，分进合击，彻底消灭中原的共军。”刘峙根据蒋介石的密令，已经在6月20日下达了围歼中原部队的作战计划，决心以“第五、第六两绥区所属部队，分由豫南、豫东对信阳、经扶（今新县）、潢川间之共军，尤其对宣化店、泼肢河方面共军之主力，集结优势兵力，一举分区包围而歼灭之。”

中原解放区横跨平汉铁路南段两侧，在江河淮汉之间，对于贯彻“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人民解放军，是扼制华中重镇武汉，堵击国民党北运重兵、进攻解放区的前哨阵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国民党要把屯聚于西南地区的大量兵力从陆上开到内战前线，实施独占东北、南北夹击关内解放区的计划，就必然要争夺中原地区。现在，国民党军要以优势兵力围歼中原军区的主力部队，形势十分严重。

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郑位三、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等人了解到国民党军队的阴谋活动以后，于6月21日给中共中央发电报提出：“鉴于国民党军队对中原军区主力部队的包围封锁最近已愈益加强，并且不断攻占主力驻地周围各军事要点，紧缩其包围圈，形势十分严峻，我区局势已经发展到必须迅速主动突围的地步。原来决定，部队向南突围，但有长江之隔；向东突围，则国民党在津浦线上部署了强大的兵力，难于达到突围目的；从界首附近北渡黄河，又由于不能徒涉的河流比较多，危险极大；只有从豫西南向鄂中、向西突围的两条路比较安全。建议中央允许我们在本月底实施主力突围计划，即经鄂中分两个纵队，从北、南两路分别向陕南以及武当山突围，然后转至陕甘宁边区。”

23日，毛泽东主席以中央的名义复电中原局：“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要请示，以免延误时机。望团结奋斗，预祝你们胜利。”

看完电报，王树声司令员向皮定均旅长和徐子荣政委传达了中原局和中原军区的指示，命令皮定均指挥第1旅担任掩护主力向西突围的任务。司令员望着皮定均，严肃地说：“中原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决定主力突围到陕甘宁边区。为了保障主力突围时的侧后安全，决定留下一支精干坚强的部队作掩护。纵队党委经过讨论，报请军区党委批准，决定把掩护主力突围的艰巨任务交给你们第1旅。第1旅要用一切办法拖住敌人，迷惑敌人，使国民党军队在3天内找不到我军主力的行动方向。29日主力越过平汉线以后，你们再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突围方向，自行突围。”

皮定均立刻表示，第1旅坚决完成掩护主力突围的任务。皮定均感到，上级把这一艰巨的任务交给第1旅，是对自己和第1旅全体官兵的莫大信任。

司令员对皮定均率领一个旅完成掩护主力突围的任务充满信心。皮定均对豫北、豫西一带的地形比较熟悉，又有独立作战的经验，所以才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他。

夜已经深了。皮定均受领任务，马上要走。王树声司令员笑着说：“别急，你们吃了饭再走。”说话间，司令员意味深长地对皮定均说：“皮旅长，中央军委对执行掩护任务的部队十分关心，周恩来副主席指示：‘皮定均旅

掩护主力突围以后，三个去向，一是西追八路军主力，二是打游击，三是到华中苏皖解放区。’这三个方向你们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决定。”

听了司令员这番话，皮定均深深感到，这是党中央对自己的信任，掩护主力部队突围的任务十分艰巨，但非常光荣。皮定均向军区党委和首长表示：“第1旅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就是自己和全旅同志作出全部牺牲，也要拖住国民党军队，保证主力部队顺利突围。”

皮定均回到白雀园，已经是25日凌晨了。皮定均经过一番思考，已经形成了一个掩护主力突围的作战方案。他和旅党委委员们共同商定了一个掩护主力突围的详细行动方案，他们还商定了掩护任务完成以后全旅同志的突围方案。

当时，中原部队突围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从1946年6月下旬开始，国民党军队先后对各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其中以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指挥8个整编师又2个旅，约22万人，围攻中原解放区。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指挥58个旅，约46万人，进攻华东解放区。以郑州、徐州两绥区的28个旅，约25万人，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晋察冀、晋绥解放区，东北解放区，陕甘宁解放区等，都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进攻。中原解放区是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以后，新四军第5师和八路军南下支队在鄂、豫、皖、湘、赣五省交界的地区创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调集了20多个师不断包围和蚕食中原解放区。到6月份，中原解放区仅仅剩下罗山、光山、商城、经扶、礼山之间，以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不足百里的狭小地区，其面积还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中央军委考虑到中原我军已经处于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包围之下，势单力薄，难以长期坚守，于5月初指示中原军区，在情况紧急时以一部分兵力坚持在原地区开展斗争，一部分兵力向东突围，主力向西突围，转移到豫西、鄂西、陕南、川东地区活动。中央军委认为，这个地区幅员广阔，便于机动筹粮。我军在这一地区长期坚持，牵制敌人，将起到在战略上配合其他地区作战的重大作用。现在，形势变化很快，上级把掩护主力突围的任务交给第1旅，是对第1旅的莫大信任。

25日，郑位三、李先念、王震根据敌情的变化，向中央军委发电报：“突围计划推迟一天，主力将于29日晚突过平汉路。”中共中央充分估计到了中原我军突围的严重形势，当天发出电报指示中原军区，要巧妙地避开国民党军队的打击，分路突出敌人的包围圈；假如遇到严重不利的情况，则以旅为单位分散前进；留下的部队至少要有上万人，以坚持原有地区的斗争。旅这个编制单位，在这次突围中的意义更大了。然而，皮定均指挥的第1旅更不一般。主力推迟一天突过平汉路，这意味着，皮定均指挥第1旅担任掩护的任务又增加了一天。

第一纵队司令员王树声率领第2、3旅，按预定计划，从泼陂河、浒湾、砖桥等地出发，踏上了突围的征程。

皮定均想到，现在部署掩护主力突围的时间已经十分紧迫了，他和徐子荣商量以后，立即召集全旅团以上干部在白雀园举行会议。会上，皮定均旅长向大家传达了中原军区首长赋予的任务、旅制定的行动方案。他简要地对大家说：“掩护主力突围的任务十分艰巨，但是我们有信心有条件完成好。我们要以一部分兵力利用原地坚固的工事和有利地形，抗击敌人，掩护主力西进，军区主力越过平汉路以后，再向东突围，到苏皖解放区。”

皮定均还在会上进行了政治动员。多年的作战实践使他深深感到，政治

工作是我军战斗力的重要源泉。每次作战行动之前，皮定均都要把战役、战斗的政治、军事目的以及战斗中可能发生的变化向大家讲清楚，使干部战士心中有数，使部队始终保持旺盛的战斗情绪，发挥高度的战斗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皮定均组织指挥作战的一条宝贵的经验。

会议结束以后，部队立即按照预定方案进行战斗准备，白雀园角角落落又开始忙碌起来。皮定均一向对部队要求严格，掩护主力突围的战斗准备他检查得更具体、更细致。皮定均反复告诫大家，一定要做好打恶仗、打苦仗的充分准备，要以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保证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1961年，皮定均在总结组织指挥作战经验时写道：“部队的顽强战斗作风是培养出来的。要从平时的政治教育中养成部队自觉的高度的组织纪律性。要用各种方法培养部队顽强克服困难的精神，能吃得起苦，耐得劳。指挥员带头克服困难，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部队，是培养部队作风的重要方法。在管理上一定要有严格的要求，不能松松垮垮。从我的经验中证明，能够经受艰苦环境锻炼的部队，也是能够顽强作战的部队；不能吃苦的部队，则只能打胜仗，稍有挫折，情绪就很难扭过来。顽强的战斗作风是从实际磨练中培养出来的。只有指挥员用了心血培养，这种顽强作风才能带起来。”在这场战斗前夕，皮定均就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培养部队顽强的战斗作风的。

夜幕深沉。皮定均仍然没有睡意。他在思考敌人的行动，在思考部队的作战计划，在思考主力部队突围的艰难征程……。他拿出笔，在油灯下开始写日记自勉：

“现在的时局又开始紧张了。党给了任务，又是单独的。你过去单独执行任务时，思想意识上暴露了很多的毛病，而且有错误，所以就是要提醒你的注意。

根据过去的一些情况，提出下列各项，你要在任何环境、任何形势下都注意到：

1. 在最艰苦最危险的时候，你个人不要表现悲观、没有主张和无能，要充分调动出自己的智谋和胆略。
2. 到了最艰苦最困难的时候，自己应表现有办法、不悲观，一切问题都是可以克服的，是可以解决的。
3. 胜利的时候不要过分的兴奋，不要过分的高兴，要了解、想到最困难的事情。
4. 特别是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中，不应有各种不清醒的表现。
5. 有时要是有一点胜利，自己看到时，更不能忘记各种的艰苦，胜利得来不易。”

皮定均旅长在掩护主力部队突围前夕写下的日记，表现出将军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严格要求自己，勇于牺牲的崇高精神和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 智设迷惑阵

蒋介石经过周密策划，认为彻底消灭中原地区解放军的时机已经成熟，命令郑州绥区主任刘峙在河南省驻马店设立指挥所，统一指挥第5绥区和第6绥区所属8个整编师又两个旅，“按既定计划，先速歼鄂中李先念部，便尔后主力作战之利。”蒋介石还调集了驻西安和武汉的空军，配合围歼中原解放军。刘峙根据蒋介石的密令，把整编第41、第47师、整编第72师主力 and 整编第48师一个旅部署在信阳、罗山、光山、商城、经扶、黄安（今红安）一线；把整编第11、第66、第15师等部队部署在黄陂、花园、应山、广水一线，企图分路向宣化店、泼陂河合击；在襄阳、南阳等地，还部署了机动部队。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还特别加强了对平汉路广水、信阳地段的兵力

封锁，企图阻止解放军西进。

6月26日拂晓，国民党军队向黄安以西、经扶以东、孝感以北的解放军阵地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侵占了邓店、虎湾等地。一时间，大炮轰鸣，硝烟滚滚，中原大地又陷入了战火之中。从此，国民党军队挑起了全面内战。

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批准的计划，中原军区部队于26日晚开始分路突围。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郑位三率领第2纵队之第13旅、第15旅一个团、第359旅、干部旅以及中原军区机关共约1.5万人为右路突围部队，称北路军，从宣化店出发，向西北方向行动。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第1纵队司令员王树声率领第1纵队（欠第1旅）以及第15旅（欠1个团）约1万人为左路突围部队，称南路军，从光山县的波陂河出发，向西行动。皮定均和徐子荣率领第1纵队第1旅，在原地抗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掩护主力部队突围。

从此，伟大的全国解放战争的帷幕拉开了。

战斗打响以后，皮定均把一部分兵力部署在余集、沙窝一线，利用有利地形和预先构筑的阵地，抗击国民党军队优势兵力的进攻；同时指挥一部分兵力在阵地东面和西面之间穿梭佯动，迷惑国民党军队。

国民党军队凭借优势兵力兵器，占领了沙窝镇阵地。

皮定均了解了敌情和战斗进展情况以后，经过详细分析，认为敌人一定会判定中原军区主力要向西突围，西面就可能部署较多的兵力。为了造成敌人的错觉，隐蔽主力部队的突围方向，皮定均大胆采用部队在东面和西面之间佯动的疑兵之计，用第1旅的部队伪装主力来迷惑敌人。

天黑以后，皮定均命令全旅主力向西面佯动15公里。

倾盆大雨不停地下着，仿佛要阻止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行动。全旅人员都集结起来了，大家精神饱满，一面阻击敌人进攻，一面向西转移。旅直机关也离开了白雀园镇。

指战员们刚到达目的地，皮定均又命令部队向东折返，回到白雀园西南6公里的刘家冲隐蔽集结。皮定均有意让部队夜里向西，白天又向东，故意造成中原军区主力向东突围的态势，使国民党军队无法真正判定中原军区部队的突围意图，同时把敌人的主力部队吸引到自己身边来，准备以自己的最大牺牲来掩护主力向西突围。

在第1旅的严密掩护下，26日午夜，中原局、中原军区领导机关和警卫部队悄悄地撤离了宣化店，踏上了突围的征程。

国民党军队果然上了皮守均设置的圈套，以为中原军区主力要向东突围，开始把一部分兵力放置在东面。

27日，刘峙对国民党军队的部署进行了调整。整编第15、第66师在夏店、阳平口、大新店、三里城、仙人崖、东双河一线对中原军区的部队加强包围封锁，主力分别配置在铁路线和铁路以东的要点上，堵击解放军向东突围；整编第75师暂时停止对铁路以西地域的“清剿”，其主力必须在30日前到达广水集结待命；整编第72师以一个团的兵力控制河口镇附近，机动待命。

为了揭露国民党军队对中原军区解放军的进攻，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电报给周恩来，指出：国民党军队已于26日对我中原部队实行攻击，“我中原部队不得不起而自卫。这一自卫斗争是否能不受严重损失，现尚不能预计。请对外广泛揭露国民党之阴谋。”

这一天，第1旅同敌人打得异常激烈，第一线的几个阵地先后都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考虑到部队已经开始突围，皮定均第1旅的指战员们边战边退。

28日清晨，皮定均率领第1旅的指战员们从刘家冲出发，继续伪装成中原军区的主力部队，大摇大摆地向南面前进。

部队前进到九龙山地区时，前卫遇到了国民党军队一个连的阻击。皮定均当机立断，命令坚决歼灭该敌，然后向国民党整编第72师的背后前进。

在第1旅的掩护下，王树声率领的南路军突围进展顺利，他们在阳平口东北的汪洋店附近与第2纵队第15旅旅直和第433团会合，继续向西挺进。李先念、郑位三也向中共中央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发出电报，告知北路军主力将全部于29日西突平汉线，向豫西南前进。

中共中央十分关心中原军区的突围情况，在28日向各中央分局发出了《关于时局的通报》，介绍了中原军区部队在国民党重兵的围攻下被迫突围、正在为生存而战斗的情况；分析了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政治腐败、经济崩溃、人心丧尽的虚弱本质；指出了我军作战能力提高、根据地巩固等许多优势，激励全军将士为胜利而斗争。这对中原军区的突围部队是最有力的支持。

经过数天战斗，刘峙开始觉察到中原军区主力正在向西突围，立即命令东面的部队调头向西追击，并要求各部队“严密包围、封锁、监视、搜索，不得使其逃去”。刘峙还告知所属部队，“共军如继续西进，各部队应组织跟踪、堵击，务必在平汉铁路东予以歼灭之”。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派驻中原军区的第32执行小组美方代表怀德中校也提出要求，要求在宣化店会见李先念将军。对此，中国共产党方面的代表策略地说：“李先念将军身体欠佳，改日再行会见。”

国民党军队的行动遭到了皮定均指挥的第1旅的顽强阻击。那一天，第1旅的处境是非常艰难的。在优势敌人的不断围攻下，皮定均沉着指挥，率领指战员们在崎岖的道路上行进。路太窄了，有的地段全是羊肠小道，只有步兵可以勉强通过，其他兵种通行就很困难了。经过一天的作战行动，第1旅前进50多里，傍晚，旅部和直属队在田铺宿营。

枪声暂时停止了。夜是平静的。皮定均在思考下一步的作战方案，在总结数天掩护突围的情况。他在日记中写道：“在行动中困难很多，特别是粮食、房屋都很困难，有的没有吃饭，有的没有房子住。天气很炎热，山是很大的，大家表现特别疲劳。我们的干部战士自宣布和平以来在砖桥、白雀园过了半年的‘资本家’生活，故这苦斗一关是很难受的，在有些地方是受不了的。”

#### 突破合围圈

29日，皮定均旅长一早就来到阵地上，检查部队的战斗准备情况。这一天，主力部队将越过平汉路，突出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也是这一天，第1旅将转入自行突围的艰巨任务。将军明白，征程将越来越艰难。他暗暗告诫自己：中原军区规定我们要在29日才能突围，一定要坚持，要把全军几万人的安全放在我们的身上。为了完成党所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必须坚持到29日。

这天，李先念司令员和郑位三政治委员率领部队到达平汉路周的周家塘埂以后，决走由第13旅第37团担任突破任务，并由第2纵队副司令员周志坚率领该团的营以上干部，现地察看地形，选走越过平汉路的突破口。黄昏，

第 37 团经过充分准备，向国民党军平汉路守敌发起猛烈进攻，夺取了柳林、黄庄、何家店等阵地。中原局、中原军区首脑机关和大部队在第 37 团的掩护下，在信阳以南的李家寨和柳林车站之间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越过了平汉路。国民党军发现中原军区部队的主力以后，丧心病狂，急忙调动整编第 3、第 41、第 47 师以及位于陕南地区的第 1 战区之整编第 90、第 1、第 76、第 36 师各一部，从不同方向尾追、堵截解放军，在天河口、苍苔地区、南阳以西、丹江以东等地，多次组织兵力大规模截击、合围解放军，但是，敌人的企图破灭了，李先念、郑位三率领部队昼夜兼程急行军，终于冲破了国民党军队的重重追堵，胜利地到达陕南的商县。

王树声率领的南路突围部队前进到阳平口地区时，突然遭到国民党整编第 66 师第 185 旅的阻击。激烈的战斗进行数小时以后，纵队指挥员果断决定。甩开在前方阻击的国民党军，部队向南绕道 45 公里，从花园到光水之间的王家店地段越过平汉路。

为了揭露国民党军的阴谋，这天下午，中原军区代表在宣化店设宴招待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派驻中原军区的第 32 执行小组全体成员。宴会上，中原军区代表郑重宣布：“国民党军向我发动进攻，李先念将军已经率领中原军区部队突围。”

国民党军队围歼中原军区主力的梦想落空以后，对皮定均部的进攻加强了。其中整编第 72 师新 13 旅、第 34 旅各一部，分别从 4 个方向对皮定均指挥的第 1 旅发起了攻击。第 1 旅处于国民党军队的围攻之下。

皮定均早已料到了敌人的阴谋。主力部队越过平汉路，第 1 旅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跳出敌人优势兵力的包围圈，千方百计保存这支革命的队伍。皮定均和旅党委的同志根据周恩来的三条指示，又综合了各方面掌握的情况，决定向东突围，到苏皖解放区，同华中的兄弟部队会师。向东，这是困难最大的突围方向。皮定均和旅党委的同志们十分清楚，东面有超过自己十倍以上的国民党军队和无数道封锁线，且山高路险，但是，这条路线同主力部队突围的方向背道而驰，向东突围，可以减轻主力部队西进的压力。

在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围困之下，皮定均时时想到了全局利益。他认为：“指挥员要有全局观点，不能因小利而贻误大局”；“对于一个战役指挥员来说，全局观点则更为重要。”

为了麻痹敌人，顺利突围，皮定均等人决定，先向西南的田铺行进，跳出国民党军队的第一道包围圈，然后再向东，从白雀园正南方向突围，进入大别山主脉，彻底跳出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

当第 1 旅西进时，国民党军队真的以为皮定均这个旅要从西面突出包围圈，就拼命追赶。刘峙认为，既然没有围住中原军区主力，也要消灭皮定均这个旅，这样也好向蒋介石交待。

然而，反动军队的梦想又一次落空了。

皮定均指挥第 1 旅行进至张家店时，激战了数小时，消灭了一部分敌人，把当地一个伪乡公所也解决了。指战员们抓到 20 多名俘虏，还缴获了不少子弹。

当第 1 旅到达田铺以后，皮定均指挥 5000 健儿，在国民党军队空隙中的一个山林里隐蔽起来，躲避了国民党军队的追击以后，突然向东急转 90 度，在黄土岗、福田河之间突破了国民党军潢（川）麻（城）公路的封锁线。

这次行军时，皮定均命令部队不准抽烟，不准生火做饭，连咳嗽也要闷



在手心里。皮定均和大家一起，以惊人的毅力和严格的纪律在同优势敌人作斗争。

部队行程 50 多里，到达王家冲后，皮定均命令部队就地宿营。

皮定均同副旅长方晋升一起，在王家冲一条河边的一颗大树下露宿。

皮有功，少进中

第 1 旅的行动有力地掩护了中原军区主力的突围。30 日，李先念、郑位三率领的北路军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以后，进入信阳、应山一带的四望山地区，继续向西挺进。中原局、中原军区和第 2 纵队机关前进到信阳西南的大庙畈、平靖关。王树声率领的南路军第 1 纵队主力和第 2 纵队第 15 旅第 43 团等部队，也于同日傍晚进至孝感、王家店以东的地区，分路向王家店到卫家店之间的铁路沿线挺进。国民党军 30 万兵力围攻中原军区主力的阴谋基本失败。

掩护主力突围的任务完成以后，皮定均率领第 1 旅，开始向大别山腹地挺进。这也是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在皮定均面前，不仅有国民党军队的堵截，还有险恶的地理环境，要到苏皖解放区，还要走 1000 多公里的路程。皮定均心想，不仅要把这支部队带到根据地，还要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把部队带好。艰苦的战争实践使皮定均体会到，“要打好仗，首先要带好部队。只有把部队带好了，使用时才能得心应手，运用自如。指挥员的模范行动，对部队的影响很大。”皮定均自己就是以身作则的模范。早在红军时期，每当部队行军时，皮定均总是吃苦在前，他肩上不是背着两支枪，就是扛着机关枪。一遇敌情，他总是带头冲锋；有时遇到严重的战斗情况，他往往是以自己勇敢、沉着、顽强的行动来影响战士，取得作战的胜利。战士们也从无数次的亲身体验中，感到自己的指挥员办事说话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官兵关系密切，战士对自己的指挥员的无限信任，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由于皮定均重视带好部队，使第 1 旅的战斗力的不断提高，全旅上下对战胜艰难困苦满怀信心。

根据任务的变化，皮定均和旅党委的同志对全体指战员又进行了动员，要求大家准备继续吃大苦，耐大劳，准备作出更多的牺牲；前面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部队一定要打出去，要到解放区同兄弟部队会师。皮定均对大家说：现在我们的部队在数量上同敌人相比，是一对比十，但自古以来讲究兵贵神速，兵在精而不在多。我们这支部队的战斗力是敌人怎么也比不过的，这就是我们的长处。我们要像一把“刀子”一样从敌人的心脏里穿过去。

皮定均要求部队进行一次轻装，把炊事担子、公文箱子都轻装掉，把走肿蹄子的骡马也留给乡亲们。经过轻装，全旅每个战士除了武器装备和带一点干粮以外，只有一身单衣，人人能走能跑，能打能拼，机动灵活，提高了战斗力。

这一带曾经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活动的中心地区，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消灭红军游击队，大肆枪杀这一地区的老百姓，抢劫牲畜、粮食，烧毁房屋，制造了所谓的“无人区”。至今还留有反动派罪恶累累的痕迹。

皮定均率领部队到达商城县境内的瓦西坪地区时，部队刚放下行李，开始埋锅做饭，突然响起了一阵激烈的枪声。皮定均一听，立即要旅部的同志去查明情况。

原来，第 1 旅的后方机关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袭击，国民党军第 34 旅第 101 团 1 个营和立煌县（今金寨县）保安团、商城县保安团也对第 1 旅进行

堵截。皮定均果断指挥第1团和旅直警卫团就地抗击。不久，皮定均又命令部队采用小群突击的战法，向敌人发起冲击，很快粉碎了敌人的围堵，保证旅主力继续安全地前进。

这一天，皮定均和指战员们一起行军50多里，在熊郭畈周围地区宿营。

7月的第一天，皮定均率领全旅指战员开始翻越鄂豫皖三省交界处的大牛山。大牛山，又名九峰尖，是著名山脉大别山的主峰。这是第1旅自从抗战以来翻越的第一座高峰。部队翻山越岭，虽然走过的行程不算多，但人却非常疲劳。皮定均同大家一样，很少翻越大牛山这样的高峰，连日作战，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围困，现在又翻过山峰，他感到很疲劳。

在艰苦的战斗环境中，皮定均没有忘记7月1日这个特殊的日子。皮定均在日记中写道：“我们住宿肖家畈一带地区，这天的行动是我军最艰难的。用这艰难的行动纪念党的生日。”

7月2日，皮定均率领第1旅行程50多里，越过大牛山，进入安徽省立煌县（今金寨县）境内。这个县是皮定均和副旅长方晋升的故乡，1914年，皮定均就出生在该县的代家岭一个贫苦的家庭。今天，皮定均同全旅指战员们一起来到故乡，很是高兴。他又见到了参加革命的老地方，见到了离别16年的故乡。他多么想回家看望自己的亲人。可是，一想到数千名与自己生死与共的指战员，他就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回家的念头。

皮定均对副旅长方晋升说：古有大禹治水，解救人民疾苦，三过家门而不入，亲人们并没有怪罪他。今天我们打敌人，是为人民夺江山，过门不入，家乡的亲人们也是会理解的。革命胜利了，我们一起回来，多住些日子。

方晋升副旅长笑着说：革命很快就要胜利了。

部队在棱子祠堂地域宿营以后，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收购粮食。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解决粮食问题成为部队的一项主要任务。

这一天，中央军委发电报给郑位三和李先念，通报了当时的全局情况。中央军委特别指出，中原军区部队突围具有充分的理由，中央正在向全国作广泛的宣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

3日，皮定均同指战员们一起到了吴家店。

皮定均想到，现在第1旅已经完成了中原军区党委所赋予的掩护主力突围的光荣任务，部队还通过了很危险的“清区”，完成了第一步的突围任务，没有遭受其他任何损失，他脸上浮出了几丝胜利的微笑。

皮定均想起了老母亲，他不能离开部队，不能回家，就派人给母亲送去一封信，以免老人家挂念。皮定均曾在数天后的日记中写道：

“此地离我家只有几十华里，一天的路程是不多的，我就在此地生长起来的，我是牧童出身，十四岁前成天到各个山野去放牛，很自在的，在各地游玩。今天我回到此

地，是非常不自在的，也是很不自在的，很多的道理我说不出来，到了最后时我才想到是因为今天我在革命。我过去是抗日的战士，我为中华民族服务，所以我不能很自在的。就是因为我们所带的军队同国民党的军队是有区别的，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他们是资产阶级个人独裁的军队，故他就要限制到我们的自由，我们的行动对资产阶级是不利的，故他们不能让我们自由。我的母亲，我的房屋，我的放牛场，你们都应当很自在的生存我们的土地上吧，等着我们完成中国的阶级斗争的任务时，来解放你们吧，再来换取你们的自由、你们的幸福吧。我个人相信为时是不会长久的。”

今天我们看到皮定均在战火中留下的这篇日记，仍然很受教育。

在吴家店，部队的粮食问题基本解决，已经饿了数天肚子的指战员们又吃上了米饭，大家笑逐颜开，像过节似的。全旅的一项重大困难解决了，皮定均心里也踏实多了。

考虑到部队连续作战，十分疲劳，皮定均和徐子荣等人商量决定，部队在吴家店休整3天，以便进一步做好下一步突围的准备工作。

中原局十分关心第1旅完成掩护主力部队突围任务以后的处境。4日，中原局向新四军军部和中央通报了第1纵队第1旅已经全部抵达立煌县东北吴家店的情况，并且指出：数天来，第1旅都在同你们联系，但是没有联系上，请你们要求电台注意同第1旅进行联系。为了使第1旅能够顺利突围，中原局还要求新四军军部把第1旅前进方向上的敌情和我方兵力部署等有关情况及时告诉第1旅。

第1旅进驻吴家店以后，皮定均在驻地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会，检查、总结前一段掩护主力突围的作战行动，研究部署下一步的突围任务。

连续数天的作战，指战员们十分疲劳，部队各方面的消耗也很大。休整时，不仅要给鞋子、干粮等行军作战的必需品作好准备，还要安排好伤病号。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尽管突围的任务非常艰巨，但许多伤病员都要求随部队行动，皮定均和其他干部们做了许多很细致的思想工作，才把一些行动不方便的同志留在老百姓家里休养。

第2天，各部队陆续向皮定均报告，已经按上级的要求做好行军前的准备工作，战士们鞋子都有一双，草鞋都有两双，粮食已经准备了够吃5天的。皮定均得知，微微点头，他心里想：只有充分做好准备，我们才能完成东进任务。

国民党军队为了追歼向东挺进的皮定均旅，在7月5日重新调整了部署，整编第48师命令：第174旅从泼陂河向立煌县开进，第176旅所属第527团开往南庄畈，独立第4团开往枣子河，第528团以及保安第2团留在立煌县附近“清剿”，独立第5团开往岳西方向进行作战。国民党军费尽心机，千方百计要消灭皮定均指挥的这支部队。

自从在吴家店休整以来，皮定均催促机关的同志设法与上级联系，希望得到上级的指示。几天过去了，第1旅还是没有同上级联系上。皮定均心情沉重，他在7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这两天沉闷的工作，也是很繁重的”；“我的一切准备都完了，只有一面行动，一面等着上级的指示，所以明天要继续前进，应当做这样的思想准备。此地不是我们练兵的场所，我们不能在此多休息了，还是向着我们家园前进，去找我们的祖母上级吧。”

7月7日，皮定均率领部队离开吴家店，顺着漫水河、黄林庙，向霍山方向继续东进。部队行程30多里，到叶家畈时，天色已晚，皮定均命令部队就地宿营。

第1旅东进的行程是很紧张的。8日，皮定均和指战员们翻过了三座高高的山峰。当时天气很热，特别是中午，在热浪的袭击下，战士们全身上下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但是，皮定均没有让部队停留，一口气翻过了大山。来到湖北省英山县和安徽省霍山县交界的地段，皮定均才命令部队利用地形宿营。

这一地带，皮定均是很熟悉的。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皮定均就经常在英山一带开展革命活动，西界岭上，洒下了皮定均为革命而辛勤奔波的汗

水。今天，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皮定均又来到西界岭，不禁思绪万千。部队宿营以后，皮定均坐在铺上写日记：“西界岭是我们红军过去的战场，它也给了革命战士很多的贡献。在这个战场上红军流了很多血，是我们革命园地之一。它同我们离别十六年了，没有想到今天还会在此又举起机关枪和刺刀，赶走阻挡我们行动的敌人。这个界岭是我们必经之地，战士们为要完成光荣任务，它今天又变成我们的西界岭了。”

9日，皮定均同大家一起翻越西阳山，来到千笠寺。

皮定均在地图上看到千笠寺这个地名时，以为是一个很大的寺庙。过了西阳山，看见一条河边上有个小小的盆地，盆地的四周都是山，中间有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就叫千笠寺镇。来到镇上，皮定均看见道路两旁有几家饭铺和杂货铺，街上冷清清的，没有多少行人来往。走出镇外时，才看到有一座古庙，据当地人讲，这座古庙就叫千笠寺。皮定均来到古庙前，只见山门上写着一副对联，他看着对联，轻轻念出声来：“漫水飘来千笠寺，春风吹去万人愁。”

突然间，前方传来一阵激烈的炮火声。皮定均对身边的一个人说：“快去看看，发生了什么情况。”

原来，先遣部队正在前进方向上同阻击第1旅的国民党军队战斗，而且四周没有其他道路了。听到这一阵阵枪炮声，皮定均开始有几分焦急了，这里四面都是山，为了开辟前进道路，第1旅只有赶走国民党军队，坚决消灭前方的敌人，才能回到根据地。皮定均看了看前方的硝烟，果断命令：第2团快速行动，坚决消灭前进道路上的国民党军队。

为了随时能够处置意外情况，做好翻越青枫岭的准备，皮定均决定跟随第2团行动。

这一天，第2团同国民党军队发生了两次战斗，直到夜晚10点左右，才把前方阻击的敌人击退。边打边走，影响了部队的行军速度。当部队来到一条黄沙滚滚的河边时，夜已经深了。这条河河水很深，人员不容易徒涉。皮定均看了看周围黑压压的山峰，手一挥，用非常坚决的口气命令：立即渡河。

前方是著名的青枫岭。为了阻击向东突围的皮定均旅，国民党第8绥区指挥部急忙调安徽省挺进纵队第2团从霍山县赶到青枫岭，企图凭借青枫岭的有利地形防堵中原军区的部队。当第1旅担任先遣任务的第2团来到青枫岭前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阻击。

面对严重的形势，第2团派出了4个连的兵力，一部分从正面强攻，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一部分从侧翼迂回，夹击敌人，终于把这股敌人击溃。这一仗，第1旅一共毙伤国民党军官兵200多人，还抓到10名俘虏。

11日，第1旅抵达磨子潭。磨子潭位于淠河的西岸，由于连日暴雨，潭水很深。皮定均和大家研究决定，连夜抢渡淠河。傍晚，国民党整编第48师的一部分兵力赶到磨子潭，阻击第1旅。第1旅第2团虽然占领了磨子潭东山，但是没有及时发现来袭的国民党军队，以致被敌人控制了渡河的要点。在紧急情况下，已经过河的第1旅第3团同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刹时间，磨子潭旁枪声炮声异常激烈。第2团抓住机会抢渡时，由于河水太急，十多人被水冲走。

在第3团的有力掩护下，第1旅其余部队在12日上午顺利地渡过了淠河。但是，在河东掩护渡河的第3团第1营第3连却与主力失去了联系。数日后，这支部队与独立第2旅第5团会合，留在大别山地区打游击。

夺占青枫岭，抢渡磨子潭，皮定均根据敌情的变化，正确决策，果断指挥，抓住了部队突围的有利时机。十多年以后，皮定均在回顾指挥这次作战时，深有体会地说：“定下决心前必须反复推敲；决心定下以后，切忌听了片面意见轻率改变自己的决心。一个正确决心的形成，是在党委的集体领导下，吸取了多方面的正确意见的结果。但贯彻决心必须在同级党委中形成坚强的核心，也就是说在同级党委中必须有几个同志对决心具有共同的深切理解，遇到困难情况能给以有力的支持。虽然有时只有一两句话，对决心的实现却具有极其重大的影响。如中原突围，先头团渡河占领了磨子潭东山，由于警戒疏忽，控制渡河的要点被敌袭占了，又逢暴雨，河水陡涨，全旅被分割在河的两岸，主力不渡河则先头团有被歼的危险，后有追兵，情况很危险。同级党委同志虽只有几句话，但对实现坚决渡河的决心是一个极大的鼓励。这次战斗所以能挽救危局，与决心得到支持关系甚大。”

13日，第1旅到达毛坦厂，先遣部队歼灭了驻守毛坦厂的国民党民团20多人。

毛坦厂是大别山东麓的一个出口。部队宿营以后，皮定均召集党委成员开紧急会议，会上决定，第1旅必须连续5昼夜急行军，赶在国民党军队调整部署以前，横跨皖中平原。会议结束以后，皮定均和徐子荣分头对部队进行动员，要求大家继续发扬英勇顽强、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咬紧牙关，以坚决、神速的行动夺取突围的最后胜利。

部队在皖中平原行动，目标较大。皮定均特别强调，要隐蔽行动企图，要同敌人斗智斗勇。

强行军开始了。第3团的前卫部队接近官亭镇时，指战员们巧妙地换上了国民党军队的服装，化装成一支国民党军队，大摇大摆地走进官亭镇，把当地的数百名国民党地方军官兵俘虏了。控制官亭镇这个要点以后，皮定均指挥第1旅顺利地通过了六（安）合（肥）公路。

16日，担任前卫任务的第1团第9连也采用化装成国民党军队的办法，奇袭吴山庙，轻而易举地消灭了国民党的一个保安队。这些胜利，都同隐蔽部队的行动企图有关。多年以后，皮定均曾经指出：“善于隐蔽自己的企图是取胜的关键。决心定下后，行动的过程越短越好。而隐蔽自己的企图又是艰苦细致的工作。”

皮定均率领部队到达吴山庙以后，淮南区党委派出的联络员及时同第1旅取得了联系。

17日，皮定均率领第1旅从下塘集越过淮南路，把急匆匆赶来堵击的国民党军第138旅的一个团甩掉了，顺利进入定远地区。

19日中午，第1旅到达红心铺。皮定均同旅党委委员们来到红心铺附近的一片松树林里，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全旅必须在天亮以前从明光、管店之间突过津浦路。任务刚布置完毕，敌情发生了变化。皮定均得知国民党第8绥区已经命令第7军第172师第514、515团各两个营，同整编第48师第138旅一起，在明光、滁县之间地域堵击第1旅。国民党军队还把侵华日军遗留下来的用于封锁新四军的护路碉堡、壕沟等工事重新修整，派遣部队严密把守，妄图在津浦路上把皮定均这个旅先卡住，再“吃掉”。

根据敌情的变化，皮定均和徐子荣等人研究决定，部队改变突围方向，从张八岭以北的石门山附近越过津浦铁路。皮定均还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会，部署新的行动，并决定由第2团派出两个连掩护旅主力，全旅其他部队分成

两个行军纵队，快速向津浦路挺进。

20日凌晨，皮定均和指战员们到达津浦路边。对于过津浦路，皮定均早有准备。皮定均在淮南区党委派遣的联络员的帮助下，根据已经掌握的国民党军队在津浦路上部署兵力的情况，果断指挥部队在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的石门山附近越过铁路。当旅直和第2团、第3团悄悄地越过津浦路后，天已经大亮了。第1团越过铁路时，被国民党军第138旅第414团巡逻的装甲列车发现，敌人立即以猛烈的火力阻击解放军过路。明光、管店、滁县的国民党军队得知以后，也迅速赶来增援，皮定均这个旅面临着五路敌人的攻击。

铁路两旁，一场激烈的战斗进行着。皮定均带领先头部队占领了铁路旁的制高点，新四军淮南大队及时进行支援，经过3个小时的激战，终于把敌人的装甲火车击溃了，第1旅全部越过了津浦路，同淮南军区嘉山支队胜利会师。

突围成功了。皮定均和战友们经过24天的艰苦战斗，横穿豫、鄂、皖三个省，行程750多里，斩关夺隘，终于胜利地到达了苏皖解放区。这天晚上，皮定均和战友们一起在盱眙县的仇集、梅花岗地域宿营，受到解放区人民的热烈欢迎。突围前，皮定均这个旅有精兵5000余人，突围成功以后，该旅还是5000精兵。这不仅使蒋介石企图把皮定均这个旅在大别山区吃掉的妄想彻底破灭，也是突围战史上的一个奇迹。

这是一个来之不易的胜利。华中军区的领导见到皮定均，兴奋地说：“你们从敌人子弹堆里打出来，真是大喜事，大喜事！”22日，华中军区领导人给中共中央打电报，报告第1旅已于20日越过津浦路，安全抵达淮南津浦路以东地区，已令淮南军区慰劳，并解决其物资困难。

《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指出：皮定均旅突围成功“这一令人兴奋的消息，证明了人民军队是不可战胜的力量”；“这一消息给予面临严重斗争的苏皖解放区军民以莫大的鼓舞。”

著名美国新闻记者史沫特莱得知皮定均指挥全旅数千名指战员如铁流一般长途突围，惊讶地说：“你们的奇迹，我一定要告诉全世界人民。”

1955年春天，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评定军衔。一天，毛泽东主席在审阅首批即将授予少将军衔人员的名单时，目光在“皮定均”三个字上停留了片刻，即挥笔写下六个醒目的大字：“皮有功，少晋中”。皮定均幸荣地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批中将。

毛泽东很赏识皮定均在中原突围中的勇敢精神和功绩。1969年，皮定均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当76岁高龄的毛泽东主席看见皮定均时，眼前仿佛浮现出皮定均指挥第1旅突破国民党军重兵围困的英雄壮举。毛泽东深切地注视着皮定均，说：“你们中原突围时留下来的同志也不多了吧？如果怕苦怕死，革命是搞不出名堂来的，就要有像你们中原突围那样冲锋陷阵的革命精神！”

#### 奇袭“王牌”师

皮定均率领第1旅突围到苏中以后，上级决定把这个旅的建制归属新四军华中军区、即华中野战军的序列，命名为第13旅。1947年1月上旬，皮定均离开第13旅，到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工作。朝夕相处的战友之情，特别是中原突围中结下的深厚情谊，使皮定均恋恋不舍第13旅的战友们，在1月4日的日记中，皮定均深情地写道：

“我在十三旅有四年的历史了，我们有很多的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这次离别的确有些难受的地方。我们在一起的长期斗争和长期的生活中熟悉了，离开时，内心里感到很难受。

这次我们的离别同过去是不同的。过去我调到各地工作时都是跟着部队一起行动，地区也是不会变动的，走到各地人事都较熟悉。工作的范围不大。这次的区别是我不但工作变动，而且地区人事也都变了。

今天我同他们分开了，我是很孤单的，在某地方休息了一夜晚，仔细想起来好象没有娘的孩子，心里不是滋味。我想到我的一生，为什么会受到这样多的苦呢。是的，我这一生的苦确实是很少有的。我又想到将来对待其他的同志时，我更要注意到我的一切感受，认真热情地对待他人。”

1月6日，皮定均到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任职。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发  
展，皮定均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但是，皮定均依然严格要求自己，时刻  
不忘学习。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今天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上级党和各位首长、各位同志都给了我很多的鼓励，要我把事办好。这的确是我有些负不了的责任，特别是我各方面的能力不够，使我很担心。根据我现在的情形，就是要很好的学习也很难补上我目前的缺点，再加上自己不太聪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能补上。现在的学习是赶不上各种的需要了这点是我个人要注意的。

在我本人来说，主要是很好的向上级、向同级、向下级、向民众多方面学习，多研究，才能在工作中弥补我的缺点。

个人要虚心，只要在工作中发现了优点，要研究优点的原因；发现了缺点时，要找到缺点的规律出来。凡是值得学习的地方都要学习，这是很重要的。其他同志中有很多好的地方，我应当向人家好的地方学习。

目前重点是要多了解情况。凡事都要事先知道具体的准确的情况才能开始下决心，定工作方向，不要心急口快。”

解放战争开始后，我军经过4个月的作战，战争形势开始出现了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明显变化，国民党军队深入解放区以后，占领的地方和城市愈多，战线拉的愈长，能够机动的兵力就愈少，兵力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由于战场上连打败仗，国民党军队的士气日益低落。解放军采用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战略战术。主动放弃了一些地方和城市以后，战线缩短，兵力逐步集中，用缴获国民党军队的大量武器装备改善了自己的装备，野战兵团得到进一步充实和加强，部队的战斗力显著提高。

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党中央在《三个月总结》中指出：今后数月的关键仍然是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此，全军必须进一步贯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实行“紧张的动员和精心计划的作战，从根本上转变军事形势。”1946年11月4日，《解放日报》发表《论战局》的社论指出：战局的发展“犹如爬山到了过山顶的时候”，解放区全体军民必须团结一致，努力奋斗，翻过当前的山顶，争取反攻的到来。在“过山顶”的作战行动中，皮定均与战友们一起英勇奋战，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皮定均到第6纵队时，华东我军正在进行鲁南战役。当时，陈诚指挥国民党军23个整编师正在向鲁南进犯，企图迫使华东野战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

“鲁南决战”。为了配合这次作战行动，国民党反动派使用了大量重型轰炸机对解放军控制的鲁南城镇和他们设想的解放军集结地域进行了“战略轰炸”；与此同时，国民党军还以大量野马式战斗机对我军进行战斗轰炸和侦察。解放军当时没有专门的防空武器，一旦敌机来袭，部队的行军和作战行动就要受到影响。1947年1月7日，皮定均同指战员们一起行军时，就受到了国民党军飞机的骚扰。

听到敌机的轰鸣声，部队很快采取了隐蔽行动。那时候，敌机对我军的行动带来了许多限制，部队只有分多路纵队行进，才能按时完成战斗任务。皮定均昂首仰望敌机，心中感慨万千。皮定均想到，运动战要求部队动作要快，要迅速。在敌机对我军的行动进行骚扰前，我军应进行详细周到的各种地形的调查工作，以减少我军行动中的疲劳和痛苦。皮定均提出，在我军目前行动的地区，应着重了解道路情况，在必要的情况下，没有道路的地方我们应该判定行动方向，架设桥梁。这样做不仅可以提高部队行军的速度，还能使我们的部队得到很大的锻炼。

华东我军完成鲁南战役的准备工作以后，于1947年1月2日夜对国民党军整编第26师突然发起攻击。第二天夜晚，解放军连续攻克了马家庄、太子堂、卞庄等地，歼灭国民党军一部。激烈的战斗进行到4日下午，解放军将全副美械装备的整编第26师以及第1快速纵队基本歼灭，第1快速纵队曾被国民党誉为“国军精华”，现在除少量逃到峄县外，都被我军歼灭了。首战告捷，解放军乘胜打击。9日晚，我军第8、第9师及滨海警备旅在炮兵群的有力支援下，对峄县的国民党守军发起猛攻，至11日拂晓，解放军攻克峄县县城，将守敌国民党军第51师一个旅、第52师一个团以及第26师、第1快速纵队残部等全部歼灭，第26师中将师长马励武也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皮定均得知我军抓住国民党军队的弱点，利用解放区的有利条件隐蔽运动部队，以灵活多样的手段痛痛快快地歼灭国民党军队时，非常高兴。他在1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

数日来我对鲁南的了解是非常简单的，就是胜利而已，这是我主观了解得不够。我在本日晚把一月的报纸全部看过后才了解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是对国内外都有很大震动的，这次战斗在军事上政治上的意义是很大的，表现在：

在我们这方面来说是很重大的。在四十三小时内歼灭蒋军嫡系一个师，一个快速纵队，不是一件小事。敌人全是美械装备，是蒋的嫡系，这表现了我军的力量是任何敌人不能阻挡的，表现了我们战斗力的加强；另一方面，我们的技术的确提高了。也表现了我们高技术指挥员战略指挥上的英明。这样的战争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这都是我军的进步和伟大。

在敌人方面来说，的确证明了敌人的虚弱。兵力上是够用的，内部政治情绪不稳，官兵开始动摇了，国民党军队的最好的装备和他的最优良的武器也不能阻挡住我们的冲锋。”

解放战争发展到1947年3月，蒋介石遭到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被迫放弃全面进攻，在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战场上转入守势，对山东和陕北两个战场实施重点进攻。为此，国民党军在陕北、山东两个解放区集中了94个旅，占进攻解放区总兵力的43%。在黄河的风陵渡到济南约1000公里的正面上，筑起了所谓的“黄河防线”，企图阻止晋冀鲁豫的解放军支援山



东战场。

这时，人民解放军已经发展到 168 万人，逐步组建了炮兵、工兵等特种部队，攻坚能力和战斗保障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中央军委要求山东的解放军诱敌深入，再集中优势兵力，抓住战机，逐批歼灭进犯之敌。华东野战军及时总结莱芜战役的经验，不仅大规模地开展练技术、练战术运动，还运用诉苦教育、团结互助运动和立功运动等开展政治工作的“三把钥匙”，鼓舞部队的斗志。4 月中旬，当国民党军主力向新泰、蒙阴一线发起进攻时，人民解放军先集中了 3 个纵队的兵力歼灭了国民党泰安守军整编第 72 师主力，又集中 4 个纵队的兵力歼灭国民党军第 83 师一部，先后歼灭国民党军 2.8 万多人，但国民党军队却找不到华东野战军的主力。

皮定均十分关注战争形势的发展，预见到人民解放军很快会取得“惊人的胜利”。在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前夕，皮定均在日记中写道：“

四月的战况是我军大反攻的一月，也是全国战局转向新的阶段重要的一个月，是决定国民党的命运的一个月，我们在这一个月中，先后歼灭敌人七万多人。国民党在全国共两个快速纵队，现在全部被我们歼灭了。目前大战正在发展中。我们目前各种情况看来，平汉南段，黄河北岸，四、五月内国民党要是不增兵，有可能全部被我解放，故我们是值得庆贺的，特别是我们华东人民常胜军正在组织和准备进行新的战役。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有很大的战果和惊人的胜利传给全国人民的。我们也相信，我们有把握、有信心战胜敌人，歼灭敌人。”

当时，皮定均的身体不太好，但他仍然日夜思考着如何去夺取新的胜利。

为了调动和分散国民党军队，皮定均所在的第 6 纵队根据华东野战军的命令，从 5 月 3 日开始插到鲁南的敌后。

那时候，战场上不断传来人民解放军歼敌的捷报。5 月上旬，中央军委多次提示华东野战军：“对于密集进攻之敌，要实行诱敌深入，胶济路以南广大地区均可开辟为机动作战的战场；要有极大忍耐心，要掌握最大兵力在手。”华东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野战军主力在莱芜、新泰、蒙阴以东地区待机。5 月 15 日，华东野战军把国民党整编第 74 师包围在孟良崮及其以北的狭小地域内。整编第 74 师是国民党军自诩为“五大主力”之一的美械装备的精锐部队，师长张灵甫。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军一直把该师作为进攻华东解放区的一支骨干力量。该师几次与我军交手，尚未受到重大打击。消灭国民党军的这张“王牌”，是华东我军广大指战员的心愿。

正当我军围歼国民党整编第 74 师的孟良崮战役激烈进行时，皮定均率部出其不意，攻占了坦埠。坦埠是国民党的“王牌军”张灵甫储备弹药和后勤物资的重地，解放军袭占坦埠，等于斩断了张灵甫的后卫，使张灵甫指挥的 4 万多人全部被压迫在孟良崮的狭小地区内，为我军全歼国民党整编第 74 师起到了重大作用。

战斗结束后，皮定均在敌人的指挥所中看到张灵甫的尸体，诙谐地说：“这位美国培养出来的常胜将军，死了还躲起来，和我们捉迷藏。”

## 上党战役中的刘忠

丁文进

刘忠（1906~）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06年农历8月15日出生在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刘屋角村。原名永灿。1929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8月上旬任上杭赤卫军第13大队军需长，同年底入红四军大学学习，1930年3月毕业后，任第12军第103团第1连第3排排长。1930年秋至1934年6月先后任第4军第12师第36团政治委员、第11师第33团政治委员、第2师第5团政治委员，第1军团政治部组织科长、团司令部侦察科长。参加了红军一至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中央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抗大第13、6、4、3大队队长、抗大第3团团团长等职。1940年任抗大第6分校校长。1941年12月，任第129师第386旅副政治委员兼晋豫联防军司令员。1944年4月任太岳军区第2分区司令员。1945年7月任太岳军区第386旅旅长，率部参加了著名的上党战役。同年10月任晋冀鲁豫军区第10旅政治委员。1946年4月任晋冀鲁豫军区第4纵队参谋长。1947年6月，任太岳军区司令员，率部参加了临汾战役。1948年8月，任华北野战军第1兵团第15纵队司令员，在太原战役中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兵团第62军军长，而后率部参加了解放大西北、进军大西南的作战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率部解放西康，任西康军区司令员。1950年7月任川西军区司令员，同年底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务部部长兼政治委员、副教育长兼物质保障部部长。1957年底任北京高等军事学院院务部部长，后任教育长、副院长。1970年任军政大学副校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自由独立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2年6月被北京、上海、天津三市评为抗癌明星。曾著回忆录《从闽西到京西》（1980年）。

\* \* \* \* \*

刘忠将军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忠于党、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高贵品质，服从命令、执行上级指示、关心部属、联系群众、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善于学习、勇于实践、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和英勇善战、机智灵活的指挥艺术，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他为革命创立的光辉业绩闪闪发光，将激励后人，勇往直前。本篇所记述的，仅是他率第386旅作为上党战役主力部队之一的战斗生活片断。

适应形势，奉命恢复第386旅

1945年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毛泽东于8月13日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明确指出：“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

根据这一正确方针，8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立即发出限令敌伪投降的命令，并令华北、华中各区人民军队迅速前进，收缴敌伪武装，接受日本投降。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有充分的理由接受日本投降，但国民党反动派阴谋依靠美帝国主义，把人民拖入内战的血海，可是它又害怕中国人民和世界舆论反对，因此肆意玩弄和平骗局。8月下旬，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同时，继续派遣其部队经同蒲、平汉、津浦三路向我解放区进攻。8月底，国民党第1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两个军，

经风陵渡北渡黄河,侵入晋南运城地区;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的3个军,则向河南郑州集中;第10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的3个军,则向苏北的徐州前进;第12战区傅作义部于进占归绥(今呼和浩特)、集宁两城后又向察哈尔进攻。他们企图夺取华北各大城市、铁路干线和战略要点,继而进占东北。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于8月中旬在日、伪军接应下,以主力进占太原,同时以其第37师、第68师、第69师,挺进第2、第6纵队,保安第5、第9团等部,共1.7万余人,由其第19军军长史泽波指挥,在日军第14独立旅团掩护下,从临汾、浮山以南地区,向我晋冀鲁豫心腹地带上党地区发起大规模进攻。8月19日,该敌进占长治城,即潞安府上党的首府。至25日,又占我屯留、壶关、潞城、襄垣四县,企图扩占整个晋东南,摧毁我太行山、太岳根据地。日阎联军在进攻中使用一切手段,在岳城竟然施放毒气,使我军围困长子部队的两个连队全部中毒。从局部看,他们企图以一把钢刀插入上党,分割我太行、太岳根据地,然后把晋冀鲁豫军区主力逼到山区予以消灭。并以此迫使中共在即将举行的重庆谈判中作出更大的让步。毛泽东早已看破敌人的阴谋,在他赴重庆谈判之前就指示,晋冀鲁豫军区的任务,首先是消灭上党之敌,除去我心腹之患。只有打得好,才能谈得好,“你们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它是不会发善心的。”还指出:“对国民党军队作战,必须集中兵力打有准备的仗,打运动战,打歼灭战。”又指出:“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的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其势汹汹所吓倒。”8月25日,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副司令员滕代远、副政治委员薄一波、张际春率晋冀鲁豫军区高级指挥员陈赓、杨得志、陈再道、陈锡联、王近山等自延安飞返太行山。当时他们乘坐的飞机是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道格拉斯运输机,美机在不知我方意图和乘坐人员身分的情况下,为刘、邓等提供了飞抵太行的方便。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与晋冀鲁豫解放区的情况,中共中央晋冀鲁豫局和晋冀鲁豫军区领导考虑到全区战略上的主要任务是粉碎国民党军在北平、同蒲两个方向的进攻,而平汉线是南北交通干线,可能成为上党敌人的主攻方向,我更应重视对平汉线的控制;但上党的敌人是心腹之患,如不迅速予以消灭,待国民党军主力北上时,我将腹背受敌。因此,权衡当时的轻重缓急,于8月29日作出晋冀鲁豫军区的整个战略部署,电报中央军委。中央军委批示后,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决心集中太行、太岳、冀南三区主力及地方兵团一部共约3万余人,于1945年9月上旬,组织上党战役。此前,太岳军区首长接到刘、邓首长和中央军委命令恢复第386旅的番号,令刘忠为旅长、张祖谅为政治委员,第386旅由第772团、第20团和士敏独立团组成,作为主力部队之一,随时准备投入著名的上党战役。

知己知彼,加紧战前准备

刘忠旅长深知:上党战役是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对国民党军队作战的第一次大战役,也是晋冀鲁豫军区部队由分散的游击战向集中的运动战转变过程中,初次集中三个区主力作战的第一次大战役。参战部队编制仍不充实,多数在千人以下,装备很差,全军区只有山炮6门,仅半数的团有迫击炮2至4门,重机枪3至4挺。新参军的战士多数使用大刀、长矛,弹药奇缺,不少步枪仅有子弹数发。而作战对象却是阎锡山的基干部队,装备齐全,长于防御,且据守着日军多年修筑的工事。在这种情况下,要战

胜敌人，取得战役的胜利，必须进行充分的战前动员和严格的训练以及发动群众等准备工作。刘、邓首长根据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打运动战、打有准备有把握之战和歼灭战的思想，以及敌人孤军深入、分散守备的弱点，决心集中太行、太岳、冀南军区主力及地方部队一部，分别编成3个纵队，并动员民兵配合作战。采取首先逐个夺取长治外围各城，而后再攻打长治的作战方针。并确定在逐个夺取外围各城时，轮流以主力兵团一部担任攻城任务，以地方兵团、游击队和民兵围困其余各城，不许敌人向长治集中；而以其余主力兵团集结于机动位置，准备在野战中歼灭长治出援的敌人，并相机歼灭可能由太原、平遥来援之敌。为防止敌人向北打通白（圭镇）晋（城）线（当时白晋线南段日军已收缩到沁县以北），又决定先从北打起。

根据上述部署，参战的主力部队第386旅在向上党地区开进前，认真分析了敌我形势。刘忠旅长认为：要完成作战任务，首先就要解决如何以劣势装备且缺乏大兵团作战经验的部队，对据守城堡且装备占优势的敌人作战的问题。其次，就是在进行战斗的同时，要加速由分散游击部队向集中正规部队的转变。这里包括兵员的补充、装备的改善、指挥的集中与统一、军事技术和战术的提高和正规作战的养成，以及充分动员、发动群众，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支援等问题。第三，要从思想上教育部队在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以后，要敢于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再接再厉，战胜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进攻。为统一部队思想，刘旅长一方面对部队进行深入细致的动员教育；另一方面加紧组织战前训练。同时还充分动员、发动当地的人民群众。通过教育，使广大指战员对国民党发动的内战极为愤慨，纷纷宣誓，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而战，为支援毛主席赴重庆谈判取得成功而战。要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歼灭进犯之敌。通过战前训练，使干部掌握了攻城和巷战的基本经验，使部队提高了技术战术水平，特别是对攻城的爆破、土工作业，以及实弹射击训练，都更有针对性。群众工作的开展，使广大人民群众明确了上党战役的意义、目的。为了保卫八年抗战和减租减息运动所取得的斗争果实，组织了以专署、县级领导人员为首的后方指挥部和民兵自卫队参战支前，其中许多民兵组成了营、连，担负作战任务。自卫队组成担架队、运输队。妇女日夜为军队做鞋、磨面，儿童也积极参加站岗、放哨。人民群众的积极支前，不但大大增强了全区的战斗力，而且保障了前线的供给和后方的安全。

通过对形势的分析、敌情研究以及对部队的动员教育和战前训练、人民群众的发动，为取得上党战役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刘忠旅长心想：现在真是万事俱备，就等首长下达作战命令了。

受领任务，全歼长子守敌

1945年9月初的一个晴朗的日子，刘忠旅长受领任务的一天终于来到了。刘、邓首长在潞城以西的黄碾镇，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作战部署，刘、邓首长和滕代远副司令员都作了指示。刘伯承司令员先谈了全国的战局形势，接着指出：“上党战役很重要，关系全国的战局。党中央、毛主席命令我们必须把插进来的阎锡山军消灭，保卫上党。这次战役在战术上要有新的转变：即从分散到集中、从游击战到运动战、攻坚战转变……”刘伯承司令员简短的讲话，把关系全战役的最根本问题讲得清清楚楚，会议确定先打长治外围各县城，吸引敌人出长治消灭敌于运动之中，然后攻占长治。李达参谋长分配各军区的任务，命令太岳军区主力、386旅攻打长子城。会后，陈赓司令员对攻打长子县城又作了具体布署，并把决死第1旅的第38

团配属给第 386 旅刘忠指挥。陈司令员问刘忠旅长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刘忠旅长斩钉截铁地回答：“坚决执行命令！圆满完成上级首长交给我旅的光荣任务，以彻底干净全部消灭敌人的实际行动为上党战役胜利作出贡献。”接着又说：“我旅攻占长子县城，部队的弹药不足，能否增补？”陈司令员说：“弹药尽量满足你们，炮弹不会太多，主要依靠手榴弹啦。攻城部队要组织好，特别是讲究战术，以短促的密集炮火掩护部队一举登城。”刘旅长回答：“是！”

刘忠旅长、张祖谅政委带着崇高的使命，怀着激动的心情，回到了旅部驻地——屯留以南的东李高村。刘旅长感到这次担子不轻，对于如何带好部队，圆满完成光荣而艰巨的作战任务，不辜负领导对本旅的信任，必须认真对待。于是，他们反复认真研究了各团的战斗任务后，便召集了营以上的干部会，布置各团的战斗任务。刘忠旅长命令：第 772 团先夺取长子城北关，然后在北关登城；士敏独立团佯攻东门，吸引与牵制敌人；第 20 团、第 38 团首先攻占长子城的西关，然后在西门发起攻城战斗。第 20 团是登城的主要部队，集中全旅的炮火掩护该团登城。战斗任务下达后，刘旅长接着讲：“同志们，今天在坐的都是军政指挥员，党中央、毛主席把这样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来完成，说明党中央、毛主席信得过我们。战斗越艰难，越激烈，我们指挥员越要保持清醒头脑，既要有勇，又要有谋，第 386 旅一定要坚决圆满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作战任务，以实际行动来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各团表示，坚决执行命令，并准备随时参战。

长子城位于长治的西面，相距长治（潞安府）50 华里。城虽不大，但工事坚固，城墙两丈五尺高，城门外有石碉，城角四周有砖碉，城角外面设有低碉，每个低碉还设有一道 3 公尺多宽、2 公尺多深的护城壕，其壕内积水过腰，墙外还有 1 米多高的铁丝网，主要地段设有地雷，城墙垛上放有许多的手雷，碰着立即爆炸，在交通要道上设有拒马。这是日本鬼子构筑的，阎锡山部队又加以改造，的确相当坚固，这就从客观上增大了我军攻城的难度。

9 月 13 日黄昏，第 772 团向北关的敌人进攻时，被前面一座孤陡的小山挡住了去路。这座小山名叫北高庙（山顶有一座庙），筑有坚固的碉堡，是长子守敌的重要屏障，好比“乌龟头”一样，站在庙上用肉眼能看清城内的来往行人，炮火可以直射到大街上。守敌凭借北高庙的工事与我军顽抗，我第 772 团发起了 4 次冲击，都未攻下来，形成对峙的局面。第 772 团团团长周学义很焦急，也很不服气，“难道我们要在长子城下丢脸？决不！无论如何都要把它攻下！”刘旅长也在不断地思考着如何打破敌我对峙的局面，心想：这个从内战以来经历无数次战斗的老红军部队，勇敢果断，屡次战斗中能攻能守，并特别擅长夜战，被称为“夜老虎团”。此时，他果断指示周团长，既然强攻不成，就另选打法，实行夜战。第二天，周团长根据刘旅长的指示，研究了新的巧妙办法，即在第 1 连挑选出第 2 排，并亲自交待训练，当晚进行“夜摸”。说来也巧，恰恰这天晚上特别黑，为第 2 排“夜摸”成功提供了又一客观条件。9 月间，正是秋天，在田间里丰硕的谷穗弯弯下垂，树叶渐渐变黄，这天晚上的炮火声停息了，只听着秋虫唧唧地低鸣。上弦的月刚从太行山那边升起，又被一朵朵的薄云遮住了。第 2 排的独胆英雄们匍匐前进，摸着上山，不时拨开当头的蒿草。第 772 团攻了两天没有成功，守在庙里的敌人便疏忽大意起来。他们做梦也没想到第 772 团第 1 连第 2 排能从背后不声不响地摸上来了。第 2 排排长一声令下：“打！”轻机枪、六 炮猛

烈射击，一阵手榴弹打进庙内爆炸了，战士们冲进庙内高喊：“缴枪不杀！”就这样一个排的敌人被全歼了。“夜老虎团”露出了真本事。第2排攻夺了北高庙，砍断了敌人的“龟头”。接着，周团长率部队攻进了北关，敌人乱了阵势，退入城内。第772团占领长子城北关，立了头功。这就有力地支援了西面主攻部队第20团和第38团的战斗。

第20团以5小时的战斗，攻占长子西城外临城的村庄——西关，部队接近城下。第38团接着第20团开进。9月15日，炮声、枪声整天响个不停。在红军时期，刘忠同志就养成了冲锋在前，指挥靠前的作风，这次也不例外。刘旅长率第20团团团长楚大明、政委朱兆林、政治处主任吴效敏，冒着敌人不间断的炮火，进到第20团前沿的观察所，同时把第38团团团长蔡爱卿同志也叫来了。他们在一起，共同研究登城的部署。

观察所设在老乡家的屋脊下，从屋脊下挖一小洞非常隐蔽，敌人根本发现不了，但视线很宽阔，可以清楚地看清城内，特别是城墙上敌人活动的情况。刘忠旅长等在这个隐蔽的观察所内，轮番观察西门城墙外围的碉堡、工事构筑，在现场具体部署攻城战斗。我第20团是在平原生长的，挖洞、爬墙等是它的特殊本领，各团都佩服它。他们利用村落的房屋挖洞，每个洞直径一公尺，战士可以带上武器、弹药从洞内钻过去，自西向东隐蔽接近到城壕边沿。敌人只监视着道路、桥头和开阔地，没有想到监视村落的房屋，也没有想到我军会钻洞秘密地把登城部队运到了城墙下。

因为弹药有限，严密的战斗组织工作十分重要。“炮火准备只能进行十分钟”，楚大明团长一字一字地轻声说。刘旅长加重语气地说：“对！十分钟！”弹药有限，时间只能“十分钟”，并要一次成功，不许失败，我们只有‘一瓢水’，在战术上，就叫做‘一瓢水’战斗吧！”实际情况是，1门山炮仅20发炮弹，1挺重机枪是1000发子弹。因此，炮火袭击只能“十分钟”，成败的关键就在这“十分钟了”。“一瓢水”要能浇死白狗子，那必须是烧开了的热水才能成功，这问题就在于我们要有严密的战斗组织工作做保证。根据刘旅长的指示和决策，第20团的登城突击队已组成了5个组，即火力组、梯子组、跳板组、投弹组和登城突击组。刘旅长和团长楚大明，连夜到处检查，并组织所属干部制订具体计划。刘旅长还深入到战士中间召开军事民主会，听取意见。“一瓢水”，“十分钟”，成了登城战斗的有力动员口号，人人表决心，个个在挑战。这个说：“只要火力组封锁住枪眼，我们保证把跳板架好。”那个说：“只要你们把跳板架好，我们马上把云梯竖好，一定登上城去！”部队的战斗情绪十分高涨，恨不得马上打下长子城。

9月18日黄昏，战前的寂静使人不安。盼望而又耽心的时刻就要到了，但时间好像过得特别慢。19时整，刘旅长下达了命令，两发红色信号弹划过天空，顿时炮声隆隆，震耳欲聋。山炮集中火力攻打一点，把城墙打开了一个缺口。轻重机枪的浓密火力，压住了敌人的发射点。战士们将云梯抬出来，不顾敌人轰击，沿西关街道猛跑抬上前去。在他们前面的跳板组，胆量更大，一个倒下去，另一个接上来，把跳板架在外壕上。掩体内的战士站起来冲向前去往城墙内扔手榴弹。在震耳欲聋的炮火声中，在刺鼻障眼的硝烟中，云梯架在被山炮打陷的缺口上，挂满手榴弹、端着手提机枪的战士，象猛虎般地扑过去，登上云梯。当第一个手举红旗的勇士爬上城垛时，我炮火立刻停止射击。勇士们用手提机枪向城里的敌人猛烈扫射，后续部队接着登城。敌人吓破了胆，顾头不顾尾地乱钻。有的在神志尚未清醒过来时，已当了俘虏。

我们胜利了，“十分钟”，“一瓢水”，成功了。第20团胜利登城，第772团、第38团在北门和东门也相继登城了。这是刘旅长果断、正确指挥的胜利，是第386旅战前5个月练兵的胜利，是战士们勇敢、机智灵活而取得的胜利，也是登城突击队5个组密切协同动作而取得的胜利。刘旅长说：“这个胜利标志着我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游击战向运动进攻战和攻坚战转变的开始，这将为以后战役、战斗提供有效的经验。”

城里的敌人妄图作最后的挣扎，组织了数次反冲击，结果都被我们的部队英勇地打退了。第20团进城后打开西门，刘忠旅长率领指挥所进城了。第20团进展最快，迅速占领了钟鼓楼制高点，以这个制高点控制着全城。部队不走大街而在房屋内挖洞钻过，这既隐蔽，又可避免被敌人杀伤。就这样我军很快地接近了敌人最后顽抗的据点——原长子县衙门即国民党县政府。各团进城后都进行了巷战。战士们先打一阵手榴弹，即乘着硝烟，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冲杀，扫清残敌，捕捉战俘。敌人缴械了，阎锡山的挺进第2纵队司令白映瞻被我第20团活捉了。第386旅和第38团共俘敌官兵1500余名，击毙敌官兵500多名，缴获敌全部枪炮、弹药和大量辎重。当晚12时，整个战斗胜利结束了。在第386旅攻克长子城的同时，兄弟部队也先后攻占了壶关、潞城、屯留、襄垣，各路部队均向长治前进，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亲自指挥3个军区的部队，扫清了登城的障碍，直逼长治城下，大战潞安府的一场猛烈的攻坚战，就摆在了眼前。刘旅长和他的战友们又将完成更艰巨的光荣任务。

#### 攻占长治北关，老爷岭下打援

长治城被我军围得水泄不通，第386旅已占领了长治城北关。他们正在修筑交通壕，隐蔽接近城墙，准备在北关登城。忽然间，天下起了滂沱大雨，道路很难走，挖的交通壕全都变成了水沟。因此，登城的准备不得不暂停下来，大家都非常着急。正在这个时候，陈赓司令员在电话上对刘旅长说：“阎锡山派来援兵两万余人，在其第7集团军副司令彭毓斌的指挥下，从太原出发，已到沁县。现正日夜兼程向长治急进，企图解救长治的史泽波，与我军决战。”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当时的形势是非常紧张和危险的，如继续攻城嘛！这就可能在城未攻克之前，敌援兵已赶到，对我军形成两面夹击，而我北面阻敌前进的部队力量较弱，有可能抵挡不住。如果放弃攻占长治城，那么上党地区就被阎锡山控制着，就完不成毛泽东主席去重庆谈判之前赋予晋冀鲁豫军区的任务。现在唯一的办法是“围城打援”。在这刻不容缓的关键时刻，刘、邓首长决定：以少数兵力继续围攻长治，主力部队分东西两路立即北上，先歼灭敌援兵，然后攻占长治。陈赓司令员、薄一波政委命令第386旅立即撤离长治北关，速向老爷岭前进，参加歼灭敌人的援兵，抢占老爷岭阵地。

刘旅长率部队从长治北关泥泞的工事里爬出来，战士们穿着被雨淋湿的衣服，尽管寒气刺骨，但士气很高，个个都在摩拳擦掌，做好了消灭援敌的准备。10月3日，第386旅到达屯留北的余吾镇，并迅速展开。刘忠命令第772团控制东梓，第20团控制从岳地村到余吾镇的公路，士敏独立团进到草滩集结待命。老爷岭是由四个山梁构成的，主峰顶上有座庙，位于白晋公路西，居高临下地控制着白晋公路，距离余吾镇20华里。它与白晋路东的磨盘脑相对应，是长治以北唯一的险要地段。我军原打算先敌占领老爷岭，但敌人来得很快。在刘旅长带着各团干部去看地形时，我侦察部队已与敌第47

师先头部队打响了，敌人先占领了老爷岭。敌发现我军大部队北进后，停止南进，就地构筑工事，扼守老爷岭，企图稳步向长治推进，准备与我军决战，解救史泽波。刘忠率第386旅向占领老爷岭之敌组织了数次猛攻，第772团从西面攻几次没攻上去，第20团和士敏独立团从东面攻了几次也没攻上去，还有太行部队第14团从正面攻击几次也没有攻上去。各团都有伤亡，第772团攻得猛，伤亡较大，该团第1营只剩下百余人。我军与敌形成对峙，双方胶着于老爷岭的山梁上。刘旅长多谋善断、英勇机智，考虑这样硬拼不行，敌人在高处，我们在低处，伤亡会越来越大。于是决心把攻打老爷岭的战斗暂停下来，改为夜袭，以智取胜。他的决心得到参战部属的拥护。第20团团团长楚大明，根据刘旅长的指示，急中生智，于24时带了一个连悄悄地迂回到敌人侧后，以突然动作占领了老爷岭东北角的两个小山梁，切断了敌第74师与其北面主力的联系，并控制了老爷岭的水源。敌人被包围孤立，饮水被切断，拼命向我军进行反扑，均被第386旅部队打退，敌人反扑未成，军心开始动摇起来。

太岳军区的指挥所已进到了余吾镇。陈赓司令员10月6日早晨给刘忠打电话，命令无论如何要设法迅速攻下老爷岭。正在这时，控制老爷岭的敌人怕被我军歼灭，就放弃了老爷岭的有利阵地，偷偷地向东逃窜了。各团急速出击追歼逃敌，但由于打了两天两夜，部队很疲劳，大家思想也麻痹，结果让敌人跑掉了。第386旅占领了老爷岭，旅指挥所立即移至老爷岭。刘旅长站在老爷岭的制高点上观察，远闻东面磨盘脑炮声隆隆，轻重机枪和手榴弹，打得象热锅炒黄豆。“卡吧卡吧”地响个不停。磨盘脑一带被弥天的硝烟遮住，我太行部队正与敌人酣战之中。曾在红军长征中任过红1军团侦察科长的刘忠，在望远镜里看见敌人大队沿着公路向南运动，突然间，在东北的方向发现一个亮晶晶的东西，刺着他的眼睛。这使他警觉起来，从望远镜中仔细观察，发现一小股敌人正在向北移动，太阳照射在敌人身上背的洋油桶发出了闪光。“奇怪，大队向南，为什么有小队反而向北走？敌人在耍什么花招？”一系列的疑问，使刘旅长紧张地思考着。他立即派出侦察部队插到北面去查明，同时反复地想着敌人是否要向北撤退，“佯南而实北”。他分析：这三天的战斗，看来敌人无力再向长治前进，解救不了史泽波的围。彭毓斌不会跟着史泽波送命于上党。事不宜迟。他立即给陈赓司令员打电话说：“报告司令员，据我切实观察和分析判断，敌人企图向北逃跑。”陈赓司令员反问说：“有什么根据？”他说：“我亲自观察着敌人大行李向北转移。”陈司令员接着说：“你把情况确实弄清楚，我马上到你那里去，部队准备行动。”这时是10月7日下午3时。下午5时，陈赓司令员、王近山副司令员带着参谋人员来到老爷岭。刘旅长派往北面侦察的部队回来报告说：“已查清北面是小股敌人掩护着行李、担子向北走。”陈赓司令员听了情况汇报后，停了好一会都没有说话，正在考虑定下决心。在紧急关头，他的沉着、果断是令人钦佩的。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指挥员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密的侦察，并将侦察来的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理的制作工夫才能形成。”过了20分钟，陈赓司令员已定下决心。说：“好！刘忠！根据情况判断，敌人确实开始退却了。你马上率第20团沿公路左侧北进，插入敌后，堵住敌人。”陈赓司令员严厉地下达命令说：“你们赶到敌人的前头，迫使北退之敌停滞于虎亭以南地区，以利于我集中全军的主力部队，彻底歼灭敌人。”刘旅长带第20团立即出发，并向



军区首长提出保证，坚决完成堵住敌人北退的任务。

#### 堵敌北逃，土落村前歼残敌

刘旅长率第20团立即出发了，后面的部队交给政治委员张祖谅指挥。这是10月7日的黄昏。部队在白晋公路的西面，沿着姬家沟、河口、白家山北急进。黑夜行军，人不歇脚，马不停蹄，一路队形与敌并行前进。敌人走公路，我军走山路。我们的部队虽然连续打了半个月的仗，但全旅指战员的战斗情绪非常旺盛。战士们懂得，打运动战，大踏步地前进，是去消灭退却逃窜之敌，劲头特别大。他们要赶上敌人，他们要超过敌人，跑到敌人前面去堵住敌人。追呀！追呀！追上了敌人就是胜利。前面是一条河，水流得很急，两岸是陡崖。部队停下来了，这时第20团团长江大明率先渡过去了，后面的部队非常有秩序地手拉着手跟着渡过河去。刘忠率领部队从黄昏前出发，经过40多里的夜行军、急行军，而且是山路行军，到达漳河西岸的土落村时，已是晚10时了。这一带是太岳老根据地，刘忠旅长派参谋人员赶紧找来老乡问情况。老乡们说：“刚才100多白狗子骑兵向沁县跑了，慌里慌张地渡过漳河。”刘忠旅长听了老乡说的情况后心里很着急，分析这是敌人的指挥机关后撤了，彭毓斌可能跑掉了。于是令第20团团长江大明，赶快布置部队进入阵地，控制河岸，切断公路，堵住敌人。这时，在土落村口放哨的哨兵，抓到了一个敌人的逃兵，刘旅长亲自进行询问，才得知敌人的大队人马尚未过去，现正由南面开来，企图北窜撤回沁县。情况弄清楚了。幸好，逃走的敌人只是一小股，刘旅长当机立断，命令江大明立即派一个营渡过漳河堵住河岸；另两个营和团直属部队立即占领阵地，连夜依山傍水修整工事。刘忠在土落村后的高地上实施指挥。刘旅长心想，这是大堵击战，能不能歼灭北逃之敌，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堵住。因此，下定决心，一定要堵好，打好，不惜任何代价，坚决完成堵住北退敌人的战斗任务，为整个战役作贡献。

10月8日，东方发白天刚明的时候，只见大批的敌人向北开进，一队一队地向北进，有的还集结在小山前公路两侧的洼地上，在很小的一块地方聚拢了2万多敌人。这就是阎锡山的第83军和第23军。由于敌人的兵力十倍于我，而且装备精良，因此战斗任务是非常艰巨的。第20团是长于攻坚战、村落战，至于打堵截敌人的防御战这样的经验较少。为此，刘旅长再三指出，第20团要特别强调既能攻坚，更能防御，打好这次堵截战，以彻底歼灭阎锡山的第23军和第83军。第20团控制了有利的地形，整修好了防御工事，严阵以待，敌人无法向沁县逃跑了。于是敌人在浓密的炮火掩护下，拼命地向第20团的阵地发动攻击，炮弹雨点般地落到第20团的阵地上，敌人的步兵也冲击到第20团的阵地前沿。但第20团的英雄们，在刘旅长的正确指挥下，一次又一次地打垮了敌人，并组织一个连一个连的反冲击，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敌人一次又一次地败退了。

敌人吓破了胆，一堆一堆的死尸倒在第386旅第20团的阵地前沿。但敌人的指挥官仍拼着命督战，组织集团冲锋，一次接着一次，但进到距第20团阵地前沿三、四十公尺处，就扑倒在地上，不敢前进了。这场堵击战确实打得十分激烈，第20团的指战员们表现得非常英勇顽强。从早晨到中午，由中午到下午，整天不停。当敌发动第8次冲击时，内部开始混乱动摇了。敌炮兵不顾指挥官的威逼和吼叫，把山炮撤出了阵地，推到河边去隐蔽了，敌人步兵再也不敢向前冲了。第20团的指战员固守住了阵地，堵住了敌人北逃，赢得了时间。当天傍晚，我太行、太岳和冀南各军区的部队都赶到了，

分别从左右两翼包围，正面攻击，将敌人装进口袋里。与此同时，第 20 团在漳河东岸的第 1 营，遇着急急来援的阎锡山省防军，与之进行了十分激烈的肉搏战，迫使敌人不能前进一步。经过一天一夜的艰巨堵击战，除阎锡山部第 7 集团军副司令及其少数随员逃跑外，其第 23 军、83 军全部被我军歼灭。

在刘旅长的精心组织指挥下，第 20 团全团官兵浴血奋战，胜利地完成了土落村堵击战的光荣任务。

#### 急进桃川，聚歼长治逃敌

土落村的堵击战刚刚结束，刘旅长指示部队，赶紧打扫战场，把俘虏的敌军官兵万余人交给民兵，押送军区后方；从漳河里面打捞出敌人丢弃的 10 余门山炮，归拢所缴获的武器、弹药；掩埋好敌人的尸体，等等。全旅的指战员都忙得个不亦乐乎。连日来，紧张的战斗吸引着他们，忘记了饥饿。如今战斗结束了，才觉得肚子里空了，真想赶快饱吃一顿后，好好休息一下。但刘忠旅长和张祖谅政委在看望伤病员和检查各项工作后，没顾上吃饭休息，就在旅部和各团团长、政委，研究分配所缴获的武器、弹药，挑选一批俘虏战士补充部队。

正在这时，谢富治副司令员来了。一见面，他非常高兴地握着刘旅长的手说：“刘忠同志，你们辛苦了，这次的堵击战打得很好呵！刘师长、邓政委要我代向你们致敬！”刘旅长说：“这是刘、邓首长指挥得英明，是在军区首长的直接领导下，在上党区人民的支援下，全体指战员英勇奋战的结果，更主要的是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才取得了胜利。”谢富治接着说：“军区党委决定，刘、邓首长批准：土敏独立团升级为第 386 旅第 21 团。蒲大义为第 21 团团团长，梁天喜为政治委员。”各团团长、政委热烈鼓掌，表示祝贺。土敏独立团，在这次上党战役中，的确锻炼出来了。它从一个地方游击队成长壮大起来，并被正式命名升级为正规野战兵团，作为该团的团长、政委，面对上级首长和同志们对他们的祝贺，怎能不高兴呢！他们激动地向首长和同志们敬礼致谢。军区首长说：“长治敌人史泽波部，已放弃长治向西逃跑了。刘、邓首长命令我太岳部队立即追击该撤退之敌。军区命令你旅和第 38 团立即行动，沿张店、马壁向翼城方向追歼之。必须在半途追上，把该敌歼灭。你们立即出发，用最快的速度沿吾元、张店一线向西挺进到马壁镇，在东西峪一带截住敌人，彻底把该敌歼灭。”刘忠表示亲率 386 旅，坚决执行命令，不顾一切疲劳，加快行进速度，一定追上敌人，并在半途歼灭该敌。

首长们立即分头到各团作政治动员。张祖谅到第 772 团，刘忠到第 20 团，谢富治副司令员亲自去第 21 团宣布升级命令并作战斗动员。决死第 1 旅的第 38 团归第 386 旅指挥，王近山副司令员已到该团部署了追歼西逃之敌的作战任务。从土落村到东西峪，在地图上并不远，230 里，但这一带是山地，全是大小山峰，半天爬不出一个山岭，而上级首长命令第 386 旅在 3 天内必须赶上并歼灭该敌。这对久战刚停的部队不能说没有困难。

为了克服困难，追上逃跑的敌人并将其消灭之，完成军区首长交给的光荣任务，刘旅长对全旅部队进行了认真的动员教育。他强调指出，我们旅是在不停的战斗情况下又添了新的作战任务，且时间紧、任务重、责任大，这就需要我们发扬老红军英勇作战、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和连续作战的作风，追上敌人，消灭他们。经过动员教育，全体指战员增强了歼灭逃敌的决心。战士们听说，侵占长治的敌人逃跑了，上级命令第 386 旅去追击歼

灭阎匪史泽波第 19 军的部队，个个精神抖擞，斗志旺盛，苦累全然不顾，一个心眼要消灭敌人，坚决完成任务，为人民解放军增光，为人民解放而奋斗。刘忠信心百倍，带这样的英勇部队，任何敌人都将被消灭。

部队经过动员教育后立即出发，趁着朦胧的月色，直向西南挺进，翻越着一座座山，一道道岭，绕来绕去，有时沿着弯曲的山背走上去，队伍前头向西南，队尾却又拐弯向北。10 月 10 日早晨，部队到达一个陡峭的山谷中。山谷中有一条湍湍的小河。秋后的严霜落在两岸的枯草上，和晨光相映，亮晶晶地耀眼夺目。天气冷了，部队又没有吃饭，身上穿着单衣。淌过河后，有不少的战士手脚都被划破了，流出鲜红的血，但仍然坚持着行军，不停一步。刘旅长指示旅政治部的机关干部和各团的政治干事，分别下到各连排与战士走在一起，一边行军，一边做思想工作，老红军干部还给战士们讲长征的故事。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鼓舞了士气，战胜了暂时的困难。迅速追歼敌人，成了干部战士的共同心愿。一连走了两天一夜，战士们又饥又累，疲惫不堪。啦啦队在喊着：“同志们！加油呵！前面快要到东西峪了。”

当刘忠率领的部队进到东西峪时，敌人已先过去了。部队稍事休息即继续追击敌人。来不及做饭，就通知各团在老乡家里买点现成的东西吃，以便快点赶上敌人。这时，人走不动，骡马饿得没有劲了。好在是我们的老根据地，人民群众都希望我军很快追歼阎匪第 19 军，积极主动帮助部队解决了吃饭、喂牲口问题。

部队继续分两路急速前进，第 21 团走山梁，第 20 团、旅直属队和第 38 团走山谷。第 772 团从土落一出发就单独沿张店、马壁、将军岭一线绕个大弯子，先插过去了，以防敌人万一漏网。第 386 旅离开东西峪急速向桃川前进时，侦察部队派人回来报告说：“在佛庙岭、将军岭一带发现了敌人的队伍向桃川开进。”刘忠听了汇报后，心里放下了一块大石头，这就好了，没有白跑，把敌人追上了。他自言自语地说：“史泽波呀史泽波，这回你可跑不掉了”。

敌人走了 4 天才从长治走过横水、东西峪，可以说是像个“乌龟爬沙”。这不是敌人不想走快，而是因为一路上受我民兵、游击队袭扰。丧魂落魄的敌人，一闻枪声响，就要把队伍停下来。经过侦察、搜索、占领阵地，得到掩护后才敢前进。在敌人后面还有太行部队一个团一路尾追着。正是：人民战争是无敌的，国民党反动派以人民为敌，失去了民心，所以他们处处被动。人民群众对敌军的袭击，有力地支援了我军的胜利作战。第 386 旅的战士们听说前面就是敌人，劲头就上来了，走得更快。

在黄昏前，刘忠旅长和张祖谅政委认真研究了作战部署，并给 3 个团部署了作战任务，下达了战斗命令。刘忠命令各团 12 日拂晓在桃川一带，利用有利地形，彻底消灭阎匪第 19 军。具体战斗部署：第 20 团担任正面攻击，第 21 团在左翼，第 38 团在右翼，从两翼包围敌人，旅指挥所随第 20 团前进。刘忠作为军事指挥员，始终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在红军长征中，他任红 1 军团侦察科长，一直为中央红军侦察探路，可以说他是长征尖兵，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靠前指挥，是刘忠的老传统，今天也不例外。

刘忠、张祖谅正在老乡家里休息，准备吃点老乡给他们做的豆子饭时，军区首长又赶来了。刘忠向军区首长报告：已经追上了敌人。军区首长问：“你们很辛苦地追上了敌人，能有把握消灭它吗？”刘忠胸有成竹、满怀胜

利的信心说：“请首长放心，歼敌的战斗部署已经布置好了，有把握在明天拂晓把敌人歼灭在桃川一带。”军区首长说：“好吧，一定不能让敌人跑掉。刘忠同志，我们要向党向人民负责，否则历史将不会饶恕我们的”。首长的语气沉重、恳切，并且同意了刘忠在桃川一带歼灭敌人的作战部署。在长期的战斗生活中，陈赓司令员等军区首长，一直是信任刘忠的，当他的主意拿定，有把握消灭敌人时，首长总是放心的。

晚上的接敌运动，第20团在前面，刘忠率指挥所人员在该团后面跟进。山地的夜行军，前面的部队走走停停。刘忠旅长和张祖谅政委商量睡两小时后再走，张政委同意刘旅长的意见。他们就停下来休息，刘忠不多不少正好睡了两个小时就醒了。祖谅同志说：“旅长你真有睡觉的本事，不多不少睡了两个钟头，可是我怎么也睡不着，刚刚想要睡着时，两个钟头到了，你又叫起来走。”刘忠凑趣地说道：“当个指挥员要善于指挥打仗，也要善于指挥睡觉，叫睡就睡，叫醒就醒，这样才行。”张祖谅说：“你这个指挥睡觉的本领，我很难学到手。”这段有趣的对话，反映了刘忠乐观情绪与战友之间的深厚感情。与他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感到心情舒畅。这种有规律的部队生活方式，刘忠直到今天还保持着。

10月12日的早晨，东方见亮了。刘忠站在桃川东面的山头上观察敌情，指挥战斗。第772团在昨晚同敌人在将军岭打响了，把逃敌的道路完全断绝了。第20团、第21团和第38团从佛庙岭方向于今日拂晓加入了战斗，尾追敌人的太行部队一个团也紧紧地扭住了敌人，对敌包围圈越缩越小。

敌人是11日下午3时被压到桃川村及其周围的，我军于12日6时发起总攻击。刘忠命令发出三发红色信号弹，山炮打得敌人乱叫，战斗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到上午8点半，战斗胜利结束了。阎锡山第19军的1万多人绝大部分被歼，共俘敌官兵5000余人，军长史泽波被第386旅第20团活捉。第772团还追到马壁村以西，将逃敌先头一个团消灭一大半。至此，追歼长治逃敌战斗，消灭阎锡山第19军的任务胜利地完成了。

在上党的整个战役中，共歼敌第19军、23军、83军等11个师，俘敌副总指挥胡三余以下的将官27名，缴获山炮24门、轻重机枪2000余挺、长短枪1.6万余支。上党战役歼灭的阎锡山部队占其总兵力的三分之一。我军在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亲自领导、指挥下，参战的主力部队3万余人、民兵5万余人，此役也付出较大代价，共伤亡4000余人。刘忠将军在回忆上党战役胜利时说：“这是一个干净、彻底、战果辉煌的大歼灭战。”

在进行上党战役的同时，其他战线也取得了重大的胜利。9月1日至10月12日，我军从日伪军手中解放了数座城市，扩大了解放区。特别是平汉线方面，太行军区第1军分区和后来的第1支队，积极地贯彻了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的战略意图，与兄弟部队密切配合，以凌厉的攻势向平汉线出击。第1军分区在司令员秦基伟的指挥下，自8月20日至9月20日，连续解放了赞皇、临城、内丘、高邑四城，基本上扫清了分区范围内的日伪军残余据点。接着根据太行军区的指示，第1军分区第10、第50团和第6军分区第42团组成太行军区第1支队，由秦基伟、何正文等率领继续南下，与王宏坤率领的冀南部队和地方团队一道，连续解放了邢台和邯郸；加上其他兄弟部队在河南境内取得的胜利，到10月中旬，南至淇县，北至高邑，全长约250公里的平汉铁路线上，除安阳城和临洛关外全部解放，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夺取华北各大城市、铁路干线和战略要点，进而进占东北的阴谋。

上党战役，打乱了国民党整个内战日程，打破了蒋介石、阎锡山迅速占领全华北的野心，使华北解放区赢得了时间，能充分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组织部队在自卫战争中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军队。上党战役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是刘、邓首长及各级指挥员英明机智果断指挥的胜利；是我军指战员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英勇善战的胜利；是在上党全区人民大力支援下取得的胜利。刘忠将军在回忆总结上党战役的作用时，讲述了如下三个主要方面：

一、我军坚决执行了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和平谈判前的指示：“晋冀鲁豫军区的任务，首先是消灭进攻上党之敌，除去心腹之患。只有打得好，才能谈得好，你们仗打得越好，我就回来的越快。”因此，上党战役的胜利为毛泽东主席在重庆谈判取得成功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上党战役的胜利，大大提高了解放区军民战胜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胜利信心。此次战役，大量地消灭了国民党阎锡山部队。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补充了我军，这就进一步提高了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正如毛泽东所说：“消灭敌人，武装自己。”

三、上党战役的胜利，使部队受到了极大的锻炼和考验。大规模的运动战、歼灭战和攻坚战，使我军从分散到集中，从游击战过渡到运动战、攻坚战，在战役战斗中边打边建，边战边炼，战炼结合，使部队受到了锻炼，得到了提高。

#### 高度警惕，乘胜前进

上党大捷和各解放区斗争的胜利，大大地打击了蒋介石的反动气焰，有力地支援了我党与国民党在重庆的谈判，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与我党签订《双十协走》。毛泽东回到延安后，高度警惕地向全党全军发出了通知，指出：“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如果他们要打，就把它彻底消灭。”正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坚决贯彻毛泽东指示的时候，蒋介石果然原形毕露，在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下，从空中、海上向北平、天津和东北等地加紧运送军队，并以主力沿各铁路交通线推进，积极准备扩大内战的规模。10月中旬，胡宗南的先头部队第3、16两个军沿同蒲路经榆次转正太路开到石家庄，侵入我华北的腹心地区。为粉碎敌人这一进攻，中央军委指示：我太岳军区主力部队西出同蒲，控制同蒲铁路交通线南面的一段，截击经同蒲路北上的胡宗南的部队，以配合我晋冀鲁豫主力部队歼灭沿平汉路北犯之敌的作战。

上党战役结束后，为适应新的形势，我军随即进行了进一步补充与整编野战兵团，将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各军区主力依次编成第1、第2、第3、第4纵队，作为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1纵队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苏振华；第2纵队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宋任穷；第3纵队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彭涛；第4纵队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富治。每个纵队下辖3个旅，每个旅下辖3个团。第2、3、4纵队还将上党战役俘获的大量炮兵和火炮组建了炮兵部队。这就使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向正规兵团（野战军）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并为以后战役战斗的胜利作了重要的准备。刘忠在上党战役胜利结束后，在第4纵队第10旅任政治委员，1946年4月晋升为第4纵队参谋长。为了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彻底胜利，他跟随陈赓司令员，投入了新的更大的战役战斗。

## 余秋里在新式整军运动中

### 雷厉

余秋里（1914~）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江西吉安人，生于1914年。1929年参加农民暴动和赤卫大队。同年12月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赤卫大队分队长、中队长，湖赣省苏维埃政府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第2军团团政委，八路军第120师独立第3支队政委，第358旅团政委、旅政委，西南军政大学副政委，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兼政委，西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委，总财务部部长，总后勤部政委，石油工业部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能源委员会主任，国务委员，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总政治部主任。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九至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1987年当选为中顾委常委。

\* \* \* \* \*

1947年秋季，西北战场的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西北人民解放军基本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开始由内线防御转为内线反攻。10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同时发布了由毛主席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公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解放战争出现的伟大转折和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对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政治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在新的形势下，部队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进一步提高部队战斗力，1947年冬，西北野战军开展了以诉苦三查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这次运动，是首先在第358旅开展起来的。旅政治委员余秋里深入部队，坚持走群众路线的方法，总结推广经验，解决运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不断把运动引向深入。经过两个月的整训，提高了指战员的阶级觉悟，纯洁了队伍，整顿了作风，严肃了纪律，加强了团结，增强了部队战斗力。第358旅的经验，得到了彭德怀司令员和毛泽东主席的充分肯定和赞扬，并首先在西北野战军作了推广。随后，毛泽东又向全军推广介绍了西北野战军的经验，一个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的新式整军运动在全军迅速开展起来。

新式整军运动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是我军政治工作在新形势下的一个伟大创造，一个新的发展，在我军政治工作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它对加强人民军队建设，加速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 绥德战评

1947年，在西北战场上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的3月中旬，蒋介石在西北地区调集34个旅共25万人的兵力，向陕北发动重点进攻，妄图一举摧毁我党的领导中枢。当时我西北野战军只有6个旅2.5万多人，敌我兵力对比是10：1，形势相当严峻。在彭德怀司令员指挥下，我军主动放弃延安和大部分县城，诱敌深入，声东击西，首战青化砭，再战羊马河，三战蟠龙，三战三捷，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打击了敌人的疯狂气焰，稳住了西北战局。

1947年8月20日，西北野战军发起沙家店战役，歼灭了胡宗南三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36师，共毙伤俘敌6000余人，俘敌第123旅旅长刘子奇。这是扭转陕北战局关键的一仗，基本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西

北人民解放军从此开始由内线防御转为内线反攻。战后，西北野战军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任弼时同志亲自赶来参加，向指战员祝贺胜利。毛泽东高兴地赞扬说：“沙家店这一仗打得确实好，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最困难时期已经过去了。用我们湖南话来说，打了这一仗就过坳了。”

西北野战军经过短暂休整后，10月1日至11日，发起延长、延川、清涧战役。11日，攻克敌坚固设防的清涧，歼敌整编第76师8000余人。俘敌中将领师长廖昂、少将旅长张新等6600余人。

在沙家店战役之前，西北野战军曾围攻榆林，但久攻未克，延清战役结束后，彭德怀决定挥师北上，再攻榆林。从10月27日至31日，经过激战全部肃清榆林外围据点。11月2日，西北野战军集中火力强攻榆林城，由于城墙高，设防坚固，几次强攻，都未成功。11月6日，宁夏马鸿逵集团与绥远傅作义集团，奉蒋介石之命，分别派兵增援榆林。西北野战军在元大滩一带给予宁马援军以严重打击，敌被迫西撤。11月16日，我军准备再次进攻榆林。但发现宁马援军西撤后绕道乌拉尔林又从北面来援，绥远援军也在向榆林逼近。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决定从榆林撤围。20日，宁马援军和绥远援军与榆林守敌会合。

从榆林撤围以后，第358旅在绥德附近集结，进行战评总结。旅政治委员余秋里每天都深入到团、营、连，参加会议，和干部战士谈话。他把笔记本在两腿之间一夹，边听、边记、边思考，想找到未能攻克榆林的答案。

大家分析未能攻克榆林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点：

一是思想上轻敌，对敌情估计不足，战役组织准备不够充分。比如，我军第一次进攻榆林之后，守敌又增强了城防工事，增修了许多暗火力点，我们事先没有查明，因而未能组织有效火力予以压制和破坏，致使攻城部队受阻。又比如，竖梯攻城是我军的一种主要手段，但在战前没有作充分的准备与严格的检查，在攻城时，花费很大代价将木梯竖在了城墙上，但因梯子太短不能登上城墙，结果前功尽弃。

二是对马鸿逵、傅作义积极来援估计不足。战前认为，胡宗南集团大部集结在南部地区，增援来不及；宁夏马鸿逵集团、绥远傅作义集团出于本身利益，不会积极来增援。没有料到马鸿逵、傅作义会积极派兵增援，更没有想到，宁马援军在遭我严重杀伤西撤后，又北绕乌拉尔林继续增援榆林。

余秋里认真地听了大家的发言，他认为，大家讲的都是事实，也有一定的道理，但这不是根本的原因。

一天，他来到第715团。

第715团是在抗日战争开始时，由红2军团第4师改编的。改编时保留了11个红军连队，是第358旅创建最早的一个英雄团体，土地革命时期，红4师在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开辟和建设根据地的斗争中，屡建奇功。抗日战争时期，第715团在开辟大青山根据地，巩固冀中根据地的战斗中，屡屡打败日寇的扫荡和进攻，和第716团一起，被誉为第120师的两只虎。解放战争中，在保卫延安的青化砭、羊马河、蟠龙的三战三捷中，也打得英勇顽强，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但是，在第一次围攻榆林时，城门被炸开，由于个别营连级干部未查明情况，即向上级报告城门未炸开，使后续部队没有跟上，失掉了战机。在第二次打榆林时，在元大滩抗击宁马援军，因轻敌，兵力未作纵深配置，阵地曾一度被敌军突破，造成了比较大的伤亡，团长罗坤山也

负了重伤。

余秋里在第 715 团团、营级干部会议上，直接了当地提出：两次打榆林，为什么没有打好？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最后集中到主要是斗志不强。余秋里又问大家为什么斗志不强？议论来议论去，主要是思想不坚定。有的同志谈到，有的人虽然看到我军不断胜利，但担心今后更加艰苦，战斗更加激烈、残酷，斗志有所减退，个别人不愿靠前指挥，甚至编造假情况，打滑头仗，对上级指示阳奉阴违，不负责任。余秋里感到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是两次未能攻克榆林的主要原因。

余秋里在了解了干部的情况以后，又想到了战士，想到在沙家店、清涧战斗中补进了大批被俘的国民党士兵，给部队会带来什么问题呢？

在西北战场上，战斗频繁激烈，规模越打越大，而在地广人稀的陕甘宁边区，兵员十分困难，部队新成分的补充，几乎全靠从俘虏兵中解放入伍，刚开始，还把集中起来短训一下，再补充到部队。以后战斗越来越频繁，俘虏越来越多，往往战斗一结束，就直接补充到连队。1947年10月11日，中央军委向各军区、各野战军发出的关于西北战场情况与经验的通报中说：“七个月作战未补解放区新兵，补的都是俘虏，即俘即补。”

余秋里来到第 715 团第 2 营第 6 连。这个连的解放战士已占 80%，大部份是在沙家店、清涧战斗中被俘的国民党士兵，他们仍然穿着国民党的军服，只是换了解放军的帽子，在操场上集合时，黄黄的一片。

在连队的日子里，余秋里找干部谈，找党员谈，找老战士谈，也找解放战士谈，了解兵员成分变化后部队出现的问题。大家谈到，解放战士绝大多数出身于贫苦家庭，是被国民党抓去当兵的。解放参加我军以后，一般都表现比较好。但由于在国民党军队受了不少欺骗宣传和反动教育，入伍后又缺乏全面系统的政治教育，他们不懂得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剥削；不了解我军的性质、宗旨、任务、纪律；不懂得区别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只知道“吃谁的粮，扛谁的枪，就给谁打仗。”这就给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行政管理及军事指挥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有的人贪生怕死，在战斗中畏缩不前，在围攻榆林的战斗中，有的人不瞄准就放枪。

有的无组织、无纪律，不听从排长班长的指挥。

有的对解放区来的老战士不服气，经常为一些小事和老战士争吵。

有的违犯群众纪律，乱翻乱拿群众的东西。

最近，部队中还出现了谣言，说什么“共产党先甜后苦，打起仗来拿俘虏兵顶头阵。”还发现个别人准备携枪投敌。

听着大家讲的大量事实，余秋里的思绪开始清晰起来。在解放战士已占兵员总数百分之七八十的情况下，提高指战员的觉悟，重点是加强对解放战士的思想教育，把他们从一个被迫为国民党卖命的炮灰转变为一个自觉为人民解放而战的人民战士，做不到这一点，提高部队战斗力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怎样提高解放战士的阶级觉悟，从何处入手？余秋里想到了夏伟，想到了他创造的从加强新旧军队对比教育入手，提高解放战士觉悟的经验。

夏伟是第 714 团第 2 营教导员，他是抗战初期投笔从戎的青年学生。在部队中经过几年的锻炼，进步很快。他工作深入、扎实，善于抓典型。解放战争初期，第 358 旅转战晋绥时，他们营补进一批被俘虏的国民党士兵。开始，这些解放战士对被我军俘虏很不服气，说我们“打仗不正规”，还说什



么“摆开架势明着打，还说不定谁胜谁败呢！”为此，经常和从边区补来的子弟兵发生争论。怎样才能促使他们转变立场，端正思想，自觉地站在人民一边，掉转枪口去消灭敌人呢？夏伟经过反复考虑，认为应从关心、爱护入手，使他们体会到两种军队本质的不同。在行军时，夏伟和战士们并肩前进，不断问寒问暖，还安排班、排长和老战士替新战士和解放战士背枪，使解放战士很受感动。一天，一位解放战士走到夏伟跟前，动情他说：“我们在国民党那边，长官开口就骂，拳打脚踢是常事，没想到，共产党队伍里的长官这么好！”夏伟从中受到启发，很快在全营搞了一个国共两军对比教育，由解放战士控诉在国民党军队里所遭受欺压凌辱和非人的待遇，讲述在解放军享受的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和官兵平等、亲如兄弟的阶级友爱之情。通过教育，提高了解放战士的阶级觉悟，对加强官兵之间、子弟兵与解放战士之间的团结，对巩固部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余秋里曾把这一情况向晋绥野战军贺龙司令员作了汇报，受到贺龙的肯定和赞扬。

### 清涧整训

从榆林撤围不久，为了提高全军指战员的政治觉悟，整顿部队纪律，适应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西北野战军决定结合当时解放区正在进行的土地改革，在全军开展冬季整训。

在第358旅党委研究部署冬季整训的会议上，余秋里传达了西北野战军总部关于进行冬季整训的决定。然后，详细介绍了他在第715团了解到的情况。他说，目前部队中解放战士已占大多数，这次冬季整训，应以提高解放战士的觉悟为重点。方法是借鉴第714团第2营的经验，开展新旧社会、新旧军队对比的教育，发动干部战士诉旧社会的苦，诉旧军队的苦。在诉苦的基础上，开展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进一步解决少数干部思想不坚定、斗志不强的问题。这个意见，得到了黄新廷旅长和其他同志的赞同。旅党委正式决定，这次整训以诉苦、三查为中心内容。

旅党委会议以后，第358旅奉命南下。黄新廷旅长亲自督促检查各团，认真做好整训的准备工作。余秋里为了取得领导运动第一手的材料，立即赶赴第714团。部队路过绥德西川时，余秋里召开了第714团营以上干部会议，他讲了旅党委关于冬季整训的部署，要求第714团先行一步。余秋里说，以诉苦和三查为主要内容的整训，是在全国贯彻土地法大纲，兴起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的环境中，为完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神圣使命而进行的。在这方面，我们还缺乏经验，只有从实际出发，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放手把群众发动起来，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才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为了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各级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机关干部要深入连队，做到及时了解情况，总结交流经验，不断引导和推动运动向纵深发展。

会后，余秋里又找第714团政治委员徐文礼和夏伟谈话，研究如何广泛深入地把诉苦运动开展起来。余秋里问：“开展诉苦运动，你们有什么考虑？”夏伟说：“我们准备在行军途中，发动营、连级干部和战士漫谈，了解每个人的出身和经历，从中发现苦大仇深的典型，为诉苦做好准备。”余秋里说：“对！诉苦典型不能由领导指定，一定要从群众中产生，这样的典型才有说服力。”余秋里还说：“诉苦，首先要让每个干部战士了解苦在哪里？为什么苦？这个问题，靠领导讲大道理不行，靠组织几个战士讲也不行，要出点题目让大家讨论。在讨论中要充分发扬民主，让大家把各种看法都讲出来，

然后，启发引导大家，联系自己的亲身经历，进行深入的分析。这样，才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达到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目的。”

11月下旬，第358旅到达清涧师家园子驻地。第二天，便展开了冬季整训。

第714团第2营根据旅党委的部署，首先召开座谈会，组织大家讨论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穷人是怎么穷的，富人是怎么富的？由于战士们几乎都是穷苦人家出身，对地主、资本家怎样进行剥削，虽然在道理上说不是很清楚，但对地主、资本家好吃懒做、三妻四妾、吃喝玩乐、欺压群众，还是有所耳闻目睹的。尤其是对自身和家庭吃尽了苦和为什么受苦还是清楚的。在座谈会上，营、连干部启发、引导战士从自身和家庭谈起，诉苦运动很快地开展起来。各自争讲自己在旧社会受的苦、遭的罪。从个人讲到父母，从自家讲到亲戚朋友，互相启发，越讲越多，越讲越深刻。有些平时不大发言的同志，在这种热烈气氛和阶级感情的激发下也积极发言，控诉旧社会、反动派给自己带来的苦难，涌现出一个又一个血泪控诉的典型。

第6连第2班班长刘四虎，是来自解放区绥远丰镇的子弟兵。他家原有12亩好地，父亲是个泥瓦匠，农忙时下地劳动，农闲时帮人家修房子，一家人的生活尚能维持。他10岁那年，村里姓马的地主想夺占他家的那块田地，就设了一个圈套。一次，地主雇四虎爹去打一道土墙，说好工钱是八块七。墙快要打好时，遇上阴雨连绵，地主乘着地基松软，暗中指使人把墙推翻，四虎爹的腿被砸伤。地主反而诬赖说墙未打好，砸伤了他家的人，不但不给工钱，还逼着重新打墙，出钱治伤。四虎爹气不过，和地主争吵起来。地主依仗权势，用钱买通了官府，判四虎爹赔给地主8亩好地，还得设宴赔礼。四虎爹咽不下这口冤枉气，撇下妻子儿女，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吊死在村头的大榆树上。四虎爹死后，他娘痛不欲生，一再嘱咐他：“四虎啊！你要记住你爹是怎么死的？咱家的日子没法过，是谁害的？”

为了找一条活路，刘四虎到一家银匠铺去当学徒。名为学徒，实际是一个奴隶，打水、扫地、做饭、抱孩子、洗尿布，什么活都得干。每天从天刚亮干到半夜，还要挨打受骂。在那里，他干了6年，没赚到一个钱。第6年腊月，他提出要几个钱给母亲过年，狠心的老板不仅不给钱，反而打了他一顿，还说吃了他家的饭，要刘四虎交饭钱。在全连的诉苦大会上，刘四虎说到这里，一手摘下帽子，一手指着头上的伤疤呜咽着说：“这就是老板给我的工钱！”停了一会儿，他又说：“在旧社会反动统治下，我们穷人没有法子活，拼命干也吃不饱，处处受气，有理也无处说呀！”刘四虎在台上痛哭流涕，在台下引起一片嚼泣声。

第4连有个解放战士叫路新理，在国民党军队当兵时，受反动宣传，中毒很深。从蟠龙解放入伍后，怪话怪事不断，谁听了见了都头疼，是出名的“罗克兵”（陕北方言，意指那些爱发牢骚，讲怪话的战士）。在夜行军走山路时，他就说：“钻山沟，走夜路，和土匪一样。”发了一顶解放军帽子，他见没人时便扔到地上用脚踩。发的津贴是边区票子，他一转身便撕了。打环县时见敌人垮下来当了俘虏，他说：“你拿的是枪，不是木棒，为什么不抵抗就跑了？”开始，他想有机会再投向敌人。经过教育，有所转变，但还是说：“吃谁的粮，就给谁干。”攻打榆林时，他畏缩不前，把头埋在地下，不瞄准就放枪。诉苦开始后的一个深夜，全连都睡熟了，路新理悄悄爬起来，抱着一包东西跑向野外。适逢查铺的指导员发现，以为他想开小差，就悄悄

地跟了上去。只见他头也不回，一直跑到后沟的一个土崖下，掏出一个纸牌，插在土坎上，接着点燃插好带来的蜡烛和供香，然后跪下磕了三个头，便一边轻轻诉说一边痛哭起来。指导员先是在一边悄悄地听着，当听到伤心处，也触动了自己的血泪史，再也忍不住，便走上前去和路新理抱头痛哭。原来，路新理顾虑自己是俘虏兵，一贯爱发牢骚、讲怪话，怕在会上讲了自己和全家的悲惨遭遇，得不到同志们的同情和理解。

第二天，第4连召开全连诉苦大会，路新理哭诉了自己的苦难遭遇。

路新理的老家在山东曹县，父亲给地主当长工，自己稍大也帮着打短工。父子俩长年累死累活，也养活不了一家4口人。父亲硬是被活活累死了。他和母亲掩埋了父亲的尸体。靠他一个人养活母亲和妹妹，更难糊口。实在活不下去，就和本村几家穷人一起，领着母亲和妹妹，向西沿途乞讨。他们来到山西夏县，路新理和几个同乡一起，去给盐场晒盐。干活时，没有防护鞋，脚上的布鞋一湿，双脚被盐汁蚀烂，疼痛难忍。但为了母亲和妹妹不被饿死，就咬着牙硬撑。后来，母亲因病饿交加，也离开了人世。自己没钱埋葬，连吊孝的麻布也买不起。还是一起逃难过来的乡亲们，凑钱帮忙让母亲草草入了土。母亲死后，他每天带着9岁的妹妹伏在母亲坟头上哭。盐场的大叔、大伯们劝他要坚强地活下去。他就继续在盐场干活。有一天，国民党军队突然到盐场抓兵，把他抓走了。妹妹见他被抓走，哭得死去活来。从此，可怜的小妹妹是死是活一点也不知道了……。路新理说到这里，再也说不下去，嚎陶大哭起来。停了一会儿又说：“解放过来以后，我认为在国民党军队里是当兵，当解放军也是当兵，反正都是打仗。我不愿当兵，天天想我那苦命的妹妹。现在通过诉苦，我明白了是谁让我受的苦，明白了应该用手中的枪去打谁。”他拿起手中的枪，将枪托猛地向地上一捣说：“今后，我一定在解放军里好好打仗，为亲人报仇。”

第714团第2营开展诉苦的经验，经余秋里总结推广以后，诉苦运动很快在全旅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

在诉苦中，不仅涌现出像路新理、刘四虎这样受尽地主、资本家、官府敲诈剥削的苦难典型，还涌现出许多受国民党军队欺压的苦难典型。一天，余秋里来到第716团。团政治委员栗光祥向他详细汇报了诉苦运动的进展情况和涌现出来的典型。

团直通讯连有个战士叫于德水，是河南人。1946年卓资山解放入伍的。他家有5口人，租地主40亩地，种了3年，勉强维持生活。第4年，父亲患眼病，因无钱医治，眼睛瞎了。老财怕他交不起租，不仅把地收回去，还把仅有的一条牛牵走，顶了欠下的地租。为了挣口饭吃，母亲就带着妹妹去给地主家做针线活。于德水大了点，就去给地主家放羊。只放了一年，老财说他好吃懒做，被赶了出来。没有办法，只好到铁工厂去拉风箱。这种活很费力气，但每天只给半斤铁的工钱。工钱已经够少了，可是到年底算帐时，厂主只给铁不给钱。铁不能吃，又卖不出去。说了许多好话，才按市价克扣了三分之一，给了点钱。于德水拿这点钱买了5斤肉、3斤油、几斤米、一些黑豆糠，腊月二十九回家过团圆年。谁料想，人刚到家，就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全家的日子都指靠着于德水，他的父母苦苦哀求，说什么也不肯放，只好眼泪汪汪地望着他被抓走了。大年初三，父亲背着黑豆糠做的窝头去县城探望，围着城转了3天，哨兵也不让进。后来，碰到一个好心人让他进了城。找到营房，哨兵又不让进，又绕着门转了两天，还是于德水出来解手看

见了父亲，向班长哀求了半天，才把连冻带饿、站都站不稳的父亲接了进去。他向司务长请求，给冻饿了几天的父亲一点饭吃。司务长说：“各有各的饭钱，要吃饭拿钱去买嘛！”于德水说家里穷没有钱，司务长却说：“谁叫你穷的。”在诉苦会上，于德水说到这里，就泣不成声了。

在全旅各个单位的诉苦大会上，路新理、刘四虎、于德水这些深受苦难的典型，在台上句句血、声声泪的控诉，强烈地震撼着每个干部战士的心，唤醒了深埋在心底的悲惨记忆，会上会下一片哭泣声。这些同志一讲完，老战士、新战士、班长、排长，群情激愤，争先发言。旧社会和反动派强加在劳动人民身上的苦难是十分惨重的。贫农战士诉出了租种地主土地，受高额地租盘剥的苦；佃农战士诉出了扛长工、打短工，受尽虐待，过着牛马生活的苦；做过工的战士，诉出了被资本家用非人待遇，掠夺工人血汗的苦。许多劳动人民出身的战士控诉说，全家终年辛勤劳动，而劳动果实却被地主、资本家掠夺，所剩寥寥无几，全家仅能以糠菜度日，终年为劳苦所困，有的沿门乞讨，有的卖儿卖女，有的流落他乡，有的死于荒郊。解放战士普遍控诉了被国民党抓丁当兵，吃不饱穿不暖，挨打受骂，受尽百般凌辱，过着非人生活的苦难遭遇。通过深入的诉苦和相互间的漫谈、启发，使大家深切感受到，天下的穷人都受苦，天下的穷人是一家，这是同地主、资本家相对立的一大群体，从而萌发出阶级意识，从感情上同剥削阶级划清了界限。

#### 深挖苦根 激发斗志

诉苦，激发了广大指战员的阶级意识。但是，要把感觉的、感性的意识变成自觉的、理性的阶级观念，必须进一步引导大家弄清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诉苦运动开展起来以后，余秋里考虑最多的是如何把运动引向深入。

在一次旅党委会议上，第 716 团政治委员栗光祥介绍了运用算帐的方法，启发、引导大家认清剥削实质的经验，引起了余秋里的高度重视。他高兴地说：“这是一个好方法。认识阶级，懂得什么是剥削，才能成长为有阶级觉悟的人民战士。算帐这种方法，既具体又生动，人人都可以参加，人人都可以理解。通过算帐，可以把地主、资本家剥削劳动人民的手法和实质充分暴露在人们面前，这要比讲空洞的道理深刻得多。”会后，旅政治部向各团介绍了第 716 团的经验，推动了运动的发展。

算帐的方法，最早是由第 716 团通信连创造的。这个连在学习土地法大纲时，组织大家讨论：“地主家的地该不该分”。一开始，蟠龙解放入伍的战士赵品祥认为：“不该分”。他说：“地是人家祖辈传下来的，凭空分人家的东西，良心过不去。”老战士张林祥则认为：“该分”。他说：“老财不劳动，一天吃得好睡得好；长工一天累到黑，吃不好睡不好。不分，太不公平。”两人立即争论起来。赵品祥说：“吃得好睡得好，是人家命好。”张林祥说：“什么命好？他吃的用的，都是长工的血汗换来的，老财为什么不去受累？”赵品祥说：“人家不去受累，是因为人家有地。”张林祥接着说：“有地？要是长工不给他种，庄稼长不出来，他吃什么？”赵品祥反驳说：“你不去种，自有别人去。”俩人争来争去，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全班 9 个人，支持张林祥的只有 1 个人，其余的都站在赵品祥一边。班里解决不了，就到排里去讨论。在排里讨论时，连指导员刘传喜提了两个问题：“穷人穷，是命穷还是地主剥削穷的？”“穷人一无所有，地主剥削什么？”问题提出以后，讨论得更热烈了。老根据地入伍的李占全第一个发言：“地主剥削的是穷人的血汗。”赵品祥不解地问：“血汗是什么？”李占全回答：

“我们讲的干活、种地，都要流血流汗，血汗就是劳动。”刘指导员看大家好像在问：“劳动有什么作用呢？”他就因势利导打了个比方。他说：“水在河里哗哗地流，不要钱。把它挑到城里就要钱。石头长在上山也不要钱，把它凿开运进城，就要钱；如果再把它凿成石桌、石凳、石狮子，就要更多的钱。挑水、凿石、运输都是劳动。经过劳动，不值钱的东西变成了值钱的东西。这就说明劳动是值钱的。我们常讲劳动创造价值，就是这个道理。”指导员的一席话，打开了大家心头的闷锁。全场立刻活跃起来，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土地是天生的，没有人去耕种，绝对不会长出庄稼，只能是块荒地。长工去耕种了，就有了收成。照理，谁流了血汗收获就应归谁所有。但是，打下的粮食，叫没流血汗的地主全部拿走了。这就是不劳而获，剥削了我们穷人。”

为了深化对剥削关系的认识，使大家具体了解剥削的残酷性。指导员刘传喜问大家：“同志们想不想了解地主剥削了多少，厉害不厉害？”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想了解。”指导员说：“那就自己算个帐，算好了就讲。”不一会儿，战士张学成站了起来，他边说边算：“我给地主做了3年长工，每年工资说定分两批给，3月给第一批，4月给第二批。按当时的物价，可买1石8斗米。可是，老财拖到5月才给第一批工钱，6月才给第二批工钱。由于物价上涨，才买了7斗米，老财剥削去我1石1斗米。”

另一个战士高学明接上来问张学成：“你一年给地主种多少地？”张学成说：“地主雇两个长工，一年种140垧地。”“每年生产多少粮食？”“每垧地7斗。”大家一算，每年收98石，每个长工生产49石，折合细粮24石5斗，再扣除种子、牛工、工钱，老财净得12石5斗，再加上因迟发工钱，赚去的1石1斗，张学成每年被剥削了13石6斗。这样一算，大家明白了，穷人受穷不是因为命穷，而是被老财剥削穷的。

剥削帐越算越细，对剥削的残酷性认识越来越清楚，对地主老财的仇恨也越来越深。张林祥对张学成说：“你干了一年，地主就剥削了13石6斗，你干了3年，剥削去多少？是40石8斗。老财不是命好，是剥削致富的啊！”

战士王生福、李玉紧接着说：“地主的剥削还不止这些。老财手里的这些钱财都不是死的，还要拿去剥削另外的穷人。每年青黄不接时，都拿去放高利贷，1石要还1石5斗，这样利滚利，一年年地滚下去，地主能不发财吗？长工终年受苦，不得温饱，地主吃喝玩乐，财产加番。地主老财的富是穷人的血汗堆起来的啊！”

这时，原来不同意分地主土地的战士赵程保，想起姐姐变穷的原因也讲了起来：“俺姐借了老财12块大洋，当时没说要利钱。两年后，财主连本带利要收回去。姐姐还不起，答应做长工还债，说好每年给22块半大洋的工钱。干了两年，应给45块。但一算帐，把欠的本、利扣去，只给了3块，还说是看在亲戚的面上，这笔债算清了。”赵程保气愤他说：“什么亲戚？凡是老财就没有一个不剥削穷人的，也没有一个好人。俺姐穷，就是他们剥削穷的。”赵品祥听着想着，心头渐渐亮了。他说：“我原来想，凡是剥削来的是应该分，但祖传的土地，又不是这个财主剥削来的，怎么去分人家的呢？现在我懂了，他祖先在置这些地时，哪来的钱？还不是当时剥削穷人的？土地法大纲提出分地主的地，这是物归原主，十分正确。我坚决拥护。”

第716团的经验在全旅推广以后，进一步把运动推向了深入。随着运动的深入，余秋里所考虑的问题也在不断深化。在旅党委的一次会议上，他说：

“在第714团和第716团的调查中，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次以政治思想为主的冬季整训，为解决部队存在的思想问题、作风问题，找到了一把钥匙。通过诉苦提高了阶级觉悟，通过说理、算帐，搞清了剥削关系，使广大指战员的认识出现了一个新的飞跃。但是，还没有和形势、任务联系起来，还没有把思想觉悟提高到为无产阶级、为劳苦大众而战的高度。因此，下一步的工作，应该是进一步启发引导战士把各自朴素的、切身的痛苦和感受，上升到整体的、自觉的阶级觉悟的高度，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为此，在诉苦、算帐的基础上，要进一步找苦源、挖苦根。引导干部战士把个人和家庭的苦难遭遇与整个阶级的苦难命运联系起来，与推翻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联系起来。”

在这次会议之后，旅、团政治机关从实际出发，出了许多小题目，启发干部战士深入思考，认真进行讨论。比如：“为什么各处的地主都这么坏，心都这么黑？”“为什么天下的穷人都这么苦？”“旧社会的穷人多，地主恶霸老财少，为什么这些少数人却能骑在多数穷人头上作威作福？”“共产党为了多数穷人翻身解放，要斗地主、分田地，国民党蒋介石为什么不让？”“为什么蒋介石要发动内战，跟共产党、解放军打仗？”“我们是为谁打仗？”“怎样才能彻底报仇雪恨？”第714团第2营还结合本营的情况提出：“刘四虎父亲有理，为什么打不赢官司？旧社会的军队、衙门、官老爷、法律，为什么都是专门整治穷人的？”“路新理从山东到山西，为什么找不着一条活路？”

这些问题提出以后，讨论会开得很热烈，你一言，我一语，互相启发，一步步，一层层深入下去，使大家的认识逐步提高。有的战士形象地比喻说：“讨论这些问题，就像是一层层剥树皮，一锄一锄挖树根，越剥越瞧得清，越挖越看得透。”战士们过去一些看不清的问题，都找到了正确的答案。大家说：“你的苦，我的苦，都一样的苦，是一个阶级的苦；这地主，那地主，都是穿的一条裤子；这里斗，那里斗，都是剥削与被剥削两大阶级的搏斗。”“穷人有理为什么打不赢官司，那是因为国民党的官府是为地主老财说话办事的。”最后，大家挖到了总根：“蒋介石就是地主老财的总代表、总头子，是穷人最大的冤家对头，天下穷人是一家，要彻底翻身过上好日子，就要跟着共产党，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在第714团第2营第4连的讨论会上，路新理激动地说：“解放过来以后，我一直思想糊涂，搞不清为谁当兵，为谁打仗，一直不愿意当解放军，真是丢了根、忘了本。现在我才知道，是为自己当兵，为父老兄弟打仗。我拿这杆枪应该打谁？我已经没有了家，但天下穷人多得很，我要为穷人的翻身好好打仗！”

#### 诉苦与“三查”相结合

在整训以前，余秋里曾深入到第715团进行调查研究，发现了干部战士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诉苦运动开展以后，余秋里很关心第715团的情况。一天，他找第715团政治委员刘佩荣谈话，了解运动情况。刘佩荣说：“我们团从榆林撤围以后，就开始检查，为什么仗没有打好？查来查去，查出是斗志不强；为什么斗志不强，查来查去，查出是思想不坚定；为什么思想不坚定，最后才查到是阶级觉悟不高。接着就讨论‘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由于不联系实际，只限于一般性的讲道理，发言不踊跃，讨论会开得很沉闷，效果不明显。当时还发现了政治谣言，查来查去，也没有查出结果。”停了一会儿，刘佩荣兴奋地说：“最近，我们学习了第714团、716团的经验，

在全团搞起了诉苦，情况一下子就变了。”接着他详细介绍了运动的进行情况。

在诉苦大会上，翻身农民参军的战士冯福林悲愤地控诉大地主“二阎王”霸占他家的二亩菜园，打伤他爹，打瞎他妈，以后又当了“还乡团”，杀害了他爹等8人的罪行。解放战士刘登旺听着，想起了自己的苦难遭遇，不由地哭了起来。冯福林刚讲完，刘登旺从人群中站了起来，准备控诉。这时，和他一起解放入伍的王金盛急忙向他挤眉弄眼。刘登旺气得浑身哆嗦，朝王金盛“呸”了一声，一挥手说：“我糊涂，我该死，我对不起同志们，我也是穷人啊！”原来，他家在陕西扶风，租种地主17亩地，一家4口过着吃糠咽菜的日子，欠下地主的租子还不起，老财就把他当壮丁卖了出来。讲到这里，他的眼泪“涮”地流了下来。他哭着说：“我被死推活拉带出了家门，撇下母亲、老婆和3岁的孩子，还不知他们是死是活啊……”。刘登旺不住地擦眼泪，王金盛却沉不住气，开始坐立不安了。刘登旺接着说：“我们像犯人一样，被押送到陕北，一路上受尽了打骂。当官的怕我们开小差，白天像蚂蚱一样，10个人拴着胳膊连成一串，拖着根绳子走；晚上怕逃跑，把裤子都收了。从延安到清涧，当官的让我一个人挑4箱子弹，走不动，当官的就在后面一步一棒子。最后，我累得晕倒了，当官的……”说到这里，他像发疯似的指着王金盛说：“就是他，这个狠心贼，把我推到山沟里……。”然后，他走到指导员王德清跟前说：“指导员，王金盛是国民党军的排长。他家是褒城县（今勉县）的大地主，祖祖辈辈欺压咱穷苦人。”接着，刘登旺彻底揭露了王金盛破坏我军的桩桩罪行：“要我串通几个解放兵拖枪投奔国民党。他说共产党先甜后苦，打仗时拿俘虏兵打头阵。还威胁我说，若不跟他走，将来他跑出去，要杀我全家。前几天我说吃谁的粮给谁干的糊涂话，他就说：‘说得好，就凭这几句话，到那边保险能给你个少尉排长。’指导员每次和我谈话以后，他都找到我说：‘不要喝共产党的迷魂汤……’”这时，王金盛已面如土色，这个混入我军进行破坏活动的国民党反动军官，在觉醒的解放战士面前，终于被揭露出来。

刘登旺的觉醒和控诉，一下子把诉苦推向了高潮。有的想起了自己的悲惨的身世，痛哭流涕；有的为过去的错误思想和言行，感到心里不安，向干部作检讨；有的要求在第二天诉苦。

余秋里认真地听着刘佩荣的汇报。最后，刘佩荣说：“我们的做法是，在三查中诉苦，诉苦后再三查，诉查结合。”余秋里听到这里，把笔记本一合，用右手把大腿一拍，猛地站了起来说：“好！你们后来居上，解决了一个大问题。”稍停一会儿，他又说：“三查既是检验阶级觉悟提高程度的标准，又是把阶级觉悟转化为战斗力的关键环节。诉苦是开展三查的基础，三查是诉苦的继续。这几天，我一直在考虑，如何把诉苦和三查有机地结合起来。你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们的经验说明，不搞诉苦教育或诉苦搞得不充分就进行三查，不是查不起来就是深入不下去。因为没有阶级觉悟作基础，群众是被动的，没有自觉，没有积极性。诉苦搞得越深入，三查就越有基础。诉查结合是个好办法。”

第715团在三查中诉苦，诉苦后再三查，诉查结合的经验在全旅推广以后，三查开始向纵深发展，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上下相合地普遍开展了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的群众运动。

三查运动是对每个人、对整个部队的一次全面检查，涉及的范围非常广

泛。不仅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也查工作、查纪律、查作风、查团结，还查党支部的作用；既查战士，也查干部，是一场从党内到党外的错综复杂的思想斗争。在这场规模空前的思想斗争中，旅党委和余秋里要求各级党组织和领导，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建军宗旨武装群众，并以这个宗旨为标准衡量每个人的各个方面，对一切违背这个宗旨的言行，展开严肃的批评和斗争。旅政治部提出了一些具体问题，要求大家对照检查：“你的头脑中有哪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对于解放战争的性质是不是明白了？对土地改革是不是真心实意地拥护？在战斗中，你的战斗意志坚决不坚决？你对夺取最后胜利的信心坚定不坚定？你对战友是不是团结友爱？你对人民是不是爱护，有没有违犯政策纪律？对党支部和党员的检查主要是：党支部的领导作用是否坚强有力？党员的入党动机是否端正？与群众的联系是否紧密？在战斗和工作中是否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在检查中，先由个人作自我检查，然后由大家进行评议。表扬好的，批评差的。经过诉苦提高了觉悟的广大指战员，大胆地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他们不仅批评战士，而且批评干部，在军人大会上受到批评的不仅有排长、连长，还有营长、团长。使这些同志受到很大的触动和教育。

随着运动的深入，查出了一些政治不纯分子：有顽固坚持地主阶级立场的人；有隐藏在革命队伍中进行阴谋破坏活动的奸细；有自首变节分子和企图组织投敌逃跑分子；还有恶习不改的兵痞，从而纯洁了革命队伍。同时，还揭露了不少问题和消极现象。有的干部战斗责任心差，执行上级命令打折扣，打滑头仗；有的领导干部有官僚主义，不关心下级；有的贪污公款，生活腐化；有的单位和个人缴获不归公，拍卖战利品；有的搜俘虏的腰包；有的干部有军阀作风，体罚战士；有的在战斗环境中强拉民夫，乱要牲口，私自动用群众财物。

在运动中，曾发生过一些偏差和过火行为。在审查每个人的阶级成分时，有的部队曾捆绑吊打过家庭出身不好的干部战士。余秋里发现后，及时进行了教育和制止，指出查阶级要把重点放在认真检查阶级立场上，不论是什么阶级出身，关键是看站在哪一个阶级的立场上，保证了运动的健康发展。

经过群众自觉的三查，干部战士立场更加坚定，斗志更加旺盛；新兵与老兵、子弟兵和解放兵、干部和战士、党员和群众之间更加团结；党在群众之间的威信更高了。部队中涌现了大批积极分子，不少同志订出立功计划，写了入党申请书。这既为提拔干部、发展党员创造了条件，又使每个党员和干部战士明确了自己与革命事业的关系，以及应发挥的作用，从而达到了审干和整党的目的。

在三查运动后期，第358旅根据彭德怀视察时的指示，充分发扬民主，在连队开展了推荐干部、推荐党员的工作。由士兵群众推荐在过去战斗中及诉苦三查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在群众推荐的基础上，经过党组织的审查和批准，提拔了一批干部，发展了一批新党员。群众推荐出来的干部和党员，觉悟高、斗志强、有威信、能打仗。使基层干部队伍和党组织得到了补充和加强。

诉苦和三查的深入，充分调动了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性。在这个基础上，开展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干部战士按照实战的要求，贯彻积极歼敌的思想，积极钻研各种技术、战术。在训练中，官兵互教互学，团结友爱，亲如兄弟；军政干部一条心，深入到训练中去，保证完成任务；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协



调合拍，党支部工作和行政工作协调一致，练兵热情空前高涨。1月份，正值数九寒天，冰天雪地，气候寒冷。可是，战士们没等吹起床号，就光着头，拎起木枪、手榴弹，跑到雪地上进行训练，中午也不休息，有的战士生了病也不肯停止训练，吹了熄灯号还不下操场。

这次冬季整训从1947年12月到1948年2月上旬，历时两个多月，是一次群众自我教育运动，由于采取了诉苦和三查的方法，启发和提高了阶级觉悟，划清了阶级界限，展开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基本上解决了部队思想不纯、组织不纯的状况，严肃了纪律，提高了工作效率，增强了军内外团结，大大调动了指战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一步提高了战斗力，为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军的任务提供了保证。

### 向毛泽东汇报

新式整军运动是我军的一个创举。开展这一运动，并无现成的经验，很多具体做法和经验都是广大指战员在实践中创造的。余秋里在运动中，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体察群众的情绪，集中群众的智慧，及时总结群众创造的经验，加以推广，对推动运动的深入开展，起了重要作用。

余秋里深入群众的优良作风和在新式整军运动中发挥的作用，曾受到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的高度赞扬。他说：“我军整训中诉苦运动与群众运动的开展，是把群众路线保持和发挥了。对此一问题，前委起了批准作用。起带头作用的是第358旅，又以第714团最为突出。”他还说：“第1纵队第358旅余秋里同志能深入群众，反映群众意见，具体解决问题，在这个运动中起了带头作用。”

第358旅在诉苦三查运动中的做法和经验，也引起了毛主席的重视。

1948年1月，西北野战军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中央领导同志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彭德怀向毛泽东汇报了西北野战军开展诉苦三查的情况，引起了很大的兴趣。以后，毛泽东专门接见余秋里，用两个晚上，听了余秋里关于诉苦三查情况的汇报。

第一天晚上，毛泽东先问了部队的一般情况，然后问余秋里：“你们诉苦三查是怎么搞起来的？”余秋里汇报说：“我们组织诉苦时先作调查，找出苦大仇深的典型，让他们先讲，引发大家诉苦，提高阶级觉悟。这样，每个连队一开诉苦会，大家都争着倒苦水，会场上形成一片诉苦声。有的还喊口号：‘打倒贪官污吏！’‘打倒蒋介石！’一边喊口号，一边把枪举起来，表示战斗的决心。我们领导很放手，用典型把群众发动起来，再顺着群众的激情引导群众进一步找苦源、挖苦根，使大家认识到蒋介石是地主老财的总代表，要彻底翻身过好日子，就要跟着共产党，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毛泽东赞扬和肯定了第358旅的做法。他说：“这个对，要顺应群众的心愿，按自己的主观意愿办事是不会成功的。”

毛泽东对部队里解放战士的比重很大，非常关注。第二天晚上，他让余秋里谈谈这方面的情况。余秋里汇报说：“国民党军队的士兵，除了个别兵油子，绝大多数都是贫苦出身，有的是被抓来的，有的是用钱买来的。他们在家受地主老财的压迫，到国民党军队里又受长官的压迫，有的受不了就逃跑，一旦被抓回来就打死。实际上他们的阶级成份跟我们子弟兵一样，有的家里比解放区来的战士还要苦。经过诉苦教育，他们的觉悟提高很快，揭发坏人坏事坚决得很，阶级界限划得很清楚。”接着，余秋里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解放战士路新理、于德水、刘登旺的转变情况。毛泽东听了，高兴他说：

“很好！很好！我们从中央苏区起，就想找到一个教育俘虏兵的好形式，这次诉苦三查的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讲清楚了，明天你到会上去讲，请陈毅同志也参加。”

1月20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和彭德怀的安排，余秋里在前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汇报发言。

周恩来副主席在听了各单位的汇报以后，充分肯定了诉苦三查的作法。他说：壮大军队，我们有两大法宝，一是扩兵、爱兵，一是放手发扬民主，开展诉苦运动。放手发动群众、高度发扬民主的诉苦、三查运动是有成绩的，是整军与土改结合起来的一种群众性的政治工作，应该受到称赞。

杨家沟会议以后，毛泽东把诉苦三查运动，正式定名为新式整军运动。这个运动所焕发出来的革命精神，在宜川、瓦子街战役中，显示了无比巨大的威力。

### 整军运动显威力

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1947年的西北战场同全国其他解放区战场一样，都是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现在的问题是应该准备力量去迎接全国的胜利，陕北和其他战场的我军主力要转入外线作战，到国民党统治区去，打它，吃它，不让敌人得到喘息的机会。”

1948年2月，西北野战军以诉苦三查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刚刚结束，即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展开春季攻势，转入外线作战，发起了宜川、瓦子街战役。

2月上旬，为了投入外线作战，第358旅各部队分别召开了团结进步大会，促团结，促进步，鼓斗志。在大会上，进行了战斗动员和政策纪律教育，有的连队还为被阶级敌人杀害的父母、兄弟姐妹和革命同志举行了公祭和灵前宣誓。会场上群情激愤。大家高呼：“穷人要翻身，消灭蒋匪军！”“地主富农是农民的穷根子，蒋介石是剥削阶级的总根子。”“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进一步激励了干部战士向敌人讨还血债的决心。会后，干部战士普遍订立了立功计划，纷纷上书请战，时刻准备一声令下，立即上阵杀敌。

2月12日（旧历正月初三），第358旅奉命离开清涧南下，向敌占区进军。部队进入新区以后，日夜露营，冒着凛冽的寒风和漫天风雪，忍饥受冻，无一人叫苦。

宜川、瓦子街战役，是一次围城打援的战役。彭德怀分析，我军围攻宜川，敌人必将派兵增援，其行军路线很可能是经过瓦子街。因此作出如下部署，以一个半纵队的兵力围住宜川守军，以三个多纵队的兵力在瓦子街设伏打援。具体战斗方案是：第3纵队、第6纵队以一部兵力正面抗击，不使援敌与宜川守敌会合；第1纵队截断敌退路，从左侧后攻击；第2纵队迅速从山西西渡黄河，从南向北击敌右翼；第4纵队由北向南攻敌左翼，最后合围全歼援敌。彭德怀果断地说：“就这么统统吃掉，尔后回师再克宜川，这局棋就算走完了。”

彭德怀料敌如神，我军围攻宜川以后，胡宗南果然紧急命令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增援宜川，走的正是经过瓦子街这条路线。2月28日，刘勘率两个整编师4个旅进入瓦子街，其先头部队遭到我第3、6纵队一部阻击，当天下午又下起了大雪。刘勘决定在前瓦子街宿营。29日拂晓，我第1纵队独立第1旅进入后瓦子街，歼敌一个搜索连，断绝了敌军的退路。这时，刘戡发现前进的道路被堵死，后退的道路被切断，已完全陷入包围之中。他立即

集结兵力，向瓦子街南山运动，并派整编第 90 师抢占南山，控制向南逃跑的通道，妄图夺路而逃。南山原部署由第 2 纵队堵击，但由于天降大雪，路滑难行，第 2 纵队未能及时赶到。为了保证全歼敌整编第 29 军，第 1 纵队司令员贺炳炎、政治委员廖汉生当机立断，决定由第 358 旅主动担负起第 2 纵队的任务，立即向南山发动攻击，抢占各要点，断绝敌人逃跑的通道。

军情紧急。第 358 旅旅长黄新廷、政治委员余秋里根据纵队的命令，立即进行了部署。决定由第 714 团配属第 715 团一个营，担负夺取南山的任务；第 715 团两个营进至小寺庄一线，准备阻击洛川、旧县可能东援之敌；第 716 团为总预备队，相机使用。余秋里在会上说：“夺取南山，关系整个战役的成败，要不惜任何代价，以最快的速度抢占各个要点，封闭所有南向的缺口，堵死敌军所有逃跑的通道。如果让敌人从这里跑掉，我们就是对人民的犯罪。”第 714 团团团长任世鸿、政治委员徐文礼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南山横亘在瓦子街的东南方，是一个自西向东绵延起伏串连着 6 个山头的长山梁，地势险要，尤以第三个山头为最，它是南山的最高峰。在敌军手里，守则可以作为最高支撑点，退则可以成为侧翼的有力掩护。如被我军占领，则可居高临下，形成对敌军的弧形包围，堵死敌军的退路。

在南山的第三个山头，敌我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战，在阵地上反复肉搏。第 714 团第 2 营指战员，经奋勇冲杀，攻占了南山的最高峰。接着，又和赶来支援的第 3 营第 8 连一起，击退了敌军两个团的轮番反扑，杀伤敌军 1000 多人，紧紧锁住了敌军南逃的大门，为全歼敌军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战斗中，我军战士攻得勇猛，守得顽强；干部身先士卒，亲临前沿指挥战斗。经过激战，第 2 营只剩下 120 人，第 6 连（即后来闻名军内外的硬骨头六连）只剩下六七人，仍顽强坚守阵地，直到最后胜利，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

诉苦典型刘四虎是第 2 营第 6 连第 2 班班长，在夺取南山最高峰的战斗中，他们班担任尖刀班。在向敌军进攻前，他向连长表示决心：“就是剩下一个人、一支枪、一口气，也要把尖刀插上敌人的阵地。”战斗中，他率领全班一马当先，奋勇冲杀，当冲过一片开阔地，到达敌人阵地时，全班只剩下了他一个人。这时，子弹和手榴弹打光了，就用刺刀和敌人展开搏斗，他一连刺死 4 个、刺伤 3 个敌人。其余的敌人纷纷后退。敌军官发现冲上来的只有一个人，就用枪逼着后退的十几名敌军折回来，包围了刘四虎。这些敌军看见刘四虎平端着滴血的刺刀左旋右转，怒目圆睁，威风凛凛，都不敢靠前，双方对峙着，为我后续部队上来，争取了时间。

突然，刘四虎听见右侧传来熟悉的与敌人搏斗的呐喊声，立即用刺刀向前一指，敌人忙闪出一条路。刘四虎冲过去一看，一班班长舒照明已被压在地上，一个敌人正举起铁锹朝他头上砍去。刘四虎猛扑过去，用尽全力朝敌人头上刺去，敌人的头一低，手一松，舒照明脱险了。刘四虎却因用力过猛，跌进了狭窄的交通壕里，翻不转身。他从身下抽出枪，准备同敌人拼杀，刚抬起头，拥上来的 4 个敌人用刺刀朝他刺去，顿时鲜血染红了他的帽子。刘四虎还想和敌人搏斗，他用左手抓住了敌人的刺刀，敌人怕他起来，在沟沿上往下乱刺。刘四虎终因伤势过重，昏迷了过去。这时，后续部队冲了上来，把刘四虎抢救下来，只见他浑身血肉模糊，共负伤 11 处。刘四虎在最关键的时间，夺取最关键的阵地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充分显示了我军敢于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压倒的英雄气概。战后，被野战军授予“特等战斗英雄”

称号，成为“全军战斗的旗帜”。

第4连的诉苦典型路新理，在战斗中勇猛顽强，冲锋在前，高喊着为亲人报仇的口号，杀敌10余人后，壮烈牺牲在战场上。战后被迫记特等功。

瓦子街战斗是以伏击战消灭运动中之敌。对敌方情况在战前并不完全清楚。在战场上，要求指挥员必须临机决断。任何犹豫不决，等待下级报告情况的做法，都将贻误战机。第714团团团长任世鸿为了及时查明敌情，做出正确决断，一直靠前指挥。攻击一开始，他就来到进攻出发地。在进攻南山最高峰时，他又随部队来到前沿，亲自观察地形，确定突击路线和战术手段。在总攻时，他又亲自率领第2营和团部特务连攻击敌整编第29军军部，不幸中弹牺牲。战后被野战军追评为“模范指挥员”。

第714团政治委员徐文礼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来到第2营阵地上，鼓动并指挥部队击退敌人反扑。战斗中，负伤不下火线，一直到将敌人全部歼灭。在阵地上牺牲的还有团参谋长武治安，负伤的还有副团长薛长义。三个营的营长、教导员、副营长、副教导员参战的共11人，牺牲和负伤的有7人。充分显示了我军指挥员英勇奋战、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经过3天3夜的艰苦奋战，我军全歼了敌整编第29军军部及两个整编师4个旅。事后查明，在我第714团和第716团攻进敌整编第29军军部时，刘戡打响手榴弹自毙，敌整编第90师师长严明被击毙；第29军参谋长刘振世等被俘。

瓦子街战斗结束以后，我军接着又收复宜川，歼敌1个旅。宜瓦战役共毙伤俘敌近3万人，创造了西北战场上的空前大捷。

3月7日，中央发表了毛泽东写的《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毛泽东从全局上分析了这次战役的伟大意义和取得胜利的原因。他指出：“这次胜利改变了西北的形势，并将影响中原的形势。这次胜利，证明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在进一步分析胜利的原因时，毛主席强调指出：“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冬季两个多月中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的整军运动。由于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的正确进行，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为全国的土改，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同时也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强团结。在这个基础上，部队的纯洁性提高了，纪律整顿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开展了，完全有领导地有秩序地在部队中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民主发扬了。这样就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

培养能打硬仗的石油大军

时光流逝，转瞬过了10年。

1957年，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绝大多数都提前和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唯有对国民经济有重要影响的石油工业没有完成计划。1958年初，周恩来总理同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同志谈话，请他推荐一名高级将领出任石油工业部部长。彭德怀同志经过考虑以后，向周总理推荐了总后勤部政治委员余秋里。

1958年2月，根据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提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对余秋里担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的任命。他把丰富的

政治工作经验，坚韧不拔的毅力，严于治军、雷厉风行、实事求是、以身作则的作风，带到了石油工业战线。

他运用解放军“支部建在连上”的经验，在钻井队和石油厂矿的基层单位普遍建立了党支部，设立了政治指导员，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

他十分注意队伍的作风建设，提倡和培养了“三老四严”（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的作风。

他提倡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培养了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

他还创造性地运用了解放军新式整军运动的经验，加强职工队伍建设。

1960年春，经党中央批准，石油部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开发建设大庆油田。余秋里组织领导了这场声势浩大的石油大会战。大会战是在全国经济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在“上有蓝天一顶，下有草原一片”的艰苦环境中展开的。当时，工人吃不饱，劳动强度又很大。在这种情况下，职工队伍中出现了不少问题。一是有些新工人害怕艰苦，不安心工作。到了冬天，有少数人竟然不辞而别，开了小差。二是有些基层干部缺乏管理教育经验，和大会战的要求不适应。看到一些新工人怕艰苦、讲怪话，不是做说服教育工作，而是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加以训斥，甚至扣工资，使问题不但得不到解决，反而使矛盾更加激化，造成干群关系紧张。这种情况引起了余秋里的高度重视。他认为，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必将影响会战的深入发展，影响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怎么办？他想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开展新式整军运动的经验，决定利用天寒地冻，野外不便施工的时机，对会战队伍进行一次整训。

整训开始后，充分发扬民主，放手发动群众，要求大家对会战的各项工作提意见。对上、对下、对个人、对单位，从生产到生活，有啥提啥。十几天里，就提了几万条意见，主要是集中在基层干部身上。根据这种情况，余秋里和会战工委其他领导同志研究以后，决定整训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整顿干部作风，解决于群关系问题；第二步，启发、引导职工群众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树立主人翁思想，坚定搞好石油大会战的信心和决心。

在整顿干部作风时，余秋里提出：对基层干部的优点，一定要肯定，要保护；对他们的缺点，一定要严肃批评，绝不姑息迁就，方法是充分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有一个采油队长，觉悟高，干劲大，技术上有一套，生活上从不特殊，就是作风粗暴，动不动就训人、骂人、扣工资。有一个工人在生产上出了事故，他竟给这个工人挂上牌子，站在食堂门口示众。整训开始后，大家对他意见很大，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有一位老工人说：“你严格要求，我们没意见，可对工人蛮不讲理，不是训，就是骂，就不对了。”有一位转业战士批评他：“你也是解放军转业的，可你忘了官兵一致、官兵平等。你动不动就训人、骂人、整人，这不是‘军阀主义’吗？”经过领导教育，工人批评帮助，这个采油队长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他说：“我自己9岁跟母亲沿街要饭，11岁给地主放牛，受尽了地主老财的欺凌和打骂，如今当了采油队长，倒变得像个国民党的工头了，看来自己是忘了本了。”认识错误以后，他主动到全队30多个挨过他训斥的工人家里和宿舍里拜访，赔礼道歉，检讨错误，得到了大家的谅解。从此，这个队的干群关系改善了，队伍团结了。这个采油队长作风的转变，受到余秋里的公开表扬。在这以后，

有 1300 多名基层干部，到工人家里和宿舍里，登门拜访，个别谈心，赔礼道歉，解决了干群之间的疙瘩。

干群关系得到调整 and 解决以后，又从职工的思想实际出发，普遍开展了“如何对待会战中的艰苦和困难？”的大讨论。

在讨论中，启发、引导工人从自己讲起，从自己家庭讲起，看看解放前后有什么变化。新老工人、干部联系到自己解放前的痛苦生活，普遍地算了政治地位、经济收入、文化生活等几笔帐，进行了摸得着、看得见、令人信服的新旧社会对比，认识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和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接着，又引导大家讨论“在旧社会吃苦和今天吃苦有什么不同？”经过广泛深入的讨论，大家认为：“过去的苦，是为资本家、地主当奴隶、卖命，是受剥削、受压迫的阶级苦。今天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是在为建设自己国家吃苦，也是为创造新的幸福生活吃苦。”

通过整训，提高了广大职工的政治觉悟，正确认识了大会战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以及个人、集体和国家三者的关系，树立了以艰苦为荣、坚持会战为荣的思想，培养了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在石油工业系统，由于学习和运用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培养了一支敢打硬仗的产业大军。正是依靠这支队伍，在困难的时期，在艰苦的环境中，艰苦创业，高速度、高水平地建设了大庆油田。以后，又开发建设了胜利油田、华北油田、辽河油田。大庆等油田的建成，根本改变了我国依靠“洋油”过日子的情况，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64 年 12 月，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石油，不论在数量或者品种方面，基本上都可以自给了。”

当时，身处逆境的彭德怀听到这个激动人心的喜讯，显得格外高兴。他对身边的亲属说：“1958 年，我向周总理推荐余秋里当石油部长，看来，这个人选对了。”

语重心长话今昔

1982 年 9 月，党中央、中央军委任命余秋里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在他离开军队 24 年之后，又重新穿上了军装。

1983 年 12 月，在毛泽东同志诞生 90 周年前夕，《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记者，采访余秋里。他根据记者的要求，着重就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军队的建军思想和他创立的我军政治工作，在军队建设和作战中的伟大作用，谈了自己的体会。他特别谈到了西北野战军开展的新式整军运动，谈了运动开展的历史背景、过程和焕发出来的伟大力量。

记者请他谈谈，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的新式整军运动的主要经验是什么？它对我们今天有什么现实意义？

余秋里稍加考虑以后，回答说：“我体会主要有 3 条：

第一，它再次证明了毛泽东同志说的，人是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从根本上提高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是全面提高部队战斗力的中心环节。

广大指战员政治觉悟的提高，不可能是自发实现的，需要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向他们灌输革命的、科学的思想，灌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所说：‘要用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要用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战斗热忱，技术和战术才能发挥应有的效力。’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推翻他们的政治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建立新中国。当时党和军队的政治工作，就是要教育广大人民和干部战士，使他们懂得受剥削压迫的阶级根源，弄清民主革命的性质、对象和任务，并为夺取革命的胜利而英勇奋斗。诉苦三查，正是因为抓住了这个根本之点，才大大调动了指战员的革命热情和战斗积极性。

今天，我们的任务是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文明和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同战争年代打江山的任务不同了，客观条件也有许多新的变化。但要完成新的历史任务，同样离不开具有高度觉悟的人。因此，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激发人民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为建设四化、保卫四化，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的精神，仍然是极其重要的。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沿用战争年代诉苦运动的具体作法，但在抓人们根本的政治觉悟这一点上，应该同过去是一样的。今天要求我们全军指战员应该有什么样的政治觉悟呢？就是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具有科学的认识和坚定的信念，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

第二，思想政治工作要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去进行，要从实际出发。我们党在解放战争中的中心任务是武装夺取政权，同时实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它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能够有效地提高指战员的阶级觉悟，解决部队的斗志问题、团结问题、纪律问题，全面提高部队战斗力。诉苦三查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适应当时斗争任务的要求和部队的实际情况应运而生的。这就告诉我们，思想政治工作不能离开党和军队所处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和具体任务，不能脱离当时的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这一点，是我们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遵循的一个根本原则，对做好今天的思想政治工作，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第三，思想政治工作要走群众路线。诉苦三查是广泛的群众性的自我教育、相互教育。这个办法开始也是群众创造的。它是领导机关、各级干部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体察群众情绪，集中群众智慧，总结群众经验开展起来的。这次教育是一次生动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许多深刻道理是通过干部战士亲身经历的活生生事实来说明的。走群众路线，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是最好的最有力的教育方法。

战争时期，我们部队没有可能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现在有这个条件了，进行系统的理论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应当高度重视和坚持发展这种教育。但是，这种系统的理论教育以及其他的思想教育，都必须结合群众的实际生活和斗争，并从中吸取新的经验和材料，吸取生动的语言和事例。否则，我们讲的道理就不会使群众感到亲切、好懂，不会有很强的吸引力、感染力、说服力。

新式整军运动，是我军思想政治工作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新发展。在今天新的历史时期，要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威力，既要继承传统，又要不断创新。总是老一套是适应不了变化了的情况的。要有新的思想，新的道理，新的方法，新的形式。新的创造从何而来？新式整军运动给我们的启示是：新的经验在基层，新的创造在群众之中，我们政治工作领导机关和政治工作干部，一定要像战争年代那样，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弄清新情况、新问题，善于发现和及时总结群众的新经验。”

余秋里说：“注重思想政治工作，把政治工作看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和传家宝，是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思想，是他的人民军队、人民战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式整军运动一开始，就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极大关注和支持。经过他的倡导，在全军都开展起来了。”

余秋里还说：“我们纪念毛泽东同志，最好的办法就是认真学习他的革命思想和革命实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毛泽东思想继续推向前进。”



# 英风傲骨周希汉

韦晓咏

周希汉（1913～1988）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13年农历8月28日出生于湖北麻城周家坳，14岁参加黄麻起义，次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加入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班长、排长、连指导员，后任红四方面军总部参谋和红9军、红31军作战科长兼教导队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第386旅作战科长、团参谋长、旅参谋长、太岳军区参谋长、南进支队司令员等职，参加过神头岭、香城固、百团大战等著名战役。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4纵队第10旅旅长、第二野战军第13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滇南卫戍司令员，第10军军长，海军参谋长、副司令、顾问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他为人民海军的创建和发展，特别是在领导建造核潜艇等现代化装备过程中，呕心沥血，身患绝症仍不遗余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88年，他在75岁生日时，向残疾人协会捐赠了大批珍贵书籍，同年11月7日逝世。

\* \* \* \* \*

## 赵城试刃

已经立过了秋，天还是热得人心里着火。云不动，树梢不动，连草叶都不动。蝉儿一面拼命地吮吸树木的浆液，一面发疯似地鸣叫，像要把天叫破。

这是1946年8月的一个下午。山西赵城。国民党第39师师长贾宣宗站在一座高高的门楼下，正在给刚刚组建起来的“奋勇队”训话。他颇有军人风度，任斜阳耀眼，任汗水洗面，他仍然同队列里的士兵一样，保持立正姿势，只是为了加重语气，不时地挥挥手臂。

“……至于共匪陈赓部，其实确无可怕之处。民国23年，他们就是国军的手下败将，在南方无法立足，才窜到陕北。若不是抗战爆发，他们早被剿灭多时了。仗着跟日本人捉过几天迷藏，他还土地爷打喷嚏——神气起来了。我们是国军的正规师，他胆敢来犯，你我众弟兄，定要众志成城，坚守待援，并与援军和壁，将其就歼于城外，为党国建功。”

“为党国建功！”

声音不太整齐，却也算得上洪亮。奋勇队这300人，是从3000多人里反复挑选出来的，都是精壮汉子。他感到满意，一摆手，“发双饷。”

发了双饷，接着摆下酒宴。

贾师长没有同部队同饮，独自一人回到指挥所，扯下被汗水湿透了的军装，摇着扇子立在地图前发呆。霍县在赵城的正北，却有汾河相隔，他们要来，得绕道。那也不过只是两个小时的路。可第69师到时候能舍命救援吗？自己能撑到援军来到吗？那共匪若来，肯定是陈赓的部队。虽然他在奋勇队前说了一通打气的话，可吹牛归吹牛。论真格的他对陈赓确实是惧怕得很。谁不怕？连日本人都怕。想到这儿，他那摇扇子的手不由地在半空中停住了。

城外一座小山坡下的树林里，也有一个人在不声不响地看地图。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陈赓的太岳纵队来了。不过不是全部人马，只是纵队的主力第10旅，旅长便是给陈赓当过多年参谋长的周希汉。这位周希汉旅长30刚出头的年纪，不知是因个儿高而显得格外的瘦，还是因为瘦而显得格外的高，总之是又瘦又高。他面庞清秀，眼睛不算很大，而且总是微眯着，却含着一股烁烁放光、咄咄逼人的气势。再配上那张两边稍有些下垂的嘴角，

不怒自威。他蜷着又高又瘦的身体半蹲半跪地看那铺在地上的地图。只要他不说话，他周围的人也不会说话。这已成惯例。

他和陈赓不同，陈赓将军无论在什么场合都有开不完的玩笑，在指挥所里也不例外。周希汉平时也同人谈天说地，但一进了指挥所，或者勘查战场，布置任务，便严肃得令人有些生畏。特别是在他思考问题时，没有让你讲话的时候，你最好大气也不要出。不出声，你却不能不动脑筋。因为一旦他让你开口时，你必须立即有长有短地讲个明白。哪怕你说的同他想的南辕北辙，他也不怪。甚至，你还可以同他争论上几句。若是你对了，你便总能看到他的笑脸。若是他让你讲，你讲不出个一二三来，那你便等着挨擻吧。最多有这么两次，你就得准备打背包了。

勘查战场，你不必总跟在他身边，但回来后，你少算了一个点，他可饶不了你。当然，我们这里说的只是他身边的团长、参谋们。对别的什么人，那就另当别论了。尽管如此，他的部下都愿意看他吹胡子瞪眼，因为，这才说明他重视你。

仗打完了，一般指挥员，都会想办法轻松轻松，钓钓鱼，打打猎，喝两口，杀一盘，或者干脆睡它一大觉，总之要换换脑筋。周希汉则不同。他要把司令部的人拉着，尽可能快地分析战斗情况，从头到尾，战斗发展过程与预先计划是否相同，如不同，是事先的疏漏，还是情况变化，必须结果透彻，结论清晰。他自己很累，给他当参谋也很累，所以参谋们背后说他打的仗像绣花。不过周希汉打仗的本领，也就是这样常常在别人看不清、摸不透、拿不准的情况下象绣花一样精确、漂亮、完整地“绣”出来的。

大约 10 个月前，这赵城曾经被第 10 旅攻破过。不过那时守城的是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几乎是冲锋号一响，城就破了。后来，为了顾全国共和谈的大局，第 10 旅主动撤离。撤离时，平毁了城防工事和部分城墙。一转眼，这里又是碉堡林立，工事套着工事。

西门遥对汾河，附近都是水田，无法靠近。城北地形狭窄，没有城关，也不宜靠近。东门外有少量民房，可作攻城依托。城南关有千余户人家，抵进城门。拿下南关，便可威逼南门。敌人的防御重点也在南门。南关驻有一个团的兵力。南关东南有据点，孙堡驻军一个营。孙堡到东门之间有据点东堡，寨墙与城墙同高，也是个重要据点，驻有敌人一个连。东门外车站、磨头和北门外的窑子镇三个点守军都是一个连。这样自南而东而北，像一个伸开五指的巴掌，又像一把南粗北细的镰刀头，形成了赵城的外围防御体系。

“你们说说看吧”，周希汉原地坐下，终于开了口。大伙围拢来，你一言，我一语他说开了。意见基本一致，都认为应该先清除外围，把敌人伸出城外的几个触角搞掉再攻城。见旅长眯着眼不同为什么，那便是“正合我意”。几个团长争着要率本团肃清外围。周希汉这才摇摇头。

“这是我们粉碎国民党全面进攻的第一仗，也是我们第一次打他正规军把守的县城。除了第 28 团之外，我们另几个团都是刚补充起来的。部队里没有打过仗的人不少。清理外围要造成局部的以强凌弱，要先拣软的捏，几个点都要以团的规模进攻，要打出士气来！”接着，他对怎样打，进行了具体的布置。

各团长领命而去，只剩下周希汉原地坐着。他摸出一支自卷的炮筒烟拼命地吸了起来。

周希汉的烟瘾很厉害。他有“三不抽”。一个是“没规矩”的场合不抽，

——周希汉戏称，那是睡着了。睡着了自然是不会抽的。第二个是“有规矩”的场合不抽，在队列前不抽。第三是晋见上级首长汇报工作时不抽。除去这“三不抽”外，你的眼前就永远是烟云滚滚，“半人半仙”的周希汉了。当然，只有在陈赓面前是个例外。

他吸烟的历史，是从十来岁时偷偷抱着爹爹的水烟袋吸了几口后开始的。在太岳抗日根据地，物质十分匮乏，香烟可不是什么时候都能搞得到的。没有香烟就抽烟叶，没有烟叶他甚至用树叶加别人沏过水又晾干了的茶叶代替。

那时，陈赓是八路军太岳军区司令员兼第386旅旅长，周希汉是太岳军区参谋长兼第386旅参谋长。陈赓的烟瘾不大，但他有一手绝技，他可以抓过别人的烟，深深地吸一大口，然后吐出一连串的烟圈来，而且可以做到后面的圈从前面的圈钻过去。他和周希汉配合默契，情同手足。先是两个人常在一群干部、战士的鼓动欢叫声中争相献技一试高低，后来陈赓终于看出周希汉烟抽得太厉害了，便开始劝他戒掉。“周希汉，看你瘦得像根烟卷，你要是不吸烟了，‘瘦子’的外号我就带头不叫了怎么样？”“周希汉，你再不戒烟，下次好仗你别想打。”好说歹说，周希汉的烟就是戒不掉。

有一次，陈赓在一次表演完套烟圈的绝技后，又将了周希汉一军，当着许多部属的面，周希汉终觉没有了退路，二人便打赌击掌，从此戒烟。谁要再吸烟，便当众刮鼻子，打屁股，以示严惩。

没两天，周希汉便忍不住了。实在没办法，他便慌忙地躲进厕所，吸了起来。到底司令的耳目灵通，陈赓亲自跑到厕所里揪着他参谋长的耳朵拉到众人面前。没什么话好讲了，当众刮鼻子打屁股。这是君子协议。鼻子是的确刮红了的。可刮也刮了，罚也罚了，烟却仍没戒掉。

兵法云：“十则围之，倍则攻之”。就是说，当你的力量十倍于敌方时，你可以把敌人包围起来；当你两倍于敌方时，你可以向其发起进攻。眼前却是敌我力量相当。他周希汉一个旅要吃贾宣宗一个师，而且人家这个师还在城里，他得打破城去吃，谈何容易！

如果手里不是这三、四个团，而是十来个团，那就好了，周希汉心想。他自认为根据他在抗日战争中的经历和功绩，他完全有能力有资格指挥这么多的部队。

对于每一个军事指挥员的表现、才能和功绩，领导心中是有一杆秤的。不过，如何使用一个干部，他们自有他们的想法。古往今来，人们都津津乐道“破格使用”这个词，而破格使用也是有条件的。比如资历，它不能被看得很重，但又不能一点都不看。因为它与能力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周希汉自当第9军作战科长时起，还不满20岁，便开始了指挥团以上规模部队的历史。但是，从科长到旅、军分区一级的领导，他从来没有当过团长。没有当过团长就当旅长已经就是破格之举了吧？

再说，周希汉仗打得虽然出色，但有点骄傲，连陈赓也不敢当面顶撞的上级领导，他都敢顶。似乎他心中除了徐向前、陈赓再没别人了。

纵观周希汉在战争年代的履历，从士兵到军长，除去抗日战争后期他任过一段太岳军区第2分区副司令员以外，他所任的职务再没有带“副”字的。而那个大岳第2分区的副司令就是实际上的司令，因为在他任副司令期间，该分区没有配司令。此人似乎不适合当配角，他好像天生就是个作主决断、拿大主意的坯子。

对他的傲气，领导上当面批评过，背后关照过。打掉一些楞角，目的是为了将来给他更重的担子。让周希汉在陈赓手下当旅长，他是没有什么话可说的。而且，这个旅就是由抗日战争时期赫赫有名的第 386 旅整编而成的。这个旅所辖的第 23 团即是第 386 旅的第 772 团，是红军时期保留下来的建制团，战斗力很强。凡抗战时期在该团任过团长的，只要活到共和国建立后，都在高级将领的行列中。这个旅的旅长，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当的。除了陈赓，不就是周希汉了吗？仅这一点使周希汉的自尊心得到了满足。用希汉将军自己的话说，这个旅交给别人带，他还舍不得呢。

周希汉在第 386 旅当了多年的参谋长，对这支部队是有感情的。这种感情不像国民党高级指挥官那样，把自己的部队当成发家的本钱，看成自己的私产。他深感到革命前辈千锤百炼培养造就这支优秀的部队不容易。不能让这支部队在他周希汉手里垮下来，或者受到任何不必要的损失。像一把好刀，需要不断地使用和磨砺，保持它的锋利，但又不能胡劈乱砍，伤了刃口。部队不打仗，不会有战斗力。战斗力很强的部队总也不打仗，它的战斗力也会减退。打得太苦，又会伤了元气。

大战将临。兵少也罢，官小也罢，这些都推得推到脑后去。就是这些兵，也要打这个硬仗。打胜了，才是周希汉。

天渐渐地暗了下来，一群蚊子在周希汉的头顶上飞舞作一团，却不来叮咬他，大概是怕他身上的烟味吧。他的身形掩在暮霜中，只有那烟火，一亮一暗。

此时此刻，若交给作家去描述，他恐怕会加上这样一笔——周将军另有一丝甜甜的不安和牵挂，他的妻子正在临盆。

秋后的白天虽然热，夜晚还是可以睡个好觉的。而贾宣宗已经连续多日没睡什么好觉了。同为国军的师长，有的人可以在后方灯红酒绿，他贾宣宗却要到这“戡乱”前线来担惊受怕。说什么多少多少天内消灭共军，真是不养孩子不知道肚子疼。从民国 19 年就开始大举剿共，剿到如今，越剿越多，哪里能看到个“灭”字呀。“奋勇队”的成立多少使他的心里有了几分安稳，他竟然在上半夜就睡着了。

依稀间，贾师长好像听到了枪声。醒来细听，果真有枪声和爆炸声，倒不十分激烈，却是好几个方向都有。静神再听，很快就又没了声息。刚想躺下再睡，电话铃便令人心颤地响了起来。

“窑子镇失守！”

“磨头失守！”

“车站失守！”

怎么这么快？！看来真是陈赓来了。怎么办？车站不能丢。天亮后应该派人夺回来。或者，应该把东堡、孙堡两个点都收缩回南关，要不就收缩回城里。是共军干的太利索，还是自己的人太蠢，三个点上怎么就连一个跑回来的人都没有，派出去探听情况的，也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

天快亮了。猛然间，城东、城南枪炮声骤起。

“报告师座，东堡和孙堡同时遭到共军的袭击！”

要东堡，东堡不通。要孙堡，孙堡也不通。要南关，守南关的团长兼“奋勇队”队长接了电话，“还不清楚，一听到枪声，电话线就断了。”

“你怎么不派人去接应他们一下？”

“去了，去了三次。根本靠近不了。师座，是共军的主力部队来了，火

力猛得很。天又黑，又没有摸清情况，我怕南关有失……”

“你吃屎去吧！没用的东西。天亮以后，无论如何你得给我把孙堡夺回来。不然，你也就别守南关了！”

手下就是这么一杆子人，你说让人怎么办。贾宣宗气哼哼地扣上了电话。枪声却突然稀疏下来。这也不是什么好事，想必两个点已经丢了。

电话铃又响了起来。“师座，是孙堡！”

孙堡？！贾宣宗抓过电话，“我是贾宣宗！快讲快讲……”

“我是周希汉”，对面传来一个浓重的湖北口音，那“汉”字还往上悠扬地拐了一道弯儿。

周希汉！我的老爹！怎么是他？！他比陈赓的手还要狠。“老爹”没有等贾宣宗答话，便一字一声闷雷地说：“贾宣宗，我把你包围了。你投降就是了。”

贾宣宗怔了一下，不由自主地把话筒从耳边移开了一点。稍顷，他说：“笑话。我不是民团、保安队。”堂堂国军师长不能让一个周希汉给吓唬住。

“随便你喽！中午十二点，你不开门，我攻城。”

对面电话挂断了。“这年月，怎么尽出这种邪门的事。你攻城？攻吧。我等着你。我这三四千人好歹也够你招呼一阵子吧。你狂什么！”贾宣宗嘟囔着扣上电话大喊一声：“奋勇队集合！”他大步跨出指挥所，又飞快地转回来，要通了南关的电话，命令道：“马上集中所有的火炮，目标孙堡三营指挥所，狠狠地打。给我把它炸平！”

贾师长看着手表，又叨咕起来：“太慢了，太慢了，这群吃货。好，炮声响了，越来越密集，不要多，有一发命中就行。周希汉，看咱们谁狠？”贾宣宗心里开了花。

电话铃又响了。他抓起电话。“贾宣宗，”又是“老爹！”“。你浪费的炮弹太多了吧？天亮了，你的时间不多了哟。”

贾宣宗泄了气。常言道：“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他这才明白，自己把周希汉看得太简单了。

周希汉根本就没进孙堡。他正在离孙堡不远的自己的旅指挥所里。刚刚被招到他身边的第30团团团长卢显阳，看了旅长同敌人师长通的两次电话，心下有些不解，便问：“旅长，进攻计划改变了？”

“哪个讲的？”周希汉盯了他一眼，“你要是不动脑筋，怕只能当个团长哟。”也难怪卢显阳。跟贾宣宗通电话，是周希汉的即席发挥。他见打下了孙堡，突发动意，想给贾宣宗套个紧箍。他从来也没有指望贾宣宗能投降。须知，此时正是蒋委员长发动的全面进攻刚刚开始，从数量上比较，国军占绝对优势。贾宣宗在阎锡山手下也算得上个人物。他岂肯轻易言降。那他会不会趁天亮突围逃跑呢，也不会。他贾宣宗的任务，便是守这赵城，还没有受到实质性的攻击便弃城突围，他无法向阎长官交待。周希汉就是要让对方整整一天都处于精神高度紧张的状态，最大限度地使敌人疲惫，自己的进攻就多几分顺利和把握。部队就会相应地减少伤亡。

卢显阳挨了旅长的批，马上就明白过来，自我解嘲地拍拍头。周希汉把他招到地图前，用手指点。这回团长可是一点就通，连连点头。周希汉叮嘱道：“这是个关键。我身边兵力太紧，你不能多带人。”

“我带一个营。”

“一个不行，你带上两个营。剩下的给我留下。你动作要快。”说完，

他重重地按了卢显阳肩膀一下。

卢显阳挺胸回答：“是！”敬了礼，飞身离去。

正午时分，工事里热得人流油。我军并没有发起进攻，但是敌军也不敢开饭。周希汉的电话倒是救了守南关的敌团长的驾。他接到命令：不必夺回孙堡了，但要严密监视共军的动向，要枪不离人，人不离工事。可是，蹲战壕的滋味也不好受呀。

下午三点，贾宣宗刚想下命令部队开饭，突然，南关和东关同时遭到炮火攻击。几座碉堡掀了盖，好一阵紧张。共军却又没了动静。直到太阳落山，部队总算吃上了饭。

正当贾宣宗坐立不安时，汾河西好义镇方向传来了枪炮声。虽然离得远，听不很清楚，但可以判断出战斗是很激烈的。他想：“这下好了。第69师来了。他娘的，干什么晚上才来？”贾宣宗吁了口气。“来了就好。让他们先把车站夺回来，把共军压到南面。他周希汉的城就攻不成了。”

过了许久，那边没了动静，贾宣宗登上城头向西臆望。可真是望眼欲穿，两个多小时过去了，一个人影也没见到。他哪里知道，霍县第69师的增援部队在好义镇遭到了卢显阳指挥的我第30团的顽强阻击，丢下100多具尸体，抬着伤号，已经狼狈地退回去了。

午夜，无论当官的怎样督促，疲惫不堪的敌兵就是打不起精神来。解放军攻城的炮声响了。南面、东面、北面同时吹响了冲锋号。养精蓄锐一整天的我军战士们，个个都如出山虎一般。杀声，号声，炮声搅成了一团。

贾宣宗的“奋勇队”倒是“奋勇”了一阵子，也就个把小时，南关便丢了。解放军抵进了城门。

原来，这打仗的秘密就是一个——扬长避短。把自己的长处发挥出来，打在对方的短处上，仗就胜了。离得远，大家彼此彼此。或许国民党军队还占点上风，因为他们武器好。离近了，短兵相接，那就是解放军的优势明显了。为天下穷苦人的翻身解放而战，它所激发出来的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那是敌军在重赏之下鼓起的“勇气”根本无法与之相比的。

贾宣宗苦撑不住，再也顾不得面子，下令拂晓前弃城向霍县方向撤退。

城头上还在肉搏，贾宣宗的大队人马就开始从西门一拥而出。这倒正中周希汉的下怀。倘若贾宣宗缩在城里，来个乌龟不出头，那么我军即使攻破了城，也得同他打巷战。城里敌人有工事作依托，攻城的则不熟悉地形、地物，又要避免人民群众受伤害，无形中便处在被动地位，伤亡和消耗都会增大。“围三阙一”，周希汉为的就是把贾宣宗赶出城，让他失去工事依托，在运动中歼灭它。

贾宣宗在前，我军在后，一路追杀。敌军的撤退变成了逃跑，哪里还组织得起还击，只剩下挨打的份儿了。

到了汾河边，贾宣宗的部队已经损失过半。他急令组织徒涉。心想：只要渡过了河，在好义镇隔河抵挡一阵子，就可以把剩下的这点人马拉到霍县了。那便总算是没有输光。你周希汉横是不敢追到霍县去吧。

真是死到临头还在做梦。他再一次进了周希汉给他挖好的坑。

前面的敌兵刚刚登上汾河西岸，便被迎头一阵机枪子弹砸在河滩上。原来，卢显阳团长率领的两个营，急袭好义镇，击退了霍县援敌之后便埋伏在好义镇汾河渡口，正等着他们呢。

敌人挨了迎头痛击，正在河里的便转身往回趟。趟水走得慢，成了机枪

步枪的靶子。东岸刚下水的见状，便拼命往岸上爬。后面的又收不住脚，奋力往河里拥。敌人溃不成军，顷刻瓦解，死伤无数，活着的大部分当了俘虏。

周希汉策马来到了歼敌战场时，天已大亮。一轮红日高高升起在空中，汾河滩恢复了宁静，汾河水无声无息地淘净国民党士兵的血污。国民党武装力量序列中，第39师在一夜之间被抹掉了。

周希汉立马河边，回望朝阳。一阵晨风掠过，凉气习习，暑气全无。

秋天，毕竟是秋天到了。

歪批“八字”

就在周希汉攻克赵城的那个清晨，他的妻子周旋给他生了个儿子。

这是他们的第二个儿子。他们的长子是1944年他在中央党校学习时降生的。由于是生在太岳根据地，生在延安，所以取名叫周太安。他还没有见到第二个儿子，便从陈赓将军的口中得到了消息。

他打电话向陈赓简单汇报了攻克赵城的经过，陈赓听后对他说：“好啊。周希汉，你是双喜临门啊。得了赵城，周旋同志又给你生了个胖儿子！”

“你看见啦？”周希汉一下子提高了嗓门。

“那是当然！我在这个问题上从来不犯官僚主义。他们抱过来给我看，我是仔细过目的呢。一点都不含糊，那下边别着个‘撸子’，威风得很呢。这小子是个外交官的料，见到谁都笑。长大以后准比你有人缘。赶快回来！等着你请我们吃酒呢！”

那边电话挂断半天了，周希汉还手握话筒站在那里，嘴巴怎么也合不拢。

周希汉出生在湖北麻城周家坳。从他父亲往上，整整是三代单传。他的父亲周启耀，30岁前曾娶妻并生有一子。可惜，那孩子两岁便生病夭折了。不冬，其妻也贫病交加，不治而死。数年后，其父续弦，40岁上得的周希汉。他爱若掌上明珠，给儿子取名叫祖荣。

周启耀祖祖辈辈精明能干，种田打铁，远近闻名。如同那个社会里大多数农民一样，他不仅没能发家致富，而且祖祖辈辈饱受地主老财的欺侮，因此，当只有14岁的儿子参加震惊中外的黄麻起义时，他没有阻挡，反而非常支持。他知道，儿子闹的是穷人的天下。

但是，当1928年红军要把队伍拉进大别山时，他望着年幼的儿子心乱了。革命是要革的，但革命也不能断了祖上的烟火啊！

他急急忙忙请算命先生推算了祖荣的八字，并按照先生的指点，给儿子不由分说定下门亲事。

先生说：“祖荣是王侯之相，却是一生的命里注定奔忙之人，需讨一房有富贵命相的妻子服侍。”

一向倔强的儿子，执拗数日之后，在成亲的那天，却没有反抗。他可以梗着脖子对着那铁匠父亲高高举起的棍棒，却听不得父亲呼天抢地的悲声。

那女子少言寡语，结实勤劳。何等相貌，叫什么名字，他是一概记不得说不清了。只知她姓郑，比自己大三、两岁。

婚礼很简单，但闹洞房的人总还是有的。那郑氏离开娘家时还在劳作，又被闹了一晚，着实疲惫。她没有留意新郎送最后的客人时，如何送的那样久，歪在床头，便睡着了。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恍惚间，记得夜晚并没有发生离家时母亲交待的那些羞人的事情。直至里里外外都寻不到新郎的踪影，她才着了慌。

岂不知，新郎已经借送客之机，远遁山林，连夜追赶队伍去了。

在川陕根据地，在延安，周希汉曾经得到过几次家乡的消息。他的父亲为寻找他，挨过国民党兵的暴打，但同样倔犟的父亲仍然不死心，把家里全部的财产——一群小猪仔赶着上了路。一路走一路卖，千难万险地走到黄河边时最后一只小猪也卖掉了。父亲站在黄河边哭着喊着儿子的名字蹒跚而归，回家后便一病不起，不久病重而亡。母亲也因思念、惊吓、悲伤过度相继而死。那郑氏，一说是改嫁了，二说是回到她母亲那里发誓终身不嫁。这些消息的细节难以考证，家里没人了，却是千真万确的。若干年后，他南征路过家乡，他家的宅地上已是瓦砾遍地，青蒿没人。家乡一个半瞎了眼睛的远房叔伯伯告诉周希汉，他父亲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是把他唯一的一封家信双手捂在胸口上离去的。……

1941年，太岳根据地党的领导同志和陈赓等人开始为周希汉张罗婚事，周希汉担心来自家乡的消息不可靠，迟迟没反应。

众人怕他又犯了犟，有些着慌。倒是陈赓稳如泰山。他掐起手指，口中念念有词地嘀咕一阵子，指指周希汉说：“不对吧？”

周希汉知道他又要捉弄自己了，虎起脸问：“怎么不对？”

“你家请的那个算命先生讲的不对”。

“哪个还管他讲的对不对，”周希汉撇了撇嘴：“他到底也没有算出来我会逃跑闹革命嘛！”

陈赓却十分认真地说：“唉，不，不，旗门遁甲、易经八卦那一套，本司令蛮精通呢。你那个郑氏，是个富贵命不假，可是她生不逢时”。

众人见他说的蹊跷，便都打起精神往下听。陈赓干咳了两声继续说：

“你们看，那郑氏大周希汉两岁，应该是辛亥年生，那可不是个好年份。孙中山先生多么伟大？他领导的民主革命，推翻了我们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可就因为武昌起义发生在这辛亥年，结果怎么样？胜利果实被反动军阀窃取了。有始无终呵。那个郑氏，进了洞房，还让周希汉给跑了出来，岂不也是有始无终？”

这时，陈赓继续给周希汉“批八字”。“你们不要笑，据我算来，他周希汉命中该取17岁的姑娘。那郑氏当年是17吧？我们不说她了。咱们太岳有个叫周旋的女同志，今年也是17岁吧？这生辰八字嘛，正好！同他周希汉属相很般配！哎，别笑嘛。你们看，他周希汉是癸丑生的。他这个‘癸’字有说法。谁不知道天在咱们的头顶上，可是，你们看，他这个家伙敢叉开双腿，把天骑在下面。这么大的脾气，谁敢惹他？将来弄不好他连天王老子都敢得罪！你们不信？反正我信。

你们再看周旋同志。她是甲子年生，这个‘甲’字像什么？像个蚊子拍嘛。她如果一天到晚地拍打他这头犟牛，身上的牛虻啊，缺点啊，苍蝇啊，这不是很好吗？这叫一物降一物哟。”

一顿东拉西扯，逗得众人大笑起来。

这周旋同志本是有名的“太岳区一支花”，年轻漂亮，聪明能干，工作热情泼辣，又有文化，且正值妙龄。追求者可谓成群结队任她挑。她对这种组织出面的“政治婚姻”能满意吗？她对这么大的年龄差距能接受吗？

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内外的野史、外传，对共和国开国元勋们的婚姻涉猎渐多，所言是者寥寥，根本原因是作者对战争年代的生活缺乏了解，没有用历史的观点去看待那个时代特殊的婚姻组合的意义。笔者在这里只是尽可能对周希汉的婚姻作一客观介绍。



周旋早就公开宣称她不喜欢军事干部“大老粗”，很多次介绍这样的干部给她，她都推说自己还太年轻急需学习进步而拒绝了。不过她对周希汉是十分敬重的。在太岳区，周希汉是青年将领中的佼佼者。在当年太岳革命根据地流传的一首民谣中是这样唱的，“……小日本，你听清；太岳山上有陈赓。小日本，你别吊蛋，让你碰上周希汉。……”

周希汉在太岳区被称为“常胜将军”，不仅是因为他英勇善战，还与他犟的出奇、清高骄傲的个性有关。这在特定的时代、历史背景、环境中并不是什么值得特别称道的品质，过于个性化的脾气性格弄不好会出岔子的。

在鄂豫皖根据地时，一天宿营，为了工作方便，参谋周希汉把一处土豪的大庄院安排给党中央的代表张国焘住，生性多疑的张国焘，看那房子周围无其他建筑，觉得它目标太大，容易受到飞机的袭击，便认定周希汉是有意陷害他。周希汉明知张国焘是借题发挥，便怒目圆睁据理力争，死活不认错。张国焘当即下令砍他的头。幸亏行刑前被徐向前撞见而救出了他。松绑时，他的脖子还是梗着的。若没有徐向前的一再保护，他早就死在张国焘的重刑之下了。

在川陕根据地时，旧军阀出身的红九军军长何畏，非要把自己的一次指挥失误推给作战科长周希汉。周希汉犯了犟。何畏恼羞成怒，竟然气急败坏地抽出手枪，对准周希汉连发数枪。不知是他的枪法不准，还是周希汉命大，居然一枪未中。枪声落了，周希汉仍然梗着脖子在陈述自己的理由。倒是何畏冒出一脑门子虚汗，瘫在椅子上再也骂不出声来。

虽说几次都是大难不死，但几次都可能是做了无谓的牺牲。那样，革命队伍中岂不白白损失了一员良将奇才？

周旋也是个犟脾气，小时候她的母亲为她按传统的习俗裹脚，裹一次她解一次，再骂再裹她就一头冲出门，冲到黄河边往水里跳，直到母亲吓得再也不敢奢望女儿成为标准的小脚女人为止。犟爱犟。在女人面前唯唯诺诺，只会顺从没见过的男人，她看不起。不过，与其说周旋投了周希汉的缘，倒不如说她更看重的是周希汉的勇敢、智慧和一员战将骑在威风凛凛的大白马上时那特有的魅力。

在徐向前和陈赓身边工作过的岂止周希汉一人，而能像周希汉那样，从战士、参谋，迅速成长为出色的中、高级军事指挥员的毕竟寥寥无几。他学到了徐向前一丝不苟的细腻的工作作风，虽不及徐向前那样稳重、成熟，却多了几分果敢强悍。他把陈赓将军灵活机动、不拘一格的指挥艺术融于自身，虽然在大兵团作战方面较之陈赓将军稍逊一筹，可又多了他“九头鸟”特有的几分机敏刁钻。

在八路军中，高级将领中，并非人人欣赏周希汉的傲气和犟劲，但对他打的仗决无二话，对他进步成长的速度如此之快感到吃惊，也无不钦佩他勤奋好学的精神。他犟，但讲道理；他傲，但却虚心好学。这一点，周旋是心如明镜的。

再说，周希汉在周旋面前则是颇有长者风度的。越是能征惯战的将领，被指派去打硬仗、恶仗的机会就越多，他能留给女人的温存和疼爱也就越少，而这又是无法补偿的。周希汉岂能不明白此理，而这其中，只有周旋自己最清楚：在周希汉那严肃、冷静、果断、很男人气的外表下面，有怎样一颗善良、多情、滚烫的心。

他们的婚事就是那么简单地解决了：陈赓、刘有光、周仲英、李成芳、

王成林等一群男人连骗带哄就把周旋送进了洞房里。有人向陈赓汇报说婚事太急、区里办结婚手续的已经下班了。陈赓急了，生气地说：“什么时候就下班了？连我的面子也不给！不给登就算了！我签个字就算数！现在就结！谁也不等！”

没有蜜月。战斗间隙，周希汉才能匆匆抽身去看看新婚的妻子。

陈赓拉着秦基伟、陈康和那几位“媒人”一起视察洞房，却只有周希汉迎出来。周仲英盯着里屋不干了：“嚯！太岳区的一朵花让你老弟给摘走了，还搞个‘金屋藏娇哇？’”周希汉快乐地谦虚道：“哪里哪里！周旋说了，她是一朵鲜花插在了我的这堆牛粪上！”惹得周旋急忙从里屋跑出，众人大笑。

周希汉风尘扑扑地回到周旋身边，抱起刚得的儿子便不肯放手，半天只会笑，却说不出一句话来。周旋便同他商量，给儿子起个什么名字。周希汉记起汾河滩上那一轮红日，便不假思索地说：

“太阳。叫太阳吧。早一日出太阳，是人民的希望。是我们的希望，就叫周太阳。”

黄公俯首

小试锋芒克赵城，从某种意义上讲，还不如得了儿子周太阳给周希汉带来的喜悦更多。此处绝非诋毁将军的觉悟水准，乃是几十年后周将军亲口所言。他有他的道理。

有道是胜败乃兵家常事。赵城得胜虽可喜，但却不是周希汉的得意之作，此其一；其二是，周希汉是先懂得革命道理，之后才学会带兵打仗的，而用兵用到妙处，又提高了他对革命道理的理解力以及对革命形势的洞察力。他知道，蒋介石是必置共产党于死地不可的。战争刚刚开始，更激烈、更残酷的大仗还在后面。

身经百战是英雄，周希汉一生所经历的何止是百战。且不说每战必胜，即便是胜仗，也只能是战斗结束之后，实实在在地摸到脑袋仍在肩膀上方可言胜。因为，哪一仗都可能是黄沙盖面尸不全，哪一仗都可能是革命到底不言休。

果不其然，打下赵城还不到一个月，周希汉便被陈赓招了去。

“你来得好快，”陈赓正伏案在本子上写着什么，见了周希汉，又继续写了几个字才丢下笔，递给他一份电报，说：“你打了赵城，李成芳打了洪洞。胡宗南脸上挂不住了，他调了十万大军压到晋南来了。你知道他的先锋官是谁吗？”

周希汉接过电报没有看，倒先抓起桌上的茶缸，连灌了几口，问：“是哪个？”

陈赓白了他一眼，仰身靠在椅背上，“我的茶水就那么好喝？你讲不讲卫生啊，你赶快给本司令再冲一杯来。”

周希汉急着要听下文，乖乖地照办。他把倒得满满的茶缸墩在桌子上，又双手扶着往陈赓面前送了送：“这样可以了吧。”

陈赓盯着茶缸慢吞吞地说：“罗列。”

罗列？！他算个什么人物！周希汉听后有些不以为然。猛地，他眼前一亮，把头凑向陈赓：“这么说，黄正诚也来了？”

陈赓这才一拍桌子，说：“对喽！‘天下第一旅’！这家伙过去没吃过咱们的亏，骄狂得很。他来得很快，怕已经到了临汾。”

“好啊，我早就想去会会他！”周希汉把电报扔在桌子上，眼睛里闪过一丝兴奋的光芒。

“不！”陈赓站起来，把周希汉招到地图前，“他黄正诚本人那两下子也算不得什么，可是他的部队武器好，老兵多，战斗力不弱。跟他硬干不合算。呆会儿成芳、陈赓他们来了，咱们开个会。我打算把你们三个旅在临浮公路一线一字排开。让陈赓去打浮山。你和成芳等在陈堰和官雀。黄正诚他是一定要来的。你让过他的先锋团，让成芳在官雀解决它。你在陈堰拦住他的主力。怎么样，给我的这杯茶水，你倒得不亏吧？”

周希汉本已乐不可支了，见问，忙收住笑脸：“这一仗下来，我们的武器装备需要不小的补充……”

陈赓指着他的鼻子说：“你这个湖北佬！真难斗。好吧，武器谁缴的谁要，我这个司令一发子弹也不要你们的，还不行吗？”

陈赓的这番安排，是把最重的担子交给了周希汉。相比之下，担任浮山诱敌的第13旅旅长陈康，得到的却是个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但这也事关大局，陈康毫无怨言。什么任务都得有人去完成。周希汉心里却很是过意不去，事后他谈起此役曾说过：“如果我们不是共产党员，如果我们是自己打这一仗，我可能会把这个好机会让给陈康。”

周希汉和陈康是真正的生死之交。陈康原名陈五和，红军时期便是主力团的团长。抗日战争初期，他受了些挫折，先是在新部队受排挤，后又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百团大战之后，部队消耗很大，急需补充。时任第386旅参谋长的周希汉，到后方要干部。在教导队，两个湖北佬见了面。周希汉说：“你不是陈五和吗，怎么当起教员来了？连名字都改了？”

陈康把手一扬，摇摇头诉说了满肚子的委屈。于是，周希汉所要干部的名单里列进了陈康。

“你要，可以给。但有一个条件，此人不可重用，不能当团长”。“接受”。周希汉答应得十分痛快。他有他的办法。回到部队他把陈赓的情况向陈赓详细地做了汇报，并提出，让陈赓担任第772团的副团长，但该团不配团长。也就是说，让陈康当实际意义上的团长。

陈赓也比较了解陈康，当下点头认可。陈康也真是一把好手，连续几个漂亮仗下来，便无可争议地当了团长。

那时节，八路军有一支炮兵部队，在抗日前线，炮弹打光了。没有炮弹的炮兵部队在前线不仅发挥不了任何作用，而且成为主力部队的累赘。国民党当局不仅不给八路军补充，反而经常给八路军下绊子。为了保留住这支宝贵的炮兵部队，党中央决定由各部队分段将其护送回延安根据地。周希汉率领本旅包括第772团在内的两个团，加上兄弟部队的一个团和一支民兵大队，负责太岳段。

八路军没有拉重炮的卡车，全靠马驮、大车拉，这就既不能高速行军，又不能钻山沟绕小路，必须经过日伪军驻守的临汾。倘若敌人拦住去路，那就免不了一场厮杀，护送部队倒是可以脱险，炮兵部队却无论如何也过不去了，弄不好重炮便可能被敌人夺去。

为将者，雄才大略，此刻方能显现。离临汾还有两、三天的路程时，周希汉一改夜行晓宿的行军方式，大摇大摆地白天在大路上行军，每到一处，故意张扬说：“八路军要攻打临汾。”敌人的眼线果然将消息报进了临汾。敌人得知周希汉带了好几千人，还驮着重炮，来打临汾，急忙收缩防御，将

靠近公路的据点撤进了城里。于是，周希汉的大队人马也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浩浩荡荡地沿着公路开过了临汾。等敌人缓过神来时，周希汉已经去的无影无踪了。

护送任务圆满完成，干净利索——这是周希汉作战风格的特色之一：即可以把一场战斗变成一场智斗；也可以让有声有色的谋略超越一场拼搏死伤的血战的辉煌。他总是那么从容不迫，却让敌人大乱方寸。而返回就不那么简单了。敌人已经了解到他们这支部队的意图和动向，岂能小视？

周希汉一路上小心谨慎。这天宿营，他安排兄弟部队的那个团在他的前方当面驻足，陈康的第772团在他的侧翼，另一个团和民兵殿后。

半夜，周希汉被激烈的枪声惊醒，刚抄起枪，有人来报：“敌人已摸到村口了！”枪声告诉他，敌人是有备而来，而且火力凶猛。情急之下，也只好果断迎战。

指挥所勤杂人员多，战斗力本就不强，再加上事出意外，仓促应战，渐渐不支。

原来，兄弟部队的那个团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没有报告便擅自移动了宿营地。这样，周希汉的正面便失去了屏障。连敌人都没想到，会这样轻而易举地摸到了周希汉的指挥部。

没有遇到强硬抵抗的敌人，似乎明白了什么，进攻更加猛烈。眼看周希汉纵然不战死，也得做俘虏。

就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陈康率队飞马杀到。一见面，陈康只说了声“快走！”便命人先把周希汉抢出危险地带。他自己则带人与敌人拼杀到天亮。真可谓：无希汉则无陈康，无陈康则无希汉。

浮山告急。黄正诚便向罗列请令出战。罗列怕中了陈赓的围点打援之计。黄正诚却大不以为然。“咱们是干什么来的？我这是‘天下第一旅’，不是‘阎老锡儿’的杂牌军。量他陈赓能奈我何。”罗列拗不过他，只得由他去。黄正诚便令该旅第2团团团长王亚武先行，他自己率主力跟进。

王亚武领命之后，也是威风凛凛地扬长而去。

所谓‘天下第一旅’，就是国民党军整编第1师下辖的第1旅。它是由原第1师改编而成的。该部首任司令长官即是胡宗南。它是胡宗南起家的本钱，所以倍受宠爱。无论多么昂贵的外国武器装备，只要蒋介石能弄进国内的，总要先尽着这个旅挑。旅长黄正诚不仅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而且在外国留过学，与蒋、胡的关系非同一般。黄本人授中将军衔，两个副旅长，甚至团长也都是少将。这在国民党军队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个旅老兵特别多，训练有素，战斗力在国民党军队中也的确是佼佼者。

黄正诚留学的成绩不错，回国后，自感中国乃至亚洲都容不下他了。自称是无敌于天下的“天下第一旅”，也是得到蒋委员长默许的。

黄正诚对陈赓是既有几分嫉畏，又有几分不服气。说是嫉畏，是因为陈赓的声威是打出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包括蒋介石在内，无一敢小看陈赓；说不服气，是黄正诚实在弄不明白：陈赓手里摆弄的，明明是一支刚扔下锄头拾起枪杆儿的人组成的队伍，它的战斗力是从哪里来的呢？若论起军事理论方面的学问来，黄某自然当在他陈赓之上；他陈赓无非是跟日本人打了几年仗，可黄某也没有把日本人放在眼里过。此番兵发晋南，黄某正是要同他陈赓见个高低。听说陈赓手下还有个叫周希汉的，也十分了得。那哪是个军人，他懂得什么叫火力配置？他知道图上作业是怎么回事？噢，也就是个放

牛的。

同黄正诚相比，周希汉的确是个彻头彻尾的“土包子”，但他不是放牛的出身。从出生到参军，家里、地里，他几乎干遍了所有的农家活，就是没有放过牛。一天也没放过。

父亲周启耀给他取名祖荣，就是祈盼他给周家耀祖光宗。启耀吃了一辈子不识字的亏，咬紧牙关送祖荣进了私塾。祖荣虽然聪颖过人，却是个死犟。一日，先生令其跪下，他却一昂脖子跑出房门，从此再也未见过先生的面。幸喜他极富灵性，写着一手漂亮的字和文章，还能“之乎者也”地吟上一阵。

黄正诚当然不知道：周希汉除了在学校里学得的一点书本知识外，凡是徐向前、陈赓懂得的，也都已倾囊而出地送给他了。因此，周希汉那时虽然未曾进过军事学堂，在军事理论上却决不是自下。当然，周希汉最得要领，或者说使他茅塞顿开的，还是徐向前给他讲完第一堂军事课后，点着他的鼻子告诉他的那段话：“记住，‘水无定势，兵无定势’。兵法最高深的境界是不拘泥，是灵活运用。一切都要依实际情况而定。”这番话成了周希汉用兵的座右铭。

黄正诚看不起周希汉，周希汉对黄正诚也心存蔑视，特别让他不眼的，就是“天下第一旅”这几个字。你是天下第一，那我呢？我是第几？打心眼里说，周希汉对陈赓司令员的布置并不十分满意，以他的心气，他是要单独跟黄正诚一试高低的。

原本做事十分缜密的周希汉，此番战斗部署更是力求滴水不漏。他一边部署，一边在心里念叨：“黄正诚啊，黄正诚，这一回非让世人看看，咱们谁是天下第一。”

“旅座，我被陈赓包围了！”无线电话筒里传来了王亚武变声变色的呼叫声。黄正诚好生不悦。

“你冷静点，你现在在什么位置？你敢肯定是陈赓吗？”

“官雀，我在官雀。旅座，我敢拿脑袋担保，这才是陈赓的主力呢。”

黄正诚不由得吃了一惊。罗列心里也是一惊，但他吃惊中又有几分得意，怎么样？我早就看出那陈赓会有这一手。黄正诚此刻已经揣摩到罗列的心思，他没有去看罗列那张可憎的脸，一股无名之火陡然而生。他对王亚武喊道：“这样也好，早晚得有这一出，你咬住他，我立马就到”。说罢，他摔下话筒，点起自家全部人马，风风火火地上了路。

按理说，罗列是第1师师长，黄正诚只是他手下的一个旅长。但由于“天下第一旅”的势力，也由于黄正诚与蒋、胡的特殊关系，黄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地位 and 名望，远在罗列之上。他从未把罗列放在眼里。

一切都如陈赓所预料。他把电话打给靠近陈堰的周希汉。

“希汉啊，黄正诚也出动了。你那里怎么样？”

周希汉胸有成竹地说：“恭候多时了，怕他不来。”

到底是“天下第一旅”，到底是机械化。天刚过午，黄正诚便冲过陈堰。过了陈堰，公路拐了一个小弯，然后一路上坡，视野宽阔了，远远地可以看见，坡顶上、公路两旁错落着一边一座小土坎，宛如一个天然的隘口。过了这个隘口，便可以听到官雀的枪声了。

眼看尖兵就要通过坡顶的隘口。望着坡顶，黄正诚心里想，你陈赓也不过如此！若是我黄某，才不去官雀那鬼地方呢，我就在这里围点打援了。要不，我在此处再设它一支伏兵，那岂不是……

“轰！轰……”

一阵闷雷，炸断了黄将军的浪漫遐想，他的尖兵在坡顶被炸得车翻人仰。要买路钱的人来了！

黄正诚慌忙地跳下汽车，伏在路旁的小土坡后，接过望远镜向隘口处瞭望，然而眨眼间隘口处又变得宁静非常。没有通常见到的那种火力追击，也没有人影移动，山冈上只有稀疏的树木和错落的岩石，好像刚才发生的一切只是他的幻觉。他也真希望这只不过是自己的幻觉。然而，被炸毁的装备还在冒着浓烟，被击毙的士兵尸体横陈公路，被抬回的伤兵在痛苦地呻吟。这一切都明白地告诉他，去路已经被拦住，要想冲过去绝非易事。

两颗汗珠钻出帽沿，在他沾满尘土的脸上划出两道弯曲的小渠，一脸的矜持，陡然变成一副狼狈相。

周希汉坐在离指挥所不远的一棵树下，居高临下地望着战场，一脸的平静，平静中甚至有点悠然自得。像驻足观棋，又像登高览景。此处离战场近得几乎用不着望远镜便可看到一切。

但周希汉还是举起了望远镜。他想着某一个角落里找到黄正诚。他已经给对手布下了一个口袋。第29团埋伏在临浮公路陈堰的入口处，截断了黄正诚的退路。第28团埋伏在陈堰北侧，前面堵截的是一向善守的第30团。南面是大山，高得令敌插翅难飞。

周希汉反复叮咛第30团团长沙显阳，这“天下第一旅”不是一般的对手。此番我们不是要同它争勇斗狠，不求在阻击时对它有多大的杀伤，拦住它的去路就是胜利。阻击要顽强，又要保持后劲。他还让卢显阳陪着他在阻击阵地上走了一遍，作了许多具体的调整，才回到自己的指挥所。

借助望远镜，周希汉没找到黄正诚。但他看见，敌人没有被突然的一击打昏头，很快便组织起了反冲锋。那散兵线的队形有点特殊，既不像日本军队那样凶猛，也不像其他国民党军队那样松松垮垮。这种队形很不利于阻击部队发扬火力。他不由得暗自叹道：若是我们没有占据有利地形，要拦住他们还真不容易。

两次冲锋被打回来后，黄正诚放下望远镜，焦躁地嘘了一口气。

他发现对方火力的配置，地形地物的利用，就是最挑剔的德国教官也得给打满分。并且，他们打得那样从容，让你找不到一丝破绽。火炮的威力难以发挥。他感到隘口处和公路两旁的山冈在一点点地长高，自己脚下的土地在一点点地下陷。刚才正当午时的艳阳天，也忽然变得灰蒙蒙的了。

他骂了一声王亚武：“你这混帐，你慌报军情。你碰到的是哪国的陈赓？老子这里才是陈赓呢。”中原共军的将领，除了陈赓，谁会这一手？！回去？岂有此理。那岂不是把第2团扔给他陈赓了，岂不是让罗列那老小子看黄某的笑话。冲过去，又谈何容易。他要过无线电话筒，命令王亚武向陈堰方向突围。

王亚武已经是焦头烂额，哪里还动得了一步，他一面支应黄正诚，一面又直接向罗列呼叫。罗列被他叫得没办法，便说，他要率领师督战队到陈堰助他们一臂之力。

“周希汉！”陈赓在电话里不急不慢地喊着。

“我是周希汉。有新情况了？”“九头鸟”反应很快。

“刚才我们侦听到敌人的对话，罗列要到陈堰来督战。”

“好啊，我派人去接他。”

“最好要活的。”

“那就看效敏的本事了。”周希汉把电话打到第29团，“效敏，你留下一个营原地监视，剩下的全带着，向临汾方向运动，找个地方拦住敌人的督战队。一个也不要放回临汾，特别是它的师长罗列。司令员点名要活的。明白吗？”

“明白。”

黄昏悄然而至。在设伏点，等得心焦的第29团团长吴效敏却始终没有见到敌人督战队的踪影。原来，若论别的本领，罗列可能不如黄正诚，若论老奸巨滑，那谁都比不过罗列。刚出东关不远，罗列便改变了主意。他想，督战队的战斗力不堪一击，万一路上遭到伏击，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再说，我即便到了陈堰，又能怎么样？说不定得给黄正诚当垫背的。所以，他调转车头又缩了回去。

眼看天黑了，黄正诚撞不开隘口，只好把部队撤进陈堰，企图拖到天明再想办法。

战机来了。周希汉凭着指挥作战的经验和嗅觉断定了这一点。他即刻调回第29团团长吴效敏。令第28团和第30团利用夜暗压向陈堰。陈堰被铁桶般地箍住了。

黄正诚在他的临时指挥所，捧着打开的罐头刚要吃，又有人递过无线电话筒。“师座请您讲话。”黄正诚很不耐烦地接过话筒说：“我是。我在陈堰休整，明天一早，设法突破共军的拦截。你让亚武挺住……什么？蒋先生？放心，蒋先生安然无恙。”

陈赓凑在侦听机跟前，听了罗、黄的对话，心里琢磨：“蒋先生，蒋先生何许人也？蒋介石？当然不可能。美军顾问？大特务？总归是个大人物吧。”他命令接通周希汉的电话。

“周希汉，黄正诚那里有个‘蒋先生’。这个神秘人物，你不能让他跑了。”

“没问题。”周希汉一般接受命令时答“是”，“可以”，若是答：“没问题！”那便是有了十成的把握。

敌人打了一下午，人困马乏。而第10旅的主力是专等着夜晚来会战的。周希汉没给敌人喘息的机会，包围圈一形成，便适时地发起了进攻。不过，他的进攻声势虽大，攻击点虽多，却不急于突破，只是迫使敌人无法设立防御重点。他用这个办法，继续耗掉敌人的锐气，尽可能地减少自己的伤亡。

战至午夜，第29团率先突入陈堰。此时官雀方向第11旅旅长李成芳向陈赓报捷：“全歼王亚武团。”陈赓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周希汉。

“希汉，成芳那里已经解决了，我们更主动了。你拂晓前一定要捉到黄正诚。”

周希汉说：“等不到那么久了，效敏马上就开始进攻黄正诚的指挥部。”

此时罗列也正在同黄正诚通话，“亚武那里可能不行了。你的情况怎么样？你千万要顶住。”

夜幕刚一降临，黄正诚便已经感到情况不妙，他开始后悔，不该太轻敌。此番来晋南，原想露一手给老头子看看，没想到一上来便钻了陈赓的套子，这共军打仗太没规矩，怎么打怎么别扭。明明都是在夜晚，他们怎么就反而更有劲，看来，我这一世的英名要毁在小小的陈堰了。他气急败坏，毫无顾忌地对着话筒破口大骂。

罗列倒显出大人的度量：“你要坚持到天亮。蒋先生呢？怎么不用一用他？”

“蒋先生？还蒋先生呢。蒋先生在一个院子里，根本无用武之地。你听啊，共军已经把手榴弹甩到我头顶上了！”说完，黄正诚狠狠地扔了话筒，一把扯下军装，抓起事先准备好的士兵服就往身上套，刚褪下裤子，后腰便被解放军战士的枪口顶住了。

打扫战场的工作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周希汉凑在油灯前，随手翻阅着缴获的作战文书。一个参谋报告：“旅长，俘虏黄正诚要求见我们的最高指挥官。”

正好，周希汉也想见见他，还想请他给自己讲点“洋学问”呢，他头也没抬地说：“可以。”

油灯下，两个旅长相视而立。一个又瘦又高，一个墩墩实实，一个军装微沾寒露，一个下身穿着裤衩。

良久，黄正诚气恼地扭过身，“你不是陈赓！”

周希汉明白了，他要见的不是自己。他被对方的傲慢激怒了，冷冷他说：“鄙人周希汉。”

黄正诚看也不看周希汉一眼，说道：“我要见陈赓。陈赓为什么不见我？”

周希汉干脆坐下了。“杀鸡焉用牛刀，捉你，我周希汉足矣。”

黄正诚转过身来，盯住坐下仍显得与他差不多高的周希汉，满脸的困惑和恼怒。

周希汉倒平静下来，“你的第2团不是我打的。我们是二打一。”但他心里却在说，“可你是我捉住的。一对一，你也未必行。”

黄正诚泄了气，脑袋耷拉下来。周希汉吩咐说：“给他找条裤子穿，莫冻着他。”

“旅长，司令员电话。”有人报告。

周希汉挥挥手，黄正诚被押走了。“我是周希汉。”

“周希汉，你们报的俘虏名单里，怎么没有那个蒋先生？是死了还是跑了？”

周希汉一听又来了精神，“那个蒋先生，捉住了呀。”

“捉到了，是个什么大人物？”

“你先说，你原来的话算不算数？”

“你这湖北佬，你卖什么关子，我什么时候讲话不算数？你赶快同我说！他是个什么大人物？”

“嘿嘿，不是大人物是家伙！——四门山炮！崭新的，还带着油封呢。”

周希汉对黄正诚说，他们打“天下第一旅”是“二打一”，严格地讲应该是“三打一”，不能把浮山诱敌的陈康的第13旅漏掉。这一仗是整个太岳纵队打的。这一仗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表扬。刘伯承同志在晋冀鲁豫边区干部会上说：“同蒲方面打得很好。中央夸奖说这一战是出乎意料之外。”

1946年9月26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向太岳纵队致敬》的社论。社论说：“……这是晋南八路军继七月间消灭胡宗南两师，八月间解放同蒲中段二百七十里，歼灭阎锡山军万余后的第三次大捷。这与中原部队的胜利突围，苏中南线的七战七捷，陇海路与冀鲁豫歼灭蒋军胜利同为光辉胜利，对于粉碎蒋介石进攻，争取国内和平民主，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绩。我们欢欣庆祝之余，特向太岳纵队全体指战员致以崇高的敬礼！”



也许，我们还应将 40 多年后出版的《将帅诗词录》中收录的希汉将军的一首五律抄录如下：

“黄公美械旅，自诩天下‘一’。  
陈堰遭我困，始知遇劲敌。  
突围累数度，难得半步移。  
求援声未落，已入战俘席。”

这颇有李杜之风的寥寥 40 字，简洁明快地客观介绍了擒获黄正诚的经过，也表达出周希汉敢于藐视任何强劲对手的英风傲骨。

走马射“獐”

1947 年 11 月 4 日，河南。

李铁军在弄清了先头部队的位置后，抓起无线电话筒喊道：“庭麟兄，我的先头部队已经进至三十里铺，你再挺一挺。”

对方的口气却仍带着沮丧：“好，好，来日必报李长官救命之恩。”

李铁军卑夷地耸了耸鼻子，“老兄说哪里话，赶跑了陈赓，你我各有功劳一份。待会儿见。”说罢便丢下话筒。

碉堡里，武庭麟也丢下话筒，强打起精神。三十里……要是三里就好了。不过，三十里也总算是有个盼头了。这位国军的中将师长，虽然长相不好恭维，但名字着实很气派。他灌了一口酒，对几乎挤满了碉堡的十来个部下们说：“都听见了，李长官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三十里铺。用不了多久，共军就得逃跑了。想活命，就顶住。耍熊包的，可别怪我武某不认人。北辰，”他招呼着中将副师长姚北辰，“咱哥俩到各点上去看看。”二人一前一后钻出碉堡，其余的人也跟着鱼贯而出。

几乎是与此同时，离武庭麟的工事不到 200 米远处，周希汉正在做攻坚的部署。侦察员飞马来报：“李铁军先头部队进至三十里铺！”

一团烟灰落在地图上。周希汉的烟又是一根接一根。

周希汉用手轻轻拂去落在地图上的烟灰，头也没抬地应道：“嗯，知道了。”接着看他的地图，继续部署。这时，他觉察到周围的人有些骚动，便平静地说：“沉着点，我们继续……。”

远离战场的纵队司令部里，一向有大将风度的陈赓此时却不那么沉着了。他来回踱着步，嘴里反复念叨着，“三十里，三十里”。自责，痛心……，他的头嗡嗡直叫。怎么事先就没有料到敌情会有这样的变化呢？这下第 10 旅要吃大亏了。这时，有人提议：“要不要命令周希汉他们撤下来？！”

陈赓停住脚步，沉思片刻，摇摇头：“不要！让他自己决定，我们不要干扰他。”这个时候，指挥员的应变、判断、处置能力是关键的关键。不撤，大不了砸进去一个旅，撤下来，则是满盘皆输。当然，陈赓怎么会舍得砸进去第 10 旅和周希汉呢！他问：“谁离得近？”

“第 13 旅”。

“嗯，可以。命令陈康快去接应他一下！”

这是郟县激战前的一幕。

且说 1947 年下半年，全国战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党军队已经由全面进攻转入重点进攻，又转入战略防御。解放军则转入外线作战。按党中央的部署，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与华东的陈毅、粟裕大军形成了指向国民党

心脏——南京的两柄利剑。为使刘邓能在大别山站隐脚跟，毛泽东令陈赓率第4纵队、第9纵队、第38军和第212旅组成一个兵团，入豫西策应刘邓，与刘邓、陈粟互为犄角。

8月，陈（赓）谢（富治）兵团强渡黄河，腰斩陇海铁路，连克县城十余座，歼灭国民党军队4万余人，蒋介石急令李铁军、裴昌会两个主力军分别组成两个兵团，夹击陈赓。毛泽东则电令陈赓，除留下少数兵力，继续在陇海线牵制敌人外，主力应南下开创根据地，并寻机歼敌。

10月下旬，陈谢挥师南下。李铁军步步紧逼。陈赓要在豫西立足，首先得把李铁军甩开。而李铁军像一只狡猾的狼，一步一步地跟在后面，若即若离，你到哪儿，他跟到哪儿。真是碰上了一个难缠的对手。

10月30日，部队进至河南伊川境内，在行军中，周希汉接到通知，陈赓司令员请第4纵队各旅旅长到温泉镇西北纵司开会。

这是离镇子不远的一个小山洼。山不很高，山前有两座对称的小山包，远远望去，很像一对女人耸起的乳房。这山凹恰似两乳之间的胸窝。公路在山凹口弯过。紧靠山根有一座庄院，庄院背后有一眼温泉。泉水涌出，在泉眼周围形成了一口房屋大小的水潭。水面像开了锅，水面上罩着一团薄雾。泉水沿山根流向山外。在水潭的出口，有石槽通进房屋。显然这庄院是专为泉水而建的。正房不多，浴室却好几间。房子建得很气派，看上去修建时间不会晚于清末。庄院的主人何许人也，无法弄清，因为，解放军来到时，此处已是人去屋空了。窗无尘土锅无灰，说明主人刚刚搬走，可搬得很彻底，不仅四壁空空，连桌椅、床垫都没留下。

周希汉策马来到时，陈康和李成芳等已先到了。还没下马，就见陈赓满身热气腾腾地从浴间走出来，脸上泛着红润，一边掏出眼镜戴上，一边招呼大家：“你们都来了，好哇好哇，我请你们不花大洋先享受享受再开会。”于是，众人下马，洗温泉。

浴间很厚实，但也很科学。靠墙离地一尺高，有一条封闭的石槽贯通，石槽下的地面比别处略低，卧着一只人形的大木盆。木盆上方石槽上有个拳头大小的孔，用木塞裹着破布塞着。拔下木塞，水便可以从石槽里流进木盆。木盆一头的底下也有个木塞，是排污水用的。排水沟上也用青砖封盖，以保持房内的清洁和干燥。除去人形的大小木盆，能搬走的都搬走了，水很烫，坐进盆里受不了，坐在盆沿上又冷。周希汉用手撩那盆里的水，心里暗发牢骚。这叫什么享受，简直是捉弄人。

周希汉洗完了澡，走到院子里，别人已经在等他了。下午三点的太阳，暖融融的，草地上铺着军毯，大家围坐在一起就开会了。

陈赓没有再说笑，好一会儿没说话，看见周希汉点烟，他也要了一支，吸了一大口，才慢慢地说起来：“眼前，这个仗不太好打。李铁军这小子就这么跟着，我们现在的任务不是跟他决战，现在也不是决战的时机。要想实现中央的决策，得先把他甩开。我想了一下，初步有两个办法讲给你们听听，看哪个好一点。一个呢，用两个旅分别去打临汝和郟县，其余的部队直接下宝丰、方城一带。打临汝、郟县的两个旅得手后，立刻向这边靠拢。这个办法的好处是好打。据初步侦察到的敌情看，两个县的敌人，都是地方民团，少则三、五百，多不过七、八百人，容易得手。缺点是：分散了兵力，部队渡黄河后，连续作战两个多月，比较疲劳，一旦李铁军赶上来，我们无法及时收拢部队，弄不好，把形势搞复杂了。”

再一个呢，用一个旅连续奔袭临汝和郟县，造成声势，把李铁军的注意力引向汝河以东。我主力密下鲁山、南召一带开创根据地。这办法好在兵力集中，主力可以争取到一个短期休整的时间，缺点呢，打临汝、郟县的这个旅压力比较大。行动稍有迟缓，被李铁军追上便不好收拾。”

很显然，第二个方案好。大家没有什么不同意见。“那么，谁去打临汝和郟县？”“我”。周希汉先开了口。他觉得此事舍我其谁，他甚至猜想到陈赓事先考虑的就是他。

他猜对了。陈赓的确倾向一个旅诱敌，而且最好是让第10旅去打。他也认为周希汉最有把握。

风险很大，几位旅长都争着自己要去，让别人休整。争来争去，还是定了周希汉。陈赓反而沉吟了：“你担子不轻，得瞻前顾后啊。”“不怕。”周希汉说。其他几位战友也能掂出这任务的分量，心里不免有些沉重，可他们的嘴里却在打趣，“老周啊，小心李铁军摸屁股。”周希汉梗梗脖子：“我是老虎的屁股，李铁军他不敢摸。还留下一个任务你们负责，把鲁山的熟柿子给我留着。”

“刚才我同廖政委和周副旅长商量过，”周希汉回到本旅，跟政委廖冠贤，副旅长周学义碰了头便开始部署，“第28团主攻临汝。如顺利，第29团、第30团不进临汝，直插郟县。第30团主攻，第29团跟进，第28团策应，从现在开始，我们是在敌后独立作战，同纵队主力保持无线电静默。侦察分队已经提前出发了，我们的行动开始前，两个县的电话线都要破坏掉。这一仗的成败，关系到主力能否在豫西站住脚，换句话说关系到我们能否实现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动作要快，下手要狠，不狠就快不了。不要因为敌人是地方民团就轻敌，俘虏不一定多捉，要尽可能快地同地方党组织联系上，善后工作主要由地方的同志去做。还有不明白的没有？”

“没有。”

“没有，散会。”

从开会到散会，只用了5分钟。周希汉还有一个特点，出了指挥所你再有什么问题提出，即便提得再好也得挨批评，他会板起脸，“刚才干什么去了！”打仗不同于干别的，战场瞬息万变，往往没有再部署的机会，或者连做小的调整都难以做到。所以他不喜欢马后炮。这也许是大多数优秀的军事指挥员的作风吧！

10月31日，第10旅出伊川、柳泉，南渡伊河。11月1日，第28团袭临汝，轻松得手。毙伤及俘虏敌人600余人，缴获机关枪4挺，步枪300余支。敌大部被歼，只有零星逃脱，奔了禹县、郟县。按计划，第28团由政委廖冠贤率领杀奔禹县神垕，监视禹县、许昌，防止郟县之敌向彼处逃跑。周希汉率第30团、29团直插郟县，对郟县实施包围。

严冬未至，寒风早起，草木凋零，大地兀秃。这一带，是伏牛山脉的边缘，有山有水有平原，本是个富庶的地方。可是自古以来，这中原一带便战乱频仍。进入国民党统治时期，更是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打仗，搅得民不聊生，十室九空，一片荒凉。一路行军，见到的老百姓大都目光呆滞，面容枯槁。周希汉心中颇多感慨，他记起参军不久，徐向前对他讲的一番话：“古往今来，只有我们是为消灭剥削制度而战的。”在他看来，这场战争之后，中国的剥削制度就要被消灭了。他在心中对这些老百姓说，再忍耐些时日，等我们打败了蒋介石，好日子就要来了。

11月2日下午，部队打尖。周希汉带警卫员巡视。绕过一座小山坡，路边村头的小茶棚里，有人在唱河南坠子，稀稀拉拉地围着几个人听，大抵是本村的半大孩子。开始周希汉并没有注意，快走过去了，那唱词飘过来，使他不由自主地勒住马。

那日寇连夜开过来，  
围定前山和后山……”

这不是在说抗日战争的事吗？除了解放区，很少能听到民间曲艺能唱这种新词。

眼看着抗日军民要遭劫难。  
呼啦啦——一只人马杀到面前。  
为首的本是无敌的将，  
姓周名叫周希汉。  
周希汉百步穿杨枪法准，  
大刀一举敌胆寒……”

分明是在唱周希汉。周希汉心想，我什么时候举过大刀啊？枪法，哪里谈得上百步穿杨。莫非天下还有一个周希汉？他轻轻下马，靠近了茶棚。

从半夜直战到天放亮，  
从天亮直战到红日滚滚坠西山。  
抗日的军民脱了险，……”

这时，马打了一个响鼻。茶棚里的人们被惊动，探头打量周希汉他们。唱坠子的中年妇女收住板，坐在一旁拉弦子的也慢慢停住，周希汉看清了，那是一个失明的老人。那妇人象是个久走江湖的，抱拳一笑：“腔不好，您多担待。”倒把周希汉说的不知该怎样搭话，顿了一下才问道：

“请问你唱的是哪一段啊？”

妇人又是一笑：“抗日的段子，大战卷峪沟。”

“卷峪沟？”对像是在唱我，周希汉又问，“是辽县的卷峪沟？”

“正是呢。您去过？”

“辽县不在你们河南呀。”

“看您说的，咱唱坠子就兴唱咱河南的事？”那老人拽拽妇人的衣襟，接过妇人的话，“别见怪，那年俺们逃荒卖唱到辽县，正赶上八路军跟日本人打了这么一仗，老百姓都传哩！就胡乱编了几句，闲来莫事，溜溜嗓子。”说完笑了。

对上了。在辽县卷峪沟，周希汉的确打了一仗。他带着3个团，执行完任务，返回卷峪沟。沟里是八路军前指和第129师师部，还有数千群众，不知是什么人走漏了消息，日伪军包围了山沟，沟里的抗日军民措手不及，形势很危险，正打得激烈时，周希汉他们赶到了，斜刺里居高临下向日军开了火。真是打了半夜一整天。仗着地形有利，总算是掩护沟里的人全部脱了险。撤出战斗还没有算完，他们又接到命令，马不停蹄地去攻打榆社。没想到，还有人给编成河南坠子了。看老人被自己问得起了戒心，周希汉好生过意不去，“唱抗日的段子好哇，不过，惯使大刀的抗日英雄是吉鸿昌、许世友哇！”

“是哩，这二位都是俺河南人哩。”

老人绷着的脸松弛下来。

周希汉接着问：“你们唱的是386旅的周希汉？”

“不错，正是正是哩。”

“周希汉不会使大刀啊，你们搞颠倒了嘛！”

老人的眉毛竖了竖，“咋着，周希汉不会抡大刀？人家周希汉是位天兵天将！啥不行哩？他啥都能干成哩！”

“你老人家见过周希汉？”周希汉笑了。这话他当然爱听。

“见是莫见过，没见过还没听说过？”老人提高了嗓门像要同周希汉争个高低。那妇人倒打起圆场来：“俺们原是可以见过的，那回俺们也是被堵到沟里的，离得远，心里又害怕，没看清。这唱词嘛，有的是俺听说的，有的是俺们自家心里想的。”

周希汉心想，你若知道站在你面前的就是周希汉本人，你一眼就能看出我哪抡得动大刀啊。他扳了一下要开口说话的警卫员的肩膀，搭讪着说：“没什么，没什么，我们知道的也不多，你们还是唱吉鸿昌，唱许世友吧，打搅打搅。”说罢飞身策马上路。

若干年后，当地人把周希汉茶棚听坠子的故事，演义成唱坠子的原是周希汉派出的探子。唱坠子的交给周希汉邾县敌情发生大变化的情报。而希汉将军自己回忆，坠子是听了，唱坠子的就是唱坠子的，并不是我军的侦察员。当地群众还有个传说：正在行军途中，忽然有几个要饭的拦住周希汉的马，向周希汉要吃的，警卫人员刚要干涉，周希汉却不让。原来那是化装成乞丐的我军侦察员，拦马要饭，是交给周希汉重要的军事情报。看来也是人民群众出于对解放军的崇拜演义出来的。事实却是，侦察分队的情报稍微迟了点，使得周希汉一到邾县，便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

3日上午，10点多钟，第30团来到邾县城外。邾县四门紧闭，东门外横七竖八地散放着伐倒的树木，构成障碍。南关被大火烧得只剩下断壁残垣，要接近城门十分困难。北门外地势开阔平坦，也无法靠近。西门临近汝河，西关抵近城门，这一处敌人设了防。由于第28团袭击临汝打得漂亮，第30团团长沙显阳也想迅速拿下邾县。勘察过战场，他把攻击点选在西关。不等跟近的第29团展开，便开始攻打西关。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争夺，周希汉赶到时，第30团已经拿下西关，随即便架梯攻城。城上的守敌抵抗十分顽强，手榴弹雨点般地砸下来，第30团两次强攻都没有奏效。周希汉远远地观察着西门争夺战，心中疑团顿起。这决不是民团，民团哪里有这么强的火力，哪里有重机枪、迫击炮？“停止攻击！”他下了命令，两个团长被召到他面前。他对卢显阳说：“不要急躁，看来敌情有变化。再侦察一下。看能不能选择新的攻击点，这样打消耗太大，不合算。”两个团长领命而去。周希汉心里估计，即便找到新的攻击点，也得利用夜暗，又是一个夜战，城内有多少敌人虽然尚不明确，但有正规军是肯定的，大意不得。

傍晚，吴效敏报告，东门外有一条干河床，可以利用接敌。好，他重新做了部署，第29团在东门主攻。调旅炮兵大队一个加强连，6门山炮，工兵营一个排，炸药300公斤配属第29团。午夜零点开始攻击。第30团两个营在第29团打响前继续佯攻西门，另派一个营堵住南门，防敌从南门逃跑。他还令人急从禹县方向调回第28团，在北门外担负预备队任务。

刚部署停当，情报来了：国民党整编第15师师长武庭麟率该师师部及第64旅两个团，孙元良兵团第125旅一个加强营于2日晚乘80余辆汽车窜至邾县。邾县守敌共计不下5000人。接着，又来了情报：李铁军大军进至伊川。

这多好，面前武庭麟，背后李铁军。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武庭麟为什么这个时候从许昌窜到邾县来呢，是怕在平汉铁路线上容易受到攻击，窜到邾县来避风险呢？还是配合李铁军专门来和我们过不去呢？此人是豫西一霸，在国民党将领中属于善守的一类。

如果撤退，不打邾县，部队可能受点损失，敌人就会很快发现我主力的位置，陈赓司令员的计划就会落空。换句话说，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就难以实现。保全自己，输掉大局，这种事不是周希汉干的。打，实在是毫无取胜的把握。邾县决非赵城可比，打赵城是背靠根据地作战，无后顾之忧。而今，背后却有个李铁军。如果把李铁军算上，敌人刚好是周希汉的十倍。弄不好邾县打不下来，自己还得搭进去。徐向前、陈赓花费多年心血培养起来的这支优秀的部队就这样葬送在自己手里？

真是左右为难，难为死了。他摸出一支炮筒烟点着吸了起来。指挥所里鸦雀无声，依稀可以听见他每吸一口烟，烟叶燃烧发出的“丝丝”声。微弱的红光在他凝神的双眼上映出两个小小的亮点。

周希汉继续吸着烟，一支又一支。他思考着一个问题，邾县该不该打。

武庭麟一进邾县，就自闭门户，城外基本没有设防。不管他来邾县是什么目的，单就这一点，便说明他是消极的，是惊弓之鸟。他只比我军早一天到邾县，在防御部署上不可能有大的作为。我军渡黄河以来，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连打了几个胜仗，士气高昂，而且弹药充足，武器好。打开邾县，为豫西人民除掉武庭麟这个祸害是有可能的。李铁军在我军后面跟了多日，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不想与我们决战。武庭麟受到我的攻击后，不会不向李铁军求援。李铁军吃够了我军围点打援的苦头，不会轻举妄动。即便来援，也会让武庭麟死守，等我军消耗得差不多，他再来以小的代价捡便宜。即使李铁军全力来援，没有一整天的工夫，也到不了邾县。一整天对我军来说，做好准备足够了。

周希汉想到，即使有个万一。那么，宁肯我第10旅被吃掉，也要保证陈赓司令员的部署，保证党中央的决策实现。他扔掉烟蒂，“打。按原计划打。”他简单地向指挥所里的同志们谈了自己的想法后，便命令将指挥所秘密移至城东靠近第29团，并且与各团之间架起双线电话。

夜色沉沉，冷风瑟瑟，周希汉的额头却是汗津津的。

第30团还没开始佯攻西门，第28团已跑步赶到。周希汉大喜！命令他们在北门外待命，李铁军来了打阻击，李铁军不来，投入攻城战斗。第30团适时向西门发起攻击。虽是佯攻，打得却很凶。城头上，敌人鬼哭狼嚎，工事全被掀翻，敌人不得不连续向西门增兵。

零点整，第29团在东门下埋的150公斤炸药拉响了。一声闷雷，地动城摇，城门被炸出一个缺口。东、西两门外冲锋号争相吹响，枪炮声大作，杀声阵阵，周希汉的眉梢舒展开来，他举起望远镜，注视着战场：黄正诚赠送的“蒋先生”发挥了威力，炮弹连珠，直泻在城头上。城头上立刻开了花，碎砖横飞，火光冲天。没多久，解放军战士便登上城楼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

电话响了，是第29团团长沙效敏。“报告旅长，东门有两层，我们只炸开了一层，经过登城肉搏，现在已经歼灭了城头守敌，突进去一个营。”

“好！都进去。两个营向西展开，一个营突击南门，消灭南门的守敌。把南门外的部队接进去。”

“是！”

凌晨3点，第30团电话来了，“报告旅长，我是卢显阳。我们已经占领了西门。”

“迅速扩大战果。效敏已经突进去了，你赶快进城同他汇合。”

“是。我进城后先向南突击，把我的第3营接进来。”

“不必了。效敏已经去了。”

“明白。”

看来进行的比预料的顺利，周希汉放下电话，叫来旅骑兵连连长，“你带一个排，向城北十五里堡，三十里堡方向警戒，监视李铁军的动向。”

骑兵连长从小跟父亲往来于塞外和中原之间，练就了一身马上好功夫。他最不愿意看着别人打仗。攻城，他的骑兵派不上用场，他正憋得难受，接到命令，便带上人飞马而去。

接着周希汉又命令第28团留下一个营在城外做预备队，其余的靠近第29团从城东北角突进城里。

第28团一进城，迎面碰上十几个敌人。他们冲过去，三下五除二缴了这十几个人的械。有一个胖乎乎的敌人厉声厉色地叫起来，“你们干什么，我是杨天明！杨副师长！”听到自报家门，一个战士立刻用绳子把他绑了起来，原来这位杨副师长是要去东门督战的，走到半路便糊里糊涂地当了俘虏。

拂晓前，第10旅主力全部突入城里。武庭麟依仗兵多，固守街道工事拼命抵抗，我军很快将敌分割成块，同敌人逐街逐巷地争夺。天亮以后，我军控制了城内大部分阵地。武庭麟收拢残部1500余人龟缩在城西北角的一座寺庙里。

天亮以后，周希汉便要进城。指挥所的同志们见枪声未息，怕不安全，不同意。周学义副旅长说：“要进我先进，你等等再说。”正说着，城里冒出滚滚黑烟，起火了。在有民宅的地方打仗，我军从来不放火。这是敌人放的火，还是失火，看来同志们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他们停止了争论，决定先派人进去看看。恰在此时，电话线架好了。第28团首先报告：“敌人已经龟缩进城西北角的寺庙，工事很坚固，不容易接近。”火正是西北方向着起来的。周希汉问：“火是怎么回事？”“是敌人放的！”“传我的命令，暂停攻击，先救火。注意防止敌人反扑！”说罢，他再也不同人商量，“进城！指挥所靠近寺庙设置。”

真是名副其实的负隅顽抗。这寺庙紧靠西北角，地势高院墙也高，正面还有一道护墙，俨然是城中之城，护墙外东南两面都是开阔地，工事很坚固，火力也很强。第28团曾从东面组织几次爆破，都没有成功。敌人放火烧的是中心工事前的民房。周希汉听了报告，便亲自带人重新勘察了战场，把敌火力点编号，然后开始布置攻坚。

“李铁军先头部队进至三十里堡！”

听了侦察员的报告，旅指挥所不亚于落下一发重磅炮弹。周希汉要他的部下沉着。然而，此时再沉着的人也会紧张的。三十里。周希汉也没有料到，李铁军的动作会如此之快。如果说武庭麟是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的话，这李铁军倒是兵也不能将也不能。

城外大兵压境，城内顽敌未歼。走，哪里走得脱！武庭麟会破裤子缠腿把你死死地缠住。打，三十里眨眼就到。情势之危甚过攻城之前。胜负只在毫厘之间。走不脱或者吃不掉武庭麟，那李铁军必不会放过吃掉周希汉的这个绝好机会。只有干净彻底地吃掉武庭麟，李铁军就不一定敢死逼我。而且

吃掉了武庭麟，李铁军也就不那么可怕了。他扔下了手里的烟头，又点上一支，慢慢地说：“形势的确很危险，现在不能撤退。为什么，你们都清楚，我不多讲。只有坚决歼灭武庭麟才是我们的唯一生路。”

接着，他命令第30团派一个营迅速到十五里堡占领阵地，第28团第3营在城北5里处担任阻击第二梯队。这是两个迟滞李铁军进军速度的措施，交待完毕，他又命令第29团、30团各留两个营作预备队，其余四个营统一由他自己指挥攻坚。旅直属队、辎重、伤员和俘虏先撤过汝河以西，向鲁山方向运动。然后，他才向各团长和主攻营长继续部署攻坚，对旅属火炮和各团属火炮、重机枪都做了统一调整。

3小时，阻击部队只要能争取到3个小时的时间，就够了。他嘴里在布置，眼睛在看手表，心里在盘算着。

部署完毕，众人以为他要下达总攻命令了，谁知他用力扔掉烟蒂，大声说：“开饭！”他环视众人，十分肯定地说：“对，开饭。”他对周学义副旅长说：“老周，你想想办法，主攻部队最好能喝上热汤。半小时可以吧？”周学义点头会意，转身便走。周希汉有些激动地梗起了脖子，眼睛亮亮的，“同志们，李铁军有饭吃，武庭麟也有饭吃。我们的部队不能饿着肚子去会他们。”

若干年后，希汉将军回顾说：“当时我想说的话很多，可就说了那么两句。我有吃饭的时间，为什么不吃？不吃饭也能打仗，可吃饱了有劲，吃饱了胆壮，吃饱了心不慌。我要吃饱了去捉武庭麟，看他李铁军能把我们怎么样。”

4个营，2000来人，半个小时要吃上热汤哪那么容易？这件事却没让周学义费力气，老百姓都给送来了。有的是地方党组织动员的，很多都是群众自发的。热馒头、热面汤，还有刚煮熟的鸡蛋。周希汉双手捧起一碗面汤，还没有开口，两颗硕大的泪珠落到了碗里。

13点整，三发信号弹腾空而起。一门山炮按周希汉的命令，被推到离敌人中心工事只有百来米远的地方，正对护墙，抵近射击。各攻击点的火炮同时开火。寺庙一下子被烟火笼罩。护墙被摧毁了，院墙被炸豁了，碉堡一个一个地被掀翻了。炮声未息，冲锋号便吹响了。英勇的战士们呐喊着从各攻击点突进寺庙。武庭麟这才感到末日来临，把一面小白旗伸出碉堡拼命地摇。

两员国军中将高举双手钻出碉堡。周希汉吩咐吴效敏：“赶快押走，莫让跑了。”说完他用无线电直接同陈赓通了话：“攻克郟县，捉到武庭麟和两个副师长。李铁军已过十里堡，离县城5里。我现在撤离。”

陈赓放下话筒，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这一仗真是周希汉的杰作哇！”陈赓的话带有感情色彩，但说是杰作却一点也不过分。部队在运动中，在敌人大兵压境的情况下，攻克城池，歼灭了与自己数量相当的敌人，擒获数员敌将。这不仅需要有过人的胆识，还要有较高的指挥艺术。

周希汉出城过汝河，李铁军先头部队进北门。他刚好没有摸到周希汉的老虎屁股。他很快便探明打临汝和郟县的都只是周希汉的第10旅，果然没有敢死追。周希汉则在陈康的接应下顺利与主力汇合。

这一仗后来被前委誉为中原我军机动歼敌的典型范例。



## 北平和平解放中的郑维山

刘俊桐

郑维山（1915～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湖北省麻城（今河南新县）人，幼年家贫，读过一年私塾，放牛为生。黄麻起义时，加入童子团，任分队长，开始从事站岗放哨、送信等革命活动。1929年加入少年先锋队，任中队长。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赤卫队，任赤卫队副指导员，同年率队编入中国工农红军。先后任红四方面军总部炮兵连、通讯队政治指导员，第9军第81团政治委员，第27师政治委员，第30军第89师、88师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教导团政治委员、团长，第4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张家口卫戍区司令员，冀察军区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第3纵队司令员，华北军区第2兵团第3纵队司令员，第19兵团第63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19兵团副司令员，第20兵团代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党委副书记，代司令员、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兰州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他是第三、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1985年被增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十三大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 \* \* \* \*

朋友，当你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一定会被故宫、天坛、颐和园等雄伟壮丽的建筑所吸引，为这些中华民族历史的瑰宝、世界著名的文化古迹完善而感叹。但是，你会不会想到，在当年平津战役中，为保护这些宝贵财产，多少人为之所付出的代价和承担的风险。会的，一定会的，一定会想到当年的平津战役；想到制定和平解放北平周密计划和实施正确指挥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聂荣臻等我军统帅们；想到那些当年为实现党中央和平解放北平计划，而奔忙的民主人士和地下工作者；同时，也会想到那位大义之举的国民党要员傅作义将军。

然而，你大概不会想到，甚至不知道，当年作为晋察冀野战军第3纵队司令员的郑维山将军，为确保和平解放这座名城计划的

顺利实施，曾在战场上“独断专行”、“擅自行动”所担的风险；更少有人知道，郑维山将军在华北与傅作义四次交战，对傅作义走向和平起义的道路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

笔者有幸看到有关资料，拜访了郑维山老将军和一些当事人，方弄清其中缘由。

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作为人民功臣留在中央政府工作，先后任水利电力部部长、国防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与聂荣臻，罗瑞卿、杨得志等过去华北战场的老对手见面的机会多了。工作之余，常提起当年战场上双方指挥判断的正误情况，每当谈到华北野战军第3纵队司令员郑维山时，傅作义似乎颇感兴趣，常插话赞誉，曾向人打听郑维山的情况。

1955年，郑维山授中将军衔，担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与傅作义见面的机会多了。这时人们发现已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傅作义，每次与郑维山见面时，握手寒暄之后，总要多谈几句，有时似乎谈得还很投机。在场的人有些不解。

傅作义，山西临猗人，1895年生，国民党员，曾是反共急先锋。郑维山，原湖北麻城人，1915年生，共产党员，是解放军的将领。二人年龄、籍贯、

经历、政治信仰均不相同，为何一见如故，谈话如此投机呢？当时，人们从只言片语中，只了解他们谈得多的是解放战争时期，华北战场及平津战役与北平和平解放的一些话题，但对其中细节缘由并不清楚。

为此，有人曾问郑维山将军，他总是笑而不答。

后来，人们渐渐知道，在解放战争时期，郑维山与傅作义战场上有过四次交手，傅作义的行动计划均因郑维山的出现而破产。因而，一位算命先生告诉傅作义，说郑维山是你的克星。但是，后来傅作义见了郑维山却说，我能留下来，应该感谢你的帮忙。

1996年秋天，我带着这个问题在北京西山向郑维山将军提起此事。

郑将军说：“反正这四次交手，他是吃了亏，教导旅、第3纵队，就是现在沈阳军区的第64军和北京军区的第63军打了胜仗。这些历史有记载。至于傅作义怎么联想，我怎么知道呢！”

问：“传说傅作义称你是个多谋善断、勇猛果敢的战将。”

郑：“我记不得了。”

郑：“当时，我们见面，他很客气，说了些过奖的话，我只当他是开开玩笑而已”。

郑将军接着说：“他年龄比我大，职位比我高，过去战场上又交过手，将来要一起为人民做事，我认为他说那些，是谦恭，是表示友好，是为了团结。因此，我一直没当真，也没记住”。

问：“传说傅作义说你这几仗，特别是平津战役中，你在碱滩马圈那个阻击战，使他后来连丢三个军，动摇了他固守北平的信心。据说碱滩战斗结束的第二天上午，傅作义就急忙致电我方，要求和谈。三天后又主动提出‘军队不要了’的和谈条件，放弃了军队。”

郑：“这些细节我不清楚，也没有核对过时间。碱滩阻击战是12月9日早上打响，傍晚结束，傅作义电报是什么时候发的？”

答：“答应和谈，要求双方停火是10日上午。答应交出军队的电报是14日，电报内容共三条，第一条就是‘军队不要了’五个字。当时军委认为，碱滩阻击战后，傅作义嫡系部队3个主力军被围于北平城外，且厄运难逃，城内仅有傅系的3个师，其余部队多是蒋系，不一定听他的指挥。所以，他才放弃了军队。由此看来，傅作义曾说你也是和平解放北平的功臣，说你帮了他的忙，将他拖住了，把他留下来的话，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我再说一遍！”

老将军似乎很激动，他喝了口水接着说：“他留下来与北平和平解放，是毛主席、中央军委英明领导的结果，是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协力作战，以及北京市地方党组织和广大民主人士、人民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对此，我在《从华北到西北》一书中写得很清楚，个人的作用是渺小的。再说，那时打仗，上级叫向哪打就向哪打，哪里有敌人就往哪里打，哪想什么功劳不功劳啊！”

是的，上级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哪里有敌人就打向哪里，哪里有困难，哪里最需要就冲向哪里，这正是老将军的性格和原则。

正是这个原则，使他及早地发现了傅作义偷袭张家口的企图，主动出援阻击敌人，争取了时间，使张家口党政军机关及人民群众得以安全有序地转移。

正是这个原则，使老将军敢于刚烈肝胆，上书直言，在保北战场与敌对

峙，为主力争取主动创造了条件。

正是这个原则，老将军得知敌人奔袭石家庄消息后，昼夜兼程 500 里，与友军协同拦住了敌人去路，打破了傅作义偷袭我中央所在地的计划。

正是这个原则，在平津战役的战场上，老将军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冒着战场抗命，可能对自己造成的种种不利，将自己置身于腹背受敌，胜败未卜的危险境地而不顾，果断命令部队堵截第 104 军对第 35 军的接应，切断了第 35 军回撤北平的唯一通道，对毛泽东主席、中央军委制定的和平解放北平计划的顺利实施，促使傅作义走和平道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那么，此间，郑维山将军与傅作义是如何斗智斗勇的呢？话从傅作义进犯华北解放区的第一仗说起。

张家口战役，郑维山警备部队与傅作义主力先打起来了

聂荣臻元帅回忆 1946 年张家口战役时说：

“我们对傅作义经丰镇、大同、阳高东进策应怀来是有准备的，但对他从集宁、尚义（南壕堽）直插张北估计不足。所以……”（《聂荣臻回忆录》第 638 页）。

所以，就发生了郑维山与傅作义第一次交战，就发生了傅作义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迂回偷袭张家口，郑维山胸有全局，夜巡张北，阻敌狼窝沟的故事。

事情发生在 1946 年秋天。

那时，傅作义为国民党晋绥第 12 战区靖绥公署主任，以归绥（今包头）为大本营。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受蒋介石指使，从西面进攻张家口。

张家口，是我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经八年抗战所夺取并占领的第一座城市，是我晋察冀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为华北解放区政治、军事、文化、经济活动的中心，被称为晋察冀边区首府，未来国家首都的雏形。

郑维山将军，当时就担任这个首府的卫戍司令员，主要负责城市的治安和警备工作。

1946 年 9 月 29 日，敌人开始了对张家口的大规模进攻。

晋察冀军区首长根据中央军委关于“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地方为主的”作战原则，以主要兵力部署于张家口以东的怀来地区，以一少部兵力放在张家口以西，在张家口城及以北地区没有作更多的防守准备。

对此，军区曾有人提出异议，其中包括卫戍司令员郑维山，认为城内或以北应留一定的机动力量，以防不测。

但是，军委的意见则不同，认为：“傅顽不可能以大兵力东进，且有张宗逊，陈正湘两部钳制……”同时，军委为了解除晋察冀军区东线作战的西顾之忧，对西线兵力部署作了适当调整。命令晋绥军区地方部队和民兵在绥东积极活动牵制傅作义部队。晋绥主力部队，由张宗逊统一指挥，以 4(5) : 1 之绝对优势兵力，每次消灭敌一至两个团，只要打如此两三个胜仗，不仅敌东进企图可以击破，绥东局势亦可开展。因而，军委要求晋察冀野战军“应集中全力配合以民兵各个击破东线敌人的进攻。”依此，晋绥部队钳制打击西线傅作义，晋察冀部队集中全力打击东线进攻之敌，粉碎敌向张家口的第一次进攻是完全可能的。

军委的上述指示，无疑是正确而明了的，各部队亦坚决执行，积极行动。

但是，战争的胜败是诸多因素决定的，在激烈的战役战斗中，特别是在

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往往一个偶然的客观因素，一个突发事变，有时会影响整个战役战斗的进程。张家口就是在敌情发生突变的情况下而提前弃守的。

在这次突发事变中，郑维山将军以他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敏锐的战场洞察力，最先发现傅作义的企图，及时果断地采取了有效的行动，迟滞了敌人突袭，为我党政军机关安全撤离张家口，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此时，郑维山年仅 31 岁，但已有 16 年领兵作战的历史，有数百战的亲身经验。长期艰苦的战斗生活，使他早早地患上了失眠症，一有战事，常常几天几夜睡不好觉。

10 月 7 日夜，这是张家口战役的第 8 天。

郑维山又失眠了，已是 8 日凌晨一点，他仍无睡意，于是干脆起来，将近日的战报和敌情通报进行细细地分析推敲。

从整个战场电报中看，张家口战役进展相当顺利。南线，我军连克望都、徐水、容城、定兴四县城，控制了平汉线北段 250 多里及沿线车站；西线，晋绥部队已按军委的部署，牵制和拦阻了傅作义东进之路；东线，晋察冀野战军主力连续粉碎了李文集团的 3 次进攻，歼敌 6000 多人。这些胜利的消息确实令人兴奋。

然而，一向有作战“心细如绣花”（聂荣臻语）之美称的郑维山，此时却想到事物的另一面：一是我军虽取得初步胜利，但并没有改变敌强我弱的局势，张家口仍处在重兵压境的险境中；二是夺取张家口是蒋介石发动内战既定目标，目前所受的打击，不足以促使他改变其决心。三是敌人从东、西进攻受挫，有可能改变战术和攻击方向。

此时，郑维山将军再次想起了张家口的北面。

张家口以北地区几乎是一马平川的大草原，无险可守，只有张家口至张北之间狼窝沟一带地形可以利用，但其山势多为北坡南陡，不易向北防守。当年，日军侵占张家口和后来苏联红军参战，都是从这个方向突破的。

傅作义会不会从这里来呢，尽管军委曾指出过“傅作义不可能出很多兵向东”，但万一从这里来怎么办？

想到这里，郑维山睡意全无。

已是深夜两点，他找来警卫团团团长李金时，命令他带 5 个连，立即出发，去张北警戒。临行，郑维山又将卫戍区的汽车和马匹交给警卫团，命令李金时带一个步兵连和机枪连一个排乘汽车先行，其主力由副团长邹新民带领，徒步跟进。

局势的发展正如郑维山司令员所预料的那样。

就在郑维山向警卫团下达夜巡张北命令的同时，傅作义已接到了蒋介石的密电，开始实施从北面偷袭张家口的行动，其快速先遣队之骑兵师先头部队，已出现在距张北不远的草原上，由西而北，然后向东南，直扑过来。

原来，傅作义对蒋介石要他离开绥远老巢，远征东进，攻击张家口，并不情愿，但碍于蒋介石的指令，只得故作姿态，以掩人耳目。

开始，他以第 35 军军长鲁英麟带第 32 师并指挥暂编第 3 军的一个师，伪装成主力，以安春山的骑兵第 4 师、鄂友三的骑兵旅和刚收编的杂牌骑兵部队，组成先遣队，由孙兰峰指挥，缓缓东行。其第 35 军主力和暂编第 3 军主力及司令长官部机械化部队，由董其武指挥，伪装成第 35 军的后续部队，集结隐蔽于远离战场的集宁地区。

当傅作义得知东面李文损兵折将，南面孙连仲丢城失线，共军又加强了

西面对他的防御时，就更加举步不前。后在蒋介石的再三督促下，傅作义方派司令长官部副官，亲自带人到大同号房子，派人到平绥路沿线征购粮草，大造东进声势，拉开进攻张家口的架势，给蒋介石看。实则坐观李文、孙连仲挨打。

由此可见，中央军委当初关于集中精力于东面对敌作战，不要顾虑西面的指示，是有根据和正确的。

但是，事情是复杂的，千变万化的。

10月8日，蒋介石见东线李文屡战失利，而西线傅作义却只打雷不下雨，出兵不出力，遂决定将张家口划归傅作义第12战区管理。

傅作义见有利可图，立即假戏真唱。南路两个师仍由鲁英麟带领，向张家口佯动。北路，主力部队以骑兵第4师为先行，第101师、暂编第31师、暂编第17师、暂编骑兵第4旅和总部机械化部周学义副旅长说：“老周，你想想办法，主攻部队最好能喝上热汤。半小时可以吧？”周学义点头会意，转身便走。周希汉有些激动地梗起了脖子，眼睛亮亮的，“同志们，李铁军有饭吃，武庭麟也有饭吃。我们的部队不能饿着肚子去会他们。”

若干年后，希汉将军回顾说：“当时我想说的话很多，可就说了那么两句。我有吃饭的时间，为什么不吃？不吃饭也能打仗，可吃饱了有劲，吃饱了胆壮，吃饱了心不慌。我要吃饱了去捉武庭麟，看他李铁军能把我们怎么样。”

4个营，2000来人，半个小时要吃上热汤哪那么容易？这件事却没让周学义费力气，老百姓都给送来了。有的是地方党组织动员的，很多都是群众自发的。热馒头、热面汤，还有刚煮熟的鸡蛋。周希汉双手捧起一碗面汤，还没有开口，两颗硕大的泪珠落到了碗里。

13点整，三发信号弹腾空而起。一门山炮按周希汉的命令，被推到离敌人中心工事只有百来米远的地方，正对护墙，抵近射击。各攻击点的火炮同时开火。寺庙一下子被烟火笼罩。护墙被摧毁了，院墙被炸豁了，碉堡一个一个地被掀翻了。炮声未息，冲锋号便吹响了。英勇的战士们呐喊着从各攻击点突进寺庙。武庭麟这才感到末日来临，把一面小白旗伸出碉堡拼命地摇。

两员国军中将高举双手钻出碉堡。周希汉吩咐吴效敏：“赶快押走，莫让跑了。”说完他用无线电直接同陈赓通了话：“攻克郑县，捉到武庭麟和两个副师长。李铁军已过十里堡，离县城5里。我现在撤离。”

陈赓放下话筒，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这一仗真是周希汉的杰作哇！”陈赓的话带有感情色彩，但说是杰作却一点也不过分。部队在运动中，在敌人大兵压境的情况下，攻克城池，歼灭了与自己数量相当的敌人，擒获数员敌将。这不仅需要有过人的胆识，还要有较高的指挥艺术。虽然，在派出警卫团出巡后，郑维山曾安排对该旅给予弹药补充，但时间仓促，尚未完成。此时，只有边开进边动员边补充了。

教导旅旅长李湘、政委张明合，得令即刻出发，直赴狼窝沟，组织坚守防御，抗敌进攻。同时，卫戍区将民兵民工也动员起来，在狼窝沟纵深和两侧山地，制造伏兵假象，以迷惑敌人。

随后，郑司令员又将卫戍区机关的车辆、马匹调赴狼窝沟，担任运输任务。

车马都安排出去后，这下苦了郑司令员的爱人孙景波。

郑维山将一切部署停当，准备亲自上前线时，发现爱人和孩子没走。他

转身进屋亲了一下还在吃奶的女儿郑理力，嘱咐爱人带孩子马上离开，先回灵寿孙景波娘家去。

孙景波也是一位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老党员了，对丈夫这样做完全理解。但华竟是个女同志，又带着刚生下来几个月的孩子，兵慌马乱，离娘家迢迢几百里，实是困难。就提出：“东西都不要了，是不是找匹马，驮孩子？”

“要毛驴都没有，留着驮炮弹呢！”郑维山说完就急匆匆地忙着指挥部队去了，孙景波只得找个民工帮忙，抱着孩子，离开了张家口。

此时，军区、军委已得知敌人偷袭张北的消息，毛泽东主席亲自拟电命令击灭敌人，电文称：

“聂、刘：

闻傅作义一部窜至张北，必须立即击灭，巩固后方；傅作义还可能以一部东进，你们必须准备击退该敌”。

显然，军区、军委尚不知蒋介石将张家口划给了傅作义这一情况。所以难以对傅作义东犯意图和兵力使用作出正确的判断。军区分析从北面偷袭之敌不过 2000 人。军委估计“傅顽东进至多不过万人左右。”

直至 9 日上午，军区接到内线情报后，方知敌情有重大变化，即致电西线张宗逊、陈正湘，并报中央军委，电称：“据密息，傅顽第 101 师、31 师之电台，自昨日（8）23 时起未出来，似在东进。骑第 4 师电台联络频繁（10 月 9 日 20 时）。”

军区判断敌已经在隐蔽东犯途中，要求张宗逊、陈正湘，“立即组织西线野战军司令部，统一指挥西线晋绥第 1、2、3 各旅、第 4 纵队之陈仿仁旅，第 1、6、7 各分区抗击傅作义东犯之敌。”

但此时对于敌主攻方向、使用兵力仍没有作出准确的判断。军区认为“敌进攻的主要方向仍在张家口以西和西北兴和、柴沟堡方向，进攻兵力为两个师。”

实际情况是：敌突袭部队为 3 个步兵师，1 个骑兵师、1 个骑兵旅、4 个骑兵大队、1 个炮兵营和一个由 10 辆战车 40 辆汽车装备的机械化部队，兵力在 2 万以上。以骑第 4 师为先导，提前出发，9 日凌晨到达兴和、尚义。即以一部骑兵由孙兰峰指挥，自兴和向柴沟堡实施佯攻。主力按第 101 师，第 31 师、暂编第 3 军军部、机械化部队、炮兵，暂编第 17 师的序列，沿骑兵第 4 师开辟的道路向张北、狼窝沟扑来。

而此时，张北已被敌先头部队骑兵第 4 师占领。狼窝沟地区，只有我刚刚到达的教导旅和警卫团余部。且经连日征战，人困马乏，建制不全，粮弹不足。

一场恶战迫在眉睫。

教导旅到达阵地后，再次进行政治动员，提出“坚持阻击敌人，誓死保卫张家口”的口号。并依据狼窝沟地形，构筑了大纵深多梯次的防御阵地，兵力作前轻后重部署。旅长李湘将旅的指挥所设在狼窝沟北沟口的第一道阵地上。警卫团副团长邹新民将该团余部编为 3 个连，担任预备队，在北沟口的左侧占领阵地，随时准备加入战斗，消灭突入阵地之敌。

按傅作义原定计划，骑兵先遣队 8 日上午夺下张北，下午可打开至张家

口通路，9日主力投入战斗，一举夺下张家口，召开记者新闻发布会。岂料，半路杀出个卫戍区警卫团，接着又来了个教导旅，一下打乱了他的偷袭计划。此时，又据空中侦察报告，张家口以北狼窝沟长城线一带解放军活动频繁，似有伏兵。傅作义误认为我军早有准备，怕中埋伏，遂致电蒋介石，要求空军支援攻击作战。

10日上午，傅作义以3个团的兵力在飞机炮火掩护配合下，分3路向狼窝沟发起多波次攻击。

战斗一开始就打得异常激烈。

教导旅，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卫戍区6个团精简合编的，下辖3个团，成分老，骨干多，作风过硬，相当能打，被誉为首府“御林军”。

在集宁战役中，该旅就与傅作义的骑兵交过战。如今，仇人狭路相逢，分外眼红。他们依托狼窝沟有利地形，连续打退了敌骑兵的17次集团冲锋。担任正面阻击任务的教导旅第1团，打得更为顽强，数度与敌白刃格斗，将突入阵地之敌驱出。但终因寡不敌众。战至10日中午，我第一线阵地为敌突破。

敌乘势楔入，向狼窝沟、黄土坝、草孤坝我第二道阵地攻击。

危急中，幸亏卫戍区运输队将弹药送到，并加入战斗，遏制了敌冲击势头，为一线部队收容、转移争取了时间。

不久，第二道防线亦被敌突破。郑司令员命令教导旅转入机动防御，以小分队多层次、大纵深、节节抗击的战术，迟滞敌攻击速度，并将情况向聂司令员报告。

10日12时，军区电告各部队并报中央军委：“傅作义乘空突入张北，本日敌骑（后面可能有步兵）向我张垣以北狼窝沟以及长城线进攻。前面只有李湘部……”“张垣空虚，敌已突破二道防线，正在长城线与空（军）配合猛犯中，我各方均增援不及，张垣危急”。

敌人进攻之快之猛，势头之大是出乎意料的。10日13时，军委终于查明了敌人真相，急致电军区领导，电文如下：

“聂刘：

北平息，进攻张家口任务，蒋已交给傅作义，你们必须严防傅作义部于数日内进攻张垣，你们必须数日内布置好巩固张垣之防务，傅部来攻至少有两个步兵师及一个骑兵师，约1万至1.5万左右”。

能获得敌人这一机密情报，是相当不易的，但是，来的太晚了。

傅作义已乘飞机临空指挥，地面主力部队已展开，在空军支援下，向张家口攻击前进，其先头部队已抵近于距张家口50余里处。

在这一地段内除了卫戍教导旅及警卫团少部兵力外，别无他部。况且，他们已与敌激战两天两夜，人困马乏，弹药不足。教导旅不愧为抗日骨干组成的部队。他们奉命转入机动防御后，不畏强敌，利用狼窝沟至张家口公路两侧有利地形，充分发挥游击战之长，以前面阻截，两翼侧击，背后袭扰等手段，以地雷，炸药等武器打击敌人，使敌人每前进一步都付出血的代价，有效地迟滞了敌之进攻速度。

10日下午5时，郑维山司令员再一次来到张家口大境门外，部署最后一道坚守防线，动员教导旅要以“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坚守阵地，没有命

令不得放弃。

黄昏时分，张家口市内除军区司令部外，大部机关、人员和物资已转移。郑维山急赶到军区司令部，向聂司令员报告了市区转移及防务情况，劝请聂司令员撤出张家口。

10日18时，聂司令员拟电向中央军委报告：

“军区边区政府一级机关撤出张家口，我与中央联络台即暂失联络，中央给我指示可暂时由萧罗转。”

随即叮嘱郑维山，对张家口发电厂等不要作破坏性处置，我们早晚还会回来的。之后，轻松地说：“把张家口这个包袱让傅作义背上去吧！”从容地走出办公室，撤离张家口。

10日夜，傅作义不敢冒进，停止攻击。郑维山命令教导旅和民兵游击队，频频出击，袭扰迷惑敌人，掩护市内活动。

11日晨，张家口最后一批人员物资撤出。

至此，郑维山指挥卫戍部队已抗敌三天三夜，打乱了敌偷袭计划，迟滞了敌强行攻击的前进速度，圆满完成了阻击任务。

11日上午9时，敌进攻开始。郑维山命令教导旅边战边向张家口东南宣化方向转移。

当日下午4时敌攻入张家口市。并致电蒋介石：“我军已从张家口大境门进入城内，共军已经撤退。”

傅作义得了一座空城。

张家口，是热察战略基地中心，是敌之必争之要点，解放战争初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特别是大同集宁战役失利后，张家口两面受敌的形势日趋严重，张家口的弃守只是时间问题。但以张家口为钓饵，大量地歼敌有生力量则是可行的。然而，由于对西线傅作义敌情变化掌握不及时，估计不足，方向判断有误，使敌乘虚而入。

对此，中央军委不但没有过多地责怪军区，还于张家口弃守的当天，由毛泽东主席亲拟电文，两次致电聂荣臻、刘澜涛，称：“我军任务重在歼灭敌有生力量，不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望本此方针，鼓励士气……”显然，军委似乎承担了责任。

在这次战役中，郑维山不拘泥于任务分工，主动扩大警戒范围，及时掌握情况，灵活指挥卫戍部队，顽强战斗，有效地迟滞敌之行动，争取了时间，使张家口党政军机关和人民生命财产得以安全有序地转移，也使军委和军区感到欣慰。聂荣臻曾对魏巍说过：“撤离张家口，抗击傅作义偷袭，郑维山是立了功的。”若干年后，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敌人由张北进到狼窝沟的时候，军区教导旅进行了顽强抵抗，掩护领导机关有序地转移。我留下当时的张家口卫戍司令郑维山同志指挥教导旅作后卫，还留下军区司令部的几个人，有条不紊地处理撤退中的问题。”

张家口一战，郑维山赢得了我军的赏识，也引起傅作义的关注。在国民党侵占张家口后召开的祝贺会上，国民党政府及要员对傅作义大加赞誉，称之为“中兴大臣”、“天之骄子”，傅作义也得意忘形，大谈如何“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力挫解放军主力，一举夺取张家口。突然，一记者问：

“听说，张家口以北地区并无共军主力，仅有郑维山卫戍警备部队，不足3000人，傅将军以两万之众，激战三昼夜，方得空城一座，作何解释？”

傅作义佯装没听见，连连举杯劝酒搪塞，不知如何回答。



的确，傅作义没法回答，因为他不知道郑维山如何判断了他的偷袭行动，又如何指挥警备部队实施阻击的。

也许，这就是全国解放后，在国防委员会休息室里，傅作义见郑维山时，要问的第一个问题。

傅作义上台第一仗，郑维山杀了他的“虎头师”

翻开《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部分条目释文汇编第139页，可见如下记载：

“涞水庄疃战役”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野战军在河北涞水地区，对国民党进行的一次围城打援战役。”

“……”

“此役，共歼国民党军8000余人，毙第35军军长、参谋长，新编第32师师长等高级将领，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华北‘剿总’（傅作义）的嚣张气焰，……。”

编后说明曰：“本条目为中条，现写了约800字，本条目原名为《庄疃战斗》，为了更好地反映此战役的全过程及战役动作的有机联系、军季编辑室审稿时研究改名为《涞水庄疃战役》。”

在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人民解放军历经战斗战役可以万计，仅有16次编入《中国大百科全书》。庄疃是一个小村庄，战斗规模小，时间也不长，为何作为中条载入《全书》，而且在字数和篇幅排列上，列为解放战争时期华北诸战役之第7位。可见，庄疃战役是有其特殊的意义。

但此役在当初和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40多年后的今天，历史专家和学者们把它放在如此重要位置，大概是发现了此役与11个月后失去了一个王牌师的第35军，在平津战役之初就被围于新保安（后被歼），以及第35军被围定后的第2天，傅作义就急忙致电我军，要求停战和谈，及之后北平顺利实现和平解放之间的有机联系吧。

是的，历史事件的地位、作用和意义，只有通过历史来检验。

如此看来，当年关于郑维山、胡耀邦率部兵围涞水，回马战庄疃，枪挑“虎头师”，棒喝傅作义的传说，并非神话。

故事须从华北战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关节点——保北阻击战说起。

1947年秋，北平行辕国民党军在晋察冀野战军连续打击下，除以其第3军驻守石家庄外，其余主力全部收缩于北平、天津、保定三角地带，企图依托平津保战略基地和便利的交通条件，机动作战，以巩固国民党在华北的统治。

为了动摇敌之防御体系，各个击破敌有生力量，晋察冀军区决定首先在保定地区发起一次战役。其部署是：以野战军主力之第2、第3、第4纵队，在炮兵旅和地方部队配合下，以一部兵力围攻徐水之点，集中主力于保定以北地区待机打援。

战役从10月11日打响，第2纵队两个旅和第3纵队一个团首先向徐水发起攻击。敌即以第94军、第16军在战车团配合下，由高碑店、定兴沿平汉路，南援徐水。被郑维山指挥的第3纵队（欠一个团）和曾思育的第4纵队及独立第7旅阻于固城地区，经四天激战，第3、第4纵队和独立第7旅打退了敌援军的多次进攻。但因敌援军十几个团猥集一起，队形密集，且昼

攻夜缩，我多次反击都未得手，战斗成胶着相持状态。

据此，野战军司令部决定将主力撤出战斗，寻机再战。遂于16日晚致电第3、第4纵队首长，命令撤出战斗。同时命令郑维山率第3纵队脱离保北战场后，西转进攻涞水。

郑维山将军则认为不妥，他主张就地坚持，等待战机，并致电野司，言辞激烈，陈述己见，电称：

“我们没有考虑，也不准备打涞水，我们的意见在现地坚持，争取情况的变化。”

后来，野司首长采纳了郑维山的意见。决心于现地寻机歼敌，并将部署作了重新调整，于17日12时命令各部队于当日晚6时调整到位。17日黄昏，各部队依令开始行动。

正在这时，野司突然接到军区聂司令员急电，得知敌情突变。

原来，我野战军在保北与敌打成相峙状态后，“不是打不赢就走”，而是仍坚持打下去。国民党军战场指挥孙连仲和正在北平的蒋介石误认为我军在保北地区兵力不足，已陷于不易脱身的被动境地。于是，急调驻石家庄之第3军军长罗历戎率军主力，北赴保定战场，会同南下部队，以南北夹击之势，图歼我军于保北地区。

野司得知这一消息，决心以第3纵队两个旅和第2纵队一个旅及独立第7旅在保北摆出与敌决战的阵势，以坚决的行动迷惑、咬住敌人主力；我野战军主力立即隐蔽撤出战场，火速南下，歼罗历戎第3军于运动中。

各部队依计行事，南北两个战场同时展开。

北线，我在保北阻援的4个旅，于麒麟店、芦草湾、北张村一线阵地，顽强阻击，寸土必争，阵地失而复得者再，两昼夜连续打退国民党军多次整团整师规模的集团进攻；尔后采取运动防御，迟滞了国民党援军的行动，保障了清风店歼灭战的进行。与此同时，南线，野战军主力两夜一昼行程240里，将敌第3军围歼于清风店地区。

此役，歼国民党军1.7万余人，其中俘第3军军长以下官兵1.1万余人，开创晋察冀歼灭战的新纪录，对扭转华北战局起了关键性作用。

在这次战役中，郑维山率领第3纵队会同兄弟部队的两个旅从10月14日保北阻击战打响，至21日撤出战斗，激战七天七夜。起先，以顽强的战斗造成了敌之错觉；尔后，又以积极行动，阻滞了保北敌人不能南下援救第3军。在整个战役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功不可没。

但是这仅仅是开始，战役的胜败往往有连锁反应。

清风店战役的胜利，歼灭了石家庄出援的第3军后，石家庄即成了一座孤城，且兵力空虚。因此，在清风店战役结束的第9天，我晋察冀野战军又乘虚攻克石家庄。歼灭国民党军2.4万余人，使晋察冀、晋冀鲁豫两个战略区完全连成一片，开创了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夺取大城市之先例。

晋察冀野战军在20天之内，连战连捷，华北局势急转直下。困守平、津、保沿线各点之敌开始恐慌。蒋介石为挽救华北地区风雨飘摇的局面，于11月26日，再次飞抵北平，撤消了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仲的职务，撤消了保定、张垣（张家口）绥靖公署，成立华北五省（晋、察、冀、热、绥）“剿匪”总司令部，任命傅作义为总司令，统一华北军事指挥，加强平津保地区的防守。

傅作义一上台，吸取了孙连仲失败的教训，制定了从军事到政治所谓全

面进攻的“总体战”，采取了以集中对集中，以主力对主力的作战方针，以扭转被动局面。他还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宣称：“过去国军处于被动地位……今后将改取主动，决定反守为攻，不仅要收复点线，而且要将匪区全面收复，消灭共匪武力。”

一向不爱说大话的傅作义一上台竟吹出如此大话，如同给华北国民党军注了兴奋剂。一时间，平津保地区闹得沸沸扬扬，国民党政府和华北绅士、新闻界各报纸欢呼欲狂，说：“华北军事机构的统一和威名远扬的傅作义担当大任，北方战局不久将有开朗……，傅作义一身系华北安危……雄师所向，战果辉煌。”

然而傅作义，毕竟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他在兴奋之余，很快意识到，“雄师所向，战果辉煌”已是过去，当务之急，必须认真准备，保证旗开得胜，打好第一仗。因此，他将以往的失败教训及晋察冀解放军的作战特点进行了一番调查研究。在分析孙连仲失败的原因时，他认为：国军在保北、清风店、石家庄的接连惨败，主要是孙连仲对保北战场错误判断的连锁反应，而造成孙连仲错觉的是当时在保北战场上最活跃的第3纵队野战第8旅。这个旅是抗日战争初期在保定一带发展起来的，占有天时地利人和，且有宋玉林、徐信、张英辉、李克忠、杨栋梁等众多久经沙场的战将。曾任张家口卫戍司令、指挥卫戍警卫部队唱空城计的郑维山，此时担任了这个纵队的司令员。因此，傅作义曾告诫部下，特别是嫡系第35军指挥官，遇此敌当谨慎。

但是，第35军自装备了汽车、战车和美式的洋枪、洋炮之后，更加骄狂。不仅不把主子的话放在心上，反而扬言要专找第3纵队野战第8旅较量。

转眼到了1948年1月，晋察冀野战军为了打击傅作义的嚣张气焰，决心将6个纵队同时展开，向平张路北平至南口段，平汉路徐水、高碑店段实施破袭，以调动敌人，寻机歼敌。

但老谋深算的傅作义不为所动，除以地方武装和小部机动部队出击应战外，其主力平汉兵团的4个军和骑兵师仍猥集于涿县至徐水间，不进不退，企图以静制动，以逸待劳，待机而行。

晋察冀野战军遂改变战术，首先以两个纵队猛攻华北三大要点之一——保定，并以其他纵队配以民兵和地方部队向保定作声势浩大的佯动，给傅作义造成我欲取保定之错觉。

傅作义误认为，我军要动真格的，怕保定有闪失，即令平汉兵团机动部队，由涿县高碑店地区向南驰援保定。这样造成了涿县及以西地区兵力相对空虚，仅有第31师驻守涿水城，且远离平汉线。据此，晋察冀野司当机立断，遂以一部兵力继续攻保定，一部兵力东进雄县、霸县，分散傅作义的注意力。以3个纵队调头北上，攻打涿水，歼敌第31师。主攻涿水的任务又交给了郑维山、胡耀邦率领的第3纵队。另有两个纵队担任策应和打援任务。

郑维山接到命令后，非常兴奋，因为在保北清风店战役的初期，在保北战场与敌打成对峙的局面下，野司曾命令他撤出战斗，西去攻涿水。郑维山没有执行，坚持原地对峙待机。后来战机出现，加之野司指挥得当，取得了胜利。这次领导又把打涿水的主攻任务交给他，并且部署两个纵队从两翼作策应配合。所以，作战决心特别大。

受领任务后，他亲自带领易耀彩、宋玉琳两位主攻旅旅长和有关侦察人员，换上便衣，先行到涿水城外，侦察地形敌情，现地制定作战方案。

根据涿水城墙高而坚固，城四周地堡、鹿砦、铁丝网密集，外壕深而宽

等特点，郑维山决心：首先以突然袭击手段，攻歼城外之敌，扫清外围；尔后集中兵力强行攻城。

为了确保攻城胜利，又要准备应付战场意外，他计划攻城时多用火力少用兵，以主要兵力作机动。即将全纵队所有火炮，集中编成炮兵群，由纵队统一指挥，以4个团的兵力突击攻城，以5个团的兵力作为预备队，分别部署于涑水城东南的庄疃、西义安、史各庄和城东北待机地域，担任警戒和打援，并随时准备投入攻城战

1月11日晚，战斗打响。当夜扫清涑水外围据点，占领西关、南关（涑水城仅有西关、南关），歼敌一部，残敌退缩城内。部队进逼城下，作登城准备，待统一号令攻城。

次日凌晨，部队正按计划准备攻城，突然从东南方向传来枪声，且越演越烈。紧接着第9旅旅长陈仿仁报告说：“有一股敌人向拒马河桥头阵地进攻。”

第9旅部署在拒马河西岸，距涑水七八里路远的庄疃、史各庄、西义安地区，其任务是准备打援和应付突然情况。

郑司令员命令第9旅迅速查明敌情。

回答是：“雾太大看不清，可能是民团。”

“民团？”

“民团有什么战斗力，迅速将其消灭”。郑司令员的命令传达下去。

不久，第9旅报告：“拒马河桥头阵地被敌突破，我第27团第3营被迫退入庄疃，正在抗击敌人。”

郑司令员又一次对第9旅下达消灭敌人的命令。他的注意力仍集中在即将打响的攻打涑水的战斗上。因为，郑司令员清楚知道，涑水城西面是山区，是我解放区根据地，东面、南面和北面30公里内，有兄弟部队在配合行动。不可能有重大敌情。

然第9旅的报告接踵而至：

“敌人跟踪紧逼，已攻入庄疃与我第27团第3营激战”。

“第27团第3营被敌压缩到庄疃西北角几所院子里，另一股敌人向史各庄迂回攻击”。

郑司令员立刻警觉起来，这不像是民团，民团哪有这么强的战斗力，能同时向我两个营进攻，并且将我一个营逼的节节退守。他命令第9旅将第27团主力投入战斗，实施一个反冲击，捕获俘虏，查明敌情。第9旅旅长陈仿仁、政委蔡顺礼接到命令后，立即带旅前指进至庄疃村边，指挥战斗。

此时，最先与敌接触的第27团第3营，在营长王义德、教导员齐志忠的带领下，正在庄疃与敌激战。起初由于大雾能见度低，他们认为是民团，估计是一个营的兵力，拒马河桥头阵地被突破后，他们估计敌人可能是一个团。退至庄疃后，最后在村西北角与敌打成对峙。这时他们分析不是民团，一定是敌人的正规部队，最少有一个团。但由于是敌进攻我退守，不易抓获俘虏，一时没有摸清敌人底细。

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当面之敌，乃是傅作义的嫡系之嫡系部队，号称王牌军的第35军第32师一个整师。开始是两个营进攻，后来又增加了两个团，如今，连师部也进了村。

敌第35军是傅作义赖以起家的嫡系部队，装备精良，战斗力强。从北伐战争该军初创到抗日战争，傅作义先后率其转战河北、天津、北平、太原、

内蒙百灵庙、绥远，尽管职务数度升迁，但始终兼任该军军长。直到 1943 年，升任第 12 战区绥靖公署主任后，才将军长职务交给了董其武，但第 35 军的重大行动和人事变动仍由傅作义决定。据说该军排以上军官均由傅作义亲自选配，其首要条件是不怕死，效忠傅作义。抗日战争时期，第 35 军在傅作义指挥下，守太原，袭包头，收五原，战功颇多。解放战争开始后，它东犯集宁，偷袭张家口，亦称急先锋。其所属第 32 师是傅作义部队中两大骨干力量之一，曾被傅作义誉为“虎头师”的称号，并授予绣有虎头图案的战旗一面。全师官兵均配戴绣有虎头的袖标。

此次，傅作义刚一上台，即打出王牌，孤军深入，寻找我主力，真有“力挽残局，扭转乾坤”之势。开始，傅作义对我军南围保定，东击雄县，这种南围东攻意在打涑水的作战意图并未弄明白，但“共军善于声东击西，调虎离山，打运动战”的战术他是了解的。因此，当保定被围告急后，傅作义并不急于救助，而是故作姿态，令主力沿平汉路南下，对外佯称救援保定，实则观察战场形势变化，同时，他紧紧地将其机动部队第 35 军第 32 师和第 101 师、骑兵第 4 师及炮兵部队控制在手，配备了 160 辆汽车，随时准备突然投入战斗，置我军于被动境地，然后，调集兵力决战。

所以，当傅作义发现我主力在保定虚晃一枪，尔后有两个纵队沿太行山东麓向涑水运动，他立刻作出了反应，急令第 35 军军长鲁英麟率第 32 师和第 101 师两个团，于 11 日星夜乘汽车跟踪第 3 纵队南下。当夜到达高碑店、定兴地区。其前卫第 94 团一个营前出拒马河，恰与郑维山部署在这里的警戒部队遭遇。

这是傅作义到华北后与郑维山的第二次遭遇了。今非昔比，此时郑维山不再是只有警卫部队唱空城计的卫戍司令，而是统帅 3 个野战旅 9 个步兵团的纵队司令员了。

此次郑维山率领的第 3 纵队攻击涑水的战斗尚未打响，傅作义就将其王牌师尾随抵近至不足 5 公里地域，可见傅作义的军事指挥才能不同凡响。

然而，郑维山年龄虽比傅作义小 20 岁，就胆识和作战经验而言，亦毫不逊色，毕竟是 19 岁就担任红军师级指挥员，曾率主力师转战 7 省 30 多个县，行程万里，身经百战的战将了。其攻防战术刚柔并济，兵力部署疏而不漏。傅作义的先头营刚到拒马河，就遭到郑维山早已部署在这里的警戒部队的顽强阻击。

双方激战竟日，打成对峙。战至夕阳西下，敌仍未能全部占领庄疃村。

起先，傅作义获悉第 35 军咬住郑维山的第 3 纵队，很是为自己的神机妙算得意了一阵子。然而随着夜幕低垂，前方仍不见捷报传来，那种得意的神情很快就消失了。因为他听说过郑维山善于夜战，早在红军时期，郑维山就曾率“夜老虎”团（红 30 军第 88 师第 265 团）一夜歼敌“王老虎旅”的故事。如今，郑维山带的不是一个团，而是有 9 个团的纵队。想到此，他立即给第 35 军军长鲁英麟发电报，再次提醒他“务必谨慎行事，不可夜间冒进。”

鲁英麟与傅作义为保定军校第 5 期同学，结拜弟兄。傅作义对鲁英麟颇为器重。当第 35 军第 2 任军长董其武调任第 8 战区任政治主任时，傅作义就把第 35 军军长的重任交给了鲁英麟。鲁英麟深感傅作义知遇之恩，在傅作义上任华北五省“剿总司令”，大展宏图之时，决心于出个样来以报答“剿总”。他在接到傅作义的指示后，即打电话指示第 32 师师长李铭鼎，要他将部队撤回拒马河东，明天再战。

“虎头师”的指挥官们，一向骄狂，军长让后撤，多数军官想不通，李铭鼎便以当前战斗进展顺利，撤退将影响士气和激战中难以脱离战场为由，继续进攻。

外号“鲁蘑菇”的鲁英麟，此时既怕吃亏，又想立头功。见李铭鼎如此之说，就再没有下坚决撤退的命令，仅以电话通知第32师参谋长王谐轩，要他转告李铭鼎尽快将部队撤出庄疃村，退过拒马河来。

李铭鼎和鲁英麟同是山西垣曲县人，私交甚厚，他接到通知后，向鲁英麟说：“我给你留下一个团，保卫军部，你不用管我们了，天黑前我要拿下庄疃，结束战斗。”就这样，李铭鼎又将最后一个团主力调过河去，挤进了庄疃，河东只给军部留下一个营。鲁英麟无可奈何，既不同意也不反对，任由他的同乡自行其事。

当郑维山得知进入庄疃之敌是傅作义的主力“虎头师”时。即决心缓攻涑水，回师庄疃，打敌个立足未稳。遂下达命令调整部署：

1. 第9旅正与敌交战之部队，继续以积极的行动，主动与敌保持接触，以不暴露我军企图。

2. 监听敌人电话，及时报告情况。总攻打响后，割断敌之电话线，切断敌对外的联络。

3. 迅速抢占拒马河桥，切断敌之退路。

4. 担任攻城之第7、第8旅第一梯队原地监视涑水敌人，第二梯队迅速撤出，集结待命。

同时，向野司报告自己的作战计划和回师战庄疃，围歼敌“虎头师”的决心。

庄疃，位于拒马河西岸的河湾处，西北4公里是涑水城，河对岸是北义安村。

第9旅旅长陈仿仁、政委蔡顺礼接到纵队命令后，即以第26团第1营实施反冲击，迅速占领了北义安以西拒马河桥头阵地，首先切断了进入庄疃之敌与拒马河东岸敌人的联系。随后，指挥部队完成了对庄疃之敌的包围。

回师庄疃的作战计划得到野司的同意后，郑维山司令员立即命令第7旅留4个营继续监视涑水之敌，第8旅留5个营在涑水至庄疃间待命。其余兵力准备投入战斗。

当日深夜，郑司令员发出向庄疃攻击的命令。各团迅速展开，象无数把钢刀，向“虎头师”杀去。到了这个时候，傅作义的王牌师，还猖狂得很，公然叫阵：“你们要是野8旅（傅作义部队中有南方人，常喊成“哑巴驴”）我们就打一打，不是野8旅就滚开！”

他们哪里知道，眼前的对手不仅有野战第8旅，而且还有红军时期沿续下来的团队。

战斗刚开始，傅作义的“虎头师”就尝到了苦头。他们防守最严密的村西北角，首先被第8旅徐信率领的第22团突破，敌人接连三次反扑都被打退。随即第7旅第21团和第9旅第25团分别由村西、村西南突破，并占领巩固了突破口。

战至次日凌晨，郑维山将预备队第8旅大部和由纵队山炮营和各团迫击炮连组成的炮兵群，投入战斗。火力陡然加强，攻势突然增猛。

这时，李铭鼎才感到形势不妙，再不喊叫与野战第8旅较量，而是开始向北平傅作义求救。

其实北平的傅作义这夜也没睡好觉。起初，他为能咬住第3纵队而得意一阵子，但很快被“第35军军部与进入庄疃的第32师失去电话联系”的不祥电报的阴影笼罩。他命令鲁英麟将第101师向第32师靠拢，但第101师遇到我军第2纵队的坚决阻击。傅作义欲调骑兵第4师增援。这时，又接到前线报告说：“进攻庄疃共军，没有火炮重武器，仅以手榴弹，步枪等轻武器攻击，‘虎头师’以照明弹克服夜战的不利条件，依托村庄院落，以火炮机枪封阻，共军难以接近。如此，再坚持两个小时，天亮反击，定能消灭共军。”傅作义看完报告，才合上朦胧的睡眼，没有立即下达增援命令。

岂知，以勇猛著称的郑维山，善于藏而不露，后发制人，一旦他捕捉住战机，就会突然发力，置敌于死地。

此战，郑维山早已清醒地认识到，进入庄疃之敌，虽经长途奔袭，人困马乏，立足未稳。但装备精良，枪炮未损，弹药充足。因此，他先以小分队轮番攻击，以疲惫消耗敌人。经一天又大半夜的激战，天亮在即，敌人正处于疲劳麻痹、昏昏欲睡的状态中，郑维山突然使用炮兵群加入战斗，近几十门火炮进行20分钟猛轰，一下子把敌人打懵了。

李铭鼎预感灭顶之灾降临，向北平紧急呼救，请求傅作义派飞机、派骑兵支援。同时派参谋长王谐轩亲自带入过河向军长鲁英麟求援。

岂知敌第101师早被我第2纵队截在距庄疃不足10公里处，前进不得。军部仅有第32师留下的一个营，如今也被打得七零八落，仅抽出一个连增援庄疃。结果，刚进入村子，就全报销了，只活下连长一人，后来成了俘虏。

向鲁英麟求救希望已破灭，但向傅作义求救有了回音，傅作义命令李铭鼎固守待援，并电告：“飞机即刻起飞，骑兵第4师马上就到。”

李铭鼎在绝望中得到傅作义鼓励，象是打了针兴奋剂，来了精神。他立即将残兵败将急忙收缩于村东北角几个大院内，用火炮和汽车做工事，负隅顽抗，等待天亮。

天亮在即，郑司令员命令迫击炮向村内推进，行简便射击，集中轰击敌指挥部。

13日拂晓，敌情骤变。

空中，敌机数架由东北方向出现，直扑庄疃上空，轰炸、扫射。据说，傅作义亲自出马，临空指挥。但为时已晚，两军短兵相接，敌空中优势失去了作用。

因此，郑司令员提醒一线旅团指挥员，不要顾忌空中，注意地面情况。

地面，骑兵来了。曾经在偷袭张家口时担当先锋的傅作义骑兵第4师，出现在拒马河滩。晨光中，刀光闪闪，马嘶人叫，呼啦啦一大片，好不威风。但是他们不知向哪里打。飞机盘旋临空，无线电发报机传出傅作义的命令：“骑兵第4师注意，哪里危险，你们增援哪里！”骑兵第4师师长安春山，只好命令部队展开，向枪响最激烈的庄疃冲去。

郑维山将军在红军时期就多次与敌骑兵作过战。后又在张北与傅作义骑兵第4师交过手，对付骑兵胸有成竹。而且，他早就料到，到时候傅作义是会使用他的骑兵第4师的。但对骑兵来说，迂回，长途奔袭是其长，正面冲锋则是万不得已才使用。今天，傅作义出此下策，败局已定。拒马河岸一侧，我军20多挺机枪严阵以待，敌骑兵刚冲到距我前沿阵地约300米处，我机枪突然开火，密集子弹，把冲在前头的敌人连人带马打倒，稍后的敌人急转马头，又与再后面的冲撞在一起，乱作一团。我炮兵急促射击！迫击炮

弹准确地马群中爆炸。

敌骑兵人仰马翻，遗退了。

村内第3纵队调整部署，集中力量向村东街敌师指挥所和炮兵阵地猛烈冲击，一举突破敌人的核心防御圈。混战中，敌师长李铭鼎当场毙命。傅作义的“虎头师”在庄疃全部被歼。与此同时，傅作义第35军的另一个师在师长郭景云的指挥下前来救援，苦不能越过我第2纵队的阻击阵地。激战半日，好不容易进至拒马河边，但见第32师已覆灭，旋即撒手扔下军部不管，急忙逃离战场。幸亏安春山的骑兵第4师及时地赶到救驾，才使已成光杆司令的鲁英麟军长骑马突出我军的包围，钻进高碑店车站据点。

在据点里，鲁英麟惊魂难定，话不成语。急忙打电话向傅作义报告情况，一连几次，傅作义都不予理睬。鲁英麟心灰意冷，绝望中选择了自裁的道路。

因为他知道，第35军是傅作义的心肝王牌，历来都是傅作义亲自指挥，从来没有吃过大亏，因而闻名华北战场。也正因为如此，傅作义才倍受蒋介石青睐。这次，傅作义刚上台一个月，鲁英麟一夜之间就将他“虎头师”丢了，另一个师受重创，军部被打得七零八落，连自己的同乡好友李铭鼎也成了他乡之鬼。

他悔恨自己没有听傅作义“遇此敌当谨慎”的告诫，才落得如此惨败的下场。他知道，如此回去，傅作义不治罪于他，蒋介石也不会轻饶他，所以扣动了手中的扳机。

就在鲁英麟开枪倒地的同时，傅作义的电话来了，他还要详细了解一下，吃掉他“虎头师”的第3纵队的装备情况及作战特点。但是，为时已晚了。

其实，庄疃之战，受打击最大、最痛心的莫过于傅作义。原傅作义华北“剿总”司令部作战处上校参谋方正之在回忆录《傅作义嫡系部队覆灭经过》中写道：“第35军惨败，李铭鼎阵亡，鲁英麟自杀，对傅作义真是晴天霹雳，在傅军中震动很大。傅作义自带兵以来，在军阀混战中姑且不论，在抗日战争中仅阵亡过一个营长，在解放战争中，团长以下军官阵亡的虽不计其数，但军师长自杀、阵亡的也只有鲁、李二人。难怪傅作义闻讯后，伤心痛苦，不能自己，几天没有好好办公。这是傅荣任总司令之后在与人民解放军较量的第一回合中所付出的代价。”

对于庄疃之战的意义，历史已有定论。《华北第三次战争史》第126页论述是：

“这一胜利，无论是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军事上，开创了我华北战场以一个纵队围歼敌一个师（欠一个营）的范例。在政治上，给敌第35军以歼灭性打击，大大抑制了傅作义的嚣张气焰。”

结论没有提到第3纵队在歼灭敌一个王牌师的同时还以一部兵力在涑水围敌一个师，也没有提到郑维山将军。但是，傅作义注意到了郑维山，注意到了华北第3纵队的野劲，并动员他的第35军，一定要消灭郑维山的第3纵队，报这一箭之仇。然而，傅作义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在11个月以后的一次交锋中，还是这个第3纵队一手挡住他的第104军，一手拉住他的第35军，让解放军的主力打了个痛快。

周恩来命令郑维山挡住傅作义

的快速突击部队

1948年10月26日，近午，阳光明媚，秋高气爽。涿鹿县矾山堡附近一间农舍里。第3纵队司令员郑维山正伏案思索攻打南山的作战计划。



这时，电话铃急促地响起来。郑维山拿起电话，神态霎时严肃起来。

电话是军区聂荣臻司令员打来的。他告诉郑维山：敌情突变，傅作义有偷袭我党中央的企图。周恩来副主席点名命令你带第3纵队立即出发，轻装、隐蔽、取捷径，以5天赶到满城，会合并指挥第7纵队，阻击向石家庄进犯之敌。可走紫荆关，翻山抄近路，不要怕疲劳。出动后，设法同我联络。聂司令员一字一句地念着中央军委的电报，最后强调：

“周副主席在等待你们出发的消息。”

“立即通知各旅，准备执行任务！”郑维山放下电话，下达了第一道命令。

话音刚落，一匹快马，由远而近，急驰而来。军委通过兵团给第3纵队下达任务的特急电报到了。来人还带来了兵团杨得志司令员的亲笔信。

郑维山打开信还未看完，电话铃又响了。杨得志司令员呼叫郑维山亲自听电话。电话中，杨司令员进一步强调事态发展的严重，任务的艰巨性。要求郑维山尽快行动，并明确：

“从现在起，第3纵队归军区指挥，你可直接与军区聂司令员联系。”

原来，当我华北野战军出冀东、战热西、征察绥，展开万里“牵牛战”，迫使傅作义到处挖肉补疮、疲于奔命之时，国民党军在东北、华东、中原等战场，同时遭到我军的沉重打击。蒋介石坐卧不安，他亲自飞抵北平，与傅作义密定一项阴险毒恶的计划：趁我华北主力尚在北平以北、绥远地区，而南线兵力空虚之机，秘密组织一支有5个师组成的快速纵队，携带大量炸药，妄图以闪电战术突袭石家庄。同时，还集结了6个师作为预备队，一旦快速纵队得手，即投入战斗，突击西柏坡，偷袭我党中央。

此时，在与石家庄毗邻的西柏坡，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正在指挥辽沈战役和运筹淮海战役。当获悉敌偷袭的阴谋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等军委领导，立即进行紧急磋商，制定应急对策。毛泽东亲手撰写文章，通过新华社电台广播，揭露敌人阴谋，号召华北军民奋起战斗，准备痛击来犯之敌。

周恩来亲自拟电，命令郑维山：带第3纵队火速南下，截断傅作义突袭之路。同时致电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第2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指出：

“据北平确息，蒋傅匪决集中第94军（3个师）及新2军（2个师）经保定向我石门实施空心袭击，并配属汽车400辆，携炸药百吨，企图炸毁石门……。我为坚决保卫石门，破敌计划，第7纵队主力应立即转移至保定以南坚决抗阻南进敌人，以待第3纵队赶到会合歼敌，使敌不得南进：第7纵队另一旅应即直开新乐、正定之间，沿沙河、滹沱河两线，布置坚决抗阻阵地。”

“杨（得志）、罗（瑞卿）、耿（飏）得电后，应立即令第3纵队受军区直接指挥，于明（26）日起，以5天行程，不惜疲劳赶到望都地区，协同第7纵队主力作战并直接指挥之。杨罗耿率主力应相机过河，到后或直插平涿线破路，或向保定、望都方向随第3纵队后跟进，视情况再定。”

“聂、薄（一波）已直电第3纵队行动。第2兵团应于营后随时保持与军区及军委联络。”

这样，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郑维山接到命令后，马上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立即与各旅旅长通电话，传达周恩来、聂荣臻、杨得志的指示，表述纵队的决心和开进方案，下达纵队命令：

1. 立即收拢部队，做好行军准备；
2. 立即组织机关干部下到各战斗连队，传达上级命令，进行政治动员，号召部队“誓死保卫石家庄、誓死保卫党中央”；
3. 部队轻装开进，各级后勤辎重随纵队后卫跟进；
4. 纵队直属队和各旅立即派出先遣队（组），沿途保障主力顺利开进。下午3点，部队准时上路了。

由矾山堡到满城，不下500华里，要是平时，4天行军是完全可以赶到的。但这支两万多人队伍，刚刚经过7个多月的连续7000余里的征战，极度疲劳。因此，连郑维山这位当年在长征路上三爬雪山，三过草地，先后两次迎接第一、第二方面军的战将，也感到压力很大。他知道，傅作义有几百辆汽车，数千匹战马，且此人办事打仗极讲究隐蔽和突然性。如若不能把第3纵队提前或按时带到，一旦造成损失，将无法向党和全国人民交待。

为了加快行进速度，抢时间，及时掌握新情况，争取主动，部队一出发，郑维山就带一个精干的指挥组走在前面，以便随时处理开进中出现的问题。

一路上，没有歌声，没有笑声，只有急促的脚步声。长长的行军队伍，象一条巨龙在起伏的山岭间蠕动着，翻滚着，向前！向前！不停地前进！

各级领导穿行在队伍中，不断鼓励慰抚着战士，排解影响行进速度的障碍和困难。开进！开进！尽快地开进！

在夜幕的掩护下，郑维山和他的第3纵队悄悄地走过了26日，迈入27日凌晨。

此时，位于西柏坡农舍里的我军最高统帅部，一直密切地关注着郑维山和第3纵队的行动。

10月27日4点半，也就是郑维山他们刚刚出发的第12个小时，周恩来就将第3纵队行动情况的书面报告放在毛泽东的办公桌上：

“主席：已与聂通了电话，要他转令3纵连26日在内以4天行程赶到满城。他说5天赶到，每天已近百里，我要他仍以此命令转告郑维山（3纵队司令），他定今日接通电话后即转告郑，并催其轻装，取捷径按4天行程赶到。7纵主力今27日夜到达完县、方顺桥、高阳以西之线布防。军区给他们的命令，是坚守方顺桥到唐河两线，以待3纵队到达。其他一个旅，则尚在来沙河途中。顷聂第二次电话，他已将提前一天到满城的命令，经北岳电话转告3纵队、3纵队今（27）日，可能到达紫荆关以北。

地方已在动员，物资在疏散。

周恩来 27日4时半”

中央军委在督促第3纵队取捷径，加快速度，缩短时间，火速南下的同时，命令保定南北地区党政军民也动员起来，断桥破路，构筑阻击阵地，埋地雷设障碍，迟滞敌前进速度，争取时间，待第3纵队到来。

一时间，第3纵队成了中央最高统帅部与当地执行抗击任务军民共同关注的焦点。

郑维山出发的第15个小时刚过，周恩来的第2次报告又送给了毛泽东。

“主席：3纵队昨26日上午方得到出发命令，得令下午即走，故昨天下午及夜间，均在走路。今日恐总须下午才能出发，俟叫通电话后，专告聂转达你的指示。

周恩来 27日6时”

显然毛泽东在关注第3纵队的行动，在询问第3纵队的行军开进情况，并不断地发出指令。

沿途各军分区、地委利用电话、电台、骑兵传递等手段，以保障军委、军区、兵团与飞奔在山间的第3纵队的联络。

第3纵队又走了一个小时。

周恩来向毛泽东呈上第3份报告：

“主席：顷与聂电话，3纵队昨天多部分是白天行军，在山沟里走不成问题。已告其再以电话通知给各县。与各县通电话，须经过地委。现新乐、望都、安国、高阳等县，均由孙毅及9地委在指挥。完、唐、曲阳、行唐等县，则由4地委指挥。石门附近各县，则由萧克指挥。聂通过他们3处与各县联络。并负责检查各条道要点及纵深破坏情况与民兵日夜的袭扰。

聂总认为，如3纵赶到出现，及我正面阻敌3天，可能破坏敌之袭击计划。

今天下午，当再检查其执行程度。

周恩来 27日7时”

第3纵队指战员就是在这样紧张的气氛中翻了一山又一山，走了一程又一程。终于在28日下午，翻过了紫荆关。屈指算来，两天两夜行程270里，郑维山下达了自出发以来的第一个休息指令。他自己却来不及休息，立即策马赶到紫荆关附近的小兰村，找到纵队后方基地，电话向聂荣臻司令员报告了到达的位置。聂荣臻听了高兴地说：

“周副主席刚来过电话，问你们今天能否到达紫荆关？你们提前到了，我立即向周副主席报告。部队要恢复一下体力。”

聂司令还说：“周副主席昨天向毛主席报告了你们出发的情况，主席很满意。主席指示你们过紫荆关后，改为白天赶路，晚间小息。”聂司令解释说：“主席的意思是说，白天视度好，要你们尽可能地加快速度。”

聂荣臻没有说更多的敌情，但从毛泽东指示的语言里，郑维山感到敌情的严重，时间的紧迫，觉察到统帅们急切的心情和信任的目光。

他匆匆地找了点饭吃，准备继续赶路。这时，聂司令员又转来电话说：

“周副主席要我转告你们：突袭之敌今天已集结保定，明天会合刘化南部南犯，我们已令7纵队和9地委至少在保定到唐河段阻敌两天以上，只要你们30日赶到望都地区，就有破敌把握。”

郑维山放下电话，二话不说，飞马回去，拉起部队就走，边走边传达毛主席，周副主席和聂司令员的指示。

29日下午3时，先头部队到满城西南的康关。这里距望都不到80里。郑维山一面命令部队原地休息，补充食品和水，一面找电话与军区联系。

岂知，军区的电话早已转接在这里等候了。电话说：“周副主席再次问第3纵队能否如期到达？”并通报敌情说：“傅作义的第35军、16军已出发，今晚可到保定，情况紧急。”

郑维山急令部队再次轻装，加快行军步伐。

指战员们立即丢下背包及一切生活用品，只剩下枪支弹药，开始了强行军。终于在30日拂晓，提前一天到达望都以西军委指定地区。

此时，敌第94军先头部已突破了望都防线，正向唐河以南突进。我第7

纵队已转退沙河一线布阵抗击。

郑维山闻讯大吃一惊，唐河到沙河 45 里，沙河以南即离石家庄不远了。如敌人强行突进，第 7 纵队又在沙河立足未稳，后果就严重了。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沙河，尽快与第 7 纵队会合。

新的动员令下达后，第 3 纵队指战员意识到：关键时刻到了！拼死拼活也要赶到敌人前面，尽快与兄弟部队会合，誓死把敌人挡住！部队在郑维山带领下，急速地向沙河奔进。 31 日，凌晨，部队终于赶到了沙河以北的燕赵、东抵村一带。立即做好抗敌准备。

第 3 纵队的突然出现，使傅作义大为吃惊，急于 31 日凌晨 3 时给前方部队发出特急电报，命令突袭部队立即撤回。电称：“敌 3 纵已反冀援石，着你部克日撤至方顺桥，并已派第 35 军接应。”

很快，聂荣臻司令员的电话来了。他对郑维山这种坚决灵活地执行军委命令的行动，非常满意。他兴奋地说：

“你们主动赶到了敌人前面，很好！周副主席让我转告你们，傅作义得知你们到达望都，惧怕第 94 军被歼，已令其回撤了。你们很疲劳，抓紧时间休息，恢复体力，做好战斗准备。如果敌人撤得慢，第 4 纵队又能赶到，争取在满城地区打一仗，吃掉它一部。”

至此，郑维山才放下心来，一头倒在炕上休息片刻。

而此时的傅作义正在大伤脑筋。他不明白是怎么走漏了风声，不明白解放军为什么这么快就做好准备，拦住了去路。原本想创造个奇迹，以挽救其垂危的战局。相反“偷鸡不成反蚀米”，损兵折将 3700 余，白白丢掉了战马 240 匹、汽车 90 余辆，以及其他大量作战物资，使其本来就枯竭的兵源、财源更加困难。尤其不妙的是，消息的泄漏，前进受阻，部队空劳往返，狼狈而归，使本已离散的军心，又蒙上一层阴影。部队对傅作义的指挥机关及决策开始“产生了很大的怨恨。”

傅作义则训斥部下无能，训斥他们为什么四个轮子的汽车、四条腿的马，却跑在共军两条腿的后面。他不明白，两天前的情报说，郑维山第 3 纵队在察南休整，怎么一下子就出现在 500 里外的沙河岸边。

对于这一问题，大概只有见了郑维山以后，才能弄明白。

但当时，有一个问题傅作义是清楚的，那就是，自这次失败后，北平地区的国民党军中蒋系部队与傅系部队之间、以及傅系集团内部矛盾加深了，互相猜疑、怨恨情绪增长，傅作义本人也感到难以驾驭了。

由此可见，第 3 纵队按时到达指定地区，不仅仅是落实了军委的部署，遏止了敌人偷袭计划。更重要的是，协同华北广大军民，给北平傅作义集团内部撒下了催化剂，加速了反动势力瓦解的进程，促进了和平正义力量的增长。正如战斗结束的第二天，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第三则电讯《评蒋傅匪军梦想偷袭石家庄》一文中所说：“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

完蛋！”

这就是郑维山与傅作义的第 3 次较量，在此 38 天之后，历史又安排他俩在新保安碱滩地区将再次相遇，进行最后的较量。

平津战役，毛泽东看到郑维山战场违抗命令

擅自行动的电报后，不久接到傅作义

### 答应和谈的电报

电报一：时间，1948年12月9日，来自平津战役新保安战场。“中央军委并告郑维山：

郑维山擅自将3纵队围城部队主力调至沙城地区，如35军跑掉，郑要负完全责任。  
第二兵团”

电报二：时间，1948年12月9日，来自第3纵队司令部。

“兵团并报中央军委：

兵团电收悉，现在我们这里情况严重，处境困难，望你们派一至二团增援。

郑维山”

电报三：时间，1948年12月10日，来自平津战役前线指挥部

“中央军委：

……傅作义答复和谈，提出三个条件：

1. 要求中共停止战斗，双方谈判解决。
2. 参加联合政府，军队为联合政府指挥。
3. 商定起义时间，并必须保密。”

电报四：时间，1948年12月14日，来自北平。

“中央军委：傅作义又答复了三条：

1. 军队不要了；
2. 两军后撤，谈判缴械；
3. 由傅部发电缴械。”

这几封电报，从内容上看，前后两封似乎毫无关联。但只要你对当年平津战役初期碱滩马圈阻击战有所了解，就会知道其间的必然因果了。

事情发生在1948年冬天。

随着辽沈战役的结束，东北全境的解放，以及淮海战役的进程，国民党军在数量上长期占有的优势，急速转为劣势。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即将面临东北、华北解放军的联合打击，已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态势。是固守还是西窜，还是南撤？蒋介石与傅作义同床异梦，各有各的打算。

蒋介石要傅作义率部南撤，傅作义惧怕南撤后被蒋介石吞并；西撤绥远，又怕地脊民穷，兵源枯竭，补给困难；而北（平）、天（津）、张（家口）、唐（山）地区人多地丰，交通便利，守、撤回旋余地大。

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针对傅作义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及其“南撤乎？坚守乎？西退乎？”踌躇难决的心理，制定了将敌“抑留华北，分割包围，就地歼灭”的12字作战方针。

但是，淮海战役打响，徐州告急后，傅作义西撤或南移的可能性增大。因此，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立即入关，决定提前发起平津战役。

中央军委决定提前发起平津战役，首要问题就是将敌稳住，留在华北，而这一任务只能由华北部队来完成。

然而，当时华北我军的情况是：第1兵团在围困太原；第2兵团在河北曲阳地区，准备开赴参加太原会战；第3兵团远在归绥。

此时，如果敌决意西撤或南逃，我军将无法阻止。

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主席以伟大战略家的气魄和雄才大略，对整个战局和各战场之间的形势进行了周密地分析，毅然作出如下决定：

1. 第3兵团撤围归绥，回师张家口，以免促使傅作义率嫡系过早西撤；或放弃西撤的希望。

2. 缓攻太原，以免过早攻克后，使傅作义感到孤立；

3. 令东北野战军迅速隐蔽入关；

4. 派人与傅作义保持接触，稳住他。

毛泽东主席这一英明决策，果然造成了傅作义的错觉，他认为我华北部队兵力不足，东北部队辽沈战役后需要休整补充，暂时不能入关。他还有充足时间决策进退问题。

如此，正中我抑留敌于华北之计。

11月29日，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命令第3兵团，向张家口外围之敌突然发起进攻，隔断了张家口守敌与宣化的联系，形成了对张家口的包围态势。从此拉开了平津战役的帷幕。

平津战役首先从平绥路张家口开刀。这是毛泽东主席全局在胸，投下的一着绝妙的好棋，也是傅作义最敏感而又料想不到的。

因为，平绥路是傅作义嫡系逃往绥远的唯一通道。张家口又是傅作义的重要军事基地。

毛泽东主席指挥部队首先从这里打响，旨在吸引北平方面之敌向西增援（中央军委估计，傅作义极有可能将位于北平附近的第16军两个师，第35军及3个骑兵旅派出增援）。这样既切断了敌之西逃之路；又调出了北平之敌，为解放北平创造了条件；同时，将敌注意力吸引到西面，从而又能掩护东北野战军隐蔽入关。真乃一石三鸟，一箭双雕。

局势发展正如毛泽东主席所预料的那样：当我军突然出现在张家口，对其猛烈攻击的情况下，傅作义怕失去张家口，切断西撤退路，即令驻丰台之第35军率两个师及驻怀来第104军第258师分乘火车、汽车星夜驰援，同时，将第104军主力和第16军分别西移至怀来、昌平、南口地区，以确保平张路畅通，留有后路。

傅作义引兵西援，正中我军统帅们的下怀，这不仅掩护了东北野战军的行动，而且为下一步分割包围，就地歼灭敌人创造条件。特别是调其第35军远离北平，正是我所希望的。

第35军是傅作义亲手培植并靠其走官运的基本力量。因此，抓住了第35军，就抓住了傅作义，就抓住了整个傅系。抓住傅系，也就拖住了平津地区的蒋系部队。如能将第35军歼灭于北平之外，对于打击傅作义逃跑或固守的决心，对于和平解放北平，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为此，当第35军到达张家口后，毛泽东主席亲拟电稿，命令第3兵团“筑围好，不使敌跑掉。”

命令东北先遣兵团由蓟县经密云向南口、八达岭间急进，包围怀来南口之敌，隔断北平与怀来间的联系，并准备击退北平增援之敌。

命令第2兵团迅速向宣化开进，以最快速度攻占下花园地区，破击平张路，隔断张家口与宣化之联系。

一张全歼敌第35军的大网在秘密拉开。各路大军按中央军委预定计划，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只要各部队严格按照军委部署，按时到达指定地区，消灭敌第35军，打好平津战役关键一仗，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岂料，东北先遣团在开进途中，于12月5日，突然打密云，暴露了我东北野战军的企图。傅作义得知北平地区发现戴狗皮帽子的东北部队，大为震

惊。他马上意识到，我要对北平下手了。急令第35军连夜撤回北平，并令其第104军、第16军同时向西运动，接应第35军，然后一同回北平。

西柏坡，我军最高统帅部发现敌情突变，敌第35军东逃，急令第3兵团坚决堵截。毛泽东主席亲拟电文，指责第3兵团。称：

“我们多次给你们电令，务必巩固地隔断张宣两地，使两处之敌不能会合在一起……。何以你们置若罔闻？至使敌第35军得以，东逃。你们必须坚决执行我们历次电令，坚决有效地阻敌继续南逃。不可违误！”

命令！严厉的命令！可见统帅们急切的心情，可见堵截第35军何等重要！

但是，此时，第3兵团主要兵力远在张家口以西以北地区。怎么能有效地阻敌继续南逃呢！

原来，第3兵团接到军委“筑工围好，不使敌跑掉”的命令后，认为主要是不使敌向西绥远方向跑掉。因而，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防敌西逃上，如今又何能阻住向东逃跑之敌呢。

中央军委得知第35军在继续东逃，急通电林（彪）、刘（亚楼）、聂（荣臻）、薄（一波）及参战所有兵团，指名道姓地批评第3兵团：

“过去违背军委多次清楚明确的命令，擅自放弃隔断张宣联系的任务，放35军东逃，（35军两个师竟乘车300余辆，毫无阻碍地东逃……）是极端错误的。今后杨李任务是包围张家口之敌，务必不使该敌向西东或绕道跑掉（主要注意不使敌西逃），如敌逃跑，则坚决全歼之。杨李应严令所部负此完全责任，不得违误。”“现35军及宣化敌一部正向东逃跑，杨（得志）、罗（瑞卿）、耿（飏）应遵军委多次电令，阻止敌东逃，如果该敌由下花园、新保安向东逃掉，则由杨罗耿负责。”

第3兵团没有堵住第35军，此时，毛泽东主席把这一任务交给了第2兵团。

军委清楚，造成战场这一敌情突变的主要原因，是东北先遣兵团打密云引起的。因此，毛泽东主席毫不客气地批评林罗刘：

“你们几次给杨李电令都不合具体情况，都与军委隔断张宣两敌联系的规定有冲突。现杨李已放任35军东逃，又不知杨罗耿能否于新保安阻住该敌，你们自己则不以后卫军打密云，而以先头军打密云，致耽搁时间。在这种情形下，可能你们尚未赶到，35军及怀来之敌即已一起东逃。你们到后毫无事做，空劳往返。虽然如此，但你们仍须星夜赶进。”

显然，统帅们对放走第35军相当不满意。只得将最后一线的希望寄托在第2兵团身上。所以，该电文结尾毛泽东主席写道：“希望杨罗耿能于6日或7日早，在下花园、新保安线上抓住第35军及104军主力。而怀来之敌亦未跑掉，你们可协同杨罗耿歼灭该敌。”

然而，此时，第2兵团主力仍在百里以外的路上，宣化以东地区只有第4纵队第12旅和冀热军区独立团，要堵住装备精良的敌第35军并非易事。

第2兵团接到中央军委命令后，即令各纵队强行军；命令第12旅不惜代价阻击敌人，争取时间，待兵团主力到达。第12旅坚决执行命令，打的十分顽强。

据后来原国民党军被俘人员回忆说：“这时，35军军长郭景云发现解放军工事里有遗体，说共军战术有变化，过去是打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现在却是拼命打。”

但这样重大的变化，并没有引起这位骄狂军长的警觉。按傅作义命令，

第 35 军应于 12 月 5 日返回北平。但大胡子军长郭景云，素以作战勇猛和狂妄骄横著称。他接到傅作义的命令后，并没有立即行动。他认为来时乘车一夜到张家口，回去也不致有什么问题。因此，延迟到 6 日下午才拉着大批物资，引军东撤。过宣化遭我地方部队的阻击，他不但不挥师东进，反而夜宿鸡鸣驿。这样，前后就耽误了一天的时间，使我第 4 纵队第 12 旅得以先敌占领了新保安，作好了阻击准备。

7 日，敌继续东进，行至新保安，遭到我第 12 旅的顽强阻击。战至下午，第 12 旅因寡不敌众，被迫撤出新保安。此时，如敌继续突进，必跑无疑。但目空一切的郭景云认为，我军主力尚远，不足为患，就夜宿新保安。

此时第二兵团主力距预定阻击地区，尚有近一天的路程。况且，面临着天寒、夜黑、沟多、路难行和部队疲劳等困难。如果天亮前赶不到阻击区，第 35 军乘车东逃将畅通无阻，且傅作义接应部队正向新保安靠近。

如果第 35 军逃脱与其第 104、16 军一同回北平，加强了守城力量，不仅打乱了军委的整个战役计划，而且会给打击、争取傅作义，和平解放北平增加极大的不利因素（后第 35 军被围新保安，傅作义曾亲自给郭景云发电报，命令他向解放军投降，郭景云宁自杀而不从）。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天越来越亮，这种不利因素迅速地增长，越来越重地压在各级指挥员心头……

此时，西柏坡，北风正紧，大雪纷飞。最高统帅部，毛泽东主席已三天三夜难眠，一大早就站在风雪中，以焦虑的心情关注着新保安战场，一连几个小时，不肯进屋。直到周恩来副主席亲自出来劝说，并告诉他“杨罗耿兵团的先头部队已到达新保安以南地区”，才松了口气，走回办公室。

但不久，又接到报告说：

“郑维山擅自行动，把围城部队主力调到沙城地区”，气氛刹时间紧张起来。

原来郑维山是在曲阳接到北上涞水集结待令的电报的，得令即走。到了涞水，兵团又命令他攻打下花园。他即带部队奔下花园。还未到达下花园，又接到兵团命令，令他立即开赴新保安以南，从西、西南两面包围新保安，不得使第 35 军出逃。

在千军万马、错综复杂、瞬息多变的战场，任何高明的指挥员都不可能不出现失误和漏洞。但是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有无数个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的优秀儿女，关键时刻，能自觉地挺身而出，堵上漏洞，减少损失。

郑维山将军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接到堵截第 35 军的严厉命令后，意识到事态的严重，立即带领部队以强行军向新保安前进。开进途中，多年的作战经验促使他对连日来的情况作出分析，很快一连串的问题在他头脑里出现了。军委、兵团接二连三地命令我们开赴新保安堵截敌第 35 军。第 35 军刚到张家口，为何又急忙撤回去？

是不是有重大行动？战争就是这样，有时下面似乎风平浪静，而实际上是上层统帅部正在作重大的部署调整。是的，是调整。你看这些电报，一封接一封，让你火急火燎的，都是催人快走、快到位的内容，没有让歼灭哪一个的。第 35 军匆匆来，急急走，说明傅作义也在作部署上的调整。双方都在调整，意味着大战在即。意味着平津战役的开始，意味着要对傅作义、对北平动手了。所以傅作义才急忙调第 35 军回缩守北平。

那么，第 35 军受阻，傅作义会不会派兵接应，要接应会从什么方向来？



想到这里、想到了傅作义老谋深算、隐蔽不外露的个性，想到傅作义惯用的突然偷袭手段，郑维山立刻警觉起来。他马上作出判断，傅作义很可能会派兵接应，接应方向无疑在东南方的沙城。于是，他在开进途中，就派出一支侦察分队，沿洋河向沙城土木东南方向侦察。并组织对部队进行动员。

敌第 35 军是第 3 纵队的老对手，11 个月前在庄疃歼灭了它一个“虎头师”，打死了他的师长，逼死了军长。据说这是该军建军以来从未有过的重大损失。所以被傅作义第 35 军视为奇耻大辱。并扬言要报仇雪耻。还在驻地营房书写“坚决消灭 3 纵队”的大字标语，以励其官兵不忘前耻，以振军威。殊不知这个口号对郑维山率领的第 3 纵队也同样起了动员作用。每与第 35 军作战，部队情绪特别高涨。这次指战员们听说要消灭敌第 35 军这个老对头，自然格外高兴，行军速度很快，首先到达指定位置。

8 日凌晨 4 时，纵队主力展开，从西、西南两面包围了新保安。刚部署完毕，新保安敌第 35 军就开始向外突击。我军凭借临时工事，顽强抗击，寸步不让。上午，敌加大投入兵力，拼命外突，战斗异常激烈。

正在这时，郑维山司令员接到先机派出的侦察小分队的报告，说沙城东南方向有枪炮声。郑维山马上意识到，傅作义派出接应第 35 军的部队出现了。他立即打电话将敌情告诉负责新保安以东、东南面防务的第 4 纵队，并询问沙城地区有无部队？回答是：“没有”。说他们的任务是阻止第 35 军从新保安东逃。

不久，郑维山又接到侦察分队的第 2 次报告：土木以南有大股敌行军纵队，沿洋河以北乡村土路向西运动。他判断：上午沿公路前来接应的敌军，遭到我地方部队的阻击袭扰后，现已改取从乡村土路隐蔽地向新保安接近。他立即将这一情况通报城东的部队，提醒他们注意背后，但对方没有派兵阻击的反应。郑司令十分焦急，如果没有一支部队去阻挡，就意味着西进之敌可毫无阻挡地接近新保安，直捣我围城部队的侧后。按路程计算，当晚即可向我围城部队发起攻击。到那时，第 35 军势必向东突围，使我东面围城部队腹背受敌，第 35 军则可能乘机跑掉，整个作战计划将付之东流。

必须挡住西进之敌，不让它向新保安继续靠近。

但郑维山的任务是在新保安的西面和西南面，东面、东南面不是他们第 3 纵队的任务。

恰在这时，又接到兵团急电，电文称：

“军委来电批评我们到达太迟，影响整个作战计划，现严令要我们确实围敌第 35 军于现在地区，如果 35 军跑掉，由我们负责。我们已经向军委承担了责任，我们也要求你们严格而确实地执行我们的一切命令，谁要因疏忽或不坚决而放走敌人，定要追究责任。”

兵团的命令是明确而严厉的，不允许有丝毫的马虎。但是，战场新出现的情况也是极其严重的。尤其是兵团电报中，没有涉及一点防敌增援的措施，这说明兵团尚不知傅作义接应部队的逼近，这使郑维山更加感到问题的严重。

他拿起电话，想把自己的判断想法及侦察的情况报告兵团，以提醒兵团早做防范准备。

话务员告诉他：“兵团指挥所有线联络尚未沟通，无线联络亦时好时坏

（此地区多雨裂深沟，在深沟内行军，无线通讯信号不好）。 ”

怎么办！是按兵团命令于现地不动，还是抽出兵力东去拦击西进之援敌。

前者，是兵团、军委再三而严格命令所规定的，对个人万无一失，成则皆大欢喜，败则无人责难；后者，则要冒抗令不遵和与敌生死决战，胜败未卜的危险！

责任感！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告诉这位 13 岁参加革命，15 岁入党，经过万里长征，对党对人民有一颗赤胆忠心，出生入死十几年的郑维山将军，宁可个人担风险，也不能眼看着革命受损失。

他认为，作为一个战场高级指挥员，应把自己作战的重点放在那些对全局最重要最有意义的动作上。抓住第 35 军是事关平津战役全局的关键，而目前只有粉碎接应之敌，才能有效地围住敌第 35 军。

时间紧迫，郑维山当机立断，决心留下 4 个团，继续在新保安围城，坚决阻敌突围出逃。他亲率纵队主力东进，去迎击西援之敌。同时，指示电台，尽快沟通联络，向兵团报告纵队行动。

部队刚做好饭，还未来得及吃就出发了。战士们拿着饼子、端着饭，边吃边走。入夜，风寒星稀，天黑如漆，第 3 纵队主力急急向前疾进。

按计划，第 3 纵队将在沙城西北侧宋家营村开设指挥所。但是，部队正准备进村，突然，从村里打出一梭子子弹。接着，信号弹升起，枪炮一齐闹腾起来。敌人的先头部队到了，先我一步占领了宋家营。

郑维山分析，这大概是白天侦察分队报告的那股敌人。幸亏他们住下来，没有继续向新保安前进，否则，情况会更糟。

他来不及多想，立即命令先头部队抢占有利地形，掩护后续部队展开，准备迎敌。并命令第 20 团团团长张文轩，设法捕获俘虏，弄清敌情。

同时，将各旅团指挥员召集到一起，在碱滩村一个单户人家小屋里，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作战方案，部署兵力，下达作战命令：

1. 第 7 旅（欠一团）为第一梯队，在碱滩、马圈地区构筑 3 道阻击阵地，正面阻击增援之敌。

2. 第 8 旅为二梯队，进至沙城东南侧，准备从敌人侧后配合第 7 旅正面阻击。

3. 第 9 旅原定围堵新保安第 35 军的任务不变，另抽出一个团为纵队预备队，部署在马圈和新保安间，随时准备执行围敌或打援任务。

命令规定，部队在天亮前完成一切战斗准备。

此时，已查明，当面之敌为傅作义之第 104 军先头部队，主力尚在路途中。第 104 军侧后为第 16 军一部配合作战。其任务是接应第 35 军突围，尔后 3 个军一同回北平。

原来，傅作义命令郭景云率第 35 军与第 104 军第 258 师回北平的电报发出后，想到第 35 军不久前在庄喧丢了一个主力师了，战斗力大大不及昔日。因此，为保障万无一失，又致电第 104 军军长安春山，命令他掩护第 35 军通过，尔后率部同回北平，电称：

“郭军被围于新保安，派该军（104 军）军长为西部地区总指挥，指挥第 104 军（欠一个师）、第 16 军（欠一个师）及第 35 军（欠一个师），迅速击溃包围第 35 军之敌，星夜向北平转进”（摘自安春山《104 军驰援 35 军被歼记》）。

安春山接到傅作义电令后，即令“第 269 师、250 师（附野炮一个营）

即刻由现地出发，用夜行军到沙城以南贾家营附近集结，向占领新保安外围、宋家营、赵家营、马圈之敌进攻并占领之，迎接第 35 军向新保安以南地区突围，重点指向马圈。限 9 日前打通赵家营、宋家营、马圈、新保安间的通路。”

“令第 35 军于 9 日早，待第 250 师、第 269 师开始向赵家营、宋家营、马圈攻击时，即由新保安向马圈攻击，两面夹击该地共军，赶早突破重围。”

8 日晚，敌增援部队在安春山指挥下向新保安方向开进，新保安城内第 35 军亦作好突围准备。

9 日拂晓，战斗开始，东西两面敌人同时向我发起夹击，双方炮火交织，12 架飞机轮番轰炸扫射，第 3 纵队顿时陷入三面受敌的险境之中。

正在这时，兵团一封急电送到郑维山手上，上写：

“中央军委并告郑维山：

郑维山擅自将 3 纵队围城部队主力调至沙城地区，如 35 军逃跑，郑要负完全责任。”

电文措词严厉，不容分辩。但是当前军情紧急，不允许郑维山作更多的解释。他一面指挥部队抗击敌人，一面叫来译电员，口述电文：

“兵团并报中央军委：

兵团来电收悉，现在我们这里情况严重，处境困难，望你们派一至两个团增援。”

战斗一开始就打得异常激烈。敌地面部队在空军和炮兵的支援下，发起多波次地集团冲锋，从一个营一个团，到两个团、四个团反复攻击，一浪高似一浪。

我第 3 纵指战员依托临时工事，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整个阵地始终淹没在战火狼烟中。

其惨烈情形连国民党军指挥官也触目惊心。40 年后，原敌第 104 军副军长王宪章回忆起来仍心有余悸。他说：

“拂晓前，我们作好一切准备，下达了命令，决心孤注一掷。9 日早 7 时，战斗开始了，第 35 军的大炮也响了。一炮一炮地向东八里射击，第 35 军先向东八里佯攻，主攻方向是马圈。第 104 军的攻击部署是：第 269 师的两个团分左右两侧担任掩护，第 250 师集中力量正面向纵深突入。战斗开始后，有十几架飞机助战，空军副司令也乘飞机到前线观测，并同我们地面部队随时联系。我们先攻下乔庄，继续又攻下两个村。每攻下一个村庄，傅作义总部就来电奖洋若干元。”

午后，“第 269 师攻下赵家营，第 250 师攻占宋家营，开始向马圈、碱滩实施炮击。此时，永定河北岸公路桥梁已修通。傅作义令第 35 军由新保安突围，与第 250 师夹击马圈，沿永定河公路向南冲击。”

新保安城内，第 35 军军长郭景云即以炮火开道，开始向外突围。

郑维山沉着冷静地观察战场的变化，指挥部队两面展开与敌近战，使敌炮火和空军优势难以发挥。

倾刻间，阵地上硝烟弥漫，遮天蔽日，枪炮声、喊杀声、手榴弹爆炸声、飞机投弹射击声，交织在一起，震耳欲聋。

这情景被当时在新保安城头上观看的敌第 35 军上校政工主任林泽生记录下来。他写道：“突然听到城外有密集的枪炮声，听说第 104 军增援来了，第 35 军两个师都派部出击接应，当时大家的精神都很振奋。我同几位官佐悄

悄地跑到城楼上看望，只见浓烟滚滚，战斗很激烈。这时，城内也向城外发炮助战，城外也有炮弹打进来，突然一发迫击炮弹落在城墙上，要是没有掩体，几乎把我们的脑袋炸开花。为了避免危险，我们就赶紧退下来。很显然，这是一场恶战。解放军是绝不允许第 104 军和第 35 军靠拢的，如果让这两个军能够会师在一起，以后的仗就麻烦了。同样，第 35 军必然争取和第 104 军会合，不然就很不容易出城，并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因此，这一仗打得很激烈，双方伤亡都很大。但终因解放军的兵力强大，我们攻不过去。”

那么，解放军的纵队司令员郑维山用了那些强大的兵力呢？

当年参战的第 3 纵队（现第 63 军）在《军史》中记下了其中的一幕。“9 日黎明，敌先以一个营向宋家营、碱滩、马圈我第一道阵地进攻。第 20 团第 9 连待敌进到 50 米左右，以步枪、轻重机枪突然齐射，打敌措手不及，并乘机组织反冲击将敌击退。敌很快又以一个团的兵力，在 12 架飞机和猛烈炮火掩护下，再次猛攻，战斗异常激烈。10 时许，当我第 9 连放弃一线阵地，向二线阵地转移时，敌乘机尾随突入我第二线阵地。营长刘新元、教导员弓庆宗带领部队奋勇抗击，与敌展开白刃搏斗。正在危急时刻，副团长周成河组织第 7、第 8 连趁敌立足未稳，实施猛烈反冲击，将敌击退，恢复了马圈碱滩阵地。敌飞机连续不断地向我阻击部队狂轰滥炸，轮番俯冲扫射。地面敌军则采取多路、多梯队轮番冲击的手段，企图一举突破我之防御。我军则采取梯次配置，以正面抗击与小分队反冲击相结合的战术打击敌人。我马圈碱滩一、二线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反复多次，成了一场血与火的拉锯战。”

原敌第 35 军少将参谋长田士吉战后在回忆录中写道：“9 日，郭景云急了，令第 267 师和第 101 师合力进攻一天。他自己几乎整天在前线督战，虽反复冲锋，仍毫无进展。”

第 3 纵队不愧是华北劲旅，他们在郑维山的指挥下，象一座不可逾越的大山，屹立在马圈碱滩阵地，将第 35 军与第 104 军隔开，使两军相距咫尺却难以会合。

——与此同时，西柏坡，最高统帅部，已指挥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插向康庄、怀来，切断援敌退路。

——与此同时，第 2 兵团首长已得知郑维山的情况，命令第 4 纵队参谋长唐子安亲自带领两个营支援郑维山。

——与此同时，北平“剿总”部，坐卧不安的傅作义不停地在屋内踱步。当他得知康庄、怀来地区发现解放军主力部队时，大惊失色，不停地自言自语：

“晚了，完了”。

是的，碱滩这支部队不仅打乱了他缩兵守北平的计划，而且使他有丢掉 3 个军的危险。一旦失去这 3 个主力军，守无得力部队，南逃，没有与老蒋抗衡的本钱。无线电话里，传出傅作义哀求的声音。对此，安春山在《亲历记》中这样写道：

“9 日午后 2 时许，傅作义在无线电话上叫我听电话。他说：‘无论如何请你亲自去把郭景云接出来。’”

安春山上阵了，亲自指挥地面与空中协同作战，作最后一拼。狼烟再起，

马圈碱滩又淹没在炮火硝烟中。东西两面的敌人，同时发起凶猛的攻击。

此时，郑维山显得格外冷静，他清楚地知道，敌人这种凶猛，是急躁，有很大的盲目性。只要坚持到天黑，敌人便无能为力了。

因此，他给各旅长下达了死命令：“阵地不能丢，碱滩不能丢！”

敌人攻势越来越猛，战斗越来越残酷，第20团有几个连已经没有了班排建制，有个卫生员边救伤员，边代替连长指挥战斗。团长张文轩也端起了机枪，敌人的手榴弹甩到他的身后，他一动不动（幸亏未炸）。指挥员的坚定沉着，对部队是无声而最有力的动员。干部战士跃出战壕，端起刺刀，呼喊着向敌人反扑过去，连能动的伤员，担架员都投入了战斗。

战至太阳西下，敌开始不支。敌104军军长安春山在无线电中请示傅作义：“是否还向北平集中？”傅作义停了一会，没精打彩地说“你看着办吧！”

“当时我想，事情要坏了，统帅的决心动摇了。”安春山后来回忆说。

是的，傅作义动摇了。

我东北野战军已占领康庄，切断了张家口、宣化、新保安、沙城整个西线傅系部队撤回北平的道路。

傅作义动摇了。

郑维山歼敌的决心越来越坚决，他抓住敌人稍一动摇之机，立即使用预备队加入战斗。第8旅主力突然由沙城东南侧向敌之侧后发起猛烈的冲击，与此同时，正面两个团同时杀出。敌人顿时大乱，抱头乱窜，溃不成军。

第3纵队奋起直追，眼看将敌人合围抓获。郑司令却下达“停止追击，返原地待命”的命令。当时，多数同志对郑司令的这一做法不理解，有意见。

然而，郑维山却认为，打援的目的是为了包围第35军。现援敌已打退，我们任务仍在包围第35军上。况且东北野战军已切断了他们的后路，这些敌人跑不了多远就会成俘虏了。

大家对郑维山司令员这种识大局，顾大体，不贪功的高贵品质十分感动。

郑维山不贪功，但功高不可没。

战斗结束的当天夜里，西柏坡最高统帅部——中央军委即通电平津战场，通报表彰第3纵队和第4纵队。电文称：

“新保安敌35军9日数次向东猛突，均被我击退，怀来敌104师军向西猛犯，亦仅占我沙城以南一村。杨罗耿三、四纵队昨（9）日击退东西两面犯敌，确保自己阵地。应传令嘉奖。”

郑维山看了这封电报，似乎看到了毛泽东主席等中央军委领导赞许的目光，心情得到几分宽慰。

就在毛泽东主席、中央军委通令嘉奖郑维山等前线将士的电报发出几个小时后，傅作义设在同仁医院的专用秘密电台第一次启用；发出了“要求中共停止战斗，双方谈判解决”的电报。

紧接着又答复了三条：

- “1.军队不要了；
- 2.两军后撤，谈判缴械；
- 3.由傅部发电缴械。”

中央军委认为，傅作义如此快地求和，并主动提出军队不要了，主要是因为傅作义接应第35军回撤北平计划失败后，他的3个主力军，一个被歼（104

军)，两个被围（第 35、16 军），特别是他的王牌军第 35 军被包围在新保安，厄运难逃。北平城内仅有傅作义的 3 个步兵师，其余均是蒋系的中央军，傅作义难以指挥。

至此，中央军委制定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将敌“抑留华北”的目标得以实现。为下一步“分割包围，就地歼灭”，争取和谈解决北平问题，实现北平和平解放铺平了道路。

由此不难看出，阻敌第 104 军西援，不使第 104 军与第 35 军会合，是把第 35 军围在新保安的重要环节，是一着事关平津战役和北平和平解放全局的好棋，这步棋被郑维山将军看准了，下好了，全盘棋皆活了，从而保障整个战役，特别是和平解放北平的计划得以按毛泽东主席，中央军委的方案顺利进行，最后夺取战役的胜利，实现了北平和平解放。

因而，杨得志司令员战后对部队讲：“军委指出，抓住了第 35 军，这是平津战役第一个大胜利，是战略上的胜利。”

不久，平津战役胜利了。北平和平解放了。

但当时人们并没注意到，在和平解放北平的队伍里有个郑维山。只知道，在 1955 年，毛泽东主席授予他中将军衔，后来又任命他为北京军区司令员。

再后来，人们发现他与傅作义的握手、笑谈。

## 走上蓝天的聂凤智

林 柏  
文若鹏

聂凤智（1913～1992）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13年9月出生于湖北省大悟县一个中农家庭。他在少年时代就投身于革命活动。1928年春参加农民赤卫队，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1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聂凤智历任红军排长、连长、政治指导员、副营长、营长、政治教导员、副团长、团长、团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担任“抗大”一分校胶东支校校长、团长兼政治委员、军分区司令员、旅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师长，纵队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员，军长等职。参与了莱芜、孟良崮、南麻、临朐、胶河、周潍、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等重大战役和战斗的组织指挥。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聂凤智认真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作战指导原则，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南征北战，果敢机智，功绩卓著，曾八次负伤，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大学教育长，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领导了华东空军的组建工作。1952年7月他奉命抗美援朝，任中朝联合空军司令员，指挥我空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1953年12月回国后，任南京军区、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指挥空军部队出色地完成了解放浙江沿海岛屿和入闽作战任务。后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军区空军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空军司令员。1977年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中央军委委员，他认真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一系列指示，经常深入部队和海、边防，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指导工作，为军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聂凤智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 \* \* \* \*

聂凤智将军的名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些重大战役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这些战役有：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淮海大战、渡江战役、战上海、解放一江山岛等。一位党史专家如是评价：“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几乎在每一个历史转折关头，或者戏剧性进程中，差不多都有聂凤智将军的精彩表演，虽然他不是主角、统帅人物。”一位军事专家则认为：“聂凤智将军几乎指挥和参加过我军各种不同类型的战斗、战役，甚至包括陆海空协同作战。他是一位实战经验丰富又全面的将军。”

聂凤智将军率领过的部队，涌现出了许许多多闻名全国的英雄集体和个人——“济南第一团”、“十人桥”、“渡江第一船”、魏平国、韩德彩、杜凤瑞……他指挥的许多战例，被拍成了电影，几乎家喻户晓，如《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战上海》、《长空比翼》等。攻打孟良崮，聂凤智率第9纵队从山下打到山上，最先把红旗插上山顶，为全歼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立下了汗马功劳；攻克济南，又是他把“助攻”变为主攻，率先攻进泉城，第73团荣获“济南第一团”称号；淮海大战，是他指挥的第9纵队攻克碾庄，立下了首功；渡江战役，他亲率第20军首先突破长江天险，拉了解放全中国的帷幕。解放大上海，又是聂凤智的第27军最先攻进市区。

1952年10月，聂凤智北上接替刘震，就任中朝联合空军司令员，他以其独特的打法，扭转了空战的局面。美空军参谋长不得不承认：“共产党中国几乎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主要空军强国之硝烟未尽，征尘未洗。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聂凤智又参加指挥了大陈列岛战役，这是解放军首次陆海空协同作战。将军指挥空军和海军航空兵，首当其冲，稳、准、狠地打击了国民党军，有力地配合了陆海军登陆作战，为解放一江山岛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8年，将军出任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配合炮击金门，组织了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空战，打击了国民党空军的嚣张气焰，使海峡上空的战云得以消逝。

聂凤智将军身经百战，智勇双全，功勋卓著。本文重点介绍聂凤智将军在我空军建设中的丰功伟绩。

#### 慧眼识才

1950年7月28日晚，时任华东军政大学教育长的聂凤智等人，正陪同陈毅在“军大”游泳池内游泳，工作人员急急跑来叫喊：

“陈老总，请您接个电话，北京来的。”

北京？陈毅的心头闪了一下。不是刚从北京回来么？定然事关重大。他来不及披条毛巾，就朝电话间跑去。

接完电话回来，陈毅一扫方才的勃勃兴致，自言自语地说：“怎么搞的！这是组织决定嘛，说好了又不来，朝三暮四！”回到游泳池边，陈毅找了条大毛巾披着，依然神色不乐。他凝思着喃喃自语：“我就不信华东找不出一个空军司令来！华东有的是人才，很好的人才！”神态间，似乎有许多沉重、不满和不快。

原来，电话是罗荣桓打来的。他告诉陈毅：原定到华东来担任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的人选不愿来华东，让陈毅立即在华东军区范围内物色一个人选报军委审批。

游泳池内，聂凤智等人还没有发现陈老总这一前—后的心情变化，正各自轻快地游着。陈毅站了一会，把目光投向游泳池。

这瞬间，陈毅好像已把华东军区的有关干部认真而快速地在脑子里梳理了一遍。他的思想集中到了聂凤智的身上。

陈毅脑子里出现了聂凤智的形象：绝顶的聪明，又绝对地好学；无论对什么事情都极其认真，甚至是过分的认真；好胜，顽强，敏锐，多思，锋芒毕露，毫不让人，有时则说话刻薄、挖苦，不留情面。在陈毅接触的人员中，连小学都没进过的工农干部，阅读过的书籍、军事著作和中外文艺作品之数量像他这样多的，还不多见。能打仗，不但敢打，而且善打，既善于打顺风仗，也善于打逆风仗。总之，他是一个优点十分突出、干什么都有办法干好的干部。

陈毅经过反复权衡，最后决定把这个最棘手的华东军区空军司令的担子交给他。

“聂凤智，你过来。”陈毅注视了片刻，朝池子里喊。

聂凤智快速游了过去。

“聂凤智啊”，陈毅顿了顿，直截了当地说，“你就不要再搞军大了，去搞空军吧，当华东军区空军司令。”

陡然听得，聂凤智愣了一下。空军！那可是在天上飞的呀！和陆军大不一样。当然，飞机对于他并不陌生：在苏区，在长征路上，在抗日战争和解



放战争的战场上，他都曾不止一次地见过飞机，不止一次地被敌机的轰炸扫射折腾得焦头烂额，多少战友也正是在它们肆无忌惮的轰炸扫射中倒在他身边。多少年来，他一直盼望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有自己的飞机，有自己的空军，以免再受那份窝囊气。可那毕竟是高技术、大学问的事，而自己是放牛娃出身，拾柴禾长大的，能搞好吗？

“陈老总”，他像过去那样既随便又认真地说，“你叫我干什么都行，这个司令我可干不了。除了挨过炸，我对这飞机从来就不懂，一点都不懂……”

“不懂？你干陆军就懂？你放牛娃出来就能指挥打仗？你放牛娃出来就能当教育长？我的好同志咧，不懂就学嘛，事在人为嘛，这些不都是学会的嘛。这是我们自己的空军，你说去找哪个内行？没有内行嘛。”

对于不懂就学，不用陈毅说，他自己也感到特别深刻和亲切。的的确确，他一生的所有成功，都是靠刻苦好学得来的。他曾这样总结过：“我没有座右铭，但我始终坚持一点：不懂就学。我始终坚信，并且实践也证明：只有刻苦学习才能求得知识，而只有有了知识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和工作的成效。除此，再没有别的什么捷径。”

为了学习，他曾采取了平生唯一的一次“非组织”行动。那是在“援西军”时，刘伯承是他们的总指挥，他是刘伯承手下的一名团长。他要去延安“抗大”，提了两次，组织上都没有同意。他一急，就“自己批准”，偷偷溜了。刘伯承得知后不由吃了一惊。因为，当时也是一个“非常时期”。在批判张国焘的斗争中，开始时四方面军有些高级干部思想不通，刚闹过一回事，搞得影响还挺大的。刘伯承不知道聂凤智是为了进“抗大”，还以为又出了什么岔子，立即派人追赶，先把人追回来再说。

聂凤智被“抓”回来了。一问才知道，原来是这么回事，弄得刘伯承又好气又好笑。“你这个小鬼啊！”刘伯承宽缓地说，就像父辈对自己的子侄，“要读书，要学习，为什么不好好说呢？为什么不直接来找我呢？进‘抗大’是好事嘛！可你看你，都是带兵的人了，干部也不小了，做事情还像小孩子，由着性子来。”

聂凤智乖乖地站着，鼻子酸酸的。他不是委屈，而是感动。

“坐么，别垂头丧气么。”刘伯承说着，转身去里屋拿出了八块银元。“你这小鬼！你知道这儿到延安有多远吗？路上要走几天？这些天里又吃些什么？住哪儿？”他把银元塞给聂凤智，吩咐道：“去吧，这几元钱给你作盘缠，路上解决点吃住问题。再去司令部开张介绍信。那边还有几个人，你们一块走。到了‘抗大’，好好学习。”

刘伯承这位长者的亲切关怀，再加上强烈的求知欲望，使聂凤智一入“抗大”，就拼命地学习起来。说来几乎令人不信，连“聂凤智”三个大字都写不全的他，却要求自己做到：白天教员讲过的内容，晚上基本上要凭脑子默记下来。从此以后，他的读书学习不但上了轨道，也成了习惯，连在山东敌后那么紧张艰苦的岁月里，他每天都带着两箱书随军转战，坚持学习。

有了这种学习精神，还能有什么学不好的。

“那好吧”，聂凤智沉思了一会，很爽快地答应说，“陈老总如果认为我可以，那我就去。实际上，我还是很喜欢搞些新鲜玩艺的。这二十年我也实在被敌人炸得恼火死了。”

“鸭子”上架

“我这就向军委报告，给你两天的时间准备交接一下，大后天就去军区空军报到。”陈毅轻松地对聂凤智说。

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空军正式成立。聂凤智出席了成立和就职大会后，就马不停蹄地赶到了上海。

当时的华东没有自己的空军，整个空军的指挥机构也没有建立。军区空军机关也还只是一些零散的班子。聂凤智的第一个大任务，除了在短期内完成机构建立、部队组建等等之外，就是首先要学会作为军区一级空军司令员的全套指挥知识和全面、全部地接收苏军“巴部”的任务与装备。

原来，当时上海及华东地区（主要是宁沪杭）的防空任务是由苏联空军帮助担任的。“二·六”轰炸给上海造成惨重损失后，陈毅跑到北京找了毛泽东，说这样不行，国民党尾巴一翘就可以到上海来“下蛋”，一下蛋就是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一点有效的空中防卫力量都没有，必须购买飞机，保卫上海。中央如果没有钱，上海就自己拿。后来经过与苏联政府协商，苏联方面派了一名颇有名气的曾经是莫斯科防空军司令的巴基斯基中将率一支空防混成部队来了。混成部队有歼击机、轰炸机、强击机，还有高炮、雷达、探照灯等，一应俱全。聂凤智要接收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摊子。当时华东军区空军的基本装备和力量也就是这个摊子。

聂凤智一到上海，陈毅就带他去见了巴基斯基将军。“将军同志阁下，这位就是我们新任的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同志。”显然，陈毅事先已给巴基斯基打过招呼。

37岁的聂凤智，个小，身矮，黝黑，精瘦，像个“乡巴佬”。巴基斯基是位注重实际、雷厉风行、多少有点“老大哥”优越感的老军人。尽管他已事先得悉眼前这位貌不惊人的“小老弟”，已经打了整整20年的仗，身经百战，功勋卓著。而且听说由苏联拍摄的淮海战役纪录片中，那么多纵队司令只有聂凤智上了镜头，可他还是不想给他留什么面子。陈毅介绍过后，巴基斯基就开门见山地说：

“很好，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完成全部的指挥学习。”

“一个月就能学会指挥了？”聂凤智只觉得飞机离他太高太远，瞪着眼反问。

“如果不行，就让我的助手希留沙廖夫再教你一个月。”

聂凤智想到，学不学得会是关系到机毁人亡的大事情，是关系到上海要挨炸、华东要挨打的大事情，是关系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年轻空军生死存亡的大事情。

一想到这儿，聂凤智的犟劲儿就上来了。于是，他毫不含糊地说：

“反正，先教一个月也好，再教一个月也好，你们什么时候把我教会，我就什么时候让你们走，否则，你将军阁下别想回莫斯科！”

这一说倒把陈毅和巴基斯基都逗乐了。这位貌不惊人的年轻司令，对事业和学问倒还真有点儿钻劲。

“那……不打仗，我们就走不了啦！”巴基斯基笑着说。他已开始打心里喜欢这位“小老弟”了。

陈毅也笑着说：“先学着看嘛。”

聂凤智取得了“胜利”，当然也就笑着点头了。于是，一个月的学习计划和资料搬到了聂凤智的面前。

聂凤智一看，几乎傻了眼。这哪儿是学习指挥！计划一大本，资料一大探，高高地堆得碰着鼻尖额头，简直就像搬来了整个空军档案库。

他必须得从空军的 ABC 开始学习啊。何况，他要学的又是空防混成的全套指挥知识！不用说，这一个月聂凤智可是吃够苦了。每天都被“填鸭”似地填进满满一肚子的 ABCD、性质原理，晚上还要反复理解，全部记住。尔后，再到指挥所去认真演习。苦归苦，但聂凤智却学得饶有兴致。也许，这就是他的独特天赋。对一门新的知识，他总是表现出许多人难以理解的过分酷好。

当然，此刻的聂凤智对如何才算“完成”他这样一级的空军指挥员的学业，心中还没有一个底。他只是认定：每天必须完成并真正掌握巴基斯坦所规定的学习内容。倘若真像“老巴”所说，这一月的学习计划完成了，他这个司令员也就“符合标准”，那么，他绝不会把学习拖到一个月零一天。

一天天下来，聂凤智居然一步不落、且有成效地把规定的课程全部完成了。一个月——从 8 月 3 日到 9 月 3 日——过去了，他兴冲冲地跑到陈毅那儿诙谐地报告说：聂司令已完成规定的学习内容，9 月 5 日可以开始“考试”了。

“考试”是紧张、务实的，又是赏心悦目的。一连五天，第一天收放飞，第二天射击，第三、四天分别组织歼击机、强击机、轰炸机的战斗，第五天是各机种都参加的可以称得上是“梯次出击，多层掩护”的“联合作战”。第一天一放飞就是 24 架，全部是中国自己的飞行员。要知道，这飞机上天难，落地却是更难。要让它们一架架地按规定的次序、空域、队形上天，又按规定的时间、先后、地点落地，按部就班，一点不乱，确非易事。它们的动作几乎都得以秒计算。不用说，聂凤智拿着话筒指挥，表面上竭力镇静，实际上浑身是汗。

“好不好？”第一天全部收机后，巴基斯坦问陈毅。他对聂凤智这个“土老儿”又有了深一步的认识：不仅“课业”出色，实际指挥更出色。“好！”陈毅看得入神，心思似乎还在万里云天，不假思索地脱口回答。

“我带的学生没有一个孬的。”巴基斯坦又补充了一句，既赞扬聂凤智，也在表现自己。

第五天“考试”完毕之后，巴基斯坦又对陈毅说：

“你看，你们这个学生完全合格了。全部是标准的五分！我可以保证，你们中国空军将来一定会打胜仗。”

“的确如此。”陈毅也由衷地高兴和称赞：“非常感谢将军同志阁下！”

初试锋芒

聂凤智说得实在，是否真正“合格”，标准的“试卷”应该在战场。不久，他奉命参加抗美援朝，真的接受实战检验去了。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两天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国驻远东空、海军对韩国军队提供“掩护和支持”。

杜鲁门一声令下，一向以好斗著称的美国驻太平洋总司令麦克阿瑟立即执行。7 月初，麦克阿瑟指挥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介入了朝鲜战争。10 月 1 日，麦克阿瑟不顾中国政府的严正警告，悍然指挥伪军首先越过“三八线”。7 日，美军也开始越过“三八线”，直指中朝边境。

朝鲜半岛战火熊熊，举世震惊，更使与它仅一水之隔的中国政府感到不安。为了帮助朝鲜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政府决定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

中国政府派兵入朝参战的决心一定，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部队，立即开始了紧张的临战准备，志愿军空军也不例外。

当时，其他国家的空军，训练一个飞行员起码需要一年的时间，而志愿军空军从筹备到组建，从训练到参战仅用了4个月的时间。由于时间短，战斗部队的技术训练只能抓住参战所必需的重点课目进行突击训练。歼击机部队重点进行特技、编队、航行和双机、4机空战训练；轰炸机部队在完成大队基本战斗训练后，重点进行团编队轰炸训练；强击机部队重点进行中、大队的中低空编队、航行和对地面战术目标的攻击、轰炸训练。

志愿军空军厉兵秣马，挽弓待发。朝鲜战场上的局势变得越来越严峻了。当时，美国在朝鲜战场上投入了大量空军兵力，连同海军舰载机在内，共14个联（大）队，各型作战飞机1100余架，飞行员中有三分之一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飞行时间多在1000小时以上。此外，英国、澳大利亚、南非在朝鲜战场上也投入了少量空军兵力，加上韩国的空军兵力，共有100余架飞机。而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仅有刚刚组建的2个歼击航空兵师、1个轰炸机团、1个强击机团，各型作战飞机不足200架；飞行员平均飞行时间只有200小时，而在喷气式飞机上平均飞行只有15小时左右，没有实战经验。麦克阿瑟根本就没有把中国空军放在眼里，他曾傲慢地扬言道：“中国最多只可派五六万兵力跨过鸭绿江。他们没有空军。”敌我双方空军兵力众寡悬殊，但这并没有动摇志愿军空军赴朝作战的决心。志愿军空军指战员们说得好：“我们装备不足，信心足，技术不高，觉悟高”；“敌人在地面上得不到的，也绝不让他们在空中得到”。

志愿军空军部队执行的是边打边建边训的方针，主要是实战锻炼，根据“有利就打，无利就不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或“打不赢就躲”的原则，灵活掌握。指战员们的求战情绪十分高涨。自1951年1月21日首战击伤敌F—84战斗轰炸机一架之后，积极主动地与敌人进行过大小数十战。在这大小数十战中，志愿军空军胜多败少，像王海、张积慧这样一批英雄，已在我年轻的空军中崭露头角，身手不凡。张积慧还曾击落了美军的“空中英雄”戴维斯少校。可这一切，都没有能够改变敌我双方在空中的态势，“空中战线”基本上还是在鸭绿江上空，也即我军驻地上空。

聂凤智第一次组建强击轰炸机指挥部是1951年3月。次年10月就任中朝联合空军司令员（开始是代司令员），开始了他真正的空军指挥员生涯。

聂凤智一到安东（今丹东，当时的空联司指挥部所在地），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就明白无误地告诉他：在他之前是边打边建边训的阶段，从他开始就已经是“实战”阶段。彭老总交给他的任务是：必须通过“实战”，把美国空军的“空中战线”，从现在的鸭绿江上空推移到清川江上空及其以南空域。也就是说，从聂凤智开始，不但必须积极主动地参战，坚决有效地反击敌人，还必须战胜敌人，把敌人的空中“阵地”往南推出几百公里。显然，聂凤智必须跳上去的是一个很大的台阶。

问题是，不只聂凤智本人是“初出茅庐”，别说亲自指挥，对于真枪实弹的空战见都没有见过。而且敌我力量之比实在过于悬殊。美国空军素有“世界空中霸主”之称，并非只是吓唬人的；而我们年轻的空军呢，除了像空3师、空4师那样参战较早的部队，稍有一点实战体验外，大部分还是那些刚组建不久、飞行训练时间只有几十小时的“幼儿级”部队。

显然，这是一场绝对劣势对于绝对优势的抗衡，而聂凤智的责任又必须

是毫不含糊地以这样的劣势去取得没有讨价还价余地的优胜，以扭转被敌军压在头上打的局面，把空中战线推移到清川江一线及其以南空域。

不可否认，聂凤智心头的压力是巨大的。他不是神仙，再聪明，再能干，也只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当时的朝鲜战场，不但有中朝联合空军，还有部分作为“后盾”的苏联“老大哥”空军部队。他们与美军对抗了一年有余未能改变的被动局面，要让聂凤智来一举扭转，无疑是有些过分的希望。

将军有将军的哲学，军人有军人的天职。除了彭老总指示的坚决反击，主动参战，聂凤智什么都没有想也不能想。他苦苦筹划这仗该怎么打，等待着美机的再一次挑战。

1952年9月4日，美国空军的又一次大规模侵袭降临了。

这是一个复杂气象的天气，美军仗着飞机性能优越和飞行员技术娴熟，浩浩荡荡，来势汹汹，一来就是黑鸦鸦的100多架。敌人料定，这样的气象条件，我军是不敢也无法与之接战的。事实上也是，这样的天气，就是平常训练，我军也很少敢大胆放飞。敌人狂妄地认为，刚于6月23日吃过大规模轰炸苦头的拉古哨水电站，这一回又注定要再遭一次他们的钢铁风雨的洗劫了。

但是这次他们碰到的却是聂凤智。聂凤智认真地将敌我情况分析了一下，在不利和劣势中，找出某些对自己有利的方面来。他明确指出，美军料定我军不敢升空，其防备必定松懈，心理必定麻痹。“轻敌必败”既是一切骄兵的下场，“攻其不意”也是兵家百试不爽的成功秘诀。我军占有了有可能取胜的一条。

再有，就是“战场”是摆在我们的家门口。欺到头上来，欺到门上来，即使再无能也有可能把大疯狗打得趴在门槛下。因此，我们的部队，在斗志、勇敢精神和必胜心理上都将占上风。也就是说，如果这也是属于“天时、地利、人和”的话，这里已占有了“地利”和“人和”两条。

此外，我们身后还有当时称为“后盾”的“老大哥”。这也是敌人不得不考虑的一点。

这时，担负保护我方运输线路任务的“老大哥”某部，已准备升空迎敌。于是，聂凤智当即命令第3师的两个大队起飞迎战。

我军升空接战的共有16架飞机。

以100多架比16架，其差距之大当然是明摆着的。我军参战的也就是那些只有几十小时飞行记录的飞行员，同飞逾千时的美军飞行员相比，其差距之大也是明摆着的。但战斗结果双方的损失是5：6，美机被击落击伤5架，我机被击落击伤6架。从最终的结果看，可以算是个“平手仗”，而从整个空战看，应该是我军比敌军打得好，而且可以说是一个胜仗。

然而聂凤智并不感到庆幸。几十年了，在他的指挥观念中，“平手仗”或“消耗战”从来就不是胜利而是失败。“九纵”的历史就这样记载着。“南麻临朐三户山，上下仙游岬子湾”，说的就是几次“平手仗”或“消耗战”，在他们的记忆中都十分沉痛、惋惜和深刻。不只他们，在总结“南麻临朐战役”的时候，尽管就当时希望达成的战略目标而言实际上已经达成，但因为拼了消耗，打成了平手，陈毅还是把它当作“败仗”看待。是啊，这是我们人民武装的条件、性质和目标所决定的。现在面对比自己强大多少倍的“世界空中霸主”，何尝又不应该这样看呢？

聂凤智的目标是战场的胜利，他的衡量标准也是战场的胜利。在这一目

标和标准下，他没有丝毫去考虑个人的面子或其他什么东西。为此，他虚心向周围的同志们，特别是手下的飞行员学习，听取各种不同意见，接受批评，认真改进指挥。这样做，他在下属面前不但没失去威信；相反，无论从心理，从感情，从信任程度上，飞行员们都因此与聂凤智胶合得更紧密、更牢固了。

在这以后，聂凤智几乎是天天指挥志愿军空军主动升空作战。同时，他又指示技术部门积极改进米格机的性能。仗，越打越好。仅 12 月，志愿军空军就击落敌机 37 架，击伤 7 架，而且大部分是高性能的 F—86 飞机。年底，美国新总统艾森豪威尔上台。为了谋求尽快结束朝鲜战争，他命令组织了一场企图凭借海空优势、配合地面部队的更大规模的进攻，向我军施加压力。敌人先后出动了 123 个机群、万余架次的飞机，向我铁路、桥梁、阵地、基地等重要军事目标，进行了一次号称“空中包围战役”的突然而猛烈、频繁而多变的猛烈的袭击。五角大楼得意忘形，以为这一铁锤砸来，我方军事实力将被破坏殆尽，从而乖乖地束手就擒或坐到谈判桌前来听其摆布。然而，这是他们的又一次失算。聂凤智倾手中全力，先后出动了战机 4000 余架次，以一直存在着的空中劣势，一举把敌人赶出了鸭绿江上空，不但保卫了朝鲜北部和我东北边境各重要军事目标的安全，还把空中战线向南推移到了清川江一线。

彭德怀长舒了一口气。这是他一直希望实现的朝鲜空中战场的战略目标。

聂凤智也长舒了一口气。这是他第一次达成了受命为中朝联合空军司令员以来，一直梦寐以求达成的彭老总一开始就交代的战略目标。

然而，聂凤智在感到欣慰的同时，头脑十分清醒。不错，从这几个月特别是从这一次大规模反击的战况看，我军在精神上、气势上、胆识上、勇武上已占上风，或者说已压倒了敌人，可真正的实力——无论从飞机的数量、质量和飞行技术上看，与美国空军相比，其优劣强弱之悬殊不但依然没有改变，而且短时间内几乎不可能改变。聂凤智是崇尚精神力量之伟大的，但他也是最注重物质力量的现实的。他十分清楚，要保持眼前已经取得的战果，必须凭借现有的物质力量，让全体指战员的聪明才智和勇敢精神在更大的程度上得到发挥。

静下心来，聂凤智把自己和年轻的中国空军都细细地“梳理”了一遍。除了巴基斯基“填”给他的那一兜子最起码和极有限的 ABCD 外，对于空军和空战，他头脑里可以说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中国年轻空军的状况大体上是，既无理论，也无经验，更无一套成功的或叫规范或叫经典的程式或模式。有的无非就是从几个月的实战中总结或体验出来的一些窍门或打法。

这是中国人自己的窍门或打法。美国人骂中国空军“无规律可言”，“近乎游击战”。聂凤智想到，这倒正是自己应该好好总结的“规律”和好好发扬的“战略战术”。他的眼前豁然开朗而变得无比宽广了。老实说，倘若去掉“空军”二字，“战争”之于聂凤智，实在是太熟悉不过的了，大小数百战的亲身经历，使他积累下无数的经验。在“陆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空军。如果也从“陆军”中汲取或衍变成功经验的话，那聂凤智无疑是一位当之无愧的行家里手。

于是，聂凤智很快有了一套虽不完善但的确是属于他自己的战略战术。这一套战略战术的最大特点，就是尽量变我军的绝对劣势为相对优势，利用我军的“无规律”、“游击战”之长制敌之有规律、正规战之短。比如，

最大限度地利用我军有限的飞机，组成“时间差”的梯次队形，一批升空，另一批待命，那一批降落，这一批升起，轮番参战，反复运用，不但使对抗空域始终保持着我方一定数量的飞机，还始终使参战飞机处于良好状态。又比如，用小批架的力量吸引和调离敌人的战斗机，集中尽量多的力量攻击敌人缺乏防护能力的轰炸机群，以我之长击敌之短，也就相对地使我军在某个空域内占有了优势。再比如，美军有个被奉为经典的“打着陆”的拿手好戏。他们凭借其飞机的性能好，续航时间长，经常利用我机油罄弹缺不得不返航的时候，跟在屁股后面“打着陆”，这是很伤脑筋的。因为飞机着陆的时候，飞行速度慢，机动范围小，而且航道固定，对抗或自卫的能力都已失去，往往是被动挨打。聂凤智则利用敌人的这一“经典”，每当一批飞机准备着陆的时候，就令另一批飞机升空等候着，来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反而让敌人吃更大的苦头。打了几次之后，敌人就再也不敢“自以为是”了。

当然，这需要飞行员更高的独立作战和临机处置的技能。聂凤智总是鼓励他们积极主动地发挥各自的主观能动作用。他诚恳地对飞行员们说：“我在下面指挥，只能给你们引个方向，提供些前后左右空域的敌情，至于怎么打还得靠你们。你们要敢于打，放手打。”指挥员的信任，把飞行员的聪明才智和敢打敢拼的精神都充分地调动了起来。于是，像王海、像张积慧，一个个空中英雄在实战中很快地成长起来。王海一个人就击落击伤敌机9架。王海大队——志愿军空军某师第9团第1大队则是最著名的英雄群体。在入朝参战期间，第1大队参加空战80多次，击落击伤敌机29架。全大队人人立过战功，架架战鹰红星闪耀。据统计，在抗美援朝期间，年轻的中国空军共击落击伤美机425架，立下了不朽功勋，在中国空军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不过，这并非说我们年轻的空军真的已经超过美军，真的已经使朝鲜上空的敌我力量强弱易势。这并不是只靠勇敢、不怕死就能解决问题的。有好几次，聂凤智只能用“空城计”迎敌。敌机起飞后，他立即通过无线电喊话，命令某某机场的飞机起飞迎击，并故意让敌人“侦听”到。不过我们没有一架飞机起飞。由于有无数次打得敌人晕头转向的战果作为垫底，敌人“侦听”到后，也不敢轻易地往北进犯了。

自从空中战线南移到清川江一线及其以南空域后，鸭绿江到清川江一带就成了五角大楼望洋兴叹的“米格走廊”。美国空军参谋长不得不饬令他的部属不要轻易闯入这个“走廊”。这样，清川江以北空域就始终处在我军“米格”机的有效控制之下。美国空军参谋长不无自嘲地惊呼：“共产党中国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的空军强国之一。”

#### 再展雄风

1954春，刚从朝鲜战场回来不久的聂凤智，就奉命进驻设于上海淮海路的军区空军指挥所。这时，等着聂凤智的任务是东南沿海岛屿的解放和上海等要地的防空作战。

聂凤智这时急忙赶到上海，除了为解放浙东沿海岛屿作准备外，还有两个具体任务：一个是护渔。这时正是黄花渔汛，必须以果断手段保护浙东渔民出海和海上作业的安全；另一个就是保卫大上海，绝对不能出事。这时周恩来正赴日内瓦参加旨在解决朝鲜和平统一和印度支那停战问题的国际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外交工作中的一件大事。上海是中国具有国际影响的大城市，绝不能让美蒋反动势力在上海弄出什么有损新中国国威、军威的事

情来。聂凤智一到上海就立即投入了紧张而繁忙的备战工作。

他指示全体人员必须考虑并做好是：首先要同敌人来一场争夺浙东地区制空权的斗争。

夺取制空权不外三法：先发制人，摧毁敌方的机场、飞机、油库等等，使对方飞机飞不起来或没有飞机可飞；经过空战消灭敌方力量，压倒对方，击败对方，从而把空域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第三，就是凭借自己的绝对强大，不战而屈人之兵，使对方根本不敢到你这儿来。从当时的情况看，第一种、第三种办法都不可能，因为我们还没有那个力量。所以，还是只有靠空中打。聂凤智仔细分析了整个浙东上空的敌我态势后，很快拿出了“远伸作战”的方案。

这是一个最有力也是最万全的方案。他摆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根据已有的上海防空体系和我军的作战力量，蒋介石要派大机群、大编队进攻上海的可能性不大，而以夜间小股偷袭最有可能。但来与不来、来大来小的主动权都掌握在敌方手中，我们要夺取制空权既是主动的措施，但又有被动的一面。因此，要变被动为主动，最好的方法就是主动出击，而且采取“远伸作战”的办法，把我们的作战空域向前推进到舟山群岛上空及其以南。这样，不但可以寻找更多的战机，而且可以把大上海置于安全的后方。

聂凤智把远伸作战的任务交给了海军航空兵和驻杭州、嘉兴一线的空军部队。很快就把三天两头北扰的蒋军“空中英雄”们打得自顾不暇了。几仗之后，不但上下大陈岛和一江山岛以北空域完全由我控制，甚至我们的飞机还可以向南伸进到一二百公里的空域，从而使上海的防空安全有了保障，海上作业的渔民受到了保护，而且使我海、陆、空三军向一江山岛和上下大陈岛进攻作战的意图得到了更好的隐蔽。

一江山岛，位于浙江海门椒江口台州湾之东南，南距大陈岛 11 公里，北距头门山岛 8 公里，东北距高岛 12 公里，西南距琅机山 20 公里，西北距海门 35 公里。

一江山岛分南江、北江两岛，总面积不足 2 平方公里。在地图上，只能用放大镜才能找到它。然而，就这么个“弹丸之地”却成为国民党“反攻大陆”的跳板和重要的前哨阵地。国民党当局认为：大陈岛是“台湾的北大门”，一江山岛则是“北大门的门闩”。它的安危不仅关系到大陈岛的得失，而且也关系着台湾的巩固。所以，国民党军从各方面积极加强一江山岛的防御，提出“保卫台湾，必先固大陈，要守住大陈，必确保一江山岛”。

鉴于一江山岛地位之重要，因此，国民党军布以重兵，成立了一江山防卫司令部，下辖第 4 突击大队和第 2 突击大队 4 中队，另有 1 个炮兵中队，共 1100 余人。

在美国军事顾问团的策划下，国民党军在岛上严密设防。他们认为，缺乏海、空军支援的“共军”是无法攻克一江山岛的，于是吹嘘：“设防后的一江山，固若磐石，共军无法登上一兵一卒！”

由于国民党军所占浙、闽沿海岛屿，不仅封锁了大陆南北海上航道，而且还把这些岛屿当成“反攻大陆”的跳板。他们经常派出小股兵力，不断骚扰大陆和海上捕鱼的渔民，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了威胁，北边的宁波港和南边的温州湾都几乎成了死港。因此，不解放浙东沿海岛屿，就无法考虑福建沿海的安全和其他岛屿的解放。要“逐岛解放”，上下大陈岛和一江山岛是第一个目标。



1954年8月2日，中央军委召开解放浙、闽沿海岛屿的作战会议。会上，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专题汇报了解放大陈列岛战役的作战设想——首先攻占一江山岛，同时佯攻披山。得手后，再全力进攻大陈本岛。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个方案。

8月11日，华东军区发出预先号令，决定以步兵第20军第60师的主力，在海、空军的支援下攻占一江山岛。华东军区在宁波建立浙东前线指挥部，由张爱萍任司令员。浙东前线指挥部下设登陆指挥所、海军指挥所和空军指挥所，空军指挥所由聂凤智任司令员。根据浙东前线指挥部命令，参战的海军航空兵归空军指挥所统一指挥。

尽管一江山岛小似“弹丸”，但为了有效地支援登陆部队顺利攻克该岛，空军和海军还是抽调了较强的航空兵兵力。被确定参加这次登陆作战的航空兵部队，共有各型飞机近200架。

在浙东前线指挥部召开的作战会议上，张爱萍司令员向参战空军明确了任务：以歼击航空兵协同地面防空部队，夺取和保持战区的制空权；以轰炸、强击航空兵集中兵力突击来自台湾的国民党军舰，切断国民党对大陈诸岛的后勤补给和兵力增援；以小机群连续对大陈、披山、渔山等岛屿的军事设施进行轰炸，隐蔽进攻一江山岛的企图；支援陆、海军部队登陆，攻占一江山岛；实施航空侦察等。

登陆作战不同于陆上战斗，部队需要跨越海洋障碍，而且暴露在敌人的各种火力下。特别是在对方空、海军兵力较为强大的情况下，如果不能有效地夺取制空、制海权，无疑会给登陆作战造成很大威胁，即使能侥幸成功，也必将付出较大的代价。

张爱萍司令员深知夺取制空、制海权对一江山岛登陆作战的重要。因此，在1954年9月召开的一次陆海空三军参战部队指挥员作战会议上，他明确提出：一江山岛登陆作战分2个阶段进行。第1个阶段由海、空军部队一部夺取战区制空、制海权；第2阶段，以陆军某部4个加强营，在海、空军和炮兵的支援下，对一江山岛实施登陆突击。

经过1954年3月至7月华东军区空军和海军与国民党海、空军进行的一系列海、空战，使我军完全掌握了浙东沿海空域的制空权。

根据浙东前指的作战计划，从11月1日开始我华东空军转入“轰炸封锁敌岛作战阶段”，主要是以空军为主，协同海军舰艇和海岸炮兵，集中突击大陈岛海域的国民党军舰，同时突击大陈岛上的军事目标。

对一江山岛，张爱萍一直在考虑如何以海、陆、空三军联合作战来解决问题。无论对谁来说，金门战斗的失利都是值得记取的。1949年10月28日夜，我军7个团两万余人分组两个梯队，向金门发起了登陆作战。本来的计划是：第一梯队登陆后，再利用运载第一梯队的船只运载第二梯队进行续攻。可是，由于计算失误，当第一梯队起渡接敌近岸时刚逢落潮，不但登陆受阻，还未上岸就被敌人火力拦截，伤亡重大，搁在浅滩上的船只也成了敌人的“固定目标”，被摧毁殆尽。这样，第二梯队既无法利用第一梯队的船只，另外的船只又一时无法征集起来，就只好“隔岸观火”，无计可施了。最后，第一梯队顽强登陆的部队被包围在古宁头一带，虽经三天三夜血战给敌人以重大杀伤，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八千子弟几乎全部牺牲。这一仗，除了由于轻敌急躁，准备不足，缺乏经验等之外，没有海、空军配合也是重要原因。现在条件不同了，我们建立了海、空军，应该让它们在“逐岛解放”中

发挥作用。

聂凤智是十分赞成张爱萍这一构想的。但是，三军配合并不那么容易。无论对张爱萍还是对聂凤智来说，这都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也是还没有翻开的一页。

聂凤智知道这“新的一页”书写之难。他很细心，每天想的几乎就只是这一件事，总是感到自己的不懂和不足。这是他的一贯作风，就像对济南城防，他不但亲自侦察，还构筑模拟工事，让部队“七进七出”进行训练。也许只有像他这样取得成功的将军才最清楚，什么目标协同、信号协同、时间协同、地点协同等等，书面上写起来都很容易，可做起来每一件都艰难无比。何况，这“海、陆、空”协同还是第一次！弄不好，到时候自己的大炮打了自己的飞机，自己的飞机炸了自己的军舰，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为此，聂凤智一次又一次地想了再想，算了又算，让部队练了又练。他指令参战的飞行员反反复复地在不同的高度和角度上练习辨认自己的军舰的能力，看看它在什么角度上是什么形状，在什么高度上是个多大多小，直到每一个飞行员都娴熟于心。

除了诸多必须精确计算、周密部署、反复演练的“协同”外，聂凤智还在考虑更大的问题，即有关三军协同作战带有战略指导性的问题。他明确提出并指示所有参战的空军部队：在三军协同中，空军的服务对象是陆军；空军的一切战斗行动都必须遵循一个原则，即以陆军的胜利为胜利。

“以陆军的胜利为胜利”，是聂凤智的创造。或许可以说，在我军的历史上，这已经是一个里程碑。

1955年1月18日，以一江山岛为第一大目标的大陈列岛战役正式发起。

聂凤智确信，空军的战斗是卓有成效的。经过航空兵两次火力准备后，上下大陈岛和一江山海域的敌军力量，诸如舰只、岸炮、阵地工事、防登陆障碍等等，均已被摧毁大半。加上此前已经夺取的制空权，整个战役都对我军有利。现在的关键，就看最后的登陆作战是否能够顺利完成了。他立即向张爱萍作了汇报。

这一天，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微风细浪，海面上浮动缕缕轻雾。

凌晨4时11分，聂凤智命令第1批歼击机出动，掩护集结于头门山、高岛等地的登陆部队进行登陆舰起航的准备；随后航空兵部队轮番出动米格—15歼击机168架次，分批次在战区上空巡逻，在作战全过程对整个战区进行掩护，并对轰炸机编队进行护航。由于在前一阶段夺取制空权斗争中，国民党空军已领教了华东空军部队的厉害，所以，这回是闭门不出。

7时40分，聂凤智命令空军轰炸航空兵某部27架图—2轰炸机，在副师长张伟良的率领下再次出征。这次的任务是对一江山岛实施航空火力准备。第1独立歼击侦察团出动8架拉—11歼击机，对轰炸机全程护航。

8时整，混合机群准时到达目标上空。随着张伟良的一声令下，一枚枚炸弹飞泻而出。刹那间，一江山岛爆炸声四起，浓烟蔽空。8时10分，轰炸机投弹完毕。蒋军的混凝土工事、碉堡终究抵不过钢铁炸弹，在阵阵爆炸声中，一江山岛上对登陆部队威胁最大的160高地上的蒋军地堡、掩蔽部、炮兵阵地和高炮阵地化为一片废墟。

与此同时，聂凤智又派出轰炸机和强击机各1个大队，突击轰炸了大陈岛守军的指挥所和远程炮兵阵地，使其通信联络中断，指挥失灵，从而将一江山岛上的国民党守军完全孤立起来。

中午 12 时许，根据张爱萍司令员的命令，登陆部队分乘 100 余艘舰船，在空军歼击机和海军舰艇的掩护下起航，浩浩荡荡地向一江山岛疾进。

下午 2 时，聂凤智命令轰炸航空兵再次出动 3 个大队 27 架图—2 轰炸机，对一江山岛实施直接航空火力准备。在这次突击中，空军某部副团长刘忠清率 2 个轰炸机中队，一举摧毁了国民党军“一江山地区司令部”的全部营房和通信设施，使全岛指挥陷入瘫痪。与此同时，空军还出动了图—2 轰炸机 2 个中队和伊尔—10 强击机 1 个大队，猛烈突击了正向航渡舰队炮击的大陈岛上的榴弹炮阵地，并炸毁了大陈岛上的雷达阵地。

14 时 30 分，登陆部队第 1 梯队上岸。虽然在空、海军和炮兵的猛烈轰击下，一江山岛的蒋军工事、火力点大部分被摧毁，但仍有一部分火力点，特别是经过周密伪装的暗堡残存了下来。

眼见“共军”冲杀上来，蒋军残存的火力点疯狂地进行扫射。一时间，登陆部队被压在岸边，前进受阻。

在这紧急关头，聂凤智又适时出动强击航空兵伊尔—10 强击机 2 个团，压制岛上蒋军火力点，对登陆部队实施直接航空火力支援。飞行员们根据空中观察到的情况，主动支援登陆部队的进攻。当登陆部队遭到火力阻击时，强击机从空中直接压制蒋军火力。强击机每俯冲攻击一次，步兵就冲锋一次。有的飞行员炮弹打光了，燃料即将耗尽，但仍向蒋军阵地俯冲。伊尔—10 强击机低空呼啸而过发出的巨大轰鸣声，把蒋军吓得丧魂落魄，纷纷躲藏起来。

在强击机的有力支援下，登陆部队一路势如破竹，至 17 时 30 分，占领全岛，击毙蒋军 519 人，生俘国民党第 4 突击大队长王辅弼以下官兵 567 人。

1 月 18 日这一天，聂凤智共组织空军出动各型飞机 288 架次，投掷各种炸弹 851 颗，发射枪炮弹 3741 发。战后查明，我空军部队共炸毁蒋军各种火炮阵地 15 处，指挥所、雷达站各 1 处，破坏火力点、掩蔽部、地雷区 25 处，营房数十间及部分地堡、堑壕等工事，有力地支援和保证了陆军部队的登陆突破和纵深战斗。国民党防卫一江山岛的突击大队长王辅弼被俘后仍心有余悸地说：“在 18 日那天，你们飞机来轰炸和往日不同，过去炸完就走，这次是轮番轰炸。烟雾遮盖了整个一江山。所有电话线全部炸断，部队完全失去指挥，很多炸弹都落在阵地和工地上。……我们躲在防空洞里，外边死了多少人，发生了什么情况，都不知道。”

这就是人民空军显示的强大威力！正如当年曾亲自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陆海空联合渡海登陆作战——一江山之战的张爱萍将军，在战后所赋的词所说：

东海风光，寥廓蓝天，涛涛碧浪。看骑鲸蹈海，风驰虎跃；雄鹰猎猎，雷击龙翔；  
雄师易统，戎机难觅，陆海空直捣金汤，锐难当。望大陈列岛，火海汪洋。料得帅骇军  
慌，凭一纸空文岂能防。忆昔诺曼底，西西里岛，冲绳大战，何需鼓簧。“固若磐石”，  
陡崖峭壁，首战奏凯震八荒。英雄赞，似西湖竞渡，初试锋芒。

### 挽弓待发

1956 年 8 月 22 日晚上，一架美军侦察机在长江口外擦着我国的领海线时进时出，打着捞一把就溜的算盘，飞着 S 形路线，多次闯入我领海线范围内对我沿海军事设施实施电子侦察。美军的这种伎俩已经多次使用，以为我军不敢对它怎样。当然，如果当时就完全判定是美机，聂凤智也可能会采取

其他更巧妙的办法。可晚上既辨认不出机徽，由于观测设备的限制又无法准确判断它到底是从日本、南朝鲜、台湾还是其他什么地方飞来的，倘是蒋机，又怎能轻易放过？这时奉命升空的我军某部飞行员张文逸一直在跟踪着目标，在指挥所值班的空四军军长高厚良和坐镇南京的聂凤智也一直在注视着目标。当敌机再次窜入我领空，而张文逸又报告自己正处于有利攻击位置时，高厚良一声令下：“开炮”。三炮齐发，一举命中。

于是，聂凤智在自己的将军生涯中经历了一次最具特别意义的风波。敌机被击中后，不是马上坠落，而是拼命地夹着尾巴朝公海方向栽下去。当时我机上的观测条件差，又是夜深天黑，敌机最后到底落在哪个具体位置上，飞行员也说不十分精确。但他肯定击中敌机是在黄泽山上空的空域内。

美军指挥机构首先发现派出的飞机没有飞回来，就知道出事了，于是报告了驻夏威夷的太平洋舰队总部。美军的这种电子侦察机，在当时的水平看，技术设备都已是最先进的了。它在共产党国家中消失，自然立即引起了总部的震惊。其后又报告了五角大楼，接着又报告了白宫。随即从白宫到五角大楼再到夏威夷总部，策划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并立即付之施行。

一听说打的是美国飞机，有人就慌了，开始埋怨甚至指责起来，聂凤智却态度明确：“打得好！”许世友也说：“打下就打下了，有什么了不起！”

为了掌握主动，避免事态扩大，周恩来接到报告后，立即亲笔改定了一篇新华社的新闻稿：

新华社 23 日讯：本月 23 日零点后在上海东南海面上空发现蒋军飞机一架，窜入我马鞍列岛上空，我空军飞机当即起飞。蒋机继续窜入嵎泗列岛上空，与我机在衢山岛以北之黄泽山上空遭遇，被我击伤，敌机当即向东南方向逃去。

文章之奥妙是显而易见的。根本不提“美机”二字，还点明“遭遇”是在我国领土“上空”，并且交代“敌机当即向东南方向逃去”。这样美国想要什么花招也无口可借了。

然而，美军的大规模挑衅行动还是悍然发动了。美国组成了一支有三艘航空母舰和其他护卫舰、巡洋舰、驱逐舰、鱼雷艇及后勤补给船等共 30 余艘舰船的特混舰队。三艘航空母舰爱塞克斯号、列克星顿号、大黄蜂号，是饱经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锤炼的海上“英雄”堡垒。夏威夷总部行动神速，48 小时之内，航母编队已气势汹汹地“打”到我们的“家门口”来了。

事情一发生，周恩来总理就有正确估计，并在确定如何发布消息的同时命令空军：美军如果借机挑衅，我们就必须反应，既不示弱，也不逞强。

聂凤智立即召集司令部有关人员商量如何执行这一命令。他命令有关方面的部队立即进入一级准备。在匆匆商定如何贯彻“既不示弱，也不逞强”的原则后，聂凤智带着作战科长立即赶往上海指挥所。

25 日凌晨，美军也已几乎同时在我国东南面的领海线外摆好了准备攻击前进的架势。

在上海空军“前指”，聂凤智首先询问了一下各军、各师的战备情况，而后立即开会，确定行动原则。“不能自己先吓了自己，自己先乱了自己”，他一坐下就先对那些显得惊慌的部属说，“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冷静地分析一下我们可能面临的情况。”聂凤智表现出让人意外的镇静。这倒不仅仅是因为他有朝鲜战场的非常经历，有出生入死的锻炼，而首先在于他有作为

著名战将的心理素质。

他认为，研究战争，一定要着眼其特点，着眼其发展。

聂凤智的分析精确而有力。表面上看，现在敌人气势汹汹，组成这样一支舰队，而且航母上的飞机基本上是“AD”（鬼怪式）系列，攻击能力强，防卫能力也很强。形势确实有点紧张。但是，就目前的情形看，敌人要实施一场登陆作战还不可能。航空母舰再有战斗力也上不了岸，飞机性能再好也不可能到我们的机场来着陆。这就要看敌的后续动作，看有没有再继续增兵，有没有再派运输船、登陆艇，也就是看敌人后面是否还有力量更大的特混舰队。因此，现在有扰而不进、既扰且进和借端扩大事态发动一场侵略战争这样三种可能，而第三种可能性小，前两种可能性大。

经聂凤智这么一点，不安的情绪稳定下来了，会议也逐渐显得活跃。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聂凤智开始从政治原则到军事方针逐条逐项地向部队布置交代。可以说，这是一个“全方位”的斗争方案。简明而扼要，周细而周密。

首先，在打与不打、小打与大打问题上，他明确指出：要立足于打，而且要立足于大打；不要认为三种可能性中第三种可能性小，就放松轻敌。在打或大打当中，不但要准备空中迎击，还要准备敌人可能来轰炸我们的机场及其他地面设施。因此，打，既有迎击部队进攻性的方面，也有其他部队防护性的方面，任何方面都不可疏忽。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始终是我们行动的指导思想。

这是聂凤智的一贯作风和指导思想。他始终坚信，毛泽东的无数经典理论是颠扑不破的。他本人之所以能成为著名将领，就是毛泽东思想哺育的结果。

既然要立足于打、大打，对敌人兵力的精确分析和估计，做到“知己知彼”，就显得十分重要了。聂凤智说，三条航空母舰，以每舰三或四个中队计，其编成或者 $3 \times 3$ ，或者 $3 \times 4$ ，每舰大一点的70来架，小一点的60多架，总共200多架飞机。除去部分常规性的（如定期检修）不能出动和必须保留的一部分防卫力量外，每舰还受吞吐量（舰上飞机不可能一下子就全部放光）的一定限制，因此，敌人每次最大的出动兵力，充其量也就是一百几十架。因此，从数量上说，我军可以占绝对优势。

对比了兵力，聂凤智又给大家对比敌我双方飞机性能的优劣和飞行员的水平，并指出何属敌长，何为我短，及如何扬我之长，避我之短。他说，并不是航空母舰一来我们就没有办法。我们自己绝不能乱了方寸。

这又是极有成效的镇静剂，大家的情绪更稳定了。打或大打，我们都不必过分惧怕慌张。

立足于大打，聂凤智作了极严密的准备。如规定：每个部队都必须保证有最大的出动量；每机都必须作好全程作战的准备；每个机场都必须作好防卫战斗的准备，并准备随时接收其他兄弟部队的飞机，后一点也包括其他边远机场在内等等。他具体地布置了哪些部队为一梯队，哪些部队为二梯队，哪些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哪些部队眼下进入二级战备。要求各部队出动时必须做到有层次、有先后，绝不准临阵惊慌，“一哄而起”，等等。

毫无疑问，不管从心理上还是行动上，这一切准备和部署，都已为实际上不大可能出现的“大打”创下胜机了。

接着，他又根据周恩来总理“既不逞强，也不示弱”的指示原则，对另

外两种“可能”，极其详细具体地规定了几个“可打”与几个“不打”。他说：

“打，要有理、有利、有节，即我们要讲得出道理，讲得出打的充分理由；并且要有利，有把握打赢；同时要有节制，达到自卫的目的即可，不可把事态扩大。以下四种情况要打，可打：一是敌人航母上的飞机直接以我上海要地等为攻击目标，无论它是扫射、轰炸还是其他形式，只要做出攻击姿态，就必须打，坚决打；二是已经窜入我领空范围，同时又对我巡逻或出航的飞机做出咬尾攻击之态，就必须打，坚决打；三是已经窜入我领空范围，我机已处于有利的攻击位置，也即一击即可保证将其击落在我们的领海、领土之内，可以打，应该打；四是已经窜入我领空范围，经警告无效，即要创造有利条件打。不管哪种形式的打，在有理的前提下，既要有利，又要有节，扛赢即止，不要往外穷追，同时必须注意：如果敌人是在双机或4机以上，要先击要害，首先集中攻击其带弹飞机；无带弹飞机的机群，则要扬我所长，先攻击其一边或一角，或在展开的情形下先集中力量攻击其分散、孤立之机，以我之强击敌之弱。敌机不入我国领空或不经过我国领空，不打；敌机只作监视飞行，并无攻击之态，时进时出，接受警告者，不打；我机不处于有利攻击位置，也即打后不能保证击落在我领海、领土内，容易引起国际纠纷，不打——打后不但说不清楚，且因敌人集结在那儿容易吃亏。”

一目了然，这一篇根据“既不逞强，也不示弱”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做出的大块文章，也是严密精细，条理分明，又色彩斑斓，紧凑有力的。战争这架机器一旦开动，实在是太复杂了。从这短短的文字中，对于聂凤智高超的政治水平和军事天赋，我们已可领略个大概了。

拂晓的时候，美军几乎倾其所有，从三艘航空母舰上放出了分明已经是最大出动量的近200架飞机，在我领海线附近气势汹汹地对我进行挑衅。敌人通过美国之音说，这是为了寻找他们“遇难的”飞机残骸和飞行员。实际上美国是想伺机制造事端，挑起战争。

聂凤智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静静地坐在指挥所里，注视着领海线外那个正在歇斯底里地嘶叫、翻腾、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其气势真还有点压人、吓人。可聂凤智根本不予置理。他只派出几架“正常巡逻”的飞机，在绝对领空之内，我飞我的。就像两位对弈高手，一个嘴里骂骂咧咧，甚至把脚搁在椅子上或把地板踩得哗哗响，把棋子拍得啪啪响，企图用威势吓倒你，扰乱你，让你出个错着；一个却只专注着棋盘，静静地准备着五套或十套应付办法，就看你下哪个子落哪个位，根本就不费那些唾沫口舌和你啰嗦。聂凤智知道这其实更有威慑力量。对手越不了解你，就越心中无数；你越镇定，他就越不敢轻举妄动。当然，这是内紧外松，只是内盘的发条虽然已经紧到极限，外盘的指针还是一丝不乱地按节按拍。将军的威力就在这里；不示弱，你飞我也飞，你飞200架，我飞20架，甚至2架，我也不怕；不逞强，你飞你的，我飞我的，只要你不犯我，我也不惹你，不打第一枪。

平静之中的紧张是真正的紧张。24小时，48小时，聂凤智都无法合眼。

这样的对峙和相持，大概就看谁的意志更坚强、神智更健全、头脑更清醒、内力更深湛了。谁不出乱子，谁就能操得胜券。美军既然已先乱于始，碰上聂凤智这样一位沉得住气的对手，还能捞得什么油水呢？

的的确确，军事上是无法捞到油水了。“共党”空军张弛有致，沉着冷静，章法分明，纹丝不乱，分明是早有准备，严阵以待，行动谨严，找不到

一丝一毫的可乘之机。政治上呢，就更无法捞到油水了。新华社的那一巴掌是拍得坚实有力的，猛然之间几乎让人喘不过气来。你说是“美机”么？那么好，你到中国来做什么！你侵犯中国主权这帐还没有给你算呢！你承认是“蒋机”么？那么，“蒋机”关你什么事？你这么大规模地陈兵一个主权国家的门口是什么意思？你说是落在“公海”上？那是你自己逃跑的时候栽下去的，怪谁？难道你飞到人家头上搞军事侦察还不让人家自卫？如果这一切都不是，那又是什么？你能拿出道理来？

理所当然，美国政府一点便宜也没有捞到。据说，为此事当时美国国会还好不热闹了一阵子，纷纷要求说明真相：有的说，如果真是自己的军用飞机侵犯了人家的主权而被打下，政府必须承担责任；一些好战分子则大叫大嚷要借此机会向共产党中国摊牌，可这是需要一点胆子的。正如陈毅在那次震惊世界的记者招待会上所说：人们只知道世界上有一个美国不好惹，须知道还有一个中国更不好惹！几天之后，美国看看武装挑衅捞不到什么东西，只好悄悄地“鸣金收兵”。

### 入闽作战

福建、粤东地区面对台湾海峡，是大陆的空防和海防前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早在50年代初，人民解放军即在这一地区修复机场，准备进驻空军部队。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集中力量进行抗美援朝作战，暂停了进驻部队的行动。1956年前后，空军在浙江、福建、广东地区新建了一批机场，并准备进驻航空兵，但一时未能实现。在这前后七八年的时间里，国民党空军利用掌握这一地区制空权的时机，经常出动飞机窜扰大陆，甚至将训练空域划到了福建地区上空，真是猖狂至极。

1958年7月中旬，美国下令驻远东美军进入戒备状态。7月17日，台湾当局也令其陆、海、空军进入特别戒备状态，并连日出动飞机对福建、广东沿海进行侦察，公然声称要“加速进行反攻大陆的准备”。

台湾海峡陡然紧张的局势，引起了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1958年7月18日，中央军委召开了有各总部、军兵种领导干部参加的作战会议。会议经研究确定，为了回击美蒋当局的公然挑衅，立即采取行动。一是空军进入福建；二是炮击金门。军委彭德怀副主席特别要求空军务必于7月27日进入福建、粤东沿海机场。

7月19日，在北京空军司令部召开了紧急作战会议，会上各航空兵部队指挥员纷纷请战，要求入闽参战，狠狠打击一下美蒋当局的嚣张气焰。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亲自确定：由聂凤智负责，立即组建福州军区空军指挥机关，并组织战斗力较强的航空兵部队进驻福建。

随后，刘亚楼宣布了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的编成，以及兵力如何展开等任务，并命令广空、武空、南空都全力支援。他特别强调：“如聂凤智需要，你们大家都要全力以赴。这个仗只能打好，绝不能叫敌人把我们撵出来！”他一刻不停地在会议室里走着，不时拿起“指挥棒”指点着地图。“如果前沿部队还不够，我就把我们整个空军都杀出去！”

聂凤智深深感到刘亚楼此刻的沉重。作为“前线司令官”，他也因而更感到自己一身而系全局担子的重大。这到底是在“和平”环境或已“和平”多年了的环境下所进行的战争啊！这不同于一江山，一江山不过是“小敲小打”，而且“进可攻，退可守”，当时之所以首先选中地处最北头的一江山，其中一重要因素就是考虑到“万一”失利的話，也还可以安然地退回到“大

后方”来。这也不同于朝鲜战场，朝鲜战场上空军毕竟唱的是配角。而这次聂凤智则唱的是主角，且全军、全国都在注视着，已建立的政权与和平生活不允許你有什么退路。

但聂凤智这人有个怪脾气，一面临真正的战争，他就会“狂妄”起来，极强的“好胜心”和“锋芒毕露”的个性也会“原形毕露”起来。他自知，建国以后还在不停地打仗，还是名符其实的“前线司令官”的，在众多耀眼的“将星”中，大概也是数得出的，而他聂凤智就是其中的一个。何况，为空军“入闽”之事，他已殚精竭虑地整整筹划了3年有余！这样的重担，理所当然地应该落在他聂凤智身上。

聂凤智表示“我们一定按照毛主席和军委的决定完成入闽的任务。困难肯定是有的，但我们会以最大努力克服困难，也相信一定能够克服任何困难。”

7月24日这天，聂凤智已被正式任命为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兼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

每到临战，聂凤智就像突然变成另一个人，出奇的冷静和镇定。部队是几天前就已开始行动的。由于3年多时间中已有一些“渗透”，加上计划周密，各指挥系统的开通都十分顺利和神速。聂凤智一进指挥所，整个作战指挥机器便开始运转起来。聂凤智精心设计并经彭德怀、刘亚楼多次审定和中央军委慎重核准的福建机场的设置是这样的：第一线，以晋江为中心，向北是惠安、龙田、福州，向南是漳州及粤东的汕头等，顺着海岸线南北联贯，先组成了一道严密的屏障；纵深上，晋江的背后有连城；第二线从浙江的黄岩开始，向广东的惠阳拉一道弧线，依次又有浙江的路桥、衢州，江西的樟树、新城，广东的兴宁、惠阳等。整个布局就像一张巨大而粗硬的大铁弓，只要一拉紧，它就会有一股连云裂石的合力。

聂凤智一面准备着边打边进，一面力争隐蔽接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要能争取，他就想“出其不意”。在军事上，“出其不意”是克敌制胜屡试屡验的不二法门。即使这么大规模的空中行动，聂凤智也是准备这么用兵的。

7月份，正值雨季，福建沿海地区更是连日阴雨霏霏。

27日，福建前线各机场浓云低垂，大雾弥漫。时近中午，天气稍有好转，聂凤智立即命令航空兵某部抓住时机，起飞米格—17歼击机33架。同时，命令另一支空军部队也起飞米格—17歼击机15架，向预定机场飞去。

为了隐蔽行踪，两个机群采取了低空飞行。一路上，所有飞机均保持无线电静默，以防止被台湾国民党军队的雷达发现和无线电窃听。

两支空军部队的转场行动进行得神不知、鬼不觉，蒋军毫无察觉。

29日，“蒋军”的4架F—48摇摇摆摆地窜入厦门上空进行侦察。他们还丝毫不知道我前线机场已部署了大量的飞机。

聂凤智毫不犹豫地命令汕头部队升空迎战。

当时，聂凤智负责指挥的是在浙江、江西、广东一线部署的全部参战部队，有从全国其他大区调来的，也有相邻的南空、广空以及海军航空兵。驻汕头的广空林虎部立即奉命派出4机迎击。这一仗“旗开得胜”，出奇地顺利，4机对4机，不但马上取得了胜利，而且还以3：0的大比分击落击伤了三架敌机，自己毫无损伤。

聂凤智不令漳州、惠安等机场飞机起飞迎战而让汕头驻军出击是有讲究



的。敌机往南去，飞向汕头方向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更主要的还是想隐蔽一下福建核心机场的实力。由于梯队开进，逐渐充实（受机场吞吐量的限制，不可能一下子就把前线机场全部灌满），其时，最前线的几个机场都还在继续进场，这当然要再“虚”一下。聂凤智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就作出了这一决断，这就不能不让人佩服他指挥上的得心应手。

果然，蒋介石上当了。国民党空军总部里一片惊呼：广东汕头驻进“共军”空军了！这时他们还不知道福州、龙田、惠安、晋江、漳州这些和他们只有一水之隔的大机场也都驻进了飞机呢！第二天，他们仍派出8架飞机，从三都澳开始由东向西“侦察”。这又是一次绝好的机会。我空军起飞拦截后，又很快击落了他们2架，击伤了3架，剩下的3架匆匆地逃了回去。

8月4日，航空兵某师第27团进驻漳州机场；8月6日，航空兵某师第3团进驻连城机场；13日，航空兵某师第46团、海军航空兵某师第10团进驻龙田机场、福州机场。至此，我军一线机场已部署6个歼击团，加上二线 and 待机位置部署的11个团，共17个团，装备米格—17和歼—5飞机520架，飞机数量和性能均超过国民党空军。这时敌人再想把我军“反”出来，已经只能是一个梦了。

8月23、24两日，前线炮兵对金门进行了毁灭性的炮击，毙伤了包括三名中将副司令在内的敌官兵600余人，不但打得金门“蒋军”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大扫了往日的威风 and 气焰。同时，也大大震慑了他们的空军，使其不敢出头支援作战。

当然，这些还只是小试锋芒，离真正的“解决问题”还远。聂凤智筹划和准备着更大规模的空战甚至是决战。

9月24日，在美国的怂恿和支持下，蒋介石发动了一场几乎等于是决一死战的大规模空战，一下子出动了一百几十架飞机，还用上了美国提供的最先进的响尾蛇导弹。这一突如其来的大规模出动令聂凤智有点吃惊，这样的规模在朝鲜战场上不足为奇，聂凤智第一次拿起话筒指挥，面对的就是敌人的一百多架飞机。可这儿到底不同，蒋介石毕竟是败亡政权，所占据的说到底只是台湾一隅之地，而美国也没有亲自上阵的迹象。在美军没有直接介入的情况下，对蒋军的这一规模，他实实在在有些估计不足。

吃惊并非慌乱，更非害怕。军事生涯中，慌乱和害怕不属于聂凤智。现在的这种局面是吓不着他的。聂凤智立即决定以绝对的优势压倒敌人，解决敌人，他以最快的速度命令各机场的飞机起飞迎击。

这是一次“全方位”的出动。要知道，我方总共500来架飞机散布在那一张弓似的“弦”和“背”的各个点上，其相互间的距离是相当大的。为了保证交战空域内兵力的优势，除第一线机场的飞机必须出动外，第二线如路桥、衢州、连城、惠阳等处的飞机也必须出动。由于距离之不同，到达晋江上空的时间也不同，于是演变成了一幅我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方向上源源而至、层层包围敌机的局面。这在蒋军是始料未及的，聂凤智本人思想上原本也无明显的“时间差”。然而在敌方指挥官的心目中却变成了一个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顾了那头顾不了这头，这批去了那批来，那批去了这批来，在时间和方位上都不留一点“空子”的真正“口袋战术”。

这一仗，当然又以我军的绝对胜利告终，敌机狼狈溃逃。

这本是一次应急采取的措施，收到的却是最佳效果。美国的《航空杂志》大吹特吹“共军”的“口袋战术”如何如何厉害。这消息传到苏联，从苏联

又转回中国，把彭德怀元帅乐得连忙打电话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聂凤智者老实地说，事先自己并无明确的“意识”，甚至认为是自己指挥上的一种“失误”，至少是一种算计上的“疏忽”，是一次“偶然”性的成功，“歪打正着”的巧遇。不过，从这次“成功”中，聂凤智倒真的悟出了一个今后可以好好研究和运用的“口袋战术”。

彭老总笑了。他最清楚为将之难就在于临机处置之果断和准确，打过之后又确实能够悟出其中的奥秘，从而“打一仗，进一步”。他止不住地鼓励：“歪打正着也好嘛！我们的许多东西不就是在偶然之中发现、总结出来的嘛！这‘口袋战术’的确值得好好研究总结一下。”

10月10日，国民党的“双十节”，敌人又组织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有400多架飞机出动的大空战。这一次规模虽然更大，但似乎已是强弩之末，呈现出垂死挣扎之状。聂凤智此刻心中有数，的确已有“先见之明”，一仗下来，当然还是我胜敌败，赢输立定。此役之后，福建沿海空域就大局已定，美军既不敢轻举妄动，蒋介石也无力抗衡，再也不敢派大机群到大陆上空侦察和袭扰了。人民空军一举夺取了海峡及沿海地区的制空权，取得了入闽作战的辉煌胜利。

#### 剑刺苍穹

“U—2”型飞机是由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公司于1955年研制成功并经过不断改进了的飞机，是当时技术最先进、性能最优异的高空远程侦察机。它具有两个绝技：一是飞得高，它的实用长为22870米，这个高度不仅超过了当时世界上任何一种歼击机的飞行高度，甚至超过了一般地空导弹的射程。因此，U—2飞机曾一度被认为是难以击落的。二是谍报本领强，它不仅可进行照相侦察，还可进行电子侦察。它装备有一台73—B巨型航空摄影机，如果在2万米的高度以飞行速度每小时800公里计算，续航时间为8小时，那么它出动一次就可侦察96万平方公里的面积。U—2飞机拍出的照片不仅清晰，而且具有立体感。如果在9000米高度拍摄，地面上人所看报纸的标题字经放大后清晰可见。凭它的飞行速度和续航能力，可以一直从台湾窜到我国西北，而后轻松地返回驻地，其危害当然是可想而知的。台湾空军从美国引进U—2飞机后，于1962年1月13日起开始频繁地进入大陆侦察，而我们性能最好的米格—19飞机也只能飞到1.7万多米，几千米的差距使我们的飞机只能望“空”兴叹。

当时中国唯一能够对付U—2飞机的是从苏联引进的性能有限的萨姆—2型地对空导弹。这种导弹是固定式或半固定式的，机动性能差，而且只有在飞机进入它的“有效范围”内才有可能将它击落。当时我军一共只有4个导弹营，自从U—2飞机侵扰后，根据其可能经过的路线，4个营一次又一次地改变“埋伏”地点，可是一次次都没有等到。最后，集中所有4营的力量，“埋伏”在西安附近，整整守候了3个多月，也没有打到。于是军委决定把导弹营摆到华东，要求聂凤智提供一切保障条件。积以往之经验，关键的问题是摆在哪里。南京军区所辖的范围很大，要想选择一个合适的地点还真不容易定下决心。

聂凤智命令情报部门立即把所有有关U—2飞机活动的资料整理出来，并根据这些材料提出一个构想。在情报部门和作战部门的精心准备下，根据每次U—2飞机的活动情况和规律，聂凤智发现在华东地区，U—2飞机有一个最常用的“进出口”——就是江西的向塘和浙江衢州之间的上饶一带。原来，

向塘属于福州军区空军，衢州属于南京军区空军，两个机场之间的“接合部”正是敌人认为的“共同防御”的薄弱环节。该型飞机的每次行动路线都是由美军情报部门精心制定的。他们或从福建切入，或从浙江切入，利用浙闽交界区的防空薄弱地段，很快从上饶附近窜入大陆，达成目的后又从这个“安全通道”出海，返回台湾驻地。聂凤智又周密研究了U—2型飞机的性能，从起飞时的拔高和返回时的降低高度，到这条航线有利于它向哪些方向机动，而后又反复论证了在这一带设伏的方案。报军委批准后，南京军区空军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并于1963年的10月底完成了导弹营的部署。地空导弹第1、2、3、4营，分别进驻江山、上饶、弋阳、衢州，由西南向东北，组成160公里的拦截正面，准备伏击进犯的U—2敌机。

11月1日，与导弹部队“埋伏”就绪仅隔一天，一架美蒋U—2型高空间谍飞机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经温州窜进大陆。它飞过三门峡，飞过信阳，飞过九江，直奔第2营设在上饶的阵地而来。当它进至距第2营阵地35公里处，第2营迅速打开天线，跟踪目标，发射导弹。一共用了8秒钟，就一举将U—2飞机击落。驾驶这架飞机的是国民党空军少校叶常棣。他是台湾空军有名的“克难英雄”，曾两次受到蒋介石点名接见，获得过“飞虎”奖章。在这次被击落前十几天，蒋介石还接见了。他。“当时，我已经看到海岸，满以为完成了任务，正准备出海下滑，突然听到轰的一声巨响，自己被甩出飞机……”叶常棣被俘后沮丧地说。11月8日，美国《时代》杂志刊载一篇题为《国民党空军：U—2和生日》的文章，不无幽默地把击落U—2飞机和蒋介石的生日联系起来：“上星期，在蒋介石大元帅过了76岁生日的第二天，北京宣布已在大陆华东某地上空击落了1架U—2飞机。”当时报道的“华东某地”，正是聂凤智花了多少心血研究论证而选定的上饶附近。

后来，在聂凤智亲自指挥下，由空军地空导弹第14营，首次使用国产红旗2号地空导弹，成功地反掉U—2飞机施放的电子干扰，又击落一架U—2飞机。我军先后一共5次击落U—2飞机，数量创世界之最。

## 拼命三郎陶勇

胡兆才

陶勇(1913~1967)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安徽省霍丘人,1912年1月出生。1929年4月,参加工农红军游击队。193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2年任红四军第35团连长、副营长、营长、副团长、团长,参加仪南、黄渠、宣达等战役。1936年任红9军教导师师长,参加长征和西路军作战。1937年参加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兼学员排长。1938年任新四军第1支队第4团副团长、团长。1939年11月,率部北上开辟扬州、仪征、六合、天长地区抗日根据地。1941年任新四军第1师第3旅旅长兼苏中第4分区司令员,率部参加丰利、大官庄、车桥等战斗。1945年1月,任新四军苏浙军区第3纵队司令员,率部参加天目山战役。1945年10月,任新四军华中野战军第8纵队司令员,率部参加高邮战役。1946年5月,任新四军华中野战军第1师副师长,率部参加苏中战役、涟水战斗、鲁南和宿北战役。1947年2月,任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司令员,率部参加莱芜、孟良崮、费县、沙土集、进军豫皖苏、平汉、陇海路等战役战斗。1948年参加豫东、淮海等战役。1949年2月,任第23军军长,率部参加渡江战役,解放杭州,尔后参加上海战役。6月返回杭州驻防。1950年10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副司令员率部赴朝作战。1951年9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代司令代政委。

1952年11月,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1955年10月,任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后兼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1967年1月21日被迫害致死。1955年被授于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 \* \* \* \*

在繁华的上海长乐路附近,有一幢美式小洋楼。1967年1月21日上午8点,一辆小轿车载着小洋楼的主人飞驰而去,主人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以后,每年1月21日左右,总有很多人纷沓而至,在小洋楼前驻足观望,有的在楼前脱帽致敬,有的则顿足痛哭,心痛欲裂地呼喊着自己的名字。这位主人,就是赫赫有名的海军副司令、南京军区副司令、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

陶勇是人民解放军中战功卓著的一员战将。他1929年参加革命后,转战南北,在红军、新四军和解放南中国和抗美援朝的数百次战斗中,屡建殊勋。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刚正不阿,坚持真理,敢于说真话,反对说假话。于1967年1月26日惨遭迫害致死,结束了他英雄的一生。噩耗传出,熟悉和了解他的人们无不悲痛欲绝,为纪念他,人们总是在1月21日左右,不约而同地来到他生前最后居住的这座小洋楼前,祭奠这位为中国人民作出巨大贡献的英灵,寄托哀思。

陶勇的一生,是血与火写成的历史长卷,他是雷电轰鸣般的传奇人物。让我们撷取他漫漫革命生涯中的几个镜头,来回顾陶勇将军的辉煌功绩。

### 奇特战争建功勋

1942年11月5日的黄昏,南京明故宫机场内,戒备森严。一架专机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徐徐降落。机舱里走出一位身着便装的小个子男子,他习惯性地摸了摸下巴下的山羊胡须,然后走下舷梯。在一群文武官员的簇拥下,钻进了停候在一旁的小轿车。轿车飞也似地驰向沙家湾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门口,一行人匆匆走进作战室,听小个子下达作战命令。

这个小个子不是别人,他就是战争狂人、日本国总参谋长兼陆军大臣东条

英机。他此行中国的目的，是部署在苏北通如启海地区实行“清乡”，以梳篦、拉网战术，向根据地分进合击，寻歼新四军主力。同时增设据点，搜剿新四军工作人员，加强伪化统治，清查户口，颁发良民证，编保甲，达到日本国长期统治中国人民的目的。

东条英机一落座，就问侵华日军总司令田俊六：“清乡已列入本军年度重点计划，而且在这两、三个月内，东京总部就此事下达了三道预备命令，不知总司令阁下准备如何？”

田俊六回答说：“一切准备就绪。前天，我和汪兆铭商量确定，将在苏南清乡的第61师团调往苏北清乡，第61师团是中国派遣军精锐，是雄鹰之师，加上汪兆铭的第32师、33师、34师，一共1.6万余人。另外，我派人从苏南运了600万根毛竹到苏北，在清乡区内筑起竹篱笆，分片分段围歼新四军。”

东条英机又问：“要保证清乡取得胜利，必须有明确的战斗口号，你们准备了什么口号？”

田俊六说：“口号是：半年活捉陶勇，一年消灭新四军！”

东条英机兴奋地站起来说：“很好，那就明天开始传达清乡计划，进行动员，一周后开始战斗，这是一场特殊的奇特战争，预祝你们旗开得胜。”

东条英机离开南京后的第四天，打入伪军内部的中共党员、伪第34师师长施亚夫，就将田俊六的清乡计划，派人秘密送到了新四军苏中军区司令员、第1师师长粟裕手中。粟裕立即报告了新四军军部后，马不停蹄地带着随员，来到第4分区，坐镇指导第4分区反清乡斗争。

一向严肃而少开玩笑的粟裕一见到陶勇，便说：“陶勇同志，你的名字在东条英机那里挂上号了，我祝贺你啊！”

陶勇露出笑脸，回答说：“承蒙东条英机看得起我，不过敌人情乡肯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你们第4分区成了人家众矢之的了，”粟裕严肃地说，“敌人的企图很明显，他们想在你们第4分区‘清乡’得手后，随即扩展到长江以北及整个华东抗日根据地。这次反‘清乡’斗争，关系到整个华中根据地的安危。我们不可大意，你有何高招？”

陶勇将和政委姬鹏飞、参谋长张震东讨论确定的军事部署和计划向粟裕和盘托出，他说：“从主力部队抽调大批骨干力量，充实地方武装，加强政治保卫队和锄奸队，分散在‘清乡’圈内，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区乡各级都及时编组了游击连、联防队，坚持‘区不离区，乡不离乡’的原地斗争；将大部分主力部署在‘清乡’圈外，寻找战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以策应反‘清乡’斗争。旅部率第7团由石港附近转移至花市街一带，并以第7团的一个营，伸至南坎、九门闸之间活动；南通警卫团第2营由骑岸镇中心区转移到白蒲边沿；如皋警卫团留少数部队在贫河附近，主力转移到掘港、南坎以北的地区；而东南警卫团则全部部署在‘清乡’圈内三余镇与三阳镇之间。”

“计划很好！”粟裕指着地图说，“敌人这次清乡特点是要依托公路大路，用汽车把士兵迅速运到各个据点，加强据点之间的相互联系支持。反清乡前，要动员民众把公路大路破坏掉，挖成水沟，让敌人的机械化无用武之地。”

陶勇点点头，他贯以雷厉风行而著称，第三天，当粟裕离开第4分区返

回苏中军区机关时，陶勇指挥第4分区军民掀起了反清乡斗争热潮。各县民兵、自卫队的广大群众拆桥、破路、筑坝搞得轰轰烈烈。有些地方因桥梁已破坏，粟裕多次绕道而行。他问破路群众怎么走，回答他的老乡们不认识他，都说：“你就碰鼻子转弯吧！”粟裕虽是湘西人，可是长期在外，各地土话也能听懂一些，他笑盈盈地自言自语说：“好，好！我们就碰鼻子转弯。”他心里暗暗称赞陶勇的快捷作风。

不久，日伪军对第4分区进行了“全面清乡”，近万敌伪倾巢出动，采取梳篦、拉网式战术，十几路向中心区分进合击，反复“清剿”，时来时去，飘忽不定，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同时，在“清乡”区边沿构筑封锁线，由天生港向北，经白蒲、丁堰，再向东沿串场河、经贫河、马塘、掘港、南坎，直到黄海边；又从天生港沿江经表龙港、永隆，直到寅阳镇，扎起了几百里长的封锁篱笆，封锁了第4分区29个区。在封锁线设立大小检问所150多个，碉堡、了望哨林立，彼此呼应，企图把抗日武装消灭在“清乡”圈内。

陶勇根据毛泽东军事思想，指挥部队在日伪间隙中灵活穿插，避实击虚，机动作战。当日伪开始“清剿”前夕，他指挥7团和南通警卫团，向敌后方及交通线进击，先后袭击南通、如皋公路上的重要据点唐家闸、启东重镇聚星镇，平毁古坝等据点；又在双甸到贫河、马塘到掘港、林梓至白蒲的公路上多次设伏，打击敌人。当敌伪深入我中心区后，他指挥南通警卫团即兵分两路，第1营、3营坚持在“清乡”圈内活动，第2营在“清乡”圈外平潮一带相机歼敌。东南警卫团一部主力，跳出“清乡”圈，抓紧整训，待机出击；第2、5、7连以班、排为单位，在“清乡”圈内坚持斗争。各地短枪队和区乡武装，深入敌伪盘踞的南通、天生港等城镇据点，严厉镇压伪“清乡”队员和特工人员，使日寇耳目闭塞，处处被动挨打。4、5两个月，第3旅进行主要战斗42次，先后袭击或攻克金沙、余东、六甲、悦来镇、麒麟镇、贫河、凤凰桥等7处据点，平毁日伪碉堡108座，沉重地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

日军对我主力和地方武装神出鬼没的出击，深感难以对付，惶惶不安。为此，他们请求上方为他们配备了一种特制的精巧、轻便、射击速度快、有夜间瞄准器、带有刺刀的96式机枪。他们便将这种武器视为神灵。当时，陶勇风闻日本天皇有令，部队如在战斗中无法脱险，必须将96式机枪的重要机件毁掉，不让落入新四军手中的消息后，立即向各级武装发出号召，开展一个缴96式机枪运动。尤其在秋季攻势中，战士们千方百计从敌人手中一挺又一挺地缴来。全分区军民在不到半年时间，就缴获了13挺96式机枪，超额完成了指标。日伪军在广大军民的政治攻势下，极度恐慌，悲观厌战，不敢分散兵力，放弃了不少小据点。

火烧竹篱笆，是新四军战史最辉煌的一页，也是陶勇对反“清乡”斗争的一大贡献。

1943年7月1日夜，是苏中第4分区军民最激动的时刻，火烧竹篱笆指挥部设在丁埭镇与掘港镇之间的小村内。300里封锁线沿线，围满了民兵、自卫队和农民，参加这次大行动的共4万余众。县团、区队和第3分区的部队分段警戒，随时准备痛击敢于出动阻挠破击的日伪军。陶勇和姬鹏飞、张震东不时地对着手表，当时针指向9时，陶勇对着电话筒，大声地向各部下达命令：“战斗开始！”

刹那间，300里封锁线上出现了第一片火光。随后，火光如星星之火，

迅速蔓延，一小时后，整个封锁线如一条蜿蜒数百里的巨大火龙，满天浓烟滚滚，人声鼎沸。这时，4万军民齐出击，敌伪军的巡逻队、检问所里的敌人见到如此浩大的攻击，只象征性地放上几枪，便争先恐后逃得不见踪影。

目睹敌人的狼狈逃窜，陶勇得意地摇着大蒲扇，那架势活象诸葛亮在世。他兴奋地说：“政委，这么大的声势，田俊六要吓出病来。”

“哈哈！”姬鹏飞仰天大笑道，“这声势，比七星坛诸葛祭风、三江口周瑜纵火的气派要大得多了。”

张震东接口说：“这叫不似三国胜似三国嘛！”

冲天火光染红了夜空。同时伴着锯声嘎嘎，斧声咚咚，气势宏伟壮观。

此役，共破竹篱笆350公里，毁茅竹400万根。田俊六惨淡经营了3个月，被陶勇领导的第4分区军民毁于一旦。

陶勇在反“清乡”斗争中，组织部队频繁出击，打得日伪军惊慌失措，一个个缩在据点不敢露面。一天，陶勇带着警卫员化装成商人，骑着自行车到九门闸侦察。当他看到街头巷尾到处张贴着：“陶勇小子，你敢出来到九门闸来吗？你如果来了，定叫你有来无回！”的标语，仔细一看落款是九门闸皇军小队队长门坂。又好气又好笑，他见四下无人，伸手撕下了标语，返回司令部，派人把旅直特务营的陈广德营长叫来。

陈广德不知何事，匆匆赶到后，陶勇拿出标语递过去。陈广德看罢，不禁气上心来：“这家伙胆大包天，竟敢向陶旅长挑战，必须教训他一下才行！”

陶勇哈哈大笑说：“你真聪明，交给你一个‘卸门坂’的任务，你在三天之内办成这事，你有把握吗？”

“首长放心！”陈广德打着包票，向陶勇敬了个礼，充满信心地转身要走。

“你先别急，我的话还没说完呢！”陶勇从警卫员的子弹夹中取出20发驳壳枪子弹递给他，说：“我叫你‘卸门坂’，20发子弹作奖励！”

陈广德别提有多高兴，他再一次立正敬礼。陶勇拍拍他的肩说：“别太高兴，如果你完不成任务，我要收回这些子弹的。”

陈广德望着陶勇嘻嘻笑着，然后告辞了陶勇，率一个连向九门闸奔袭去。近九门闸时，陈广德略施小计，派人化装成老百姓，到九门闸向门坂报信，说陶勇昨天夜里住大同镇，今天上午还没走。门坂一听，高兴得手舞足蹈，立即集合队伍，向大同镇奔袭。当他们走到大同镇附近的青纱帐，突然枪声四起，战斗进行半小时后，陈广德歼灭了鬼子14名，门坂惊慌失措，脚部受伤流血，三个小鬼子从老百姓家找来一块门板，把只剩一口气的门坂抬回了九门镇据点。九门镇的百姓们见门板上躺着奄奄一息的门坂，不禁拍手称快。

1944年5月15日，已是苏中第4分区反“清乡”斗争一年半后，东条英机从东京来到南京，前来迎接的已不是田俊六，而是冈村宁次。田俊六因“清乡”失败，已被东京总部调回日本。

淮海战役歼敌七万

1948年10月底，华东野战军各路大军正沿公路、大路和阡陌，从济南、兖州、济宁、临沂、曲阜等地，浩浩荡荡向南开进。他们穿过平原上一个一个村庄，涉过黄泛区的一条条河流，向淮海战场推进。陶勇率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两万余人，从兖州出发，向黄百韬兵团驻地新沂奔袭。队伍中歌声嘹亮，欢声笑语不断。陶勇时而奔前，时而奔后，不断地鼓动指战员们。他在第11师第32团队伍旁问张排长：“小张，你对参加淮海战役有什么想法？”

“当然是很激动、很光荣啦！因为这次大战是空前的，它不但决定中原、华东的解放，还对全国革命的胜利起着决定性作用。”小张说，“陶司令，这么简单的问题你问我这个老兵太没劲，你问问新兵还差不多。”

“好啊，嫌我问得太简单了，”陶勇眨眨眼睛，想了一下说，“那我就问一个复杂的。我问你，党中央毛主席为何要发动这次战役？”

张排长一拍胸脯，头一昂说：“这个问题也难不倒我，今年9月，党中央、毛主席在平山县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提出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在5年内打倒蒋介石的总任务。会议还规定了各野战军的歼敌任务，要求华东野战军担负歼敌40个旅的任务，要攻占济南、苏北、豫东、皖北若干大中小城市。粟司令在9月24日济南战役即将胜利时，向中央建议举行淮海战役。9月25日，党中央批准了他的建议，歼灭徐州刘峙集团。”小张说罢，敬礼说，“陶司令，报告完毕！请指示！”

陶勇满意地说：“回答得很好，你将来一定是当政委的料子！”

小张伸伸舌头，做了个鬼脸说：“俺可没当政委的野心，就想打败了蒋介石早点回家看俺娘去。”

陶勇又到了第10师第29团第3连，他问金连长：“你们连打淮海有什么口号吗？”

金连长说：“我们提出了三硬三比的口号，三硬是：头皮硬（意志坚），脚底板硬，打仗硬。三比是：比行军互助，比团结巩固，比纪律齐整。在这个口号下，各班之间，各组之间，各人之间，都订出条件，开展竞赛。现在是实行诺言的时候，大家谁也不甘落后。”

部队中有人说：“陶司令，讲个笑话给我们解解乏吧！”

陶勇稍加思索，点头应允说：“好吧，你们都好好听着。”说罢，他讲了一个又一个，逗得大家笑声不绝。

部队不分昼夜，轻装前进，陶勇也不分昼夜穿行于各部队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11月3日，他们抵达驼阴以南的孟家渊，机要员跑步到了陶勇面前说：“刚收到野司字13号作战命令，请陶司令过目。”

陶勇接过电报便看，命令中说：第4纵队、第8纵队由第4纵队陶司令、郭政委指挥，应以主力一部首先袭击邳县、官湖之敌，尔后即进击徐塘集、运河车站。主力应由马头至纪集段沿沂河两岸开进，由官湖以南、纪集、猫儿窝以北之间地区，由东向西分割围歼运河车站及炮车地区守敌，得手后即沿运河两岸及官湖、炮车、窑湾沿河以东地区部署阻援。该部应首先集中主力及炮兵，攻歼运河车站守敌，务求速战速决，以便控制阵地，争取阻援时间，保障主力围歼敌第7兵团之作战。

陶勇看罢，叫号兵吹号，命令各部队就地宿营休息，他则召集第4纵队领导开会传达野司命令。接着又向各师下达作战命令：

第10师：首先以一部兵力围歼岔河之敌。得手后，继续向加口圩方向挺进，并查明至滩上镇一线之敌情、地形，主力由头道河、二道河渡口经邳县以南渡河，攻占徐塘集。一部则在加口圩至滩上一线，沿运河东岸构筑工事，阻击可能东援之敌。并以一部兵力渡过运河，向碾庄圩、曹八集方向侦察警戒。

第12师：首先以一个团（附纵队警卫营）由龙凤哑渡口渡河攻占邳县城。得手后，以警卫营向官湖警戒，主力直插运河车站，并以精干部队切断运河车站与铁桥之联系。攻歼该点守敌后，以一部兵力控制车站西之铁桥，主力



围歼大榆树之敌。

第 11 师：首先以一部兵力由汤楼渡河，攻占小黄家、白龙埠一线，得手后，以一部严密监视官湖之敌。并乘机以主力攻歼官湖守敌，一部在官湖以东渡河南下，进至上下二郎庙一带，切断炮车至运河车站之联系，保障第 12 师左翼安全。尔后全师沿铁路以南西击，配合第 12 师围歼大榆树之敌。

各师接令，于 11 月 6 日出发，投入战斗行动。淮海战役拉开序幕。从东起海州，西至商丘的 700 多里陇海线上，华东野战军对徐州刘峙集团发起了强大攻势。

陶勇率部队兵分三路杀向敌人。11 月 7 日，第 10 师第 28 团进占加口圩，第 12 师第 35 团攻占邱县，守敌东窜。8 月，左路第 11 师自三面逼近官湖；中路第 12 师第 35 团在敌炮火下强涉邳县以东大河，于城东沿歼敌第 9 军一个加强连，进至连燕又歼敌第 9 军一个连；右路第 10 师向滩上镇攻击前进，一部由邳县以西渡河南击。

此时，担负攻击黄百韬兵团的华东野战军 4 个纵队，昼夜不停地猛攻，黄百韬兵团插翅难飞。陶勇和郭化若坐在电话机旁指挥。11 日上午，第 10 师攻击大兴庄，第 11 师攻击秦家楼，第 12 师攻击陈庄。连攻两天，第 10 师进展甚微，陶勇急得团团转，一口接一口地猛吸香烟，眉心结成了一个深深的“川”字。这时，一个同志说：“大兴庄敌人一个营，第 10 师第 28 团攻了两天都没攻下，我建议撤了第 28 团团长的职务。”

“不行！”陶勇摆摆手说，“第 28 团的战斗力很强，这次可能是我们对敌情不明造成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认为要下令停止攻击。先查查敌情，再找内部原因。”说罢，打电话给第 10 师师长杜屏，要他查明敌情。

两小时后，杜屏来了电话，他对陶勇说：“大兴庄是黄百韬兵团部所在地碾庄圩设在东北侧的一个重要据点。敌人在此部署了一个加强团兵力，我们误以为只有一个营；并且判断敌人是逃窜的，慌乱的，工事不会有多少。其实敌人是有准备的，他们修筑了完备的野战防御工事。其二，是我们兵力运用不当，违背了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军事原则，只用一比一的兵力。细想起来，这都是与我的急躁、欠思考有关。”杜屏顿了顿，接着说了调整部署，认真准备两天再攻击的打算。

陶勇说：“你这个想法很好，我们俩是不谋而合嘛。我同意你的建议，就这么定了。”陶勇当机立断说，“纵队炮兵营的两个连队也配属于你们，一定要将大兴庄给我拿下来。”

杜屏放下电话，召开了师、团干部作战会议，共同分析了敌我情况，决定分批组织干部到敌前沿反复观察阵地，侦察敌情，研究部署。经过侦察，不但了解了敌人在大兴庄配有强兵，而且设防完善，构筑了子母堡群，设置了鹿砦，其地势也高出地面十来米，周围是开阔地，易守难攻。为了保证拿下大兴庄，他们决定投入全师兵力。

具体部署是：一、确定第 30 团由北向南担负主攻任务；第 28 团从大兴庄的东面往西打；第 29 团从西北往东南攻，负责切断敌人往西的退路，以此保证第 30 团的中央突破。二、组织步炮协同，研究摧毁的目标和如何搞好步炮协同动作。三、进行深入动员，各团仔细地挑选和组织好突击队。

准备就绪，14 日傍晚，刚刚拉下夜幕，进攻大兴庄的战斗就开始了。炮兵按预定计划抵近射击，炮弹呼啸着向敌阵地飞去。刹那间，大兴庄地动山摇，烟雾滚滚，枪声、炮声淹没了一切。炮火摧毁了一座座敌堡和主要工事，

并压制了敌人的火力。第30团第5连的爆破组，迅速跃出战壕，勇猛冲杀，插入敌阵，用炸药包把地堡的敌人送上西天，打开了突破口。敌人在纵深炮火的支援下，集中大量兵力在突破口拼命反扑。战士们顽强战斗，用集束手榴弹与敌人进行殊死的战斗。从黄昏一直战斗到午夜，连续打垮了敌人多次反扑，巩固和扩大了突破口，保障了主力及时投入战斗。15日拂晓，战斗结束，大兴庄为第10师攻占，敌第64军第467团全部被歼。

19日，总攻碾庄圩黄百韬兵团部，守敌大部被歼，残部逃入尤家湖。粟裕亲自打电话给陶勇，要陶部不惜一切代价，攻克尤家湖。

陶勇受命，立即向各师下达任务，要求当晚发起战斗，不许放跑一个敌人。夜幕降临，陶勇来到担任主攻任务的第29团，亲自动员。晚8时，攻击开始，战斗一直进行到第二天拂晓，第29团攻占了尤家湖北侧两个集团堡群，为总攻突击扫除了障碍。下午4时，陶勇令第10师、第11师和第12师的第34团发起攻击。这时，粟裕给陶勇派来4辆坦克助战。陶勇要求步兵、炮兵、坦克兵三者协同作战。顿时大炮轰鸣，坦克威风凛凛地向前推进，几百名步兵紧跟着坦克向敌阵冲去，激战3个小时，攻占了尤家湖，俘虏第64军军长刘镇湘。22日黄兵团被全歼，取得了淮海战役的第一阶段胜利。陶部以伤亡5000人的代价取得歼敌两万的伟大胜利。

第一阶段战斗结束后，淮海战场敌人的态势形成三大块：中原野战军将黄维兵团围困在双堆集；蚌埠的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企图北援黄维兵团；徐州“剿总”企图率部南下，增援黄维兵团。粟裕根据总前委孤立黄维、歼灭黄维的意图，命令陶勇统一指挥第4纵队、第11纵队、第12纵队和渤海纵队，组成东路阻援集团，控制徐州东南的水口、二陈集、关帝庙一带阵地，阻击徐州之敌南援。粟裕布置完任务，望着陶勇问：“老陶，给你压担子加任务，是形势所逼啊，你有意见吗？”

陶勇回答说：“第一次指挥大兵团作战，没经验，能不能胜任，心里没数，我就试试看吧。”他想了想说，“根据大兵团作战歼敌多，自己伤亡也多的特点，我们想建议各纵队，加强随俘随补，增加自己的新鲜血液，才能使连队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和战斗力。而且，被俘士兵，多数是穷人出身，是被拉壮丁而加入国民党军的，经过短期教育，懂得为谁当兵为谁打仗，很快会转变立场的。”

粟裕双眼一亮，兴奋地说：“你这个建议很好，解决了部队伤亡大缺员大的困难。我想在你提的随俘随补基础上，加上随补随战，这就叫随俘随补，随补随战方针。这就全面了。我马上通知各纵队贯彻这一方针，经常保持满员，战斗力饱满。”

陶勇受命后，为让兄弟部队获得休整时间，他先命令本纵队第10师开赴褚兰、营里一带进行防御作战。中午，第10师一到，敌第70军第96师就在8辆坦克掩护下，向褚兰、营里猛攻，遭第10师顽强阻击，不敢越雷池半步。徐州之敌见南援无望，即令“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率第2、13、16三个兵团，放弃徐州，南下增援黄维兵团。粟裕命令陶勇统一指挥第11纵队、第4纵队、第12纵队和渤海纵队，从潘塘镇、褚兰、朝阳集地区，经徐州以南向萧县、永固方向急进，追歼徐州之敌。

陶勇接到命令，迅速组织4个纵队，采取多路、多层的尾追和平行截击、迂回拦击相结合战法，向西猛追。他提出“勇猛追击，连续作战，活捉杜聿明”的战斗口号，第一天急追100余里。追击中，陶纵缴获美式吉普车。陶

勇和政委郭化若、参谋长梅嘉生同坐一车，车开到哪里，陶勇的声音便传到哪里：“同志们，加油追啊，不让敌人喘一口气，快追啊，加油啊！”

敌人被紧追不舍，惊慌失措，沿路溃逃的敌军队伍被陶部打得狼狈不堪。陶勇指挥部队追上一股逃敌后，命令部队立即插入敌阵，使其首尾不能相顾，乱成一团，然后逐个歼灭。追击途中，连续消灭十几股敌人，加起来有3、4万人。12月4日，陶纵与兄弟部队将杜聿明集团的三个兵团30万人，围困在永城东北纵横不到20里的地区。

从12月6日起，陶勇根据总前委提出的三面围攻，一面坚守的战法，对杜聿明集团实施轮番攻击，加上天寒地冻，开展强有力的瓦解敌军工作，敌军心不稳，不管在早晨、晚上，还是在严寒的深夜，总有三三两两或成群结队的敌人跑到解放军阵地投诚。

12月15日，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说，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一部全歼了黄维兵团。中央军委为稳住华北傅作义集团，命令淮海前线我军，对杜聿明实行围而不打方针。华野做出部署，以8个纵队严密包围杜聿明集团，进行战场轮番休整，以7个纵队在夏邑、永城、滩溪口等地进行战备休整。陶勇纵队担负包围任务，陶勇和郭化若根据上级意图和任务，要求各师在休整期间，抓紧做五项工作：

第一、恢复和整顿战斗组织，提拔补充干部，充实基层。尤其抓紧对俘虏兵的教育，教育一批，成熟一批，迅速补充到连队一批。

第二、深入进行形势教育，广泛开展立功创模运动，通过多种形式教育部队认清形势，鼓舞部队斗志。

第三、广泛开展群众性的瓦解敌军工作。用60炮和弓箭，将大批传单撒向敌营。每晚到前沿阵地，用喇叭向敌人广播形势和喊话。每逢开饭，组织战士向敌人阵地丢馒头，战士们称为“钓鱼”。以各种形式鼓动敌人投诚。

第四、召开“诸葛亮会”，发动群众献计献策，摆沙盘，论战法，反复讨论总攻方案和对付敌人坦克、地堡、毒气等具体战法，并针对敌人的作战特点，进行阵前练兵。

第五、进行近迫作业，把坑道挖到敌人鼻子底下，而且坑道挖得纵横交错，既能攻又能守。我军向敌人射击一枪一个准，敌人还击却找不到目标。

经20天休整，陶纵精力旺盛，1949年1月7日，与兄弟部队一起向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总攻一般地说，都是选择黄昏时刻。可是，陶勇却与众不同，他根据敌人夜间紧张睡不好，早上睡不着的特点，建议上级于拂晓时发起总攻。上级采纳了他的建议，收到意外的奇效。拂晓时分，解放军万炮齐轰，炮弹似狂风暴雨，一簇簇地倾泻在敌人阵地上，鹿砦炸翻了，地堡摧毁了，刹时间敌阵地变成了一片火海，浓烟四起。此刻，各团队随着呼啸的炮火迅速出击。陶纵与坦克密切协同，向东及东北攻击。在密集的炮火支援下，加上利用交通壕，部队似利剑钢刀，插入敌阵，攻占了前平庄、郭庄、谢庄、花庙等地，逐步向陈官庄逼近。

陶勇在望远镜中观察时，发现一个问题，他看到随着包围圈逐步缩小，敌人的防守更加严密，我军总攻面也愈来愈小。这对解放军是不利的，因为地区狭小不利兵力展开，又不利我军密集靠拢。而敌人则可利用炮击和飞机轰炸，造成我方不必要伤亡。陶勇立即向上级建议，采取轮换对敌攻击，他认为两个拳头轮番出击，要比一齐捶打更有劲，这样既可使部队得到休整，消除连日作战的疲劳，又能更有效地打击敌人。果然，1月10日拂晓，陶纵

的第12师第35团首占杜聿明集团驻地陈官庄。这时，各师各团向陶勇报捷的电话铃声不绝。下午，第11师政治部陈茂辉打电话说，他们师在张老庄抓到一个名叫高文明的俘虏，他自称是第13兵团军需官，却说不出第13兵团机关几个处长名字。陈茂辉告诉陶勇说，高文明衣着考究，别着派克钢笔，戴着进口防水游泳手表。

陶勇听到此时，不由心中一愣，杜聿明至今还没抓到，这人是不是他呢？一旁的郭化若接过电话，要陈茂辉立即将这个“高文明”带到纵队司令部。郭化若和杜聿明是黄埔军校同学，带到纵队司令部，这个“高文明”的问题就解决了。

两小时后，“高文明”被押到了。郭化若上前笑着打招呼说：“你不是杜聿明吗？什么时候改名叫高文明啦？”

陶勇明白了，他上前递给杜聿明一支香烟，笑着说：“请坐，请坐，你们俩是老同学战地重逢，叙叙旧吧！”

杜聿明知道瞒不过去了，他接过香烟，面部的表情十分尴尬。面对同学和对手，他一时不知说什么，低着头一个劲地吸烟。

陶纵在历时65天的淮海战役中，歼敌72863人，其中俘敌58018人，仅俘虏少将师长高级军官就有16名。战前陶纵只有两万人，战后增加到5万余人。

进杭州在金钱美女面前不动心

1949年春天，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纷纷南下，饮马长江，拉开了渡江战役的序幕。

这时，陶勇的第4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3军，陶勇任军长，卢胜为政委，梅嘉生为副军长，刘文学为副政委。2月18日，第23军在陶勇率领下，离开峰县南下泰州。

泰州地区，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新四军根据地，陶勇和第4纵队的老同志曾在这里战斗过。乡亲们听说陶勇来了，纷纷涌上大路，夹道欢迎，争着把部队拉回家住。

有个白胡子老大爷，拉着陶勇的手，左看右看，一迭声地说：“没变，没变，还是老样子。”他激动地说，“乡亲们可想念你们啦，这回一定要多住些日子，养足精神打过长江去，活捉蒋介石啊！”有个老大娘拉着儿子，对陶勇说：“陶司令，我把他交给你了，让他跟你打到江南去，不立功别让他回来。”

陶勇抹去挂在腮边激动的泪水，对乡亲们说：“大爷大妈大叔大婶们，我们第23军的指战员大部分是苏中子弟兵，是喝苏中水长大的，我们一定不忘苏中之情，打过长江去，乡亲们就等着听我们的好消息吧！”

陶勇向乡亲们挥手告别，率部队继续向江边开进。部队到达江岸，陶勇把部队安置好后，领着团以上干部到江边察看地形。

时值早春，寒意未尽，劈面扑来一阵阵冷冷的带着腥味的江风。由于这里地处长江下游，水面宽阔，迎着江风望去，眼前水天一色，波翻浪涌，气势磅礴，确实给人以“江天一览”之感。

陶勇透过望远镜，可以清楚地看出敌人沿岸密布着的地堡掩体的轮廓：在一些地段上，不断有人影在晃动，那是敌兵正驱赶着民工加紧抢修工事。陶勇想，在那江堤的后面，那纵深的村镇林木间，不知还有多少明碉暗堡、炮群、坦克隐蔽着呢！敌人称之为“固若金汤”的立体防御，虽不是他们自

吹的那样牢不可破，却也不能等闲视之啊！

返回的路上，陶勇提醒大家说，这次渡江不同以往。过去，沿江只有敌人布设的零星据点，一个偷渡就能摸过去了。比如抗日战争时期，陶勇就率部队四次过长江。而此次却大不一样了，敌人设防坚固，有天然江水作屏障，有江堤掩蔽下的地堡群、炮群。头上还有飞机轰炸扫射，指挥稍有疏漏，行动稍一迟缓，就有可能导致战斗力大部消耗在江中。况且，渡江作战不比在陆地上，陆地上无论敌人设防有多坚固，只要部队有一股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拼命精神，讲究战术，就能攻破。

当晚，陶勇回到驻地，在老乡家的一所土房子里设立了军指挥所，展开一系列渡江准备工作。首先进行渡江训练。为了提高部队在江里行动的速度和作战能力，他根据渡江登陆作战的特点及我方只能以帆船为渡江工具的情况，针对薄弱环节进行练兵。战士们绝大部分来自老解放区，家在北方，“旱鸭子”多，便组织大家反复进行上下船、过独木桥、走晃板等等练习，并且开展抓虾摸鱼的比赛活动。战士们不顾天冷水凉，在江水里滚，泥滩上爬，练得热火朝天。从而解除了一些同志对江情的顾虑，熟悉锻炼了水性，掌握了乘坐帆船等方面的知识。苇滩上淤泥深，有的战士在训练中陷掉了鞋子，被芦苇茬扎破了脚，干部们动员战士们把鞋口接上布，使鞋成靴状，紧紧扎进绑腿布里。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旱鸭子”变成了“水鸭子”，不管在船上还是水里，大家都能行动自如了。

陶勇在几次检查部队演习抢滩登陆冲击时，发现不少战士的鞋子陷入淤泥里，有的离船登岸时，脱掉鞋袜，赤足冲锋，脚被石头、荆棘刺破，鲜血直流。陶勇想，此事不解决，就会影响部队的战斗力。他派人将后勤干部召来开会，商量解决办法，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终于找到了办法：决定用旧布袜做成半开连式鞋袜，与鞋联结缝紧，打进绑腿内。从此，在泥泞中抢滩登陆的指战员们不用担心陷落鞋子了。通过一系列紧张的临战演习和准备，陶勇向粟裕报告：我军渡江作战，已准备就绪，待命行动。

1949年4月21日19时30分，陶勇指挥第23军冒着敌人炮火开始渡江，顷刻间，如箭离弦，千帆齐发。到23时，全部过了江。陶勇手持报话机，与3个师保持联络。22日，在武进以北歼灭敌第54军第291师。23日，分左右两路昼夜兼程，直取金坛、溧阳。中午，第69师师长谭知耕报告说：“军长，我师占领金坛，歼敌200余人，据俘虏说，敌人逃到溧阳去了。”

“快追！”陶勇大声命令，“晚上一定要赶到溧阳！”

报话机又响了，第68师报告说，他们在金坛白培镇歼灭第52军一个营和一个保安旅，俘敌800余人。

陶勇不断催促部队快速追歼逃敌。晚上，谭知耕报告，第69师占领溧阳城，俘敌9000人。接着第67师报告，在张渚歼敌3000余人。

24日拂晓，三野副政委谭震林打电话给陶勇，告诉他说，杭州守敌欲弃城南逃，要第23军占领杭州，并任命陶勇为杭州警备司令。

陶勇立即命令3个师向杭州挺进，并命令第68师为先头部队，迅速占领杭州，占领广播电台、监狱、法院，保护钱塘江大桥和市内重要工厂、设施。他紧跟在第68师后面，到达瓶窑，突然部队停止了前进。陶勇立即赶到前面，师长张云龙汇报说：“前面一条几百米宽的小河挡住了去路，正在设法架桥。”

“要快点！”陶勇一边下令，一边观察，他突然发现头顶上有根细细的电话线横过空中，直指杭州方向。他略一思索，下令说：“赶快利用敌人的

这根电话线，把电话接上，我要同杭州通话！”

电话接通了，对方一阵慌乱的吵嚷后，“喂！”了一声，出现一个傲慢的声音。陶勇大声地说：“我是陶勇，你是谁？”

“啊！”了一声后，里面传来了小心轻微的声音，“我……我叫督导。”对方听到是赫赫有名的陶勇，口气显然软了下来。

没想到，这根小小的电话线连到了敌人的公安机关，巧极了。陶勇眉锋一扬，大声说：“我知道，你是杭州公安局局长。你听着，不许破坏人民的城市和工厂，你要尽力而为，加以保护，立功有奖，否则，罪加一等！”

“是……是，我一定照贵司令的话办。”

放下电话，陶勇轻轻地嘘了口气，对大家说：“城里敌人已经开始退却。你们要立即带部队上去，抄小路前进。你们跑得愈快，敌人破坏的时间就愈少。”

时间不允许摇橹过河了，张师长带上侦察连和部分部队游过河去，踩着羊肠小道，插到了拱宸桥。

陶勇到了杭州，第一件事就是派第68师政委陈茂辉占领广播电台。天亮时刻，陶勇将3个师干部召集开会。确定第68师担任市区警备任务，第67师担任杭州外围警备，第69师担任西湖和钱塘江大桥警备任务。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怎么样，还热闹吧？”陶勇见到陈茂辉便问。然后，又严肃地说，“别光顾高兴，一切才刚刚开头，任务还重着呢。首先杭州解放了，百废待兴，社会治安就是个大问题。另外，地下党组织内部也难免鱼龙混杂。这些都要我们领导群众去解决，一定要解决好，要让杭州在我们手中变得更加美丽，象个人民的城市。”接着，他又说起一些存在的问题，如虽然国民党军队闻风而逃了，但城里还有少量反动武装，并且有点“青红帮”的味道。这些虽都是杂牌军，每支人马不多，头衔却不少，什么参谋长、司令的都有，手里的枪炮也不坏。国民党军队败出杭州后，他们抢先占领了好房子、好地方。解放军入城后，他们仍不放弃这些“风水宝地”，意欲与解放军分庭抗礼。另外，他还提出，“明枪好躲，暗箭难防”，内部还会有坏人捣乱的，更不可轻视麻痹。

不出陶勇所料，第二天，军部门口来了一样又一群不三不四的人。有的自称是“地下先遣军”，有的说是“江南人民义勇军”，要同第23军谈判共同接管杭州。

陶勇在屋里一面观察门口的情况，一面思考对付的方法。考虑成熟了，他信步走出门外，大声地说：“我就是杭州警备司令陶勇，你们要求谈判，可惜我今天公务在身，你们还是明天再来吧！”

来人陆续走了，门口的喧闹声停了下来。陶勇立即派出人去，对杭州的种种杂牌军进行了周密的调查，摸清了底细之后，他心中有数了。第二天上午，那些人果然都来了，他们有的还带着枪。陶勇接待了他们，并严肃而坚定地对他们说：“人民解放军离不开人民的支持，但人民中成分复杂，我们的依靠对象只能是工人和农民。杭州只能是解放军接管，其他人一律不得介入。为了人民的安全，同时也为了你们本身的安全，请你们统统放下武器，回去随时听从政府的安排。”

听了陶勇的话，那些人愣了一会，相互对望，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乖乖地放下武器走了。

陶勇常教育战士，进了杭州不要在花花世界中迷失政治方向。杭州，的

确令人销魂。湖光山色，固然楚楚动人，叫人乐而忘返。而那珠光宝气，更会让人眼花缭乱。解放军入城后，蒋介石、宋美龄的行宫，资本家的店铺、仓库等地方，都是无人之境。走近一瞧，那满盈的财宝，有点象阿里巴巴找到的强盗的山洞，琳琅满目；绫罗绸缎，金银玉器，俯拾皆是。单说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陈仪，官不到极品，而他在杭州的一个店铺，却摆着美式收音机1000多台，各种手表、镯子、金币及玉器、珍玩，多得数也数不清，价值数十万。这些都是他们搜刮来的民脂民膏。现在已是人民的财产，要受到保护不被侵犯。解放军入城前，陶勇对部队进行了严格教育，不准占房子，不准拿东西，从军长到士兵，都一丝不苟地执行。

陶勇和陈茂辉住在资本家的小洋房里。这洋房上下4间，座落在伪法院的旁边。资本家已经出走了，只留下一对老年夫妇管理房财。房间的陈设精致玲珑，床更是别具一格，推着能跑。陶勇和陈茂辉一人睡沙发，一人睡钢丝床。可是到了半夜，陶勇叫了起来，他说：“陈茂辉，陈茂辉，你怎么一躺下就睡着了，我咋就睡不着呢？唉，我们这些穷光蛋，享受不了资本家这份清福，我还是睡地板吧。果然，他一躺在地板上，便呼呼大睡了。

第二天一早，他们被隔壁盥洗间传来孩子气极浓的叫声所吵醒：“好香啊，好香啊！”

陶勇闻声跑去，原来是警卫员在叫，他看到这里摆着各式色彩的香水，都是法国货，红、黄、蓝、绿，煞是好看，好奇心驱使他拧开一瓶，顿时香味四溢，便情不自禁地叫了起来。

“什么香不香的，快放下！”陶勇唬着脸说，然后转过身对管房子的老头说，“老先生，我的警卫员动过香水了，对不起，你快把它们收走吧。”

这位老先生察颜观色，心中已十分崇敬这位战功显赫、为人师表的解放军军长了，他诚恳地说：“长官，你用吧，那就是用的。”

“我军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老先生，你的心意我领了，但香水我们是一定不用的。”陶勇也很诚恳地回答。

上行下效，全军在陶勇的带领下，纪律严明，不论是在行宫里站岗，还是在仓库里放哨，不论是白天还是夜晚，即使只有一个人，大家都能够面对耀眼的财物不动心，不伸手。经解放军保护的地方，未丢失一分一毫，曾多次受到谭震林的夸奖。

第23军指战员们在陶勇的教导下，在金钱面前不动摇，在美女面前同样经得起考验。进驻杭州不几天，兄弟部队攻下金华和诸暨后，南逃的伪人员家属、姨太太们无路可走，又倒流回到杭州，不少明娼暗妓混杂其中。一时间，杭州成了大收容所，吃饭难，管理更难，只得暂让她们在城隍庙里安身。可是，那些明娼暗妓能安身，却不能安分，照样干那些风流情事，有的见了战士，也嬉皮笑脸，暗送秋波。但是战士们从不动心，任凭她们如何甜言蜜语，卖弄风情，就是不动半点邪念。娼妓们费尽心机看看勾引不成，只得叹息着，摇头走开。人民群众赞扬战士们是铁打的英雄汉。

#### 浴血奋战在朝鲜

1950年10月5日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野战军第23军军长陶勇，身着整齐的军装，神采奕奕地来到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办公室门口，轻脆地喊了一声：“报告！”

这时，屋内立即传来亲切的答话：“是陶勇吧，快请进！”

陶勇推门而入，这时陈毅站起来说：“陶勇啊，你知道我找你干什么

吗？”

陶勇低着头，极不情愿地回答：“还不是为那兵团副司令的事！”

事情是这样的，半年前，中央军委任命陶勇为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副司令员。可是，陶勇不愿意，因为陶勇的第23军前身，是从1939年的新四军苏皖支队发展而来的。这支队伍历经十余载战场风云，番号左变右变，队伍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转战华东战场，屡建奇功，业绩昭昭。陶勇从苏皖支队司令员到23军军长，与这支部队结下了深厚感情。此时，上级却要他离开23军，他怎么能舍得放下这段深情。因此，他曾多次向上级请求，不当兵团副司令，要亲自率领这支部队解放台湾，为祖国的统一贡献一份力量。

陈毅看着陶勇一脸的不悦，理解但却十分耐心而严肃地说：“陶勇啊，我知道你与23军有生死之情，所以才迟迟不肯升职就任。可是，你知道吗？形势发生了变化，美帝国主义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畔，毛泽东主席命令9兵团赴朝作战。为了保家卫国，你必须立即去9兵团就职，发挥你这个虎将的虎威，打好出国第一仗！”

站在一旁的粟裕插话说：“陶勇啊，陈总和我知道你在荣誉和待遇面前从不伸手。但是，当兵团副司令也是军队建设的需要，何况9兵团赴朝作战命令已下，希望你协助宋时轮打好出国第一仗，为第三野战军争光，为中国人民争光！”

粟裕的话刚一说完，陶勇的脸色已由阴转晴，听说去朝鲜打仗，他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激动地说：“报告首长，为了朝鲜三千里江山的安危，为了祖国的安危，我坚决服从命令，到朝鲜一定打好第一仗；向二位首长报捷！”

时值秋末，上海街头两旁的梧桐树叶已变得枯黄，随着阵阵秋风飘落，呈现出一派肃杀气氛。可是，在第9兵团，官兵们正在紧张地进行着备战，军营中呈现出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从机关到连队，从司令员到炊事员，他们一个个满怀喜悦而兴奋的心情，紧张而有序地进行出国作战准备。兵团机关于部听到陶勇就任副司令时，个个笑逐颜开，他们深知陶勇是一位胸富韬略，智勇双全，作风雷厉风行的将领，他们深信由陶勇协助宋时轮，第9兵团到朝鲜一定能旗开得胜，一定能完成抗美援朝的光荣任务。

不几天，第9兵团所属第20、第26、第27三个军，告别刚刚解放的大上海，跨上北上的列车，来到山东曲阜。10月30日，朱德总司令到达曲阜，向第9兵团团以上干部作出国作战动员报告。会场设在曲阜孔林。当朱德在宋时轮的陪同下走进会场，跨上主席台时，陶勇一个箭步上前，双脚立正，精神抖擞地行了个标准的军礼。朱德紧紧地握住他的手，乐哈哈地说：“嗨！我们这个虎将到了朝鲜，美帝国主义这只纸老虎要怕你三分啊！”

陶勇见到了日夜思念的总司令，自然是十分崇敬和爱戴，他恭敬他说：“请总司令作指示！”

朱德环顾四周，用他那浓重的川音高声地说：“同志们，我们又要打仗了。这次打仗不同以往，我们这次不是在国内打，而是要到国外去打，是到朝鲜同美帝国主义较量。我们要把美国佬赶出朝鲜。你们第9兵团的第20军、26军、27军是第三野战军的主力，在华东战场上打过许多漂亮仗。你们的宋时轮司令员，进过黄埔军校，红军时期是第30军的军长，他饶勇善战，有勇有谋，是解放军中得力的战将。而你们的副司令员陶勇，是新四军中的一员虎将，是陈毅开辟苏北根据地的一把斧头。第9兵团在宋、陶二位的指挥下，一定能打出9兵团的雄风来……”



朱德讲完了话，向大家告别时，随手将挂在胸前的望远镜取下，递给了陶勇，殷切地说：“你马上去打仗了，把这个送给你，一是物尽其用，提高利用率；二是战友之情，留作纪念。”

陶勇不由得一阵激动，他双眼含泪，恭恭敬敬地从朱德手中接过望远镜，向朱总司令敬了个军礼。会后，他带着朱总司令的期望和嘱托，奔赴朝鲜战场。

11月初，第9兵团在宋时轮、陶勇的率领下，从曲阜出发，日夜兼程，从临江、辑安跨过鸭绿江，11月19日到达江界集结。当陶勇和部队进入完全陌生的朝鲜境内时，这里已是漫天风雪，万木凋零，一派荒无人烟的惨景映入眼帘。沿途各城镇村庄弹痕遍地，一片荒墟。有的村庄尸体遍野，见不到一个活着的人，有的偶而有少数妇女儿童，大多也是缺胳膊少腿的。看到美帝国主义给朝鲜人民带来的一幕幕悲惨情景，陶勇恨在心里。兵团部刚到江界宿营，陶勇便向兵团政治部交代任务，要各级政治部门，抓住沿途看到的美军野蛮暴行作为教材，对部队进行广泛的“三视”（仇视、蔑视、鄙视）美帝教育，激发广大指战员抗美援朝的决心和信心。

第9兵团部署在东线战场，他们的任务是参加第2次战役的长津湖战役。

原来，美帝侵略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曾估计，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不会派军队入朝，而朝鲜人民军是无力抵抗的，因此叫嚣要在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他在西线以美军第8集团军向北进攻，在东线以美军第10集团军指挥美陆战第1师、第7师、第3师和南朝鲜的首都师、伪第3师等部向北进攻。企图东西两军向心突击，于江界、惠山会合后，向中朝边界推进，达到占领全朝鲜的目的。敌人气焰极其嚣张，进攻速度很快，11月14日东线之敌已进至长津湖地区的新兴里、下碣隅里、柳潭、社仑里一带。第7师第17团已到鸭绿江边的惠山镇。11月25日，李承晚的第6师一个团被全歼，麦克阿瑟得到错误情报，说中国百万志愿军入朝，东线是陈毅率领的第三野战军的3个兵团20万人。此时，麦克阿瑟吓得由不相信到晕头转向，慌忙令东线部队后撤。

宋时轮、陶勇接到志愿军司令部关于东线反击的命令，立即召集军以上干部作战会议，研究作战部署。宋时轮擅长军事理论研究和指挥大兵团作战，陶勇不仅亲自经历过许多恶仗、大仗，而且思路敏捷，制定作战方案出手快，俩人配合十分默契。主持会议的宋时轮简单讲了几句开场白后，陶勇便很快拿出具体作战方案，提出根据长津湖的地形，采取分割围歼的战术，以第20军、27军为第一梯队，第26军为第二梯队，攻击时间定为11月17日。由于第9兵团仓促入朝，后勤保障未能跟上，大多数部队穿着单衣，戴着大檐帽，加上东线地形山高路险，人烟稀少，困难很多。陶勇要求各级指挥员要深入第一线，了解部队真情，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鼓励部队不怕一切困难，不畏一切风险，不惜一切代价，勇猛进攻，分割围歼敌人。

作战部署确定后，陶勇感到兵团指挥部在江界距离第一线较远，不便指挥，主动向宋时轮提出，到第一线去指挥第20军、27军作战。宋时轮知道陶勇有胃病，入朝以后，天天过着一把炒面一把雪的日子，有时连续几小时行军，连炒面都顾不上吃，常常饿肚子，陶勇的胃病经常发作，痛得直冒汗。在开会部署作战方案时，宋时轮想等开完会后，到第一线去指挥，没等自己开口，陶勇却提出自己去第一线，宋时轮笑着说：“不用争了，你身体不好，还是我去吧！”

陶勇急了，他争着说：“你看下象棋，哪有主帅跑出田格子的呢？哪有主帅过河的呢？”说罢，不由分说，带上几个参谋出了大门，一会儿就消失在风雪之中。

陶勇赶到前线，将指挥所设在山脚的一个小屋内，他打开地图看了不到10分钟，5架敌机就飞到了头顶上轮番轰炸，屋顶上碎土瓦砾直往下倾，陶勇的头上、脖子里、身上满是泥土，参谋处长金冶要他赶快出去，到山谷里避一避。陶勇风趣地说：“你们要走就先走，我这人虽然命苦，却生就一副铁骨头，天生的不怕子弹和炮弹，再说，我的革命任务还没完成，马克思哪会收我去呢？”说完就摇通了电话，与第27军彭德清军长通了话。据彭军长报告，原来侦察到长津湖地区只有美军陆军第1师，美军第7师在惠山方向，谁知机械化程度很高的第7师在一夜之间就从惠山移到了长津湖，向第1师靠拢了。情况突变，没有吓倒应变能力极强的陶勇。他能因势利导，变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使战局向着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方向发展。

陶勇在电话中听到彭德清有关敌情变化的报告后，沉思片刻，一个新的分割围歼方案便应运而生。他对彭德清说：“先打弱敌，美第7师比第1师战斗力弱，你们包围第7师，采取数路穿插的战术，先吃掉第7师。”

陶勇布置完毕，又电话命令第20军围歼美军第1师。要求两支部队协同配合好，首先将第1师和第7师隔裂开来，尔后逐点围歼。

此时，美军已成惊弓之鸟。11月27日，第20军侧重于向长津水库东侧攻击，第27军向长津水库西侧攻击。美第7师除第31团、32团少数逃窜外全部被歼。第1师被歼5个完整营。第1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以能征善战而著名，号称常胜军。在长津湖受到如此惨重打击，这在该师170年的建军史上尚属首次。

陆战第1师和第7师受到我绝对优势兵力的攻击，一下子乱了套，纷纷丢弃重型装备，狼狈向咸兴逃窜。陶勇便指挥部队沿社仑里、剑山岭侧翼追击。部队在追击中，因供给困难，只能忍饥挨饿。陶勇有车不坐，有马不骑，他拄着木棍，同战士一样爬山越岭，滚雪坡，滑冰道，不断指挥部队追击。

陆战第1师、第7师均是机械化装备，突围途中上有飞机掩护，下有坦克开路。他们以坦克开路，装甲车殿后，形成坦克、装甲车为主体的突围队伍。追击中，志愿军十分棘手。对这个浑身是铁，能爬山越岭、遇路过路、遇河过河的宠然大物无从下手。有的部队硬打硬拼，结果吃亏不小。陶勇便召集师以上干部研究对策。他说：“对付坦克，决不能硬打硬拼，我们反坦克武器少，可以发动群众破路，还可采取小分队袭击和大部队突击相结合的战法。”说到这里，他回忆起过去解放战争时期的战法，他说，“那时的鲁南战役歼灭敌快速纵队，就是用发动群众破路的办法，用土洋结合的方法获得胜利的。”

各师根据陶勇的指示行动，果然路被破坏后，敌人的坦克、装甲车就开不动了，成了一堆废铁。17日，追到咸兴，敌人又逃到兴南，同汇集在那里的其他敌军，在第7舰队的掩护下，准备从海上撤退。陶勇立即指挥部队向兴南追击。陆战1师在兴南以北设置大量火炮、坦克阻击。陶勇便集中炮兵火力扫清障碍，并利用大雾天气，以朝鲜人民军为先导，第20军在后，向陆战第1师薄弱的西侧进攻。此时，大雾刚过又降大雪，陶勇命令部队把棉衣裤翻过来穿，这样穿着白色衣裤在雪天雪地里行走，掩护了我军，迷惑了敌人。

兴南是一座较大的工业城市，又是重要的海港。麦克阿瑟要部队坚持 10 天，以便把集结在此的 10 余万部队和兴南城机器设备、技术人员一起撤走。因此，担任防御任务的敌第 10 军，凭借海岸附近的有利地形，特别是河流要道旁，建筑桥头堡，运用舰炮、坦克、大炮，组成层层交叉火力网，封锁我志愿军。志愿军开始一波接着一波地冲锋，伤亡很大。陶勇冒着弹雨，在兴南四周仔细观察，他根据敌人活动规律，制止了部队的贸然冲锋，命令部队利用有利地形，重点打好夜战、近战，部队的伤亡开始下降。24 日胜利占领了兴南，第 2 次战役胜利结束。

陶勇在指挥第 9 兵团东线作战中，果断机智，机动灵活，由开始的进攻转入追击，赢得了第 2 次战役的最后胜利。美国陆军上将、“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微哀叹：“这次进攻，美军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失败是严重的，损失也是惨重的。”

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在 12 月 17 日致电彭德怀和第 9 兵团宋、陶称：“你们在极困难条件下，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

战后，第 9 兵团在咸兴一带休整。休整期间，陶勇协助宋时轮，组织部队认真总结经验，指挥部队开展山地运动战和山地游击战训练。在第 3 次、第 4 次战役期间，第 9 兵团除陶勇指挥第 26 军出击一次外，基本上没参加。

第 9 兵团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后，士气更加高昂，粮弹充足，他们满怀信心地投入了第 5 次战役作战。

陶勇协助宋时轮在第 5 次战役中，指挥左翼集团的第 20 军、26 军、27 军和第 39 军、40 军以及炮兵第 1 师、炮兵第 2 师、第 7 师各一部，担负三八线北的金化、健川一带反击与出击任务。1951 年 4 月 21 日下午 3 时，宋时轮收到志愿军司令部下达的作战命令后，要求陶勇立即拟定作战方案。陶勇勇挑重担，毫不推辞，和参谋长覃健、参谋处长金冶一起，在不到 1 小时内，就拿出了作战方案。宋时轮看过方案后，赞扬地说，陶勇指挥打仗真有两下子，制定作战方案善于从敌人的弱点开刀。利用敌人的弱点，就能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第 5 次战役第一阶段作战是 4 月 22 日晚打响的。志愿军攻势凌厉，至 24 日晨，已突入敌人防御纵深 30 余公里，前伸到加平以北沐洞里地区，并在途中歼灭美军第 24 师、南朝鲜第 6 师各一部，完成了打开战役缺口的任务，将敌军分成东西两块，为第 2 阶段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5 月 6 日，志愿军司令部下达第 5 次战役第 2 阶段的作战任务，要求宋时轮、陶勇除指挥第 20 军、26 军、27 军外，还指挥第 3 兵团的第 12 军，以及朝鲜人民军的金集团，以打击李承晚的 6 个师为作战目标。任务要求首先集中力量歼灭伪第 3、第 7、第 5、第 9 师，尔后再歼伪首都师、伪第 11 师。5 月 12 日，第 2 阶段胜利结束，志愿军司令部鉴于部队消耗较大，为争取主动，集结休整，总结经验，以利再战，决定第 9 兵团主力转移到华川、金化以东地区休整。兵团领导开会讨论转移方案时，陶勇提出留第 20 军的第 58 师在华川地区，摆出大部队作战态势掩护主力转移。大家一致赞成这个方案。但是，志愿军的动向被美军总司令李奇微侦知，便乘志愿军转移之际，集中兵力，以摩托化步兵、坦克、炮兵组成“特遣队”，在大量航空兵的支援下，以及部分伞兵配合下，对我后撤部队实施猛烈反扑。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陶勇见美军要抄我军后尾，连续打了 4 次电话给第 58 师师长黄朝天，要他把美军挡在华川地区，不得向北移动一步。在最后一次电话中，他问黄朝天有

什么困难。黄朝天说，炮兵少了一点，能不能增加一点炮。陶勇果断决定拨了一个炮团给黄朝天指挥。

黄朝天的 58 师在华川地区，充分利用坑道和有利地形，连续阻击了七天七夜，尽管这一带方圆 30 里的树林、房屋给美军炸光了，山头炸平了，但美军也确实无法向北移动一步。

部队向北转移，千军万马，浩浩荡荡，十分壮观。但是，敌机猖獗，不管白天黑夜，每隔个把小时，总有飞机在上空盘旋，就象老鹰似的时高时低，发现目标就狂轰滥炸。这对我军行动带来很大麻烦，尤其志愿军在异国作战，粮弹补给全靠自己保障，部队走到哪，后勤运输车就跟到哪，运输车一旦被炸，粮弹补充就发生严重困难。行军如何防空？这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天黄昏，陶勇坐在吉普车内赶路，走到山脚下，突然遇见 5 架飞机临空扫射。陶勇急忙拉着金冶跳出车外，站在离车不远的山坡上，仰望那闪烁着火光的飞机。片刻，飞机摇着尾巴飞走了。他愣神地想了好一会儿，陡然想起一计，对金冶说：“有了，有了！我们在苏北根据地反扫荡、反清乡时，对付鬼子的一个办法不就是分段建立消息树报警吗？我们在朝鲜对付敌机，可以在交通干线上，分段设置防空哨，发现敌机就鸣枪报警，这办法如何？”

金冶说：“这办法也许行，可以试试。”

结果，试行了三天，驾驶员反映夜间行车增加了安全感，提高了行车安全率，减少了事故。

三天后，兵团各部全面推广这个办法。人嘴快如风，这消息很快传到志愿军总部，苏联军事顾问说：“朝鲜战场采取鸣枪报警是个创造。”他想起在苏德战争中，苏军损失车辆很多，采取的办法是消极的，损失一辆补充一辆，最后只得把车的体积改小，象嘎斯 51 型汽车，体积小，速度快，就是在苏德战争中逐步改进而来的。总部很快推广了第 9 兵团的报警方法。

第 5 次战役结束后，毛泽东给彭德怀总司令发来电报，指示对美军作战的口不能张得大大，必须采取“敲牛皮糖”的办法，多打小歼灭仗，积小胜为大胜。后来，毛泽东根据朝鲜形势提出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志愿军总部为贯彻落实毛泽东这一指示，提出在东西海岸构筑纵深防御工事的意见。第 9 兵团从 1951 年 9 月起，在元山地区构筑防御工事，随时粉碎敌人登陆冒险。

元山，位于朝鲜的中部，是一个重要港口，美军曾多次从此处登陆，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陶勇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要求部队尽一切力量，增强海岸及纵深防御工事，广泛开展“以阵地为家”和“人在阵地在”的宣传教育。为了把阵地建成“战士之家”，陶勇亲自带领干部、战士挖坑道，他对挖坑道的分布和质量把关特别严格，要求不光是能防敌人的飞机大炮，还要能守能攻。为了指挥部队挖好坑道，陶勇很少在司令部里，他几乎除了开会外，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前沿阵地。不是同战士们一起挖坑道，就是到各师检查坑道质量。当时，敌我双方都经常派特工和游击队到对方刺探军情，我方战士失踪和干部被谋杀事件时有发生，大家十分担心陶勇的安全，有的师长对陶勇说：“我们一定向你保证，按质按量完成任务，你就不必三番五次来检查了。”

陶勇回答说：“你向我保证，是你师长的职责，我要来检查，是我的职责，我们是各行其责，不能互相替代，否则就是失职。”

陶勇下部队检查工作不仅是听汇报，而且是到各坑道去检查，发现不妥

之处，及时提出意见。第27军的第79师在元山附近的速高山和松峰德山坚守防御。有一次，陶勇来到第79师的第2营检查工作，在坑道掩蔽部里，他仔细地用随身带的1米长的树枝，测量着3米以上的覆土，敲打着20公分粗的支柱和顶盖圆木，检查坚固程度和稳定性，又检查战士的地铺，察看到蓬松的铺草，表示满意他说：“铺草不错，既防潮湿又保暖。”

在检查交通壕时，陶勇对营长王吉伦说：“王营长，请把重机枪架在这里试试看。”

王营长回答说：“重机枪我们放在防空阵地了。”

陶勇说：“交通壕的射击孔显然挖小了，应该适合放除炮以外的各种武器。”

他检查完交通壕后，敏捷地爬上交通壕上方，拍拍手中的土说：“王营长，你这个核心阵地基本构成了，但还要小修小补。另外，在阵地前方有没有设施？”问罢，他用手指着松峰德山向元山方向伸展的几个山腰，又说，“你们如果在那几个山腰上构筑简易工事，作为前沿触角阵地，可以便于侦察敌情，提早发现敌人，迫使敌人过早展开，我以火力阻滞、杀伤、消耗敌人，使敌人在进攻前的航空兵和炮兵火力结束时，失去步兵的有力配合，这样，营的主阵地就能抓紧这个间隙做好战斗准备，为冲击与反冲击创造有利条件。”

随同检查工作的彭德清军长插话说：“设置前沿触角阵地这个办法好，在金城坚守防御战中，我们采取这种办法，做到了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和最大限度地杀伤敌人。我们在元山坚守海岸防御，是抗登陆作战，敌人可能是三军协同进攻，从夺取滩头阵地，巩固登陆场，继续向我海岸纵深进攻。我们的触角前沿阵地应是多层次的防御，才能保证有效地抗击敌人登陆。”

十天后，陶勇又来到第2营检查坑道，看到他们已建立了前沿触角阵地，十分高兴地对王吉伦说：“王营长说干就干，做到了有备无患，我对这一带工事放心了。”

1952年10月，陶勇奉命调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圆满完成了抗美援朝任务，率部凯旋回国。回国前，他受到了金日成主席的接见，金日成还亲自向他颁发了两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独立自由勋章。

小炮艇打出了威风

1952年深秋，陶勇率第9兵团从炮火纷飞的朝鲜战场回到祖国，担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他走马上任3个月后，一天，陈毅司令员从上海打来电话，兴冲冲地对陶勇说：毛泽东主席要来视察。

陶勇接到这个电话，激动不已，毛泽东亲自视察人民海军，对海军指战员来说，是莫大的鼓舞，也是人民海军的光荣。他立即布置下去，准备迎接毛泽东的检阅。高兴之余，他又担心起自己刚到海军工作，对海军的情况和业务不是很熟，如果毛主席问到自己不知道的事，一问三不知，该有多尴尬。

第二天，南京下关军港暮色苍茫，雄伟的狮子山高耸入云，江面上送来阵阵微风，令人心旷神怡。这时，两辆小轿车从揭江门方向风驰电掣般地驶来，在江边码头停下。毛泽东下了轿车，由陈毅、罗瑞卿的陪同，快步走上码头，踏上了“南昌”舰，陶勇早已守候在此。见到毛泽东，他兴奋地快步上前，立正敬礼，大声地报告说：“报告主席，我率舰队到南京，接受您的检阅，东海舰队司令陶勇！”

毛泽东的眼里闪着亮光，他一边亲切地问：“你就是陶勇啊！”一边还

礼，上前握着陶勇的手说：“你在新四军、三野打了不少漂亮仗，三野的电报上常常见到叶王陶，叶飞、王必成和你陶勇的大名真是如雷贯耳。”

陶勇被毛泽东夸得不好意思了，他那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却轻轻地放下了，他红着脸说：“毛主席，我们打胜仗，都是因为你的英明指挥。我陶勇只是服从你的命令，听从你的指挥才能打胜仗的。”

在陶勇的陪同下，毛泽东视察了泊于草鞋峡的十余艘军舰。最后又回到“南昌”舰的会议室里。在陶勇的请求下，毛泽东欣然命笔，写下了“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的著名题词。

接着，陶勇如实向毛泽东汇报了华东海军的情况，当他说海军力量弱小，舰艇数量太少时，毛泽东插话说，目前我们的经济在发展中，一时不可能有航空母舰，要发扬小米加步枪的延安精神，要用小炮艇打大军舰，小炮艇要打出威风来。

小炮艇要打出威风来！陶勇默默记下了领袖的教导。他决心利用现有的装备，立足打大军舰，做到敢打敢拼。从此后，在他亲自组织指挥的一系列海战中，充分显露了他的指挥才能。东海舰队在這些海战中打出了威风，得到了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的高度赞扬。

陶勇首先着手抓训练，舰队的干部大都是从陆军调来的，既缺少海上生活的体验，对海军的战术技术也知之不多，更没有大编队海上协同训练的经历。然而，有一些同志总以为自己在陆军能征惯战，再苦再恶的仗阵都经历过，干海军不成问题。因此，从思想上、技术上早日实现从陆军到海军的转变，是加强舰队机关和部队建设的首要问题。陶勇经过认真分析，认为要尽快完成这一转变，从外行变内行，使海军各级指挥员和机关适应未来海上作战的要求，唯一的途径就是到海上去学习。1957年，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在海军训练会议上指出“海军舰艇部队应该展翅到海上去练兵”。为搞好这次大编队海上训练，10月中旬，陶勇组织各编队和舰队机关进行了首长、司令部战役集训和图上导演。从10月26日起，由62艘各型舰艇组成的大编队出海，与舰上官兵同吃、同住、同训练，在大风大浪里磨练思想作风。

出海的第一天，风轻浪低，舰艇在碧波中平稳地航行。有些机关同志第一次上舰，面对浩瀚的大海、蔚蓝的天空，有些陶醉了。

有位同志还打趣地说：“当海军就象坐彩船游西湖一样舒服。”

陶勇在驾驶台上听着，脸上露出一丝微笑，两眼眯着说：“还没有领教大海的脾气呢！等着瞧吧！”

不出陶勇所言，第二天，老天和大海就翻了脸，蔚蓝的天空中突然乌云翻滚，海面上风大浪高，军舰被发怒的大海玩弄着，一会儿掀到浪尖，一会儿抛到浪底。昨天还象坐彩船游西湖的同志们忍不住哇哇地呕吐起来。他们的胃里就像翻江倒海般，直吐得没有了食物，吐出了黄水。有的连站也站不起来了，趴在床上直到下舰。

就在大家都晕得不能自制之时，陶勇却在舰艇上行动自如，如履平地般地一会儿到指挥部位去检查参谋作业，一会儿到指挥台观察编队的战术机动，一会儿又去锅炉舱去看望水兵们，操作一会儿又忙着看望晕船的同志，忙得不亦乐乎。舰艇在定海港靠码头后，陶勇把舰队机关人员召集起来，语重心长地说：“舰队机关人员不能老蹲在陆地上，要到海上来体验生活，不能老当旱鸭子。在陆地上，你们一个个生龙活虎，可是到了海上，一点小的风浪也经受不住，这样怎么能组织指挥海上作战？”

当初说大话的同志不好意思地低下头。陶勇扫了大家一眼，又说：“当海军不仅要学会战胜拿枪的敌人，还要学会驾驭大海的本领。今后，大家要经常到海上去，克服晕船，熟悉和适应海上生活，这是完成陆军向海军转变的第一步。所以，我这次把你们赶到海上来，是为了让大家体验体验海上生活，熟悉海上环境，了解并学会海上作战的组织指挥，以适应未来海上作战的需要。”

在陶勇的领导下，机关干部们终于和大海交上了朋友。几个月后，陶勇在总结这次大编队海上训练经验的文章《大编队海上训练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有效方式》中，详尽地论述了机关干部通过海上训练后的精神风貌。文中说：“大编队出海训练，还推动了机关的工作，使机关各业务部门得到一次实际的锻炼。过去机关有不少部门对部队训练关心不够，工作也配合得差。这次出海训练，第一次把机关各部门组织起来进行保证工作。……提高了这些部门保证军训的积极性和责任感，并改进了他们的工作。通过这次实际锻炼，使机关各部门基本上懂得了大编队出海要做哪些保证工作，对部队出海训练比过去关心了，这为加强机关对部队的领导和指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大编队训练开始后，陶勇根据舰队以往几次海战的经验教训，抓住了练兵必须从实战出发的关键。在以海湾封锁反封锁为背景的训练中，他安排了编队安全通过雷区的演练。10月25日，演习开始。当舰队指挥所通报“敌情”后，26日，编队驶离上海吴淞码头，单纵队鱼贯航行。有的编队指挥员认为是轻车熟路，“麻痹轻敌”，因此当编队进入长江南航道，抵达园园沙江面时，原先熟悉的航道上，出现了一些红色浮标，有的舰长提高了警惕，放慢了速度，小心翼翼地沿着浮标标出的安全航道前进。有的编队立即发出进入雷区航行的信号，令各舰采取防雷措施。而有的舰长却不以为然，依然向前，横冲直撞，当指挥舰向他们发出注意安全、做好防雷措施信号时，毫无反应。

夜幕降临，演习结束，各舰艇按预定计划进入锚泊位置后，陶勇把各编队指挥员和舰长召来开讲评会。那些闯了雷区的舰长提心吊胆，惴惴不安地等着挨批，气氛紧张。可是，陶勇并没有批评大家，更没有发火，而是面带笑容地问大家：“航行中，大家有没有发现设立的浮标？”

“发现了！”大家回答。

“当你们在没有航标的海区发现了航标后，你们是怎么想的呢？”陶勇继续问。

“我以为是熟悉的航道，不会遇到什么危险”。有的舰长回答。

陶勇又问：“你们有没有收到通报？”

有的回答说有，有的说没有。

陶勇沉思了片刻，慢慢地抬起头，深沉他说：“过去战争年代，我们在行军时，发现路上有什么异常，都要问几个为什么。鸟惊飞，狗乱叫，都会警觉，任何蛛丝马迹、风吹草动都要问几个为什么。这就是军人应有的革命警惕性。”话说到此，他抬眼看看大家，严肃地说，“作为指挥员，缺少警惕性是要吃大亏的，以往的教训并不少。这次演习，有的舰长没有收到通报，就不去批评他了，这是编队指挥员的责任。作为指挥员，在发布通报时，不仅要注意自己的命令是否正确地下达了，还要考虑下面能否及时收到了命令，否则会贻误战机的。这就要求海军通信组织必须适应海上指挥的要求，

做到准和快。另一方面也要求各级指挥员要有临机处置和判断情况的能力，及时请示，果断处理。如果这次不是演习而是实战，同志们想一想，像有的舰那样盲目行驶，后果会有多严重。”

陶勇的讲评生动而具体，说得大家心服口服，收益匪浅。

在演练编队对空防御的课目时，陶勇强调要接受“瑞金”舰遭空袭的教训，要求各舰夜间严格执行灯火管制，白天不准烟囱冒黑烟。并经常发出空袭警报，组织对空射击考核，加强舰艇对空防御训练。这次的编队对空实弹射击，一改过去训练的套路，舰队指挥所只通报“敌情”，不提供飞机进入的具体方位和高度数据，由各舰艇自己去找目标，捕捉战机，进行反击。并要求边射击边报告，以测验各舰对空观察和通信协同的灵敏度和准确度。这次从难从严的要求，暴露了不少问题。总结时，陶勇对大家说：“自古以来，战争都带突然性、临机性，对空作战尤其如此。隐蔽、突袭更是现代空战、海战的特点。哪有敌人来进攻事先通报的呢？今天，我们进行这样的训练，就是要强化对空防御训练，以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不然的话，真正打起仗来是要吃亏的。”

50年代初浙东大陈列岛尚未解放，敌空军、海军活动猖獗，使我东南沿海的安全受到影响，渔民们出海打鱼总是提心吊胆。小股匪特还时常登陆骚扰百姓，影响工农业生产。陶勇在抓训练同时，狠抓制海权斗争。

1953年5月29日，陶勇指挥海军舰队解放大小鹿山、鸡山、羊屿四岛。这天黄昏，炮艇两个中队掩护陆军一个营登上了羊屿和鸡山，并进至大小鹿山东北和东南海域，实施抵近射击，支援陆军另一个营登陆该两岛。此次战斗，毙敌53名，俘敌“反共突击军”第42纵队司令何卓权以下186名，击沉敌机帆船两艘。

为此，蒋介石严厉训斥了大陈防卫区司令胡宗南。胡遂于6月19日夜，亲率舰艇9艘，载运步兵1600余人，向我四岛猛扑，妄图夺回。守岛部队浴血奋战，坚守羊屿、小鹿山，陆军两次增援，均遭敌舰封锁阻击。至20日凌晨，浙江军区参谋长赵俊从杭州来电话，要求陶勇驰援。陶勇立即下令，无论有多大困难，也要全力以赴，掩护陆军增援部队作战。

于是，温台大队第2中队在张家麟中队长的指挥下，迅速出动，通过敌积谷山的炮火封锁区，冲过石圪和寨头之间海面，于当天黄昏抵达寨头。夜幕降临，舰队向羊屿东北之敌舰逼进，向敌舰射击。敌人措手不及，狼狈逃窜，陆军增援部队终于安全航渡，先后登上羊屿和小鹿山，与岛上守军共同抗击敌人，至21日拂晓，胜利结束战斗。此役共歼敌700余名，击沉敌机帆船两艘，击伤敌舰艇5艘。

6月24日16时，解放军陆军一个营，在8艘炮舰的掩护下，背水攻坚突破敌占积谷山岛前沿，于22时攻占该岛，歼灭敌“军官战斗团”一个连110余人。战后，俘虏们心有余悸地说：“解放军的小兵舰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温台大队在作战中，还担任战区海域警戒任务，击退了大陈岛来犯的3艘敌舰。

陆军第60师参谋长王坤伸出拇指说：“你们炮艇大队立了大功！”

陶勇打电话给温台大队长陈雪江说：“打得不错，我们的小炮艇打出了威风，了不起，了不起。你们打得胡宗南丢盔弃甲不说，害得他被老蒋革了职。”

陶勇还亲临海门港视察，他高兴地说：“我们配合陆军解放敌占岛屿的



实战证明，不是我们怕敌人，而是敌人怕我们。我们的小炮艇打败了敌人的大军舰。”

陈雪江说：“陶司令，我们的炮艇一出海口，敌舰就调头返航，不敢和我们打了，水兵们别提有多自豪！”

陶勇听后，沉思了片刻，严肃地对陈雪江说：“同志，不能有骄傲轻敌思想啊，要做到胜不骄，败不馁，否则，就有打败仗的危险。”他缓了缓口气又说，“不过，战士们骄傲一点没关系，这样，他们才不会怯战，才有信心和敌人斗。干部不行，干部头脑一发热，就会掉以轻心，就会麻痹大意。”

1954年4月间，500余艘渔船在三门湾猫头洋渔场捕鱼，为保证渔业生产的安全，陶勇命令第6支队在海军歼击航空兵掩护下，以“广州”、“开封”、“瑞金”、“兴国”舰，协同舟山、台州巡逻艇大队进行护渔，其间先后进行3次海战，共击伤敌舰3艘。5月16日，护卫舰“南昌”、“广州”、“开封”、“长沙”号于檀头山以东海域，击伤敌护卫舰“太和号”，保证了陆军部队进占东矾列岛的侧翼安全。

1955年1月18日，强攻一江山岛的战役打响了。一江山岛由南江、北江两岛组成，面积为1.4平方公里，据守在此的是国民党“一江山防卫司令部”，下辖突击第4大队、第2大队和第4中队和一个炮兵中队，共1100余人。守敌以岛上几个高地为核心，设置了3道阵地和4层火力网，构筑明堡、暗堡154个，平均每百米正面配置两门火炮和两挺机枪，前沿各突出部和阵地前密布铁丝网和地雷，形成设防坚固、易守难攻的环形防御。国民党十分重视一江山岛的防务，他们吹嘘它是“台湾的门闩，大陈岛的门户”，再三命令驻岛官兵：“一江不保，大陈难守；大陈失守，台湾垂危；一旦枪响，要苦守死守。”

1954年5月中旬，华东军区陆、海军攻占了东矾列岛、关门山、田乔、蒋儿吞等岛。此后，华东军区鉴于国民党军在浙东沿海岛屿的指挥中心和防御核心是大陈岛，而一江山岛又是大陈岛的门户和前哨据点，如攻占了一江山岛，必能击中要害，沉重打击和震撼大陈岛守军。因此决定先攻占一江山岛，再取大陈岛，然后相机攻取其它岛屿。中央军委7月11日批准了华东军区的作战方案，并指示以海、空军轰炸大陈岛，以陆军攻占一江山岛，积极准备解放浙东沿海全部岛屿。7月下旬，华东军区确定参战的部队为陆军第20军第60师一个团又一个营，海军舰艇137艘，海军航空兵和空军航空兵共12个大队184架飞机。8月，华东军区浙东前线指挥部成立，由军区参谋长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委，前指下设空军指挥所、海军指挥所、登陆指挥所，还成立了三军联合后方勤务部和政治工作组。陶勇和东海舰队副司令彭德清负责指挥海军配合空军、陆军攻占一江山岛。战前，他将参战的舰队编好队，制定训练计划，不时地派舰艇到一江山岛侦察敌情，训练中碰到国民党“太平号”军舰，陶勇果断命令将它击沉在高岛附近。攻占一江山岛当天，他奉命指挥舰队集中炮火轰击敌人滩头工事，敌人被火力压进工事，登陆部队跳入水中，抢登滩头，保证了陆军部队顺利占领一江山岛。一江山岛解放的第3天，陶勇又指挥快艇部队准确地击沉敌人的“宝应号”炮舰。大陈之敌吓得频频呼救，在美军第7舰队掩护下，仓皇逃向台湾，使大陈岛回到了祖国怀抱。

1958年春，在福建中部海潭岛附近海面，有一艘特务船活动十分猖獗，它就是200吨的“63号”炮艇。该艇火力强，航速快。国民党特务少校副队

长高建武是平潭县苏吞人，他仗着对地形的熟悉和特务船性能好的优势，以白犬岛为依托，经常到附近海域抢劫破坏，有时公开在海潭峡口外抛锚，抢劫我渔船、商船，以致我渔民不敢出海打渔，商船不敢航行。海潭岛的渔民和船民一提起它，人人切齿痛恨，称它是“海上恶霸”。平潭县政府专门派县长杨玉洪到东海舰队反映群众的愿望。陶勇与彭德清认真考虑了他们的要求后，决走向海潭岛派驻舰艇部队。舰队于1958年5月先派出护卫舰第31大队第1中队4艘艇进驻海潭岛娘宫港，同年12月，大队进驻平潭。

1959年2月2日，敌“63号”炮艇终于又露面了，它从白犬岛出航绕道外海，伪装成渔船混入我牛山渔场，企图对我正在进行捕鱼作业的数百艘渔船进行抢劫破坏。平潭县海上武装民兵船发现敌情后，一面挂出信号要渔船避开，一面以信号向岸上报警，并主动向敌艇靠近。海军大队指挥所接到报告后，立即命令第4中队的3艘75吨炮艇出击，从海潭峡经海潭石礁区向敌艇侧背运动，截断其退路，由外向里打。此时，敌炮艇已与我武装民兵船接近，装有机关炮的民兵船突然开火，与敌展开激烈战斗。不久，第4中队的3艘炮艇从敌侧翼突然出现，并同时开火，顿时将敌艇打得晕头转向。几分钟后，这个恶贯满盈的“海上恶霸”就在我军民的猛烈炮火下葬身海底了。

陶勇久经战阵，经验丰富，精力充沛，在海上对敌斗争中，他从作战指导原则、兵力运用、战术手段，直至编队射击，无不仔细地运筹，他的谋略超众，富有独创精神。他亲自领导了护卫艇与鱼雷艇编队协同作战的训练，即以护卫艇大队掩护鱼雷艇大队实施鱼雷攻击，使海军的合同战术得到了新的发展。在1965年11月13日的崇武以东海战中，我军一举击沉击伤敌舰各一艘（“永昌”、“永泰”号），就是陶勇亲自组织指挥的战前协同训练所取得的战果，“海上猛虎艇”（588号护卫艇）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也是陶勇通过实战培养教育出来的典范。

东海舰队的成长、壮大，海上作战的胜利和基地建设的完善，无不倾注着他的大量心血，他身上始终保持着无产阶级的正气，共产党人的党性，是全体指战员的楷模。

## 握“笔杆子”的将军萧向荣

孙世华  
潘长禹  
李波

萧向荣（1910～1976）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原名萧木元，1910年生，广东省梅县石扇乡新田村人。192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1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共青团梅县地委秘书，中共梅县地委巡视员，中共东江特委秘书长，闽粤赣省委秘书长，永定县委书记兼县苏维埃军事部长，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干事、秘书长兼军委直属队总支书记，红1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统战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军委总政治部统战部部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宣传部长，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宣传部部长兼《八路军军政杂志》主编，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第15兵团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15兵团政治部主任兼广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后任第15兵团政治委员，华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南军区政治部第一副主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国防部办公厅主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国防科委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曾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76年3月23日逝世。

\* \* \* \* \*

### 军旅诗人

萧向荣是广东梅县人，1910年9月6日诞生在石扇乡新田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6岁加入共青团；大革命失败那年，他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小时候，向荣经常光着脚板，穿着破旧衣服，跟着父母下田干活，过着稀一顿干一顿、吃糠咽菜的苦日子。看着有钱人家的孩子上学念书，他也苦苦地恳求母亲把他送到学校去。母亲是个开明人，想到自己吃尽不能识文断字的苦头，就下决心怎么难也要送向荣去念书。

萧向荣长到7岁时，母亲征得村里小学教员同意，让向荣一边读书，一边给教员烧菜做饭，打扫房屋，可免交学费。1919年，他以优异成绩从初级小学毕业。后来，靠在海外打工的父亲寄回的一点钱，他又考入高级小学。高小毕业后在伯父的接济下勉强凑够学费考入梅县东山中学。

梅县东山中学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萧向荣在这里深深地受到进步思想的感染和影响，开始走上革命道路。

1925年3月，国民党广东革命政府讨伐陈炯明军阀势力的东征军进驻梅县。当时任东征军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同志和一批共产党员先后到达梅县，在工农群众中以各种形式宣传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周恩来同志还亲自到东山中学，作了《青年学生是国家未来的主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讲演。第一次听到革命道理的萧向荣，备受鼓舞，耳目一新，很快成为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1925年6月中旬，广东爆发了支援上海“五卅运动”的省港大罢工。萧向荣和学生运动的领导骨干陈劲军、萧啸安、胡明轩等人，发起组织“五卅运动”后援会，成立东山中学学生会救国运动团。同时发动同学们集资组成宣传队，利用暑期放假的机会，冒着

炎炎烈日，冲破军警干扰，在梅县的松口、白渡、丙村、西阳、南口和焦岭的新铺、福建的半市等城镇，步行数百里，演出控诉英帝国主义残害广州同胞的话剧——《广州惨杀》，以唤起民众，反对帝国主义；并筹款 600 多元，捐寄给省港罢工委员会。

萧向荣将军不仅是我军一位卓越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也是一位军旅诗人。在他半个世纪的戎马生涯中，他同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1995 年，解放军出版社第一次出版了《萧向荣诗词集》，其中收录了他在各个历史时期创作的诗词 140 余首。迟浩田同志赞誉他的诗词是“战斗的足迹，光辉的印记”。

萧向荣将军还在中学时期，就能吟出脍炙人口的诗章。1925 年 10 月，国民革命军的第二次东征，在梅县城北洋门发歼灭叛军陈炯明。消息传到东山中学，全校沸腾，师生们热烈庆祝东征的胜利。此时的萧向荣欣喜若狂，即兴挥毫写下了“一枝梅蕊未曾开，两度东征带雨来。此日朝阳春倍好，岭南花放满瑶台”的诗句。这首诗被师生争相传阅，在东山中学和梅县各校广为吟诵。

1925 年寒假，萧向荣回到家乡，在新田小学办起一个夜校。上夜校的人非常踊跃，学生有六七十人之多，不少妇女也冲破封建礼教束缚参加夜校学习。萧向荣不仅动员在校教师教农民识字，还亲自宣讲革命道理，教唱革命歌曲。当时，他看到许多农民都留着长辫子，就首先说服自己的亲友张新云和几个比较进步的夜校学员带头剪了辫子。

一天晚上，萧向荣沉着地站在人声鼎沸的夜校教室讲台上，对

大家说：“梳辫子既费时间，耽误农活，又不卫生。剪掉它，既好看又顺乎潮流，大家何乐而不为呢？”他说得实实在在，近情近理，加之又有事先被说服的亲友及其他几个学员积极响应，石扇乡一时掀起了剪辫子热潮，一股新鲜空气在闭塞、守旧的乡村回荡……

经过大革命的洗礼和革命实践活动的锻炼，萧向荣说自己“由一个羞羞答答、讲话就脸红的少年学生，成长为东山中学的革命活动分子”。1926 年 6 月，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年暑假后，萧向荣被分配到共青团梅县县委当秘书。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萧向荣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不久，广州、汕头发生“四·一五”大屠杀事件。广东陷入腥风血雨之中。在严酷的斗争中，萧向荣曾受命担任梅县石扇乡党支部书记。他积极组织农民武装，开展打土豪、除恶霸的斗争，并处决了破坏革命的石扇公学反动校董。

1927 年 8 月 18 日，中共兴宁县委举行第二次暴动，攻下兴宁县城。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暴动部队第 2 天就撤离了县城；已经暴露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学生也随部队撤到农村，城内只剩了四五个共青团员。为了配合农村游击战争，及时了解城内国民党反动派的动态，中共兴宁县委派萧向荣到县城把县团委建立起来。当时，兴宁县国民党反动县长廖桐史正到处设团防哨卡，搜捕革命同志，公开宣称：“宁可枉杀三千，决不放走一个。”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300 多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兴宁成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模范”县。萧向荣不避艰险，毅然打入县城开展工作。他以小学代课教员的身份为掩护，一边做发展共青团员、建立团组织的工作，一边了解敌情，并把了解到的敌情及时向县委汇报。此间，他曾两

次险遭敌人逮捕，靠了群众掩护和自己及战友的机智、勇敢才得以幸免。

此后不久，萧向荣还先后担任共青团东江特委秘书长和中共东江特委秘书长，在九龙障和八乡山等地参与领导游击战争，同围剿根据地的国民党反动派和各地民团周旋。他的感人诗篇：“铜鼓九龙转八乡，南山北岭共刀枪。卅年不见白云面，一曲聊传祝健康。”反映的就是这一时期的斗争生活。

1932年5月，根据聂荣臻的提议，苏区中央局决定调萧向荣到红军第1军团工作。周恩来亲自找萧向荣谈话并亲笔写了介绍信。经红1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安排，萧向荣担任宣传部主办的《战士报》的编辑。从此，他便开始长期从事我党我军的宣传工作和秘书工作，成了我党我军有名的笔杆子。

红军长征时，萧向荣任红1军团政治部秘书长。长征的胜利结束和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给萧向荣和部队全体指战员带来极大的兴奋和喜悦，全军将士满怀无比欢快的心情，迎接1936年新年的到来。为了增加节日的喜庆气氛，军团战士剧社准备排练节目为部队演出。但是在长征途中，所有剧本几乎都丢光了。萧向荣根据长征的全过程和自己亲身参加这一伟大历史行动的体会，写出了《红军长征曲》的歌词，再套用《春天的快乐》曲谱，先由战士剧社的同志学会演唱，然后再把宣传唱到部队里去。军团机关的领导罗荣桓、邓小平、朱瑞听到这个歌子后，特地让剧社的同志到他们那里教唱；第1军团第2师师长刘亚楼和政委萧华，也把剧社的人找去教他们唱这首歌。在部队中，这首《红军长征曲》一直唱到抗战初期。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三省和热河，并继续向华北扩大侵略。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在长征路上发表著名的《八一宣言》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同年1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瓦窑堡会议，决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为了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红1军团首长要萧向荣利用几个晚上的时间，给军团直属机关、部队的干部讲课。

萧向荣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他透彻地分析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把只有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拯救民族危亡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使广大干部很快把思想统一到《八一宣言》和瓦窑堡会议的精神上来。但也有一些同志对党的战略策略的转变不理解，思想上搞不通为什么要和国民党建立“统一”。个别人还向萧向荣提出种种问题，对他的讲课挑剔，责难，发泄不满。这时，萧向荣一点儿也不急躁，他耐心地和这些同志共同探讨，反复解释，既不强加于人，也不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这种情况第二天被当时在军团政治部任宣传部长长的邓小平知道了，他当天晚上亲自来听萧向荣讲课。听完之后，他肯定萧向荣讲课内容是完全正确的，还严肃批评了个别同志的挑剔、责难。

萧向荣任红1军团政治部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期间，是执行统战政策的模范。一次，红1军团在攻占甘肃曲子镇和打援战斗中，抓获了1000多个俘虏。萧向荣率领一个警卫连和20几名宣传队员把这批俘虏押解到曲子镇附近小山沟的一个村子里，组成俘虏训练营，以上课和文艺演唱形式向这些白军官兵宣传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他们进行弃暗投明的教育。萧向荣严令训俘营的工作人员执行俘虏政策，对他们不打不骂，尊重他们的人格。对回族俘虏，他安排分灶开火；对伤、病俘虏，他派医生为其治疗、护理。

训练结束时，大部分俘虏由于受到教育、感化，又亲眼看到在红军中官兵平等，纷纷要求留下当红军；少数想回家的，就发给路费，临行时，还让他们会餐，并夹道欢送。这些被释放的俘虏，有的走到半路又返回来要求当红军；还有些重新被国民党军队拉去当兵的，在以后的战斗中，又带头向红军缴枪投降。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蒋介石为了分化瓦解东北军，破坏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的联合抗日，把东北军调往河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当时，甘肃长武县是东调的东北军必经之地。军团首长就派萧向荣在长武做东北军下层官兵的工作，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

萧向荣带着宣传队来到长武后，白天站在大路边，敲锣打鼓，唱歌，呼口号，欢送东北军过路部队。特别是萧向荣自己写的那首《欢送东北军东征》的歌词，配上江西苏区流行的《欢送红军歌》的曲调，演唱后，让人听来十分亲切。东北军官兵听到这首歌，人人感动，他们满怀对红军朋友依依不舍的心情，一步一回头地挥泪告别。晚上，他们为临时住宿长武的东北军演出《亡国恨》、《血汗为谁流》、《打回老家去》等节目。他们还和东北军官兵举行联欢会，共同演唱《松花江上》、《九一八小调》。唱到激动处，东北军士兵纷纷自发地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回老家去！”“赶走东洋鬼！”等口号。

萧向荣和宣传队在长武住了一个多星期，直到东北军部队全部走完，才返回驻地。这期间，他抽出部分宣传队员专门深入到东北军士兵中间，和他们谈心、交朋友。他自己又在东北军下级军官中多次召开小型座谈会，反复宣传只有一切爱国力量团结起来，才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的道理。他还利用座谈的机会，揭穿了国民党诬蔑我党“青面獠牙、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红军是土匪”等谣言。面对深明大义、和蔼可亲的萧向荣和善良礼貌的红军宣传队员，许多东北军下级军官感慨地说：红军既能打仗，又讲道理，顾全国家、民族利益的大局，真心实意抗日，天底下哪里有过这样的“土匪”？他们表示，今后再也不能打内战了，只有联合起来抗日才是正道。

《八路军军政杂志》主编

以“芦沟桥事变”为标志，中国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115师在平型关重创日寇，歼灭坂垣师团一部1000余人，缴获大批步枪、机枪和辎重，取得了全国抗战第一个伟大胜利。身为第115师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萧向荣，在紧张的战斗生活间隙，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赶写了《平型关大胜利》、《平型关战斗前后》、《战场片断》等文章，详尽介绍了第115师官兵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用简陋的武器歼灭装备精良的坂垣师团一部的战斗经过，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士气。他的这些文章，先后在《八路军军政杂志》、《解放》杂志和国内许多报刊杂志发表，有的还被苏联《红星报》转载。这对于在全国以及全世界人民面前戳穿日本侵略者不可战胜的神话，增强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起了重要作用。

萧向荣所在的第115师的老同志们，如今回忆起当年部队的情景，都说这支部队能战斗，斗志高昂。在漫长的战争年月，这支部队涌现了大批优秀指挥员和政治工作领导干部。谈到这一点，这些老同志们都充分肯定那时扎实、认真的政治教育，说第115师的赫赫战功及各方面的成绩，和政治教育工作做得好是分不开的，同时也和萧向荣的正确领导分不开。

第 115 师的战士主要来自受剥削、受压迫、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贫苦农民，他们抗战热情虽高，政治、文化水平却比较低。从部队建设的长远考虑，萧向荣首先向师领导提出了在连队设立政治文化教员的建议，以此加强对战士的政治文化教育，同时培养政治工作干部。这一建议被批准后，第 115 师从此就建立了连队设政治文化教员的制度，并被逐渐推广到其他部队。负责政治文化教育的，是当时涌入部队的知识青年及从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分配到部队的学员。他们给战士们讲政治课，上文化课，教唱歌曲，进行战场鼓动，深受欢迎。战士们把他们看成是连长、指导员之外的第三号连首长。

我军长期建设和发展的历史证明，在连队设立政治文化教员，对于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和文化水平，活跃连队文化体育生活，增强部队团结，提高部队战斗力，起了促进作用。而政治文化教员扎根部队，熟悉了部队生活，获得了基层工作经验，经过长期部队生活锻炼和战斗考验，也增长了才干，很多人逐步成长为我军中高级干部。

为了对部队进行系统的政治教育，依据抗战时期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萧向荣对部队政治教育的方针、内容、制度和要求等，作了详细研究，提出了一整套具体意见。

根据萧向荣的建议和政治机关安排，第 115 师部队进行的政治教育主要有如下内容：

——民族解放教育。其中包括提高民族觉悟，加强民族团结，坚定民族信心三部分。

——军队生活教育。其中以“七个为什么”即为什么当兵，为什么而战？为什么要遵守纪律、服从命令？为什么要勇敢作战、刻苦耐劳？为什么要努力学习军事、政治、文化？为什么要团结友爱？为什么要与人民打成一片？为什么要争取敌军、优待俘虏为主要内容。

——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社会科学常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

——文化教育。

此外，萧向荣对教学指导思想，提出了少而精、理论联系实际、逐步提高三条要求。对部队的政治教育制度，从时间安排，到授课方式，都根据干部、战士以及领导干部的不同情况，做了具体的规定，这样，就能保证政治教育落到实处，有用有效。

进行政治教育需要教材，萧向荣就亲自编写。他编了三本政治课教材，第一本是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兼用的新战士入伍教材，包括军队生活各个方面的内容；第二本是初级课本，分为中日问题和统一战线两册；第三本是高级课本，也分两册，一册为中国革命运动史，一册为社会科学常识。

经过萧向荣和政工干部的努力，第 115 师的部队政治教育得到了明显加强和提高。后来，萧向荣对这一时期政治教育的情况和经验，进行总结，写成《一一五师的政治教育工作》一文，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发表，向全军作了介绍。

萧向荣重视政治教育，也十分重视文艺工作。他强调文艺工作是部队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第 115 师战士剧社的建设，凝聚着他的很多心血。在参军的青年学生中，他发现在文艺方面有特长的，就把他们调到剧社来，为部队培养文艺骨干。部队打了胜仗，他就组织剧社及时编排节目进行演出，并尽力引导剧社编排反映抗战形势和部队战斗、训练生活的节目。有一个宣传队长编演的活报剧《三阶段》，形象地反映了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的

思想，萧向荣高兴地在剧社表扬他，并让部队各宣传队都演出这个节目。在紧张工作之余，他还亲自创作了《一九三七年华北抗战歌》，生动地描述了华北抗战的大好形势，十分振奋人心，因而得以广泛流传。

萧向荣经常亲自带剧社到部队演出慰问，不但对剧社的文艺战士在政治上、业务上给以具体指导和帮助，生活上也多方关心、照顾。行军路上，他看到有的年轻体弱的宣传队员走不动了，就立即扶他骑上自己的骡子。他和战士剧社的同志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1938年10月，中央军委调萧向荣到军委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当他离开第115师，踏上去革命圣地延安的道路时，剧社全体同志送了一程又一程，一直送了十几里路，才依依洒泪而别。

萧向荣到中央军委后的第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筹备出版《八路军军政杂志》。《八路军军政杂志》是为指导部队建设，提高部队战斗力，同时也向国内外介绍我军的抗战业绩和经验，由中央军委决定创办的。这是一件大事。杂志编委会由毛泽东、王稼祥、萧劲光、郭化若、萧向荣五人组成，主编就是萧向荣。

当时，杂志社连萧向荣在内，只有7个人。但萧向荣分秒必争，紧张筹备，克服了许多困难，以最短的时间于1939年1月出版了《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号，毛泽东亲自写了《发刊词》。这是八路军从她的前身——中国工农红军诞生以来，第一个以革命理论为指导创办的正规刊物。萧向荣根据毛泽东撰写的《发刊词》的精神，把“为抗战服务、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服务”，“研究抗战的战略、政略，特别是抗战部队中的军事建设和政治建设，并检讨军政建设上的经验教训”，作为办好杂志的指导思想，并为此付出了艰辛劳动。

《八路军军政杂志》每月一期，每期10~12万字。每一期的内容，都是萧向荣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党中央提出的任务、要求以及部队建设和战斗、工作上的需要，提前拟定并多方组稿的。对大量稿件，萧向荣总是一篇篇地看，连错别字和标点符号也不放过。有些重要文章他修改后，还打出清样，送毛泽东作最后审定。有时，毛泽东把文章清样退回后，还打电话给萧向荣，指出某一段要增加一些内容，某一段要删去些无关紧要的部分等等。萧向荣总是根据这些指示，对文章再加修改，然后才送去付印。因此，他一天从早忙到晚，顾不上吃饭，睡觉时间也很少，一般都要在午夜12时以后才能休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八路军军政杂志》的每一篇文章，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浸透着萧向荣的心血和汗水，但他自己却说，“我所做的只是一个‘文字匠’的工作。”

全面负责、主编一本杂志，已够萧向荣忙的了，但在百忙中，他自己还不断撰写发表文章，充实杂志的内容。他的《从“百团大战”说起》一文，以“百团大战”空前胜利的事实，严厉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所散布的“八路军游而不击”、八路军“不听从命令”、“捣乱后方”等无耻谰言。在《从皖南事件谈到军纪及其他》的文章中，他义正辞严地揭露蒋介石颠倒黑白、贼喊捉贼的伎俩。指斥蒋介石对坚持江南敌后游击战争、战功卓著的新四军，施用“不覆亡于敌寇，亦难逃我法网”的卑劣手段，进行惨无人道的“聚歼”的反革命罪行。他还根据各时期部队工作的需要，发表了《部队中的宣传鼓动工作》、《八路军与知识分子》、《为提高文化知识而斗争》等多篇文章，对部队政治工作的建设，起了很好的指导性作用。



《八路军军政杂志》内容广泛，现实性强，每期都辟有《战地通讯》专栏。为了能够及时反映各抗日根据地情况，保证战地通讯稿件的来源，萧向荣特意从抗日军政大学选调了一批政治上进步、工作上踏实、又有写作能力的优秀青年党员，组成“八路军总政治部前线记者团”，分成四个记者组，先后奔赴晋察冀、晋西北、晋东南、山东四个抗日根据地进行采访。他们和部队生活战斗在一起，写出了许多内容充实、生动感人的稿件，使杂志的战斗性、现实性更加强烈。

由于《八路军军政杂志》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材料具体，反映部队生活及时，印刷也比较完美，成为抗战中一种有威望的杂志。尽管它受到日寇汉奸和各类反动分子的痛恨，发行受禁止，投寄有障碍，加之交通不便，但它的影响还是深远的。国内许多机关、团体和图书馆都纷纷给杂志写信，要求按期寄赠并赞誉它“言论正确，蜚声遐迩”“内容丰富，记载翔实”。八路军附近的各友军，也有要求寄赠，或前来订阅的。仅各地个人直接向杂志社订阅的，就达 900 余人。

《八路军军政杂志》一共出了 39 期。1942 年，日寇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以深沟、碉堡，分区封锁的办法，阻断交通；国民党反动派也与日伪呼应，接连发动反共高潮，对陕甘宁边区进行蚕食和严密封锁。在这种情况下，杂志出版需要的必备物资断了来源，发行也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这样，只好在出版了最后一期（第 39 期）之后，于 1942 年 4 月忍痛停刊。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保存着一本书——《战士课本》。这本书作为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献，是萧向荣对我军思想政治工作杰出贡献的标志。《战士课本》是萧向荣在延安工作时期，根据自己在第 115 师进行政治教育的经验，又一次编写的战士政治教材。它分为上、中、下三册，分别讲述中日战争、统一战线及党的政策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毛泽东仔细审阅修改过这个课本，提了许多具体意见和要求，并亲笔写信给萧向荣，称赞“战士课本写得很好”。

同在第 115 师一样，在延安工作的萧向荣，在做好政治教育工作的同时，也积极关心、支持文艺工作。

1942 年，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萧向荣到会聆听了这个讲话。他也是《讲话》精神的忠实实践者。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萧向荣正是抓住文艺为什么人这一根本问题来贯彻《讲话》精神的。

萧向荣认为，部队的文艺工作必须与部队所执行的政治任务、战斗任务相结合，与部队的实际相结合，既能反映部队火热的战斗生活，又能教育和鼓舞部队。他在毛泽东倡导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针下，提出了部队文艺要“为兵服务”的口号，以改变部队文艺脱离实际的倾向。他在《部队的文艺工作应该为兵服务》一文中说：“不仅从内容上来说，部队文艺主要反映的是部队，而且从表现方面来说，由于部队生活上有它的许多特点，因此，部队文艺工作不论在掌握军队感情和表现军人姿态上，都应该有它的特点，即所谓有军队作风这个问题。”

在血与火的战争年代，人民军队肩负着打败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伟大使命，从这个实际出发，在部队文艺工作中，把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总方向具

体化“为兵服务”，是完全正确的。那么，怎样将这一口号落到实处呢？萧向荣又提出了“写兵，演兵，给兵演”的具体措施。他要求部队文艺工作者必须熟悉部队，真正成为部队的一员，必须从部队实际出发，反映部队中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只有这样，才能写好兵，演好兵，给兵演好，创造出真正的部队文艺，发挥文艺为战争服务的作用。

1943年，留守兵团的部队艺术工作团和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的青年艺术剧院合并，成立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简称联政宣传队）。贺龙司令员任命当时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部长的萧向荣兼任宣传队队长。

1944年夏天，萧向荣把一批有写作能力的人派到部队深入生活，创作新剧本。下部队的同志按照萧向荣的要求，在部队了解干部、战士的思想感情，收集部队中英雄模范人物的生动事迹，很快创作出《徐海水锄奸》等12个以表现部队生活为主的广场歌舞剧。同时，经过学习和整训，留在延安的联政宣传队的同志，也创作和演出了《无敌红军》、《开辟第二战场》、《拥护成立联合政府》等紧密配合形势、宣传党的主张的广场活报剧。中央领导和各界人士对这些新的创作给予很好的评价。宣传队的同志激动地说：“是萧向荣同志燃烧起我们部队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之火。”

1944年冬，萧向荣把联政宣传队编为两个演出队，分别到庆阳和关中地区的部队演出。他亲自带演出队到刚从前方回到陕甘宁边区的教导第2旅慰问。宣传队在那里的每场演出，他都要亲临现场，直接观察和感受干部、战士的情绪和反映，从中研究他们欢迎哪个节目，不欢迎哪个节目；他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他还带着有关人员到营、连驻地召开座谈会，听取对演出、对宣传队的意见，然后和宣传队共同讨论修改剧本、改进作风的具体方案。

萧向荣特别注意联政宣传队的作风建设，要求宣传队一定要有优良的作风，宣传队员要成为革命军人的表率。他说：“一个剧团的政治思想、业务水平，都会从作风中表现出来，戏演得再好，如果作风不好，也不会取得应有的效果。”根据萧向荣的要求，演出队制定了队员长期恪守的规则：“要千方百计满足部队的要求，要千方百计少给部队增加负担。”后来，这个规则就成为联政宣传队的座右铭。在这次慰问演出中，一队的宣传队员同连队一起出操，晚饭后和战士们一起游戏，又参加战士们的班务会，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砍树、割草、烧炭；女队员还为战士们拆洗、缝补衣服……由于作风好，演出的节目又以反映部队战斗生活为主，联政一队的宣传受到了部队的热烈欢迎和赞扬。干部、战士高兴地说：“红军宣传队回来了”，“这才是我们的宣传队”。当他们离开部队时，第1旅第1团赠送给他们一面大旗，上面写着“我们的宣传队”。这次实践，证明了部队文艺只有把“为兵服务”放在首位，才能最有力地发挥文艺鼓舞士气、更好地服务于当时的革命斗争的作用。

1938年8月，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指导下，由著名的电影艺术家袁牧之和摄影家吴印咸负责筹备，成立了我们党直接领导下的第一个电影工作机构——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简称延安电影团。延安电影团的成立是我国人民电影事业的开端，她成为我国人民电影事业的摇篮。我国人民电影事业的骨干分子，有许多就是从这里培养出来的。

萧向荣对延安电影团的建设和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延安电影团最先拍摄的是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这时，尽管电影团还不归总政宣传部

领导，但萧向荣从宣传工作的整体考虑，给了这一拍摄工作以热情的支持和帮助。1940年电影团改属总政宣传部以后，萧向荣对电影团的建设抓得更具体、更细致了。他经常亲自参加电影团会议，和大家一起学习、座谈，并回答各种问题。他特别强调电影团的每个同志都要争取成为政治工作干部，努力做好党的宣传任务。

电影团摄影队的队长是吴印咸，萧向荣特别关心他的工作和学习。他经常结合研究工作，向吴印咸讲解国内外形势，传达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教以领导方法。凡是比较重要的工作任务，他都是先向吴印咸传达，并听取他的意见。吴印咸遇到工作上的难题，找到他，他总是耐心听完吴印咸的意见后，再帮助他分析、出主意，想办法解决。吴印咸生病住院，萧向荣带上鸡蛋、挂面等营养品亲自到医院看望，使这个由上海来延安参加革命的文化人非常感动，彼此建立了诚挚融洽的工作关系和亲密的革命友谊。

从1940年到1942年，由于日寇对我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反复扫荡，国民党顽固派包围封锁，断绝对陕甘宁边区的供给，我各抗日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进入了抗战最困难的时期。这时，延安电影团也处在胶片来源完全断绝的困境。军委政治部根据这一情况，曾考虑精简电影团。如何处理这个问题，领导电影团的萧向荣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他考虑的是拍电影在一定时期内是很难的了，是否还有其他出路？另外，聚集一批电影艺术人才和专业技术干部不容易，如果分配这些人去干别的工作，再聚集起来就困难了。他和吴印咸反复交换意见后，吴印咸的想法给了他很大启发。吴印咸说，现存的胶片虽然有限，但用来拍少量的电影和照片，还可以维持一个时期，电影团可以一面生产，一面拍摄重要资料。这样，不仅可以渡过难关，还可以把这批电影技术人材保留下来。萧向荣立刻接受了这个设想，并让吴印咸写一个电影团生产自给和提高摄影技术的计划。萧向荣把这个计划报告总政领导，并力陈保留电影团的必要，取得了总政领导的支持，电影团终于保留下来了。

按照生产自给计划，电影团的同志一面参加农副业生产，种粮种菜，一面办起了照相服务部，同时还用废旧胶片制做胸前佩戴的“纪念章”。这些纪念章或镶着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照片，或镶着毛泽东“为人民服务”、“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题词，一时在延安引起轰动。无论谁带上这样的纪念章，都感到很高兴。特别是镶有战斗英雄、劳动模范照片的纪念章发给部队，对指战员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经过自己的努力，电影团实现了办公经费全部自给，还盖起了工作急需的5间瓦房。在萧向荣的直接领导下，电影团顺利地渡过了那段艰难岁月。

1943年，陕甘宁边区的第359旅在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把荒山僻野开辟成万顷良田，创造了惊人的奇迹。电影团用仅有的胶片，拍成大型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真实记录了这一伟大创举。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资料片，也是萧向荣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安排电影团的同志精心完成的。在抗战胜利前后，萧向荣还让电影团相继举办了两期电影摄影训练班，培训电影摄影工作的新生力量。这两期训练班的学员除少数留在电影团外，大部分都回原单位担任摄影记者或做宣传工作兼搞摄影，其中不少人从此走上专业摄影道路，成为卓有成就、造诣很深的摄影家。

1946年，我党在长春成立了第一个电影制片厂——东北电影制片厂。她的成立，也和萧向荣的工作有直接关系。日本投降后不久，萧向荣就让吴印咸、钱筱璋提出一个接受东北伪满电影制片厂的计划。东北民主联军打响进

攻长春战斗的第二天，钱筱璋、田方、许珂等人，就持东北民主联军周保中副司令员的命令进入长春，接管了日寇长期经营的“满洲映画协会”的全部人员和物资。在此基础上，将电影厂建立了起来。东北电影制片厂虽不属部队建制，但萧向荣仍十分关心她的建设。他曾建议这个厂要大力培训摄影人才，抓紧建设摄影技术部门，在工作上，要集中全力为战争服务。根据他的建议，东北电影制片厂派出了若干摄影队到部队去，到前线去，拍摄了大量关于东北解放战争的资料片。他们摄制的《民主东北》各辑纪录片，萧向荣都参与了审查工作。

新中国诞生后，以延安电影团的同志为骨干，成立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当年在电影摄影训练班学习过的学员，有不少走上了电影工作的领导岗位，分别成了许多电影制片厂的骨干力量。

#### “四野”宣传部长

萧向荣对党的政治工作、宣传工作，无比热爱，无限忠诚。对这一工作，他有着极强的自觉性和责任心。在第115师，在延安，在抗日战场上，在解放战争中，他把满腔热血无私地奉献给了党的事业。

抗战胜利后，我国的主要矛盾由民族矛盾转变为阶级矛盾。这时，党中央适时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这个方针的关键是控制东北，依靠东北来对付国民党向我解放区的大举进攻，以使我党我军在斗争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为此，党中央决定从各战略区抽调了2万名干部和10多万主力部队进入东北，并将延安联防军机关大部分干部和陕甘宁边区部队的3个旅组成东进纵队调往东北。联防军机关调往东北的干部编为东进纵队的直属支队，萧向荣任该支队政治委员。

东进纵队直属支队作为干部支队，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家属也在其中。要把这样一支队伍全部安全地带到东北，比带战斗部队难得多。萧向荣深入细致地进行思想动员和具体部署。他亲自检查联政宣传部、宣传队、电影团、印刷厂每个干部的出发准备，每个细节都想得十分周到。

1945年12月初，直属支队到达陕甘宁边区北部重镇绥德。由于我党和国民党的重庆谈判出现新情况，党中央命令直属支队停止前进，在绥德待命。在绥德住下不久，有些干部急于上前线，或希望下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萧向荣及时向领导上汇报直属支队的思想状况，又根据领导的指示及时组织大家学习时事，说服同志们认清形势，执行命令，同时要求大家做好力所能及的工作。1946年春节到来之前，萧向荣就安排联政宣传队准备为绥德党政军和人民群众排练文艺节目，并亲自到现场观看他们的排练。春节一到，联政宣传队连续几天演出“军民互助”、“军爱民，民拥军”、“霸王鞭”等节目，慰问和感谢绥德各界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这次演出引起了绥德群众强烈反响，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1946年9月，萧向荣和东进纵队直属支队的同志们，历尽艰险到达哈尔滨。他担任了东北民主联军即后来的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根据东北战场和部队工作的情况，他明确提出，“宣传方面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打倒蒋介石，为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从这个总的方针出发，他以扎扎实实的工作作风，对宣传部提出必须做好的十项工作：办好《自卫报》；编写政治教育教材；编辑出版配合部队政治教育的读物；经常派人下部队，了解战斗、工作和思想情况，帮助指导部队的宣传教育工作，并为报纸写稿；举办政治教导团，培训部队政治工作干部；加强宣传队建设，推动

“为兵服务”的部队文艺运动的发展，积极参加战时勤务工作；接收青年知识分子，进行政治和艺术训练，为部队培养文艺干部；做好书报杂志发行工作，及时把书报、杂志送到部队；配合新华社东北分社、东北日报社、东北画报社，做好部队对外宣传工作；加强对敌军的宣传工作。

东北战场地域辽阔，战线长，变化快。萧向荣认为，运用报纸指导部队工作迅速及时。因此，他要求一定要办好《自卫报》，使之成为及时传达党中央、中央军委、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指示、命令，指导部队工作，鼓舞指战员战斗意志的有力工具。

为了办好《自卫报》，萧向荣从内容到方法，做了许多具体指示。比如，他要求报导一要抓中心，二要抓典型，要着重报导人和事的主要方面，不要面面俱到，要发挥典型的示范作用，以典型反映战斗或工作的全过程。对于到部队采访的记者，他都要具体指导他们主要采访什么，怎样采访等等。由于战区扩展，前后方距离更远了，前方部队看到《自卫报》需要半个多月的时间，报纸的时效性受到影响。萧向荣从实际出发，立足报纸要真正做到对部队的战斗、生活有用，他要求在当时的情况下《自卫报》采取“报纸的形式，杂志的内容”，主要要总结部队战斗和工作的经验，给部队提供军事教育、政治教育的材料，特别要注重介绍指导作用大的典型，多刊载综合性的、重要的时事消息等等。

指导《自卫报》的工作，萧向荣特别注意抓住时机组织采访，以取得良好效果。1947年2月下旬，我军歼灭了号称“天下第一军”的新第1军的第30师第89团，生擒团长曾琪。萧向荣当即派人和曾琪谈话，并交代“要将谈话内容报导出来”。谈话中，敌团长叙述了他们失败的经过，并说：“谁掌握了主动，谁就能够胜利。这次战斗你们完全是主动的……我们完全处于被动，现在我们在东北的五个军，哪一个军没有挨打？哪一个军没受损失？”随后，一篇《蒋军完全处于被动》的报导在《自卫报》上发表了，并为《东北日报》所转载，这对鼓舞前方部队的士气，增强后方人民的胜利信心，起了积极作用。

在我军三下江南之后，被萧向荣派到第1纵队检查帮助宣传工作的王基础同志发现第3师第9团第3连的指导员孙永章经过一年多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把一个比较落后的连队变成了朝气蓬勃的英雄连队，就把收集到的许多事实和经验写成几篇稿件寄给《自卫报》。历来关心连队工作的萧向荣看到这几篇稿子后非常赞赏，认为对指导连队政治思想工作有普遍意义，就亲自动手修改，连续在《自卫报》上将这几篇报道发表出来，产生了良好的反响。萧向荣又亲自把这些报导编成题为《模范指导员孙永章》的小册子，并亲自写了前言，印发给部队。

为及时指导部队工作，萧向荣亲自撰写了许多紧密结合部队中心工作的社论，如《关于立功运动》、《关于党委制》、《东北战局已开始变动》等等。他还把《自卫报》发表的社论汇编成集，发给部队阅读，让“笔”发挥枪的作用。

用“笔”来形容萧向荣所长期从事的政治工作和宣传工作，或许是不全面的。因为除了写之外，他还要说。他担负的工作的性质、特点，决定了他自己要说到写，同时要领导、组织别人说到写。

萧向荣的笔是犀利的，由他组织起来的千千万万支笔，更是无比的犀利。在硝烟弥漫、血与火的战争年代，离不开枪，但同样离不开笔。笔也是取得

革命胜利的必不可少的武器。正因为这样，萧向荣热爱“笔”，着重“笔”，从未错过以笔作枪来对付敌人的机会。

从1945年到1946年6月，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援助下，大量增兵东北，妄图抢占这个重要的战略基地。在以美械装备的蒋介石军队的疯狂进攻面前，对能不能打败敌人的问题，必须使我军指战员有明确的认识，这是关系着士气，关系着这场战争胜负的问题。为此，按照萧向荣的建议，我军在东北各部队普遍进行了革命战争教育。他为此起草了《战争教育提纲》作为这次教育的基本教材。他还撰写了《自卫战争》和《人民军队》两篇文章，作为补充教材。在这些教材中，他详细论述了革命战争的性质，尖锐揭露了蒋介石汉奸卖国贼的丑恶嘴脸，深刻分析了敌我双方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力量对比，指明了革命战争必然取得最后胜利的历史前景。与此同时，他还组织编写了《党员课本》、《新战士课本》、《干部教育丛书》、《战士教育丛书》等多种材料，供部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使用。在部队中普遍进行的革命教育，提高了指战员对革命战争和战争前途的认识，坚定了胜利的信心。

时事政策教育作为宣传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萧向荣一向非常重视。他把给指战员作时事报告，看作是自己份内之事，看作是进行时事政策教育的有效方式。他随时随地注意收集、积累时事资料，进行分析整理。他走到哪里，就把时事报告作到哪里。他在每一次时事报告中，对敌我力量消长，县以上城市的得失，特别是对蒋介石军队的实力及其被歼灭的情况了如指掌。从蒋军的总兵力、总部署，一直到师驻地，到蒋军的指挥机构，师以上的指挥官以及蒋军被歼部队的番号、人数、指挥官等等，都讲得一清二楚。听过他的报告的人，无不被他丰富的材料，精辟的分析和中肯的论证所折服。仅据1947年不完全统计，他给军队和地方作的时事报告就有23次之多。1948年后，随着我军的胜利大进军，沈阳、北京、开封、广州等地的军队和地方干部，大专院校的师生，很多人都听过他的时事报告，受到巨大鼓舞。

每当战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他都挤时间撰写评述文章。1946年10月底，我南满部队全歼被称为“千里驹”的蒋军主力第25师，活捉师长李正谊。萧向荣立刻写了《从辽东胜利来认识美械嫡系蒋军》一文，在《自卫报》上发表，揭露了蒋军的外强中干。1947年3月，我军经过“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艰苦作战，歼敌5万余名，粉碎了敌人在东北“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从此取得了战争主动权。萧向荣又为《自卫报》撰写了《东北战局开始变动》的社论。1947年3月13日，蒋介石嫡系部队胡宗南集团分两路向延安发起进攻，我军从战略上考虑，于19日主动撤出延安。敌人对此大肆吹嘘所谓“进攻的胜利”，摆出不可一世的架势。这时，心中装着全局，对战争充满必胜的自信的萧向荣，及时撰写和发表了《胡宗南找到了坟墓》的文章，以透彻的分析，预见性的揭示了胡宗南必败的结局。

这一阶段，萧向荣不仅撰写了多篇时事评论刊登在《自卫报》上，同时还主持编辑出版了《时论丛书》和《时事漫谈》作为指战员学习时事的读物。其中《一九四七年的任务》、《中国人民的庄严声明》、《脂粉下的豺鬼》、《蒋介石的慌张》等篇，在军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东北战场和全国各个战场一样，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战斗十分频繁。部队只能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短暂间隙，进行兵员和装备的补充，开展练兵运动。为搞好练兵工作，萧向荣提出了加强练兵过程中政治思想工作的意见，

并专门为部队干部作了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提了具体要求，讲了具体做法，从而保证了练兵任务的顺利完成。

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曾制定过一个很有影响的条例——《部队战时立功条例》，它是由萧向荣起草，经反复讨论、修改后颁布执行的。这个条例激发了部队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使战斗情绪更加旺盛。对部队中大量涌现的战斗英雄及英雄事迹，萧向荣主持编印了几集《保卫东北的英雄》的小册子，广为宣传。

在我军进行解放战争的同时，党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这个运动意义重大，它进行的好坏，关系着革命战争的胜利，关系着能否建立一个新中国。在部队中进行土地改革教育，帮助指战员弄清楚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的关系，是当时部队政治教育中最根本的一课。

还在土改运动初期，萧向荣就为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起草了《拥护实行土地法的训令》，教育部队拥护土地改革，开展部队土改教育时，萧向荣又起草了《土改教育意见》，指导这项工作。1947年9月，萧向荣收到第3纵队的一份《关于土改教育情况的报告》，引起了他的重视。报告介绍了这个纵队第7师第20团以第9连战士房天静、机枪连班长任纪贞受苦的事实作教材，开展诉苦运动，进行阶级教育，极大地提高了指战员的阶级觉悟，使部队空前团结，战斗情绪极为高涨，涌现出许多英雄、模范事迹的情况。萧向荣立即指示《自卫报》社对此报告加以整理，并写了一篇短评同时发表，《东北日报》很快也转载了此材料。9月28日，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将《三纵队学习土地政策经验（诉苦）介绍之二》，上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毛泽东主席亲自向全国批发了这个报告，使诉苦运动在全军各部队热烈开展起来，取得了很大成效。毛泽东在1948年3月写的《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对诉苦运动的意义和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诉苦和新式整军运动中，萧向荣亲自深入连队调查研究，总结出一套土地改革教育的经验，为部队政治建设提供了有益的教材。

在东北工作期间，萧向荣成功地领导了东北民主联军的文艺工作，使之全面、健康地蓬勃开展起来。他的关于部队文艺工作如何“面向连队，为兵服务”的一整套思想、理论和做法，也是在这期间臻于完善并得到进一步发展的。

归结起来，这期间他对部队文艺工作的开展主要办了5件大事：

——在佳木斯组建了部队艺术学校，又在哈尔滨举办青年训练队，为各部队培训了一批具有“面向连队，为兵服务”思想的文艺骨干。

——在哈尔滨创办《部队文艺》刊物，共出版了5期。1947年4月1日《部队文艺》创刊号以“演唱专号”出版时，萧向荣亲自撰写了《部队的文艺工作应该为兵服务——代发刊词》。《部队文艺》为部队和宣传队提供了一批演出材料，也很好地宣传了部队文艺工作要“为兵服务”的思想。

——指导文艺工作者创作了一大批歌舞剧、演唱和歌曲。有的歌剧，如《杨勇立功》、《好班长》、《张裁之死》，演唱如《兄弟参军》、《唱坚守排》，歌曲如《说打就打》、《我为人民扛起枪》、《歼灭战》等，在部队和人民群众中广为流行。

——创建了一支专业舞蹈队伍。1947年，在他的指示和关怀下，从哈尔滨青年训练队挑选了三四十个能跳舞、懂音乐的学员，建立了我军第一个专业舞蹈队。经过一年半努力，舞蹈队创作了反映革命战争和军队生活的大

型舞蹈《进军舞》，第一次在刚解放的北平演出时，以新鲜、刚健、丰富、优美的格调，引起了当时新老区和军内外文艺工作者的震动和注意。

——开展连队演唱运动。对于“演唱”这种艺术形式，萧向荣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他认为“演唱”就是小型的歌舞剧，它有化妆、有动作，有表情，演员最少在两人以上，又演又唱，又唱又演，能够表现比较丰富的内容，也能够用更适合的音乐表达感情，通过演唱可以简捷地把人物和事件过程反映出来，给人的印象深刻、强烈，适合战时的环境和连队的特点。1948年春天，部队进行整训的时候，萧向荣指示宣传队组成3个文艺工作组，分别到第6、7、8三个纵队去开展连队群众性的演唱运动，他自己还亲自带一个大组到第10纵队指导开展“学英雄、唱英雄”的演唱运动。经过一个多月的活动，不仅带动了这4个纵队的各级宣传队，发现和培养了一批连队文艺骨干，使这几个纵队的连队群众性文艺活动普遍开展起来，而且经过事后总结，并写成文章在报纸上发表，有力地推动了东北各部队连队文艺活动的蓬勃开展。

1947年1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布署了对敌宣传工作。萧向荣认真组织贯彻这次会议精神，做了大量工作。他先后亲自起草和组织了一大批对敌宣传的传单和小册子，如《国民党卖国事实》、《蒋军官兵的凄惨下场》、《告国民党军官书》等。还为《自卫报》写了《争取蒋军工作》和《对敌政治攻势》等社论。当我军研制出对敌宣传弹（用六炮把宣传品送到敌人阵地上）时，他通过报纸宣传这一创造，既引起了部队各级领导对对敌宣传工作的重视，也启发了指战员对对敌宣传多样化的认识。前线指战员由开始的战场喊话，发展到节日给敌军士兵送礼品，或进行战场联欢等活动。

如何教育俘虏，是对敌宣传的一个重要内容。萧向荣主张对俘虏教育要分步骤进行。一是个别谈话或漫谈，二是有组织地座谈，三是开展诉苦运动，四是进行革命思想教育。他还组织编写了解放战士读物一、二、三集，出版了《解放军官的谈话》、《走入人民的行列》等小册子。这些做法，在解放战争中曾发挥了巨大威力，有效地分化瓦解了国民党军队。

辽沈战役是我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第一个大战役。发起辽沈战役的当天，萧向荣为东北野战军总部起草了《关于战役口号的指示电》。次日，又为该军政治部起草了《战时政治纲要》，发到野战军各部队。此外，《关于新区政策的指示》、《关于二线兵团参加战役行动的政治动员》等文件，也都是由他起草完成的。

1948年11月初，萧向荣和野战军政治部的干部进入沈阳后，多次召集新华分社和报社的同志开会，研究对新区的宣传报导工作。他还要求各部队宣传队抓紧时间组织为新区群众演出，以此让群众了解党的新区政策，了解我军的宗旨。

刚刚解放的沈阳，市内国民党的散兵游勇有七八万人，对社会治安影响很大。为了将这些人收容起来，萧向荣确定由驻沈阳的几个纵队的宣传队担负收容任务。在各宣传队的努力下，只用了几天时间，就将这些散兵游勇全部收容了。1948年12月，东北野战军奉命入关作战，野战军总部关于部队入关作战的动员讲话，是萧向荣起草完成的。他还在政治部机关召开的动员会上作了入关作战的动员报告。在向关内进发的火车上，萧向荣把两个椅子并起来当办公桌，几块小木板架起来当小凳子，起草了对新闻报导工作的指示和入关后部队对群众的宣传口号。

1949年元旦，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发表。



他向国内外庄严宣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将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这是一篇战斗檄文，敲响了蒋家王朝的丧钟，昭示了新中国的诞生。这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萧向荣深知这篇文章意义重大，所以元旦一过，他首先在野战军直属机关、部队的干部会上对这篇文章做了详细讲解，对如何学习这篇文章做了具体指示和安排。同时，他又编写了学习教材，在野战军中开展广泛深入的学习《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的热潮。

在平津战役中，东北野战军政治部曾有几天住在通县师姑庄。这期间，萧向荣得知北平郊区的双桥有国民党中央社广播电台的一个发射基地，他马上从部队调了一个营长带着一个连队去保护这个基地，以便北平解放后供我方广播电台使用。由于他采取的措施得力，这个发射基地被完好地保存下来，北平一解放，就派上了用场，我方立即用它进行广播宣传。

《自卫报》作为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机关报，是在蒋军大举进攻我东北解放区，东北我军处于战略防御的情况下创办的。而在我第四野战军即将向中南挺进，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胜利在望的时候，“自卫”显然已不适应形势继续用作报纸的名字。于是，萧向荣按照四野总部的决定，在北平期间，主持了将《自卫报》改为《前进报》及更换版面的工作。萧向荣亲自起草了更名改版启事和《前进报》的报导提要，并重新对工作人员作了分工，提出了办报的具体要求。萧向荣指出，报纸应当成为部队工作成绩大小、任务完成好坏的评判员，成为帮助部队发现问题，改进工作的医生。

1949年，萧向荣接受第四野战军总部派遣，出任第15兵团政治部主任。在离开武汉的时候，他收集了部队开展演唱运动的优秀节目，汇编成《演唱选集》，并编辑了《前进报社论选集》。他还向总部提出两项建议：由野政宣传部创办综合性刊物《部队生活》；由野政文工团抽调部分同志创办一个部队艺术学院，均获批准并实现了。这所部队艺术学院是我军建军史上第一个比较正规的培养文艺人才的学院，毕业的学员不仅分配到第四野战军，也分配给其他野战军，对全军文艺工作的建设起了良好的作用。

萧向荣主持第15兵团政治部工作后，对兵团政治部干部提出的工作要求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勇于负责，不怕困难，不怕麻烦，勤勤恳恳地为部队服务的工作态度。他要求，对部队提出和反映的问题，一定要出主意、想办法解决，绝不能消极、冷淡和漠不关心。兵团政治部下属机构有组织部、宣传部、保卫部、民运部、秘书处等部门，萧向荣深入到一个一个部门，具体研究各部门如何开展工作。他专门同宣传部研究了出版兵团机关报《连队生活》的有关事宜，并为《连队生活》报创刊号撰写了发刊词。

1949年盛夏，长江以南的江西地区酷热多雨，不仅给兵团行军带来极大困难，也暴露出指战员的一些新的思想问题。兵团各部队的指战员大多数是北方人，初到南方，生活上不习惯。有些干部、战士对行军爬山、过河蹚水、连阴多雨、蚊虫叮咬、疾病不断等，产生了厌烦和畏惧心理。有人甚至提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底”在哪里的的问题，以及到了“底”以后怎么办？个人的问题怎么解决等等。针对如此等等的思想问题，萧向荣组织在部队中进行“将革命进行到底，争取立解放战争最后一功”的思想教育。他在自己起草的政治工作文件中，在为《连队生活》报撰写的社论、文章中，在各种会议的讲话中，都注意阐述这个问题，明确回答这个问题。他指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底”，就是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在到“底”之前，我们必须打到广东、海南岛去，还要走两千多里路，还要打几个大仗。这是困难，

但要克服。如果不能坚持到底，对个人、对革命事业的损失就太大了：个人会失去过去的光荣，革命已取得的胜利不能保持、巩固和发展，甚至可能前功尽弃。他一再要求全兵团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克服前进中的各种困难，更好地树立“为兵服务”的思想，关心战士，爱护伤病员，反对官僚主义习气。与此同时，他还编写了《关于我国南方夏秋季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广东情况介绍提纲》等材料，帮助指战员解决生活不习惯、不适应的困难，提供防病治病的方法。

在1949年9月11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召开的著名“干州会议”上，萧向荣受命兼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长。因此，萧向荣参与了进军广东的军事、政治、组织等多方面的准备工作，参加了广东、广西省军区领导干部的配备、两广所属军分区的划分及军分区干部配备等问题的讨论，并主持召开了进军广东的宣传报导工作会议。这期间，许多文件、电报诸如《关于纪律问题的十个要求》、《广州入城守则》、《关于解放广州后的警备任务》等，都是由他动手完成的。

1949年10月，广东解放。1951年4月，萧向荣任华南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参加了第15兵团党委和华南军区党委的工作。除在军队任职外，萧向荣还兼任了地方各界的多项头衔。严肃、认真的他，把这许多职务都看作是党和人民赋予自己的责任，一丝不苟、竭尽全力地去服务、去完成。他每天几乎连续工作十四五个小时，有时甚至几天连轴转。他毕竟不是钢打铁铸之躯，即使是，也需要间歇。一次，他突然病倒了，很吓人。医生紧急赶来，却查不出什么病症。当了解了他的工作情况后，医生下了诊断：疲劳过度！处方：好好休息。而他，只休息了一天，便又投入紧张的工作——这就是萧向荣，多年如一日的萧向荣。

广东解放较晚，广东省，特别是广州市，是全国反革命势力比较集中的地区。因此，在广东解放初期，剿灭土匪、镇压反革命，是我党我军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萧向荣受命总负责。1950年4月，华南分局召开常委会，讨论毛泽东关于镇反工作的指示，萧向荣发言说：华南“镇反”开展较晚，要做好这项工作，运动结束的时间也应相应推迟，不能急于求成。作为当时兼任第15兵团军法处长的他，对反革命案件的审理，从党的政策出发，极好地把握了严宽分明，区别对待的原则。作恶多端、罪大恶极者镇压不贷；可杀可不杀者，视其认罪态度，能宽则宽。一次，他接到一份处决一批反革命分子的报告，其中有一人只有十六七岁，工作人员建议，这个人年纪还轻，罪恶也不很大，能否考虑不杀。萧向荣仔细审阅了案卷，接受了工作人员的建议，把这个人宽赦了。

由于对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执行得好，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广东全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安定局面。萧向荣曾在《南方日报》上发表了他1950年4月在广州市召开的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为军队代表的发言——《我们一定要在短期内解放海南岛和肃清全省土匪》，对稳定人心，打击蒋介石残余匪特的破坏活动，起了很好的作用，广东人民为之振奋。

提起《南方日报》，人们都不会忘记萧向荣的一份功劳。萧向荣一到广州，就把创办《南方日报》这份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机关报的工作，作为大事抓得十分紧，十分认真。到广州的第二天，他就召开该报出版工作会议。第三天，他又找调往《南方日报》帮助工作的有关同志谈话，要求他们迅速赶赴岗位工作，抓紧筹备出版事宜。结果，只用了一周，《南方日报》就正式

出版了。从1949年10月27日报纸出版之日起，直到12月末，萧向荣每天凌晨2时到5时，都要看报纸大样，进行最后审定，他没有睡过几天踏实的觉。

华南解放初期，各方面都需要干部。毛泽东指示，要在南方办好一个大学。萧向荣是南方大学的筹备委员会成员，也是三人校务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南方大学的开学典礼和第一期学员的毕业典礼，他都出席并讲话。在第一期学员毕业典礼上，他针对学员即将奔赴各自工作岗位的实际，发表的题为《彻底清除官僚习气和官僚作风》的报告，列举了官僚习气和作风的“八条罪状”，进行深入的分析、批判，给了学员深刻印象和很好的教育启迪。他的讲话后来在《南方日报》发表，为党的干部队伍的思想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教材。并且，萧向荣清廉自律，公正处事，不以职权地位询私，以实际行动做出了反对官僚习气和官僚作风的榜样。

萧向荣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回到广州后，一些亲戚朋友都来找他帮助安排工作、解决问题。他以一个共产党人大公无私的态度，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很好地处理了亲情和工作原则之间的关系。他说，国民党盛行的那种“裙带风”，在我们革命队伍中应该绝迹。他有个亲弟弟，曾找他要求在部队中安排工作，萧向荣耐心地对弟弟进行了说服教育，终于说服他回到家乡梅县，在石扇乡供销合作社当了售货员，直到逝世。萧向荣不给弟弟安排工作的事一直在梅县群众中传为佳话。

1952年1月，萧向荣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他要求办公厅的各级干部都不要把自己看成是什么主任、局长、处长、科长，而要把自己看成是承上启下、传达军委指示、反映部队情况、做具体工作的秘书和管理员。必须树立全心全意为全军部队服务的思想。他还强调说，“我自己就是军委的大秘书、大管理员。”在实际工作中，萧向荣的的确确是这样做的。

刚到军委办公厅工作不久，萧向荣就感到各总部、各大军区给军委报送的大量工作报告大都文字冗长，工作繁忙的军委领导难以全部看完，只好把报告压下。于是，萧向荣就采取自己先仔细审阅报告的办法，然后从中摘取要点，再以最简明的文字写成报告，上报毛泽东主席和军委其他领导。后来，毛主席曾赞许地说，“我对军队情况的了解，很多是从萧向荣送来的报告中得到的。”

自从任军委办公厅主任之后，军委的许多重要文件、报告、电文，都是萧向荣亲自动手起草写作的。他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负责态度和严肃认真的工作精神和工作成就，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他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为我军的建设和发展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从黄土地里走出来的将军崔田民

崔世拙

崔田民（1912～1991）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陕北革命根据地和陕北红军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原名逢吉。1912年正月出生于陕西省绥德县铁茄坪村。192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陕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保卫局局长、国民经济部部长。长征到达陕北后，奉命调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第78师政治委员，参加了著名的直罗镇战役。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第687团政治委员、第689团政治委员，344旅政治部主任兼冀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八路军第2纵队兼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司令员，中共冀鲁豫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冀鲁豫边区行政主任、公署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1纵队政治部主任，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华北局党校第四部主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处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二炮兵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1988年8月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曾当选为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共七大、八大代表，十三大特邀代表，第四、第五、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991年11月16日在北京逝世。

\* \* \* \* \*

滚滚无定河，蜿蜒数百里，奔腾呼啸流入黄河。无定河两岸的河谷，是沟壑纵横、丘陵连绵的黄土高原所难得一见的平川。无定河与大理河汇合的三角地带，有一座依山傍水的古城，这就是塞上名城——绥德。

绥德是陕北的交通枢纽，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早在秦代，大将蒙恬就在这里戍守，秦始皇长子扶苏也来此地监军。西汉“飞将军”李广，屯兵上郡（即绥德），匈奴闻之丧胆。城东虎坞村，传说是因李广于此射虎而得名。几千年来，这里有过多少次刀光剑影、鼓角相闻的生死拼搏。有“誓扫匈奴不顾身，八千雕纓丧胡尘”的悲歌，也有“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咏叹！

人杰地灵，英才辈出。刻在绥德东门外石崖上“钟灵毓秀”四个大字，不就蕴含着这是一块藏龙卧虎的宝地吗？陕北还流传着这么一句民谣：“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这也许是对米脂姑娘漂亮、绥德小伙精干的赞美，也许是因为米脂出过貂蝉、绥德出过韩世忠的缘故。悠悠历史，灿烂文化，哺育出无数具有传奇色彩的杰出人物。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近百年来，诞生在陕北高原上的革命英雄，更是光照青史，名范后人。崔田民就是吃绥德小米，喝无定河水，从这片黄土地里走过来的一位将军。

顶风而上勇敢无畏闹革命

1927年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制造了举世罕见的“四一二”大惨案。陕北军阀井岳秀遥相呼应，紧密配合，派兵封闭了进步的学校绥德第四师范，到处搜捕共产党人，残酷地镇压革命运动，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黄土高原。陕北早期的党、团员，有的被捕入狱，有的惨遭杀害，有的畏难消沉，还有的自首叛变，革命暂时处于低潮。在这危难关头，还在绥德第一高等小学上

学的年仅 15 岁的崔田民挺身而出，于同年 9 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党，冒着血雨腥风，勇敢地走上艰难的革命征程。

崔田民组织学生闹学潮驱逐反动校长，引起反动当局的注意，井岳秀派来一连白匪军，把一高团团围住，要抓领头闹学潮的学生。在同学们的掩护下，崔田民离开了学校。他回到家乡铁茄坪后，在本村小学当了教师，以教员的合法身份作掩护，同失散的党员、团员取得联系，秘密发展党团员，建立基层党，团组织，开展农民运动，着手组织武装斗争。1933 年召开的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选举崔田民为特委委员。

1933 年 8 月 5 日，崔田民在清涧县王家山组建了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 2 支队，罗永宽为支队长，高朗亭为政委。将崔正冉、王巨德从白军哗变出来的士兵手中缴来的三支自来得手枪，交给第 2 支队，作为游击队的武装。崔田民说：“要搞武装斗争，光靠这三支枪是不行的。我们要用手中的大刀长矛，夺取敌人的枪支来武装自己，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壮大自己，消灭敌人。”同时宣布了红军游击队的纪律。游击队成立以后，立即开展了对地方反动势力和土豪劣绅的武装斗争。

同年 9 月，特委组织特务队。崔田民对第 2 支队的同志们说：“保卫特委机关很重要，把手枪送给特务队，我们再从敌人手里夺。”便派高朗亭、罗永宽给特委送去了手枪。

第 1 支队从安定南下，与第 26 军第 4 团配合，打了几个漂亮仗。返回安定后于 11 月 20 日攻打秦树坪失利，退回安定。因队员失散很多，难以立足。遂将枪支埋藏，队员疏散。崔田民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派崔正冉、张爱民、李相海等同志，前往安定恢复第 1 支队。几个游击队员化装成江湖卖艺的，与黄湾楼的黄秀英接上关系，去景家坪取出第 1 支队埋藏的 13 支枪，而后返回清涧东区。

1933 年农历腊月初八，清涧县解家沟正遇集会。崔田民在距解家沟不远的王家山村王巨德家里召开了第 1、2 支队联席会，作出了袭击腊八会的决定，并进行了周密部署。这天傍晚，清涧东区的豪绅聚集在地主高潘家里，正七嘴八舌地争论着征收粮款的事。第 1、2 支队的游击队员，在赤卫队配合下，突然闯入会场，抓住了高潘等地豪绅和催粮的衙役共 10 人。游击队的负责人，宣布了他们的罪行，并贴了布告，当即处决。其中一个被砍了一刀，未被砍死，游击队撤走后，他苏醒过来跑了（不久又被我游击队镇压），这就是当时流传四方的红军在解家沟腊八会上杀了九个半地主豪绅的故事。自此之后，清涧东区、绥德南区的土豪劣绅再也不敢横行霸道逼租收税了。第 2 支队又在赤卫队的配合下袭击了店子沟李成善的民团，缴枪 10 余支，开辟了绥德南区、清涧东区、延川东区游击根据地。

袭击腊八会后，崔田民将崔正冉、张承忠所带的第 1 支队，派回安定，开辟游击根据地。1934 年 1 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谢子长回到陕北。崔田民听说谢子长抵达清涧东区，立即派第 2 支队武装护送回安定。谢子长回到安定后，先将疏散回家隐蔽的干部谢绍安、李盛堂等集中在一起，又找到了一些疏散回家的游击队员，取出了埋藏的 6 支枪，很快又和崔田民从清涧派回安定的第 1 支队会合。3 月 8 日正式恢复了红第 1 支队。谢子长任命李盛堂为支队长，贺晋年为政委。从此这支游击队就在谢子长领导下，在安定、清涧、绥德一带，开展革命游击战争。

1934 年 3 月，崔田民和郭洪涛研究进一步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游击根据

地。崔田民找来崔正冉，对他说：“把你去年组建的游击队拉出来，扩建个游击支队。”崔正冉到王家沟，把队伍带到苏家圪坨。3月8日，郭洪涛代表中共陕北特委宣布：“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5支队”正式成立，任命崔正冉为支队长，马万里为政委。

4月，在佳县神堂沟召开了陕北特委党团联席会议。崔田民和崔田夫、马明方、郭洪涛、张达志、李铁轮等同志经反复研究，提出了创建一师红军的奋斗目标，并决定实行土地分配，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革命根据地。会后，崔田民去清涧、神府地区巡视工作，组织群众保卫麦收，并将神府的3支队扩编为红3团，成立了神府革命委员会。

5月，陕北军阀井岳秀第86师及各县民团1.5万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敌人用分兵合击的办法，到处烧杀抢劫，企图摧毁根据地，消灭游击队，巩固其反动统治。他们把崔田民的大哥，崔田夫的妻子、儿子，崔文运的儿子等革命家属抓去，关在绥德的大牢，受尽非人的残酷折磨。

崔田民从神府回到白色恐怖笼罩着的绥德南区。在那血雨腥风的日子，他冒着生命的危险，走遍了南区的每个村庄，抚恤慰问烈士家属，号召党、团员化悲痛为力量，更加坚强地和敌人进行斗争。并组织群众坚壁清野，积极配合游击队，粉碎敌人的反革命“围剿”。

7月8日，在安定县的阳道茆，成立了陕北红军游击总指挥部，谢子长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率领第1、2、5支队，一举攻克安定城。7月23日，谢子长率红第26军第3团和陕北游击队第1、2、5支队，三战三捷，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围剿”。

是年冬，崔田民、马明方等特委委员分赴各地，发展革命武装，建立红色政权，至年底，红军游击队已发展到26个支队。游击根据地的各级苏维埃政府，也普遍建立起来。

1935年1月，崔田民在安定县白庙岔，筹备并主持召开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代表百余人，大会开了三天，1月15日胜利闭幕。成立了陕西省苏维埃政府，选举马明方为主席，崔田民、霍维德为副主席。

1月30日，陕北特委在白庙岔宣布将陕北红军游击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7军第84师。

陕北红军的迅速发展壮大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使国民党统帅部也为之震惊。蒋介石调集了6个师，30个团，约5万人的兵力，对我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围剿”的战略重心是安定、绥德、清涧。这次“围剿”，完全照搬对我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一套办法，采取分割“清剿”、逐区蚕食的方针，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同时组织“还乡团”、“铲共义勇队”，辅之以政治欺骗宣传，推行保甲连坐法，并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企图彻底摧毁陕北革命根据地。

在第二次反“围剿”的斗争中，崔田民按照陕北特委总结的土改试点经验，在全省进行了土地分配，并且与马明方一道，及时纠正了土地分配中的一些偏向。经三个月的奋战，4月底完成了全省的土地革命，从而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忱，为取得反“围剿”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崔田民派去搞兵运工作的石厚刚、雷维烈在横山县石湾的战场上，击毙敌连长，率士兵前线倒戈，对这次战争的胜利

起了很大作用。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使陕北和陕甘边连成一片，形成了西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提供了落脚点。这是西北人民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

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 25 军于 9 月 15 日到达永坪镇，受到陕北根据地郭洪涛、马明方、崔田民等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欢迎。粮食、猪、羊、红枣、鸡蛋源源不断地送到红 25 军驻地，慰问战士。正如刘华清同志在《忆徐海东》一书中描述的那样：“特别使大家感动的是，陕北人民对我军无微不至地关怀。农会、妇女会、儿童团为我们送粮送柴，慰问我军。赤工军、儿童团为我们送信、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战士们看着这一切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

毛泽东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经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于 1935 年 10 月 19 日胜利到达陕北根据地的吴起镇。陕西省苏维埃政府张贴布告，组织群众，热烈欢迎中央红军。陕西省苏维埃政府及时下达了“给各级苏维埃政府关于扩红工作的通令”、“通令”中指出：“为巩固革命根据地，粉碎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为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必须巩固与扩大红军。各级苏维埃政府自接到本通令之日起，到九一八止，在这一期间，最低限度要号召扩大红军战士 500 名，以后每半月要绝对保证五百名新战士的号召……”各级苏维埃政府及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响应“扩红”号召，迅速壮大了红军队伍，加强了红军战斗力。

#### 奉调红军东征西战写春秋

中央红军和第 15 军团会师后，中共中央决定组织新的西北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统一红军作战指挥；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下辖红 1 军团和第 15 军团。

由于新战士不断增加，队伍日益扩大，部队干部就显得特别短缺。加之，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肃反，好多红军干部被捕，有的竟惨遭杀害，这就大伤了红军的元气。为了加强军队建设，必须抽调一部分优秀地方干部充实军队。在这种情况下，崔田民被调到第 15 军团，担任第 78 师政委。

崔田民到职后，先召开了连以上的干部会议，打通干部思想。接着又给全师指战员作了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陕北红军和鄂豫皖红军合编成 15 军团，使红军壮大了，战斗力强了，能打大胜仗了。劳山战役、榆林桥战役，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不管是陕北的干部，还是鄂豫皖的干部，都是共产党派来的，都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保卫陕北革命根据地，全体战士，一定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团结战斗，为彻底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而努力奋斗。”崔田民同志还对干部和战士做了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崔田民和来自鄂豫皖的田守尧师长团结得很好，他们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互相学习，给广大指战员做了很好的榜样。这样一来，部队情绪稳定了，战斗力加强了。

第 1 军团、第 15 军团两支红军的胜利会师，使部队的战斗情绪十分旺盛。但当时面临的形势仍然十分严峻。蒋介石对陕北根据地发动的两次“围剿”被粉碎之后，又调集和指挥十余万中央军和东北军，从南北两线对我陕北根据地开始进行第三次“围剿”。参加这次“围剿”的敌军主力是东北军董英武部第 57 军第 109 师、111 师、106 师、108 师。他们从甘肃的庆阳、合水、阳白镇沿葫芦河向富县前进。另一路是王以哲部的 117 师，沿洛川、富县大道北上，接应董部东进。同时，增援甘泉、延安守敌，打通洛川、富

县与延安之间的联系，构成沿洛河南北封锁线，妄图乘我军立足未稳，采取东西对进，南攻北堵的方针，将我军聚歼于洛河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彻底摧毁我陕北根据地。

为了粉碎蒋介石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给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扎在西北奠定基础，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决定歼敌先头部队第109师，以挫伤敌人的嚣张气焰，并把作战地点选择在位于富县城西约120里的直罗镇。

直罗镇位于葫芦河中游，是甘肃庆阳通往陕北富县、宜川的必经之地，全镇不满百户人家，东、北、南三面环山，一条从东向西的大道穿镇而过。镇子东头有一座古老的小寨，里面的房子都已倒塌，但围墙却大部完好。

毛泽东和军团首长经过充分研究，制定了直罗镇战役的计划，决定采用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方针，将敌人放进直罗镇，趁其立足未稳，我军集中优势兵力，将敌围歼。

第15军团团以上的干部召开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亲自到直罗镇，带领两个军团团以上的干部，走遍了附近的各个山头，周密地观察了地形。边观察，边研究，确定了具体部署。红1军团主力设伏在直罗镇北边的山头。以一部分兵力隐蔽在张家湾北山，准备打敌援兵或溃退之敌。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总指挥所，就设在北山杜家砭村后吴家台山上的一棵大梨树下。第15军团第81师1个团，继续围困甘泉，1个团在甘泉地区配合地方游击队钳制富县之敌，防止西援。派一个营拆毁直罗镇镇东小寨的寨墙，以防敌人利用。派一个连进至镇西北山，担任警戒，配合当地游击队，节节抗击，诱敌深入。第15军团的主力，埋伏在直罗镇南边的山上，以一部分兵力隐蔽在直罗镇与黑水寺之间的张家湾，任务是截断敌军的前后联系。

崔田民站在南山顶上，整个直罗镇全在他的视野之下：西边是葫芦河，东、南、北群山环绕，天然生就一块典型的盆地。毛泽东把兵力配备得如此得当，敌军已是瓮中之鳖，手到擒来。想到这里，崔田民心里不禁由衷地敬佩毛泽东“口袋阵”的英明部署。

据可靠情报，敌第109师共3个团，5500余人。装备精良，重武器较多。要实现全歼计划，战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崔田民在张村驿给第78师全体指战员作了政治动员，各团认真开展战前军事训练。全师官兵士气旺盛，斗志昂扬，决心英勇杀敌，打好会师后的第一仗。

11月20日凌晨，敌第109师在六架飞机掩护下，和游击队断断续续地打了一路。正午前，敌第626团、627团闯入直罗镇。敌师长牛元峰接到占领直罗镇的电话，急忙向总部报捷，接着就大摇大摆地带着亲信，随第625团进入直罗镇。

红81师的一个连和游击队牵着老“牛”的鼻子，把这条蠢牛顺溜溜地装进“口袋”里来了。

这天，正下着小雪，到处白茫茫的，天气显得格外冷。崔田民和第78师的指战员趴在南山坡的雪地里，静静地等待着战斗的来临。

21日拂晓，毛泽东一声令下，杀声动地，号声震天。我军突然以排山倒海之势从直罗镇南北山上同时发起了攻击，两路红军象两只铁拳砸了下来，直捣敌人营垒。

敌人在我军突如其来的打击下，乱作一团，很快被我分割为几块，大部



被歼。敌第 626 团在敌第 625 团的掩护下，拼命向直罗镇北山反扑，与第 1 军团第 2 师、4 师形成拉锯战，到处是枪炮声、拼杀声，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

第 15 军团的指战员，将敌第 627 团歼灭后，立即抄在敌第 626 团的后面发起攻击。敌第 626 团在我前后夹攻下，很快土崩瓦解了。

敌师长牛元峰率其残兵败将 500 余人，逃窜至镇东小寨里负隅顽抗。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来到第 15 军团指挥所，命令第 73 师第 232 团围攻东头寨子，必须堵死敌人向东逃跑的去路，一定要打歼灭战。

崔田民立即和韩先楚率第 232 团，把东头寨子围了个水泄不通。韩团长伤口还未全愈，崔田民给副团长下了死命令：一定要把寨子东边严严实实堵住，不能让牛元峰向东逃窜。22 日、23 日，敌人东西两路援兵，都被我军击退。牛元峰见待援无望，只得孤注一掷，于 24 日拂晓拼命突围，崔田民、韩先楚指挥第 232 团英勇拼杀，全歼第 109 师残部，牛元峰被当场击毙。

向西逃窜的敌第 106 师第 617 团，被我红 1 军团第 2 师和第 75 师第 225 团歼灭。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

直罗镇战役以后，中央决定，设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博古任办事处主席兼外交部长，蔡树藩任内务部长，王观澜任土地部长，崔田民任国民经济部部长（在前线，未到职，后由毛泽东任国民经济部部长），林伯渠任财政部长，邓振询任劳动部部长，邓发任粮食部部长，徐特立任教育部部长，谢觉哉任司法部部长，罗梓铭任工农检查局局长。

为了防止北线敌人扰乱，巩固后方，军委调第 78 师、28 军、军委骑兵团组成北路军。1936 年 1 月，毛泽东在瓦窑堡召开了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洛甫、博古和李德（第三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刘志丹、宋任穷、张爱萍、田守尧和崔田民也参加了会议。周恩来副主席宣布，刘志丹同志任北路军总指挥。毛泽东非常关心红军指挥员，送给崔田民一本“瓦窑堡会议决议”，勉励崔田民好好学习。这本书是 1935 年 12 月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的重要文献。在漫长的战争岁月中，崔田民不少东西都丢掉了，这本书却一直珍藏在身边。

北路军在完成防止北线敌人扰乱，巩固后方，保护中央领导机关安全的任务之后，1936 年 2 月崔田民和田守尧率第 78 师开往延川。

1935 年 12 月 17 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统一了渡河东征的思想。为了推动抗日救国运动，促进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为了筹集物资、扩大红军、巩固革命根据地，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改为“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队”，彭德怀任总司令，毛泽东兼总政委，总部下辖左、中、右三路大军。第 1 军团为中路，第 15 军团为右路，第 28 军为左路，渡过黄河，东征抗

1936 年 1 月 15 日，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共同签发了红军东征抗日的命令，命令指出：抗日红军愿意同一切革命人民联合起来，不问什么人，只要是愿意打日本、打汉奸卖国贼的都要同他讲团结。我们只打日本同汉奸卖国贼，欢迎一切敌方官兵到抗日红军中来。命令还要求黄河两岸游击队和民众，夺取敌人的船只，替红军主力运伤兵、运粮食、运物资。

1 月下旬，毛泽东亲自来到黄河畔和彭德怀等总部首长侦察敌情、选择渡口。经过反复的研究，选定北起沟口，南至永和关为渡河地段。

第 78 师侦察排长张存直从山西回来，崔田民立即领他到临真镇向彭总汇报黄河东岸的敌情：原来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就开始抓夫派款，加强河防，沿黄河东岸的 20 余县构筑工事，修建明碉暗堡 2000 多个，每个碉堡驻兵两个班，重要渡口驻兵一个排以上，并配备有机枪、迫击炮等火器。碉堡封锁线外，还挖了深、宽各一丈的外壕。阎锡山任命第 34 军军长杨爱源为前敌总指挥，以第 70 师师长杨耀芳为晋西警备司令，以第 69 师师长杨澄源为晋南警备司令，凭借黄河天险和吕梁山的山隘层层设防。中阳县三交、碛口、军渡一带，驻有孙楚部约 4 个旅的兵力，在中阳县至石楼县之间的河防线上有晋军第 71 师所属温玉如一个旅的兵力担任防守，阎锡山自吹他的沿河防线“固若金汤”，“万无一失”。

听了张存直的汇报，彭德怀笑了笑说：“蒋介石百万大军，依仗乌江、金沙江、大渡河之天险，尚不能阻挡我红军的铁流，小小的阎锡山岂奈我何？”

2 月上旬，毛泽东在延长县古峪村召集抗日先锋军团以上干部开会，作了东征形势与任务的报告。

抗日先锋军各级指挥员，上至军团首长，下至突击队长，都仔细侦察了渡口和登陆点。

2 月中旬，第 15 军团在延川的文安驿，召开了东征抗日誓师大会，毛泽东亲临第 15 军团，检阅了部队。

2 月 19 日，崔田民、田守尧率第 78 师，从文安驿出发到黄河西岸、无定河与黄河汇合处河口镇隐蔽待命。

20 日，挑选好的水手和战士们一起会了餐，大家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投入紧张的渡河准备。

第一批渡河的突击队，由 8 只船组成，每只船上配备 8 名水手，2 名向导，10 名精干的红军战士。

晚 9 时，彭德怀命令渡河开始。突击队从黄河西岸的拐沟里推出来，一入黄河，即如离弦之箭，顺流而下。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夜黑如墨，伸手不见五指。寂静的夜晚，只听见河水的咆哮声和冰块与木船的撞击声。突击队的小船，越过激流骇浪，迅速划向对岸。突然，河东传来一阵猛烈的枪声。原来第一只船快要靠岸的时候，被巡逻的敌人发现了。水手们使尽全身力气拼命猛划，不管敌人火力多猛，也挡不住红军战士。小木船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划去，穿过弹雨，越过惊涛，胜利靠岸。

还没等船身稳住，突击队的战士早已跳上岸，用一排手榴弹，把敌人的巡逻队炸跑了。在向导的带领下，英勇的红军战士向半山腰的碉堡猛冲，碉堡里的敌人晕头转向，盲目射击。这时西岸的“水连珠”对准敌人的碉堡一阵猛烈轰击。敌人吓得仓皇逃窜，突击队占领了敌人阵地。

第二天红军各路人马都已登上了黄河的东岸。阎锡山花了数十万大洋，苦心经营的“固若金汤”的沿河防线，一夜之间，彻底崩溃。彭德怀率第 1 军团占领了黄河东岸重镇——留峪镇。毛泽东率第 15 军团向石楼挺进。千军万马，浩浩荡荡，嘹亮的战歌响彻云天：“密云遮星光，万山乱纵横，黄河上渡过抗日英雄，猛打、猛冲又猛攻，追到石楼城。”

21 日，崔田民、田守尧率第 78 师在隰县的蓬门歼敌第 405 团一个营，俘敌营长以下 200 余人。然后挥师东进，先后在水头镇、双池镇、大麦郊等地宣传抗日，募捐筹款，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救国会、抗日游击队，扩大红

军，创建抗日根据地。

3月19日，第15军团奉命东进，挺进文水、交城。崔田民和田守尧指挥第78师在汾阳东南之演武镇击退敌人步兵、骑兵和飞机的阻拦，掩护军团直属队安全通过。

第1军团进占孝义、介休，向平遥、榆次挺进。两路大军准备东征河北，与日军直接作战，但遭到蒋介石和阎锡山的阻拦。阎锡山见两路大军直指太原，十分恐慌。忙调进犯陕北绥德、米脂的两个师，星夜回晋，驰援太原。陕北根据地解除外部威胁后，无定河两岸苏区连成了一片，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3月30日，第15军团掩护刘志丹、宋任穷率领的第28军，东渡黄河，占领黑峪口，歼敌一个营。第15军团将全部伤员和缴获筹集的粮食、物资运回陕北。

第15军团在忻县、临县一带，一面休整部队，一面开展打土豪、斗地主和扩大红军的工作。得悉敌军傅存怀、杨效欧、李生达三路人马向我驻地白文镇包抄而来，我军绕临县和方山之间的小路一昼夜行军140多里，甩开敌人。崔田民和田守尧率第78师提前赶到方山县圪洞镇，修筑野战工事，进行运动防御，掩护红15军团主力安全通过，使我军化险为夷。

红军为顾全抗日大局保存国防实力，从4月底开始西撤。4月29日，崔田民和田守尧指挥第78师掩护东征军西渡黄河。战前崔田民向全师指战员作了动员，不惜一切代价，掩护毛泽东，掩护主力红军，安全回师陕北。国民党中央军、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全部美式装备的关麟征第25师，向我军阵地猛扑过来。第78师全体指战员奋不顾身，英勇杀敌。重机枪连指导员崔正杰腹部受伤，坚持指挥战斗。神枪手崔文富，弹无虚发。敌人在阵地前抛下黑压压一片尸体，退下去了。敌人发动又一次冲锋。战斗在十分紧张的时候，一名机枪手中弹倒下，敌人乘机冲了上来，崔正杰眼里冒着火星，不知从那里来的一股劲，猛地跃起，抓住机枪向敌群猛烈扫射，敌人的进攻被打退了。优秀的红军指导员崔正杰同志英勇牺牲。

激战了三天三夜，第78师的英雄们胜利完成了掩护任务。5月5日，全部回师陕北。

这次东征，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彭德怀的亲自指挥下，取得了中央红军到陕北后的第二个伟大胜利，巩固了陕北根据地。同时红军东征山西不但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还扩大红军7000余人，筹集现金40多万元，补充了陕北兵源和给养之不足。东征红军回师陕北后，毛泽东和朱德向南京政府发出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蒋介石仍执迷不悟，不仅拒绝与我议和，反而更进一步加紧了对我根据地的围攻和进犯，妄图摧毁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和消灭红军。东有阎锡山的晋军和中央军，北有陕军的第84师、86师，西有甘肃马鸿宾和马鸿逵骑兵，南有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对我革命根据地形成四面包围的态势。蒋介石亲临西安督战，在靖远、会宁一带集中了第1军胡宗南部、第3军王均部、第37军毛炳文部、第67军王以哲部、骑兵何柱国部5个军的兵力分4路向我主力红军扑来。

同年5月，第一方面军在延川县大相寺召开了团以上干部大会。大会期间，毛泽东做了“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为了巩固根据地，迎接第二、四方面军北上，作出了西征的部署。

红一方面军组成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红15军团在西征

战役期间为右路军。

西征前，毛泽东指示：凡是不拦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道路的武装，我们不打。被我人民红军缴械的部队，只要他们赞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以放回俘虏，退还武器。

19日，第15军团从延川五家坪出发，经安塞、靖边，越过长城，到宁条梁，夜袭小桥板镇未克，随即改为围攻，并采用政治攻势瓦解敌人。小桥板寨的反动武装在外国天主教堂神父唆使下负隅顽抗，不肯投降。我军逼近寨子，挖战壕，修掩体，携带云梯预备登城，还用山炮向寨内轰击，摆出一副攻城的架势；同时，不断向敌人喊话，叫对方派人出来和谈，否则就摧毁全城。这时，寨子里传出口信，要求我军先派人进去谈判。为证实对方是否有诚意，政治部敌工部长唐天际派刘华清先到寨墙下与对方对话。刘华清和敌方谈妥后，同唐天际一起到寨子里同民团团头和天主教堂神父进行具体谈判。慑于我军强大的军事优势，谈判进行得很顺利。我军撤围，敌人打开城门迎接我军，还给我军送了一些粮食和布匹。此后，第15军团便兵分两路进军西征。

崔田民和新任师长韩先楚率第78师于6月16日到了定边县，侦知城内驻军一个营。崔田民和韩先楚立即电告彭司令员及徐、程军团首长，请求袭击定边县，同时进行地形侦察和攻城准备。至黄昏，一切准备就绪，部队已进入阵地，待命攻城。就在这时，接到彭司令员复电：“袭击定边，恐难奏效，仍照原来计划前进。”（袭击定边是其他部队的任务，因未能攻克，所以第78师主动请战。）崔田民和韩先楚立即到阵地，召集3个团的团长、政委开会。崔田民宣读了彭司令员的电报，然后说：“现在我们的部队已进入阵地，大家说怎么办？”当时只有两个选择：一是遵照电令，撤出阵地；二是命令攻城，夺取定边。经过讨论，绝大多数同志主张攻打定边。只有师政治部特派员，再三建议：“彭总的电报，就是命令，应慎重考虑。”崔田民说：“考虑过了，抓住战机，消灭敌人，彭司令员会同意的。攻打定边城，决心不动摇。”当晚便发起攻击，次日凌晨，3个团的主力，都已先后攻入城内。韩师长已离开指挥所，进入城内指挥战斗去了。崔田民在阵地指挥所写电报，报告彭司令员和徐、程军团首长。彭德怀很快就回了电报：“你们机动灵活攻克定边，庆祝胜利。防守任务移交宋、宋，（第28军军长宋时轮、政委宋任穷），继续向盐池侦察前进。”

18日，崔田民、韩先楚将防务移交第28军。

19日，崔田民、韩先楚率第78师连以上干部骑马提前出发（定边缴获的战马），先到盐池县看地形，并作攻城准备工作。（骑兵团派部队配合行动，担任警戒。）

当晚，因战士疲劳，向导又带错了路，攻城未能成功。

第二天，崔田民提出让战士休息一天，养精蓄锐，以利再战。韩先楚、宋时轮同意崔田民的意见。

20日晚，攻城命令一下，杀声动地、号声冲天，我军战士精神抖擞，斗志昂扬，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城去。城内守敌惊恐万状，溃不成军。不到凌晨三点，胜利结束战斗。

崔田民和韩先楚率第78师，5天连克两座县城，歼敌一个骑兵团、一个步兵营和两个县的民团武装，俘敌官兵及两县县长以下850人，缴获战马600余匹和大量军用物资。

这两个攻城战斗，在当时有重大意义。盐池，有取之不尽的食盐；定边，有丰富的物资、布匹。给陕甘宁边区政府增加了一大批财政收入，解决了边区的实际困难。定边、盐池两县的解放，扩大了革命根据地，打通了前后方的交通联络，有很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 78 师受到总部和军团首长的表扬。

第 73 师于 6 月底攻占豫旺县城、红城水、下马关等地，协同第 75 师攻克韦州，进驻同心城。崔田民、韩先楚率第 78 师至红城水、豫旺地区休整，发动群众巩固新建立的根据地。

豫旺县和红城水都是回民集居的地区，崔田民向全体指战员讲明一定要注意民族政策，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规定不住回民的房屋；不借回民的灶具；不在回民的井里打水，如果住地没有汉人的水井，就请回民用他们的水桶帮我们打水，然后把打好的水倒在我们的水桶。由于第 78 师很注意民族政策，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所以军民关系、回汉关系搞得相当好。回民和第 78 师的指战员亲如一家人。一次每个连分到两只羊，给战士改善生活，豫旺县的阿訇知道后，便主动替我们杀羊。阿訇说：“我杀的羊可以在我们回民的锅里煮，我们回民做的羊肉好吃。”阿訇把杀的羊分给几户回民给我们做。做好羊肉后，还给我们烙了很多饼，做成羊肉泡馍，使战士们大饱口福。由于我军和兄弟民族的关系搞的很好，这就便于开展宣传工作。崔田民带领政治部的同志们，协助回民组织起自卫军、游击队，赠送给他们武器，帮他们建立起民主政权，巩固了这一块新开辟的根据地。

10 月 22 日，第 1、2、4 方面军会师会宁城，三军大会师，是三个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共同心愿。三支劲旅经过长途跋涉、艰苦征战，终于从四面八方汇合到一起来了。三军汇师后，彭德怀亲自指挥了山城堡战斗。胡宗南部第 1 军、孤军冒进，尾追红军。我三军主力早已集结于山城堡，严阵以待。

11 月 20 日，胡宗南部第 1 军第 78 师刚进入山城堡，彭德怀司令员一声令下，红 1 军团由南向北，红 15 军团由北向南发起猛攻。崔田民、韩先楚率第 78 师奋勇向前，第 2 方面军策应各部，第 4 方面军正面攻击，激战至 21 日下午，战斗结束，歼敌第 78 师一个旅又两个团。山城堡战斗，是三个方面军会师后的第一仗，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最后一仗。这次战斗的胜利，扫除了红军进入陕北的最后障碍，巩固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1936 年 12 月 12 日，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在西安扣留前来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实行兵谏。这就是轰动世界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成为由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1937 年 7 月 7 日，日寇悍然制造“卢沟桥事变”，大举进犯中国，在这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8 月 25 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第 15 军团编为八路军第 115 师第 344 旅，崔田民任第 344 旅第 687 团政训处主任，后改任政委，奉命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

9 月 23 日，第 344 旅进入平型关东南地区上寨、下关一带隐蔽待命。师部召集全师干部开会，林彪师长作了动员，聂荣臻副师长宣布了战斗部署。第 687 团的任务是到平型关北面截断敌人之退路。

24日晚，崔田民与张绍东团长率第687团向平型关北开进。天下着倾盆大雨，干部和战士都没有雨衣，任凭秋雨湿透单薄的军装，沿着崎岖的山路向前行进。突然咆哮的山洪从沟里冲出来了，水势凶猛，大家只得把枪和子弹挂在脖子上，手拉手，从激流中淌过去。经过大半夜艰苦行军，拂晓前赶到阵地，崔田民向战士们作了战前动员，便和经过一夜风雨侵袭的战士们，忍受着饥饿和寒冷，趴在冰凉的阵地上隐蔽着。

这时，沟里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进犯平型关的日军坂垣师团第21旅团已进入了平型关北的山沟里，前面是100多辆汽车，接着是200多辆马车，除军用物资外，车上坐满了戴着钢盔的日本兵，再后面是驮着九二式步兵炮的骡马和骑兵。车马连成一线，马达声和马蹄声充斥在山沟间。日寇南下以来，一直没有遇到过抵抗，所以虽是辎重部队，仍然毫无顾忌地如入无人之境，大摇大摆地走着。

清晨7时，日军已全部进入了伏击圈，师部下达了攻击命令。立刻，巨大的冲杀声响彻山谷，我部战士居高临下，向日军展开猛烈袭击，一开始就把日军的指挥系统打乱了。山沟里汽车撞汽车，人挤人，非常混乱。我军战士勇猛地冲向公路冲击，同敌人展开了短兵相接的白刃肉搏战。不出师首长所料，日军残部集中火力向我687团阵地扑来，企图突出包围圈逃命。张绍东团长一声令下，子弹象急雨泼入敌群。日军的第一次反扑被打退了。一会儿，日军又组织第二次反扑，韩振纪副团长率先跳出工事，高呼：“同志们冲啊！”全团战士冲出战壕，如猛虎下山，势不可挡。日军在我第687团和第686团两面夹攻下溃不成军。这时，崔田民发现韩振纪副团长负伤了，马上叫卫生员给他包扎伤口，他带着战士向企图顽抗的日军冲了上去。

激战到中午，战斗胜利结束。进犯平型关之日军除突破阎锡山部队负责阻击的东跑池防线逃掉的外，其余全部被歼。

平型关战斗，我军歼灭日军坂垣师团第21旅团1000余人，打破了“日本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粉碎了亲日派“抗战必败”的谬论。

平型关大捷，是我军出师华北前线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中国抗战开始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它雄辩地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确有战胜任何敌人的勇气和力量，使全国人民看到了民族之希望，增强了抗战的决心和信心。

平型关大战胜利结束后，张绍东和崔田民奉命率第687团在平型关与灵丘、涑源之间，平型关与浑源、广灵之间，平型关与大营、繁峙之间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破袭公路，截击运输，再战老爷庙，三战平型关，迫使日寇龟缩太原。

1938年初，第344旅由山西转入河北省平山县休整，扩建第689团，韩先楚任团长，崔田民任政委。第689团参加了洪子店战斗，穿娘子关，越正大路，又入山西境内，在晋东南地区主动袭击敌人。经过町店、张店、武乡等战斗，歼敌近千人，给日寇以重创，并积极配合兄弟部队胜利粉碎了日寇的九路围攻。配合党政机关，发动群众在屯留、长治、长子、高平地区为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那时部队的经费非常困难，崔田民和第2营营长石厚刚率部到径阳一带，筹集抗日经费。这里都是石山，耕地很少，大多是用石头砌起的梯田。农作物大都是玉米、谷子和南瓜。土地都集中在少数地主手里。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很残酷，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第2营住的那个村，还是比较大的一个

村子，村里有百十户人家。

崔田民和石厚刚一进村，便开展工作。崔田民深入群众搞调查，石厚刚带人张贴布告。布告的内容是：“日本帝国主义九一八侵占我东北，七七卢沟桥事变又侵占我华北大部，我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际，凡我中华民族皆负抗日救国之责，故我国人，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人出人，有枪出枪，乃是我抗日救国之宗旨……”群众看了布告，纷纷到营部来举报该村的一户大地主，可捐钱五千元，粮几万斤。崔田民经多方调查，基本掌握了这个大地主的情况：他的土地很多，对农民剥削很残酷，又勾结县大爷欺压农民，民愤很大，是个征收对象。但这个地主贪得无厌，一有钱就买地，所以现大洋并不多，粮食确实不少。据上述情况崔田民和石厚刚等研究决定，第2营700余人住在这里全吃他家的粮，并向他筹捐抗经费千元现洋。那个地主说：“粮食有，贵军吃的粮他包了。现大洋没那么多，但他回去想办法。”第二天那个地主来到崔田民和石厚刚住的那间小房，恭恭敬敬把崔田民请到一旁，低声对崔田民说：“行个方便吧！”捏住崔田民的两个指头摇了摇，“给你这个数”。崔田民哈哈大笑，笑得那地主惊恐不已。崔田民把脸一沉说：“你看我就值200块钱？你既然舍出200块钱行贿，说明你还是有现大洋的。现在要你筹捐的数目不是1000，而是1200块，少一块也不行，限5天交来，否则就按破坏筹捐抗经费论处！”那地主连连点头称是，哭丧着脸回去了。石厚刚笑着对崔田民说：“那家伙真是个瞎眼睛，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没过5天，1200元现大洋乖乖送来了。崔田民和石厚刚把送来的大洋数点了半天，一个个碰打着听听声音，看有没有假的，然后50块一卷，50块一卷捆包好交给供给处。1938年春，崔田民调任第344旅政治部主任，和第344旅代旅长杨得志去冀鲁豫参加由第129师东进纵队司令员陈再道、第386旅政治委员王新亭在临漳、安阳和内黄一带发起的漳南战役。

9月中旬，由王新亭率领的青年纵队、新1团和第344旅的第688团、689团组成漳南兵团，由王新亭和杨得志统一指挥，南进作战。25日，解放滑县城和道口镇。26日，追歼伪军扈全禄部于汤阴县西南，俘虏伪军1400多人。此后又经过四五十天的连续作战，肃清了漳河以南、平汉路以东、卫河两岸方圆百十里地的伪军和土匪，建立了安阳、汤阴、内黄三个县的抗日政权。冬天，崔田民和杨得志奉命率部返回山西长治一带进行冬季练兵和休整。

深入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

千里太行，雄奇壮丽，长治盆地，千姿百态。虽然是冰封雪飘的季节，根据地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崔田民、杨得志和柳林村人民群众一道喜气洋洋地迎接1939年元旦，军民同乐，热闹非常。

新年刚过，崔田民和杨得志奉命东进。这次东进的任务是：到冀鲁豫地区扩大部队，待命回山西。

1939年2月16日，崔田民和杨得志带一个炮兵排、一个工兵排和部分干部总共才有百十人。从高平出发，经壶关、合涧，到汤阴一带的时候，正值春节。但是这里却没有一点春节的气氛，寒风卷着雪花，吹着那干枯的树枝发出呜呜的哀鸣，目之所及无非是拄着拐棍沿门乞讨的老人，耳之所闻无非是孩子们呼爹唤娘的惨叫，和根据地相比，简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看到父老乡亲如此凄凉，我们的战士心里很难受，谁也不吭声，只是默

默默地掏出自己为数不多的口粮，放在一双双伸过来的、干瘦如柴的手里。

崔田民解下他在瓦窑堡亲手织的羊毛围巾……

杨得志脱下他那长征路上缴获来的短大衣……

面对着这些苦难深重的同胞，更激发了我军指战员们的杀敌勇气。

过了平汉线，崔田民和杨得志在濮阳县井店一带同早已活动在这里的第344旅独立团、特务团，八路军第2游击支队等抗日武装，组建成冀鲁豫支队，杨得志任支队长，崔田民任政治部主任，下辖5个大队，共4700余人。支队由杨得志、崔田民及各大队主要领导同志组成行动委员会，崔田民任书记，在军事、政治、供给诸方面实行统一领导。遵照八路军总部的指示精神，在冀鲁豫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活动，壮大抗日武装，建立民主政权。

3月中旬，冀鲁豫支队即采取以直南为依托，开辟鲁西南的抗日游击区的方针，向鲁西南挺进。鲁西南地区，自古是强人出没的地方。这里的特点是两多：一是土匪强盗多，而且每个土匪头头都有绰号，这也许是受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的影响吧；二是土围子多，为了防止土匪骚扰，每个村都修筑了又高又厚的土围子，这些土围子在战乱时期经常关闭，几乎与世隔绝。土围子里的老百姓由于受敌、伪、顽、匪的反动宣传，一见到我们的部队便跑进土围子，紧紧关闭围子门，抄起大刀，架起土枪，大喊大叫，如临大敌，不许我们靠近。支队的指战员只有在土围子外边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崔田民十分重视支队的政治思想工作，要求每个战士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绝对不能侵犯群众利益。群众看到我们的装备和武装，如果要攻打他们的围子，那是不成问题的。但见支队不攻打围子，也不损害他们的利益，逐渐解除了顾虑，渐渐地打开围子门让我们过路驻扎。抓住这个机会，崔田民、杨得志和广大指战员，广泛开展宣传工作。告诉他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八路军到这里来是和他们一道打鬼子，打汉奸，打土匪的；八路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吃了东西给钱，损坏了东西赔偿。慢慢地群众对我们的部队有些了解，甚至主动和我们谈话，问：“你们支队最大的官有没有俺们这里的司令大？”“你们支队好，不糟踏老百姓，不知你们能不能打过日本鬼子？”

看来他们对支队的力量还是有疑虑的。崔田民想，要叫群众相信我们的部队，就要打几个漂亮仗叫他们看看。

鲁西南的情况比较复杂，那些拉起杆子占山为王的“牛毛司令”，有的是打家劫舍、祸害群众的土匪；有的是投靠日寇，为非作歹的汉奸；有的则是“逼上梁山”，杀富济贫的穷苦农民。对这些不同的“牛毛司令”，崔田民按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分别对待，该争取的尽量争取，该打击的坚决打击。

曹县东南高辛庄的汉奸、恶霸地主高圣君（绰号高二穷种）的民愤最大。崔田民就和杨得志商量决定在高圣君头上开刀。

别看高圣君的外号叫高二穷种，其实富得流油。自从日本鬼子来后，他家里挂起两面太阳旗，还有日军授给他的指挥刀和委任状。他仗着豢养300团丁的“富户团”，又有日本鬼子作靠山，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别看他年过半百，丑陋不堪，却霸占了30多个年轻妇女做他的姨太太。群众对他恨之入骨。崔田民率第2大队，连夜包围了高辛庄，第2大队长覃健派人先摸了“富户团”的哨兵，开了围子门，战士们冲了进去，300名团丁在被窝里就当俘虏，活捉了汉奸、恶霸地方高圣君，缴获长短枪300余支、迫击炮一



门。一枪未放，大获全胜。

白毛集的土围子里，住着几个民愤极大的汉奸，经常打着日本旗威吓群众，谁要不听他们的话，不是当场打死，就是送给日本鬼子。支队决定攻打白毛集，战前崔田民给第2大队的指战员作了动员：“今天的任务是抓汉奸头子，一定要打歼灭战，不能让一个汉奸漏网。”战斗打得很顺利，几个汉奸全部被活捉。于是趁热打铁开了审判大会，宣布罪状，当场枪毙。人民群众拍手叫好，同时也大大震慑了附近的几个围子里的顽固分子。

在曹县县委的帮助下，支队与国民党曹县县长王贯一建立了统战关系。崔田民多次给王贯一做工作，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利用王贯一与国民党曹县县党部的矛盾，指引他摆脱反动派的控制，走上抗日的光明大道。王贯一终于被争取过来，支队派共产党员到王贯一的保安团里做工作。保安团里设立了政治处，把国民党的保安团改造成为一支抗日的武装。

青堍集是国民党曹县县党部的老窝，山东省省党部书记李文斋控制的反动武装李子仪部盘踞在那里。支队决定分兵两路围歼李子仪部。一路由崔田民率领（第2大队和王贯一的保安团），一路由杨得志率领，从东西两面围攻青堍集。经过5个小时的激战，全歼国民党反动武装1000余人。

在争取“牛毛司令”方面，崔田民下了很大功夫。有个叫“王四拐子”的“土匪”，过去在冯玉祥的部队干过几年，后来拉了二百来人“占山为王”。虽然当地群众都称他是“土匪”，但他却没有干过什么太坏的事情。有些伪军头目，利用曾在旧军队里一块混过的关系，多次拉拢他去当汉奸，他虽然没有答应，但思想上正处于犹豫徘徊状态。支队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崔田民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便亲自到王四拐子的土围子里给他做统战工作。在几次谈判中王四拐子既不表示反对，也不表示同意，只是用“让我考虑考虑”来周旋。后来崔田民问他：“你是不是吃中国的粮食长大的？”“你忘了自己的祖宗是谁吗？”别看这是些口语化的语言，力量却是很大的，使王四拐子灵魂深处那快要麻木的神经震动了，复苏了。他终于表示，他还没有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他绝不会做对不起祖宗的事情。于是，崔田民对他耐心细致地宣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这支武装力量终于被我们争取了过来。

还有个叫刘杰三的“牛毛司令”，是被地主、官府“逼上梁山”的穷苦农民。很有点“杀富济贫”“山东响马”的豪放劲头。他的几百人马还很守他的规矩，从不欺侮群众。他身边的卫队，每人一长一短两支枪，一人一辆自行车，很有派头。崔田民亲自给他做工作，启发他走上抗日的道路。支队派人到他的队伍中去做政治工作，并委任他为这支队伍的司令。此后，他逢人便说：“我是八路委任的司令，正牌的！”

崔田民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做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政治工作，化腐朽为神奇，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抗日斗争，使冀鲁豫的抗日武装很快壮大起来。正如杨得志同志所说：“对这些‘牛毛司令’，我们的政委崔田民头脑冷静，很讲政策，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5月初，崔田民和杨得志率领第1、2、3大队的指战员，从曹县出发，远程奔袭日军重要据点金乡县城。25日，各部隐蔽集结于金乡城四周。26日零时发起攻击，迅速突入城内，激战4小时，击毙日、伪军150余人，俘敌100余人，缴获长短枪100余支。

不久，在金乡县白浮图又袭击了前来进行扫荡的日本鬼子的一个汽车队。骄横的日军压根儿没想到在这块土地上大白天还有人敢打他们，根本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一接火就被打懵了，掉转头没命地跑。支队的战士一边喊，一边追，一边放枪。群众高兴地说：“好！还是八路军能行，追着日本鬼子的汽车打。”

支队在主乡县袭击日本鬼子，大煞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冀鲁豫人民的抗日信心。广大青年踊跃报名参军，使我抗日力量迅速壮大。

崔田民、杨得志率冀鲁豫支队连战连捷，打开了鲁西南地区的抗日局面。冀鲁豫支队蓬勃发展，引起了当地国民党顽固派的不安。国民党山东省菏泽专员卢冀之污蔑我八路军游击支队“游而不击”，指挥地方封建势力不许我军进寨，拒绝供给粮食，进而命令部下向我武装挑衅。定陶县国民党县长姚崇礼自恃兵多城坚，秉承其主子的旨意，屡次向我军挑衅。6月30日，崔田民、杨得志率支队从安陵集出发，向金乡县挺进时，定陶县姚崇礼保安旅竟突然向我射击，阻止我军过境。我军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崔田民、杨得志指挥第1、2、3大队主力，迅速将定陶城包围，并于当晚发起总攻。不到3小时结束了战斗。除顽固县长姚崇礼及少数骑兵侥幸潜逃外，城内保安团五六百人，被我全部歼灭。这次战斗，给热衷于反共摩擦的国民党顽固派以应得的惩罚，使饱受压迫的定陶人民欢欣鼓舞。

日军司令河野率日伪军300多人，向我曹县东南一带进犯。崔田民率第2大队在苗堤圈设伏，前后夹击敌人，从中午战至傍晚，毙伤俘日伪军200余人，河野仅带30余人狼狈逃窜。

冀鲁豫支队连挫日军，引起了日本鬼子的注意。在7月到11月不到半年时间里，连续进行了三次大规模“扫荡”，妄图消灭这支年轻的八路军队伍。第一次“扫荡”，敌人调集1.5万人的机械化部队，采用分进合击的战术，先占领边区周围的重要据点，构成对我边区的多层次包围。而后，于7月1日发动以濮阳、菏泽为中心的七路围攻：第一路由济宁经巨野攻菏泽；第二路由商丘经曹县攻定陶；第三路由开封经考城攻东明；第四路由新乡经汲县攻道口；第五路由大名经南乐攻清丰；第六路由安阳经内黄攻濮阳；第七路由东阿经寿张，分两路支援对濮阳和菏泽的进攻。

崔田民、杨得志率领冀鲁豫支队，在敌人“扫荡”的开始阶段，便主动出击，阻滞敌人大“扫荡”到来的时间，为反“扫荡”创造有利条件。7月1日，冀鲁豫支队正在定陶城内召开大会，纪念党的18周年生日，动员反“扫荡”时，日军一支机械化部队2000余人逼近定陶县城。崔田民、杨得志立即指挥支队转移出城，投入战斗。第2大队在定陶西南的许庄寨与日军先头部队遭遇，覃健、常玉清率众勇猛突击，毙敌百余，击毁汽车三辆、大炮一门，顶住了敌人进攻，掩护支队转移。刘震、李雪山率第1大队在贾庄击退了敌步骑兵的疯狂进攻。战至黄昏，敌收缩兵力进占定陶城。当晚，冀鲁豫支队各部避开敌人的主力，向敌侧后分散转移。第3大队向东明、长垣方向，北渡黄河，进入濮阳、内黄、滑县地区；第2大队从敌人间隙穿过，转移到曹县、单县一带；第1大队和支队直属队从曹县、考城之间穿过，转移到陇海路北侧地区活动。位于菏泽东南一千庄的支队被服厂、医院等后方设施，在当地群众大力协助下，于当夜分散隐蔽。冀鲁豫支队针对敌人“分进合击”战术，在各路敌军后侧频频出击，声东击西，出没无常，使敌人疲于奔命，无奈我何，除占几座空城而外一无所获，不得不于7月中旬收拢部队，退守

据点。七路大“扫荡”宣告结束。

10月中旬至10月底，日军对鲁西南进行第2次“扫荡”。敌人以城市为依托，结合所谓“治安肃正”，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向我根据地腹地进攻，以图缩小我军活动区域。这次“扫荡”，敌人集中了5000余兵力，完全使用汽车、坦克和骑兵。10月12日始，调集100多辆汽车到虞城、商丘，同时增兵曹县和单县等据点，企图从陇海路向北出击，会剿我第2大队于曹县、单县、虞城与商丘之间。次日，崔田民、杨得志率第1大队与敌在李庄、孙老家庄、天宫庙一带发生激战，支队主力突破重围，转移到敌人之侧后。20日，敌又出兵三路向我围攻，第一路出菏泽南，进王浩屯；第二路出定陶西，攻桃园；第三路出曹县进犯魏湾。考城、长垣之敌亦出动配合，合攻冀鲁豫支队主力于桃园、大寨集一带。当日，我第3大队在沙窝赵与菏泽南犯之敌激战竟日，在当地民兵和游击队配合下将敌击溃，毙敌50余人。其他几路进犯之敌也遭我军坚决抵抗，伤亡惨重，欲进不能。至10月30日，第二次“扫荡”又被粉碎。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紧接着，于11月8日又动员了津浦、平汉、陇海各线约一个师团的兵力，乘800辆汽车并配备坦克，从菏泽、定陶、考城、长垣、东明等据点兵分八路，对鲁西南我军进行了第三次大“扫荡”，妄图以高度机动捕捉我主力决战。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冀鲁豫支队各部迅速突破敌人封锁线，转移到敌人包围圈外。位于考城、东明的我第2、5大队闻敌出动，即在孟大夫、秦寨集结，准备转移。但敌人已乘100辆汽车猛扑过来，占领了附近村寨。崔田民立即指挥部队就地隐蔽，第2、5大队在人民群众掩护下隐蔽了一天。11日傍晚，第2大队避开敌人安全转移。第5大队正在秦寨西头集合，敌人已从西、南、北三个方向包剿过来，情况万分紧急。大队长胡继成当机立断，沉着指挥，化整为零，乘夜色突出敌人包围，直插到曹县以东地区。分散的部队安全突围后又很快集合起来。敌人在原地区搜索了三天一无所获，只好收兵，退守据点。到16日，其来势汹汹的第三次“扫荡”又告失败。

日军在几次大规模“扫荡”之后，仍然不时出动部队四处清剿。冀鲁豫支队在敌众我寡，处境十分险恶的情况下，始终保持旺盛斗志，同敌人顽强作战，战斗力不断提高。第5大队这支由几部分地方武装组织起来的部队，就是在反“扫荡”的硝烟烈火中逐步锤炼成为坚强的主力部队的。

在平原地区如何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抗战初期，八路军尚处在探索阶段。崔田民和杨得志十分重视总结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经验。他们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实践，总结出一套开展平原游击战的战术。即：一、平原地区能够进行游击战争。因为敌人兵力不足，而我国地域广大，敌人只能占领点和线，我则可凭借乡村广阔的天地开展游击战。二、要进行平原游击战，必须动员和组织民众。只要广大民众投入抗日洪流之中，就能形成平原游击战所依赖的“活的人山”。三、要进行平原游击战，必须执行正确的战术。“硬的不打，软的打”，“敌打我不打，敌不我打”，进行夜战。这些都是崔田民和杨得志在冀鲁豫平原上与日本鬼子进行长期艰苦的战斗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行之有效的战术。这些创造性的概括，是十分宝贵的。它丰富了我军开展平原游击战的经验，对抗日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日军长达半年的反复“扫荡”，虽使我鲁西南活动区域大为缩小，但我仍控制着东明、曹县交界地带的游击根据地。当日军全力在黄河以南“扫荡”

的时候，冀鲁豫支队利用敌人在濮阳地区兵力空虚之机，先后进入直南、豫北，在当地党委的大力协助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相继组建了独立大队和豫北大队，使直南、豫北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崔田民和杨得志在频繁的战斗中，十分重视地方工作，积极支持帮助地方党组织开展群众工作，并在经济上予以帮助。到7月，成立鲁西南地委，各种群众团体也建立起来，鲁西南抗日游击根据地逐步形成。

正当抗日力量蓬勃发展之际，湖西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肃托事件”。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有300人惨遭杀害（其中有区党委统战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如等），区以上干部五、六百人被集中审讯。这是一桩在全党有重大影响的冤假错案。

支队转战至湖西地区，崔田民和杨得志在鱼台县南阳镇见到了苏支政治部主任兼第4大队政委王风鸣（湖西事件主要制造者之一）。王风鸣向杨得志和崔田民介绍了湖西“肃托”的情况，杨得志和崔田民当即告诫他要吸取历史的教训，不能随意怀疑自己的同志，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决不能乱捕人。之后，冀鲁豫支队转战回鲁西南，白子明（湖西区委书记，湖西“肃托事件”负主要领导责任者）、王风鸣给杨得志和崔田民发来电报说：“鲁西南地区是托派组织”，要求杨、崔支队将鲁西南地委区以上干部送交他们。崔田民、杨得志立即回电予以拒绝，再次阐明了他们的态度。同时，向鲁西南地委书记戴晓东转告了湖西的情况，请他暂时不要派人去湖西。并立即去电报告第115师和山东分局，要求派人解决湖西“肃托”问题。第115师和山东分局得悉湖西“肃托”情况后，即向湖西电令：停止捕杀。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第115师政委罗荣桓及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率领骑兵连日夜兼程赶赴湖西，采取紧急措施、制止了“肃托事件”。

崔田民和杨得志经过将近一年的艰苦奋斗，成功地开展了敌后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创建了平原地带的抗日新兵团，开辟了冀鲁豫边区抗日游击根据地，胜利完成了八路军总部交给他们的扩军任务。正准备返回山西时，集总发来电报，命令他们在冀鲁豫长期坚持斗争，巩固抗日根据地。

冀鲁豫边区处于平汉、陇海两条铁路干线的交汇处，虽然地区不大而且狭长，但这一带是华北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连接枢纽，又是太行与鲁中两大山岳地带抗日根据地的连接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此创建抗日根据地，将面临着复杂而严酷的斗争。中央军委将如此重任交给崔田民和杨得志，这充分表明总部对他们的高度信任。崔田民和杨得志没有辜负党的期望，他们和英雄的冀鲁豫军民一起和日、伪、顽展开新的殊死斗争。

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以后，将政治“限共”为主的方针，改变为军事“限共”为主的方针。随之，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1939年12月到1940年春，国民党第39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对我冀南、冀中、鲁西和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发动疯狂进攻。在此反共气焰嚣张的形势下，冀鲁豫和鲁西地区的国民党地方部队丁树本、李树椿、王金祥、齐子修等部约5万余人，皆蠢蠢欲动，与石友三遥相呼应。石友三为加强直南、豫北地区的反共军事力量，掩护其通向卫河以东的后路，年初将所属新8军高树勋部调至濮阳、濮县一带，与丁树本靠拢，企图向冀鲁豫支队进攻。盘踞在朝城、阳谷、范县、观城一带的李树椿、王金祥等部地方顽固势力不断与我摩擦，鲁西南地区的数股地方顽军也向我鲁西南地委及独立团围攻；特别是湖西地区的朱世勤等部反共活动更为猖狂，惨案接连发生。在此情况下，我八路军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遵

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进行自卫反击。

1940年1月，第129师先遣队、筑先纵队在卫河东岸的馆陶东南一带，第115师独立旅在观城、朝城一带，东进抗日挺进队在聊（城）阳（谷）阿（东）一带，同时对国民党鲁西行辕主任李树椿部，第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王金祥部发起反击，攻克朝城，收复聊阳阿地区，歼其一部，击溃其大部。李树椿、王金祥分别率其残部退到濮县、观城一带，靠拢高树勋部。

为统一太（太行山）南、豫北的作战指挥，2月6日，在太南地区成立了八路军第2纵队。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兼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杨得志任副司令员，韩振纪任参谋长，崔田民任政治部主任。纵队辖第344旅、新第1旅、决死第3纵队、冀鲁豫支队、独立游击支队和华北抗日民军第1旅等部。

2月中旬，石友三顽军在日军策应下，于大名、临漳之间渡过漳河，到清丰东南地区企图与丁树本、高树勋会合，进行反扑。为了解除石友三部对冀南地区的威胁，彻底消灭石友三顽军，根据党中央指示和集总命令，冀南、冀中、鲁西和冀鲁豫地区的兵力，由冀南军区司令员宋任穷和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统一指挥，协同作战。我军以第115师独立旅、东进纵队第6支队和挺进纵队第5支队为左纵队，以冀南军区东进纵队、冀中军区刘子奇支队及赵承金、谭冠三支队为中央纵队，以冀鲁豫支队为右纵队，展开对石支三顽军的全线攻击。

2月21日，冀鲁豫支队在固城集、柳格集与敌展开激战。在我强大的攻势下，石友三顽军节节败退。

25日，石友三顽军在濮阳南张合沟一带构筑工事，企图顽抗。28日，崔田民、杨得志率第1、2、3大队一举突破其防线，歼敌一个营。石友三顽军连战连败，仓皇溃逃，一直退到黄河南岸，在东明、菏泽以北，凭借黄河大堤构筑工事，妄图负隅顽抗。我各路部队兼程追击，不给敌以喘息机会。左纵队由习城集向南攻击，连克袁老家、玉皇庙、东台寺等地；冀鲁豫支队突破黄河防线，连克高屯集、菜园集，并在桥口将敌一部围歼。在冀鲁豫支队等部的沉重打击下，石友三主力分数路向南逃窜，我军猛追穷寇，在东明附近又给予严重杀伤。石友三率残部逃窜至民权以东，陇海路两侧。

冀鲁豫支队回师濮阳进行休整，迅速恢复濮阳诸县的抗日政权、地方抗日武装，肃清顽固势力，整顿社会秩序，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崔田民很重视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国民党滑县县长贾心斋是一位很有声望的爱国民主人士，1938年出任滑县自治委员会主席，曾率领民众抵御日军的进攻。为争取贾心斋和我们合作抗日，崔田民和中共直南特委的同志，曾多次与他接触，反复做耐心细致的宣传工作，贾心斋终于对我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表示赞同，并予以大力支持。冀鲁豫支队和直南特委派了一些党员参加滑县县政府工作，帮助其发展武装。在贾心斋的支持下，滑县向我根据地输送了一大批爱国青年。由于滑县物资丰富，战略地位重要，国民党濮阳专员丁树本和豫北专员龚柏岭，都曾对贾心斋进行过拉拢与控制。丁树本在冀鲁豫支队反击顽军石友三作战时，企图裹胁贾心斋和滑县县政府一起南撤，但贾心斋决心留在滑县抗战，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杨、崔支队根据贾心斋的要求，派韩明接任县长，宣布成立滑县抗日民主政府，委任贾心斋为抗日民主政府首席参议。

4月初，石友三部在日军直接配合下，进占东明，伙同国民党菏泽专署

武装共万余兵力，由东明北上直取濮阳，妄图重占直南。日军千余人亦由菏泽经高庄集、胡状集向濮阳逼进。此时，丁树本已完全倒向国民党顽固派一边，从两门取道韩集向濮阳袭来。冀鲁豫支队以地方武装及第1大队一部，在各路敌人来路上设伏，袭击牵制敌人，集中主力于4月5日黄昏，向进占小韩集、苏岩之丁树本保安旅发起猛攻。丁部立刻土崩瓦解，溃不成军。丁树本仅率残部千余人逃往豫西。冀鲁豫支队乘胜收复两门。

崔田民、杨得志率支队主力，迂回至濮阳东南，在东进纵队、冀中军区、赵承金、谭冠三支队配合下，向盘踞在八公桥、王坝、坝头集的石友三部发起猛攻。在我军沉重打击下，石友三部仓皇逃窜至东明以南的曹县、定陶一带。冀鲁豫支队收复了黄河以北地区，进入东明，成立了东明县抗日民主政府。

石友三逃窜至曹县、定陶一带，惊魂稍定之后，便纠集残部在以东明集为中心的十余村修筑工事，企图固守并伺机卷土重来。我军主力迅速南下对顽军发起全面攻击，经激战，将顽军据守的10余村寨全部攻克，歼敌800余人，其余大部南撤。至此，我军对顽军石友三的第一次反击作战胜利结束。

第一次讨顽战役，我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获得重大的胜利，粉碎了石友三盘踞两濮及南乐、清丰、观城、朝城地区，纠合丁树本、李树椿建立反共基地的计划，而我则控制北起朝城，南至东明，西起卫河，东至运河，包括清丰、南乐、濮县、濮阳、内黄、观城、朝城、范县、东明、鄄城十个县城在内的广大地区，使我冀鲁豫边区和鲁西区连成一片。

为了加强对直南、豫北和鲁西南地区的领导，北方局决定由王从吾、刘晏春、杨得志、崔田民、信锡华组成中共冀鲁豫区党委。4月18日，冀鲁豫区党委正式宣告成立，张玺任书记。区党委下属四个地委，郭超任第一地委书记，唐克威任第二地委书记，赵紫阳任第三地委书记，戴晓东任第四地委书记。日寇“五五”大扫荡后，二、三地委合并，四地委改为三地委，二地委赵紫阳任书记。全区共辖15个县，有2.6万名党员。

4月30日，黄克诚率领八路军第2纵队主力到达冀鲁豫地区，与冀鲁豫支队统一整编，仍称第2纵队兼冀鲁豫军区，杨得志任纵队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兼军区司令员，崔田民任纵队政治部主任兼军区政治委员，卢绍武任纵队兼军区参谋长，唐亮任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兼军区政治部主任。第2纵队兼冀鲁豫军区辖：第344旅，刘震任旅长，康志强任政治委员；新第2旅，田守尧任旅长，吴信泉任政治委员；新第3旅，韩先楚任旅长，赵基梅任副旅长，谭甫仁任政治委员；华北抗日民军第1旅，朱程任旅长，闻允志任政委；南进支队，赵承金任司令，谭冠三任政治委员。

为加强对冀鲁豫地区党、政、军的统一领导，经北方局批准，由黄克诚、崔田民、杨得志、张玺、信锡华、晁哲甫、安法乾组成军政委员会，由黄克诚任书记。

5月15日，冀鲁豫军区军政委员会决定成立冀鲁豫财政委员会，黄克诚任书记，华夫任副书记，统一领导全区的财政工作。从此，冀鲁豫区财政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6月上旬，黄克诚奉集总命令，率第344旅和新第1旅第5、6团，离开冀鲁豫，南下华中地区，执行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黄克诚南下后，杨得志任第2纵队司令员兼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崔田民任第2纵队政治委员兼冀鲁豫军区政委。冀鲁豫地区军政委员会书记、冀鲁豫区财政委员会

书记都由崔田民接任。崔田民身兼数职，统一领导冀鲁豫地区党、政、军的全面工作。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高干会议精神，积极开展发展、整顿党的组织，整编、整训部队，加强政权建设的各项工作。确定了根据地从长期着眼，爱惜民力，加强工农业和副业生产建设的财政经济工作方针，要求各地统一收支，建立财政制度，并核定了人民负担程度同总收入的比例；成立工、农、青、妇抗日救国总会，创办党报，组织剧社，加强宣传，动员广大人民投入抗日战争；创办学校（冀鲁豫抗日联合中学）和各种干部培训班，培养革命人才，推动抗日斗争的发展。

恰在这时候，日伪2万多人于6月10日分兵十二路合围濮阳、清丰地区，妄图一举摧毁新生的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这次“扫荡”，开始于6月10日，农历的五月初五，故称“五五大扫荡”。崔田民、杨得志指挥部队分散突围，由新第2旅第2团掩护纵队机关跳出敌人合围圈。崔田民、杨得志指挥新第3旅抵住敌人之进攻，掩护纵队机关向南转移，敌尾追十余里，我民第1旅设伏于途中，终于击退尾追之敌。崔田民、杨得志率第2纵队，穿梭于敌军间隙，迂回到敌后，从背后打击“扫荡”之敌。经过13天艰苦顽强的斗争，粉碎了日寇的“五五大扫荡”。扫荡过后，日军占据了清丰、濮阳、内黄、东明等县县城，并在滑县、浚县等地安设了34个据点，形成了对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包围，使冀鲁豫边区出现了严重困难的局面。

在日军对我频繁“扫荡”的同时，顽军石友三部乘机又一次向我抗日根据地反扑过来。

原来石友三逃窜至鲁西南后，并不甘心失败，时刻妄图东山再起，卷土重来。他一方面派他的弟弟、教导师师长石友信赴商丘与日军进行秘密谈判；一方面派人去洛阳国民党第一战区领取弹药军需，补充和整训部队，准备再度北犯。

6月28日，顽军石友三部3万余众，由日伪军开路，重占我濮县县城及濮阳、清丰、观城、范县之间的根据地，并企图逐步扩大控制区域，完全隔断我华北与华中、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联系。

为了粉碎顽军石友三这一企图，集总组织了讨顽总指挥部，发起了第二次讨顽战役。由宋任穷、萧华统一指挥，分三路纵队对进犯我抗日根据地之石友三顽军发起反击。崔田民和杨得志按照统一部署，率第2纵队新第3旅、民第1旅和冀中南进支队为右纵队，在范县房子铺、颜对铺一带对石友三顽军发起猛攻，重创顽军。又在朝城、堂邑给石友三之羽翼齐子修、王金祥等部以沉重打击，粉碎了鲁西北顽军向南伸延策应石友三部的企图。并采用以政治攻势为主，军事斗争为辅的双管齐下、长期斗争的方针，从7月下旬起，我以主力逼近石友三顽军，逐步压缩其盘踞地区，另派出精干小部队，截断其粮源，寻求有利时机予以痛击，并协同地方政府，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人。濮阳、濮县、范县等县县委和县政府，则组织武工队、县大队、民兵等武装，积极配合主力作战，孤立顽军据点，用各种方式进行抗日宣传，揭露石友三通敌叛国的罪行。在我强大的军事和政治攻势的沉重打击下，石友三顽军前进不能，外出挨打，死守则给养极端困难。不久，敌上层发生内讧，高树勋相继处死石友三、石友信，大大减轻了对我根据地中心区的压力。之后，高树勋部被日军重重包围，眼看就要全军覆没，崔田民和杨得志不计前嫌，派了两个旅把他营救出来，接到根据地休整，将他失散的人和枪，全部送还，并派部队把他的部队送过陇海铁路，高树勋十分感激。

1941年1月15日，冀鲁豫党、政、军、民代表300余人，在内黄县张村召开会议，成立冀鲁豫边区行政主任公署，选举晁哲甫为行政主任公署主任，崔田民、贾心斋为副主任。行政主任公署辖三个专署，直南为第一专署，豫北为第二专署，鲁西南为第三专署。至此，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更加巩固。

蒋介石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直接助长了日军的侵略气焰。1941年4月12日，日寇在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从内黄以南，清丰以西，濮阳西北，滑县东北，卫河东的沙区根据地，开始了一场极其残酷的毁灭性的大“扫荡”。

大“扫荡”开始前，第2纵队和边区党委、行政公署机关都住在沙区一带。

4月11日，伪第24路军杨震兰部和浚县伪反共自卫团孙步月部共800余人，由黄辛庄经花固占领卫河东岸、并店西南的杨文城和齐村，这股伪军来势很猛，对我造成直接威胁。我第2纵队因未察觉敌人诱歼我主力的意图，便派军区第4团和民第1旅一部向杨文城、齐村进击。经一天激战，把齐村的据点拔掉，并将杨文城的伪军大部歼灭，残部被压缩在几座高楼内。

12日夜，早已集结隐蔽在濮阳、内黄、滑县、五陵集、白道口的日军主力第35师团、独立第1混成旅团和骑兵第4旅团加上伪军共有1万多步骑兵，有100多辆汽车和坦克，20余门重炮，兵分五路，向我第2纵队所在地的沙区中心猛扑过来，只见东西南北沙尘弥漫，遮天蔽日，日伪军的汽车、坦克、骑兵蜂拥而来。炮声隆隆，枪声不绝，炮弹不断在第2纵队指挥所周围的田野、沙丘和树林里爆炸。敌人有汽车和坦克，我们用两条腿，要想马上突围，显然已来不及了。崔田民和杨得志当机立断，决定杨得志在前，崔田民居中，卢绍武压后，率领部队和党政机关先撤到沙丘中的枣林里隐蔽，俟机突围。

日军的机关枪由远而近疯狂地扫射着。子弹如雨，浓烟滚滚。

由于是在夜间，走在前面的伪军，不敢贸然进入枣林。借助夜色和大风的掩护，杨得志率众首先冲出包围圈。

崔田民带领机关干部和纵队战士，从两路敌人的间隙穿插而出，顺利突围脱险。

卢绍武所率第2纵队指战员刚突围出去就被敌人发现了。孙仁道指挥第4团阻击敌人，卢绍武带着大队转移。负责掩护撤退的第4团第2营，在百倍于我的日伪军的合击中，经过反复冲杀，只突出了5连的部分同志。第6、7两个连的200多名指战员，抱着宁可自己战死也要掩护大部队转移出去的决心，同日、伪军搏斗了一天一夜，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毁坏了武器，拉响了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

第2纵队转移到内黄东北面，然后跳出包围圈来到鲁西的观城地区。

战士们纷纷要求要为第4团第2营的战友们报仇。

崔田民和杨得志召集团以上的干部开会，研究下一步的部署。有的说：“攻他的一路。”有的说：“打他的背后。”有的说：“多面出击，叫他顾此失彼。”……

崔田民说：“这次日寇扫荡的目的，是想消灭我们的主力。不管打他的那一路，必定会引得诸路齐来。我们身边的部队不多，突围时又失散了一些人，实力不足，众寡悬殊。我看硬打不是个办法。”

杨得志说：“敌人这次‘扫荡’，可以说是倾巢出动。这样一来，他的后方必然空虚。我看还是绕开他的主力，直捣他的老窝。”



“我同意司令员的意见。”崔田民接着说：“打他的后方，还可以搞乱敌人的部署，打破日军的‘扫荡’计划。”

大家都同意这么打，于是“掏老窝”的方案就定下来了。

选定的第一个攻击点是清丰县。清丰县在滑县东北，守备力量薄弱，离敌人“合围”第2纵队的地区也比较远。崔田民、杨得志指挥第2纵队主力攻城，其余部队配合当地的民兵、游击队炸碉堡，夺物资，端炮楼。在敌人后院里点一把火。

这一着还真灵验，各路日军纷纷回调援清丰，“合围”的部署打乱了，第2纵队主力和根据地民兵、游击队配合，在运动中消灭日、伪军700余人。

血与火的9天“扫荡”过去了，第2纵队回到沙区时，这里已经面目全非了。

141个村庄被烧成废墟，53户人家被杀绝，4000多同胞惨遭屠杀。在一个被焚烧的房子里，扒出100多具烧焦了的尸体。在一口水井中，找出72具尸体。有的被剁成八块；有的被挖掉五官，刨出内脏；有的被钉在寨门上，用四根一尺多长的钉子，穿过手心和脚心钉上去的。挂在树上的人皮，是从一个4岁小孩身上，活活剥下来的。至于对我们女同胞犯下的滔天罪行，是用文字无法记述的。

这，就是日本法西斯的“人道”！

这，就是日本法西斯的“王道乐土”！

这，就是日本法西斯的“大东亚共荣”！

房屋被烧光了，粮食被抢光了，枣树被砍光了，牲畜被杀光了，日本法西斯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在沙区的中心制造了“无人区”。

第2纵队的指战员们，含着悲痛掩埋了同胞们的尸体，把仅有的口粮，甚至脱下身上的衣服送给劫后幸存的父老乡亲。一股熊熊的复仇烈火在每个人的心里燃烧着。

冀鲁豫党政军负责同志共同研究救济受难群众的问题，当前最关键的是粮食，民以食为天，没饭吃就无法生存下去。

晁哲甫说：“1933年黄河决口，我们曾发动群众‘吃大户’度过了难关。”他沉思了一下，望着区党委书记张玺和杨得志、崔田民问：“这个办法，可不可以再用？”

“我觉得‘吃大户’作为一个口号目前还是不提为好。”崔田民是个很注重政策的同志，他考虑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停了一会接着说：“不过提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救济受难群众，就是爱国，我想还是可以的。我们可以用钱救济受难群众。”

大家都同意崔田民的办法，经过党、政、军各方面的努力，在很短的时间内，筹集起8万多斤粮，9万多块钱，1000余件衣服，全部救济了受难群众。第2纵队还派出几十支小分队，帮助群众修房建屋，重建家园。党、政、军机关抽调干部组成5个善后工作队，到受难地区进行宣传、慰问和救济工作。崔田民和杨得志在这段时间里总是一身汗，两腿泥，帮助人民共度难关。群众逐渐安定下来了，第2纵队也重新在这块土地上站住了脚。

沙区“大扫荡”之后，冀鲁豫边区的敌情更为严重。周边驻有敌人重兵，根据地内有日伪军7万余人，将沙区与鲁西南的联系完全切断，第2纵队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斗争形势更为严峻。此时，与边区紧密相连的鲁西抗日根据地也面临着严重困难。为了统一对敌斗争力量，坚持冀鲁豫平原抗日游

击战争，7月1日，中共北方局、集总决定，将冀鲁豫和鲁西两区合并为新的冀鲁豫边区，冀鲁豫、鲁西两个军区合并为冀鲁豫军区，两区所属主力部队统一编为八路军第2纵队，杨得志任司令员，杨勇任副司令员，崔田民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苏振华任纵队兼军区政治委员，卢绍武任纵队兼军区参谋长，唐亮任纵队兼军区政治部主任。

新的冀鲁豫边区，东临津浦，西靠平汉，南跨陇海，静静的卫河沿北界向东流去，滔滔黄河横穿其间，除泰山、大峰山、东平湖一些较大的山峦湖泊之外，全区是一片可以纵横驰骋的广阔平原。摆在崔田民眼前的任务更加艰巨，斗争更加复杂。他决心不管日、伪、顽、匪多么猖狂残忍，都将一如既往，和战友们亲密团结，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用他那对党、对祖国、对人民无限热爱的赤子之心和卓越才能，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 浴血在红四方面军最前阵的钢锋战将程世才

王毅

程世才（1912～1990）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12年8月8日生于湖北省大悟县。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四方面军第11团连政治指导员、第11师党委书记、第33团政治委员、红30军第88师师长兼政治委员，红30军副军长、军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曾入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央党校学习，后任冀热察挺进军参谋长兼第12支队司令员、抗大分校校长、延安中央党校四部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辽南军区副司令员，辽东军区副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第3纵队司令员，南满军区司令员，安东军区司令员，辽西军区司令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于南京军事学院深造，后任公安军第一副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兼沈阳卫戍区司令员，1959年任军委装甲兵副司令员（1985年定为大军区正职待遇）。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3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他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0年11月15日因肺癌医治无效，于北京逝世。

\* \* \* \* \*

1974年9月31日傍晚的人民大会堂，华灯齐上，红旗飘飘，这座象征中国人民大团结的宏大建筑沉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25周年纪念的节日气氛中。由周恩来总理主持的盛大国庆招待会就要在此召开，而招待会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北京卫戍区司令、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吴忠却急急火火地离开宴会大厅，驱车赶奔京西宾馆。在楼里，吴忠小跑着找了几遍，终于发现站在南阳台上的那位身材高大、星眸如炬的老人，他赶忙上前敬礼，喊了一声首长。转身看着满脸是汗的吴忠，老人操着宏亮的湖北口音斩钉截铁地说：“组织上没有正式恢复我的工作，那就不能参加国庆招待会，名不正，言不顺嘛！”作为他的老部下，吴忠紧张地搓了搓手，除了把他曾在电话里解释过多次的意思重复之外，又格外诚恳地说道：“邀请你和其他68位尚未恢复工作的老同志参加这次国庆晚宴，是周总理亲自安排的。”十分钟后，这位倔强的老人终于出现在由周恩来主持的最后一次国庆招待会的座席上。他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军杰出的军事指挥员程世才将军。本文仅从他战功卓著的戎马生涯中撷取红军时期的那一段烽火年代的故事以飨读者。

川陕，一片土地一片血

程世才从昏迷中醒来，忽然发现自己被抬在一付担架里，头上、腿上缠满的绷带，已让血殷得湿乎乎的。他挣扎着起了起身，看到前前后后都是自己熟悉的红五星八角帽，才又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1932年10月的枣阳新集战斗，是红四方面军由鄂豫皖根据地向西实施战略转移以来打得最凶的一仗。蒋介石在我四方面军主力跳出其包围圈后，施行“追剿”部署，以嫡系第14军军长卫立煌率第10师、83师、34旅从东、南、北三面对我包围进击，企图以左右钳击之势，围歼我军于新集以西、汉水以东地区。重兵包围之下，迫使我方不得不与敌死战。红11师向敌右线薄弱处第34旅发起反突击。前线上的第33团向敌人制高点猛冲。突然，一阵机枪扫射，团长吴云山饮弹牺牲。在这千钧一发之时，身为第11师党委书记、

第 33 团政治委员的程世才挺身而出，挥起大砍刀率队杀入敌阵。程世才手中的那柄刀窄而长，与众不同，就像他那高大的身材一样。一道寒光腾起，全团士气为之大振，一鼓作气直至突围成功。多少年后，共和国国家主席李先念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十分动情地说，“在战场上，世才气势夺人，身先士卒，一往无前，就像出山的猛虎。”那时李先念任第 4 方面军第 11 师政委。当李先念赶到前沿时，满身是血的程世才一字一句地说：“请政委不要把我就地安置，只要还有一口气在，我就跟他们拼——拼到底！”他在得到李先念郑重的首肯之后，再一次地昏厥过去。就这样，带着一身的重伤，程世才投入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激流。

程世才，大别山贫寒农家的儿子，仿佛就是为着革命战争而生的，对于黑暗与压迫的顽强反抗，早在他的体内蓄积为一股巨大的能量，促使着那天赋的强悍体魄一往无前地冲锋——再冲锋，其迅疾之势往往会令他自己都惊愕不已。“我刚参加红军那会儿，也象你们这么大，但个头已经就这么高了。排长、班长都是黄埔毕业生，纪律要求特别严格。因为我身体素质好，又是新兵，身上背的子弹、干粮比别人多，行军、训练也总被安排在后面。1930 年，蒋冯阎军阀中原大战，顾不上‘围剿’红军，鄂豫皖根据地趁势发展，出击平汉铁路。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大规模的战斗，真刀真枪地干啊！我军向铁路东侧的敌阵发起攻击。听到班长喊了一声‘上！’，我拎起步枪就冒出了田埂，撩开长腿往前冲！突然，两个国民党兵端枪挡住去路，一个胖少尉用驳壳枪指着，大叫‘举起手来！’我当时几乎被这场面惊呆了。原来，我身高腿长，只顾闷头往前跑，太快了，脱离部队单枪匹马地闯进了敌前哨。我赶紧定了定神儿，双手将步枪高高地举过头，但右手的拇指仍轻轻顶着扳机。胖少尉拿手枪指着，示意另一个家伙上来缴械，可那家伙看我身高个大，一再犹豫，正在这个当儿口，胖少尉冷不防朝我开了一枪。也顾不上自己是死是活了，好象打娘胎里生下来就会似的，我翻转手中的步枪由横变竖，冲着胖子就搂了一发子弹。胖少尉的脑袋被打开了花，另一个国民党兵吓得拔腿就逃。他跑，我也跑，不过可不是去追他，而是头也不回地跑回到咱们的队伍里。”听程团长有声有色地讲了这段化险为夷的新兵经历，周围的同志和师政委李先念都忍不住地大笑，带走了许多长途行军的沉闷与疲惫，已经是第 33 团团团长兼政委的程世才也爽朗地笑起来。其实，他的故事刚讲了一半。当年仅 17 岁的程世才归回本队时，已然满身透汗。他所体验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那颗驳壳枪弹击穿了他左腋下的粗布军装，离心脏只差不到一寸的距离。在伤痛的折磨下，他脸色铁青，整整一天没吃一粒米、没喝一口水。也就在这天夜里，排长把新兵程世才叫到一边，带给他一个沉痛的消息，因为他参加红军，哥哥嫂子都受连累被土豪杀害了，他的老母亲也被驱赶出村庄。尽管排长强令他不许哭，可他还是一头扎进树林里大哭了一场。程世才永远记住了这一天，而这一天如刀刻般重新雕凿了这个人的心魂。革命战争就是在生死之间的奋斗，它的终极不是走向死亡之地，而是迈向再生之境。真正的勇猛与无畏决不是基于对死亡的无知，相反是建立在对死的深切体验与理解之上。从这一天开始，程世才感到生命已不仅仅是属于他自己。他时常默想：也许，多少次，我已经死过了，但战斗又赋予我生机，革命烽火就是我的心火，我的再生源于革命。既然头一次拿起枪就冲到了最前阵，那么革命注定是要我作先驱、当先锋，赴汤蹈火而后快。或许不该否认，冥冥苍穹之中真的存在一颗罡星，襄助这个身材魁伟的勇士成为天才的锋线

英雄。

程世才率领红 11 师第 33 团，作为胜利越过秦岭的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迅速进抵汉中平原，令沉寂逾百年的汉中盆地重起千年兵争要冲的躁动。汉中沃野居于三千里汉水之源地，东联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北望三秦，西通巴蜀，南贯楚荆，为历朝历代群雄逐鹿之地。昔日刘邦据此而后兴汉，诸葛武侯也以之为战略出发地希图中原霸业。1932 年的这个隆冬之夜，荡荡汉水迎来了一场前无古人的武装较量。国民党陕军杨虎城部向洋县、城固地区东进；与此同时，中央军胡宗南、刘茂恩部溯流西进至安康一线，欲成东西夹击之势，阻截红军南渡汉水，红 33 团到达距汉水河滩仅二里的公路上，正在稍事休整，侦察员匆匆跑进团指挥部：“报告团长，听路旁小吃店老乡说，傍晚中央军的八九台汽车满载士兵刚从这里路过，到杨虎城部队那边去了。”很明显，这是敌人在取得联系，准备夹击我军。程世才迅速警觉起来，为保证后面大部队顺利渡江，他一边派人控制了公路两侧的制高点，在江岸布置了警戒，一边带上 3 个营的主力赶到汉水。

岸边，望着宽阔的水面，透过夜幕，勉强可以看到起伏的对岸，几株枯树随着寒风摆动。浅滩结满了冰凌，亮晃晃地映着月光，好象浮出水面的无数把钢刀。看不清河心的水势，只能听到一浪一浪的涛声。前进，无桥少船，几个月来连续行军作战，同志们忍饥挨饿，身子疲弱，怎能涉过冷冰湍急的宽阔江水。停下，中央军、陕军即将赶到，背水而战，凶多吉少。程世才徘徊片刻，冲着一营长林英剑喊道：“全团营连干部和最好的战马马上到这儿集合！”水边上长大的程世才凭着对江河的一种直觉，迅速选定了一段江面，带领干部拉着马尾巴一字排开，踏破河岸的冰凌，扑进严寒的汉水。开始水较浅，慢慢的水升到大腿根，到河心时已没到程世才的胸部，紧随其后个子不高的林英剑忍不住直喊：“团长，水已经没到肩膀啦！”程世才回身拉了他一把，自信地说：“没事儿，最深也就到这儿了！”果然，百米之后，水慢慢的又浅了，径可登上南岸。涉水地段已探明，程世才翻回北岸飞身上马，直奔前指。总指挥徐向前、第 11 师政委李先念听了程世才的报告，满脸的阴云尽扫。徐总指挥满意地点点头：“枯水季节，一定能找到一片浅滩，第 33 团干得好！世才，你在前面组织疏导、警戒，全军星夜渡河、一律徒涉！”

12 月 11 日寒夜涉过汉水，成为创建川陕根据地的先机。此时的程世才还不知道，他在此后的全部红军革命生涯中就与渡水结下了不解之缘。每一次新的转战，均以渡水行动为先声，而每一次先声之战又是以程世才为先锋。四方军转向镇巴、西乡，彻底摆脱了遭敌追堵的被动局面。当杨虎城部赶到汉水时，已是鞭长莫及

红军入川，插进川北敌后空虚地带，分兵三路迅速实施战略展开。乘四川军阀混战之际，程世才带领第 33 团一路占领了屏障通江的要点得胜山，并以得胜山为根据地辐射扩展红色版图。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大地上燃起了土地革命的薪火。川北山区地势偏僻，没有经受大革命运动的洗礼，许多农民住在交通闭塞的山旮旯里，连三民主义、国民革命也闻所未闻，更不要说什么共产主义和苏维埃运动了。但就是在这片原本没有群众基础的地方，红军得到的却是空前的拥护与支持。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经常充满疑惑，在当时，共产党之于中国各派政党，绝不是一个大党，红军之于中国各地军队武装，绝非一支装备精良的劲旅，究竟是什么使这支独特的原本微不足道的政治力量得以容纳大众，生生不息地发展壮大？是苦难，苦难是只在革命者

与被压迫者之间相通的共同语言，革命者为反抗而生，而有压迫的地方就孕育着反抗。四川军阀在川北进行残酷的剥削，捐税繁重，连行乞讨饭的，也要出“花子捐”。程世才带部队进了得胜山，一面就地休整、补充备战，一面大力开展发动群众、建党建政工作。

“红军就是穿上军装、拿起武器的穷人，是穷苦人自己的队伍，为穷人打天下、求翻身、得解放。天下穷人是一家，红军跟穷人就是一家。”兼政委、团长于一身的程世才深知发动群众的重要，他把部队分散到川北老乡家里，挑水砍柴、喂猪放牛、烧饭肩娃儿……什么脏活累活都干，什么活儿干起来都内行。很快打破了外地人同本地人、军队同老百姓的隔阂。第33团赢得了得胜山人民的信任与拥护。打土豪，分田地，开仓放粮，解决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农会、赤卫队、儿童团、妇联会等革命组织相继成立，不出一个月就在得胜山一带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他还抓住时机就地招兵扩红，设立“参加红军报名站”。一时间到处是父送子、妻送郎的情景。在程世才的作战日记上，就记录下了当时流传很广的一首民歌：

月出东山顶，照进竹笆门。  
么妹灯下打草鞋，送郎当红军。  
手搓桐麻绳，根根耐千斤。  
一只草鞋三百层，层层有我心。  
鞋尖编朵花，表表我深情。  
哥哥天天穿草鞋，见花如见人。  
妹妹手不巧，妹妹心不灵。  
草鞋不好你莫嫌，万里能行军。  
哥去闹革命，妹妹也光荣。  
等到天下都太平，你我再成亲。  
月儿已西沉，雄鸡唱五更。  
手捧草鞋出了门，送郎上征程。

第33团就地扩红1000多人，消灭了当地的地主反动武装，并歼灭了进犯之敌杨森一个旅。程世才率领英勇的第33团扎根得胜山，牢牢把住了通向南巴地区的南大门。

1933年1月21日，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酣战暂息，双方宣告妥协。27日，蒋介石委任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兴兵六万实施“三路围攻”。面对来势汹汹之敌，徐向前总指挥确定了积极防御、诱敌深入，实施战略退却以收紧阵地，待机反攻与敌决战的作战方针。红四方面军且战且退，撤至战略后方最北端的空山地区。

5月17日，方面军总部在空山坝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以冒进空山坝西部的敌左纵队13个团为反攻的重要打击对象。该敌贪功急进，与中、右两路间隙极大，已进入我军三面包围，只要断其退路，便可瓮中捉鳖。自空山坝以北向敌左侧迂回，断其后路的重任就交给了灵活勇猛的红11师。

5月20日凌晨两点，程世才接到第11师政委李先念的电话，命令第33团迅速向空山坝东南20多里远的余家湾方向行动，并要程世才连夜赶回方面军总部——空山坝，接受紧急任务。

空山坝座落在海拔2500米的险峻高山上，周围群峰林立，怪石嶙峋，沿

着峭岩绝壁只有两条羊肠小道，分别通往东南方向的两河口和西南方向的余家湾。方面军总部设在半山坡上一间破旧的茅屋里，总指挥徐向前和总部领导人住在一处窄长的房间，墙壁上挂着一幅四川省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屋内的木床上放着一部电话机，不停地传递着各方向的战况和首长的指示。

当程世才赶到总部时已经鸡叫头遍。凌晨5点钟，会议开始了。徐总指挥环视了一遍到会的各师、团领导说：“现在摆在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分兵把守，这样只能维持对抗，形不成反攻；另一条道路是在一个方向上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主力一部，而后乘胜追击，彻底粉碎敌人包围。”这时，徐总停下来去接一个紧急电话，屋子里格外寂静。大家全神贯注地思考着即将来临的战斗。李先念瞧了一眼程世才，两人会意地站起身走到地图前，第73师师长王树声也跟过来，“李政委，多好的地形啊！”他指着地图用其钢挫一般的声音说道：“从这里出击最好，就是没有通路。”李先念和程世才都知道，王树声所指的那组密匝匝的等高线是陡险的余家湾。李先念再次用目光与身边这位高大的年轻人交换了一下意见，而后很有把握地说：“只要想办法，在余家湾一带可以开辟一条通路。”徐向前回到原位，目光凝注着前方，程世才知道，这是徐总决心已定的表现。徐向前说道：“原定后天开始的行动，现在决定提前到明天即21日拂晓——11师担任自空山坝以北向敌左侧迂回，死死切断敌人退路；第10师、12师向敌右侧包抄进攻；第73师继续坚守小坝子等阵地，伺机正面反攻。”

当天上午10点，程世才带上各营干部和第1、2营主攻连的干部，换上便衣来到了余家湾山头阵地。

余家湾位于空山坝东南，背靠巴山，浓密的丛林布满了整个山峦，古老的松柏二三人方能合抱，据说是蜀汉大将张飞栽种的，还有刺人的荆棘和茂密的青竹，这都将是大部队穿插时的障碍。程世才带人在山里艰难地爬了一上午，来到离敌前沿百余米的地方。他掏出怀表，记下了这段行进的准确用时，又端起望远镜观察敌军的部署。

由此往南通过20余里的山林，有一座山岗，就是柳林坝，驻敌两个营，不远处还有一个营，为敌团预备队，团指挥所设在那里。往西南不远的一个村庄内，架有一排电台天线，从地图上可以确定，就是梓潼庙——敌李鳌陶旅部驻地。从望远镜内清晰可辨东山上密集的碉堡和弯弯曲曲的交通壕，敌人防守严密。只有开辟林间通道，从敌防守薄弱的翼侧进行反攻，然后追歼，才能将敌拦断阻截，配合全线反攻。

程世才当机立断，决定由第1营、2营分兵左右两路，相隔二三百米，从山林中开辟通路，并担负团主攻任务，从下午2时开始，到次日即21日两点前完成。

冒着声荡群山的大雷雨，苍茫的巴山霎时间变得翠色如碧。程世才突然感到鼻子发酸，忍不住地要落下泪来。面对这母亲怀抱般的深谷，他被深深地感动了，就象那童年抚育他成长的大别山一样，一个异地赤子在这片热土中再次获得了一种脉脉亲情。他真想知道自己的老母是否还活在人间，他真想知道自家门前那两株油桐是否还依然挺拔……可这一切都要待到革命的最后胜利。

程世才闭起厚厚的双唇，抄起大砍刀三步并作两步，赶到了部队的先头。雨还在“哗哗啦啦”不停地下，伴随着漆黑的夜幕为程部作掩护，新开的道路如同一柄利刃，无声无息地伸向了敌人的软肋。部队在距离敌人仅有不到

百米的地方才停下来，战士们擦掉武器上的雨水，轮流休息着。程世才摸出怀表，“凌晨两点整”，距发起总攻还有两个小时。排除了潮冷饥饿的干扰，程世才的脑子里飞快地闪过了未来战局中即将发生的种种可能情况，如果在一两个钟头内，敌情没有新的变化，胜利是有把握的，如果敌人有大规模的增援，我们的胜利就要付出较大的代价……

4时整，总攻开始了。红33团的战士如同猛烈爆发的山洪一般，将敌人的侧背冲开了一道豁口，仓促应战的川军，完全被如从天降的红军打蒙了，有的提着裤子，有的端着枪胡乱射击。整整两个营的敌人，没等编成战斗队形就全部成了俘虏。战斗紧张激烈而顺利地进行着，程世才率领部队一口气冲到敌方旅指挥所——梓潼庙。正在这时，师政委李先念带着几名干部泥一身水一身地赶到了前沿，他端起望远镜观察了战场情况，兴奋地对程世才说：“还是33团打得好，打得猛！”

在这场胜利的战斗中，第二个向程世才表示祝贺的是川军独立路司令兼第4师第10旅旅长杨杰，这位昔日威风八面的军阀，万万也想不到，生擒自己的竟是一位年不过二十的青年红军指挥员。垂头丧气的杨旅长面对身材高大的程世才，只是在嘴里一遍又一遍地咕哝着：“完了——就这样子地完了！太快、太快！”其实，被第33团活捉的岂止这一位旅长，仅在此12小时之后，川军第29军23旅旅长覃世科又懵懵懂懂地成为程世才的阶下囚。

徐总指挥的到来，总有他与众不同的方式。“程世才！”他举手将这位心爱的猛士召到身前，指点着左翼的一脉山岭面授机宜：“速派一部分兵力控制分水岭，扼制敌人回旋的余地，并马上与友邻部队取得联系。”程世才知道，能亲耳聆听徐总指挥的教诲，就是对团队作战成绩的最大褒奖。回到指挥所，徐向前显出了难以抑制的兴奋，他总结了一天的战况：“第33团在余家湾给敌突然袭击后，我军开始了全线大反攻，敌人已显颓势。我军在几条战线上均给敌人以重大杀伤，随后乘胜扩大战果，追歼敌人。”徐向前接过程世才自卷的“大炮”吧吧地吸了两口，颇为欣赏地冲着身边这位年轻的指挥员点了点头道：“这烟不错！”尔后他又回到方才的话题，“装备补给的条件要求我们，必须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这样就需要熟练地掌握指挥艺术。熟练的指挥艺术是从实战中学习总结出来的。没有鄂豫皖苏区的教训，就不会有今天这样收紧阵地趁机消灭敌人的经验！”徐向前狠狠地吸完最后一口烟，站起身道：“部队要抓紧时间休息，明天继续前进，有什么困难吗？”“弟兄们打了一夜仗，没粮吃，”程世才顿了顿还是把话说完了，“就近有两亩多青蚕豆，可不可以买下来撑撑饿？”徐向前一边迈步出了指挥所，一边将手一挥道“可以嘛！”目送着总指挥削瘦的身影远去，程世才还不知道，这一仗下来，不仅巩固了红军川陕根据地的地位，确立了他作为一名急先锋在徐向前治军方略中的地位，他本人在第四方面军成了知名人物。

在1933年6月的木门会议上，第11师扩编为第30军，程世才成为第30军第88师师长兼政委。程世才的第33团则荣获了一面“攻如猛虎团”的荣誉军旗。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程世才第一次将难以抑制的愤怒投向了“自己人”。

当初反“三路围攻”开始不久，张国焘借口部队“不纯”，令陈昌浩和保卫局进行“肃反”——单线领导，搞逼供信、“自首”运动，随意捕人杀人，罪名无非是什么“托陈取消派”、“右派”、“通敌”之类。“肃反”



使不少团以下干部遭到逮捕和杀害。第 73 师第 218 团第 3 营一仗没打好，结果团政委被捕，还株连全团的排以上干部，几乎全部抓光！那是反“三路围攻”，在部队继续后撤收紧阵地的一个下午，程世才奉命来到师政委李先念的驻地。面对这个身如铁塔的鄂北汉子，李先念向来视他为自己最亲密的战友。因此，这位只有 24 岁的师政委开门见山：“世才，保卫局要我枪毙你，他们说你是‘AB 团’！”屋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可程世才仍是感到了气氛反常，一腔怒火腾地跳了起来：“政委，我程世才是什么人，你最清楚，要杀要剐，听组织安排，但我有一句话要说在前面，杀死我一个程世才事小，杀寒了弟兄们的心，杀垮了咱红军事大！”李先念没有作声，把一张写满了人名的纸条放在油灯上烧了，随后要通保卫局的电话，只给了对方一句话的答复：“打完了仗再说！”李先念保住了程世才的性命，也保护了全第 11 师的骨干，也为日后第四方面军保存了一支强悍的主力部队。

在木门会议上，前方指战员对自毁长城的内部“肃反”给予了激烈的抨击。当程世才得知坐在自己对面的那个人就是保卫局里下令“清洗”第 33 团的幕后人物时，他无法容忍这种对革命者忠诚的质疑。年轻的程世才从屁股底下抄起凳子径直朝那家伙打去。原本嘈杂的会场，只听程世才的一声大喝：“他娘的，就是你要害我们那么多的好弟兄——你家地里种了二亩人头咋的！？”气得满面通红的程世才昂然地立在会场上，板凳已被他摔碎成几块，保卫局的那个幕后人物屁滚尿流地跑了。在这样的场合，出了这样的事，大家并不为之惊讶，反而欢呼雀跃起来，都说程世才“一板凳”打掉了“肃反”者的气焰。

带出一支“攻如猛虎”的好团队，对于程世才来说还远远不够，他从空山坝一役中看到了夜战突袭的潜在优势，便在反击刘湘 50 万大军的六路围攻中，着力培养起了一支名冠川北的“夜老虎”团。

1933 年冬，程世才率第 88 师在老观场一带担负箝制敌人的任务。当时，敌人的兵力多我数倍，装备优良，我军为了战胜敌人，往往采取夜战。可是，夜战是有许多困难的，如夜间的战术动作、部队的运动、通信联络，以及混战中如何分辨敌我的问题，都要一个个设法解决。为此，程世才从能征惯战的第 265 团抽出一部分部队，进行严格的夜战训练。

1934 年初，川军刘湘一部进犯至川西北渠江上游重镇达县，第四方面军与之短暂接触后，旋即施行收缩阵地，诱敌深入。程世才部署第 265 团在登龙坪一线担任防御。一天，刘湘部的一个旅在飞机、炮火的掩护下，向该团发起攻势，战斗从早晨六点打到下午三点。我军阵地上的山石粉碎，工事坍塌，但是战士们仍坚守主要阵地，寸步不让。黄昏，敌人暂时收了兵，在对面的山上构筑工事。程世才急召第 265 团团长沙丰明、政委黄英祥研究战术。“苦战一天，我们失去了部分阵地……”，“师长，我们连夜把它夺回来！”面对部下的急切，程世才却显出成熟的沉稳，“不！花肠子的敌人恐怕会估计到我军天黑以后的反击。所以，咱们将计就计，以逸代劳。前半夜同志们抓紧休息，到了后半夜，就派‘夜老虎’，小试锋芒，来他个黑虎掏心！”敌人惊慌地等了半夜，也没见红军出击。误以为我军白天伤亡太大，无力反击。便放心地睡起觉来。午夜一点多钟，正当敌人熟睡的时候，在他们纵深 10 里处，突然响起了枪声。精于夜战的第 265 团钻到敌人肚子里去了。战士们在团长沙丰明和政委黄英祥的率领下，在敌人纵深处发起了攻击。敌人预备队的一个团，没来得及展开，即被消灭。第 88 师正面和敌人对峙的部队，

听到枪声，按事先的部署，从正面展开猛攻。敌人正面阵地上的两个团，由于腹背受敌，东窜西逃，无力应战。天没亮，敌人的一个旅大部被歼。

战后，程世才独自一人来到连队巡察，他没有让人惊扰这些夜战归来正在酣睡的勇士，他从一个个疲惫的战士身前轻轻地走过去，看一看那些拼弯了的枪刺，摸一摸那些卷了刃的砍刀。程世才默数着，这支有 103 人的连队，竟有 82 人的战刃之上染有敌人的血污。这个百分之八十的比率记录的是夜战的激烈，也铭刻着红军的英勇。天将黎明，程世才回到指挥所，用红铅笔把这一数据永久地写在了作战日志上。

2 月 10 日，刘湘嫡系郝耀廷旅及两个附属团，到达了毛坝场一带。他们在群山中构筑工事，修了木城、盖沟，准备歇兵过旧历年。徐向前总指挥认为战机已到，决定趁此机会向敌右翼大举反击，并再次点将程世才担负先锋突击。敌人的兵力强大，工事坚固，我军如白天进攻，必然伤亡很大。程世才最后决定以第 265 团为先导夜袭毛坝场。

凭借训练有素的夜战战术和精密的谋划，程世才指挥毛坝场一仗，歼灭了敌人的 1 个旅部 4 个团，击溃了敌 3 个团，缴获大量武器、弹药物资。这次大捷，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反革命气焰。程世才的“夜老虎”声威远震，使得敌人心惊胆战。

自 1933 年 10 月，刘湘纠集 40 余万军队分兵六路进犯川陕苏区以来，经过近一年的征战，程世才已成长为指挥第 30 军作战的副军长。一个大雨滂沱的夜里，在九龙场西头的一间破旧的房子，徐向前总指挥、李先念政委召集第 30 军的军、师干部开会，研究对敌最后决战的战役部署。

1934 年 7 月间，于川东北万源一带，第四方面军以英勇顽强的作战扼制住了刘湘十余个旅在东线长达 30 多天的重点进攻，已为第四方面军的总反攻创造了决定性的条件。要想歼灭刘敌的有生力量，就必须发挥我军运动战的特长，搞大纵深迂回包抄。但究竟是左旋包抄，还是右旋包抄？在这个关键的战术问题上，谙于用兵的徐向前与刚愎自用的张国焘发生了冲突。左旋向东，东边是刘湘的 3 个主力师。右旋向西，西边是非主力的敌范绍曾师。徐向前主张左旋打刘湘主力。搞掉刘湘 3 个主力师，不仅可以占据下江东地区，而且可以改善我军装备。反之右旋向西，同敌军处于平行地位，地形不利于包抄。但张国焘坚持右旋，他是中央代表、西北军委主席，徐向前只得服从命令。其结果早在意料之中，右旋包抄不成，只得转回来左旋反攻，而此时敌人已经退却，尾追歼敌，战果不大。东线反攻的结果很不理想，徐向前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西线了。西线四路敌军见东线两路崩溃，也都露出撤退逃跑的迹象。包抄逃敌，又遇到浅迂回还是深迂回的问题。张国焘打来电话，指示北向长池，打浅迂回。成败之抉择又一次摆在了徐向前也是四方面军的面前。徐总指挥坐在灯旁，吧嗒吧嗒地抽着小旱烟袋，炯炯有神的眼睛望着那些英勇善战的指挥员们思考着。他见人来齐了随即磕掉了烟灰，把烟袋放进上衣的口袋里，从皮包里掏出一张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摊在一块木板上，边看边用红色铅笔画着。

大家围着徐总指挥，有的坐着，有的蹲着，等候最后的决策。每个人的两眼都随着他的红铅笔审视着。他顺着向西进军的攻击方向，把驷马门和蓝草渡画上了红圈。接着，又顺第 31 军的攻击路线，把镇子坝、和平场和旺苍坝，画了红圈。最后把第 30 军攻击的杨柏河、新庙场、清江渡和右垭口，也都依次画了红圈。这时他抬起头来，扫了大家一眼，似乎要说什么，大家习

惯地注视着他。他稍停了一下，又低下头，继续画起来。他用左手量了量从木门、桑林子、黄牛坎到黄猫垭的距离，随即画了一条蓝色箭头，最后沿九龙场、五观寨、黄猫垭，重重地画了一条红色箭头。“浅迂回兜不住敌人，那是抓兔子尾巴，抓不住的，这回就是犯错误也不听他的，打完仗再说，我负责！”徐向前放下了手中的铅笔。

“对！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嘛！我们听总指挥的！”李先念说到这里，转脸看了看坐在一边的程世才，程世才没作声，但他那坚定的一个点头就已经表明其全部心迹。

“好！我们也来个当机立断，搞大纵深迂回，跟敌人赛跑。”徐向前兴奋地挥起右手上的铅笔继续说：“我第31军，已进抵旺苍坝以西，切断了南江守敌邓锡侯的退路。现在摆在第30军面前的任务有两个：一个是以一个半团的兵力，迅速顺恩阳河尾追逃敌；另一个是以军的主力，火速抢占黄猫垭，切断敌孙震所属部直向苍溪的退路，并且歼灭全部敌人。现在敌人离黄猫垭已经近了，而我们距离黄猫垭还有五六十里路。因此要分秒必争，用最快的速度抢占黄猫垭，切断敌人退路，全歼逃敌！先念、世才带第30军先头部队急速穿插，我带后续部队跟进。”说着，用目光扫了大家一眼。由于战斗任务如此紧迫，大家也不由得紧张起来。

接受新的战斗任务后，李先念、程世才同几位师长、政委研究决定：由第88师熊厚发师长带领第263团为先头部队，立即出发，火速抢占黄猫垭；其余第268团、264团、267团等为后续部队，随后跟进，要求所有部队，于第二天下午，全部到达指定地点。少数部队顺恩阳河尾追逃敌。

熊厚发接受任务后，操着湖北口音，满有把握地说：“首长放心，咱们红军的两条腿是铁打的，决不能让敌人从黄猫垭逃走。”几年来在战斗生活中，熊厚发始终在程世才的属下，彼此结成了深厚的情谊。望着他那迅速消逝在雨夜中的矫健背影，程世才感到这一仗是很有把握的。

拂晓，群山弥漫着潮湿的冷雾。程世才率领队伍，沿着高低起伏的山路，向黄猫垭急进。

黄猫垭是敌人溃退的必经之路。它是南北两条山岭夹在中间的小山头。西面和南面是一条月牙形的险峻的山谷，山谷的两面是悬崖绝壁。横在东北的一条山岭像巨龙一样咬住它的背后。座落在巨龙身上的鸽子庙和五观寨离此不过五六里路。一条通向木门的山路，蜿蜒崎岖地把它们连接起来。中午，程世才赶到九龙场以西离黄猫垭只有20多里路的山梁时，第263团派人来报告说：“黄猫垭尚未发现敌人。”程世才沉吟片刻，即令第265团就地做午饭休整补充，随后向身边的警卫连董连长喊了一声：“带上连队跟我走”。

程世才身边这支警卫连非同一般，全连170人，步枪、快慢机、大砍刀、手榴弹、子弹袋，以及携带的干粮也都很充足。不仅如此，警卫连士兵的素质也是十里挑一的好手，因而素有“高墙”之称，是程世才在关键时刻直接带上阵地东挡西杀的近卫军。今天，在这场不平凡的大迂回作战中，程世才再次带上这支“高墙”作为先锋，形成堵截逃敌退路的第一道防线。

天过中午，程世才和他的警卫连继续搜索前进。熊厚发已掠过了黄猫垭，堵在了最前面；大部后续部队还远远地在后面行进，最快的第265团也尚与之相距十几里之遥。已连续几天几夜未合眼的程世才第一次感到有些疲惫，他几次从马背上摔下来，又被重扶上马。他干脆集中全连眼睛最敏锐的几名战士，骑在马上用望远镜不断向四面观察搜索，并不停地向他报告。程世才

微闭二目，一边听着战士的报告，一边思考，敌人是否已先我通过黄猫垭，如果是这样，那下一步该怎么办？

午后3时，抵达黄猫垭近旁的五观寨，警卫员沈德叶大喊一声惊醒了程世才：“副军长，发现敌人了！”

“有多少？”

“好多呀！黑压压一片！”

程世才顺着警卫员手指的方向一看，在敌人尖兵排的后面，黑压压一大群顺着山路爬了过来。这就是从木门方面溃退下来的敌人的两个旅。当他们发现黄猫垭前方已被我军占领后，便顺着山岭，向黄猫垭以东的鸽子庙和五观寨窜过来。

观察了敌情后，程世才一面派人向徐总指挥报告，一面分别通知处在一前一后的第263团和第265团。同时命令部队迅速组成战斗队形，抢占五观寨的有利地形，挡住敌人退路。以几十个人据守山顶，借着敌人丢弃了的完整工事，围成一张弓形。由董连长带领一个排进入山坡上的工事。

敌人刚一发现红军，就立即组织了一个团的兵力，向我阵地冲击。警卫连的机枪、步枪、手榴弹对着敌群猛打。敌人倒下一批，又上来一批。敌人越来越多，一万六七千名敌军，全部挤在由黄猫垭到五观寨的这条十几里路的山谷里。敌人倚仗人多，一次又一次地向我军阵地发起冲击。我们的战士，精神抖擞，越战越勇，以一当百，凭借近战肉搏坚守阵地。虽然经过多次激烈的战斗，但几百公尺的阵地，仍然象大山一样地屹立着，一寸也没有落到敌人的手里。

打退敌人的五六次冲锋后，警卫连伤亡也不断增多，为了集中力量坚守要点，程世才命令董连长带领前沿阵地的十多名战士，搀扶着伤员，撤到山头阵地上来。此时，敌人又一发炮弹击中了陈指导员的左臂，鲜血从衣袖流下来，豆大的汗珠，顺着脸直淌下来。但他仍然坚持战斗，不下火线。战士们紧握着步枪和大刀，把程世才团团围护在中央，高呼“我在阵地在，我在副军长在！”两眼射出愤怒的光芒，仇视着冲上来的敌人，准备进行更激烈的战斗。

经过又一场血战，170人的连队，只剩下了30多人。每个战士的身上都粘乎乎的，一身焦土一身血，有敌人的血，有战友的血，也有自己的血。程世才身上的军装已被横飞的弹片和炮弹掀起的石块撕烂了，浑身上下血迹斑斑。他手握一柄大砍刀，向身边警卫部队的战士喝令一声：“排成战斗队形！”在他心中，守住阵地压倒一切。

坚守在阵地的程世才和他的警卫连已弹尽刃折，他带领警卫连决定用石块作最后一搏。正在此刻，在他的背后，雷鸣般的喊杀声由远而近。邹丰明率265团赶来增援了。顿时，警卫连的战士们哭了，董连长哭了，程世才也哭了。没人能抑制得住那一刻的泪水，更没有人能说清泪水是为悲恸还是为欣喜。就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时间仿佛凝固了，时钟停下来让我们的勇士也获得片刻的停歇，渲泄那如泉的泪水。其实，他们已经死过了多次，此时的泪水是为了那死后的永生……

这一场恶战持续到了天黑，几个波次的白刃格斗之后，敌人又轰轰烈烈地向我军阵地猛烈炮击，炮弹炸平了胸墙，碎石呼啸着飞向空中。我军工事薄弱的地方，被打开了缺口，看到这种情况，程世才立即命令战士们扑上去，将缺口迅速堵上。但警卫班长沈德叶却把他推倒，用高大的身体压伏在程世

才的身上。紧接着就在不远的地方，轰的一声巨响，掀起的碎石和沙土从空中落下来。等程世才爬起来的时候，只见沈德叶软弱无力地躺着，这位追随程世才久经转战的鄂北汉子右臂被弹片切掉了大半，已经昏迷不醒。

程世才借着火光闪现的一瞬间，忽见徐向前总指挥和李先念政委亲临最前线指挥作战。他急忙跑过去，向徐总指挥报告战况。徐向前就站在最前沿阵地的缺口处，观察敌我双方的作战态势。那里是最危险的，程世才急忙把他拉走。刚离开那里就又落下敌人一颗炮弹。徐总指挥拍了一下溅落在身上的泥土，笑着说：“这个战斗打得满有味道哩，现在我们已经把敌人围住了。先要狠狠地打，给敌人以重大的杀伤后，再全部歼灭。”

这时，我军主力已经赶到。李先念政委和程世才命令：第 268 团把第 265 团替换下来，让他们休息，和其他几个团一起作预备队，准备决战。第 268 团一直坚守在阵地上，打得很出色。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着，十几里地的山沟里，成了一片火海。子弹象无数流星似地飞来飞去，交织成一道道火网。

第二天拂晓，敌人的两个旅分两路同时向黄猫垭和五观寨猛烈攻击，企图作最后一次挣扎——突围逃跑。这时，全线反击的时机已经成熟。在徐总指挥的同意下，程世才命令：“全线出击。”嘹亮的冲锋号声响彻了整个山谷，各团的战士象潮水一样直奔山谷冲去。一片喊杀之声，犹如山崩地裂。经过一阵激战，全部敌人被压在山谷里，敌军一看，漫山遍野都是红军战士，一个个吓得魂飞胆裂，面如土色，慌忙丢下武器，抱头鼠窜，前拥后挤，乱成一团，齐向对面的山坡奔逃。我第 268 团熊德成团长一声令下，山坡上我军 26 挺轻机枪、6 挺重机枪，对准敌群一齐开火。敌人的尸体盖满了山坡，血顺着山坡往下淌。一部敌人负隅顽抗，拒不交枪，全部被大刀砍倒。敌人的正、副旅长，也做了红 30 军的刀下之鬼。经过一天一夜的恶战，敌孙南甫的两个旅和其所属部队全部被歼，毙伤敌官兵 4000 余人，俘虏敌官兵 1 万余人。程世才所部共缴获迫击炮 20 余门，长短枪 7000 余支，电话机 80 余部，电台 7 部，子弹数十万发。

黄猫垭战斗结束后，程世才率领红 30 军继续向西挺进，到苍溪、阆中、南部三县的周围地区，追歼残敌，直逼嘉陵江岸。至此，四川军阀刘湘的六路围攻被彻底粉碎。

长征，肝胆相照骋义气

10 个月的反“六路围攻”，在靖江渡军事会议上得到了系统的总结。战争的间歇使程世才得以带着满身的硝烟回到了课堂。三天三夜，聆听徐向前亲自讲战术，在军事统帅身边切磋指挥艺术，对于这位锋线悍将而言显得格外宝贵。程世才作为第 30 军——第四方面军兵力最强的作战部队的指挥者，调动全部的记忆与智力，思索关于集中兵力、进攻突破、运动防御、迂回包围等战术问题。与之同时，第 30 军 1.5 万余人马全部投入了新的练兵热潮。而这一时期程世才及其第 30 军的全部收获在随后到来的一场渡江强攻战斗中得到了检验。

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的召开，将程世才的视野第一次拓展到了整个红军乃至整个中国革命。广昭战役之后，第四方面军总部接到中央电报，要求其集中全力西渡嘉陵江，策应红一方面军渡江北上。当程世才接到总部以第 30 军为渡江主力，于苍溪以南的塔子山附近实施重点突破的作战部署后，凭借优秀军人特有的直觉，他感到这一仗必将迎来四方面军的一次新的战略转移，就像当年他率先锋队突破汉水一样。为此，嘉陵江沿线的通盘战略全部

萦绕在了程世才的大脑中枢。

纵贯四川东部的一条大江——嘉陵江，正处在川陕苏区的西北部，它对苏区的发展和红军的军事行动造成很大的障碍。自从我军粉碎敌刘湘部进攻后，敌退守大江西岸，并在沿江构筑坚固的工事——由不同密度的碉堡和集群碉堡连接成一线。我军已在大江东岸同敌人对峙有数月之久。要通过这条险要的江河，不能像一般的河川战斗或者偷渡就能过去，而是要经过周密的准备和激烈的战斗。我军的技术条件很差，器材缺乏，船只早被敌人抢去，又无强大炮火，虽有少数工兵部队，要渡过这样的大江，仍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军有坚强的意志，旺盛的士气，有足够的准备时间和克服困难的办法，再加上利用夜间行动的便利条件，特别是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就补救了我军技术条件差、器材缺乏、炮火不强的弱点。程世才要在这次战役中，依靠“人和”，创造“天时”，寻找“地利”。

程世才下令由红30军第88师担任强渡，以该师第263团为强渡先头部队，其他两团进行渡江战斗训练和各项准备工作。

渡江能否成功，关键之一是渡江地点的选择。嘉陵江是长江上游的一条支流，宽800~1500米，水深且流速较大，两岸多大山，有些地方是陡岩、急坡。要渡过江去，必须寻找既为对方弱点，又利于我渡江、且登岸后便于扩大战果的地方。经过反复比较，程世才认为，主渡地点只能选在苍溪县东南20几里之石家坝一带。该地敌方江河弯曲，突向我方，我方两端江面突向敌方，形成钳形，我军炮火对敌威胁大，便于掩护渡江。而且江面宽，流速慢，适合河川战斗的要求。佯渡地点选在我方右翼约30里的老苍溪城方面，正对敌暴露之翼侧。这个任务可令红89师一部分兵力来担任。

我军渡江方向的守敌是刘汉雄师的一个旅，分布在新苍溪（老苍溪城在我方）沿江一线防守。在我渡江处约五六华里地段上有敌一个营另两连在江边防守，一个连力营预备队兼守纵深的几个碉堡；往后有敌团预备队约一个营；再往后十几里地的地方为敌旅预备队，兵力不到一个团。该敌是被我军打垮过几次的手下败军，对其作战特点有一些了解。战士们戏称他们是“运输大队”。虽是这样形容，但仍有相当的装备和一定的战斗力，以运动战同阵地战相比较，在某种程度来讲，敌人更善于阵地战，江防守备更占优势。

选择的渡江地点，虽然敌人兵力比其他方向稍雄厚些，但是权衡各方面条件，还是适宜的。程世才胸有成竹，带领部队开到离渡江地点30余里偏东北的东河一带，开始做渡江的各项准备工作。首先是计划造船的问题。经过连日调查研究，程世才估算着，如以一次渡过一营兵力，则一只船坐10个人，就需40只左右，再加上每排一只预备船，则需造50余只才够用。造船任务限在20天左右大部完成。在当地苏维埃政府的帮助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下，铁匠、木匠、漆工从四面八方秘密地集结在指定的隐蔽地点。几天之后，一排排战船奇迹般地出现在东河的水面。

除一小部分部队帮助造船外，大多数部队开始了紧张的渡江作战训练，做成了假碉堡、工事和障碍物进行演练。程世才严格要求部队一举一动都要从实战出发，每次操练后，都作扼要的讲评。船只大部分造成后，程世才又命令部队转到夜间乘船航渡演习。

根据夜间进行河川战斗的特点，程世才强调：部队行动要特别肃静，注意隐蔽火光；渡江时，一定要照平时训练的要求和编队顺序上下船只，任何情况下不能混乱；要沉着，在未靠岸前不管敌人叫口令、打电筒或是打枪，

不准还枪；在我军快靠岸时，如被敌发觉，则先以船上火力压制敌人，上岸即向敌发起冲击；如我上岸后敌才发觉，则火速集结部队形成优势兵力向敌进攻；先头部队上岸后，指定专人负责将所有船只即速返回，接运第二梯队渡江。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程世才的精心安排下，派出人员不分白天、夜间不间断地对敌进行观察，并从各先头营中挑选本地同志化装过江，收集情况。此外，还依靠地下党组织，在白军中的内线搞到了不少情报。然后将敌人兵力部署、工事构筑等情况，印成材料、绘成图纸供指挥员研究。程世才发扬军事民主，组织大家讨论，这对最后形成切实可行的战斗方案起了很大的作用。

全部准备工作，按照规定时间提前两三天就完成了。程世才又安排各级领导干部分头进行了周密的检查。没人能说清楚，究竟是谁教会了程世才如此精明的战斗准备。这一切都出于他对战争本身的悟性。程世才的悟性使这场迫在眉睫的战役带上了现代战争的色彩。从红30军成长起来的干部，无不钦佩他们的程军长，因为他是为数不多的那种能够将勇猛强悍与细致缜密完美统一于一身的人。

由于20多天的战斗训练，部队比较疲劳，正式行动前三天，程世才下令各部队进行休整。同时将战船抬运到距渡河地点几百米的小山沟内隐蔽好。

1935年3月15日夜，渡江行动的命令下达，开始渡江战斗。

午夜两点，一声“渡江！”令下，几十只战船破浪向前。渡江的勇士们一股劲地向前划行。哗哗的涛声淹没了船板和船桨击水的声音。程世才虎目圆睁盯着江中的英雄们，同时严密监视敌人的动静。当我军大部分船只已靠岸时，敌人才开枪阻击。但为时已晚。战士们迅速跳下船向敌人发起了冲击，很快就占领了敌人沿江六七个碉堡，歼灭了守敌，接着向敌纵深发展，又打下几座大碉堡，将敌一个营的防区大部占领，继而又将敌团防区大部占领。6时左右，我第二梯队全部过了江。我佯渡方向也开始向敌左侧发起进攻。当时程世才考虑到：我军是背水作战，没有一定的把握不能轻易出击。因此，命令以两个营的兵力在原地暂时防守，待反扑之敌遭重大杀伤和消耗之后再出击。果然，敌人拼命地向我军反扑，遭我大量杀伤后，即在原地同我对峙，等待援兵到来。程世才急调二梯队从左翼向敌进攻，经过两小时激战，反扑之敌大部被歼。程世才率队渡过嘉陵江，乘胜猛追残敌，一口气追了70多里。到下午3点多钟的时候，他们来到山丘下的一个小村落里。在村子的东面发现一个四合院，四周有许多电话线都通向这个院里。程世才断定这里可能是敌人的一个通讯联络点，当即命令一个排，包围了这个小院。敌人很快全部缴械，果然是敌人的一个通讯联络站，有一个中校负责。此人大约三十七八岁，中等个，白白胖胖，圆脸蛋，身穿灰色军装，脚上穿着黑光光的皮鞋。程世才问道：“你是什么人？在这里干什么？”

“我是不久前在庐山军官学校毕业的团长。在这里负责阆中、苍溪、剑阁及周围各部队的通讯联络工作。”

他神气十足，洋洋得意。很显然，他还不知道站在面前的就是红军。他还表示关切地说：“距这里十里远的西北方向，有我们的一个医院，由一个连在那里负责警卫。”说完，他抬起头来反问程世才：“你们是哪一部分？”胖团长一定是把程世才的队伍当成地方武装的伤兵连了。

“我们是红军。”

“红军！”胖团长略微紧张了一下，而后又很快地恢复了镇静，斜眼看着面前这位高个大汉。皮笑肉不笑地说：“老兄，别开玩笑啦！我们有这么多部队，又有滔滔嘉陵江天险，红军怎么会来这里呢？你们究竟是哪一部分的？快把枪还给我们吧！”

“你要老实交代，还有什么情况？红军宽大俘虏的政策你知道吗？”当这个家伙知道来者真是红军后，立刻吓得瘫软在地上，吞吞吐吐地交待了敌军的兵力部署。

程世才命令第268团团长熊德成和该团第1营营长林剑带领第1营迅速朝敌人的医院前进。由于那里的敌人毫无准备，当红军突然到来时，一个个在惊疑中哆哆嗦嗦地交枪投降了。医院里有八九百个敌人的伤员和数百名医护人员，还有二三百名敌军的官太太。通过宣传教育，动员争取了一批医护人员参加红军。部队在这里休息了一夜。翌日，程世才即令第30军迅速向剑阁方向进发。第30军成功突破天险嘉陵江。守敌刘汉雄一个旅被歼灭了。继而我第9军乘胜向阆中挺进；第31军向昭化挺进。不到一个月，歼敌万余人。先后攻占了剑阁、阆中、昭化、青川、平武、北川、梓潼等地。同年6月，第30军一部作为第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懋功地区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懋功会师的喜悦形成了鼓舞红军士气的巨大动力，给这座偏僻的山城带来了空前的欢腾。天性乐观的程世才哼起了刚刚学会的《红军两大主力会师歌》：

“万余里长征，经历八省险阻与山河，铁的意志，血的牺牲，换得伟大的会合。为着奠定中国革命巩固的基础，哎！为着奠定中国革命巩固的基础，高举红旗向前进……”

第一、四方面军会师在作战方面未能象鼓动士气那样马上显出优势。程世才深深感到，由于张国焘不断地坚持与中央相左的意见，已经使他们这批指挥员丧失了许多绝好的战机。例如在松潘，封锁红军北上之敌立足未稳，配属红一军作战的程世才就曾请缨速战，而得到的却是林彪的否定答复。对此，总指挥徐向前也显得无可奈何。等到敌人准备就绪后，又决定进攻松潘，但为时晚矣。接下来又是一段长时间的徘徊。程世才心急如焚。

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沙窝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部队终于开拔了。程世才率第30军第265团、264团为先遣兵团，经墨洼过草地出班佑、包座，为全军开道。与此同时，毛儿盖会议召开，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具体部署。毛泽东的战略方针将红军指向了东方，并变右路军为北进主力。程世才成为右路军乃至整个中国工农红军北上的先行官，面对于自己所肩负的这一重要历史使命，他在几天前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就意识到了。

那是在毛儿盖，毛泽东向徐向前提出，要见一见右路军主力部队第30军的领导干部。于是，在党中央驻地的一座喇嘛庙里，程世才得以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毛泽东。经徐向前介绍后，毛泽东与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煊一一握手。毛泽东向程世才详细询问了部队的情况，问部队掉队的人数，各连都有多少人，战士的情绪高不高，生活给养如何，休息了几天……所有能想到



的都问了。毛泽东一边问一边招呼大家席地坐下，因为庙里找不到桌椅，毛泽东便风趣地说：“我们与土地贴得越紧，这心里就越踏实啊！”他把地图在地上铺展开，讲述了他对战局的思考：“第一，红军向东还是向西，这是全局中的关键。向东，是积极的方针。否则，将被敌人迫使我向西，陷红军于不利的境地。第二，从洮河左岸或右岸前进，均可视情况而定。如有可能，采取包座至岷州的路线才是北上的最佳方案。占领西宁，目前是不智之举。第三，不能视左路军为战略预备队，作战战略预备队它赶不及，不能指望。他们要向右路靠拢。日后，在川陕甘建立革命根据地以迎接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那么整个形势对我们是有利的！目前我军北上，必先取包座！毛泽东讲到此处，兴奋地将手中的红铅笔一挥，映成寺庙中的一抹红光重重地落在了地图上的那座高原重镇——包座。

这是程世才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并接受了他亲自部署的任务。特别是他那和蔼可亲的态度，给程世才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这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里，毛泽东与广大红军战士同甘共苦，对革命形势了如指掌……这一切，都铭刻在这位年轻的红军将领的心里。毛泽东同程世才握手告别时端详着地说：“你这个军长很年轻啊！”当毛泽东发现这位年仅23岁的红军军长竟然拎着一长条长枪时就更为诧异了。徐向前上前自豪地解释道：“程世才同志作战勇猛，指挥靠前，总是冲在阵地最前沿，所以虽然当了军长，可步枪仍不离手。”听了这话毛泽东重又打量一番身形高大的程世才，微微点了点头，将他的手重重地握了一下。

离开毛泽东回到部队，程世才、李先念召集师团干部，布置了战斗任务。大家决心要遵照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坚决打好这一仗。全军指战员怀着最大决心和必胜的信心向包座进发。为争取先机之利，程世才率军快速猛进，两天走完三天的路程，进抵包座西北七八里的地方，并在当天下午，派一个团向包座守敌的外围据点攻击。包座守敌是胡宗南独立旅的一个团。团部位于大喇嘛庙内。这座庙紧靠着一座五六百米高的大山，庙前有一条小河，虽然只有两丈宽，但因为正值草地雨季，河水深而湍急，是一道天然屏障。敌人已派兵控制了山上的制高点，六七个外围据点建在山坡上的松林里，集群式的碉堡，构成一个防御区。外围据点的敌人从暗堡向我进攻的部队射击，我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代价。但战士们打得十分勇猛顽强，当天攻占了全部碉堡，歼灭了两个连的敌人。

入夜，侦察处根据已掌握的敌情和俘虏的口供，绘制了包座守敌和增援部队路线图，并将地图和俘虏中敌军的一个排长、两个班长送到军指挥部。程世才暗暗思量着，前来增援的敌第49师是一支生力军，过去打过硬仗，约1.2万人。而我们虽然是一个军，但因过雪山、草地减员很大，拨出一个师部和一个团编到第一方面军后，缩编成第88、89两个师。全军只有1.3万人。特别是在长征中，因缺乏粮食，没有油盐等副食品，战士们的体力已受到严重损害。要歼灭装备比我们好、数量几乎和我们相等的敌人，确实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仗打得好坏，正确的判断、周密的计划就更加重要。因此程世才抓紧时间挑灯夜战，一夜之间，调查完地形并制定了详细的作战方案。

翌日上午，第30军除用一个团的兵力继续围攻包座守敌外，将第88师和第89师的大部分兵力布置在敌人援军必经之路的西面山上，并派小部兵力控制了东山制高点。据俘虏供称，敌人增援部队将在这天下午到达，但敌人

没有按时来。又等了一夜零半天，敌人才沿着松潘通包座的道路浩浩荡荡而来。中午 12 时，战斗打响。为了全歼敌人，指挥部预定等敌主力进入我埋伏圈内后再出击。可是客观情况并不是那样顺利，敌人十分狡猾，企图先用一部分兵力搜索前进，与我接触后，先进行局部战斗，夺取有利地形后主力再前进。程世才看穿了敌人这一诡计，命令在山上的主力部队隐蔽好，仅以正面的一个团在一些次要的小山头上抗击，给敌人大量杀伤后就节节撤退，诱敌深入。骄傲的敌人象瞎子一样，摸不透我军情况，加之距离包座还只有十几里路，救援心切，就步步前进，正中程世才的欲擒故纵之计。

在节节抗击中，第 30 军不仅给了敌人造成不小的伤亡和消耗，而且摸到了对方的战斗力与作战特点：敌方战术动作和小集团（连、排）战斗打得比较灵活，并相当顽强。敌人的人力很强，每次冲锋时，除了有很多轻重机枪掩护外，还用迫击炮、小炮等武器轰击我前沿和纵深。距离火线只有二三里的我军指挥所附近，就曾不断遭到炮击。程世才迅速作出果断反应，命令第 30 军各部发动总攻击时，必须是多梯队的，队形疏散，而火力集中，打得狠，打得猛。

下午 3 时，敌主力进入我预定作战圈内。军指挥部在 5 点钟发出总攻命令和信号后，隐蔽在山上的第 30 军，一齐向敌人出击，枪、炮和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六七里长的战场，眨眼成了一片火海。我军虽居高临下，但敌人有纵深配备，并占据着许多小山头。尤其漫山遍野都是大松树和灌木丛，敌人隐蔽其中。我军冲到哪里，哪里的敌人就利用树林、山包或河坎作掩护进行顽抗。在这关键时刻，第 30 军展开了更猛烈的攻击，把敌人拦腰斩成了三段。程世才下令调集全军仅有的几门迫击炮放在第 88 师后面，用最后的几十发炮弹轰击敌人集群。战士们用手榴弹、刺刀和大片刀同敌人厮杀，前边的倒下了，后边的又冲上去，整个战线都展开了肉搏战。师、团掌握的所有预备队和机关以及军的通信连、警卫连、保卫排等都投入了战斗，军的机关干部、宣传队以及伙夫、马夫也都拿起枪来参战。师、团指挥员跟部队一起前进，靠前指挥。程世才起初用电话和通讯指挥，最后出击时干脆拎起步枪跟随部队进行实地指挥。

第 268 团切断了敌人第一段，打得最出色。左右两面的敌人向他们夹击，他们像一把钢刀一样横插在中间，连续打垮了敌人的数次反冲锋。程世才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后来我们经过这段已为我军最后攻占的阵地时，几乎每一步都会踏到烈士们洒下的鲜血。有一个烈士，一只胳膊打断了，另一只手里还紧紧握着大片刀。这种情景是多么令人感慨啊！他们在草地上吃的是野菜、树皮，为人民贡献出的是宝贵的生命和鲜血！”

战斗一直激烈地进行了七八个小时，程世才带领第 30 军终于把截成三段的敌人，一段段地啃掉了。敌人的师长武成仁受重伤后跳了河，一个团长和一个副团长当了俘虏。敌主力被歼，后勤部队企图逃跑，程世才急令一部兵力猛追，缴获了七八百条牦牛、马匹以及所驮的粮食和弹药。与此同时，围攻包座的我军也向喇嘛寺里的敌人发动了猛攻，守敌大部被歼。

包座之战的胜利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徐向前元帅在其《历史的回顾》中这样写道：包座战斗，我第 30 军立了大功，是役共毙伤敌师长伍成仁以下 4000 余人，俘敌 800 余人，缴长短枪 1500 余支，轻机枪 50 余挺，电台 1 部，粮食、牦牛、马匹甚多。我军指战员坚决完成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赋予的打开北上通道的任务，取得了全歼蒋介石嫡系部队胡宗南

一个师的重大战果，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

包座之战的胜利也使毛泽东的脑海中深深印下这位提着长枪的红 30 军军长。20 年后，当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为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而调兵遣将时，程世才成为他亲自圈定的五大军种之一的公安军的第一副司令员，司令员由公安部长罗瑞卿兼任，实际工作是由程世才主持的。这支担负特殊任务的部队，由这样一位特殊的战将来指挥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在右路军参加长征，令程世才与第一、第二方面军的将领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包座之战，第 30 军曾缴获了大批牛马物资。为此，朱德总司令专门请年轻的晚辈程世才吃了一顿炖小牛肉。在饭桌上，朱老总一边亲切地询问部队的情况，一边热情地招呼程世才多吃一点。当时，程世才也并不拘束，总司令让吃那也不必客气，只是看到朱老总手中拎着一把小锤不住地砸骨头吃，很觉过意不去。朱德却笑着说：“前面的先头部队缴获得多，而后面的部队就很少有战利品，还是要经济一些来得好！”年轻的程世才再也坐不住了，他腾地站起身道：“请总司令放心，我们第 30 军缴的牛羊都留给后面的部队。这样的事，只要首长打个电话，不怕我们不给。感谢总司令请吃牛肉！”这位青年将领的机敏与风趣，惹得朱德开怀大笑，连声说：“好！好！是条爽快的汉子！”

后来程世才从第 30 军专门抽出了一个连的兵力负责看管部队节省出的大批牛羊，并向后续部队发放。在与第二方面军会师时，就是第 30 军第 88 师政委郑维山给贺龙送去了一批牛羊。直到解放后，贺龙元帅陪同毛泽东主席视察部队大比武的成果，见到时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郑维山，还不忘提起当年第 30 军给第二方面军的那批可贵的牛羊补给。

其实，当时的兄弟部队中第一位找上门来求援的当属中央干部团团长陈赓。

那天正当程世才在军指挥所里写作战日志时，一个又黑又瘦的人，身上裹了一块烂羊皮，用绳子扎着，径自闯进了指挥所，一副小架眼镜片晃出一道白光，人还没站定，大嗓门却早已放了起来，“程世才——程世才！”

那副镜子，还有嗓门，使程世才不加思索地站起身来，啪地打了一个敬礼——“陈师长！”此人正是陈赓，当年他在第 4 军任第 12 师师长，程世才任连长。好开玩笑的陈赓赶忙啪地也敬了一个礼——“程军长！”两人相视，不禁大笑着把手握在了一起。陈赓开门见山地说：“世才啊！我现在可真不是什么师长了，我是干部团的团长，手下管的是老弱病妇，行军打仗不在行啊！”陈赓接过程世才递来的香烟，嗅了嗅，陶醉地点了点头问：“缴来的吧？”没等程世才回答，他又说道：“行军困难，没办法！打你这个大军长这儿借十几匹马怎么样？”听到这儿，程世才不禁又笑了起来。

当天下午，陈赓接到了第 30 军送来的 30 匹骡马和一批食品、药品及衣物。日后在延安，陈赓常与程世才在一起，与陈锡联、陈再道并称“延安四陈”（陕北话陈程不分）。解放后陈赓出访越南，回来还专门带了越南的特产送给程世才，说是还长征路上的人情债。

第四方面军几经曲折，终于在 1936 年 10 月进抵青江驿界石铺。在会宁，程世才没有想到，第一个来欢迎他们的又是第 1 师师长陈赓。重逢的喜悦被永远地记录在会宁这块红军长征胜利的纪念碑上。

西路，丰碑下忠魂永舞

一个西风萧瑟的秋夜，朗星点点，山坡上的灌木和野草，已经凋萎干枯，

残枝败叶被秋风吹得漫山飞舞，村落里的灯火熄灭了，狗吠的声音也早已消逝，只有浩莽的黄河，仍然以她那一泻千里的气势奔腾直下。两岸的山岩象一双黑沉沉的铁手，用力地掐住了河身，黄河愤怒地咆哮着，涌起排空的浊浪，巨雷般冲击着岩石，水花四面飞溅。这是1936年10月20日夜的甘肃靖远虎豹口，河边集结着整装待发的红军。他们要在这个深秋的夜里，冲破黄河天堑和敌人的封锁，渡河西进！

“西进，西进”，这个字眼一遍又一遍地被站在岸边的程世才重复着。面前是随着水波跳动的一排渡船，每条船由一个战士用绳子拉着，旁边集合着等待渡河的队伍。身后的山坡上，是排列好了的机关枪和迫击炮，射手们都紧紧盯着对岸，那里正闪烁着敌人手电筒的亮光，夜风不时地送来他们相互喊叫的声音。

以前，他指挥部队涉过了汉江，强渡过嘉陵江，这次是夜渡黄河。程世才只知道这必将是他指挥的又一次成功的强渡作战，他有这样的把握和决心。程世才的能征善战，特别是他打渡江作战在红军中已颇有声名，而且给第一方面军的高级领导层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刘邓大军中原挺进前夕，程世才接到邓小平派人送来的30块银洋，调他去任职，希望他能在黄河淮河强渡作战中发挥作用，但遗憾的是程世才未能到任。淮海战役之后，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时任南满军区司令员的程世才，要他任兵团司令，打渡江战役，打过长江去，但又无奈五大书记之一的高岗执意留他在东北整编30万军队，此意最终作罢。也许，程世才预感到他将不会再有渡江渡河作战的机会，因此把虎豹口黄河强渡视为自己的生命之中的一次最难得的机缘而倍加珍惜。

两个月以前，第四方面军已走出了草地，以后经过岷州，到达甘肃会宁县境驻扎。同时，第一方面军西征到了固原一带，第二方面军也正向固原靠拢。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并在会宁召开了会议。此后，按照中央提出的“建立河西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部署，部队经过简要动员，便士气高昂地顶秋风、踏落叶，浩浩荡荡地向黄河边上开来了。为了避免暴露我军的行动方向，部队在离黄河30里的地方驻扎，秘密地进行侦察，选择渡口，并在那些密密层层梨树林里造船，进行敌前登陆的军事训练。

此前，第30军按照预定计划，在靖远上游30里的地方渡河。但是船到中流遇上了一片浅滩，过不去。情况是严重的！程世才率第30军是一梯队，第9军、5军、总直属队是二梯队。“渡河的道路要由我们开辟，全军同志今晚都在看着我们。”必须重新侦察过河渡口。当报告侦察到虎豹口可以渡河，并将敌人河防部署情况基本上弄清楚时，程世才立即点齐第88师的团以上干部和前卫团第263团的连、排干部，换上便衣到河边勘察地形。一行人隐蔽在河岸上，看到滚滚的黄河从两山之间奔腾而来，对面光秃秃的山峦，重迭起伏。贴近河岸是一带平川，山上山下都是碉堡，敌匪马禄的骑兵旅就在这防守。

10时左右，部队到达渡口。对岸的马匪不时地放着冷枪，大概是在为自己壮胆。看到怀表指针指到了11点，程世才下达了命令：“渡河！”霎时之间，虎豹口两侧轻舟齐发。

“二十分钟以后，对岸传来枪声，我命令火力掩护，顿时枪声、炮声掩盖了黄河的涛声。先头部队投掷的手榴弹和掩护部队发射的迫击炮弹，在对岸团团爆炸，战斗的火光，由河岸转向了小山，先头部队向纵深发展了。直到这时，我才深深地舒了一口气。”——程世才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程世才从渡口回到指挥部，警卫员送来两碗羊肉面条汤，这时他才想起已经一天一夜没吃一点东西了。忽然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接着是飞机扫射声。参谋跑来报告有数架敌机在渡口上空轰炸。程世才忙跑出去一看，还好，因为早已做过防空布置，损失不大。敌机一跑，部队继续渡河。

每渡过一条河流，都要开辟一片崭新的领域，开始出现新的转机。涉汉江，离开了鄂豫皖，却开创了川陕根据地；渡嘉陵江，放弃了川陕苏区，却得以与中央红军、第二方面军汇合北上抗日。此次渡河西征战略意义重大，对此程世才深信不疑。

第30军渡河胜利，朱德、张国焘为此向中央军委特发了捷报，电文如下：

“中央军委：

我三十军于昨晚在靖远上游十五里之虎豹口渡河成

功，河左岸碉堡已被我占领。二六三团今早四时已渡完。

二六五团跟渡，九时五团可渡完。

朱、张”

全军人马都渡过了黄河。红30军仍是前卫军，在程世才的率领下，第30军始终是冲锋在前的主力军，此时它又象一把利剑，刺向敌人心腹，乘胜猛追。第89师在宋家川，以3小时的战斗，击退了马禄骑兵旅的阻拦，俘敌200余，缴获了800多支步枪、10余挺机枪、70多匹战马。第三、四两天，敌人退却，我军一直追到景泰和一条山一带。第30军担任前卫军的任务，向西北警戒马步青部，向东北警戒宁夏马鸿逵部；第9军和第5军作为前卫军的预备队，对兰州方向警戒胡宗南，对西南方向警戒马步芳可能从青海方向来的援兵。第7天，程世才亲自率领第88师两个团，在宁夏中卫县五福寺，两小时就击退了马鸿逵的骑兵团。

第88师两个团占领五福寺的第二天，忽然接到总部电报，命令渡河部队大量收集船只，准备回陕北去。当时程世才并不知道上级为什么突然放弃进军宁夏的战略计划。事后得知，宁夏敌人兵力雄厚，敌人派了好几个师控制着定远营，恐怕打不进去，上级才改变了主意。其实，这只是“飘乎不定”的作战指令的开始。回河东、去陕北是他们衷心盼望的，所以部队接到电报后十分兴奋，经过一天的努力，收罗了大船7只、小船10余只，将对岸情况也作了些调查。

不料第三天上级又来电报说，船只不要了，并命令程世才带领部队立即西返一条山。这时马步青、马步芳的主力已增援上来，三个旅的兵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正向一条山猛扑。守卫在一条山的第89师两个团、第88师一个团，在熊厚发、邵烈坤两位师长共同指挥下英勇地和敌人进行着争夺战。

当时战斗是空前激烈的，军政治部和宣传队在一条山南面的一个小围子里也陷入了重围。他们只有一个政保排的战斗部队，其余的全是干部和勤杂人员，可是包围着他们的起码有1500名骑兵。政治部主任李天焕所属虽只有90支短枪进行机动，但整整坚守了一天，直至程世才派去援兵解围。

渡河以来，第30军虽然节节胜利，程世才却开始整夜整夜地睡不好觉，他被前所未有的问题困扰着：北进宁夏的计划既已放弃，那为什么东进陕北与中央会合的计划又撤销了呢？“五马”主力13个旅在我们周围，胡宗南的一个补充旅随时都可到，我军面对着占压倒优势的敌人，在这片地瘠民困、没有群众基础的狭小地区，能够长久地呆下去吗？部队暂时还有饭吃，但未来怎么办呢？天气已经冷了，全军还穿着过草地时发的一身单衣，冬装哪里

来呢？……

正当程世才对这些问题百思不解的时候，党中央和军委于1936年11月8日发来了《作战新计划》，其中第11款为“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随后，河西部队改称西路军，并成立了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部队在“打通国际路线”、“配合一方面军夺取宁夏”的口号鼓舞下英勇进击，展开了第一次西进新疆之战。

程世才奉命率第30军向西疾进。先围凉州，围而不打，成功地稳住马步青部；随即占四十里铺并以一部西进，于11月18日克永昌，21日克山丹。随后，徐向前令第5军跟进，至山丹接防第30军，并令程世才带第30军集结于永昌至凉州西北四十里铺一线休整待命。

但此刻的休整却是出于意料的短暂。第9军在河西走廊要冲古浪遭马匪5个旅和4个团的围攻，损兵达三分之一，牺牲了一批优秀的指挥员，元气大伤，此后也再没有得到补充和恢复。整个西路军的作战任务几乎全部地落在了第30军将士的肩头。

1936年11月19日，一个令西路军将领终生难忘的日子——中央军委电令停止西进，在永昌、凉州一带建立根据地。山丹、永昌、凉州一线，地处河西走廊蜂腰部，北临腾格里大漠，南靠祁连山脉，在此无给养补充、无群众基础而有利于敌骑兵作战的地区驻守，很快使西路军陷入了有耗而无补的苦战境地。徐向前、陈昌浩11月24日致中央电云，“九军任掩护阻敌，此次激战古浪，敌几面破城而入，人人血战，终将敌击退。三十军连续作战。五军更弱，始终不能以优势兵力击敌。现九军在永昌因受大损失待休整。三十军主力在四十里铺，子弹、炸弹耗尽，都用大刀拼杀。”“三十军在四十里铺激战三日，伤亡五百余，昨晚以二六五团夜袭骚敌，获马百余。敌今三个团犯三十军，全日主力被敌杀进两层，终用刀杀退，敌死未运者三百余，其一团团打打死未抬走。”11月25日致中央电云，“世才率二六九团、骑师及五军全部今集在山丹，正寻机各个消灭马彪、马朴及韩旅等敌。”“三十军前进四十里铺，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日的三次战斗共伤亡约两千。”连续不断的艰苦鏖战与滞后的战略指导，令高级指挥员们深感不安。李先念找到陈昌浩讲：在这里东不东，西不西，等着挨打怎么行？要东去，我打先锋。要西去，我也打先锋。程世才则在其作战日志中写道：我仿佛是第一次感到这个地区是如此狭小。这里决非长久立足之地。而敌人抓住我军兵力不足和分散的弱点，死死地缠住不放。严重的问题摆在我军面前。”

西进，西进，一个在大西北12月零下30度的隆冬里的理想，依然旗帜般地高高飘扬。

沿着大路，踏着起伏的黄土高原，踏着石滩，红军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前进。第5军为前卫军，第9军和总直属队为本队，第30军作后卫军以钳制马家军追击。

第5军猛攻高台、抚彝，守敌向西退去，除部分兵力追击外，主力就驻扎在高台城；第9军以一部分兵力相机袭入甘州未果，又转过黑河在沙河停止；第30军随后跟进，也过黑河，在倪家营子一带停止。从高台到倪家营子约有100多里，为了打击敌人，部队分散地配置开，恰恰又像一条长蛇阵与马步芳、马步青主力展开了正面对峙。

不久，高台失利，第5军军长董振堂阵亡。敌人组织了5个骑兵旅、3

个步兵旅、宪兵团、手枪团和数千民团武装向倪家营子进攻。程世才调兵遣将严阵以待。

倪家营子像一个长方形的军棋棋盘，南北长 16 里，东西宽 3 里，有四、五十个大小不一的黄土围子，稀稀落落地点缀其中。倪家营子南面高北面低，人们习惯地把南半部叫上营子，北半部叫下营子。西路军占据着下营子的全部和上营子北边的两三个屯庄。第 30 军在西南方向，第 9 军在东北方向，两军阵地相接，共 10 个团的主力，每团 800 人左右。另有总直属队和第 5 军剩下的小部分人，住在下营子中部坚固的土围子内。

马匪以两个旅的兵力发动了一次进攻，主要方向是第 30 军第 88 师阵地，特别是第 263 团固守的王家屯庄。因为这个围子突出在我军前沿阵地之外，能够从正面和左、右两侧狙击敌人，是一个很好的支撑点，敌人视之为眼中钉。他们利用炮轰和步兵轮番进攻，而我军则采用近战。当敌人进到离我阵地二三十米的时候，战士们像猛虎捕食似地跳出工事来，挥舞着战刀，杀得马匪鬼哭狼嚎，抛下满地尸体，狼狈逃去。

与马匪苦战了一个多月，毙伤敌人万余名，我军也伤亡了数千人。

不日接到中央命令，部队调头东返，士气重又高涨起来。第 30 军在西洞堡反击的追敌，全是青海的撒拉族宪兵。敌人穿着黑色的羊皮袄，也有穿光板皮袄的，每人一支短枪或一杆长枪、一把大刀。他们凭借良好的装备和健壮的体力拼命顽抗。经过一番激战，战斗胜利地结束了。800 多个敌人作了异乡的冤鬼；800 多支马枪、400 多支短枪和许多战马、子弹成了第 30 军的战利品。

一次战术上的胜利却远远未能扫除程世才心头的疑云，他正焦急地等待着出发的命令。为什么不趁胜利的机会，迅速甩开敌人？正当程世才思考这一问题时，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召开了扩大会议，程世才参加了这次会议。陈昌浩在会上讲道：“马匪主力装备好，战斗力强，被我们敲掉了，这一仗打得好，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说，目前敌我力量已经起了变化，敌人的锐气被挫伤了。西进对我有利，我们要重回倪家营子去，占领甘北。我们要……。”

程世才禁不住打了一个冷颤，这些话简直如迎头泼来的一瓢冷水。

马好像离弦之箭冲出了村外，程世才又往坐骑上紧打了几鞭。转瞬间跑出三四里地，马跑得浑身是汗，满嘴白沫地喘息着，慢了下来。程世才就由它信步走着，望望空旷的田野，这位以刚勇和机敏著称的战将此刻也感到失去了鲜明的思路。回想几个月来发生的一些事情，脑子乱得像马鬃，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来。

全军回师西进。第 9 军为前卫，总直属队随后跟进；第 30 军在后卫掩护，并箝制追敌。

前卫军和总直属队出发后的第二天拂晓前，第 30 军军部忽然接到了一份电报：

“程军长：

李政委：

总直已抵甘浚保一带，请速率部西进。

总指挥徐向前

政治委员陈昌浩

×月×日”程世才和李先念、李天焕传看了电报，第30军的三位最高领导都很奇怪，行动前任务和行进的序列、时间都已分配好了，现在既无变动为什么又无缘无故地打电报呢？一般联系吗？似无必要。然而，电报是用密码拍来的，也不容轻易置疑。电文从军长手里传到政委手里，从政委手里传到主任手里，又传给军长。循环了一圈。程世才怀疑地说：“通常总部来电，直呼名姓，从来不加职衔，这次为什么例外啦？”

李先念把电文接过去，端详了半晌，指着下款：“这里也不对头！我们打电报不都是以代字表明日期吗？这儿却是直写的。”

“电文的语气，也与以往不一样！”李天焕两眼注视着电报摇了摇头。

“必须查明情况！”李先念派出一队骑兵出发侦察。据报，前卫军和总直属队遭敌人围攻了一天，伤亡很大，损失电台一部。军指断定电报是敌人的阴谋。因此，当夜按兵不动，第二天出发，第三天到达倪家营子，与第9军和总直属队会合了。程世才到总部一了解，那份电报果然是假的。

返回倪家营子，程世才发现这里已是一座人烟灭绝了的空营子，原来就地安置的伤员也惨遭当地大地主、匪民团团团长李成英屠杀。不久，敌人重围上来，梯队重迭，步步推进。

一日，敌人3个旅的兵力，集中攻击我88师阵地，前面的敌人被我击退，后面的又蜂拥上来，最后有一个旅的敌人终于冲进了下营子。

程世才正在军部，忽听外面一阵大乱，有枪声、叫声，也有人们奔跑的脚步声。警卫员跑来用低沉的声音说：

“军长，敌人攻到军部住的庄子来了！”

“沉住气，跟我来！”

程世才拿起快慢机，压上一梭子弹，直奔大门外。刚一出门，就见五六个匪兵沿着墙根迎面跑来，为首的一个只离他几步远，头戴大羊皮帽，一身黑制服，提一口鬼头刀，后边的几个都端着枪，刺刀明晃晃的，个个凶神恶煞。见此情景，程世才心头立时燃起复仇的烈火，仿佛回到了鄂豫皖当新兵的时代，他举枪迎敌奔向前去。这时，一个大胡子敌人也举起刀来，穷凶极恶的目光直直地逼视着程世才。忽然从侧后飞来一发子弹，大胡子翻身栽倒，原来是警卫员先开了一枪。与此同时，又上来一个端刺刀的敌人，直对程世才胸膛刺来，一个战士伸手一把将刺刀攥住，又有几个战士上来用枪托敲碎了这个敌人的脑袋。程世才没看清救他的战士是谁，只见他两手被刀刃割的血淋淋的，拣起敌人丢在地上的武器又冲上去了。

程世才组织3个团的兵力扼制了敌人的进攻，但敌人在新占领的土围子里，用炮火射击下营子中心地区，对我军威胁很大。

次日，又展开了空前的恶战，部队面临被分割、被消灭的危险。下午，在刘家屯庄西路军总指挥部，一间低矮的北屋里。徐向前伏在桌子上看地图，因为室内光线不好，他的鼻子几乎挨到了桌面。陈昌浩也坐在桌旁。像往常一样，他们安详、镇定地工作着，激烈的枪声和不断爆炸的炮弹对他们没有丝毫影响。程世才喊了一声报告，等待首长下达命令。

徐总指挥慢慢地抬起头来，放下红蓝铅笔，理一理腰间又细又紧的小皮带，没有马上讲话，一双炯炯放光的眼睛凝视着手下这员爱将。程世才知道，在这严峻的目光里含着多少珍贵的语言啊！在一度沉默之后，徐总指挥扬起微微下垂的眉毛，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命令：

“敌是优势，我是劣势，如果今天不把敌人打退，就有被消灭的危险。”



世才同志，我派你率领部队立即出击！第9军的一个团附属你指挥。”

这是命令，每一个字都像一根针似的钉进这位最后的主力军军长的心里。离开总指挥部后，程世才沿着一条被雨水冲成的自然沟渠急速奔向前沿阵地。敌人的子弹从他头顶嗖嗖地飞过。

下营子的敌人又排山倒海地扑来了，红军用来隐蔽的断垣残壁只有二三尺高了，土块被枪弹打得四处飞溅。战士们不动，也不开枪，因为每人手里的子弹顶多也不过三两排了，只有当敌人“呜呀呀”地喊着冲上来，离前沿只有三二十米的时候，红军的手榴弹才像冰雹似的一齐扔过去。程世才身旁有一个机枪射手，他看见敌人冲上来，也不隐蔽，扬起半截身子转动着枪口猛烈扫射。把敌人打退下去以后，他用袖子抹一下脸上的汗滴，一歪身子就睡着了。连续的恶战，战士们疲劳到了极点，但他们仍然保持着高昂的斗志。身在他们中间，程世才从未感到自己是一位军长，而是同仇敌忾的袍泽兄弟。这就是第30军，程世才所率领战斗的英勇团队。

二战倪家营子，血战九个昼夜，弹尽粮绝，没有轮换使用的兵力，战士们昼夜不眠，不添油的灯终会灭掉，再顽强的生命力，得不到养息，也不能永远支持。西路军面临的情况已严重到了极点。

寒风，昼夜在怒吼着，到非突围不可的时候了。

从倪家营子突围出来，却仍未摆脱马匪的追兵，西路军于南柳沟、西柳沟又陷入激战。1937年3月10日，徐向前、陈昌浩致中央军委的电文中说：“军委：昨晚敌以几个团兵力，抢占我南、西柳沟野外中央地带，我集兵出攻，激战一夜未得出，因火力太弱，伤亡大，出击不易。敌占野外沙滩，层层筑工事，已将三十军、九军联系截断。现已无粮，仍战中。附近地区均无粮缺水，转移不易，只有坚决死战。三百米内亦用电台联系，请白天与我们通报。徐、陈”当天午夜12时，程世才率第268团和第263团一个营撕破重围，与李先念率领的第265团会合。

经过连续恶战，部队伤亡极大，消耗过半，虽然还保有两个军的番号，但实际上每个团不过只余二三百人，而且很多是带伤作战，尤其第9军，兵员更少。整个西路军面临着生死关头。西路军总部决定星夜突围，由梨园口进入祁连山。梨园口一仗，第9军几乎全军覆没。西路军遂连夜向深山转移，目的地是80里外的康隆寺。战斗始终在短兵相接的状态下胶着着，石窝一场激战，马匪的马队曾冲到了距程世才只有20来米的地方高喊：“交枪！交枪！”马匪骑旅的军马均依颜色划拨，一旅黄马，一旅灰马，一旅青马，一旅杂色马，冲上来漫山遍野。当程世才赶赴第265团的时候，全团只剩下不到200人。在他旁边的一挺轻机枪，只剩下一个射手，一个负了伤的战士躺着给他压子弹。这个轻易不肯开火的战士，可以说是弹无虚发，他的机枪一响，立即可以看到山坡上有匪徒落马。一支黄马队又向着这个火力点冲来了，敌人的机枪也交叉着向这里射击。这个年轻的射手，换了一个梭子，从照门里紧紧盯着敌人。敌人越冲越近，突然一颗子弹打中了射手的前胸。不容迟疑，程世才立即抓起机枪便向敌人猛扫，滚烫的机枪在抖动着，他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复仇！复仇！”警卫员把一梭又一梭的子弹递了过来。要知道，程军长也是出名的神枪手，匪徒们随着枪声从马上跌落下来，横七竖八地躺在山坡上，剩下的像一群没头苍蝇似地溃退了下去。在零下三四十度的祁连山上，程世才打得浑身是汗。当枪声停下来时，他才看到那个年轻的射手，不知什么时候已爬到自己的身旁，用一只拳头支着淌满鲜血的下巴目不

转睛地望着敌人。他吃力地向程世才转过头来，似乎在辨认着这个接过机枪的神射手。忽然他两眼放出了兴奋的光彩，嘴唇抖动着想说点什么，但他只低低地叫了一声“军长”，嘴角凝住了最后的一丝微笑。这永恒的微笑终生铭刻在程世才的心碑中。

1937年3月13日下午，西路军集结在石窝山头。陈昌浩召集全体师以上干部宣布下一步的行动计划。那些在战场上都顽强得像钢铁一般的汉子，这时眼圈都慢慢红了，眼泪扑簌簌地落下来，陈昌浩也满眼泪花。但程世才的心中仍无法接受这一支红军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惨败！

会议开始，陈昌浩抹了一下眼泪，宣布了下一步行动计划：“第一，我们战不过敌人，只有分散活动，保存现有的力量，待刘伯承同志率领的援西军过黄河以后，再去会合；第二，部队剩下的人不多了，他和徐向前总指挥离开部队，回陕北党中央；第三，将第30军剩下的千把人编为左支队，由李先念、程世才和李天焕带到左翼大山打游击。第9军剩下的300多步兵和100骑兵编为右支队，由王树声、朱良才带到右翼大山打游击。总直属队剩下的十几个干部与第30军一块行动。”

对于这三个问题，大家都同意。最后徐向前发言表示不离开部队，他说：“我们不能在部队处境最困难的时候离开，我要跟部队一起走，大家死死在一起，活活在一起，将来听候中央的决定。”徐向前说这些话的时候，程世才心酸地低下了头。总指挥临危不惧的精神，深深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一个指挥员不离开部队是对的，指挥员应该始终和部队在一起，但是已经失败到了这种地步，陈、徐离开部队会减小目标，因此大家都同意徐向前离队。最后，陈昌浩作了结论：按计划行动。

三月的祁连山格外寒冷，高耸入云的山峰披冰戴雪。程世才率领的左支队1000多人绝处逢生，在这里发现了一线生机。敌人暂时被甩脱了，而恶劣的地形与气候却又向这支虚弱得已达极限的部队施虐。

身负重伤的第88师师长熊厚发动脉被打断，伤口化脓。因为山高坡陡，骑不了马，又无力步行，不能继续前进了。程世才命令部队原地休息，同李先念、李天焕前去探望麾下这员爱将。

“我要是再走，就得死在路上……个人死了没有什么，给部队增加多少累赘……首长，部队要赶快前进……把我放在这里吧！”熊厚发停顿几次才说完了这句话。听到耳里，心如刀绞，程世才他们四个人都抱头痛哭，过去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怎么忍心把他扔下呢！最后由于熊厚发同志一再地说：“在这里太危险，部队要赶快走！”为全军的利益，大家只好擦着眼泪，让熊厚发驻在附近的一个突出的石崖底下，给他留下了一些药品，并留下一个排掩护他打游击。就要分手了，李先念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讲，熊厚发拉住程世才的臂膀抬起头，眼睛里放射着坚毅的光彩：“给我留下一封介绍信吧！有了它，将来回到陕甘宁，我还是个共产党员！我好继续为党工作……请党放心吧，就是我死了，这是为革命，毫不惋惜！”

程世才在祁连山转战中，忽然有一天感到晕旋和心痛，他把当时的症状记在了日记中，直到后来他才明白，那天正是熊厚发在青海牺牲的日子。熊厚发脱离大部队后遭遇马匪搜山，全排同志战斗到最后，全部壮烈牺牲，熊厚发被俘。马匪恨透了红88师，所以把他押到青海，最后残忍地用钢炮将他活活轰死。临刑前熊厚发还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唱着：“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山，一步比一步险峻，高入云霄的山峰披着冰雪的铠甲，寒气逼人。程世才带领部队沉默地行军，驮着伤员的战马也一声不响，仿佛都在想自己的心事——自入山以来，经常整营整连地陷入饥荒，战马一度成为食物的唯一来源。耳中所能听到的是脚下的积雪被踩得咔嚓咔嚓的声音，还有间或传来的一、二声伤员的呻吟，程世才本能地抵抗着这种沉闷，他带的队伍应该始终斗志昂扬。

一个阴云密布的下午，程世才下令部队在一道背风的峡谷停驻，鼓动起各个连队的文娱积极分子，指挥大家唱起了革命歌曲，有的唱《国际歌》，有的唱《打骑兵歌》，有的也唱着工委书记李卓然同志新编的那支《巍巍峨峨祁连山》战歌……山谷里歌声雄壮，此起彼伏。这歌声使人们想起往事，想到全国的革命斗争，血液都在跟着发热，部队恢复了以往的生机。李先念、李天焕和程世才带领战士们分头出动，准备当天的晚餐，有的到山上打野羊，有的拿着破毯子去拣牛马粪；有些干部便和原地休息的战士们谈天，鼓舞大家的革命意志。和程世才一起拣牛粪的有一个四川战士，虽然不过二十来岁，但嘴上已长了一圈毛茸茸的胡子，他忽然问道：“军长，我们到哪一带打游击？打多久啊？还要走几天？”这真是一串难以答复的问题。虽然几天前，左支队的领导人统一了意见，决定向西打游击，程世才、李卓然、李先念、曾传六、郭天民、李天焕、黄火青等还共同批驳了西路军参谋长李特的右倾逃跑主义思想，然而向西打，打到哪里去，大家是不明确的。现在部队真是像一只茫茫夜海里的航船，只知道前进，却没有灯塔的指引。程世才沉吟了片刻，没有给那个战士以正面的答复。

第二天到达祁连山的分水岭，赶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晴朗天气，东方升起玫瑰色的朝霞，雪山反射出耀眼的光芒，程世才再次直觉地感到雪山在向他昭示着什么。部队随着清脆的哨声起床，一天的行军又要开始了。这时，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遍了全军：我们仅有的一部电台和党中央联系上了，并且得到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程世才同几个负责同志，拿着机要处长抄来的电报，反复传阅。直至几十年后，程世才尚可以一字不差地背诵电文原文。中央指示左支队，要团结一致，保存力量，并询问他们是否考虑去新疆，中央将派陈云和滕代远去迎接。经过工委讨论，一致决定去新疆，并马上电复中央。

得到了中央的指示，全军同志立即精神倍增，任何的艰难困苦都忘记了。部队唱着歌，举起已经被战火燃烧得残缺不全的红旗，怀着无限的希望向西挺进。

程世才把马让给伤员骑着，自己与战士们一同步行。他看到昨天傍晚一起拣牛粪的那个四川战士，顶着满帽子的雪花，背了两支步枪，大踏步地走在前头。程世才紧走了几步追上他说：“现在你知道往哪里去了吧！”

“知道了！”他以坚定的语气说着，露出一口整齐的黑牙，一笑，就又大步流星地向前走去。

在冰天雪地，渺无人烟的祁连山中，整整跋涉43天，翻过无数座大小起伏的山峦，徒涉寒彻骨髓的疏勒河激流，终于从安西走出山口，到达甘西平川。程世才下令清点一下人数，全军还有903人。他面对这个仅有三位的数字，心情是万分复杂的。西路军从渡河前的2万余人削弱到走出祁连山时的不足千人，巨大的反差本身就形成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但无论如何，左支队——西路军完整意义上的部队，终于走出了祁连山

险境，至山脉西端的古包城休整。此地距河西名城安西不远，那里曾留下了霍去病、张骞通向西域的征尘，也曾留下唐玄奘西天取经的足迹。千余年后，这块神奇的土地又迎来了一支前无古人的义勇之军。就在这里，第30军军长程世才同万佛峡住持道人郭元亨结下了一段不解之缘。

1937年4月，贫苦出身的道士郭元亨在蘑菇台子绿洲接待了“要为穷人打天下”的红军，也许是红军理想与宗教信仰的神合。郭老道倾其数年的积蓄，为精疲力竭的左支队捐赠了小麦二石四斗、面粉200多斤、黄米6斗、胡麻油30斤、粗盐4口袋、羊30只、骡子1头、马1匹。危难中的红军感激这位方外之士对刀兵武夫的支援。这位道士的形象成为程世才心中的又一尊凝重的雕像——他是个山西汉子，却有着大西北人的瘦劲与刚强，皮肤深深的褶皱里，蕴藏着一种执着与不屈。当天夜里，程世才命令千名红军露宿山下，不得进入佛窟净地半步。临行时，程世才留下了一张收条，请郭老道妥存到革命胜利后兑现。但程世才没有想到，为了这张收条，郭老道遭受马匪军的残酷折磨甚至被阉割，而他当初保存收条不过是珍惜同共产党人的这么一段缘份。为了这段缘份，程世才又于25年后与郭老道进行了一次郑重的笔谈。

“郭元亨先生：

您61年10月3日由胡链代笔给我的信收阅。谢谢您在20多年前红军路过万佛峡那种困难情况下对革命的帮助。

信中谈到解放后生活有了提高，而你被选为省人大代表和省政协委员，能为人民做些事情那很好。

1937年4月间红军路过万佛峡关于您帮助粮食和牲畜问题确属事实，我也写信给了安西县，特告。

最后，今后如有机会到西北去，一定前往拜访。

祝

身体健康

程世才

1961年12月8日”

“安西县人民委员会：

我们接到贵县祁连公社万佛峡道士郭元亨老先生给我部副司令员程世才同志的一封信，要求证明红军路过该地时，他曾赠送粮食、牲畜等物。经程世才同志回忆，确有此事。在革命艰苦的岁月里，郭元亨老先生帮助了红军，实为可贵。除程世才同志直接给郭老先生复信外，特致函你们。作为证明。

此致

敬礼

装甲兵政治部（印）

1961年12月9日”

这件事无疑给程世才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实际上，戎马生涯中的每一件事都深深地埋藏在他的心中，这并不完全因为他有惊人的记忆力，而是由于烽火年代本身的惊心动魄。

辽阔的大戈壁象一望无际的海洋，起伏的沙丘仿佛是汹涌的波涛。灰褐

色的沙丘上，长着一丛丛的干枯了的红荆和沙柳，空气中弥漫着干燥的尘土。程世才在其回忆录中毫不掩饰地称此时的左支队为“溃不成军的队伍”——拖着沉重的脚步，踩着没到脚踝的沙子，一步一晃地向西行走。

白天过去，又是寒冷的黑夜，程世才在作战日志中说，戈壁滩上的黑夜，比祁连山中还冷，这时不仅没有水喝，没有饭吃，而且还不能休息，谁要是躺下来，就会永远也爬不起来了。左支队不分昼夜的走着，虽然步履一步比一步艰难，但是谁也没停下脚步。程世才当时并不知道中央对西路军采取的援救行动，几经转折，终于通过同新疆军阀盛世才建立的统一战线而得到了实现。

1935年4月下旬，西路军左支队抵达星星峡，彻底摆脱了危险。“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程世才带领最后坚持到新疆的近千人同当地的新疆驻军一块开会，庆祝这个全世界劳动人民共同的节日。就在这天，迪化（今乌鲁木齐）方面的三架飞机，送来了供应品。接着，又开来了几十辆汽车为部队补给了枪枝弹药。程世才他们兴高采烈地围上去迎接。从前面的一辆车里走出了党中央代表陈云和滕代远。“大家一齐向他们伸出手去，并且都像小孩子一样地跳跃欢呼，群山环抱着整个星星峡，沸腾着，欢乐着。”程世才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当大家握着党中央代表的手时，这些历尽了艰难和风险的同志们，又压抑不住万种情肠和内心的激动，一个个热泪夺眶而出。”

在众人欢腾的时刻，程世才再次思考起那个关于生命的主题。九死而一生，历经千辛万苦，走出祁连山，进入新疆，左支队是唯一的、最后一支没有打垮的西路军。为着生命中所流淌的那2万多名西路军战士的热血，只有顽强地生存下去，革命到底。为告慰同袍同泽的在天英灵，这位大无畏的共产主义战士迈向新的战场，搏击在湍急的历史洪流中，他依然是劈波斩浪的钢锋利刃。

## 游击队员出身的红军师政委廖汉生

李迎选

廖汉生(1911~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11年出生于湖南省桑植县,土家族。1927年参加农民运动,1928年参加工农武装斗争,1929年参加县农民协会和县苏维埃工作,长期在湘鄂边苏区进行游击斗争。1933年调任红3军书记,同年入党,后任军政治部秘书、师党委书记、师政委、军团组织部长等职,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期间,历任团政委、旅副政委、代旅长,1941年后入延安八路军军政学院和中央党校学习,参加了延安整风,任党校第二部、第四部组织教育科科长。1944年10月任八路军南下支队第5干部大队政委,率队赴湖北洪湖地区,任新四军第5师襄南军分区政委兼地委书记。抗战胜利后任江汉军区副政委、政委。解放战争期间,历任晋北野战军副政委、晋绥军区第1纵队政委、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副政委、西北野战军第1纵队政委、第1军政委,率部参加保卫延安、转战陕北、解放大西北等一系列战役。1949年9月率部解放青海,任省军政委员会主任、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军区政委。1952年任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1954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入军事科学院战役系学习,毕业后任该院院长。1960年任北京军区政委,“文革”中受迫害。1973年后任军事科学院政委、南京军区政委、沈阳军区政委。1983~1993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他是中共“七大”代表,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一、三、四、五、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 \* \* \* \*

每一个辉煌的人生旅程都有过最初的起点。

每一个功勋卓著的将军都有过士兵的经历。

每当廖汉生将军回到他出生和参加革命的地方,他总要久久伫立在贺龙元帅的故居前,充满深情地感叹:

“贺龙元帅是我的同乡和长辈,是我的革命引路人和入党介绍人。我从小在贺龙元帅的关怀、照顾下成长起来,在他的影响、带领下参加革命,在他的培养、教导下从一个游击队员成为红军的师政治委员。总之,没有贺龙就没有我廖汉生!”

少年心中的偶像

1911年秋,辛亥革命爆发之际,廖汉生出生在湖南省桑植县一个土家族农民的家庭。他的家与名震湘西的“活龙”——贺龙的家只隔一座山,由他家到桑植县城去,必从洪家关贺龙门前过。桑植百姓口头流传的许多关于贺龙的传奇故事伴着他成长:

幼年贺龙习武练拳,胆量过人;

少年贺龙赶骡子运盐,往返在湘鄂川黔四省交界的崇山峻岭中,是个远近闻名的小“骡子客”;

青年贺龙参加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反袁护国,刀劈芭茅溪盐局,拉起一支民军;

敢为穷苦人打天下的贺龙,很早就成为廖汉生幼小的心灵中崇拜的偶像。

有一次,贺龙的队伍从廖汉生家附近的平坝子经过,他和另一个小孩子跑到路边田埂上看“过兵”。只见一支队伍走过来,队中一个士兵身后背着几支像古戏里的令箭似的牌子,廖汉生告诉小伙伴:这个牌子叫做“大令”,它到了哪里就代表长官到了哪里,查岗查哨,巡视军情,纠察军纪,下级见了都要向它敬礼呢。

廖汉生正盯着“大令”看得入神，没注意有个留着“一字胡”的军官来到面前，笑眯眯地问：“你是谁家的小孩子？胆子这么大，敢看兵呀！”

那个时代，老百姓是怕兵的。听说要“过兵”，唯恐躲避不及，谁还敢看呢。

廖汉生一看问话的像是个当官的，便大大方方地回答：“我是廖家的。”这人原来就是贺龙。

贺龙夸奖了他几句，率队向洪家关走去。从此，这个敢看“过兵”的男孩子在贺龙的脑子里留下了印象。

廖汉生的父亲是桑植县有名的才子，在省城长沙读书期间，曾与湘籍著名革命党人林伯渠结为好友，回乡后致力于乡村教育，在本乡办起小学，教授新课程、新知识。后来，在贺龙再三诚聘下携笔从戎，到贺龙当营长的桑植独立营里任职，做些文墨事。

一次，他向贺龙请假回家，要给儿子定亲。贺龙问：“是我见过的那个敢看‘过兵’的孩子吗？”

“不是，是给汉生的弟弟定亲。”

贺龙说：“那我也提个亲吧。”当下，两人就把贺龙二姐的女儿和汉生定了娃娃亲。从此，廖汉生与贺家结下了革命姻亲的不解之缘。

廖汉生10岁时，父亲不幸病逝军中。贺龙的大姐贺民英夫妇把灵柩接回桑植，帮助安葬。以后，廖汉生一家孤儿寡母，经常得到贺龙及其姊妹的关心、照顾。

1925年春，贺龙在澧州当了建国川军第1师师长和澧州镇守使，廖汉生和贺家的两个小孩子被接到澧州过春节。

贺龙就职典礼这天，廖汉生趴在城墙上悄悄观看，只见大操场，队列整齐，军号齐鸣，贺龙身穿军礼服，腰挎指挥刀，骑着高头大马，绕场一周检阅部队，然后登台发表就职演说。廖汉生听不懂讲的内容，只觉得贺龙威风得很，神气得很。

春节过后，贺龙派了一排兵把他们三个小孩子送到常德，送入省立第二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读书，每人留给100块钱的学费和食宿费。

常德是湘西北的中心城市，省立二师是这一地区的最高学府。廖汉生在桑植县高小读过两年书，因此他进二师附小插班上五年级。作为一个山里伢子，他第一次走出闭塞的山区，来到大城市，开阔了眼界，而且感受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第一次听说了共产党。

入学不久，国民革命的先驱孙中山逝世，举国同悲。附小学生也参加了常德各界举行的悼念仪式。

随着孙中山的逝世，围绕着要不要继续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二师左右两派学生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

一天，廖汉生正在听课，教室里闯进二师的一个右派学生，嚷叫着要搜捕共产党。后来听说是右派首先发难，挑起了一场械斗。在冲突中，一个右派学生受伤致死，由此导致数十名左派学生被校方挂牌开除，首当其冲的是共产党员、麻阳籍学生滕代远。

在常德读书期间，放寒暑假回家、返校，廖汉生都要路过澧州，在贺龙那里住几天。两个学期后，贺龙被湖南军阀赵恒惕逼出澧州，远走贵州。廖汉生的钱用光了，他给贺龙写信求助，贺龙寄来30块钱，他又接着上了第三个学期。

1926年暑假后快开学了，廖汉生的学费还没着落，听说贺龙率部由黔入湘到了常德，于是他和在桃源女子师范读书的贺龙的幺妹贺戎姑结伴，从桑植步行去找贺龙。刚走出桑植县境，又听说贺龙挥师北伐已经走远了，他俩只得悻悻而返。廖汉生不甘心就此辍学，进入桑植县高小学完了最后一个学期，毕了业。

在第二师范附小时，廖汉生曾有一个理想：发奋读书，争取毕业时考入前两名，保送升入师范免费学习，然后像父亲那样当个乡村教师。现在却事与愿违，从桑植高小毕业后，家里实在没钱供他外出继续升学，他向母亲哭闹了一通也无济于事，只得留在家中一边干农活，一边帮别人带小学生。

1927年夏，湖南农民运动的浪潮波及到偏僻的湘西山区，廖汉生和本乡几个高小毕业同学积极投身其中。他们从县城领回宣传品，在集市上贴标语，喊口号：“打倒土豪劣绅，杀尽贪官污吏！”

然而不到一个月，反革命的血雨腥风又刮到桑植，刚刚兴起的农民运动被镇压下去。反动乡长放出风来：“要教训教训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学生崽！”

一起闹农会的同学，有的见风使舵，投靠了团防队；有的胆小怕事，活活吓死了。廖汉生无法在家里安身，于是投奔到贺龙的大姐贺民英处避难。

当时，贺家几姊妹不甘心受压迫，又受了贺龙的影响，先后拿起枪来自卫。廖汉生原来只想在贺民英处暂时避一避风头，结果却从此投笔从戎，像贺龙及其姊妹那样走上一条武装反抗旧制度的道路。

拿起刀枪跟贺龙

1927年秋，一个消息震惊了桑植：“贺龙参加共产党的南昌暴动啦！”

人们惊愕未定，又一个消息接着传来：“南昌暴动垮台啦！”

桑植县里谣言四起，传说贺龙已经死了。

廖汉生在贺民英处度过了一个难熬的冬天。

1928年3月，贺龙和周逸群、贺锦斋等人辗转回到桑植洪家关。在贺龙的家里，廖汉生看到贺龙的亲友、旧部属纷纷前来探望，就连堂堂的县长大人也慑于贺龙的声威坐着轿子赶来拜见。人们散去以后，贺龙对亲友们公开宣布：“我现在已经是共产党了。南昌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我们回来就是要重新组织工农武装。”

后来，廖汉生从贺龙那里逐渐听到：国民党背叛革命以后，贺龙断然拒绝蒋介石高官厚禄的拉拢，毅然接受共产党领导，率领国民革命军第20军参加南昌起义，并出任起义军总指挥。在从南昌向广东转战途中，贺龙由周逸群介绍加入了共产党。起义军失败后，他经香港到上海找到党中央，要求回家乡重新搞武装，而后经武汉、洪湖等地回到桑植。

廖汉生看到贺龙这次回来，只有七个人，带着三支没了枪匣兼枪托的驳壳枪，但是贺龙一声号召，贺家姊妹和王炳南等亲友、旧部属纷纷响应，几天时间就在工农革命军的大旗下聚集起上千人的队伍。17岁的廖汉生也加入其中。

不久，敌军龙旅长得知贺龙是“红脑壳”，前来“进剿”。为了便于作战，贺龙把一些妇孺亲属交给贺民英姊妹。廖汉生本想跟着工农革命军走，因为那里人多枪多好打仗，贺龙却要他跟在贺民英身边。

刚刚组织起来的工农革命军首战失利，大部溃散了，只剩下少部分人和亲属们跟着贺龙向山里退去。这期间，廖汉生目睹了贺龙与堂叔间发生的一场“家庭纠纷”。



堂叔生气地指责贺龙：“你当过镇守使，当过军长，是有前途的。为什么要当共产党？脱下将军服穿粗布衣，脱下皮鞋穿草鞋，图的是什么？”

贺龙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找真理、找出路，找了半辈子，现在总算找到了，就是把我脑壳砍了，也要跟共产党走到底！”

叔侄俩人互不相让，争吵起来，气得族叔浑身直抖，拂袖而去。

从这场“家庭纠纷”中，廖汉生看到贺龙跟着共产党的坚定信念，他也进一步明确了拿起刀枪跟贺龙的决心。

不久，贺龙乘敌军撤走之机带领贺锦斋等人去“撂尾子”，也就是袭击后卫。那天廖汉生受母亲之托，提着一只黑母鸡给贺龙送去，正巧碰上他们“撂尾子”回来。贺龙兴犹未尽他讲起当时的情景：在一个岔路口，他叫贺锦斋几个人守一边，他自己守一边，等敌人大队人马过去、零散后卫过来时，大家一齐跳出去，夺了枪就跑回来。

望着贺龙手抚钢枪眉飞色舞的样子，廖汉生的心里不由得一阵酸楚：他可是当军长的呀，拥有过上万人枪，今天为了搞枪却要亲自冒险去守路口，“撂尾子”！

几天后，贺龙重回洪家关，又召集起几百人。

在工农革命军的初创时期，廖汉生目睹了这支队伍的三起三落。在最困难的1928年冬天，工农革命军在石门县遭受严重失败，师长贺锦斋牺牲，贺龙率部撤回桑植边界的大山里。廖汉生和贺龙的幺妹夫刘玉阶受贺家姊妹派遣，给部队送去一些过冬物资。

在工农革命军驻地，廖汉生看到：

原先上千人的队伍只剩下91个人、72支枪；

天已下雪，部队还穿着单衣，贺龙军长的脚上套着一双烂草鞋；

军部招待他们吃饭，端上来的只有一碗苞谷糊糊……

但是在党的领导下，工农革命军经过整编，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发展成为一支坚强的红军。

1929年春，贺龙率领红军相继解放了湖北鹤峰和湖南桑植两座县城，建立了湘鄂边苏区。

廖汉生受命回乡组织农民协会，后被推举为代表，参加县农民协会和县苏维埃的工作，带领农民赤卫队开展土地革命。

就在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将要召开之际，敌军向子云团前来进攻。贺龙摆下“空城计”，把红1团和红4团分别埋伏在城外，等敌军入城后突然出击。

廖汉生带领农会的赤卫队配属由“神兵”改造成的红4团参战。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战斗。他们按照贺龙军长的指示，利用敌军迷信“神兵”刀枪不入的心理，人人头缠红布帕，腰扎红腰带，手持挂上红布条的梭镖、大刀，俨然一副“神兵”打扮，沿着城外300多级台阶直冲东门。门楼上的敌军吓得丢下两挺水机关枪拔腿就逃，一边逃一边掏出小孩子打水仗玩的唧筒，把事先灌好的乌鸡血、狗血往“神兵团”战士身上喷。战士们不是过去那种吞丹画符的“神兵”，而是具有革命思想的“红色的神兵”，勇敢地冲上前去，缴枪抓俘虏。

贺龙军长指挥红军主力趁势追击，一直把敌军赶到赤溪河边，全歼其一个团。敌团长向子云抓着骡子尾巴冒险泅渡，被山洪卷走，淹死了。

此后，红军和苏区迅速扩大起来，土地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廖汉生在县苏维埃主席和农会主任的带领下，到各乡发动群众，组织赤卫队，动员参加

红军，斗争土豪劣绅，惩办有民愤、有劣迹的坏人。

一次，苏维埃主席吴天锡带着廖汉生和赤卫队下乡去惩办几个有劣迹的人，其中一个人是廖汉生的三伯父。这个三伯父是个不务正业的痞子，干过一些欺负人的坏事。廖汉生带着赤卫队把三伯父抓住，吴天锡主席以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宣布其罪恶，把他法办了。

这年秋天，廖汉生已满 18 岁。尽管他早在两年前就参加过农民运动，然而，他一直把这一年看作是参加革命的起点。如火如荼的工农武装斗争使他选择了人生的道路，轰轰烈烈的苏维埃工作给了他思想的启蒙，而叱咤风云的贺龙更对他产生了直接的深刻的影响，促使他拿起刀枪，坚定地跟着贺龙、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贺民英游击队队员

从 1928 年春参加贺龙发动的工农武装斗争时起，廖汉生就一直渴望成为一名正规的红军战士，渴望能够跟着贺龙痛痛快快地打胜仗。

以后，廖汉生看到往日的同学、一道参加革命的游击队员、同在桑植县苏维埃工作的红小鬼，进了主力红军后进步很快，短短二三年间已经成为师、团指挥员，而自己还是一个普通的游击队员。年轻气盛、不甘人后的他，为此曾三番五次要求离开贺民英游击队，到主力红军去。然而，每一次都受到贺家姊妹的坚决挽留，受到贺龙军长的耐心劝说，因此没能实现。他只好一直跟在贺民英身边，继续当一个游击队员。

后来，贺民英为了满足他的好胜心，“提拔”他为游击队文书，掌管贺民英的名章。每次有事需要与外界进行信件联络，由他根据贺民英的口述写个便条，盖上章子，作为游击队的公文。

贺民英游击队的主要成员是贺家几姊妹及其亲属、旧部，领头的是贺民英，副手是贺民英丈夫生前的护兵徐涣然，年纪最大的有五六十岁，最小的仅七八岁，男女老幼加起来有二三十人。这支队伍虽然人数不多，没有正规编制和正式番号，但在湘鄂边乃至整个湘鄂西苏区名气很大。红军指战员按照贺龙对贺民英的称谓，尊敬地称它“贺大姐的队伍”；老百姓根据贺民英乳名“香姑”，习惯地叫它“香大姐的队伍”；国民党反动当局则按照谎报的军情，把它骂为“约有二三百人，连枪居多”的“女共匪贺仙姑的队伍”。

就是这样一支小小的游击队，在贺龙的影响下，在党的领导下，长期坚持在湘鄂边苏区。

1930 年春的一天，廖汉生在鹤峰县城看到贺龙军长第一次公开出布告，其中有两句话气魄颇大，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与我六军会合，直下武汉三镇。”

遵照党的命令，贺龙率领湘鄂边红 4 军东下洪湖地区，与周逸群、段德昌领导的红 6 军会合，组建红 2 军团，创建了以洪湖为中心、规模宏大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廖汉生跟随贺民英送走红军以后，登上鹤峰与桑植交界的四门岩山区，在那里建立了游击队的基本营地。

红军主力走后，在敌军的频繁“围剿”中，贺民英游击队和其他游击武装一道，在中共湘鄂边特委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坚持苏区斗争。

他们在四门岩山区与敌人反复周旋。湖南的敌军来了，他们就跑到鹤峰一侧；湖北的敌军来了，就跑到桑植一侧；两省敌军一齐来了，他们就往更高的山上攀，那里敌军大队人马上不去，小股爬上去不是挨打就是被牵着满

山转圈子。敌情紧张时，湘鄂边特委和苏维埃的干部也从鹤峰县城撤上山，敌军退走了再回去。一些红军伤病员和家属也在这里休养、隐蔽。

在山上，不分男女老幼，人人一手拿枪一手荷锄，一边游击一边生产，在岩缝中种些苞谷、南瓜。几个未成年的小孩子，不能光跟着舞刀弄枪，还要学文化，廖汉生就成了他们的文化教员，每天闲暇时教他们认字，唱歌。

1932年下半年，中共湘鄂边特委和独立团转往洪湖，会合红军主力去了，湘鄂边只剩下零星几支游击武装。苏区被敌军全部占领，陷入反革命白色恐怖之中，敌人大肆屠杀，四处烧屋，长期围山“清剿”，斗争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到了冬天，风雪交加，饥寒交迫，敌人的围困却不见缓和，扬言要把游击队困死、饿死、冻死在山上。

一个雪夜，廖汉生随贺民英下山去摸情况，找粮食。他们来到山脚下的小村子，发现里边驻扎着敌军。他们进不了村，就悄悄来到村边一户独立人家，请主人家向乡亲们找了一些南瓜和黄豆。

回山时，为了不在雪地上留下脚印，以防敌人追踪而来，廖汉生跟着贺民英沿着山中的雨裂沟，赤脚趟着冰冷的溪水向上走，遇到沟边枝杈横生的地方直不起身，只好伏下身子在冰雪上爬行，手脚被划出一道道血口子，浑身被冻僵了。

他们带上山的那些黄豆成了游击队的救命粮。

黄豆吃完了，大家就四处采野菜，捡野果，挖蕨根。蕨根里面含有淀粉，是老百姓度灾荒的代食品，游击队员们把它挖来当饭吃。

冬夜漫长，游击队只能住在阴冷潮湿的岩洞里。廖汉生用火镰引燃一堆篝火，大家围坐着取暖。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只好胸前背后转着烤。

山里人都会唱山歌，越是苦越要唱。有一首自编的山歌形象地唱出了游击生活的艰苦情景：

吃的洋芋果（土豆），  
烤的转转火（篝火），  
盖的黄丝被（稻草），  
背的抓子火（土枪）。

……

游击队员们渴饮山泉，饥食野果，昼伏密林，夜宿岩洞，过着原始人般的生活，苦苦坚持着，不动摇，不屈服，一直坚持到贺龙率领红军回到湘鄂边。

1933年初，农历腊月间，敌军“围剿”有些松懈。贺民英把廖汉生叫到面前，交代说：“我们这样总在山上呆着也不行，你下山去看看，找些粮食，也找一找出路。”

廖汉生接连翻过几座大山，走了上百里山路，一路走一路打听，听说山下的茅坝坪来了一支队伍，有人说是贺龙率领的红军，有人说是贵州来的“黑军”。

廖汉生大着胆子继续往前走，走到茅坝坪村边上，突然从隐蔽处跃出几个持枪的人，喝令：“站住！”原来已经闯到警戒线上。

廖汉生被哨兵带进村里的连部，他一问，对方果然是红军。他欣喜万分，连忙接着问：“是不是贺龙的队伍？”

“是。”连长告诉他：“这里是第8师的一个连哨。”

他又问：“你们师长是谁？”

“师长是朱胜文，政委是谷志标。”

他一听，这两个人都熟悉呀！就请连长派人把他送到师部。

朱胜文师长招待他吃了一顿饱饭，又派人把他送到军部。廖汉生终于见到了盼望已久的贺龙。

贺龙军长见到廖汉生；急切地问：“大姐和大家都还安全吧，现在怎么样了？”

“都还安全。”廖汉生回答，接着把红军走后的情况简单报告了一下。贺龙军长叫他马上回山上去，把贺民英和大家接出来。

廖汉生顾不上休息，当天又匆匆赶回去，报告了喜讯。贺民英带着大家走出深山，与红军团聚。

血洒洞长湾

红军这次回来，打开了鹤峰县城，初步恢复了湘鄂边苏区，并向桑植和鄂西一带活动。

廖汉生跟随贺民英几次到军部看望贺龙。贺龙对贺民英讲：“大姐，根据你们过去在湘鄂边坚持游击的情况，你这个队伍还可以扩大些。”贺龙还拨给他们一批步枪和子弹。

回到游击队驻地——鹤峰县太平镇的洞长湾，他们根据贺龙的指示，把太平镇附近村寨的贫苦农民组织起来，成立了赤卫队，进行训练，实行联防。

转眼间到了5月的插秧时节，赤卫队员们白天各自回家下田插秧，夜晚再集中起来驻防。一连几天下来，每个人都感到疲劳不堪，就连苦了一辈子的贺民英也感到有些吃不消。在大家的要求下，她心软了，说：“这样太累了，大家还是把秧插完再来，晚上就各回各家睡吧。”

贺民英身边只留下十几个人，分开住在洞长湾的两户人家。贺民英、徐涣然带着两个妹妹的遗孤和几名队员，住在西边人家；贺戊姐带着儿子、幺妹贺戎姑，廖汉生带着妻子和两岁的女儿、周岁的孩子，以及在这里养病的红军团长向刚，住在东边的农会委员许璜生家。

就在这天晚上，当劳累的人们熟睡之后，农会委员许璜生悄悄溜出屋去，向敌人密报了游击队的情况，领着团防大队前来偷袭。

凌晨，敌人从山背后摸下来，放哨的游击队员唐老么刚要报警，被敌人一枪打死了。

凄厉的枪声回荡在小小的洞长湾里。当大家惊醒时，敌人已经分别包围了两处木屋。大家抄起枪，向外还击。红军团长向刚背起廖汉生的女儿春莲，说了一声：“我喊赤卫队去！”第一个冲出屋，上了屋后的山坡。

廖汉生招呼屋里的人们：“快走！”随后提着驳壳枪冲出屋子。黑暗中只见到处都是敌人枪口迸出的火光，他打了几枪，见其他人都跑出来了，就绕到屋后上了山，与敌人对射着。后来才知道，贺戊姐因为患哮喘病跑不动，落在后边被敌人抓住了，敌人撤走时把她枪杀在水田里。

在西边那栋屋里，贺民英持枪冲出门，被敌人一颗子弹打中了右腿，她跪在门边向敌人还击。徐涣然背上她正要走，肩膀中了一枪，背不动了，只好把她放下来。贺民英一边要徐涣然先走，一边继续还击，正在这时又一颗子弹击中了她的腹部，她当即牺牲。

红军团长向刚很快就带着从太平镇召集的赤卫队赶来增援。敌人在天亮

时匆匆退走了。

大家回到两栋木屋前，只见贺民英、贺戊姐两姊妹双双牺牲，此外还有三人遇难、三人负伤，廖汉生的妻子和怀里的儿子被敌人抓走了。

洞长湾里鲜血殷红，哭声一片。

怎么办？大家一时手足无措。廖汉生强忍悲痛，含着泪给贺龙写了一封信，报告情况，询问：“今后该怎么办？”

贺龙收到信，派警卫员朱绍田来接大家。他们在乡亲们的帮助下，选择靠山根的一块平地草草掩埋了贺民英姊妹和其他牺牲者，搀着受伤的人，翻山越岭来到红军驻地。

在军部里，亲人相见，又是一番哭诉。贺龙默默承受着一夜间失去大姐、二姐的悲痛，把姊妹们遗留下來的几个男孩子安排在警卫班当战士。贺龙问廖汉生：“大姐她们牺牲了，你们打算怎么办？还干不干？”

廖汉生坚决地回答：“干，横直革命到底！为她们报仇。”

“好！你们回去，招人，搞枪，把游击队重新组织起来。”贺龙当即任命徐涣然、廖汉生为鹤峰县第4游击大队正副大队长，又发了一批枪，要他们回去重整队伍。

他们回到太平镇集合起赤卫队，进一步扩大队伍，成立了游击大队，在烈士牺牲的地方继续跟敌人做斗争，接连同团防队打了两仗，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半年以后，这支游击大队编入红军部队。

廖汉生从1927年夏投奔贺民英时起，到1933年5月将她亲手安葬，在这支游击队里生活、战斗了七个年头，亲眼目睹了贺家姊妹在贺龙的影响下，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接受新思想，从传统的农民造反者逐步成为工农革命的坚决支持者和积极参加者。大姐贺民英、二姐贺戊姐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大妹贺满姑被捕后在刑场上英勇就义，幺妹贺戎姑在当红军营长的丈夫刘玉阶牺牲后不久也去世了。

1933年冬，红军捉住了曾经抓捕贺满姑的桑植县桃子溪团防队长张恒如，贺尤军长派廖汉生和贺戊姐的儿子萧庆云、贺满姑的儿子向轩把张恒如押回军部。他们三人想到贺家姊妹们的惨死，越想越气，按不住心头的怒火，半路上就把那个家伙杀掉了，报了仇。

艰苦的游击生活使廖汉生得到特殊的磨练，贺家姊妹们对党无私奉献、对革命坚贞不渝、对敌人决不屈服的精神，使他永生难

逆境中入党

1933年夏的一天，红3军军部和第9师从鹤峰县太平镇经过，在镇上住了一晚。贺龙军长把在第4游击大队任副大队长的廖汉生调到军部当书记员。

他这个书记员和警卫班平时吃住在一起，一样的装备，驳壳枪、牛皮子弹带，但不必跟随首长，不用站岗放哨，有时抄抄写写，到各师传达军部命令。

廖汉生多年来渴望当一名红军战士的夙愿，今天终于实现了！令他欣喜若狂。然而，喜悦的心情很快又被眼前的一些怪现象冲走

廖汉生到军部报到的当天，就看到军部特务班里关押着三个人：一个是他在桑植县高小时同校不同级的同学、第8师政委谷志标；一个是他在县苏维埃结识的红小鬼、团长贺炳炎；还有一个不认识，听说是第9师政委宋盘铭。

这三个人不知道犯了什么罪，被关在这里。廖汉生原想上前跟谷志标、贺炳炎打个招呼。可是又听警卫班的战士告诫说：这三个人是反革命“改组派”，要是被人知道你们认识，恐怕连你也一起关起来。

以后廖汉生逐渐了解到：湘鄂西党的分局书记、军委分会主席夏曦推行一套“左”的“肃反”路线，大抓所谓“改组派”，致使党和红军中大批优秀干部被错捕错杀，像段德昌、王炳南这样一些赫赫有名的湘鄂西苏区创建者，不久前刚刚在鹤峰被冤杀。“左”倾错误路线导致了规模宏大的湘鄂西苏区垮掉了，近3万人的红2军团缩减为3000余人的红3军。夏曦抓人抓昏了头，荒谬地认为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已经被“改组派”完全把持了，因而全部解散。整个红3军竟然只剩下“三个半”党员，即书记兼主席夏曦、军长贺龙、政委关向应、第7师师长卢冬生，由于卢冬生的党组织关系在上海党中央那里，他有时列席分局会议但没有表决权，在红3军中只能算有一半党的关系。

廖汉生调到红3军时，抓“改组派”的高潮刚刚过去。贺龙军长、关向应政委利用夏曦带领第7师与军部和第9师分开行动的机会，开始对“左”的错误做法进行纠正。在贺龙担保下，关向应政委释放了谷志标、贺炳炎、宋盘铭三人，又在军部直属队率先恢复了全军第一个党支部。

廖汉生到红3军工作仅一个月，贺龙军长、关向应政委就把全军第一个党员发展对象选中了他。因为，一是他多年来一直在贺民英游击队里，没有受到前一段党内、军内抓“改组派”的牵连；二是贺龙军长从小看着他长大，可以说是知若父母；三是大批有才干、有文化的干部，那些黄埔生、留苏生，几乎全都当成“改组派”错捕错杀了，而高小毕业的书记员廖汉生也算是有较高文化的了。正是基于这样一些因素，贺龙军长、关向应政委亲自介绍他入党。

农历七月间，红3军游动到湖北建始县一个镇子，军部驻扎在一户地主家的两层木楼上。一天，在二楼警卫班的屋里召开直属队党支部会，讨论廖汉生入党问题。

关向应政委首先简要介绍了情况。他说：“廖汉生过去一直在贺大姐的队伍上，大家都熟悉。他有文化，勇敢，经过游击生活的艰苦考验，现在党和红军处在最困难的时期，特别需要这样的同志参加党。”

关政委介绍完毕，其他同志都表示同意，当场就通过了。

虽然是刚刚步入党的的大门，但是廖汉生在此之前对党已经相当熟悉，在党的领导下战斗了多年。当一名共产党员，这是他一直追求的理想。早在常德第二师范学校附小读书时，他就对共产党有了初步印象。后来在湘鄂边打游击时，他发现苏维埃里党的特派员原来就是他在二师附小的年级主任刘植吾。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他看到第一个公开宣布自己是共产党员的人，就是 he 从小崇敬的英雄——贺龙。在贺民英身边战斗、生活中，他两次目睹贺民英申请入党，虽然未能获准仍苦苦追求，从中感受到党的强烈吸引力。他曾有机会和周逸群、关向应这样一些杰出的党的工作者接触，从他们的一言一行中看到了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

支部会上，关向应政委又给廖汉生和全体党员讲了一次党课：党在现阶段所进行的革命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要打倒封建地主阶级，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打倒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势力；将来还要建设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

对于关政委讲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廖汉生一时没有听懂。然而对于要打倒地主、国民党、帝国主义，他听得很明白。尽管这时红军还只有那么一点人，那么一点枪，处在非常困难的境地，却敢于喊出这样的口号。他相信这个理想一定可以实现！

廖汉生是在湘鄂西党组织和红军处于毁灭边缘的逆境中入党的。外部敌军残酷“围剿”的险恶环境，党内“肃反”扩大化的紧张气氛，都没有动摇他对党的信念和追求，而且给了他特殊的学习和锻炼机会。

从入党的第一天起，廖汉生就被关向应政委带在身边学习做党的工作。关政委给他详细讲解党的路线、政策和任务，手把手地教他填写党员登记表，亲自带他下连队重新登记党员、恢复基层党组织。

第一次下连登记党员是到第9师第25团第2连。那是10月间的一天，部队在湖北利川县小河镇驻扎。关政委带着廖汉生在该连召开军人大会，讲了一番话：“同志们，过去我们的党组织都解散了，党员都不作数了。现在我们还是要建立党组织。红军不能没有党！哪个过去是党员的出来报名。”

关政委话音一落，廖汉生提起笔，在备好的一叠党员登记表上准备登记。可是会场上反应冷淡，大家都闷不做声，只是用惊疑的目光打量着他俩。廖汉生提起的笔只得又放下。

关政委看到没人出来登记，就按照事先了解的情况一个个点名，一连点了几个，谁都不承认，后来点到一个扛机枪的战士：“朱长清，你是不是党员？”

朱长清站起来答道：“我是共产党员。”他走到廖汉生面前开始登记。

廖汉生在给他登记中了解到，朱长清原来是长江边上的一个脚夫，也就是码头工人，在洪湖苏区参加了红军，参加了党。他是这次下连登记的唯一的党员。一年后，由于朱长清是全军连队里重新登记的第一个战士党员，又是出身于纯正的无产阶级，他被选为湘鄂川黔省苏维埃的副主席，与贺龙、夏曦等人赫然齐名于省苏维埃的所有布告上。

登记党员是一项困难而艰巨的工作。由于前一时期大抓“改组派”的影响，部队中普遍存在着“党员等于反革命改组派，改组派等于杀头”的看法，以至于老党员不愿承认自己是党员，青年群众不愿入党。

有的同志作战英勇，入过党，也被抓过“改组派”，廖汉生动员他重新登记时说：“你应该登记，你过去打仗多么勇敢呀！”

“过去？”他把双手一伸，露出手腕上被棕绳子捆出的深深沟痕，然后一言不发。

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指战员不敢加入共产党，入党多年的老党员不愿承认是党员，这实在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悲剧！

尽管有困难、有阻力，廖汉生在关政委的带领下，坚持耐心、细致地做工作，一个连一个连的动员，一个人一个人的登记。

继第9师第25团第2连之后，廖汉生跟随关政委到了第9师其他几个连队。与第7师会合后，又首先在第7师特务连登记了该连司务长黄新远。经过一番努力，全军各单位陆续登记并发展了数百名党员，初步恢复了党的组织。廖汉生也从中学习到做党务工作的知识和方法。

处决熊贡卿

1933年12月间，贺龙军长、关向应政委率领军部和第9师与夏曦率领的第7师会合，继续在湘鄂川三省交界地区流动游击，试图创建新的根据地。

12月22日拂晓，红3军从湖北咸丰县一个小镇出发，一天内，长途奔袭百余里，连打三仗，黄昏时攻占了四川黔江县城。

就在打开黔江城的第二天，夏曦下令把已被贺龙释放了的第9师政委宋盘铭捆了起来，拉到一个山头上，召开第9师军人大会，宣布了所谓宋盘铭的“改组派”罪恶，下令把他枪杀了。廖汉生亲眼目睹了这一幕惨剧，心里充满了困惑和不满：“贺、关首长已经把宋盘铭放了嘛，为什么夏主席一回来就又把把他杀掉呢？”

红3军在黔江城驻扎了一个星期，敌军反扑过来，夏曦害怕了，命令退入湖北利川县。

老苏区丢掉了，新苏区建立不起来，红3军在湘鄂川边转来转去，竟然找不到一块安身之地。部队天天在走路，天天在减员，伤员无处安置，兵员无法补充，内部抓“改组派”的紧张气氛又使得人人自危，情绪低落。只是靠着贺龙军长的威信来维系着军心、人心，指战员认定，只要贺龙不倒，这支红军就垮不了。

就在红3军处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一位从恩施市来的人，找到红3军军部，求见贺龙。廖汉生按照贺龙军长的指示先接待了他，得知此人叫梁素佛，是来联络的，捎来了自称是贺龙任澧州镇守使时的旧友熊贡卿的信，熊要求前来拜访，表示愿意帮助贺龙摆脱困境。

廖汉生把信交给贺龙。贺龙一眼就看出熊贡卿来信的用意：“这是要搞老子的策反来了！”贺龙仿佛受到莫大的侮辱，气得火冒三丈，恨不得一刀把那个来联络的梁素佛劈了。但他克制住满腔怒火，把信交给关向应政委。中共湘鄂西分局开会分析了熊贡卿的来信，决定将计就计，以贺龙的名义复信，同意他前来。

几天后，廖汉生和警卫班战士们看到梁素佛引着熊贡卿来了。熊摆出一副蒋介石代表的臭架子，坐着轿子，带着护兵，还雇了几个民夫挑着礼品，神气活现地直闯军部驻地。

战士们大声喝令：“站住！”熊贡卿不得不下了轿子，立在外边等候通报。

贺龙按照党的决定出面与熊贡卿周旋，要他们一行人随军转至湘西龙山县茨岩塘住了半个月。在这段时间里，贺龙从熊的口中探知：蒋介石以为贺龙已经是走投无路了，一边用重兵“围剿”，一边用高官厚禄引诱，企图“招降”贺龙。同时，还派了一些人到中央苏区和红四方面军去，企图搞上层收买，破坏红军。情况了解得差不多了，湘鄂西分局决定处决熊贡卿。

一天凌晨，红3军准备离开龙山茨岩塘向桑植进发。贺龙军长把廖汉生叫到面前，神情严肃地交代任务：“你去把熊贡卿抓来，今天我们要处决那个坏蛋。”

廖汉生带着警卫班长来到军部旁边的熊贡卿住屋，熊正在酣睡。

廖汉生上前扯掉被子，喝令道：“起来！”

熊贡卿猛然惊醒，莫名其妙地问：“你们干什么？”

“逮捕你！”

他惊慌地说：“你们抓人，贺军长知道不知道？我是贺军长的客人。”

“我们就是奉贺军长的命令来抓你的！”

听罢这话，熊贡卿绝望地叫了一声，然后赖在床上不动。

廖汉生和警卫班长用枪指着，喝令他穿上衣服，提着小皮箱，把他押



到军部。与此同时，熊贡卿的那些护兵和梁素佛也被控制起来了。

在从茨岩塘去桑植的一个山垭口上，待命出发的部队集合完毕。廖汉生和警卫班战士把熊贡卿押到队伍前。

贺龙军长站到一块突出的岩石上，高声宣布：

“今天，我们要处决一个坏蛋，他叫熊贡卿，是蒋介石派来劝降的说客。这是对我贺龙个人的极大污辱！也是对红军的极大污辱！这个坏蛋又是一个奸细，我们绝不能放他回去。蒋介石的算盘打错了！艰苦困难吓不倒红军，高官厚禄收买不了红军，阴谋诡计也骗不了红军！”

在全军指战员面前，贺龙军长揭露了蒋介石的劝降阴谋，宣布枪毙这个反动“说客”，而后率队向桑植进军。

处决熊贡卿，深深地教育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廖汉生从中看到贺龙军长对党的耿耿丹心，对敌疾恶如仇的坚定立场，光明磊落的无私胸怀。

熊贡卿死了，蒋介石败了。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然而，此事过去 30 多年后，在“文革”浩劫中，林彪、江青、康生之流颠倒是非，诬陷贺龙“通敌”、“请求收编”，将功勋卓著的贺龙元帅置于死地。他们要身陷囹圄的“贺龙的干将”廖汉生交代：贺龙是如何派你与熊联络的？蒋介石派熊到湘鄂西与贺龙是怎样谈判的？最后达成了什么协议？

廖汉生据实写出了历史的真相。

初任师政委

1934 年春，红 3 军恢复了军政治部。

政治部一共只有 6 个人，夏曦兼主任，下面有四个干事，廖汉生担任秘书。

7 月间，红 3 军进入贵州沿河县的枫香溪。中共湘鄂西分局召开会议，决定全面恢复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派一批干部深入发动群众，建立黔东苏区。

会后，军政治部在枫香溪集中全军经过登记的党团员干部 100 余人，成立了干部大队，突击培训政治工作干部。政治部秘书廖汉生既是组织者又是学员。

于干部大队，学员们比较系统地学习《红军政治工作条例》等小册子，学习怎样做政治工作、党团工作、群众工作，怎样组织苏维埃、农会和游击队，怎样打土豪、分田地。

经过一个来月的培训，干部大队在枫香溪一片树林里召开了毕业大会。学员毕业后，一部分人充实到军政治部，大部分人分配下去担任连指导员、团政委和师宣传队长。廖汉生调到第 7 师任党的师委书记，主持党的工作并领导宣传队。第 7 师一时没有配政委，因为师长卢冬生是老党员，领导力量强一些。

在卢冬生师长的领导下，廖汉生在第 7 师继续登记并发展党团员，恢复党团组织。他挎着一个装满党员登记表的牛皮文件包，每天往各单位跑。由于党员人数还很少，他们先在师部恢复了党总支，团一级建立了党支部，重点在于部中发展新党员，以后又逐步向连队发展。

第 7 师宣传队长是一位优秀的青年团干部。一天，廖汉生和卢冬生师长找他谈话，动员他入党。这位宣传队长竟然不相信，径自跑到军部向关向应政委连连发问：“廖汉生和卢师长讲的是不是真的，我可不可以入党，今后还会不会再抓我的‘改组派’？”直到关政委当面向他证实，并再三保证今

后不会再抓什么“改组派”，他才回去，同意廖汉生和卢师长介绍他加入党组织。

经过一个来月短暂的摸索和锻炼，廖汉生很快掌握了政治工作的一些基本方法。

9月间，红3军驻扎在与黔东毗邻的四川西阳县南腰界。在这里，廖汉生离开第7师党委书记岗位，调到第9师担任师政委。第9师师长钟炳然是贺龙的亲戚，从讨袁护国给贺龙当弃兵干起，一直当到红军的师长，他固守着旧军人的一套思想、作风，始终没有入党。贺、关首长把廖汉生调去，加强第9师的领导力量。

廖汉生到第9师上任的当天，正好赶上攻打冉家祠堂。冉家祠堂座落在一块水田中央，祠堂四周围着一丈高的石头墙，里面住着南腰界团总冉瑞庭的武装，是盘踞在苏区中心的一颗钉子。

当时红军没有炮，廖政委和钟师长请当地木匠掏空一段树筒，打上几道铁箍，做成土炮，里面填入铁砂、铁片，后面装入火药。进攻准备好后，钟师长一声令下：“开炮！”

轰的一声，炮膛里的铁家伙没打出去，炮身却炸了，没有成功。部队硬攻了一下，也没奏效，只得收兵。

第9师把冉家祠堂围困了半个月，廖汉生政委组织师宣传队把那些团防队员的亲属找来，动员她们喊话，促使许多团防队员跑了出来。

第9师再次组织进攻。挑选了精干强壮的战士组成几支突击队，各团团长亲自担任突击队长，又新做了几门土炮。炮声一响，轰塌了围墙一角，廖汉生政委紧跟着突击队冲了进去，拔掉了这颗钉子。

在南腰界期间，红3军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对重返湘鄂边以来流动游击和抓“改组派”的教训进行了认真总结，对夏曦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初步批评。从此，红3军实现了由失利走向胜利、由困境走向发展的重要转变。

在入党仅仅一年的时间里，廖汉生迅速地成长起来，先后担任了军政治部秘书、第7师党委书记、第9师政委。

#### 团结如兄弟

1934年10月，红3军正在全力以赴进行黔东临时根据地的建设，从西阳县南腰界的一张白区报纸上获知，有一支红军部队来到黔东谋求会合。

红3军的电台早在两年前撤出洪湖时丢失了，因此主要依靠从白区报纸登载的“剿共”新闻中推测外界情况。不久前第9师打开贵州沿河县城，曾缴获了一部电台，但是一些战士不认得，想打开这个铁盒子看看里边装着什么，捣鼓好一阵也打不开，一气之下用枪托子把它捶烂了。电台送到廖汉生政委面前时，已经成了一坨废铁。

贺、关首长分析了白区报纸的消息，决定兵分两路，深入黔东接应那支红军。军部率第7师为一路，第9师为一路，同时由北向南行进。一天后，在沿河县境内碰到了由李达参谋长带领的红6军团先头部队。据李达参谋长讲，红6军团奉党中央命令于8月撤出湘赣苏区，前来会合。几天前在黔东石阡县甘溪与敌遭遇，李达率先头一部突出包围，一路打听来到沿河。

两路部队立即朝着6军团与敌军交战的方向急速前进，穿松桃，过印江，入江口。

一天，第9师来到梵净山下，发现前方山上有一支部队正在艰难地向上

攀登，对方也发现了情况，把机关枪架到了山顶上。

廖政委和钟师长仔细观察了一番：对方那副疲劳不堪的样子，又专捡偏僻陡峭的小路走，见到这边部队就往山上隐蔽，不像是前来“围剿”的敌军，倒像是一支红军部队。经过军号联络，对方答复是红6军团第50团。廖政委和钟师长立即奔上山去，与第50团团长郭鹏、政委彭栋才握手相见，然后帮助他们把山上山下的部队收拢起来，带着他们向军部靠拢。

第二天晚上，第9师和红6军团第50团到达印江县木黄，廖汉生让钟师长安排宿营，自己跑到军部报告情况。推门进屋，贺、关首长正在和几个穿灰布军装的人交谈。贺、关首长给他介绍了中央代表任弼时、红6军团军团长萧克、军团政委王震，廖汉生也代表第9师全体同志向红6军团首长问候。

几天后，两支红军到达南腰界，隆重举行庆祝会师大会。红3军恢复了红2军团番号，第7、9两师改为第4师、6师。

红6军团远道而来，物资装备损失很大，红2军团从物质上给以支援。红2军团刚刚恢复党团组织和工作制度，还很不健全，缺少有经验的政治干部，红6军团便从政治上给以支援。中央代表任弼时到红2军团担任政委，红6军团政治部整个搬过来，又抽调大批优秀干部到红2军团担任师、团政治干部。

第6师调来袁任远任政委，廖汉生改在副政委。在廖汉生的眼里，袁任远是一位年长的大哥和尊敬的老师。袁任远是湘西慈利人，与他是邻县同乡，论年龄，比他年长13岁；论文化，袁上过大学，他是高小毕业；论资历，袁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他入党仅一年；论工作经验，袁当过多年的师政委和师、军、军团政治部主任，他当师政委不足三个月。廖汉生虚心向袁任远学习，在袁政委的领导下，健全了师、团政治机关，配齐了营、连政治干部，在每个连队建立了党支部。袁任远在第6师任职一个月就调走了，廖汉生又重新担任了师政委。

红2、6军团会师后，并肩战斗，以第6师为先头，挺进湘西，攻占水顺县城。而后两个军团在永顺县龙家寨摆下口袋阵，打垮敌军三个旅一个团。接着，为配合中央红军行动，两军团出击常德、桃源地区，同时建立了湘鄂川黔苏区。

1935年3月，贺龙、任弼时、关向应首长调廖汉生担任红2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组织部的几名干事都是从红6军团调来的，后来又调来女同志李贞担任副部长，廖汉生部长团结大家一道工作，并且在管理军团党务和干部的工作中不分亲疏，唯贤是举。

廖汉生了解到任弼时政委的警卫员余秋里，曾经当过连队政治指导员，在湘赣苏区红军学校深造过。于是，他向任弼时政委提议：“现在部队扩大了，干部很缺，是不是把余秋里调出来，到团里当干部。”任政委同意了，组织部把余秋里派到第6师第18团担任党总支书记，不久又当了团政委。

在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的一系列战斗中，组织部除了动员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团员为粉碎敌人“围剿”而斗争，还要随时准备上火线，代理伤亡干部的工作。廖汉生部长在短短的三个月里，两次受命到第4师代理师政委。

6月初，红2、6军团在湖北咸丰县忠堡包围了敌军一个师。战斗进行当中，第4师政委方理明和第6师第18团团长、政委相继负伤，部队进攻受挫。军团政委任弼时把廖汉生、贺炳炎叫到面前，亲自下令派廖汉生到第4师代

理政委，派贺炳炎接任第 18 团团。他俩受领了任务，转身奔向炮火纷飞的战场，组织部队向敌军阵地发起新的进攻。这一仗，红 2、6 军团歼灭了敌师部和旅，活捉了敌纵队司令兼师长张振汉。

忠堡大捷后一个多月，第 4 师政委方理明伤愈归队，廖汉生又回到组织部当部长。

仅仅过了几天，红 2、6 军团在宣恩县板栗园伏击歼灭敌第 85 师。战斗中，第 4 师师长卢冬生、政委方理明身负重伤，廖汉生再次受命代理 4 师政委，投入战斗。

8 月间，红 2、6 军团从桑植出发，出击临澧、津市、澧州地区。第 4 师在大堰当与敌第 26 路军激战，代理师政委廖汉生和代理师长金承忠各率一个团把敌军打垮，而后指挥部队乘胜追击。廖汉生观察战况时，突然一颗子弹击中头部，从左边钻进去，从右边飞出来。他顿时昏死过去，被抬下阵地。

一个多月后，廖汉生伤愈出院，军团首长没有叫他回组织部工作，而是派他到第 6 师担任政委。

### 一诺千金

1935 年 11 月，一个秋雨绵绵的日子，廖汉生政委和郭鹏师长踏着泥泞，匆匆赶到桑植县刘家坪一栋木屋里，出席红 2、6 军团的师以上干部会议。大家围坐在堂屋的一盆炭火旁，听贺龙、任弼时等首长部署突围计划。

当时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了陕北，第四方面军滞留在雪山草地，长江以南只有红 2、6 军团这一支主力红军孤军坚持。蒋介石调集 100 多个团的正规军，从四面八方湘鄂川黔苏区围攻上来。敌军采取堡垒战术，严密封锁，步步紧逼，将我军逐渐压缩在苏区中心的狭小地带，企图一举消灭。苏区一天天缩小，形势一天天严峻。因此，红 2、6 军团决定实施战略转移，跳出堡垒区，进行运动战，在湘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

会后，廖汉生政委和郭鹏师长回到第 6 师，传达党的决定，着手进行各项准备。

凭着多年反“围剿”斗争的经验，红军指战员都看得出来：这一次突围与以往不大一样，出去后还能不能回来？何时回来？很难讲。估计会走得更远一些，离开的时间更长一些。因此，要离开家乡，离开父老乡亲，离开亲手创建的根据地，每个人都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感情。

出发前 5 天，正巧是廖汉生 24 岁生日。第 6 师驻地离他的家不过几十里，骑马也就是个把小时的路程。他很想抽空回去一趟，看一看家中的亲人。

这些年来，家人们跟着他吃了很多苦。前年 5 月贺民英游击队在洞长湾遭袭击时，妻子和怀中的儿子被反动派抓去，受尽折磨，他母亲东拼西凑弄了一些钱，托人把她们母子赎了出来。去年春节前，部队从他家附近经过，他向贺龙军长请假回家，原想在家里住上一晚，可是仅仅吃了一顿晚饭，就得到消息：曾经和他一起闹过农会的高小同学、乡团防队的朱照环要来抓他。他吩咐家人出去躲避一晚，就赶部队去了。第二天，他在军部得知：晚上，妻子带着孩子躲出去了，母亲不肯走，弟弟、弟媳留下陪她，拂晓时朱照环带着团防队围住屋子一通乱打，弟媳跑出来被当成他的妻子给打死了。他顿时怒火满腔，找到关向应政委：“给我一个连，我要回去报仇！朱照环毁了我的家，我也不叫他好过！”关政委没有给他人，也不同意他回去，严肃地说：“队伍马上就要出发，你不能回去。”他只好憋着一肚子火带着对家人的担心跟随部队出发了。后来他意识到自己的态度不大对头，只想到个人的复

仇。

从那以后，又是一年多没见面了，儿子在东躲西藏的生活中不幸夭折了，妻子、女儿跟着母亲，老少三代三个女人相依为命。红军这回一走，她们的命运肯定是凶多吉少。

廖汉生思念家人，但是他已经懂得作为师政委，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部队的情绪。他顾不上回家道别，忙着给部队进行思想动员，检查突围准备。他的妈妈和妻子听到消息，翻山越岭走了大半天赶来为他送行。

苏区的群众也从苏维埃政府动员坚壁清野中知道红军要远走了，很多人赶来看望自己的子弟。

廖汉生曾在地方上打游击多年，第6师有不少战士的亲属都是他的熟人，他们纷纷找到师部，对他说：

“汉生，我的儿子交给你了，你要照顾好他呀！”

“汉生，我的丈夫交给你了。你要带他活着回来呀！”

这些情真意切的托付，使他不能不一一应承下来：“放心吧，有我廖汉生在，就有你们的亲人在。”

他对来队的家属们和自己的母亲、妻子做工作：“红军走了，白军来了，苏区人民要吃苦的，请多保重。不管我们走到哪里，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没想到，这一走就是数万里，一别就是几十年，很长时间甚至连个音讯都没有。

抗日战争中期，廖汉生在延安从贺龙那里再次得到家人的消息时，传来的却是妻子早已被人打死的噩耗。大家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因为她是贺龙的亲戚、红军的妻子，早就有人想整死她了。后来，贺龙的妻子薛明给廖汉生介绍了一位同在延安工作的四川妹子，相识，结婚。

没想到，全国解放之际，随着胜利的喜讯又传来廖汉生的前妻“死而复生”的消息：她没有死，还活着！只是已经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到外乡给别人做老婆了。贺龙派人把她接出来，又送到西北的青海与廖汉生见了一面。这是反动派给廖汉生造成的家庭悲剧，也是相当一批红军战士的家庭悲剧。

全国解放后，许多长征老战士纷纷回到家乡，看望久别的乡亲，寻找离散的骨肉，祭奠死去的亲人。然而，廖汉生却很多年没有回去。

俗话说：一诺千金啊！

长征出发前廖汉生对来队的乡亲们许下的一句承诺，使他从此背上了一笔沉重的感情债，压在心头几十年。在艰苦的长征中，在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许多同志先后牺牲了，有些人连怎样牺牲的、牺牲在什么地方也很难说得清楚。当年参加长征的数千名桑植籍指战员能够活到全国解放的寥寥无几。1955年授衔时桑植籍的高级将领只有一个元帅、一个中将、一个少将。

由于这个原因，廖汉生感到无法向那些把亲人托付给自己的乡亲们交代，直到离别44年后的1979年，他才第一次回到桑植。此时，他熟悉的乡亲只剩下十几个年愈古稀的老太婆了。他久久地仁立在桑植县人民政府、也是原县苏维埃政府的大门前，仿佛又回到长征出发的那一刻……

突破封锁线

1935年11月19日，红2、6军团从桑植出发，踏上战略转移的万里征程。前一天，第6师先行出发，向大庸方向警戒，保障主力安全。随后，跟着主力来到大庸城外的张家湾强渡澧水。

敌军在澧水设置了第一道封锁线，发现红军突围意图后，依托堡垒进行拦阻，并派来飞机向水面上的浮桥扫射轰炸。

担任警戒的第6师隐蔽在岸边橘树林里，整整呆了一天。部队又饥又渴。挂满枝头的橘子都成熟了，被敌机轰炸震落到地上，俯拾即是。廖汉生政委观察四周，没有一个人捡起来充饥解渴，表现出良好的群众纪律观念。就这样，他们空着肚子离开了苏区。

在将近一年的长征中，年仅24岁的师政委廖汉生与前后两任师长一起，带领第6师英勇作战，屡建奇功。

长征前期，红2、6军团忽东忽西，忽南忽北，三次试图建立新的根据地又都不得不放弃，部队行踪可谓千回百折，变化莫测，有时师一级指挥员也不知道明天要往哪里走，只在出发前接到当天的宿营命令。不少人对于不停地走，不断变换方位地走，越走越离苏区越远，产生了厌烦情绪。廖汉生政委及时以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动员和教育全师指战员，坚决执行战略转移的方针，连续突破敌军一道又一道封锁线，挺进湘中，驻足黔西，回旋乌蒙，横扫云南。时而担任前锋，斩关夺隘；时而担任后卫，阻击追兵。

1936年的春节，红2、6军团攻占贵州瓮安县。第6师在瓮安一个叫“猪场”的小地方吃完年夜饭，又向贵阳挺进。

贵阳北面30公里的扎佐一带，敌军构筑了一道堡垒封锁线。前卫第6师避开堡垒和大道，在常人难以逾越的悬崖深涧之间探路而行。

他们来到一道崖涧前，只见涧深数十丈，涧水不宽却非常湍急，两边是陡峭的绝壁，一条溜索凌空飞架，上面挂着一个木斗，一次只能坐进去一个人，当地山民就是用这条溜索过来过去。

廖汉生带着师部人员一个接一个攀着溜索，飞身而过，大部队绕到涧底再攀上来，巧妙地越过封锁线，一举攻克修文县城。

红军攻占修文、兵临贵阳之势，迫使敌军一边向贵阳收缩，一边在乌江北岸布防，以防红军沿着一年前中央红军的老路北渡乌江，攻取遵义。贺老总指挥又把从乌江上游鸭池河渡江的任务交给了前卫第6师。

廖汉生政委和郭鹏师长、常德善参谋长研究后，派师作战参谋王绍南带着师及各团的侦察队，化装成国民党正规军，闯进守江的黔军阵地，占领了渡口，而后渡过乌江，进占黔西县城，打开了黔西北的大门。红2、6军团在黔西、大定、毕节一带铺开摊子，建立了临时根据地。

4月上旬，红2、6军团来到云南的普渡河边，计划从这里过河后经元谋北渡金沙江，直上四川。这条路线也是一年前中央红军北上的路线，敌人已有防备。先头第4师强渡普渡河后受到前方敌军反扑，红6军团准备渡河时与侧面围上来的滇军接火，而从湖南、贵州一路尾随的敌“追剿”各纵队也紧追不舍。我军面临陷入敌军前堵后追两面夹击的境地。

清晨，第6师刚刚经过一整夜的行军到达宿营地，准备休息。总指挥部派人飞马跑来，向郭鹏师长、廖汉生政委传达贺龙的命令：第6师立即原路返回，赶到六甲，最好赶过六甲，阻击敌人追兵，掩护主力改道转移。

廖政委和郭师长当即决定：全师后卫变前卫，马上出发，强行军回师六甲。他俩分头通知第16团、17团，同时派人通知后卫第18团。他们边走边下达部署，边进行动员：“估计时间、距离和敌我的行军速度，很可能在六甲与敌人打一个遭遇仗，一定要争取先敌之利。这是一场关系全军安危的战斗，要不怕疲劳、不怕牺牲，坚决阻住敌人！”

上午，前卫第 18 团果然在六甲与敌先头部队遭遇。敌人没想到红军会突然杀一个回马枪，措手不及。第 18 团一下子就消灭了敌先头部队，抢占了山头有利地形。郭师长和廖政委带着第 16 团、17 团随后赶到，展开了一场阻击战。

这是第 6 师长征中打得最残酷的一仗。敌军一个旅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发动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攻。第 6 师伤亡 200 余人，其中第 18 团的政委杨秀山、参谋长陈刚负伤，3 个营长伤亡 2 个，9 个连长伤亡 8 个；第 16 团的参谋长和两个营长牺牲，6 个连长负伤；师长郭鹏也在指挥中负了伤。但是全师指战员依靠灵活机动的战术技术、深入有力的战场鼓动、高昂旺盛的战斗意志，顽强抗击，血战竟日，把敌军死死顶住了，又在第 5 师增援部队的配合下打垮了敌军，保障了全军安全转移。

天黑后，廖汉生带领苦战一天的部队，掩埋了牺牲的战友，抬着伤员，追赶主力。

在一个岔路口，他看到贺老总指挥等候在那里，亲自为第 6 师指路。

贺老总对廖汉生说：“你们 6 师这一仗打得苦，打得好啊！”接着，他又交代说：“这一次我们的情况很紧张。明天敌人飞机来了都不要隐蔽，继续行军。能不能保住我们这些本钱，就看能不能甩脱敌人了。”

次日，第 6 师担任前卫，急行军南下昆明，攻占距昆明仅 20 公里的富民县城，威逼昆明。当大批敌军回救昆明时，红 2、6 军团掉头西去，甩开敌人，沿着滇西大道向金沙江上游急进。各师交替担任前卫，展开夺城大赛，几乎是一日攻克一座县城。

4 月 18 日夜，前卫第 6 师来到祥云城下，先头第 18 团只用半个小时就占领了县城，活捉了敌县长、团总以及 2000 多名团防队员。师部进城后，廖汉生政委指示师政治部把那些团防队员集中起来，宣传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揭露地主官吏压迫穷人的罪恶，讲清当兵就要当红军的道理。经过一天的工作，争取了其中的 1000 多人参加红军，一边行军一边训练，很快就补充到部队中。

长征路上，红军兵员的补充全靠各单位自己扩红。哪个单位抓的俘虏多，扩红工作搞得好，补充得及时，哪个单位的战斗力就强一些，哪个指挥员的日子就会好过些。作为师政委的廖汉生，肩上理所当然地担负着补充全师兵员的重大责任。

在湘中的淑浦、贵州的黔西、云南的祥云，每到一地，廖汉生都组织全师各单位的宣传队、扩红队，深入到群众中去，传播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动员群众参加红军。第 6 师先后吸收了 3000 多名工农群众参军，使部队在历经激烈战斗和艰苦行军后，能够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保持着永不枯竭的战斗力。

据当时统计，第 6 师长征出发时有 3303 人，过金沙江前后已减员 1000 多人，由于及时补充兵源，全师仍保持有 3044 人。为此，红 2 军团政治部在政治工作总结报告中，对第 6 师的扩红成绩给予了高度赞扬。

#### 草地后卫

渡过金沙江以后，红 2、6 军团进入了藏民区和雪山草地。敌军的围追堵截暂时没有了，随之而来的却是从未遇到过的恶劣的自然环境。廖汉生政委及时将全师政治工作的中心，由保证战斗胜利转变为向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

在风俗迥异的藏民区，他教育部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的群众纪律，尊重藏民风俗习惯，筹粮时要留下银元或借条。

在雪山连绵的康藏高原，他带领政治干部组织收容队，带头帮助体弱有病的同志背起“加枪”，把自己的骡马让给伤病员骑，每到宿营地安排好部队后又返回去接应掉队人员。

5月中旬的一天，第6师担任前卫来到得荣县城，原以为可以在这里筹到粮食，没想到眼前的县城竟然只有三栋破房子。被第6师捉到的得荣县长，本是湖南长沙人，在这里当县长居然要靠打草鞋卖来糊口。此地之穷，可想而知。

从得荣出发后的一天，红2军团参谋长李达来到第6师，摊开地图，指着一个地方，下达了总指挥部的命令：军团直属队已经断粮，第6师把粮食调剂给直属队，你们另外去这个地方筹粮，到达后不要回来了，沿金沙江北上。

部队继续行军时，路边摆好了箩筐。廖汉生政委带头来到箩筐前，摘下粮袋，把里面本来就不多的青稞粉全部倒了进去，随后全师同志依次走过，每过一个人就倒光一条粮袋。将这些粮食留给直属队。

第6师在李达参谋长带领下到达指定地域，看到地里的青稞还没有成熟，无法收割。筹粮未成，部队继续沿金沙江北上。

7月初，红2、6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红2、6军团和红32军（原红一方面军的第9军团）合编，成立了红二方面军。红二、四方面军团结北上，相继进入了草地。

进草地前，贺炳炎接替郭鹏担任了第6师师长。

绵延数百公里的水草地，预计要走十几天，实际走了一个多月。第6师从甘孜出发时筹集不到足够的粮食，每人只携带了一天半食量的青稞粉子就匆匆进入了草地。

在第6师前面，红一方面军一年前就走过去了，红四方面军已是三过草地了，红二方面军主力也正在通过。前面的每一支部队都经历了吃野菜、啃牛皮、嚼草根的困难境地，而走在最后面的第6师，遇到的困难自然更大。

走了17天后，第6师来到有“草地上海”美称的阿坝，已经无粮可筹，连宿营地附近的野菜都被采光了，留下的只是前面部队无法掩埋的尸体。在这个“草地上海”，第6师一天就饿死了十几个人。

为了走出草地，从师政委到连指导员，每个政治干部都承担起为部队寻找食物的艰巨任务。第17团政委因为筹不到粮食被方面军政治部撤了职，第18团政委董瑞林在外出给部队筹粮的路上被冷枪击中牺牲了。

在这种情况下，粮食就是生命，粮食就是政治！

廖汉生政委根据在湘鄂边山区游击生活的经验，向部队介绍哪种野菜有毒，哪种可以吃。有时候拿不准，他就自己先尝一尝，确实没毒再推广开来。他动员大家挖野菜，捡马骨，寻找一切可以充饥的东西来吃。

作为师的领导干部，廖汉生既要指导部队找吃的，还必须解决自身的饥饿问题。

一次，他和师长贺炳炎出去采野菜，跑了很远才找到一点。天边，乌云逐渐压过来。贺师长看了看天，说道：“算了，回去吧，要淋雨了。”他说：“回去今晚我们吃什么？再坚持一会儿吧。”结果，两个人被大雨浇得湿透，总算采回一些野菜，掺上青稞粉子，熬了一锅野菜糊糊充饥。



看到师长、政委每天为解决部队吃的到处奔忙，自己还常常饿肚子，战士们十分心疼。

一天，廖汉生什么吃的都没有了。师部警卫班不知从哪里找到一小块牛皮，看上去象是一个草鞋底子，警卫员们把它刮洗干净，烤得焦黄，拿到他的面前，说，“政委，你饿了吧？快吃吧。”

廖汉生大发脾气：“我饿，你们就不饿？为什么就该我吃？”

“你是首长嘛，事情多，吃了好办事情。”

廖汉生一听更火了，狠狠地把几个警卫员骂了一通。他嘴上发着火，泪水却悄悄地流下来，心想，大家都是20来岁的人，谁不饿呀，可是战士们为了照顾首长，宁愿自己饿肚子。这种阶级感情实在是深啊！

他们推过来，让过去，谁也没吃，而是把那块牛皮留给了更需要的同志。

作为后卫，第6师担负着收容前面部队掉队人员的任务。前面部队的人掉队了，在这里可以收容起来，而从这里再掉队恐怕永远也赶不上了，因此第6师竭尽全力不让一个同志掉队。

第6师收容的掉队人员，有红二方面军的，也有红四方面军的，甚至还有红一方面军的，可以说是整个红军的总收容队。

在收容的人员当中有一批红四方面军的小鬼。他们人小力薄掉了队，被收容后由师部带着行军。

相处熟了，有的“小鬼”带着稚气对廖汉生政委说：“从前我们啥子也不晓得，后来张国焘主席教我们唱歌子，一唱就啥子也晓得了，毛周张博是机会主义逃跑。”

廖汉生听后，用大量的事实向红小鬼们解释党中央的北上抗日路线，说明：“中央红军北上绝不是机会主义逃跑，相反是为了担负起抗日救国的重担，走向抗日前线。你们看，我们今天不是正在沿着中央的路线走吗？”

正是依靠团结的力量和顽强的意志，廖汉生政委和贺炳炎师长带领全师胜利走出了草地。

### 统战风波

1936年11月，红军三大主力齐集陕甘边，进行了山城堡战役，这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

其实，在当时还不能讲是最后一仗。山城堡之后，战事未了。蒋介石顽固坚持反共内战政策，于12月间亲赴西安部署“剿共”，督逼张学良、杨虎城向红军进攻。

红二方面军驻扎在陕甘边界的环县、定边一带休整备战。这里的条件仍然十分艰苦。喝的是苦咸水，住的是土窑洞，初冬季节，寒风凛冽。国民党军的飞机在驻地上空侦察、骚扰，欺负红军没有对空武器，子弹也不多，毫无顾忌地从头上只有屋顶高的高度飞过，撩起一股股黄尘，气得战士们指着飞机斥责：“有本事怎么不去打日本，在红军头上逞什么威风？”

这天晚上，贺炳炎师长带着部队到野外进行夜间训练，廖汉生政委留在师部值班。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来，他抓起话筒，对方是新任红二方面军参谋长的周士第。

周士第参谋长操着一口浓重的广东话，语气又急又激动，又是新来乍到，廖汉生一时听不懂他讲的什么，猜也猜不出，急得对方在电话里喊叫了半天，其实就是一句话，后来廖汉生终于听懂了，也情不自禁地喊起来：“抓住蒋介石啦！”

廖汉生放下话筒，跑到野外训练场，高声宣布：“抓住蒋介石啦！”

训练场上顿时爆发出惊喜若狂的欢呼声，在夜空中久久回荡，传遍了附近的山岭沟壑。

当晚，廖汉生和贺炳炎带领团以上干部赶到方面军总指挥部参加紧急会议。贺尤总指挥、关向应政委传达了上级的情况通报：东北军的张学良和西北军的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

这一夜，廖汉生和所有红军指战员一样，兴奋得通宵睡不着觉，心中思绪万千，感慨万千：“这个蒋介石呀，从他背叛革命以来，打死了我们多少人，杀害了我们多少亲属和工农群众呀！这回捉到他了，应该好好清算总帐了！”高兴之中，也有几分担心，担心张杨部队会不会再把蒋介石放掉。

为了防止国民党军进攻西安，红二方面军迅速南下三原、富平一带备战。

不久，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对于我党和平解决的方针，红军指战员是拥护的。但是对于放蒋，不少人在思想上不通，在感情上接受不了。一些同志来到师部，向廖汉生政委诉说：“这个蒋介石打了我们十年呀！远的不说，长征时把我们赶得那样苦，死了那样多人，现在就把他白白地放走了？”

尤其是蒋介石回到南京以后，背信弃义，拘禁张学良，进兵蒲城，使西北地区战云密布。这一下，就连师里有的指挥员也向廖汉生发牢骚：“看看吧，我们在讲统一战线，可人家却在进攻！”

转过年来，我党中央为促进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于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电文指出，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我党愿作出以下四项保证：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后来又经过国共两党的多次谈判，蒋介石最终同意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国内战争结束了，伟大的民族抗战就要来到了。

这又一次在部队中掀起了轩然大波。许多人一下子转不过弯子，有的怀疑这会不会否定红军十年的奋斗，有的认为这是不是等于向国民党投降……一时间不满情绪颇大。

在短短几个月里，一个转变接着一个转变，实在是太快、太多、太大了。对于这些巨大变化，甚至连廖汉生自己也搞不大懂。但是，大家有个优点，就是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认真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和部署进行统一战线的学习、教育。廖汉生自己学，组织全师学，针对各种思想疑虑做解释，使每个人都能逐步明白：民族矛盾是当前的主要矛盾，抗日救国是革命的首要任务；捉蒋放蒋，都是为了逼蒋联蒋抗日；停止土地革命政策，是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以我们的让步来换取内战的停止和统一战线的建立

1937年3月，红二方面军在古时以盛产耀州瓷而得名的陈炉镇召开了党代表大会。各师团党员负责干部和连队代表参加了这次盛会。大会总结了红二方面军所属各部队在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决议拥护党中央的路线，加强部队的教育训练。在这次大会上，廖汉生被选为出席党的苏区代表会议代表。

5月1日，廖汉生和红二方面军其他代表由关向应政委带领赶到延安。

对于廖汉生等红2军团的干部来说，他们从这支部队创建以来始终就与党中央分隔两地，党中央的文件、指示除了靠时断时续的电报沟通外，大多数情况下是靠交通员携带密写信来传递。如今，他们第一次出席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第一次和来自各个苏区的党政军高级干部在一起讨论党的重大事情，第一次面对面地和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众多中央领导同志坐在一起开会，第一次直接地、原原本本地聆听党的报告，因此感到特别兴奋。根据代表们反映部队中的各种思想情绪，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会议统一了思想，通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前阶段的任务》的决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政治路线，批准将红军和苏维埃政府改名。

十几天的会议结束后，廖汉生原来憋在心里的疑虑和担心消除了，对部队做工作更有本钱了。他把党中央的精神带回去，进行传达学习，统一了全师指战员的思想。

在统一战线教育的同时，红军普遍开展学习革命理论和文化活动。过去对于马克思、列宁，大多数人只知道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人没见过，书没读过，现在每个单位“列宁室”里都张贴着革命导师画像，廖汉生和战士们从那里认识了：大胡子叫马克思，光头的叫列宁。他们比较系统地学习了《政治常识》、《党的建设》、《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论帝国主义》等普及性的小册子，得到一次革命理论的启蒙教育。

红军本色不能丢

随着国内和平和国共合作的实现，红军各部队驻下来进行军政整训，准备改编，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一段时间里不再奔波行军，没有流血牺牲，除了训练演习，听不到枪声，看不到硝烟，苏区也与外界沟通了联系，一些指战员与家人通了书信。

一天，廖汉生意外地收到家乡来信，拆开一看，不是家人的，却是乡团防朱照环写的，洋洋洒洒几大篇，除了讲些高小同学的老话，主要是说曾在廖汉生探家时袭击他的家，把他弟媳打死了，表示道歉，还说已经给他弟弟另找了一个媳妇。廖汉生不理睬朱照环假惺惺的一套，没有回信。

在国内和平的新环境中，大多数人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也有少数人昏了头，斗志衰退，产生了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情绪，以为和平了，该回家了，团防不会再杀他，家人也不会再被当作“匪属”遭迫害，于是开了小差。有个团一次就跑了三个连长。廖汉生接到报告后立即派人把他们拦了回来。

在干部会上，廖汉生痛心地说：“这些开小差的同志，过去都是在红军里长大的红小鬼，在反‘围剿’的战场上没有退缩，在雪山草地的长征中没有掉队，却在一时的和平中动摇了，忘记了一直奋斗的事业，忘记了抗日救国的责任！”他组织全师深入开展保持红军光荣传统的教育，开展思想斗争，敲响思想警钟，认清：国内革命战争虽然结束了，抗日民族战争即将到来；红军虽然要改编了，红军的传统和本色却永远不能丢！

为了更好地担负起抗日救国的责任，第6师派出扩红队、宣传队到驻地群众中，大张旗鼓地宣传党和红军的抗日主张，在激发群众爱国热情的基础上扩大红军。

一天，廖汉生只带了两个警卫员，骑马来到离驻地几十公里的咸阳城下，要进去搞宣传。

警卫员急忙拦住他：“政委，那里是白区，有危险，还是不要进去吧。”

廖汉生说：“怕什么，跟我走。”他径直来到城门前。把守城门的是东北军士兵，看到他是红军，问也没问就让进去了。廖汉生找到城里的抗日救国会，只见人来人往的很多。他抓住机会慷慨激昂地演说起来，把共产党和红军的抗日主张讲了一通，救国会工作人员和过往群众热烈鼓掌，纷纷表示赞同，也对他只身进咸阳的胆量表示敬佩。

廖汉生了解到咸阳有个棉花打包厂，不景气，关闭了，工人们失了业。他派师扩红队到厂里把抗日救国的道理向工人们一讲，立即得到热烈响应，扩大了上百名工人参加红军。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工农红军请缨抗战，进行改编。红二方面军与陕北红军一部合编为八路军第120师，第6师与第28军合编为第716团。红第28军军长宋时轮任团长。由于整编是按照国民革命军的统一编制搞的，撤销了红军原来的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政治干部改任副职。廖汉生由第6师政委改任第716团副团长。

改编完成后，接下来就要更换服装。红军与国民革命军的衣服式样区别不大，都是中山装，因为红军本来也是从国民革命军那里决裂出来的；然而，帽子却大不一样，红军的帽子上面有一颗红布做的五角星，国民革命军的帽子上钉着“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党徽。在红军指战员的眼里，红与白分别是革命与反革命的象征，长达十年里两者是不共戴天的敌人，现在却要戴同一顶帽子，总感到十分别扭。但是大敌当前，又不能不戴。

为了满足指战员对红军帽的留恋，廖汉生把富平城里的照相师傅请到第6师驻地，在土戏台上挂起大幅红布作背景，给每个人照一张红军纪念像。

那一天，廖汉生拿出一身最好的军装，仔细扎好绑腿，穿上缀着红绒球的新草鞋，身上披挂着从警卫员那里借来的皮制子弹袋和驳壳枪，端端正正地带上红军帽，照下一张神气的红军像，作为红军师政委的珍贵纪念。

几天后，廖汉生怀揣红军像，率部开赴抗日前线。

六十甲子一轮回。

60年前，20来岁的红军师政委，如今已经是耄耋之年的世纪老人。廖汉生将军谈起自己54年的军旅生涯，谈起同样是54年的政治工作经历，谈起红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感慨良多：

“同今天相比，当年红军政治干部，特别是我们师以下干部，大多数人的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都较低，讲不出好多深奥的道理，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读得很少，有些同志甚至识字也不多，这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但是，我们也有一个长处，就是身体力行，身先士卒，身教重于言教，以自身的模范行动来带动和影响部队。因此，我们做政治工作就很有号召力、感染力、凝聚力。”

廖汉生当红军师政委三年，他给自己总结了三条经验：“第一条，打仗不怕死，即做英勇战斗的模范；第二条，多扩大一些人，少减员一些人，即做扩大与巩固部队的模范；第三条，按政策纪律办事，不搞特殊，即做联系群众的模范。”

这三条经验，既是他个人的经验，也是许多红军政治干部的共同经验，是他以后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后当团政委、旅政委、分区政委、纵队政委、军政委、军区政委，乃至他整个政治工作生涯中始终恪守的准则。

